

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建立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1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
专项经费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1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编的《北方民族考古》系列丛书的第1辑，主要收录了为纪念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建立十周年由本学科部分师生撰写的24篇学术论文，内容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涉及文化谱系、古代都城与墓葬、古代北方民族与体质人类学、佛教与美术考古等。文后附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成立大会和学科建设研讨会发言辑录。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艺术学研究者及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 第1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7-03-042128-9

Ⅰ. ①北… Ⅱ. ①中…②中… Ⅲ.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2299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韩 杨 彭 涛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张 放 李雨濛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四季青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7 1/4

字数：650 000

定价：1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委员会

序　　言

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的建立已经走过了十年。

十年，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留下的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短暂记忆；十年，对于长年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我来说，进入高校则无疑是丢下了原来拥有的一切而选择了艰难的二次创业。

2002年深秋之时，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所所长和历史系主任的成崇德教授，作为北京市“居延沧桑”摄制组的学术顾问，与正在内蒙古居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我盘桓数日。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中国人民大学为建立考古学科引进人才而对我进行的一次专门的考察。随后，便是与当时历史学院院长陈桦教授和学校领导的几次长谈，他们对建立考古学科的迫切期望和欢迎我加盟的殷切之情，使我打消了疑虑。2004年6月18日我在学校人事处正式报到，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的正式一员。

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学校和院系领导及学术团队的支持。多年的工作实践和科研历程也使我深刻理解了“欲要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的辩证关系。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所以在十年间能够有所发展并取得一定进步，恰恰是由于学校领导坚定不移发展考古学科的决心、历史学院几任班子的积极支持、考古学专业师生的不懈努力和把握住了几次机遇的结果。

2004年秋，我们在历史学院创立了“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学科点，并于2005年1月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以推进考古学科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起步；同年设置考古学专业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并开始招收研究生；2006年启动历史专业本科生和考古专业研究生的田野实习，并开始在各地设立田野考古实习基地；2007年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并开始举办文物陈列；2010年获准设立考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011年7月考古学获教育部一级学科授予权；同年增设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点开始招生；2012年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的团体会员；2013年1月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团体发掘资格”；同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置考古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同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正式成立；2014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在辽宁喀左县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田野考古实习基地”。至此，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形成了完备的本、硕、博学科培养体系。

考古学科建立之初，我们就明确制定了立足中国北方，逐步发展中亚考古的基本方针，而且注意招收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考生，目前部分研究生已经毕业返回新疆、内

蒙古等地从事考古和文博工作。近年来，我们不但加强了新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同时，随着师资队伍的扩大和科研力量的加强，我们也开始注意在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的学科布局，目前已经在河北、北京、内蒙古、辽宁、新疆、湖北、重庆和江西等省区建立了田野考古实习基地，以期建立更为完备的学科培养体系。

经过十年的发展，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考古文博系设有先秦考古、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文博科技考古四个教研室。现有专职教师11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2人、讲师6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另有专聘校外兼职博士生、硕士生导师9人，博士后进站研究人员3人，师资队伍覆盖不同年龄段和专业方向，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次和科研布局。经过几年的培养，目前已毕业博士研究生8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7名、专业硕士研究生26名。现有在读博士研究生10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7名、专业硕士研究生42名，其中有留学生3名。

在学术研究上，考古文博系教师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和北京市社科联项目等多项重大科研课题，2014年更是一次获得4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础研究之外，多年来考古学科师生主动参与南水北调、西部开发、北京市基建项目和上海广富林等诸多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20余项，同时受邀与各地相关部门合作，签定专项课题研究协议，责成专人负责，为研究生培养找到了新的模式。此外，通过学术访问、合作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研究生论坛和学术讲座等方式，与美国、俄罗斯、蒙古、日本、韩国等，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和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

紧紧抓住田野考古实习是高校考古学科发展的根本。自2006至2014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10届历史专业本科生和考古文博专业研究生的田野考古实习。考古实习不但可以使学生掌握考古学的方法和基本技能，也给他们创造了一个了解社会的机会，同时也在实践中磨练了年轻人的意志品质。记得我在为前六届考古实习的同学编辑的《历练与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田野考古教学实习纪实》那本书的后记里曾写过这样几句话：田野考古实习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贯穿始终的严谨学术思想和互相帮助的协作精神；是烈日下挥汗如雨而从不抱怨的坚毅品格；是同学们用心回味的"人生在世，当以情义为重"的朴素观念；是在举杯同贺时山呼海啸般的那一声"干杯"的畅快淋漓！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初衷，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次返璞归真的洗礼。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这样的洗礼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学子来说，实在是受益良多。

这本论文集是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十年发展的见证与总结，汇集了每个教师和部分同学的研究成果。目前看起来，集子中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还不够宽展，有些论文甚至还显得单薄、稚嫩。但这毕竟是以《北方民族考古》文集的形式，给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恳请学界前辈和同仁在呵护之余，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

在这本文集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为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建立、成长而奔波、

操持的陈桦、成崇德教授！感谢为考古学科发展、为田野考古实习规范化出谋划策的刘后滨、李小树教授！感谢为考古学科壮大和人才引进不遗余力的孙家洲、黄兴涛教授！感谢在考古学科走过的十年中，一直伴随着我们，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历史学院老师和同仁们！

在此，我要感谢我们团结、和谐，共同奋斗的考古团队和已经毕业或在读的同学们，学科的发展和壮大有着每一个人的心血！还要感谢为这本文集的稿件收集、前期编辑付出辛苦的马利清老师！感谢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为本文集的如期出版做出巨大努力的王琳玮编辑！

十年磨一剑。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已形成了自身的教学特色和研究专长，逐渐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让我们期待这课扎根于北方沃土的小树，在下一个十年里，栉风沐雨，枝繁叶茂。

魏　坚

2014年9月29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目　　录

细石叶技术的生态适应性

——以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材料为视角

仪明洁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北方地区含细石叶技术的遗址有了连续报道，关于更新世晚期末段气候与环境的研究日益细致化。本文立足于以上报道与研究，旨在从细石叶技术的扩散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狩猎采集者技术组织与群体流动性的角度讨论细石叶技术的生态适应性，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技术、环境、资源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所用的年代数据，除特殊说明者之外，均为校正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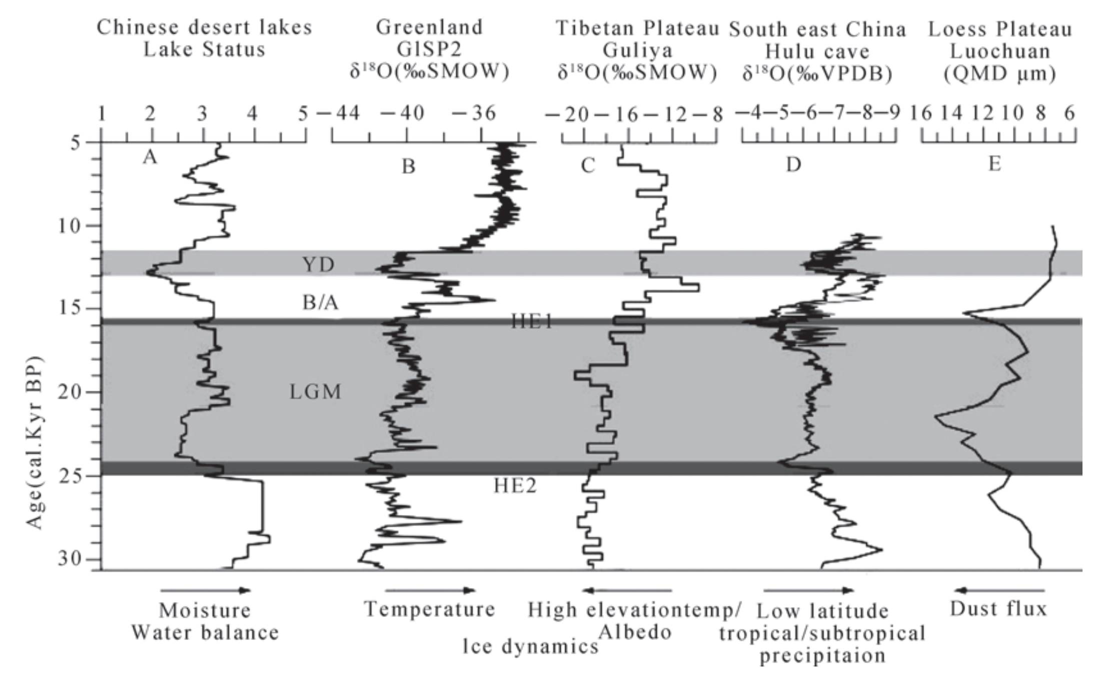
二、环境背景

旧石器时代晚期处于全球气候大变动时期，这个阶段经过多次冷期、暖期气候旋回，包括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Maritime Isotopic Stage 3，MIS3）、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博令（Bölling）/阿勒罗德（Allërod）事件（B/A）、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 Event，YD）、全新世早期的升温期等（图一），气候的多次起伏变化，与人类生存空间、生存方式的转变有极大相关性。

（一）深海氧同位素3阶段（MIS3）环境特征

Antje[1]对来自全球冰芯、陆地和海洋的MIS3气候记录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全球183个MIS3阶段的气候记录表明这一末次冰期中气候相对温湿的时段具有全球性，来自黄土、沙漠、湖泊、石笋、冰芯等多方面的记录显示了极大同步性[2]。

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发育的黄土对第四纪气候变化有基本连续的记录，气候的周期性冷暖更替表现为黄土堆积与古土壤发育的更迭。塬堡剖面研究表明31～25kaBP是中等温湿时期，雨热条件适宜；洛川马兰黄土及下伏古土壤地层剖面的研究同样指出了这个阶段的湿润性[3]。在AMS^{14}C数据支持下，甘肃静宁地区酸刺沟剖面高分辨率花粉记



图一　30～5kaBP气候变化记录[4]

录了在44～25kaBP的大部分时期生长了以云杉和松为主的针叶林；宁夏水洞沟地区在MIS3阶段的生态环境大致为阔叶疏林草原[5]，具有适宜动植物生存的自然条件。

在MIS3的后半阶段，青藏高原的气候表现得异常温暖、湿润，达到间冰期的程度，施雅风等称之为“特强夏季风事件”或“高温大降水事件”[6]。根据柴达木盆地查尔汗盐湖钻孔岩心中的石盐—水包体δD和δ^{18}O测定推算，50～30kaBP的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约2℃，暖湿气候使青藏高原的湖泊水面升高、湖面增大[7]。在35～22kaBP期间，腾格里古湖泊出现最高水位且居高波动，形成腾格里大湖期，腾格里沙漠的温度和湿度均大于现在的数值[8]。

（二）末次盛冰期（LGM）环境特征

末次盛冰期的黄土土质均一、疏松，富含大孔隙，显示寒冷干旱的气候特征[9]，渭南黄土剖面陆生蜗牛化石的迅速演替反映了气候快速的变化过程和温湿度的组合关系，冬季风的强化缩短了夏季风在黄土高原地区的滞留时间，加大了季节性差异[10]。

孢粉记录显示，末次盛冰期干冷气候条件造成草原和沙漠带同时向南急速扩张[11]，在北纬30°出现稀树草原景观，分布一部分沙漠生物群[12]。甘肃静宁地区酸刺沟剖面高分辨率花粉显示，23kaBP之后，该地区气候冷干，植被以稀树草原为主，18kaBP左右甚至演化为荒漠草原[13]。

此阶段的青藏高原广泛发育冰卷泥和沙楔，雨量减少，气温骤降，处于一个干冷

气候期[14]。贾玉连等人[15]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及北侧新疆区诸多湖泊的高湖面从40kaBP以前开始存在，持续到24kaBP，到20～15kaBP出现最低湖面。

（三）博令/阿勒罗德（B/A）环境特征

末次冰消期伊始，北半球气温短暂回升，主要气候事件是博令/阿勒罗德事件（B/A）。此阶段中国北方的湖泊虽有扩张，但是并没有恢复到末次盛冰期之前的状态[16]。

末次盛冰期之后，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显著回暖[17]。伴随这一过程，黄土高原西部地区的孢粉中木本植物的成分逐渐增加，呈现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末次冰消期之初是花粉浓度低的荒漠草原和草原景观；博令/阿勒罗德时期气候条件好转，孢粉构成呈现指代暖湿气候特征的森林和草原景观的状态，14～12.9kaBP期间植被由干旱草原迅速演化为森林，气候快速变湿，期间气候存在次一级的干湿波动[18]。

南京葫芦洞的 δ^{18}O结果显示，博令/阿勒罗德时期夏季风增强，降水量上升[19]。贵州七星洞石笋的 δ^{18}O在15.5kaBP以后向偏轻方向迅速转变，在13～14kaBP前后达到了最轻值，说明这时的夏季风有一个强劲的峰值。贵州凉风洞石笋、衙门洞石笋均有的同步记录[20]。

（四）新仙女木事件（YD）环境特征

周卫建[21]通过近100个AMS^{14}C数据和上千个有机碳 δ^{13}C、有机碳百分含量、花粉、粒度和磁化率等多个气候代用指标数据的测试及相应时间序列的建立，揭示了沙漠/黄土过渡带及其林区的高分辨率泥炭、黄土—古土壤及风成沙—古土壤序列的新仙女木事件，指出在11～10 kaBP（未校正）之间为干冷气候。在宁夏贺兰山东南缘的鸽子山遗址剖面上，两层古土壤之间有因气候干冷而形成的风成沉积，其年代约13.5～11.6kaBP[22]。李家塬剖面沉积的沙漠环境不稳定性记录得出的沉积学指标变化曲线显示，约13～11.5kaBP黄土沉积中出现了砂粒增多的现象[23]，指代了寒冷的气候。黄土高原西部的海原剖面和会宁剖面的孢粉分析结果显示12.6～11.4kaBP孢粉总浓度下降，以蒿属、藜科和禾本科为主的灌木及草本花粉含量快速增加，此期间森林退化，荒漠草原发育，气候明显变干。黄土高原富县与临夏剖面的孢粉也记录了11～10kaBP（未校正）的寒冷事件[24]。古里雅冰芯研究显示大约在13.2～11.8kaBP出现冷事件[25]。此阶段青海湖的孢粉也由木本向草本方向转变，气候变冷[26]。

（五）早全新世环境特征

进入早全新世，全球温度大幅度回升，其中高纬度的变化比较显著。格陵兰冰芯

$\delta^{18}O$记录的升温过程始于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持续到约10kaBP，此过程中虽然有冷干事件的发生，出现气候的起伏变化，但是温度的下降幅度远低于末次冰期阶段[27]。兰州附近塬堡等地区黄土沉积的磁化率、粒度分析及碳酸钙沉积显示，进入全新世以后，气温的逐渐攀升与格陵兰冰芯的曲线是一致的[28]。

自10.4kaBP（未校正）开始，进入全新世的青海湖孢粉浓度急剧增高，植被类型逐步向森林草原过渡，10.4～8.6kaBP（未校正）期间，乔木以温性阔叶树种桦占优势，湿生莎草明显增多，旱生白刺相对减少，气候温暖偏干[29]。若尔盖地区的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自10kaBP（未校正）起气候明显好转，至9.4 kaBP（未校正）进入全新世大暖期[30]。在9.8～9.6 kaBP（未校正）期间，宁夏南部海原剖面的针叶树花粉含量和浓度快速上升，阔叶树和草本花粉浓度也有增加，植被快速过渡为以松和云杉为主的针叶林，气候温凉湿润；9.6～7.6 kaBP（未校正）期间，气候有一定波动，孢粉总浓度和针叶树花粉浓度较低，阔叶树花粉浓度略有增加，森林草原发育，气候较温暖湿润[31]。

三、相关发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北方地区陆续发现从约距今29000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多个含细石叶技术的遗址点，为解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与人类活动特点，全面了解该阶段不同人群在此区域适应生存的策略和模式提供了材料。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细石叶技术的使用过程可以划分为萌芽期、扩散期、爆发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32]，笔者对此做简要介绍。

（一）萌　芽　期

该阶段出土细石器的遗址数量寥寥可数，其中包括近年来发现的龙王辿遗址、柿子滩遗址S29及S14地点、西施遗址、彭阳03地点[33]。针对这些遗址的多手段测年数据显示，细石叶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的时间不晚于25kaBP，甚至可能超过27kaBP或更早阶段，此后直至18kaBP前后，细石叶技术并未在华北地区大规模传播。该阶段的细石器遗存数量少，零星分布，是细石叶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萌芽期。

（二）扩　散　期

这一时期大致为距今18～14ka前后。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到晚期，由直接打击的、以小石制品为主的主工业中国北方地区延续，发展连续、滞缓[34]。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石器面貌开始转变。含细石叶技术的遗址数量渐多、分布区域扩大、技术日渐成熟。在以泥河湾盆地为代表的区域，出现了同时期内传统打制石器技术与细

石叶技术并存的现象，前者表现为梅沟地点、苇地坡地点、西白马营遗址[35]，后者的代表为二道梁遗址[36]。类似的情况在大地湾遗址、鸽子山遗址的相关层位也有反映[37]。这些同时期的遗址中存在截然不同的技术传统，暗示着此时是一个细石叶技术与传统打制石器技术并重的阶段，掌握了两种技术的人群发生交汇。

（三）爆　发　期

这一阶段约为距今14～10ka前后。

目前为止，该阶段中国北方地区经过系统发掘、测年的以传统打制石器技术为主体的遗址近乎缺失，与之不同的是细石器遗存的大量出现。尽管多数细石器遗存暴露于地表故而无法测定其年代，但不与陶器大量共生的状况以及部分经过年代测定的遗址可让我们判断处于地表的遗址的年代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该时期细石器遗存常以地点群的形式出现[38]，包括柿子滩遗址、鸽子山遗址、大地湾遗址的相关层位、虎头梁遗址、籍箕滩遗址为代表的一批遗址[39]，此外，近年来在青海湖周边区域也发现了处于这一阶段的大量细石器遗存[40][41]，显示了新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存在的普遍性。

（四）衰　落　期

进入早期新石器时代后，人群流动性降低，定居性的增强，动植物资源的驯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食物需求，人群流动中所需的生产、生活工具减少。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使用渐多，细石叶技术产品的比重逐渐降低。除大地湾遗址[42]显示了细石叶技术的衰落外，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李家沟遗址[43]也是其中的代表。

四、生态适应性

流动性是狩猎采集者对某个环境中特定阶段资源分布状况的定位策略[44]。Murdock[45]按照其流动性将168个民族学数据中的狩猎采集者划分为四种群体：①完全的流动群体；②半流动性群体：其成员每年有大半的时间为游动的，但是在特定时间或季节会占据固定居址；③半定居群体：其成员随季节变化而使用不同居址，或当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季节性地开发新的营地时，其他成员相对持续地使用某一固定居址；④相对的定居群体。Binford[46]按照不同环境、资源条件下的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策略，将之以采食者（forager）—集食者（collector）模型概述，在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狩猎采集者的生存策略呈现多种变体，随着采食者向集食者的转变，文化的复杂性、石器技术的精致性逐渐加强，高流动性群体的工具较规范、精致、便携带，而简陋、形态多变的权宜工具则对应流动性低、资源可获得性稳定的群体（表一）。

表一　采集者与集食者特征对比

主观 / 客观	采食者	集食者
环境	非季节性、均一	季节性、斑块状
聚落	营地居址、野外活动地点	营地居址、野外活动地点、临时营地、消息站、窖藏
流动性	迁居式	后勤式
技术	一般化、权宜型	专门化、精致型
觅食模式	低收入	高收入
狩猎	机会狩猎	计划狩猎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的气候不断波动，尤其在末次盛冰期及以后的阶段，冷暖、干湿变化剧烈，其中包括著名的博令/阿勒罗德事件、新仙女木事件。在恶化的环境及人口逐渐增长背景下，资源需求量日增，人类的生存压力增大，尤其是在寒冷的末次盛冰期及新仙女木事件阶段，中国北方地区的气温出现大幅度下降，寒冷期变长造成资源匮乏期的进一步增长。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狩猎采集者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除了拓宽食谱、改进技术之外，社会组织、流动形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当时人类的应对策略为：流动性更强，采用更为先进、更高技术组织性的细石叶技术。

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技术迅速超越传统打制石器技术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石器生产的主要方式原因何在呢？

中国北方地区长期连续发展的主工业类型呈现连续、缓慢、渐进的发展格局，主要原因是中国缺乏优质石料。高星和裴树文[47]曾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所使用的原料以脉石英、石英岩、砂岩等劣质石料为主，燧石、黑曜石等优质原料少且个体小，石器原料的质量先天不足。劣质原料不适合制作形态规整的石制品[48]，其影响在中国旧石器早、中期的石器技术中并不显著，但是到生存压力变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环境恶劣时期，如何充分利用为数不多的优质原料，使可获得的资源物尽其用、减少寻找优质石料的时间，已经成为古人类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打制实验中，尽管细石叶技术预制过程耗费的时间是两面器的两倍，但从产品的有效刃缘总长度来看，前者是后者的近7倍[49]。尽管在细石核预制中会出现失败现象，但一旦预制成功，大多数细石核能够连续剥片，产生大量细石叶，更可能使优质原料发挥作用。对于技术娴熟的生产者而言，有些形状合适的优质原料无需预制即可生产细石叶，这又使得部分个体小的优质原料有了用武之地。

工具组合的有效设计和使用对高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影响重大[50]。细石叶的宽度相对一致，不同数量的细石叶可通过组合满足不同的长度需求；细石器复合工具在形态的规整性、生产中的可控制性、使用中的致命性、可依赖性、韧性等方面有独到的优势。

石质工具在寒冷天气易断折，影响觅食的顺利进行；骨质、木质等有机材料韧性强，一旦细石叶部分损坏能够及时更替，在狩猎中更好地需求。在恶劣环境中，狩猎失败带来的影响巨大，为保证成功率，可依赖性强的细石器复合工具的优势凸显［51］。

在有较高的不可预测性环境中，狩猎采集者更需要可维护性强的工具［52］。细石器复合工具的刃部可能在使用中损坏，但是该部位易于替换，且大量细石叶的生产保证了补给；若复合工具的有机部位破损，也可将遗留的细石叶用于新的有机工具。高流动性的狩猎采集者所能随身携带的物品是有限的，工具的重量、尺寸都因之受到影响［53］。与打制石器相比，细石叶、细石核、细石器复合工具轻便易携带，为古人类的高流动性提供便利。

五、结　　论

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气候的不断波动，尤其是连续出现的气候寒冷事件，东亚、北亚地区的狩猎采集者生存压力变大，所在的环境能量产出率下降，资源斑块质量降低，同时人口增长进一步增加了生存压力。为满足生存需求，古人类的流动性增强，对更先进技术的需求加强，以节省优质原料、提高狩猎成功率、降低生存风险。偶然出现的细石叶技术产品在使用中表现出更好的生态适应性，满足人类高流动中生产、加工等多方面的需要，迅速扩散至广大东北亚地区。细石叶技术从距今3万年左右到达中国后一直呈现相对缓慢的发展过程，直到距今约13ka，新仙女木事件的气候剧烈变冷进一步促使中国北方地区人群提高其流动性，细石叶工具在狩猎、后期处理猎物、皮革加工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这些技术、生态优势使这项新技术爆炸性地流传。从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上看，细石叶技术的兴衰过程与气候变化间有较好的耦合关系：在气候寒冷期，人群流动性增强，含细石叶技术的遗址数量增多；气候稳定温暖期，人类的生存压力降低，人群流动性的降低，细石叶技术的优势不再明显，使用相应减少。从这些发现可以得出基本的认识：细石叶技术对寒冷气候有特殊的生态适应性，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适应气候寒冷波动的技术保障之一。

注　　释

［1］ Antje H. L. V.. Global Distribution of Centennial-scale Records for Marine Isotope Stage (MIS) 3: A Database［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002, Vol.21 (10).

［2］ 刘东生，施雅风.以气候变化为标志的中国第四纪地层对比表［J］.第四纪研究，2000（2）.

［3］ a.陈一萌，饶志国，张家武等.中国黄土高原西部马兰黄土记录的MIS3气候特征与全球气候记录的对比研究［J］.第四纪研究，2004（3）.

b.安芷生，卢演俦.华北晚更新世马兰期气候地层划分［J］.科学通报，1984（4）.

［4］ 修改自：Wünnemann B., K. Hartmann, M. Janssen, et al. Responses of Chinese Desert Lakes to

Climate Instability during the Past 45,000 Years［A］.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C］.Amsterdam: Elsevier, 2007.

［5］ a.李春海，唐领余，冯兆东等.甘肃静宁地区晚更新世晚期高分辨率的孢粉记录及其反映的气候变化［J］.中国科学（D辑），2006（5）.

b.高星，袁宝印，裴树文等.水洞沟遗址沉积——地貌演化与古人类生存环境［J］.科学通报，2008（10）.

［6］ a.施雅风，刘晓东，李炳元.距今40～30ka青藏高原特强夏季风事件及其与岁差周期关系［J］.科学通报，1999（14）.

b.施雅风，贾玉连，于革等.30～40kaBP青藏高原高温大降水事件的特征、影响及原因探讨［J］.湖泊科学，2002（1）.

［7］ a.张彭熹，张保珍，洛温斯坦等.古代异常钾盐蒸发的成因——以柴达木盆地查尔汗盐湖钾盐的形成为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b.陈克造，J. M. Bowler，K. Kelts.四万年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变迁［J］.第四纪研究，1990（1）.

c.郑绵平，向军.青藏高原盐湖[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d.李炳元，张青松，王富葆.喀喇昆仑山——西昆仑山地区的湖泊演化［J］.第四纪研究，1991（1）.

［8］ a.张虎才，马玉贞，彭金兰等.距今42～18ka腾格里沙漠古湖泊及古环境［J］.科学通报，2002（24）.

b.张虎才，B.Wünnemann.腾格里沙漠晚更新世以来湖相沉积年代及高湖面期的初步确定［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2）.

d.Zhang H. C., B.Wünnemann, Y. Z. Ma.,et al.. Lake Level and Climate Changes between 42,000 and 18,000 ^{14}Cyr B.P. in the Tengger Desert, Northwestern China［J］. *Quaternary Research*, 2002, Vol.58 (1).

［9］ 雷祥义.黄土高原南部晚更新世黄土地层划分、显微结构及力学性质特征［J］.第四纪研究,1992（2）.

［10］ 吴乃琴，刘秀平，顾兆炎等.末次盛冰期黄土高原蜗牛化石记录的气候快速变化及其影响机制［J］.第四纪研究，2002（3）.

［11］ 中国第四纪孢粉数据库小组.中国中全新世（6kaBP）末次盛冰期（18kaBP）生物群区的重建［J］.植物学报，2000（11）.

［12］ a.Sun X. J., C. Q. Song, F. Y. Wang, et al.. Vegetation History of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during the Last 100,000 Years based on Pollen Data［J］.*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1997, Vol.37.

b.Yu G., X. Chen, J. Ni,et al.. Palaeovegetation of China: A Pollen Data-based Synthesis for the Mid-Holocene and Last Glacial Maximum［J］.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2000,Vol.27.

［13］ 李春海，唐领余，冯兆东.甘肃静宁地区晚更新世晚期高分辨率的孢粉记录及其反映的气候变化［J］.中国科学（D辑），2006（5）.

［14］ a.潘保田，陈发虎.青藏高原东北部15万年来的多年冻土演化［J］.冰川冻土，1997（2）.

b.Derbyshire E, Y. F. Shi, J. J. Li,et al.. Quaternary Glaciation of Tibet: The Geological Evidence［J］.*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1991, Vol.10.

［15］ 贾玉连，施雅风，马春梅.40kaBP来亚非季风演化趋势及青藏高原泛湖［J］.地理学报，2004（6）.

［16］ a.刘东生，施雅风.以气候变化为标志的中国第四纪地层对比表［J］.第四纪研究.2000（2）.

b.Wünnemann B., K. Hartmann, M. Janssen, et al. Responses of Chinese Desert Lakes to Climate Instability during the Past 45,000 Years［A］.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C］.Amsterdam: Elsevier, 2007.

［17］ a.Jones G. A., L. D. Keigwin. Evidence from Fram Strait (78° N) for Early Deglaciation［J］. *Nature*, 1988, Vol.53.

b.Lagerklint I. M., J. Wright. Late Glacial Warming Prior to Heinrich Events1: The Influence of Ice Rafting Large Ice Sheets on the Timing of Initial Warming［J］.*Geology*, 1999, Vol.27.

［18］ a.唐领余，李春海，安成邦.黄土高原西部4万多年以来植被与环境变化的孢粉记［J］.古生物学报，2007（1）.

b.孙爱芝.黄土高原西部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植被及环境变化研究［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c.孙爱芝，马玉贞，冯兆东等.宁夏南部13.0～7.0kaBP期间的孢粉记录及古气候演化［J］.科学通报，2007（3）.

［19］ Wang Y. J., H. Cheng, R. L. Edwards,et al. A High-resolution Absolute-dated Late Pleistocene Monsoon Record from Hulu Cave, China［J］. *Science*, 2001.

［20］ a.张美良，程海，袁道先等.末次冰期贵州七星洞石笋高分辨率气候记录与Heinrich事件［J］.地球学报，2004（3）.

b.刘启明：《贵州凉风洞石笋的古气候记录与古生态环境意义》［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c.杨琰，袁道先，程海等.末次冰消期亚洲季风突变事件的精确定年：以贵州衙门洞石笋为例［J］.中国科学（D辑），2010（2）.

［21］ 周卫建.最近13000年我国环境敏感带的季风气候变迁及～（14）C年代学［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

［22］ Madsen, D. B., J. Z. Li., et al. The Loess/Paleosol Record and the Nature of the Younger Dryas Climate in Central China［J］. *Geoarchaeology*, 1998, Vol.13(8).

［23］ 丁仲礼，孙继敏，刘东生.联系沙漠—黄土演变过程中耦合关系的沉积学指标［J］.中国科学（D辑），1999（1）.

［24］ a.孙爱芝.黄土高原西部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植被及环境变化研究［D］.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b.孙爱芝，马玉贞，冯兆东等.宁夏南部13.0～7.0kaBP期间的孢粉记录及古气候演化［J］.科学通报，2007（3）.

c.李秉成，孙建中.黄土高原晚更新世的植被与气候环境［J］.地理研究，2004（5）.

［25］ Thompson I. G., T. Yao, M. E. Davis, K. A. Henderson,et al. Tropical Climate Instability: The Last Glacial Cycle from a Qinghai-Tibetan Ice Core［J］.*Science*, 1997,Vol.276.

［26］ 刘兴起，沈吉，王苏民.青海湖16ka以来的花粉记录及其古气候古环境演化［J］.科学通报，2002（7）.

［27］ a.Dansgaard W., S. J. Johnson, H. B. Clausen,et al. Evidence for General Instability of Past Climate from a 250-kyr Ice-core Record［J］.*Nature*, 1993, Vol.364 (6434).

b.Jansen E., J. Overpeck, K. R. Briffa, et al.. Paleoclimate. *In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1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PCC*[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8］ Chen F. H., J. Blomendal, J. M. Wang, et al. High Resolution Multi-proxy Climate Records from Chinese Loess: Evidence for Rapid Climatic Changes over the Last 75 kyr［J］.*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1997: 330.

［29］ 刘兴起，沈吉，王苏民等.青海湖16ka以来的花粉记录及其古气候古环境演化［J］.科学通报，2002（17）.

［30］ 阎革，王富葆，韩辉友等.青藏高原东北部30ka以来的古植被与古气候演变序列［J］.中国科学（D辑），1996（2）.

［31］ 孙爱芝，马玉贞，冯兆东.宁夏南部13.0～7.0kaBP期间的孢粉记录及古气候演化［J］.科学通报，2007（3）.

［32］ 仪明洁，高星.细石叶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兴衰［J］.边疆考古研究（待刊）.

［33］ a.尹申平，王小庆.陕西宜川县龙王辿旧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07（7）.

b.石金鸣.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N].中国文物报，2011-1-7（6～7）.

c.柿子滩考古队.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S14地点2002～2005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3（2）.

d.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原腹地首次发现石叶工业——河南登封西施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突破[N].中国文物报，2011-2-25（4）.

e.吉笃学，陈发虎，R.L.Bettinger等.末次盛冰期环境恶化对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影响［J］.人类学学报，2005（4）.

［34］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J］.人类学学报，1990（4）.

［35］ a.梅惠杰.泥河湾盆地梅沟和苇地坡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J］.人类学学报，2006（4）.

b.谢飞，于淑凤.河北阳原西白马营晚期旧石器研究［J］.文物春秋，1989（3）.

［36］ 谢飞，李珺，刘连强.泥河湾旧石器文化[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

［37］ a.张东菊，陈发虎，R. L. Bettinger等.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J］.科学通报，2010（10）.

b.Elston, R. G., C. Xu, et al. New Dates for the North China Mesolithic［J］. *Antiquity*, 1997,Vol. 71(274).

c.Madsen, D. B., J. Z. Li.,et al. The Loess/Paleosol Record and the Nature of the Younger Dryas Climate in Central China［J］. *Geoarchaeology*, 1998,Vol.13 (8).

［38］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产品废弃的文化过程研究［J］.人类学学报，2008（3）.

［39］ a.宋艳花.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石英岩石制品研究［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

b.张东菊，陈发虎，R. L. Bettinger等.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J］.科学通报，2010（10）.

c.Elston, R. G., C. Xu,et al. New Dates for the North China Mesolithic［J］. *Antiquity*, 1997, Vol.71 (274).

［40］ 仪明洁，高星，张晓凌等.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史前遗址2009年调查试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1（2）.

［41］ 张东菊，陈发虎，R. L. Bettinger等.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J］.科学通报，2010（10）.

［42］ a.赵朝洪.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J］.考古，2006（7）.

b.李超荣，郁金城，冯兴无.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新进展［J］.人类学学报，1998（2）.

c.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密李家沟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J］.中原文物，2011（1）.

［43］ Binford L. R.. Willow Smoke and Dogs’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J］. *American Antiquity*, 1980, Vol.45.

［44］ Murdock G. P. Ethnographic atlas: A Summary［J］.*Ethnology*, 1967,Vol. 6.

［45］ a.李春海，唐领余，冯兆东等.甘肃静宁地区晚更新世晚期高分辨率的孢粉记录及其反映的气候变化［J］.中国科学（D辑），2006（5）.

b.高星，袁宝印，裴树文等.水洞沟遗址沉积——地貌演化与古人类生存环境［J］.科学通报，2008（10）.

［46］ 高星，裴树文.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与生存模式的考古学阐释［J］.第四纪研究，2006（4）.

［47］ Andrefsky W. Jr.. Raw-material Availabi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echnology［J］.*American Antiquity*, 1994, Vol.59.

［48］ a.Flenniken, J. J.. The Paleolithic Dyuktai Pressure Blade Technique of Siberia［J］.*Arctic Anthropology*, 1987, Vol.24 (2).

b.Elston R. G., P. J. Brantingham. Microlithic Technology in Northeast Asia: A Risk Minimizing Strategy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Early Holocene［A］. *Thinking Small: 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12［C］.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49］ a.Kelly R.. Hunter-gatherer Mobility Strategies［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aerch*, 1983, Vol.39 (3).

b.Kelly R.. Mobility/Sedentism Concepts, Archaeological Measures, and Effects［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2.

c.Kuhn SL. A Formal Approach to the Design and Assembly of Mobile Toolkits［J］. *American Antiquity*, 1994, Vol. 59.

［50］ a. Ellis, C. J.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Stone Projectile Tips［A］. *Projectile Technology*［C］. New York: Plenum. 1997.

b. Elston R. G., P. J. Brantingham. Microlithic Technology in Northeast Asia: A Risk Minimizing Strategy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Early Holocene［A］. *Thinking Small: Global Perspectives on Microlithization, 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12*［C］. Washington, D.C.: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51］ Bleed P.. The Optimal Design of Hunting Weapons: Maintainability or Reliability［J］. *American Antiquity*, 1986, Vol.51.

［52］ a. Torrence R.. Time Budgeting and Hunter-Gatherer Technology［A］. *Hunter-Gatherer Economy in Prehistory: A European Perspective*［C］.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 Shott M..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 and Settlement Mobility: An Ethnographic Examination［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86,Vol. 42 (1).

The Ecological Adaptation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A Perspective from the Paleolithic Collections of North China

Yi Mingjie

Abstract: Microblade technology was a lithic technological system broadly existed in Northeast Asia during Upper Paleolithic. As a different technological system to the traditional direct-lithic technology long-term used in North China, the use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may indicate new adaptive strategies to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and survival pressure. The systematically excavated and well-dated sites yielding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 China show that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in North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e stage of germination, the stage of diffusion, the stage of proliferation, and the stage of declin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events of Maritime Isotopic

Stage 3, Last Glacial Maximum, Bölling/Allërod, and Younger Dryas Event. The microblade technology had more advantages in the harsh condition, such as its reliability and portability, more helpful in saving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 thus, attracted hunter-gatherers in cold environment to use it.

Key words: microblade technology; upper paleolithic; North China; hunter-gatherer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分期与类型

毕德广[1]　乌云花[2]

（1.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大连，116081；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小珠山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广鹿岛中部吴家村西的小珠山东坡上。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通过对小珠山遗址及其周边几处史前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小珠山下层、中层、上层文化，初步确立了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和认识的加深，重新将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确定为小珠山一期至五期文化。继续探讨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分期与类型等问题，有利于加深对新序列的认识与研究。

一、考古发现与研究

小珠山遗址发现，要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人在大连市长海县诸岛进行的多次考古调查和探掘。[1] 50至70年代，辽宁省旅顺博物馆对上述诸岛又进行多次调查。[2] 1978年10～11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和长海县文化馆联合对广鹿岛小珠山、柳条沟东山、吴家村、大长山岛上马石等贝丘遗址进行正式发掘[4]，获得一批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明确了贝丘遗址的层位关系，提出了小珠山下、中、上层考古学文化的概念。1981年，辽宁省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大连庄河市发现北吴屯遗址[5]，在丹东市东沟县发现并试掘了后洼遗址[6]。1983～1984年，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对后洼、大岗等遗址进行正式发掘[7]；1990年4～8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北吴屯遗址进行正式发掘[8]，清理出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后洼和北吴屯遗址被划分出上、下层两种文化遗存，并将后洼、北吴屯下层文化遗存和大岗全部文化遗存归入小珠山下层文化，加深了学术界对小珠山下层文化内涵、年代、分布以及地域性差别的认识。2006、2008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小珠山遗址进行第二、三次发掘[9]。通过这两次发掘，将过去划分的小珠山三个文化，细分为五个文化，即小珠山一期至五期文化，有利于加深与重新认识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辽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

关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研究，已有许多重要成果，其中不乏是对小珠山下层文化分期与分区的研究。王嗣洲从小珠山下层文化和后洼下层文化的筒形罐、生产工具、房址、雕刻艺术品等方面，对两者共性和差异性进行比较。他认为小珠山下层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后洼下层文化类型晚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类型，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晚期。[10]后来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依据筒形罐形态的变化，将小珠山下层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段：柳条沟东山遗存的内涵单纯，陶器种类及其纹饰单一，石器均为打制，显示出早期文化特征，故定为小珠山下层文化早段；小珠山下层（T1⑤层除外）、北吴屯下层仍以压印之字纹直口筒形罐为主要特征，同时出现一定数量的压印席纹直口筒形罐和侈口筒形罐，极少量浅刻划纹，新出现壶、碗、杯等器类，故被定为小珠山下层文化中段；后洼下层以压印席纹居多，但整体上压印纹开始减少，刻花纹增多，器形仍以筒形罐为主，但鼓腹罐增多，器身逐渐变矮小，被视为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晚段。王嗣洲还将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9期，其中前3期即为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早、中、晚三段。[11]赵辉以筒形罐为典型器物，对小珠山下、中层文化重新进行探讨。他将小珠山下层文化的筒形罐分为形制不同的两组，一组为直口直腹或下腹弧收、大平底筒形罐，器表施各种压印纹；二组为侈口斜腹微曲、小平底筒形罐，器表主要施平行长线刻划纹。将小珠山中层文化的筒形罐分为三组，一组为侈口深腹小平底筒形罐，施刻划纹，器形与纹饰近似于小珠山下层二组的筒形罐；二组为斜敞口、斜腹小平底筒形罐，施刻划纹，风格与一组迥异；三组为直口或微敛口筒形罐，口径变大，器身较矮，腹微鼓，形态与二组较接近。他通过对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和器物形态对比的分析，将以上五组筒形罐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小珠山下层一组，以直口压印纹筒形罐为主要特征；第二期为小珠山下层二组和中层一组，以侈口长线刻划纹筒形罐为主要特征；第三期为小珠山中层二、三组，纹饰以斜短线刻划纹为主。赵辉进一步对各期筒形罐作了式别的划分，其中第一期筒形罐分为三式，Ⅰ式为直口直腹大平底；Ⅱ式为直口下腹微弧收，底径略小；Ⅲ式为敞口斜腹，底径较小。第二期筒形罐分为二式，Ⅳ式为侈口，斜腹直收，底径较小；Ⅴ式为侈口，腹壁微曲收，小平底略呈假圈足状。赵辉将施刻划纹的侈口斜腹筒形罐从小珠山下层文化中剥离出来，与小珠山中层文化中相同器形的筒形罐并为一期，实际上是将之划归于小珠山中层文化。[12]赵宾福在《东北石器时代考古》一书中支持该观点。[13]栾丰实在筒形罐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小珠山下、中层文化的分期作了进一步划分，这应该是目前对小珠山下、中层文化的较为系统的分期。他按口部形态将筒形罐分为A、B二型。A型为直口或微敛口，又可分为9式；B型为侈口，沿外卷，又可分为8式。其中A型Ⅰ、Ⅱ式的口径与底径相差不大，器表施压印纹，施纹面积大，纹饰的层次、排列规整。B型Ⅰ式器表施刻划纹，但整体形态与A型Ⅱ式接近，因此可将它们作为一组，是为第一组，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早期。A型Ⅲ、Ⅳ式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器表以刻划纹为主，压印纹减少，纹饰潦草，排列不规

整。B型Ⅱ、Ⅲ式的总体形态与A型Ⅲ、Ⅳ式基本一致。此4式筒形罐可归为一组，是为第二组，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第二期。换言之，他认为小珠山下层文化可划分为早、晚两期。[14]朱延平利用小珠山、北吴屯和后洼等6处遗址的发表材料，依据相关堆积单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出土器物形态异同，概括出小珠山下层文化压印之字纹和压印席纹的演变轨迹，由此建立小珠山下层文化筒形罐和小口鼓腹罐的分期，并指出北吴屯遗址下层和柳条沟东山遗址年代较早，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早期，小珠山遗址下层比北吴屯遗址下层晚，可能晚到北吴屯遗址上层的年代，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晚期，另外后洼遗址下层和大岗遗址的年代接近北吴屯遗址下层，基本上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早期。他将小珠山下层文化分为两个类型，即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北吴屯下层类型和以压印席纹为主的后洼类型。[15]王月前将后洼下层文化的筒形罐分为A、B二型，A型为有耳筒形罐，B型为无耳筒形罐，两者在整体形态和纹饰上十分相似。A、B型筒形罐均可分为二式，Ⅰ式大口大底，口径与底径相当，腹壁近于笔直；Ⅱ式大口小底，腹壁微弧。Ⅰ式早于Ⅱ式，显示出筒形罐演变趋势为：腹壁由直变弧曲，底径由大变小，口径与底径的比例逐渐变大。[16]

通过以上对小珠山下层文化相关研究成果的简单回顾发现，学术界在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研究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小珠山下层文化分布范围、文化内涵等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分歧，例如北吴屯遗址下层、后洼遗址下层和大岗遗址的遗存是否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1978年小珠山遗址下层出土的侈口筒形罐是否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等。这些分歧导致在对其分期与分类型研究上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另外，以往的相关研究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期与分区研究，个别分期成果还存在明显错误。因此，有必要对小珠山下层文化作更加详尽和深入的分期与类型划分研究，以求对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有更具体的认识。

二、典型层位关系的分析

从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来看，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遗址主要有大连市广鹿岛小珠山下层、柳条沟东山；大长山岛上马石下层；獐子岛李墙屯下层、沙泡子下层[17]；海洋岛南玉屯[18]；庄河市北吴屯下层；东沟县后洼下层、大岗；阎坨子、王坨子、赵坨子、石灰窑地下岩洞[19]；臭梨陧子[20]等。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小珠山下层、柳条沟东山、上马石下层、北吴屯下层、后洼下层、大岗等。尽管试掘和发掘了众多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出土了大量器物，但正式发表的材料较少，真正能提供给我们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层位并不多。从发表资料来看，后洼下层、大岗、柳条沟东山、上马石下层均无法提供明确地层关系。本文拟以小珠山下层和北吴屯下层的发表材料为基础，试对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典型层位关系进行分析。

1. 小珠山遗址下层[21]

小珠山遗址经过1978年、2006年、2008年三次正式发掘。1978年发掘[22]，布4米×4米探访5个，揭露面积80平方米。以T4东壁剖面为例，堆积分为5层，第5层定为下层文化遗存，第3、4层定为中层文化遗存，第1、2层定为上层文化遗存。虽然发掘者将第5层又分为5A、5B两个亚层，但在发表资料时并未标明器物出土的亚层，致使找不到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层位。2006年和2008年发掘，共揭露面积220余平方米。以T1211北壁剖面为例，堆积分为16层，其中第15层以下开口的T1211F4为代表的遗存为一期文化，主要遗迹单位有：T1211F2～F5、F8、H6等，从出土遗物形态对比来看，该文化包含于1978年发掘时划分的下层文化内。2006年和2008年两次发掘，发表的出土陶器的单位有T1612⑮、T1512⑰、T1512⑱、T1512⑲。这些单位提供了一组明确的层位关系：T1512⑰→T1512⑱→T1512⑲。

根据这一组层位关系和器物形态、纹饰的对比，可将已发表的小珠山下层陶器分成具有早晚关系的三组（表一）。

表一　小珠山下层陶器分组

组别	层位	器物
三组	T1612⑮、T1512⑰	T1612⑮：2、T1512⑰：1、78T2⑤：15、78T5⑤：12 78T4⑤：54、78T1⑤：28、78T1⑤：27
二组	T1512⑱	T1512⑱：1、78T3⑤：24、78T1⑤：20、78T4⑤：55
一组	T1512⑲	T1512⑲：1、T1512北隔梁⑲：1、78T3⑤：23、78T4⑤：53

2. 北吴屯遗址下层

北吴屯遗址于1990年正式发掘，布5米×5米探方15个（T1～T15），发掘面积共计43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分为4层，第1、2层为上层文化遗存，第3、4层为下层文化遗存。下层遗迹单位主要有：F3～F6、F8、H1、H2、G1、G2。根据发掘简报，发表的出土陶器的下层堆积单位有：T1③、T2③、T2③B、T3③、T3③B、T6③、T9③、F4、F5、F6、F8。北吴屯遗址第3层分为A、B两个亚层。发表的器物的编号有的标明出自3A层，如石磨盘T2③A：76；有的标明出自3B层，如中筒形罐T3③B：6；但多数只标明出自第3层，如大筒形罐T3③：1、T3③：2、小筒形罐T2③：80、T2③：82等等。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这类编号的器物之间是否存在早晚关系。上述发表出土陶器的地层和遗迹单位只能提供我们如下层位关系：T2③B→F4；T3③B、T93③B→F5；T6③B→F6；T9②B→F8→T9③。

根据这几组层位关系和器物形态、纹饰的对比，可将已发表的北吴屯下层陶器分成具有早晚关系的三组（表二）。

表二　北吴屯下层陶器分组

组别	层位	器物
三组	F8	F8：5、F8：7
二组	T2③、T2③B、T3③、T3③B、T6③、T9③	T6③：6、T2③：72、T2③：11、T3③：1、T3③：2、T3③：4、T2③：77、T3③：5、T9③：15、T6③：14、T2③B：1、T6③：26、T3③B：6、T2③：82、T3③：7 、T3③：8、T3③：9、T2③：80、T2③：82、T3③：10、T3③：11、T2③B：27、T6③：28、T3③：12、T2③：81、T6③：6、T3③：9、T3③：14、T2③：12、T2③：13、T3③：107、T3③：24
一组	F4、F5、F6	F5：24、F6：12、F4：82、F4：68

以上对小珠山遗址下层和北吴屯遗址下层典型层位的分析，为小珠山下层文化陶器的类型学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地层依据。

三、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小珠山下层文化出土遗物的种类与数量丰富，主要有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石器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主要有刮削器、盘状器、亚腰石锄、网坠、石球等；磨制石器主要有石斧、石刀、石凿、石杵、石镞、磨盘、磨棒、磨石等。陶器为含滑石粉的夹砂陶，陶色以红褐、黑褐或红色为主，均为手制，火候较高。纹饰以压印纹为主，有少量刻划纹。压印纹主要有之字形纹、席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以及它们的组合纹饰。刻划纹主要有席纹、网格纹、斜线、横线等。器类以筒形罐为主，有少量鼓腹罐、壶、碗、盘、杯、钵、勺、舟形器等。骨器和玉器数量很少，种类主要有骨锥、骨针、骨匕、骨管、骨钻、玉锛、玉凿、玉斧、玉坠、玉玦、玉环等。后洼遗址还出土少量雕塑品，种类有滑石人像、滑石猪、石鸟、滑石虎头形、鱼形、鹰形、蝉形坠饰、陶猪头等。本文只对以筒形罐为主的陶容器进行类型学分析。依据上述对小珠山下层文化典型层位的分析、发表陶器的分组和器物形态、纹饰的变化，可对其陶器作如下类型学分析。

1. 筒形罐

筒形罐在小珠山下层文化遗存中占绝对优势，可分为直口和侈口两大类。

（1）直口筒形罐

以有无瘤状耳为标准，分为A、B二型。

A型　无瘤状耳，直口或大口，腹壁竖直、斜直或弧曲，平底。按口部、腹壁形态和口径与底径比例的变化，又可分为三式。

Ⅰ式：直口，腹竖直或下腹部稍斜收，大平底，口径与底径相等或相差无几。纹饰以压印的之字纹、席纹、网格纹或其组合纹为主，有少量刻划网格纹、横线和素面陶。纹饰带占据器表全身或主要部分（图一，11～29）。

	小珠山下层	北吴屯下层	后洼下层	大岗
Ⅲ式	1 2 3 4			
Ⅱ式	5 6 7		8 9 10	
Ⅰ式	11 17	12 13 14 18 19 20 23 24 25 27 28 29	15 21	16 22 26

图一　小珠山下层文化A型直口筒形罐的分式

1～7、11、17. 小珠山（T4⑤：54、T5⑤：12、T2⑤：15、T1612⑮：2、T3⑤：24、T1⑤：20、T1512⑱：1、T3⑤：23、T1512⑲：1）　8～10、15、21. 后洼（81T1：7、81T1：5、IIT18④：46、IIIT16④：25、81T1：9）　12～14、18～20、23～25、27～29. 北吴屯（T3③：2、T3③：1、T3③：8、T3③：7、T3③：9、T2③：77、T2③B：1、T3③B：6、T3③：4、T2③：82、T6③：14、T2③：80）　16、22、26. 大岗（T1：2、T2：4、T1：1）

Ⅱ式：直口，腹弧曲，底径变小，口径与底径比例变大。纹饰以压印的之字形纹、席纹及其组合纹为主，有少量刻划网格纹。纹饰带面积变小，与Ⅰ式相比，纹饰较潦草，排列不甚规整（图一，5～10）。

Ⅲ式：大口，腹斜直或弧曲，小平底，口径与底径比例最大。纹饰以压印纹为主，与Ⅱ式相比，更加潦草和散乱，纹饰带面积进一步变小（图一，1～4）。

B型　有瘤状耳，直口，腹壁竖直或弧曲，平底。按腹壁形态又可分为二式。

Ⅰ式：直口，腹竖直或下腹部稍斜收，大平底。纹饰有压印纹和刻划纹，主要有之字纹、席纹和网格纹等（图二，1～7）。

Ⅱ式：直口，腹弧曲，大平底。纹饰与Ⅰ式基本相同（图二，8～16）。

A、B型筒形罐各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演进关系。从器物形态来看，两型筒形罐均由Ⅰ式的直口、直腹（或下腹部微斜收）、大平底，演化为Ⅱ式的直口、弧曲腹，底径变小，与口径比例变大。A型Ⅱ式又演化为大口、斜直腹、小平底的Ⅲ式。从纹饰来看，A型Ⅰ式和B型Ⅰ式的纹饰均以排列规整、细密的压印纹为主，有少量刻划纹和素面陶。纹饰带面积较大，布满器表或占器表的绝大部分。发展至Ⅱ式，纹饰仍以压印纹为主，但较Ⅰ式，开始变得疏松、不规整，纹饰带面积变小，素面陶消失。A型发展至Ⅲ式，纹饰进一步变得散乱，纹饰带面积变得更小。

（2）侈口筒形罐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侈口筒形罐数量极少，但在小珠山中层文化中普遍存在，因此有学者将之归入小珠山中层文化。这类筒形罐数量虽少，但仍可寻出演变之轨迹，当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固有器形。按其口沿外撇程度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口微侈，直腹，下腹部稍内收，大平底，施由压印之字纹、网格纹、席纹、横线纹组成的组合纹饰（图三，4、5）。

Ⅱ式：侈口，口沿外撇程度大于Ⅰ式，小平底或台形足，口径与底径比例变大，施刻划横线与竖线或与交叉斜线组成的组合纹饰（图三，1～3）。

两式侈口筒形罐之间也存在明显演进关系。口部由微侈向大侈口演变，底部由大平底向小平底或台形足演变，纹饰则由规整的压印纹向较凌乱的刻划纹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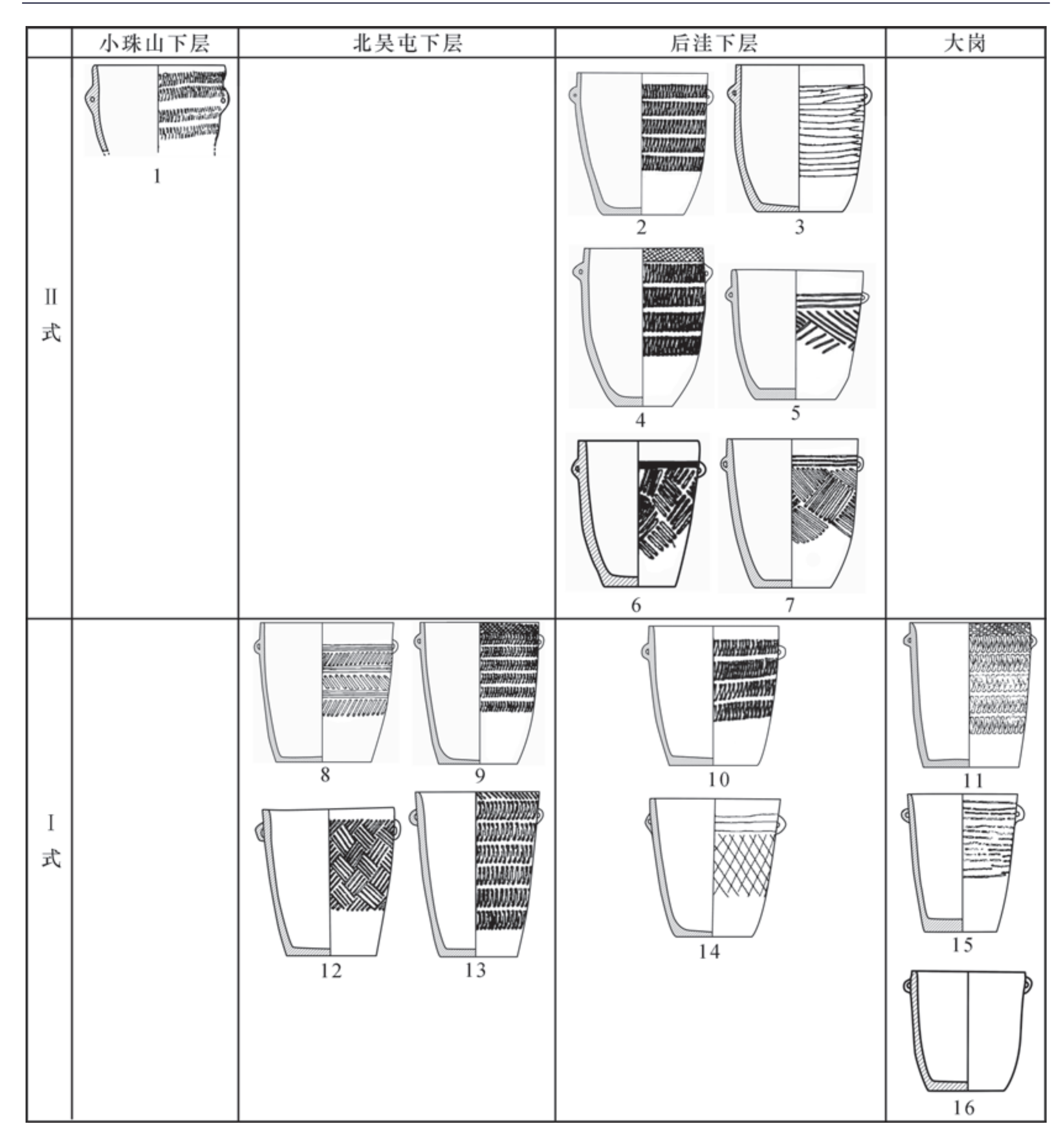
2. 鼓腹罐

小珠山下层文化中的鼓腹罐数量很少，大体为直口或侈口，短领，鼓腹，平底。以肩部有无瘤状耳为标准，分为A、B二型。

A型　无瘤状耳，按腹部与口部形态的变化，又可分为三式。

Ⅰ式：直口或微侈，折腹，平底或内凹底，素面（图四，3、4）。

Ⅱ式：直口，短领，圆鼓腹，平底，纹饰为压印窝点纹、网格纹和横线构成的组合纹（图四，2）。



图二　小珠山下层文化B型直口筒形罐的分式

1. 小珠山（T4⑤：55）　2～7、10、14. 后洼（81T1：1、81T1：2、81T1：8、VT9④：24、81T1：4、81T1：3、VT23④：28、81T1：6）　8、9、12、13. 北吴屯（F4：82、T6③：26、T3③：5、T9③：15）　11、15、16. 大岗（T2：1、T2：2、T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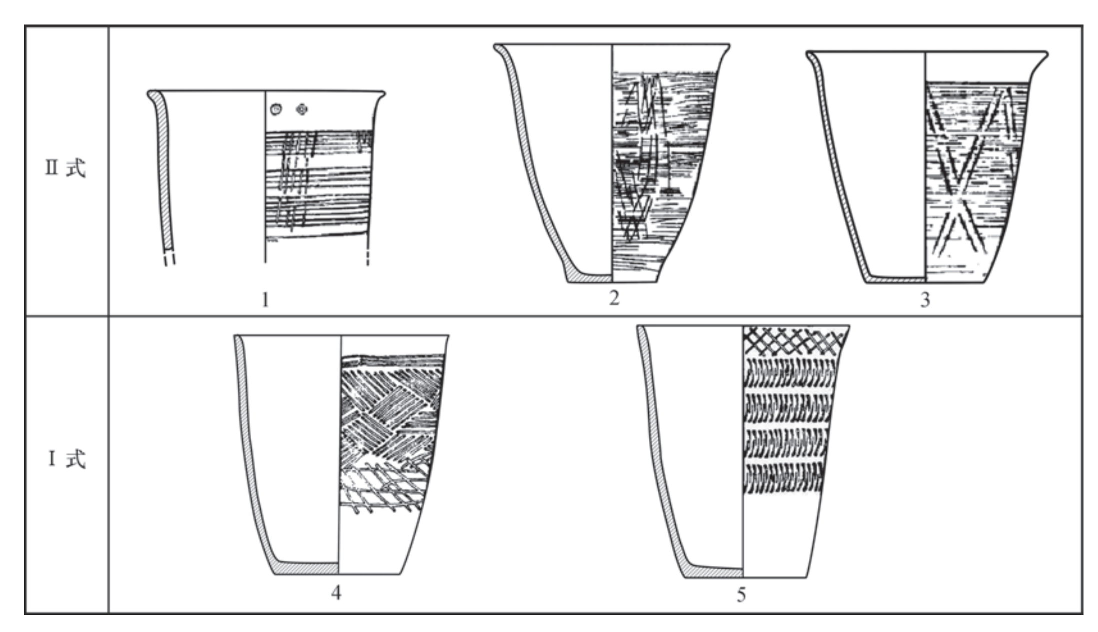
Ⅲ式：侈口，束颈，圆鼓腹，平底，斜线三角纹（图四，1）。

B型　有瘤状耳，按腹部鼓起程度，分为二式。

Ⅰ式：直口或微侈，腹微鼓，平底，压印席纹、人字纹或素面（图四，6～9）。

Ⅱ式：直口，口径变小，腹部鼓起程度比Ⅰ式大，压印编织纹（图四，5）。

A型鼓腹罐三式之间存在演进关系，主要趋势是口径逐渐变小，口部形态由直口变



图三　小珠山下层文化侈口筒形罐的分式

1、2. 小珠山（T1⑤：28、T1⑤：27）　3. 上马石（ⅢT1④：11）　4. 大岗（T1：3）　5. 北吴屯（T3③：10）

为侈口，腹部由折腹变为圆鼓腹，平底也有逐渐变小的趋势。B型鼓腹罐二式演进主要表现为口径变小和腹部外鼓程度加大。

3. 壶

直口，有的微侈，矮领，肩部有对称双耳，鼓腹，平底。按肩部形态和外鼓程度，可分为二式。

Ⅰ式：溜肩，鼓腹，施压印席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纹（图五，3、4）。

Ⅱ式：肩部耸起，腹部外鼓程度大于Ⅰ式，施压印席纹或素面（图五，1、2）。

两式壶之间存在演进关系，主要表现在肩部和腹部：肩部由溜肩变为双肩耸起，腹部外鼓程度加大。

4. 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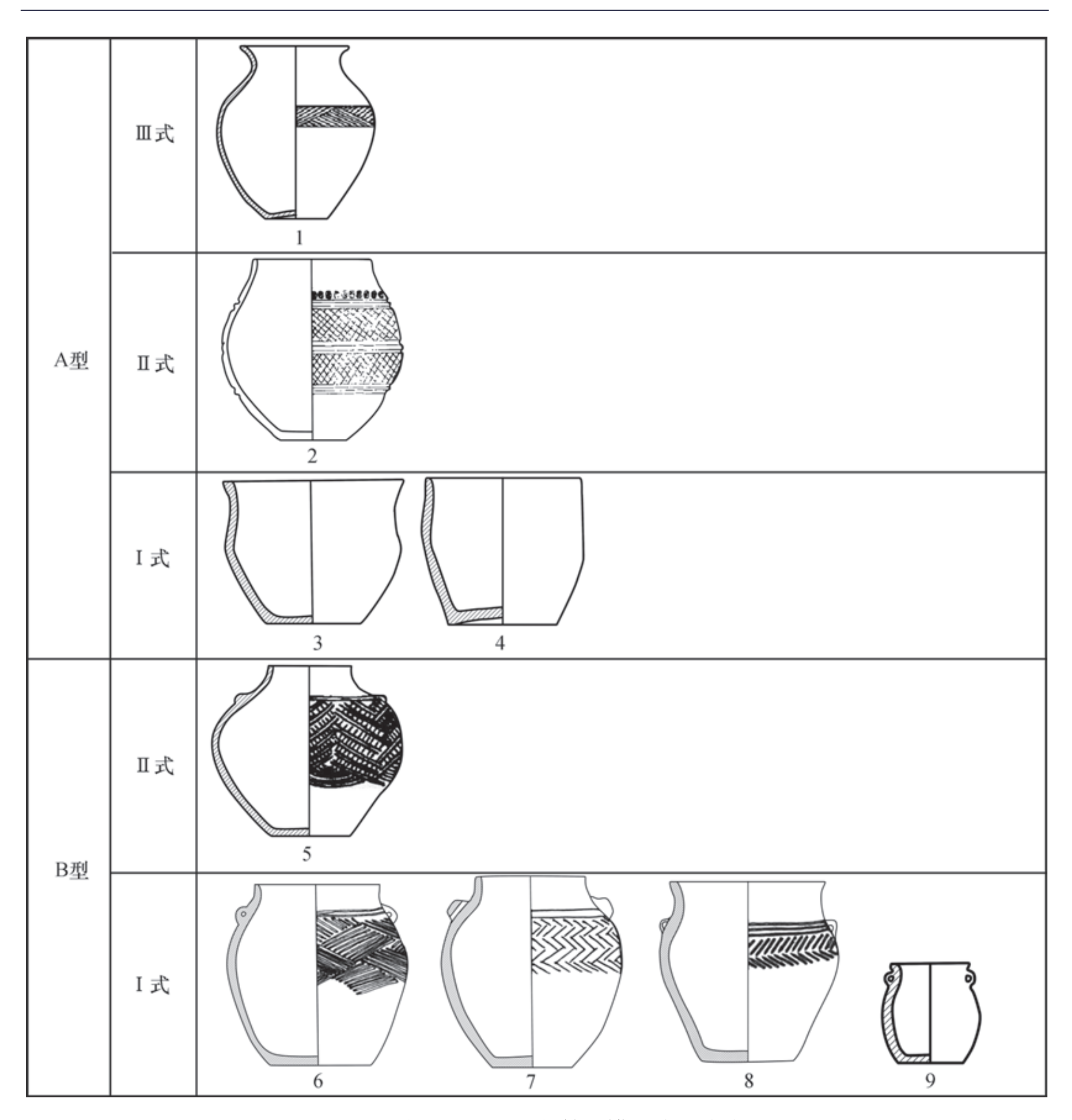
按底部形态，大致分为二式。

Ⅰ式：平底，腹部为鼓腹、折腹或直腹，口部微敛或微侈。

Ⅱ式：圜底，弧形腹，直口。

5. 碗

可分为直腹和折腹二式。



图四　小珠山下层文化鼓腹罐的分型分式

1. 上马石（ⅢF1：8）　2、3. 北吴屯（T3③：11、 F4：68）　4、5、6、7、8.后洼（81T1：10、81T1：12、IIT18④：45、IIIT4④：10、IIIT9④：21）　9.大岗（T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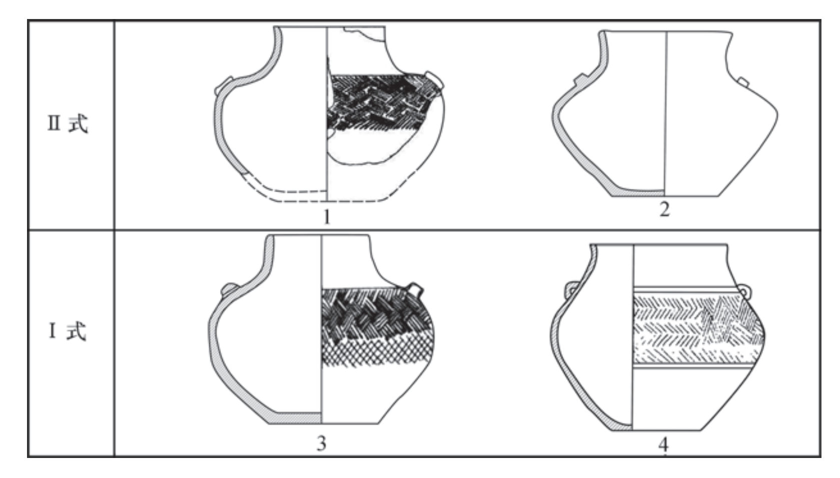
Ⅰ式：直口微侈，折腹，下腹弧收，平底。

Ⅱ式：直口，直腹或微弧曲，平底。

6. 杯

陶杯形制单一，基本上都为直口、斜直腹、平底。

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钵、碗等器物虽然作了简单分式，但不确定Ⅰ式与Ⅱ式之间是否存在演进关系。故对其分式仅作为一种分类。



图五 小珠山下层文化陶壶的分式

1. 大岗（T2：5） 2、3.后洼（VT22④：46、IVT1④：27） 4.北吴屯（T2③B：47）

四、分期与类型的探讨

1. 分期

以上对小珠山下层文化典型层位关系与陶器类型的分析，为讨论小珠山下层文化分期与类型奠定了基础。小珠山下层筒形罐尤其是直口类筒形罐的类型学分析，显示筒形罐各式别存在明确的序列演变关系，且各式别特征明显，体现了小珠山下层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佐以其他器物的类型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小珠山下层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以直口、直腹、大平底的筒形罐为显著特征，纹饰以压印纹为主，包括之字纹、席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纹及其组合纹等，纹饰占器表全身或绝大部分，有少量素面陶。中期以直口、弧曲腹、平底筒形罐为显著特征，纹饰仍以压印纹为主，但在排列上较早期潦草和散乱，纹饰带面积也变小。晚期以大口或侈口、斜直腹、小平底筒形罐为显著特征，纹饰在整体上较中期更加凌乱，纹饰带面积也变得更小。

Ⅰ式侈口筒形罐的口部稍外撇，整体形态及纹饰与直口直腹筒形罐基本相同，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早期遗存。Ⅱ式造型与纹饰接近A型Ⅲ式筒形罐，属于小珠山下层文化晚期遗存。但其侈口、深腹、台形足以及平行长线刻划纹等特征又与小珠山中层文化的侈口罐非常相似。以往学者认为小珠山中层文化的侈口筒形罐应该是由下层文化的A型Ⅲ式筒形罐发展而来，并且认为下层出土侈口罐不属于下层文化，应归入中层文化。笔者认为小珠山遗址下层的Ⅱ式侈口罐不是由A型Ⅲ式筒形罐发展而来，两者之间不存在谱系关系，而是同时并存的两种不同形态的筒形罐。侈口筒形罐不仅在小珠山遗址下层有发现，在北吴屯遗址下层和大岗遗址都有出土。北吴屯下层和大岗的侈口罐（Ⅰ

式）形制较原始，器形更接近直口筒形罐，但与小珠山遗址下层、上马石下层出土侈口罐（Ⅱ式）有着明显的相似处，表明Ⅱ式是由Ⅰ式发展而来，故侈口筒形罐是小珠山下层文化固有的器形。小珠山下层文化各遗址筒形罐的式别与小珠山下层文化分期的对应关系如下表（表三）。

表三　小珠山下层文化各遗址筒形罐的式别与小珠山下层文化分期的对应关系

式别／分期	小珠山下层			北吴屯下层			后洼下层			大岗		
	直口罐		侈口罐	直口罐		侈口罐	直口罐		侈口罐	直口罐		侈口罐
	A	B		A	B		A	B		A	B	
晚期	Ⅲ		Ⅱ									
中期	Ⅱ	Ⅱ					Ⅱ	Ⅱ				
早期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通过表三，可以清楚发现北吴屯遗址下层和大岗遗址只包含小珠山下层文化早期遗存。后洼遗址下层包含早、中两期遗存。小珠山遗址下层则早、中、晚三期都有。另外，上马石遗址下层则只包含了晚期遗存。小珠山下层文化各遗址所包含遗存在期别上的差别，可能会对探讨小珠山下层文化类型、分区与传播有所帮助。

2. 类型

小珠山遗址下层出土陶器比较单纯，主要为筒形罐，其中以直口（大口）筒形罐为主，有少量侈口筒形罐。从1978年发掘情况来看，陶质以含滑石粉黑褐陶最多，约占65.8%；其次为含滑石粉的红褐陶，约占34%；夹砂红陶与夹砂黑褐陶极少，仅占4%与3.1%。纹饰以压印纹为主，约占95%，其余5%为刻划纹。压印纹又以之字形纹为主，基本上都属于横排竖压，压印席纹、网格纹、横线纹、斜线纹等较少。北吴屯遗址下层陶器以含滑石粉黑褐陶为大宗，约占总数的49.4%；其次为黑陶和红褐陶，分别占23.5%、19.4%；红陶较少，只占5.2%。夹砂陶也以黑褐陶为主，约占总数1.3%；夹砂红陶、红褐陶等极少。纹饰有压印纹和刻划纹两种，约99%为压印纹，其中之字形纹最多，约占62%，次为席纹，约占27%。北吴屯下层陶器种类较小珠山下层丰富，有罐、壶、碗、钵、杯、筒形器等。柳条沟东山出土陶器纹饰几乎均为横排竖压的压印之字形纹，只有少量的压印席纹陶片。上马石下层出土陶器只有陶罐一种，以筒形罐为主，还出土一件小口鼓腹罐。纹饰有压印纹，同样以压印之字形纹为主，未见压印席纹，刻划纹较少。上述遗址在陶器质地、颜色、纹饰、器形器类等方面，表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应该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后洼遗址下层与大岗遗址出土的小珠山下层文化陶器与小珠山遗址下层等遗址出土陶器相比，在器类、纹饰等方面具有一定差异。后洼遗址下层陶器以夹砂红陶最多，

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次之，均含大量滑石粉。大岗遗址陶器均含滑石粉，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黑褐陶、夹砂红陶等较少。后洼下层与大岗陶器以含滑石粉的夹砂红陶或夹砂红褐陶为主，与小珠山下层、北吴屯下层等遗址的陶器以含滑石粉的黑褐陶为主不同。后洼遗址下层出土陶器除筒形罐外，还有鼓腹罐、小口鼓腹罐、碗等。大岗遗址出土器物种类较多，包括罐、壶、碗、杯、勺、舟形器等。后洼下层与大岗出土陶器的种类较丰富，尤以舟形器最具特征。纹饰上，后洼下层和大岗均以压印纹为主，有少量刻划纹。但压印纹均以编织席纹为最多，与小珠山下层以压印之字形纹为主有明显不同。后洼下层与大岗遗址出土一定数量的素面陶器，器形有筒形罐、小口鼓腹罐、碗、杯等。小珠山下层、北吴屯下层等遗址中均未发现素面陶器。

小珠山下层与后洼下层在石制生产工具的种类、制作工艺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小珠山下层石器以打制为主，约占生产工具总数的57%，磨制石器只占27%。打制石器多采用石英岩制成，种类有刮削器、盘状器、网坠、石球等。磨制石器种类有斧、沟磨石、磨盘、磨棒等。后洼下层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次之。打制石器种类有石球、砍砸器、石镞、网坠等。磨制石器有斧、锤、杵、锄、磨石、磨盘、磨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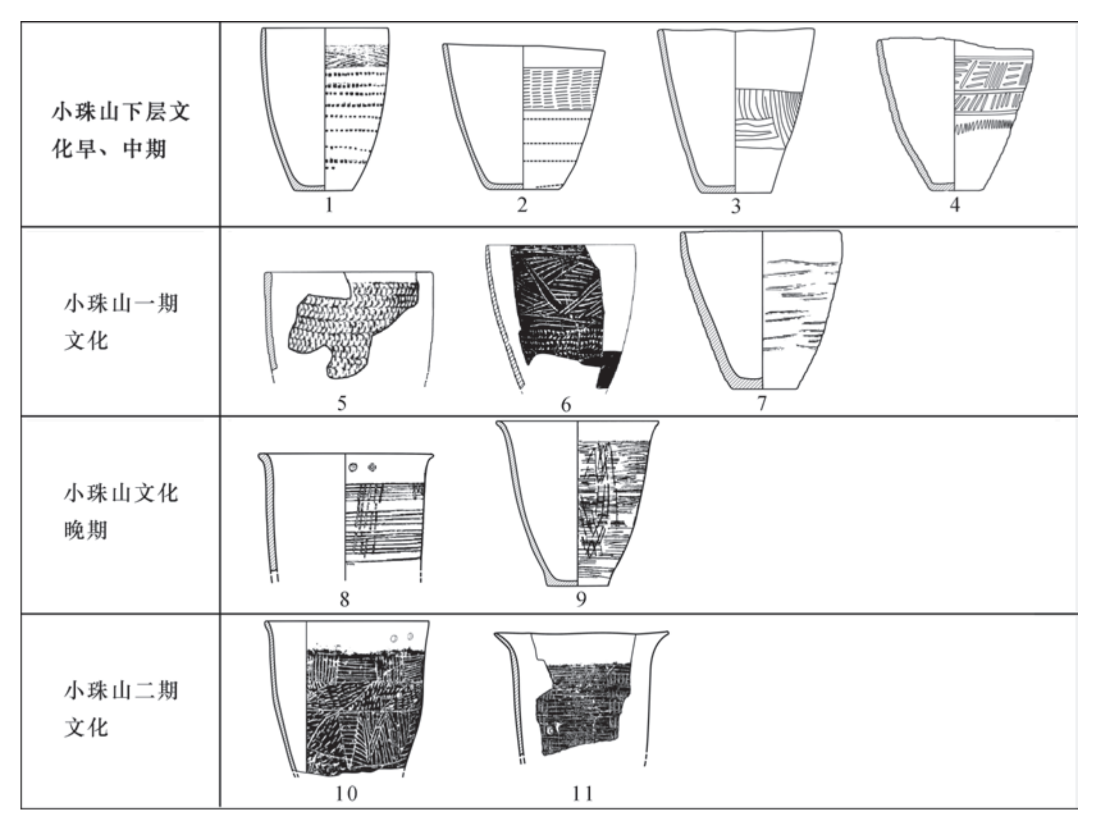
北吴屯下层刻划陶人面像与后洼下层滑石人像在形态和表现手法上十分相似，同时又存在着明显差别。北吴屯下层陶人面像是用残陶片刻划而成。T2③：12，平面呈三角形，上部刻划交叉斜线，两道短弧线为眉，眼为圆圈纹，鼻为两个对称小圆窝，下有内填三道竖线的长方形，表示嘴和牙齿。T2③：13，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两个对称圆圈表示眼睛，眉为弧线状，眼睛下刻划出眼眶线，鼻用短横线表示，长方形内填六道竖线表示嘴和牙齿。后洼下层出土滑石质人像3件。其中标本ⅠT1④：59两面雕刻，正面为人像，额顶和颧骨突起，用柳叶形浅浮雕表示眼，外眼角向上，眼眶内凹。用两条长平行横线表示嘴，内填八道等距离竖线表示牙齿，这一作法与北吴屯下层陶人像嘴与牙齿的表现方法异曲同工。除了人面像外，后洼下层还出土了石质或陶质的动物雕塑，种类有滑石猪、鸟头形坠饰、鱼形坠饰、鸟形坠饰、虫形饰件、虎头形坠饰等。

通过以上简单对比，发现小珠山下层、北吴屯下层与后洼下层、大岗遗址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性。[23]依据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将小珠山下层文化分为小珠山下层类型和后洼下层类型。后洼下层类型主要分布在大洋河下游一带。小珠山下层类型则分布在大洋河下游西南的沿黄海地区，主要分布在长山群岛等地。

3. 小珠山下层文化分期与小珠山一、二期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

通过对比已发表的首次发掘出土的下层陶器和第二、三次发掘出土的一、二期陶器的资料（图六），发现小珠山下层文化被细分为小珠山一、二期文化。其中小珠山一期文化与本文划分的小珠山下层文化早、中期吻合，两者的筒形罐都以直口、直腹（或

弧曲腹）、大平底、压印纹为基本特征。小珠山二期文化与下层文化晚期吻合，两者都有数量较多的侈口筒形罐，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以往研究对于装饰刻划纹的侈口筒形罐归属多有疑义和争论，新的研究将以这类筒形罐为特征的遗存划分成一个单独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利于澄清在这个问题研究上的分歧，完善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但也要注意侈口筒形罐在小珠山一期文化中已经存在，并且小珠山二期文化仍含有大量一期文化的因素，两者共同文化特征比较明显。



图六　小珠山遗址1978年发掘的下层陶器与2006、2008年发掘的一、二期陶器的对比

1. 78T4⑤：54　2. 78T3⑤：24　3. 78T2⑤：15　4. 78T1⑤：28　5. T1512⑱：1　6. T1612⑮：2　7. T1512⑲：1　8. 78T1⑤：27　9. 78T5⑤：12　10. T1512⑪C：1　11. T1111⑧：1

五、结　　语

后洼下层类型在器物种类、形态和制作技术上较小珠山下层类型稍显先进和发达。有学者认为后洼下层类型在时代上晚于小珠山下层类型，“是接续小珠山下层文化类型的早期存在的，显然是直接受其影响而存在并发展的”[24]。从上文对小珠山下层文化陶器所做类型学分析来看，北吴屯遗址下层和大岗遗址只包含小珠山下层文化早期遗存，后洼遗址下层包含早、中两期遗存，小珠山遗址下层则早、中、晚三期都有，上

马石遗址下层则只包含了晚期遗存。换言之，后洼下层类型和小珠山下层类型是并存发展的，但从陶器的型式排列来看，小珠山下层类型是由后洼下层类型发展而来，即小珠山下层文化是由北向南发展的。下面试从器物类型学角度略作说明。

小珠山下层文化两个地方类型的筒形罐在形态上差别不明显，但后洼下层类型只存在于早、中两期，而小珠山下层类型存在于早、中、晚三期，即小珠山下层类型存在大口、斜直腹、小平底的A型Ⅲ式直口筒形罐，而后洼下层类型则没有该类型的筒形罐（图一）。这可能暗示着两者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别。后洼遗址下层存在B型Ⅰ、Ⅱ式直口筒形罐，而小珠山遗址下层仅存在B型Ⅱ式直口筒形罐，同样可以证实小珠山下层晚于后洼下层（图二）。北吴屯下层仅有B型Ⅰ式直口筒形罐，说明后洼下层类型是经由北吴屯下层继续向南发展的，最终传播到小珠山下层。侈口罐分为二式，Ⅰ式存在于大岗遗址和北吴屯下层，该式罐口微侈，直腹，下腹部稍内收，大平底（图三，4、5）。Ⅱ式侈口罐存在于小珠山遗址下层和上马石遗址下层，在后洼下层类型的遗址中没有发现该式罐（图三，1～3）。Ⅱ式侈口罐的口沿外撇程度大于Ⅰ式，小平底或台形足，口径与底径比例变大，在形态上由Ⅰ式侈口罐发展而来。Ⅰ式侈口罐施压印之字纹、网格纹、席纹、横线纹的组合纹饰。Ⅱ式侈口罐施刻划横线与竖线或交叉斜线组成的组合纹饰，且侈口较大，底部为小平底或台形足，这与小珠山中层文化流行的刻划纹侈口筒形罐极为相似，说明小珠山下层类型时代较晚，已经出现了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因素，同样也可说明小珠山下层文化是从大岗与后洼下层经由北吴屯下层传播至小珠山下层的。A型鼓腹罐的三个式别，Ⅰ式标本为后洼81T1：10、北吴屯F4：68，Ⅱ式标本为北吴屯T3③：11，Ⅲ式标本为上马石ⅢF1：8，恰好提供了从后洼下层到北吴屯下层再到上马石下层的一个完整发展序列（图四，1～4）。通过上述器物型式演变的分析，可以确定小珠山下层类型晚于后洼下层类型，由其发展而来，并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两者是并行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本文对小珠山下层文化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小珠山下层类型和后洼下层类型应该都存在时代更早的地层堆积。小珠山下层文化发展谱系问题的彻底解决，或许有待于新的考古资料的出现。

注　　释

［1］ a.三宅俊成.长山列岛先史时代の小调查［J］.满洲学报，1936（4）：163.

b.岛田贞产.关东州の古代文化[A].鸡冠壶[C].1944：44.

c.澄田正一.辽东半岛の先史遗迹（调查抄报）——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A].人间文化[C].1986～1988（2～4）.

［2］ 旅顺博物馆.旅大市长海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调查关东州の古代文化［J］.考古,1961（12）、1962（7）.

［3］ 辽宁省博物馆等.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J］.考古学报，1981（1）.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4（3）.
［5］　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J］.考古，1984（1）.
［6］　a.许玉林等.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J］.文物，1989（12）.
b.辽宁省博物馆.辽宁东沟大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1986（4）.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4（3）.
［8］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长海县小珠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9（5）.
［9］　王嗣洲.小珠山下层文化类型与后洼下层文化类型的比较［J］.博物馆研究，1990（3）.
［10］　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C].史前研究[A].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52～62.
［11］　赵辉.辽东地区小珠山下、中层文化的再检讨［J］.考古与文物，1995（5）.
［12］　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289～290.
［13］　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375～407.
［14］　朱延平.小珠山下层文化试析[A].考古求知集：96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学术讨论会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6～193.
［15］　王月前.鸭绿江右岸地区新石器遗存研究[A].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07～126.
［16］　旅顺博物馆.旅大市长海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调查［J］.考古，1961（12），1962（7）.
［17］　三宅俊成.长山列岛先史时代の小调查［J］.满洲学报，1936（4）：163.
［18］　丹东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丹东市东沟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和试掘［J］.考古，1984（1）.
［19］　许玉林等.辽宁丹东地区鸭绿江右岸及其支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J］.考古，1986（10）.
［20］　小珠山遗址下层泛指属于小珠山遗址中的小珠山下层文化的地层堆积，它以1978年发掘的T4⑤、2006及2009年发掘的F4、T1512⑲等堆积为代表.
［21］　为了与2006年、2008年发掘区别开来，下文在涉及1978年发掘时，将在遗迹单位或遗物之前加上78两个数字.
［22］　王嗣洲.小珠山下层文化类型与后洼下层文化类型的比较［J］.博物馆研究，1990（3）.
［23］　王嗣洲.小珠山下层文化类型与后洼下层文化类型的比较［J］.博物馆研究，1990（3）.

The Periodization and Type of the Lower Xiaozhushan Culture

Bi Deguang Wuyunhua

Abstract: Scholars have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stages and types of the Xiaozhushan lower level Culture. But there are not any systematic research about the staging of xiaozhushan lower level Culture, and they have different opinion in the conno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stratigraphic relations and the unearthed pottery types, the Xiaozhushan I Culture will be divided into early, middle, late phases.The Houwa lower type and Xiaozhushan lower type exis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hases, only Xiaozhushan lower type exists in the late phase. The Xiaozhushan lower types come from the Houwa lower type, and coexist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the Xiaozhushan lower level culture; stratigraphy; Tube-Shaped Jar; periodization; type

小黑石沟遗址相关问题研究

陈海霖

（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北京，100060）

小黑石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村东南台地之上。1975～1998年期间，小黑石沟遗址经历过数次清理和发掘。早在1975年，宁城县文博部门在旧金属回收公司发现一批青铜器，共50余件，后经辗转调查，确认为宁城小黑石沟遗址墓葬所出土。1980年在该遗址之上又发现了M8061，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金器等；1985年4月初，因村民取土而坍塌露出一座石椁墓，后清理发掘了这座墓葬，获得了一批极具研究价值的考古资料。198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因大型石椁墓的发现而引起重视，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发掘，共清理灰坑9个，墓葬11座，其中被盗掘的墓葬破坏严重。1992～199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85年的发掘基础之上，确定该台地为遗址的最北端，继续在该台地上布方，进行大面积的科学而系统的发掘；1996年，该遗址一座大型墓葬被盗掘，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联合公安局收缴了一大批青铜礼器、车马器及装饰品等。1998年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共清理灰坑59个，墓葬21座。2009年3月，《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发行，这批尘封了约20年的资料终于得以面世。这本发掘报告以历年发掘获得的资料为主，还包括征集、采集的实物资料。本人将以这本新出版的报告为基础，对小黑石沟遗址进行整体的初步分析和研究。

一、分　　期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在小黑石沟遗址分期、年代的研究中，剔除遗址中发现的少量早期遗物和战国时期墓葬，对其主要文化内涵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进行了分期和断代。由于1985年AⅠ区的发掘资料保存不全，地层堆积情况、遗迹间的叠压打破情况不明，而1992NDXBⅠ区和1992NDXBⅡ区的墓葬是钻探式发掘清理的，仅有单个墓葬的发掘资料，地层堆积情况、遗迹间的叠压打破情况亦不明。所以，报告主要是根据1992～1993年AⅡ区和1998年AⅢ区的发掘资料来进行分期研究的。

报告对两个发掘区的遗迹单位关系进行整理后，找出几组有器物标本可资比较的

单位进行分析，如表一所示。

表一　小黑石沟遗址遗迹单位关系表

发掘区 遗迹	1992～1993年AⅡ发掘区	1998年AⅢ发掘区
遗迹关系	②→M6、M9→③→H28→H3　②→H57→③→H65→G4 ②→H64→②A→H87　②→H68、H71→H73 ②→H7、H9→H14→H14（H7→H9）②→M10、M14→H69 ②→M19→②A→H104　②→H94、H72→H88→H67 ②→M21→②A→H136→H139　②→H98→H150 ②A→H120→H108　②→H153→②A→H169 ②→H12→H18→③→H50　②→H5→H18 ②→H15→②→H16　②→H17→H23 ②→H20→②→H26　②→H24→H27 ②→H35→H26→H37　②→M11→H31 ②→H9→H21→H49　①→M17→H79 ①→M22→②→H162、F8、H164	①→H1→H8 ①→H4→②→H28→H20 ①→H5→H38→H12 ①→H16→②→H34 ①→M20→H26→H40→H56 ①→M5→H10→H43 ②→H57→H12 ①H59→H60

报告又对两个发掘区的这些遗迹单位分组。

1992～1993年AⅡ发掘区：

第一组：92～93③层下开口遗迹，以H5、H8、H28为代表。

第二组：92～93②A层下开口遗迹，以H104、H111、H135、H151、H160为代表。

第三组：92～93②层下开口遗迹。

第四组：92～93②层下开口的墓葬。

第五组：92～93①层下的遗迹单位及墓葬。

1998年AⅢ发掘区：

第一组：98②层下的遗迹单位。

第二组：98①层下的遗迹单位。

第三组：1998年发掘的墓葬。

遗址中陶器的出土数量最多，本可作为分期标准，但其中可复原的陶器较少，增加了型式、期别的分辨难度。而出土的完整器又基本集中于几个遗迹单位中，早晚关系不明确，有打破关系的遗迹单位，又缺乏标本器物。所以，报告认为尽管遗址中存在诸多的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但缺乏分期的典型遗物，目前难以据此来做分期。

最后，报告主要是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来进行分期。从分组的情况看，1992～1993年AⅡ发掘区的四、五组和1998年AⅢ区的第三组，主要遗迹单位是墓

葬，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存在较多的一致性，划为同一期。鉴于墓葬普遍打破其他遗迹，几乎没有相反的例子，所以1992～1993年AⅡ发掘区的一、二、三组，1998年AⅢ发掘区的一、二组，早于1992～1993年AⅡ发掘区的四、五组，1998年AⅢ发掘区的第三组，分别代表了该遗址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报告分期结论是，将遗址大致分为早晚两期（表二），早期主要遗迹单位是灰坑、房址，以92NDXAⅡH5和92NDXAⅡH8为代表；晚期主要遗迹单位是墓葬，以M8501和98NDXAⅡM5为代表。从分期结果推测该遗址经历两个发展阶段，早期人们把这里作为居住地，在此生活，晚期人们迁离，又把它作为墓地。

表二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分期表

分期＼发掘区	1992～1993年AⅡ发掘区	1998年AⅢ发掘区
第二期	②层下开口的墓葬，①层下的遗迹单位及墓葬	①层下开口的墓葬
第一期	③层下开口的遗迹，②A层下开口的遗迹，②层下开口的大多遗迹	②层下的遗迹单位，①层下的遗迹单位

但是，笔者认为《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对小黑石沟遗址的分期有不当之处，依据如下：

报告中对1992～1993年AⅡ发掘区和1998年AⅢ发掘区两次所揭露的地层堆积，经过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等的综合分析比较后，认为两次发掘的文化层是相互对应的，具体的对应情况是：1998年的①层对应1992～1993年的①层，1998年的②层对应1992～1993年的②层，1998年的③层对应1992～1993年的③层，1992～1993年的④层堆积不见于1998年的发掘区。

两次发掘的层位关系对应表，按由晚到早的顺序，如表三所示。

表三　1992～1993年AⅡ发掘区和1998年AⅢ发掘区层位对应表

层位＼发掘区	1992~1993年发掘区	1998年发掘区
对应层位	①层地层	①层地层
	①层下开口的遗迹	①层下开口的遗迹
	②层地层	②层地层
	②下开口的遗迹	②下开口的遗迹
	②A层地层	
	②A层下开口的遗迹	
	③层地层	③层地层
	③层下开口的遗迹	
	④层地层	

由此可见，报告分期研究中1998年AⅢ发掘区的第三组，即1998①层下开口的遗迹单位应当晚于1992～1993AⅡ发掘区的第四组，即1992～1993②层下开口的墓葬。但报告却将1992～1993②层下开口的墓葬与1998①层下开口的墓葬一起划为晚期，而1998①层下开口的遗迹却划为早期，早晚关系颠倒了。所以笔者认为报告中的分期结论是存在错误的。

本文在做分期研究方面，同样因为现存1985年的小面积发掘资料不全，地层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不明，而1992NDXBⅠ区和1992NDXBⅡ区的墓葬又是钻探式发掘清理的，仅有单个墓葬的发掘资料，地层堆积情况、遗迹间的叠压打破情况亦不明。所以，主要是根据1992～1993年AⅡ区的发掘资料和1998年AⅢ区的发掘资料来进行分期研究。

从1992～1993年AⅡ发掘区的各遗迹单位出土的陶器类型情况来看，鬲、罐、豆、盆、钵、杯、纺轮在各遗迹单位中都有，但陶鼎主要是出土于②层堆积和②层下开口的灰坑，而在②A层堆积、②A层下开口的灰坑、③层堆积、及③层下开口的灰坑基本不见。在出土的陶器组合中某一器类的出现为分期提供了重要线索，所以本文认为报告中划分的早期的遗迹单位可以再做分期。1992～1993年的AⅡ发掘区中，②A层以下的单位与②A层及其以上单位应当分为不同时期。在1998年发掘的AⅢ区，陶鼎主要是出现在①层下开口的灰坑和②层下开口的灰坑，不见于③层堆积。②层及其以上单位与③层当分为不同时期。

根据1992～1993年AⅡ发掘区和1998年AⅢ发掘区的地层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表，找出出土陶鼎的三组关系：②→H64→②A→H87；②→H89→H69；②→H161→H167→H151。从这三组关系来看，出土陶鼎的H64、H89、H161都叠压打破其他灰坑，所以也说明陶鼎的流行时期当较晚。

其他器类中，Ab型罐也为此分期提供了佐证：在1992～1993年的AⅡ发掘区②层堆积和②层开口下灰坑中出现Ab型Ⅱ式罐，也见于1998年的AⅢ发掘区①层下开口的灰坑，其肩部较Ab型Ⅰ式罐的更为下斜，此类器型不见于其他遗迹单位，为后期发展演变而成的。

由此可见，1992～1993年的AⅡ发掘区中，②A层以下的单位与②A层及其以上单位的陶器组合明显不同；1998年发掘的AⅢ区，②层及其以上单位与③层的陶器组合明显不同。

在1992～1993年的AⅡ发掘区和1998年的AⅢ发掘区，都存在墓葬普遍打破其他遗迹的现象，几乎未见到相反的例子，所以遗址中的居住址和墓葬应当是不同时期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墓葬属于晚期。

综上所述，本文将该遗址划分为三期，1992～1993年的AⅡ发掘区中，开口于②A层下的单位、③层、开口于③层下的单位、④层为第一期，开口于②层下的墓葬、开口于②层下的灰坑和房址、②A层为第二期，开口于①层下的墓葬、②层为第三期。1998

年的AⅢ发掘区③层为第一期，开口于②层下的单位为第二期，开口于①层下的墓葬、开口于①层下的灰坑、②层为第三期。具体分期如表四所示。

表四　小黑石沟遗址分期表

发掘区 / 分期	1992～1993年AⅡ发掘区	1998年AⅢ发掘区
第三期	开口于①层下的墓葬，②层	开口于①层下的墓葬，开口于①层下的灰坑，②层
第二期	开口于②层下的墓葬，开口于②层下的灰坑、房址，②A层	开口于②层下的单位
第一期	开口于②A层下的单位，③层，开口于③层下的单位，④层	③层

二、社会组织

墓葬资料为我们剖析当时社会情况提供了信息，而对当时社会复杂程度的分析也一直是墓葬研究的主要目标。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考古学界中，美国塞克斯和宾福德两位学者就充分论证了墓葬中反映的各种差别与古代社会复杂程度之间的关系，开创了通过墓葬资料认识古代社会结构的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对墓葬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代表人物霍德提出，墓葬中反映的各种社会关系可能只是现实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扭曲反映，比如，社会等级制度可能会在丧葬礼仪中被强化，也可能被弱化[1]，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反映。但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还是承认，墓葬资料对研究古代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我国学者也一直非常关注通过墓葬资料分析古代社会的研究，着力最多之处是通过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探讨社会等级分化，成果丰硕。[3]小黑石沟遗址共发掘和清理墓葬80座，其中有72座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墓葬均为单人葬，未见合葬墓。墓葬形制有石椁木棺墓、石棺墓、竖穴土坑墓三种，其中大型石椁墓2座；石棺墓50座，部分墓室四壁和顶部由石块垒砌而成，墓室底部也铺砌石块，但大多数底部不见铺砌石块，顶部垒砌石块也仅是部分墓葬可见；竖穴土坑墓21座，其中仅有1座墓四壁有生土二层台，并可见木棺，其余皆不见或无木棺。葬式以侧身直肢葬居多，其次为仰身直肢葬，俯身直肢葬较少。墓向方面，有69座墓可辨别墓向，其中大多数为南向、北向，东向、西向的较为少见。随葬品以铜器为主，骨器、石器等较少，基本不见陶器。这些墓葬为分析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之上，对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墓葬的埋葬制度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主要表现在墓葬形制、规模，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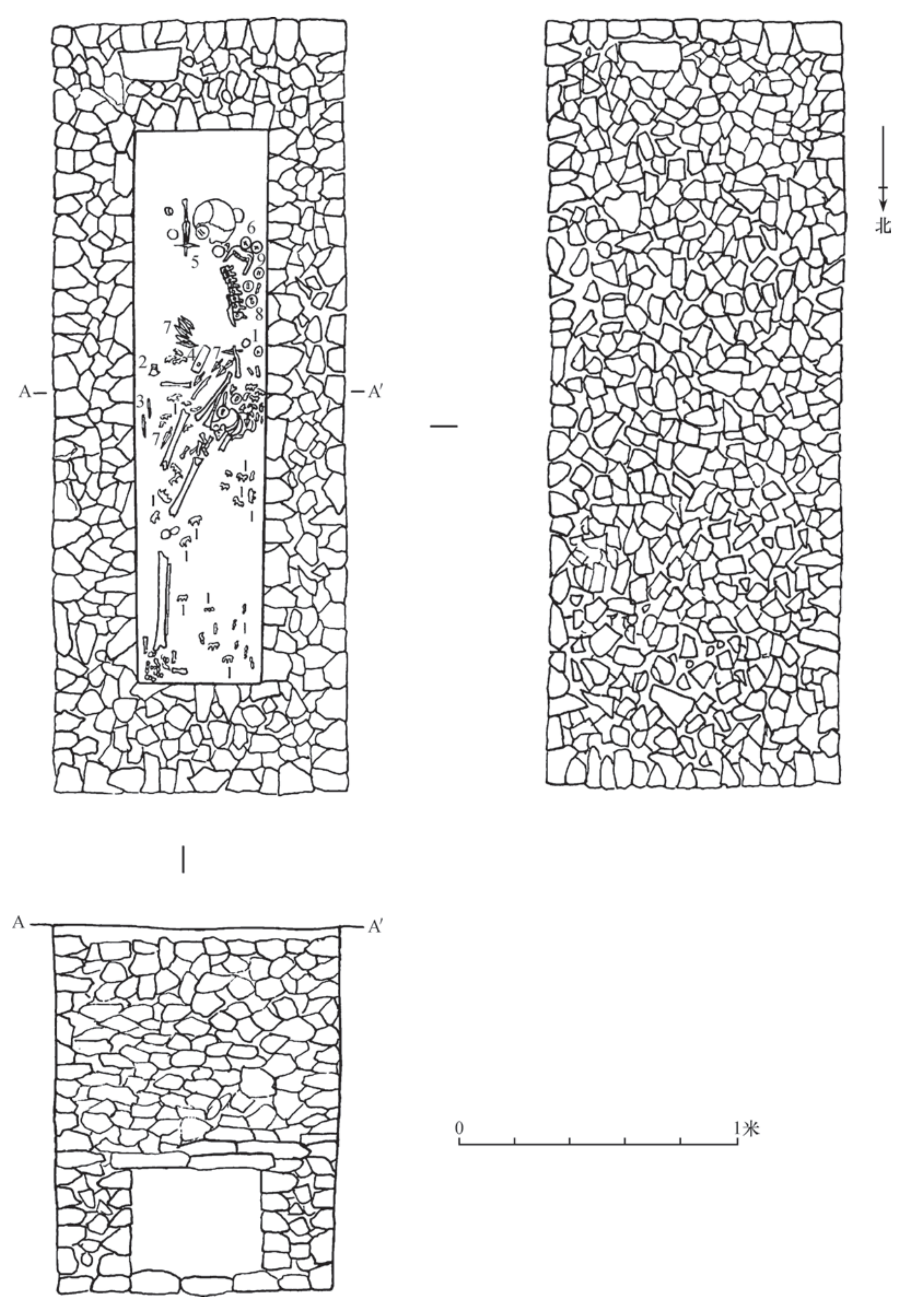
式，葬具，随葬品，殉牲等几个方面。其中墓葬的形制和规模以及葬具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体现了生者对死者葬仪的重视程度，从而间接反映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葬式一般是反映该地区当时的社会习俗；殉牲作为祭祀用品，其本身也是一种财富象征，可以衡量墓葬耗费的财力，进而体现墓主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随葬品组合按功能可分为装饰品组合、生产工具组合、武器组合、生活用具组合，随葬品的类别和多寡也能反应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首先从墓葬的形制、规模，以及葬具的复杂程度方面看，其能反映出墓葬建造时所耗费人力、物力的情况，从而体现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是研究墓葬等级制度的重要依据。小黑石沟遗址的墓葬中，M8501和M9601是两座大型石椁墓，但因遭到严重破坏和扰乱，墓葬形制、规模和葬具的具体情况不明，此外M8061仅确定墓葬形制是长方形石椁墓，墓葬规模和葬具的具体情况也不明，因此在分析墓葬规模和葬具方面，本文将剔除M8501、M9601和M8061这三座墓。从墓葬形制看基本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仅85NDXAⅠM2、92NDXBⅡM2和92NDXBⅡM14有生土二层台。墓葬规模主要是通过墓葬体积体现出来，由于部分墓葬受到扰乱破坏，墓葬原始深度难以推算，我们将以墓口面积作为墓葬规模的衡量标准。葬具方面，69座墓中有葬具者共50座，包括石椁木棺、石棺、木棺三种，但大部分墓葬的葬具是石棺。本文按葬具的复杂程度，将其分为以下三个级别（表五）。

A级：整体形制较为规整，构造较为复杂。石棺四壁由多排石块堆砌而成，层数较多，有的多达十余层。石棺顶部垒砌几层石块，多者达数十层。部分墓葬墓室底部也铺砌一层石块（图一）。此种墓葬共5座，有85NDXAⅠM3、92NDXAⅡM11、93NDXAⅡM23、98NDXAⅢM1、98NDXAⅢM5。此外，85NDXAⅠM1、85NDXAⅠM11两座石椁木棺墓，葬具结构也较为复杂，划归此级别。所以，有此级别葬具的墓葬所占比例为10.1%。

B级：石棺四壁大多为单排石块堆砌而成，顶部一般垒砌两到三层石块，部分墓室底部铺砌一层石块（图二）。此种墓葬共28座，有85NDXAⅠM4、85NDXAⅠM5、85NDXAⅠM6、85NDXAⅠM7、85NDXAⅠM8、85NDXAⅠM9、85NDXAⅠM10、92NDXBⅠM1、92NDXBⅠM3、92NDXBⅠM10、92NDXBⅠM11、92NDXBⅡM1、92NDXBⅡM2、92NDXBⅡM3、92NDXBⅡM4、92NDXBⅡM5、92NDXBⅡM7、92NDXBⅡM8、92NDXBⅡM11、92NDXBⅡM12、92NDXBⅡM13、92NDXBⅡM14、92NDXAⅡM1、92NDXAⅡM2、92NDXAⅡM7、93NDXAⅡM22、98NDXAⅢM8、98NDXAⅢM17，所占比例为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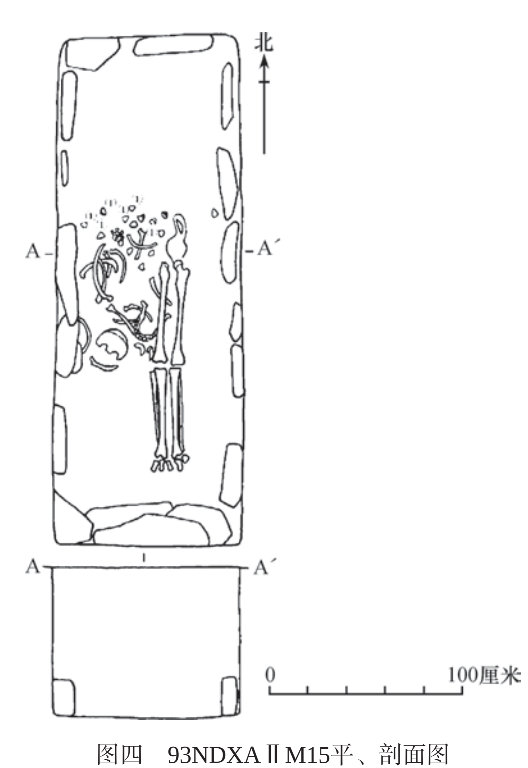
C级：简易石棺。有的墓葬仅在人骨上部垒砌几层石块，四壁及墓底均不见堆砌石块（图三）；有的墓葬仅在墓室四壁用碎石简单垒砌，顶部和墓底均不见堆砌石块（图四）。此种墓葬共14座，有92NDXBⅠM7、92NDXBⅠM8、92NDXBⅠM9、



图一 85NDXAⅠM3平、剖面图

图二　85NDXAⅠM5平、剖面图

图三　92NDXBⅠM8平、剖面图



图四　93NDXAⅡM15平、剖面图

92NDXAⅡM13、92NDXAⅡM14、93NDXAⅡM15、93NDXAⅡM16、93NDXAⅡM17、93NDXAⅡM19、93NDXAⅡM20、93NDXAⅡM21、98NDXAⅢM2、98NDXAⅢM10、98NDXAⅢM15，所占比例为20.2%。

表五　葬具等级表

A级：	85NDXAⅠM1，85NDXAⅠM3，85NDXAⅠM11，92NDXAⅡM11，93NDXAⅡM23，98NDXAⅢM1，98NDXAⅢM5
B级：	85NDXAⅠM4，85NDXAⅠM5，85NDXAⅠM6，85NDXAⅠM7，85NDXAⅠM8，85NDXAⅠM9，85NDXAⅠM10，92NDXBⅠM1，92NDXBⅠM3，92NDXBⅠM10，92NDXBⅠM11，92NDXBⅡM1，92NDXBⅡM2，92NDXBⅡM3，92NDXBⅡM4，92NDXBⅡM5，92NDXBⅡM7，92NDXBⅡM8，92NDXBⅡM11，92NDXBⅡM12，92NDXBⅡM13，92NDXBⅡM14，92NDXAⅡM1，92NDXAⅡM2，92NDXAⅡM7，93NDXAⅡM22，98NDXAⅢM8，98NDXAⅢM17
C级：	92NDXBⅠM7，92NDXBⅠM8，92NDXBⅠM9，92NDXAⅡM13，92NDXAⅡM14，93NDXAⅡM15，93NDXAⅡM16，93NDXAⅡM19，93NDXAⅡM20，93NDXAⅡM21，98NDXAⅢM2，98NDXAⅢM10，98NDXAⅢM15
无棺：	92NDXBⅠM2，92NDXBⅠM4，92NDXBⅠM5，92NDXBⅠM6，92NDXBⅡM6，92NDXAⅡM3，92NDXAⅡM4，92NDXAⅡM6，92NDXAⅡM8，92NDXAⅡM9，92NDXAⅡM10，93NDXAⅡM18，98NDXAⅢM3，98NDXAⅢM4，98NDXAⅢM7，98NDXAⅢM11，98NDXAⅢM14，98NDXAⅢM16

无葬具者共19座，有92NDXBⅠM2、92NDXBⅠM4、92NDXBⅠM5、92NDXBⅠM6、92NDXBⅡM6、92NDXAⅡM3、92NDXAⅡM4、92NDXAⅡM5、92NDXAⅡM6、92NDXAⅡM8、92NDXAⅡM9、92NDXAⅡM10、93NDXAⅡM18、98NDXAⅢM3、98NDXAⅢM4、98NDXAⅢM7、98NDXAⅢM11、98NDXAⅢM14、98NDXAⅢM16，所占比例为27.5%。葬具仅是木棺者有一例，85NDXAⅠM2。

从随葬品方面看，该遗址墓葬的随葬品数量与墓葬规模、葬具复杂程度并非全部是一一对应关系。有的墓葬规模大、葬具复杂程度高，但是随葬品却很少，如98NDXAⅢM1，墓葬面积大，葬具复杂程度为A级，但随葬品极少，仅见1件铜泡饰、1件铜扣、1件铜钮状器。有的墓葬规模一般，葬具较为简单，但随葬品却很丰富，如92NDXAⅡM5，墓葬规模一般，无葬具，但随葬品却比较丰富，随葬有铜剑、铜刀、铜斧、铜牌饰、铜车 、铜扣、15件蚌饰品、46件料珠、S形小饰件遍布全墓室。

本文按墓葬面积由大到小的顺序列表（附表）对墓葬形制、规模，葬具复杂程度及随葬品进行综合分析，可将小黑石沟遗址的墓葬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代表四个不同的阶层。

一级墓葬：2座，包括M8501和M9601。墓葬形制为大型石椁墓，但这两座墓受过严重破坏和扰乱，墓葬形制、规模和葬具的具体情况不明。随葬品数量大，种类多，样式精美，以青铜器为主，有青铜礼器、容器、车马具、武器、工具、装饰品等。其特点是大量随葬青铜礼器、容器，礼器以中原式青铜器为主，有的还刻有铭文，但铭文内容都与小黑石沟遗址没有直接关系。如M8501出土一件方簋，底部铸有三行铭文，计16个字，“许季姜作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随葬青铜礼器的规模与中原贵族墓葬相当，但品类繁杂，没有一定的组合，未形成像中原那样完备的列鼎列簋制度，不能按青铜器组合来划分等级，仅是作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故推测此等级墓葬的墓主人为小黑石沟遗址中的贵族阶级。

二级墓葬：9座，包括M8601、85NDXAⅠM1、85NDXAⅠM2、85NDXAⅠM3、85NDXAⅠM11、92NDXAⅡM11、93NDXAⅡM23、98NDXAⅢM1、98NDXAⅢM5。此等级墓葬或墓葬规模较大，葬具结构复杂，随葬品种类、数量较多，或其中一项较为突出。墓葬形制大部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也有石椁木棺墓和木棺墓，墓葬规模较大。葬具的复杂程度大部分都达到A级，形制较为规整，构造较为复杂。随葬品数量较多，以青铜器为主，种类有武器、车马具、工具、装饰品等，其特点是多见武器和车马具，基本不见一级墓葬中的青铜礼器。如85NDXAⅠM3，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面积较大，石棺形制较为规整，四壁为多层碎石块堆砌而成，顶部垒砌数十层石块，墓室底部铺砌一层石块，构造较为复杂，随葬品有铜剑、铜镞、铜斧、铜刀、铜铲、铜扣饰、铜联珠饰、铜牌饰、铜耳环、骨针等。

此等级墓葬中也有墓葬规模较大，葬具构造较为复杂，但随葬品却极少。如98NDXAⅢM1，墓葬面积大，葬具构造复杂，石棺四壁约有10层石板堆砌而成，墓室底部铺砌一层石板，但随葬品极少，仅见1件铜泡饰、1件铜扣、1件铜钮状器。

本文判断此等级墓葬的墓主人应属于小黑石沟遗址中的中层阶级，有的墓葬随葬品中多见头盔、短剑等武器装备，推测其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武士之类，拥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三级墓葬：30座，包括85NDXAⅠM4、85NDXAⅠM5、85NDXAⅠM6、85NDXAⅠM7、85NDXAⅠM8、85NDXAⅠM9、85NDXAⅠM10、92NDXBⅠM1、92NDXBⅠM3、92NDXBⅠM10、92NDXBⅠM11、92NDXBⅡM1、92NDXBⅡM2、92NDXBⅡM3、92NDXBⅡM4、92NDXBⅡM5、92NDXBⅡM7、92NDXBⅡM8、92NDXBⅡM11、92NDXBⅡM12、92NDXBⅡM13、92NDXBⅡM14、92NDXAⅡM1、92NDXAⅡM2、92NDXAⅡM5、92NDXAⅡM7、93NDXAⅡM17、93NDXAⅡM22、98NDXAⅢM8、98NDXAⅢM17。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墓葬规模较二级墓葬小，葬具的复杂程度为B级。随葬品较少，主要是工具类和装饰品类，部分墓葬无随葬品。如85NDXAⅠM8，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规模较小，石棺四壁为石块堆砌而成，顶部垒砌两层碎石块，随葬品有铜凿、铜联珠

饰、铜镞、铜别针等。

其中，部分墓葬的葬具等级较低，或无葬具，但随葬品却很丰富，也归入此等级。如92NDXAⅡM5，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随葬品丰富，有铜剑、铜斧、铜刀、铜车 、铜牌饰、铜小饰件、料珠项饰、蚌饰件等，其中铜S形小饰件遍布墓室。此等级墓葬的墓主人推测为小黑石沟遗址中的平民阶级。

四级墓葬：31座，包括92NDXBⅠM2、92NDXBⅠM4、92NDXBⅠM5、92NDXBⅠM6、92NDXBⅠM7、92NDXBⅠM8、92NDXBⅠM9、92NDXBⅡM6、92NDXAⅡM3、92NDXAⅡM4、92NDXAⅡM6、92NDXAⅡM8、92NDXAⅡM9、92NDXAⅡM10、92NDXAⅡM13、92NDXAⅡM14、93NDXAⅡM15、93NDXAⅡM16、92NDXAⅡM18、93NDXAⅡM19、93NDXAⅡM20、93NDXAⅡM21、98NDXAⅢM2、98NDXAⅢM3、98NDXAⅢM4、98NDXAⅢM7、98NDXAⅢM10、98NDXAⅢM11、98NDXAⅢM14、98NDXAⅢM15、98NDXAⅢM16。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规模较小，部分墓葬的葬具是简易石棺，复杂程度为C级，部分墓葬无葬具。随葬品极少，主要是装饰品类，部分墓葬无随葬品。如92NDXBⅠM8，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规模较小，葬具为简易的石棺，仅见顶部杂乱垒砌三层大小不一的石块，墓葬无任何随葬品。此等级墓葬的墓主人推测为小黑石沟遗址平民阶级中地位较低的一级，拥有的财富较少，相比较为贫穷。

由此可以看出，小黑石沟遗址的社会中已经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从墓葬形制、规模，葬具的复杂程度，随葬品的多寡和类别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高等级墓葬规模大，葬具复杂程度高，随葬品数量多、种类丰富，其中不乏中原贵族所用的青铜礼器等精美的随葬品。而普通墓葬规模小，葬具简单，有少量随葬品或无随葬品。这是小黑石沟遗址社会中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的表现。

在性别方面，由于大部分墓葬人骨保存不佳，难以判断其性别，使得本文对墓葬埋葬制度中性别方面规律的探讨受到阻碍。从可辨明性别的几座墓葬来看，同属于二级墓葬的93NDXAⅡM23、98NDXAⅢM1，说明此等级墓葬的墓主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墓葬规模、葬具的复杂程度均与墓主人的性别无明显的联系，男性、女性是否存在社会地位上的高低之别也并不明显。另外，从随葬品种类分析，装饰品如耳环、铜扣、料石珠等在男、女墓葬中均有出土，与生产工具相关的刀、匕、锥等在男、女墓葬中也都有出土，说明当时社会分工现象并不明显。

在年龄方面，同样由于大部分墓葬人骨保存不佳，难以判断其年龄，增加了本文研究墓葬埋葬制度中年龄方面规律的难度。但从可以确定的两座儿童墓葬93NDXAⅡM20和98NDXAⅢM3来看，这两座墓的面积较小，是根据墓主人身材的大小而定，墓葬中皆无随葬品，墓葬等级都属于第四等级，可见幼年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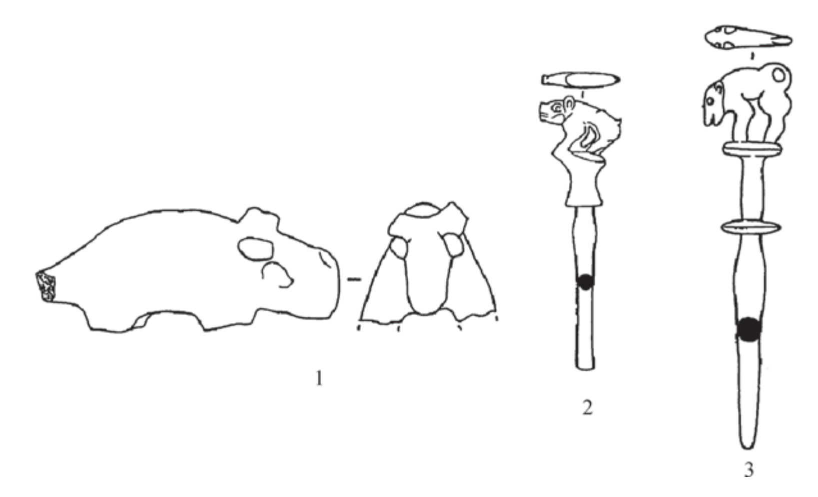
三、社会生产水平

1. 生业模式

（1）农业生产

小黑石沟遗址的居住址发现房址和大量的灰坑，居住址内出土大量陶器，种类齐全，且以日常生活用具为基本组合，如鬲、罐、盆、豆、钵等，且包括颇多大型陶器。陶器主要为夹砂灰褐、红褐陶，易破碎，不便于远距离移动。由此可见，小黑石沟遗址的居民应该过着定居生活。此外，小黑石沟遗址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72座，规模较大，也说明这里的居民应该是过着定居的生活。

定居生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从小黑石沟遗址出土的遗物来看，有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其中用于砍伐、收割的石斧、石刀、石铲等占较大比重，还出土加工谷物的磨棒。很多灰坑的坑壁都有明显的工具加工痕迹，但遗址中未出土用于掘土的大型工具，推测可能为木制工具，未保存下来。有的灰坑中发现有炭化谷物的痕迹，如92NDXAⅡH18，在坑底发现一层谷物炭化的痕迹，经土样采样分析确为谷物，推测此灰坑应为一个放置粮食的窖穴。通常认为，猪的饲养与农业经济有关。小黑石沟遗址中有出土猪的骨骼，还发现装饰有猪形象的器物，如98NDXAⅢM5有一件陶猪（图五，1），墓葬93NDXAⅡM17发现有两个青铜簪形饰，顶端均铸有一只圆雕的猪形象（图五，2、3）。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其他遗址中也普遍发现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如龙头山、南山根、夏家店、蜘蛛山、大井遗址，都出土石铲、石锄、石刀、铜镐、铜镬等生产工具。遗址中也出土猪、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从喀喇沁旗大山遗址中夏家店上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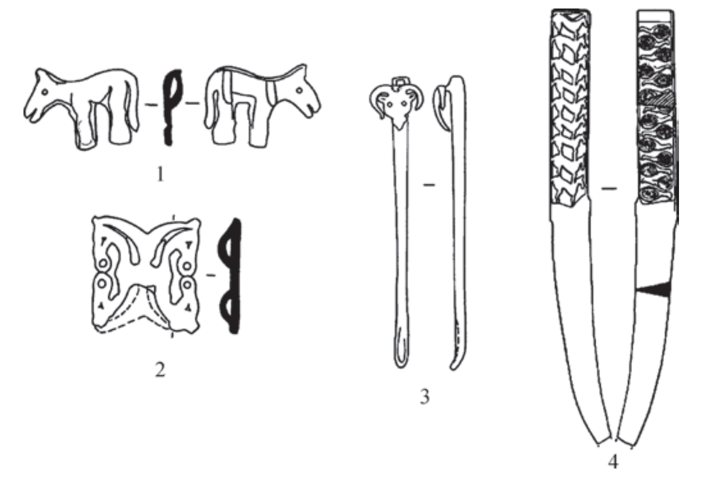
图五　小黑石沟遗址出土的猪形象器物

1. 98NDXAⅢM5　2. 93NDXAⅡM17　3. 93NDXAⅡM17

化的动物骨骼来看，猪的骨骼占到60%，居大宗，可推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当以农业为主，小黑石沟遗址的居民也当如此。

（2）畜牧业

居住在我国北方长城地带的古代居民都发展一定的畜牧业，小黑石沟遗址的居民应也不例外。该遗址出土有动物骨骼，包括马、牛、羊、狗等，灰坑中较常见。遗址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丰富的车马具，主要见于一、二等级的墓葬，如一等级墓葬M8501、M9601均随葬数量可观的车马具，包括当卢、马衔、马镳、节约、车轭、杆头饰等。属于第二等级墓葬的92NDXAⅡM11亦出土丰富的马具随葬品，有铜马衔、铜马镳、铜节约等。这说明当时养马业较为发达。此外，遗址出土器物的装饰图案中，多是一些畜牧部族常见的马、羊等家畜类题材，如85NDXAⅠM3出土有马形铜牌饰（图六，1），马呈伫立低头觅食状，马腿粗壮，此牌饰多达43件，遍布整个墓室。92NDXAⅡM1出土一件青铜牌饰，为群马造型，整体呈方形，镂空对称刻画四个马头（图六，2）。M8501出土一件铜刀，弓背弧刃，柄部一面有10个相连的伫立状马形饰（图六，4）。92NDXAⅡM14出土一件青铜匕，顶端有一个圆雕羊首，羊角向下弯曲，双眼用圆圈表示（图六，3）。这些器物上的装饰图案都从侧面反映了畜牧业在此遗址居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图六　小黑石沟遗址出土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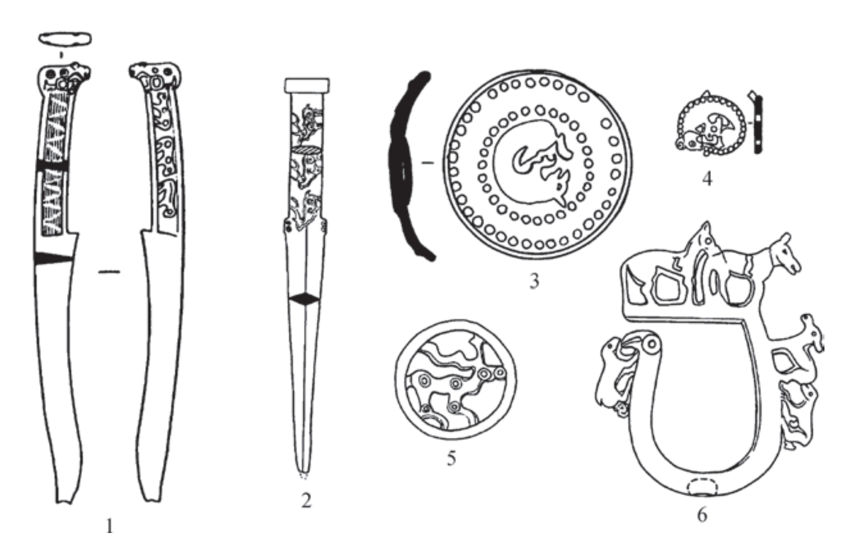
1. 铜牌饰（85NDXAⅠM3）　2.铜牌饰（92NDXAⅡM1）　3.铜匕（92NDXAⅡM14）　4.铜刀（M8501）

（3）渔猎采集

狩猎在小黑石沟遗址居民的经济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如一件采集的青铜动物纹挂钩，整体呈马镫形，一侧有缺口，呈鸟首状，横梁上端有两个人骑马的形象，但人物已残，仅留马背上人腿部的造型，右侧横梁上饰有两只狗的形象，左侧横梁上饰有一只豹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一幅骑马狩猎的场景（图七，6）。遗址出土器物的装饰图案中有大量野生动物图案，以虎、鹿、豹为主。如85NDXAⅠM2出土的一把铜刀，直柄、

弧刃、刀尖上翘，刀柄顶端铸一只虎，呈伫立状，昂首远眺，刀柄正面亦饰有三只虎纹（图七，1）。M8501出土一把T字形直刃短剑，直柄，柄首呈T字形，剑柄的两面均饰有三只大角鹿，呈伫立状，昂首，鹿身以圆圈纹装饰（图七，2）。采集的一件圆环形鹿纹牌饰，圆环状，中间镂空饰一大角鹿，形象较为抽象，鹿身饰圆圈纹（图七，3）。98NDXAⅢM5，出土一件金制卷曲豹形饰件，豹的身体蜷曲成一团，头尾相接，身体外围有一圈连珠纹（图七，4）。98NDXAⅢM17，出土一件圆形青铜牌饰，中间有一只卷曲成团的豹纹，头尾相接，豹的外围饰有两周连珠纹（图七，5）。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其他遗址出土的器物中也发现狩猎题材的装饰艺术，如南山根遗址M3出土一件铜环，环上饰两个人骑马围追兔子的场景，造型生动。南山根遗址M102出土一件刻纹骨板，上面描绘猎人拉弓射杀鹿的场景，这些都说明了狩猎在该文化居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箭镞，分铜制、骨制、石制三种，虽然不排除是用于战争，但也可能与狩猎有一定关系。

此外，遗址中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鱼骨和网坠，说明小黑石沟遗址的居民还可能从事一定的捕鱼业，渔猎经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也占一定比例。至于采集方面，虽未发现相关炭化的植物，但推断是存在的。



图七　小黑石沟遗址出土器物

1.铜刀（85NDXAⅠM2）　2.铜剑（ M8501）　3. 铜圆形环饰（98NDXAⅢM17）
4. 豹形金饰件（98NDXAⅢM5）　5.铜挂钩（75ZJ）

2. 手工业

（1）制陶业

陶器是小黑石沟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遗物，主要见于居住址中，墓葬中较少见。器型包括鬲、罐、豆、盆、钵、鼎、杯、纺轮、鼓形器等数种，其中鬲、罐、豆、盆的

数量较多，构成该遗址的陶器基本组合。

该遗址陶器器壁较厚，整体感觉厚重，从陶质看，主要以夹砂陶为主，质地疏松。陶色以灰褐色和红褐色居多，也有少量红色、黑色等，但器表颜色多不均匀，呈色斑驳，多为素面，纹饰较罕见。在制法方面，小型陶器采用手制法，一般制作比较粗糙。大型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先将各部分用盘筑法制成，把连接处压成锯齿状，然后再套接成器，这种套接方法是小黑石沟遗址制陶技术的一大特色。小黑石沟遗址的陶器多为夹砂陶，质地疏松，器表颜色也多烧制的不均匀，呈色斑驳，可见当时陶器烧制火候较低，说明该遗址的制陶技术水平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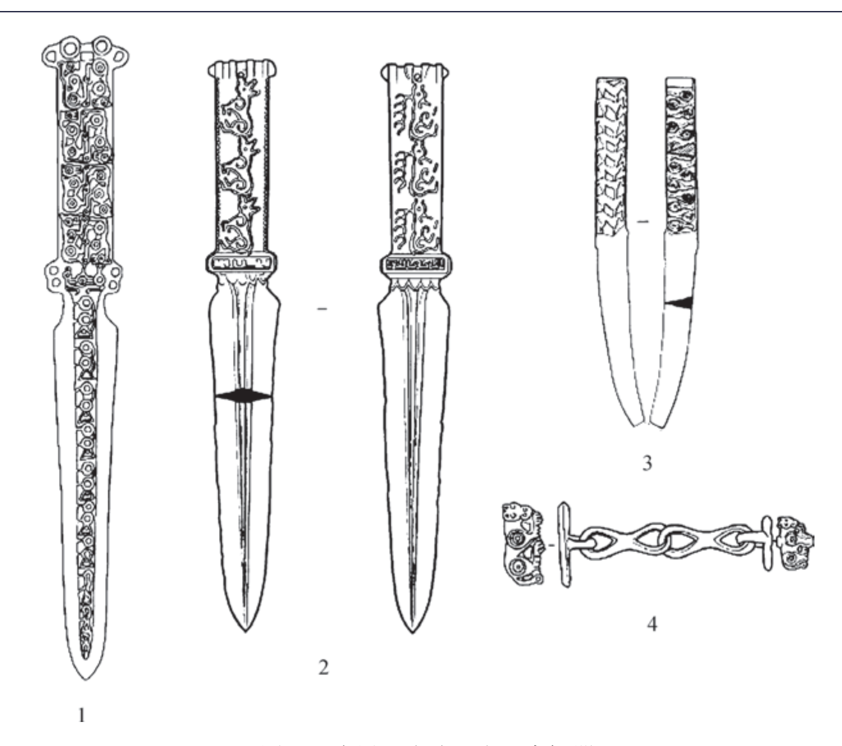
（2）骨器、石器制造业

小黑石沟遗址的骨器主要是见于居住址，墓葬中较少见。以工具类为多，主要有锥、镞、铲、匕、刀、镰等。亦见少量卜骨和装饰品。其中骨锥的数量最多，有圆锥状的、椭圆形锥体的、三棱锥状体的，也有犄角加工而成的。制法上流行将动物的肢骨剖开后加工磨制而成，整体扁平，顶部加工成圆珠状或扁平状装饰。骨镞的数量仅次于骨锥，形制方面有双翼有铤式，还有燕尾式和无翼有铤式，这两种是小黑石沟遗址箭镞所特有的形制，也见于一些青铜镞中。骨匕数量较少，一般是用动物长骨或骨片磨制而成，有的平面呈长方形，扁体较薄，直刃或弧刃，动物长骨直接加工的仅在下端磨制。说明该遗址的骨器制造业有一定发展。

小黑石沟遗址的石器主要出土于居住址中，墓葬中数量较少。器型种类较多，有斧、刀、铲、杵、纺轮、凿、磨棒、网坠、环状器等。其中石刀、石斧、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居大宗。石刀数量较多，主要是半月形双孔刀，磨制而成，弓背直刃，刀身中部有两个钻孔，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石刀的基本形制。石斧数量与石刀相当，主要有三种，一种平面有呈梯形或者近似长方形，弧刃，正锋，斧身有的有钻孔；一种平面是三角形，刃部圆顿，斧身上端有钻孔；另一种平面呈不规则形，周边有打制痕迹，下端两面打制成刃部。石刀和石斧的数量占据所有石器的总数80%以上。该遗址出土一种料石珠项饰，仅见于墓葬中，料石珠项饰主要是由黑白两色的料石珠穿制而成，间或有绿松石珠，大多数墓葬皆有随葬。石刀、石斧、石铲多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可见小黑石沟遗址的石器制造业多是生产农业工具。

（3）青铜铸造业

小黑石沟遗址的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遗址墓葬的随葬品中以铜器为主，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其中尤以武器类、工具类、车马具类和装饰品类最具特色，说明当时流行随葬青铜器，青铜铸造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青铜制品都制作精良，做工考究。如1975年征集的一件青铜剑，柄首为两只相向的抽象鸟纹，柄部两面均饰有四组相对而卧的马纹，剑格部位铸有一只伫立状马纹，两侧亦装饰有抽象鸟头纹，剑叶两面中间均饰有十头伫立状的猪的图案，整把剑做工精致，装饰精美（图八，1）。92NDXAⅡM5出土一件青铜短剑，剑首为T字形，中间有一个孔，之前可能有衔环，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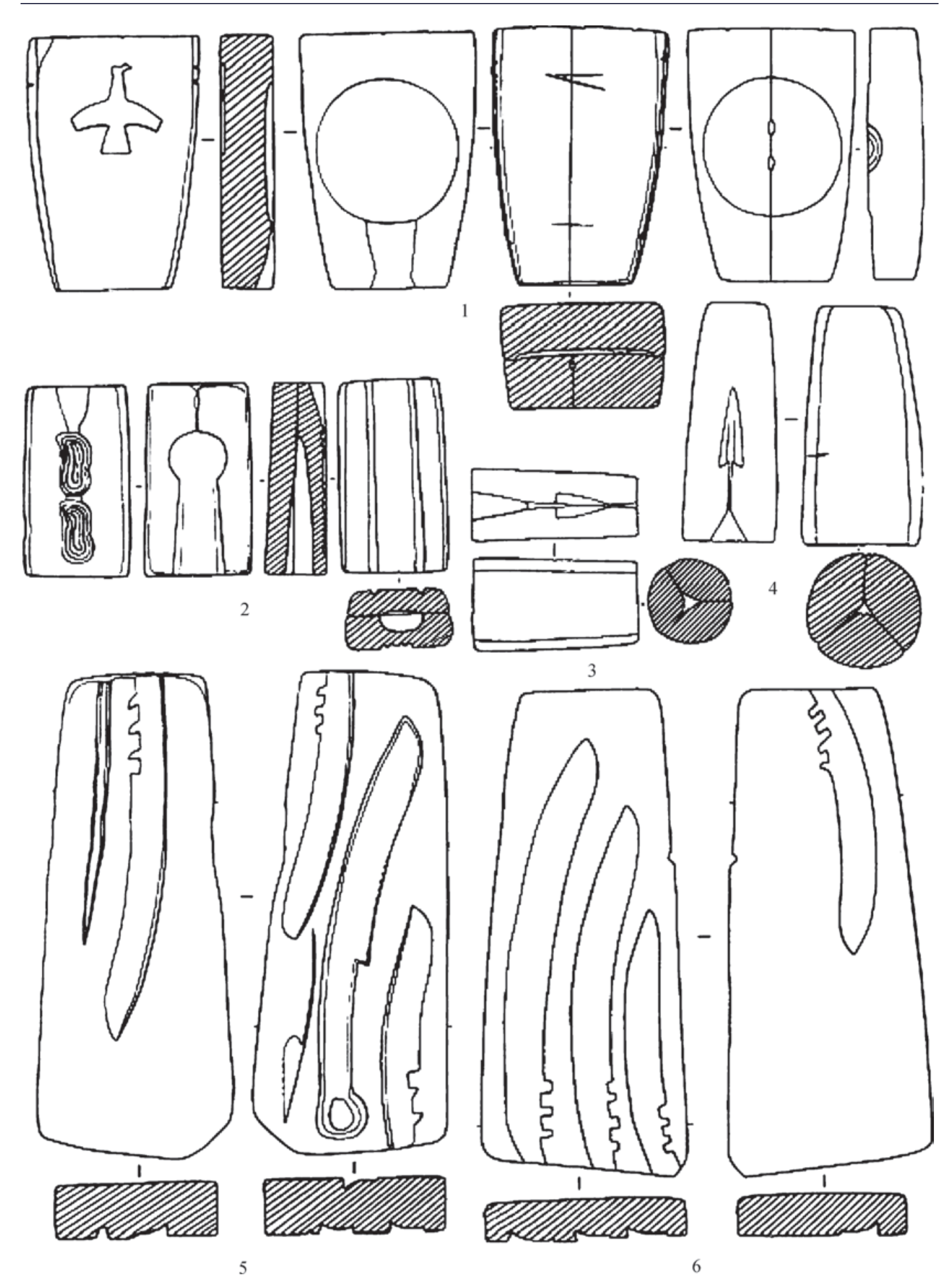
图八　小黑石沟遗址出土青铜器

1. 铜剑（75ZJ）　2. 铜剑（92NDXAⅡM5）　3. 铜刀（M8501）　4. 马衔（M8501）

部两面边缘均饰有连珠纹，一面中间为三只伫立状马纹，另一面中间为三只大角鹿纹，剑叶中部有三道凸起的棱脊,整体制作考究，纹饰精美（图八，2）。M8501出土一把铜刀，柄部饰精美的图案，一面是十四只相错的抽象几何形鸭纹，一面是十个伫立状的马纹（图八，3）；其出土的车马具也很精美，有一马衔两端各饰一个蹲踞状虎纹，虎身饰有重圈纹（图八，4）。这些制作异常精致的铜器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技艺的高超。该遗址还出土夏家店上层文化所特有的遗物——剑鞘，目前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时间早于或相当于该文化的遗址尚未发现此类金属剑鞘，从侧面说明其青铜铸造业的发达程度。而且像M8501、M9601这样的多种青铜器出土于同一座墓葬的现象也较为罕见。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小黑石沟遗址青铜铸造业水平十分发达。

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一批铸造石范，主要有工具类和装饰品类，包括刀锥范、凿范、泡范、斧范、铃范等。许多范中模的形制都与出土遗物相似，如鸟形、S形泡范，铃范，齿柄刀、环首刀的范，三翼镞范等（图九）。这些石范也是该遗址青铜铸造业高度发达的实物见证。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其他遗址也出土种类繁多、制作精良的青铜器，还有冶炼遗址的发现也说明此文化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如林西大井铜矿遗址，从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来看，该铜矿遗址包括采矿、选矿、冶炼、铸造等整套工序。矿址的面积约2.5平方千米。地表可见露天采矿坑47条，最长者为102米，短者7.8米，宽0.25～0.8米。深均在



图九　小黑石沟遗址出土石范

1. 泡范　2. 柄形器范　3、4. 三翼镞范　5、6. 刀锥范

7～8米。有的坑道附近还发现工棚遗迹。出土和采集的石锤、石镐等采矿工具1500余件。另外还发现冶炼遗址多处，出土大量坩埚残片、焦砟和鼓风管[4]。大井铜矿遗址有两个^{14}C测年数据：K2T4上层炼炉旁采集石炭标本距今（2970±115）年和K4T2F2堆积层中出土石炭标本距今（2720±90）年，年代上限可以早到西周早期[5]。可见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很早就开采铜矿来铸造青铜器，为之后青铜铸造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结　　语

本文以《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为基础，对小黑石沟遗址进行整体的分析和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一定认识。

第一，在小黑石沟遗址的分期研究方面，原报告根据层位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将其大致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主要遗迹单位是灰坑、房址，晚期主要遗迹单位是墓葬。笔者对原报告中的分期结果提出异议，然后根据遗迹中出土的器物及组合，以及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将该遗址分为三期。

第二，社会组织方面，遗址中的墓葬资料为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提供了信息，本文通过对墓葬形制、规模、葬具的复杂程度及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进行综合分析，将墓葬划分为四个等级，这说明当时社会中已有明显的等级分化现象；男女两性关系较为平等，社会分工现象不明显；幼年墓主人社会地位较低。

第三，在社会生产水平方面，小黑石沟遗址的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同时狩猎在该遗址居民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方面有制陶业、青铜铸造业、石器和骨器制造业，其中以青铜铸造业最为发达。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对小黑石沟遗址资料的科学整理和系统发表，有助于我们探讨该遗址相关问题，及促进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笔者能力有限，仅对上文内容做初步分析与研究，希望在小黑石沟遗址乃至整个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方面尽自己有限的力量。

注　　释

［1］ I.Hodder.*Burials, Houses, Women and Men in the European Neolithic*[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2］ Shelach G..Apples and Orange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Burial Data from Northeast China［J］.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2002 (3):53~90.

［3］ 魏峻.中国史前埋葬习俗的研究[A].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59～69.

［4］ 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1）.

［5］ 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A Study on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Xiaoheishigou Site

Chen Hailin

Abstract: Situated on the tableland in the southeast of Xiaoheishigou Village, Ningcheng County,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Xiaoheishigou Archaeological Site witnessed several clearances and excavations between 1975 and 1998. The publication of *Xiaoheishigou—Report on Excavation of Upper Xiajiadian Cultural site* in Mar. 2009. This paper will carry out overall primary analysis and study on Xiaoheishigou Archaeological Site on the basis of this Report. In this paper, three period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overlapping and brea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ains as well as the unearthed utensil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in the remains. And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analyses and studies in the aspe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productivity of Xiaoheishigou Archaeological Site,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hierarchy by reference to its burial system, to judge that the economy is dominated by agriculture and subordinated by husbandry with hunting as important activity and bronze foundry as a developed industry.

Key words: Xiaoheishigou archaeological site; period; social organization; social productivity

附表

小黑石沟遗址墓葬等级分析表

墓号	墓葬形制	墓葬面积	葬具等级	性别	年龄	武器	工具	车马器	装饰品	容器
85NDXAⅠM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	162000	A						铜扣、铜牌饰、铜联珠饰、骨饰	
92NDXAⅡM1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98800	A			骨镞、石镞	铜别针	铜马镳、铜马衔、铜节约、铜车軎、铜车马器具、铜带纽器、骨镳	铜扣、海贝	小陶杯
92NDXAⅡM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62400	B			铜镞			铜牌饰	
93NDXAⅡM23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57800	A	女						
98NDXAⅢM5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53760	A			铜剑	骨锥、铜刀、铜棒、铜镜	铜当卢	铜泡饰、铜簪形饰、豹形金饰件、铜扣、铜虎纹牌饰、陶猪	青铜鼎
98NDXAⅢM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53040	A	男	40 ~ 45					
92NDXBⅡM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44080	B	男					贝	
93NDXAⅡM2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40128	C						铜扣	

续表

墓号	墓葬形制	墓葬面积	葬具等级	性别	年龄	武器	工具	车马器	装饰品	容器
85NDXAⅠM3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33000	A			铜剑、铜镞	铜斧、铜刀、铜管、铜铲、铜针筒、骨针		马形青铜牌饰、圆形青铜牌饰、铜扣、铜耳环	
98NDXAⅢM17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32500	B				铜凿、铜斧		铜扣、铜牌饰、铜小饰件	小陶钵
92NDXBⅡM7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31050	B	男						陶钵
85NDXAⅠM2	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棺墓有二层台	28500				青铜矛、铜戈、铜镞、铜盔	石斧、角锥、铜管銎斧、铜齿柄刀、铜环首刀、铜兽首刀、铜斧	铜当卢、铜车軎	铜扣、铜牌饰、铜泡、铜五联珠饰	
93NDXAⅡM22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27500	B				铜刀、铜锥、石铲(填土)、骨管(填土)		铜扣、料石珠	
85NDXAⅠM10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26000	B			铜镞(填土)			铜耳环	
92NDXAⅡM15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26000	C						蚌饰件	
98NDXAⅢM10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25584	C							
92NDXBⅡM8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24920	B							

续表

墓号	墓葬形制	墓葬面积	葬具等级	性别	年龄	武器	工具	车马器	装饰品	容器
98NDXAⅢM16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23520	无							
98NDXAⅢM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20000	无							
85NDXAⅠM1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	19680	A						料珠项饰	
93NDXAⅡM19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9200	C				铜刀、骨棒、骨管			
85NDXAⅠM8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8900	B			铜镞	铜齿、铜别针		铜联珠饰	
85NDXAⅠM5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8200	B						绿松石项饰、铜扣饰(填土中)	
92NDXBⅡM2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7640	B				骨匕、卜骨		石料珠、铜扣(填土)	小陶杯(填土)
92NDXBⅡM4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7538	B	男			铜刀、铜匕、陶纺轮		铜耳环	
85NDXAⅠM4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7500	B							
92NDXBⅡM5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7160	B							
98NDXAⅢM15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7000	C							
92NDXBⅠM3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6800	B						铜耳环	

续表

墓号	墓葬形制	墓葬面积	葬具等级	性别	年龄	武器	工具	车马器	装饰品	容器
85NDXAⅠM7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6520	B						石珠项饰	
92NDXBⅠM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6500	B						铜耳环、铜人面纹饰	
92NDXAⅡM16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6320	C							
92NDXBⅡM6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6000	无							
98NDXAⅢM1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5776	无	男						
92NDXBⅠM1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5275	B							
92NDXBⅡM3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5200	B							
93NDXAⅡM20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5200	C		儿童					
98NDXAⅢM11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5200	无							
85NDXAⅠM9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5120	B							
98NDXAⅢM8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5048	B							
92NDXAⅡM17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4980	C			铜剑	铜刀、骨叉形器		青铜牌饰、铜簪形饰	

续表

墓号	墓葬形制	墓葬面积	葬具等级	性别	年龄	武器	工具	车马器	装饰品	容器
92NDXBⅡM12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4770	B							
92NDXBⅡM13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4528	B							
92NDXAⅡM8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4450	无							
92NDXBⅠM10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4420	B							
93NDXAⅡM18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3664	无				石杵			
92NDXAⅡM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3600	无							
92NDXAⅡM14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3300	C				铜匕、铜刀		铜耳环、料石珠项饰	
92NDXBⅠM2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2600	无							
98NDXAⅢM7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2600	无							
92NDXBⅠM4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2300	无	男			陶纺轮		铜耳环	陶钵
92NDXBⅡM14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2064	B							
85NDXAⅠM6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2000	B				铜刀、骨锥、骨针、铜棒		铜扣	

续表

墓号	墓葬形制	墓葬面积	葬具等级	性别	年龄	武器	工具	车马器	装饰品	容器
92NDXB Ⅰ M8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2000	C							
92NDXB Ⅰ M6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1400	无	男					铜扣、铜双尾状饰、铜圆环形饰	
92NDXA Ⅱ M5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11275	无			铜剑	铜斧、铜刀、骨锥	铜车軎	铜牌饰、铜小饰件、蚌饰件、料珠饰	
92NDXB Ⅱ M11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0650	B							
92NDXA Ⅱ M13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0476	C			青铜镞				
92NDXB Ⅰ M9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10440	C							
92NDXA Ⅱ M6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9625	无							
92NDXB Ⅰ M7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9120	C	男			铜锥		石料珠	
92NDXA Ⅱ M9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7476	无							
92NDXA Ⅱ M2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残	B							
92NDXA Ⅱ M3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残	无				骨锥			
92NDXA Ⅱ M7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残	B							

续表

墓号	墓葬形制	墓葬面积	葬具等级	性别	年龄	武器	工具	车马器	装饰品	容器
92NDXAⅡM10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残	无							
92NDXBⅠM5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残	无	男					铜耳环	
98NDXAⅢM2	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棺墓	残	C							
98NDXAⅢM3	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残	无		儿童					

齿柄舌铜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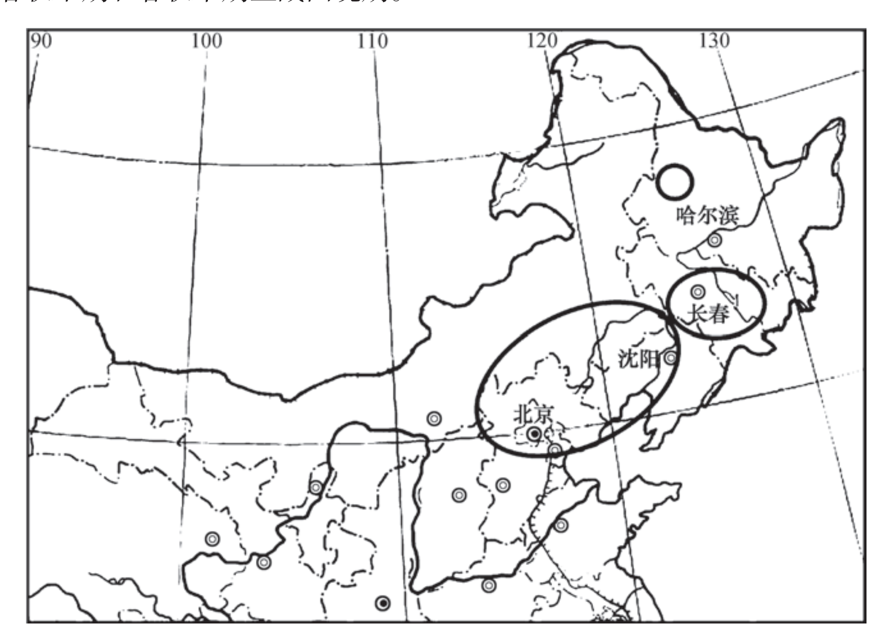
吕学明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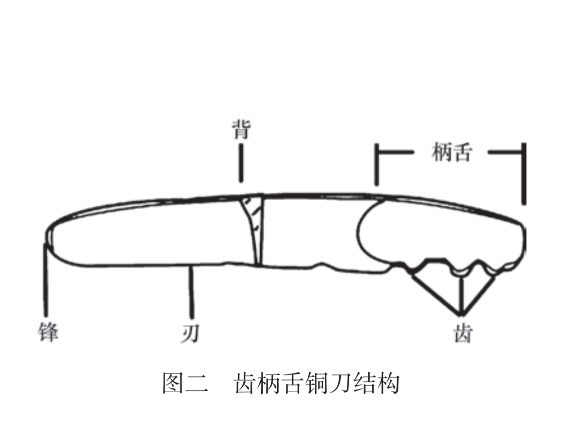
青铜刀的类型极为丰富，承载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区域特征。西周至战国之际，在中国东北部地区，具体包括河北北部、京津、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讷河市（图一），流行一类齿柄舌铜刀。

此类铜刀为复合柄刀子，由刀身、柄舌、刀柄三部分构成（图二）。其刀身较长，形式多样；其柄舌短小，下缘有凸齿，是此类铜刀典型特征及命名根据；其刀柄为木质或骨质，套接、铆接或夹装于柄舌之上，形成复合刀柄（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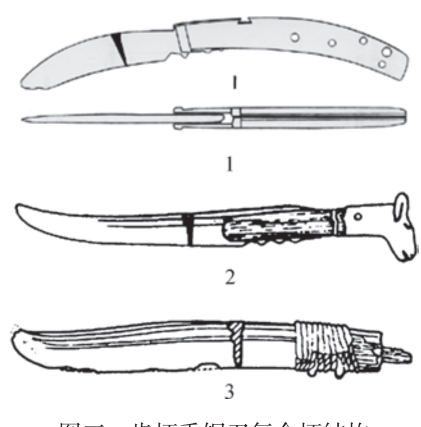
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齿柄舌铜刀首见于西周早期，成熟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衰落于战国中晚期。可以将齿柄舌铜刀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西周至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



图一　齿柄舌铜刀分布区示意图



图二　齿柄舌铜刀结构



图三　齿柄舌铜刀复合柄结构
1.小黑石沟93NDXAⅡM19：1
2.敖汉旗大哈巴齐拉M1出土铜刀
3.敖汉旗周家地M45：53

一、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齿柄舌铜刀

就齿柄舌铜刀而言，从西周早期开始出现，到西周中期发展成熟，成为中国东北部地区最有地方特色的铜刀类型。从青铜器发展的角度看，整个北方地区春秋早期与西周晚期是一脉相承的，共性很多，无法断然割裂，这一点在齿柄舌铜刀上也有体现。因此，本文将西周至春秋早期作为一个大的发展阶段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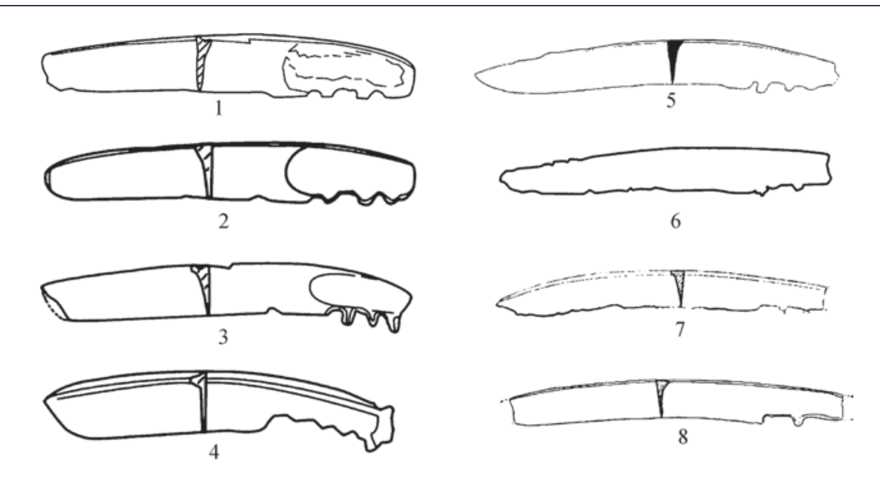
（一）型式划分

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齿柄舌铜刀可以划分为四型，具体如下：

A型　刀身较长，刀背微凸，刃近平直或略凹，刀身与柄舌分界多较明显。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宽，刀刃较直，刀锋宽且圆钝。标本辽宁省建平县水泉M8出土铜刀[1]，柄舌下缘有2齿，以利于绑缚木柄，现尚存木柄和麻线痕迹。长18.3、柄舌长5厘米（图四，1）。标本建平县水泉城子M7701：3[2]，保存完整，柄舌下缘有3齿，两侧面均遗有清楚的木质纤维痕迹，推知原曾加装木质柄。长18.4、宽3.4、背厚0.8厘米（图四，2）。标本建平县水泉城子M7801：2[3]，长21、宽2.9厘米（图四，3）。标本辽宁省喀左县和尚沟B区M22：5[4]，长11.8厘米（图四，4）。

Ⅱ式：刀身略窄，刃多内凹，尖锋。标本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92NDXBⅡM4：4[5]，长12.7厘米（图四，5）。标本喀左县和尚沟D区M12：3[6]，柄舌下缘有1齿。长12.5厘米（图四，6）。标本宁城县南山根M102：8[7]，刀刃略残，残长16.2厘米（图四，7）。标本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M17：6[8]，刀身细长，刀锋和柄舌残（图四，8）。



图四　A型刀

1～4.Ⅰ式（建平县水泉M8出土铜刀、建平县水泉城子M7701：3、建平县水泉城子M7801：2、喀左县和尚沟B区M22：5）　5～8.Ⅱ式（宁城县小黑石沟92NDXBⅡM4：4、喀左县和尚沟D区M12：3、宁城县南山根M102：8、赤峰市夏家店M17：6）

变化规律：刀身由宽变窄，刀锋由圆钝变尖锐。

B型　刀身窄，背较直、刃略凹，刀锋圆钝，刀身与柄舌分界不明显。

标本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关东车M1：3[9]，刀身呈长条状，柄舌残，下缘保留2个凸齿。残长15.3厘米（图五，1）。标本内蒙古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出土铜刀[10]，柄舌下缘有两个小齿。长14.5厘米（图五，2）。

C型　刀身窄长，直背，直刃。

标本宁城县南山根M101：58[11]，尖锋，柄舌窄于刀身，柄舌下缘有3个凸齿。长12.4厘米（图六，1）。标本宁城县小黑石沟85NDXAⅠM2：10[12]，柄舌与刀身同宽，刀锋残。残长20.6厘米（图六，2）。



图五　B型刀

1.克什克腾旗关东车M1：3　2. 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出土铜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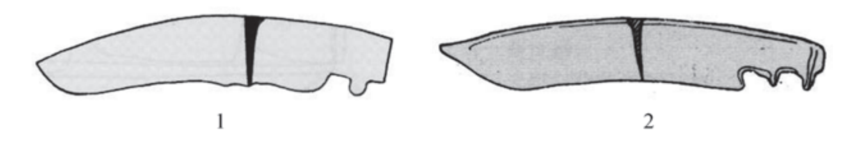


图六　C型刀

1.宁城县南山根M101：58　2.宁城县小黑石沟85NDXAⅠM2：10

D型　刀身短宽，凸背，凹刃。

标本宁城县小黑石沟92NDXBⅠM1：2[13]，刀锋圆钝，单齿。长7.5厘米（图七，1）。标本敖汉旗东井村出土铜刀[14]，刀锋尖锐，两齿。长12.5厘米（图七，2）



图七　D型刀

1. 宁城县小黑石沟92NDXBⅠM1：2　2. 敖汉旗东井村出土铜刀

（二）分期研究

以上铜刀标本，以墓葬出土为主，有铜器或陶器与之共存，为我们对其进行分期断代提供了基本条件。本文选取与典型陶器或青铜器共存的单位，作为铜刀分期断代的主要参照物及检验标准。结合铜刀自身形制的演变规律，可将西周至春秋早期齿柄舌铜刀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期。

1. 第一期

铜刀型式包括：B型。

出土铜刀的单位和地点包括：克什克腾旗龙头山M1[15]、克什克腾旗关东车M1[16]。

克什克腾旗龙头山M1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早期单位，年代为西周早期。该墓出土铜刀的柄舌部和刀锋已残，无法确定具体形式，但通过细致观察，基本可以认定是齿柄舌铜刀。

关东车M1所出铜刀背部略厚且起凸棱，较翁牛特旗大泡子铜刀更具有早期的形制特征。所出的空首铜斧形制与克什克腾旗龙头山M6出土铜斧基本相同，这种铜斧的年代大致在商周之际。所以，可以将关东车M1的年代定为西周早期。

综上所述，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

2. 第二期

铜刀型式包括：A型Ⅰ式、B型。

出土铜刀的单位和地点包括：辽宁省建平县水泉M8[17]、水泉城子M7701、M7801[18]、喀左县和尚沟B区M22、D区M7[19]，内蒙古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20]。

建平县水泉几座墓葬中出土的齿柄舌铜刀都比较宽大，刀背上有浅凹槽，是时代较早的特征。与铜刀共出的銎柄式短剑，刃部较直，光素无纹，具有早期形制特征，与

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出土短剑形制相近。据此，本文将这几座墓葬出土铜刀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

关于喀左县和尚沟B、C、D地点的年代，发掘报告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出土陶器的器形较原始，说明时代较早；青铜短剑的形制具有较早的特点，可能稍早于南山根和乌金塘；与属于商末周初的A地点墓的关系密切，提出了曲刃短剑的渊源问题[21]。本文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墓葬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

翁牛特旗大泡子墓葬出土2件铜刀，与之共出的还有2件銎柄式短剑和一些很有特色的陶器。发掘报告认为，墓中随葬的陶器与黑龙江肇源县白金宝遗址出土的陶器相似，其时代亦当相近。该墓中出土的短剑形制也比南山根M101中出土的短剑原始，年代可能早一些。因此，将墓葬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22]。本文认为有道理。

综上所述，第二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

3. 第三期

铜刀型式包括：A型Ⅱ式、C型、D型。

出土铜刀的单位和地点包括：辽宁省喀左县和尚沟D区M12[23]，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961M3[24]、南山根M101[25]、南山根M102[26]、赤峰市夏家店M17[27]、敖汉旗东井[28]、宁城县小黑石沟92～93 NDXAⅡT1213③：2、93 NDXAⅡH62、M8501、85NDXAⅠM2、85NDXAⅠM3、85NDXAⅠM6、92NDXAⅡM5、92NDXBⅡM4、92NDXBⅠM1、93NDXAⅡM19、M9601[29]。

以宁城县南山根M101、M102、小黑石沟M8501为代表的墓葬既出中原式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又出地方特色鲜明的青铜器，其年代被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综上所述，第三期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三）文化归属

以上地点中，除喀左县和尚沟位于十二台营子文化分布区并且是该文化的一处墓地外，其余地点皆位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并且皆属于该文化的遗址或墓地。由此可知，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了齿柄舌铜刀，这类刀在该文化的早中期阶段成为最主要的铜刀类型，并影响到了十二台营子文化。

二、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齿柄舌铜刀

春秋战国之际，北方地区兴起了多支游牧文化。齿柄舌铜刀的发展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际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战国中晚期则走向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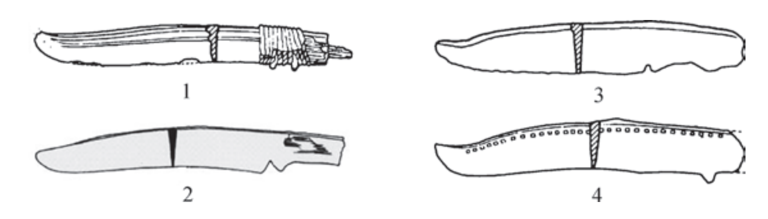
（一）型式划分

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齿柄舌铜刀可以划分为八型，具体如下：

A型　凸背，刀锋微翘。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窄长。标本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M45：53[30]，柄舌部位尚残存木柄，绑缚木柄的绳索保存较好。残长14.4厘米（图八，1）。标本北京市延庆县玉皇庙墓地YYM386：3[31]，刀锋起翘不明显，刀柄一面保留有木柄痕。残长14厘米（图八，2）。

Ⅱ式：刀身短宽。标本黑龙江省讷河市二克浅M63：2[32]，残长9、宽1.5厘米（图八，3）。标本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L：0[33]，刀身沿刀背处饰一条小方格纹（图八，4）。



图八　A型刀

1、2. Ⅰ式（敖汉旗周家地M45：53、延庆县玉皇庙墓地YYM386：3）　3、4. Ⅱ式（讷河市二克浅M63：2、滦平县梨树沟门L：0）

变化规律：刀身由窄长变短宽。

B型　背微凹，翘锋，刀身后部有的有穿孔。

标本敖汉旗大哈巴齐拉M1出土铜刀[34]，刀身窄长，凸刃，翘锋。刀柄为木质，柄首为一铜质羊头，双角外盘成环形，颈部为椭圆形銎，有对称钉孔。刀长16.2、刀首长3.6厘米（图九，1）。标本宁城县孙家沟M7371出土铜刀[35]，长16.1厘米（图九，2）。标本朝阳县木头沟M1：4[36]，刀身与刀柄分界明显，柄舌较短，带有二齿。长13.7、刀身最宽处2.3、背厚0.3厘米（图九，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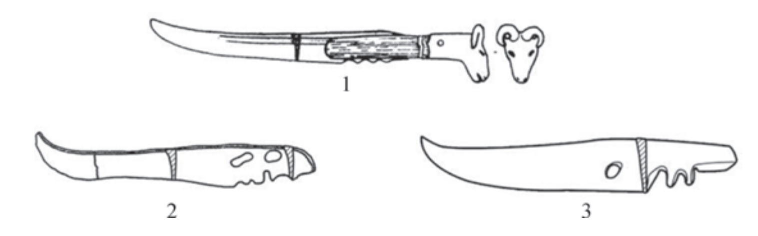
C型　凸背，凹刃。可分二式。

Ⅰ式：刀身窄，柄舌窄于刀身。

标本宣化县小白阳M32：11、M31：6（图一〇，1、3）；标本河北省隆化县骆驼梁M8出土铜刀[37]（图一〇，2）。标本1959年河北省平泉县出土铜刀[38]，长16、宽2.3、柄舌长3.5厘米（图一〇，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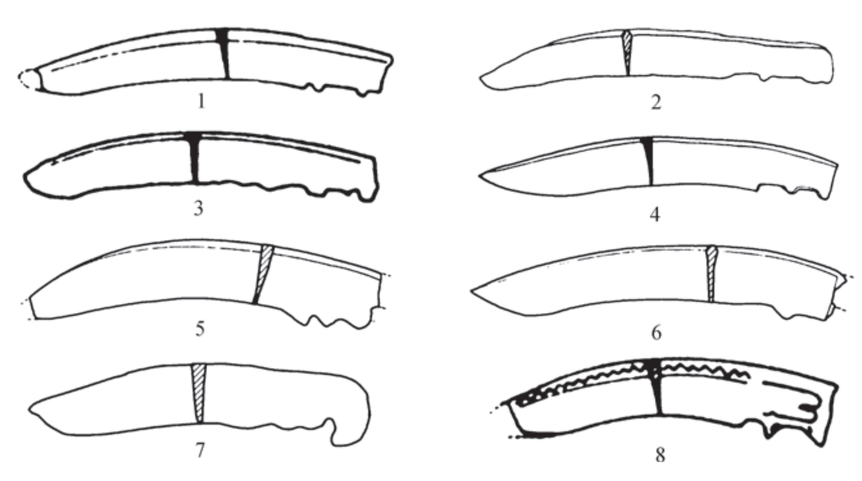
Ⅱ式：刀身宽，柄舌宽于刀身。

标本滦平县梨树沟门L：1830，刀锋稍残，柄舌下缘有2个齿（图一〇，5）。标本滦平县梨树沟门L：1734，柄舌下缘有1个齿（图一〇，6）。标本吉林省吉林市猴石山



图九　B型刀

1.敖汉旗大哈巴齐拉M1出土铜刀　2.宁城县孙家沟M7371出土铜刀　3.朝阳县木头沟M1：4



图一〇　C型刀

1～4.Ⅰ式（宣化县小白阳M32：11、隆化县骆驼梁M8出土铜刀、宣化县小白阳M31：6、平泉县出土铜刀）
5～8.Ⅱ式（滦平县梨树沟门L：1830、滦平县梨树沟门L：1734、吉林市猴石山1975M1：1、宣化县小白阳M1：1）

1975M1：1[39]，柄舌下弧，形成钩状齿（图一〇，7）。标本宣化县小白阳M1：1，刀锋残，刀身沿刀背处饰一条锯齿纹（图一〇，8）。

变化规律：刀身由窄长变短宽。

D型　刀身窄长，背微凹。可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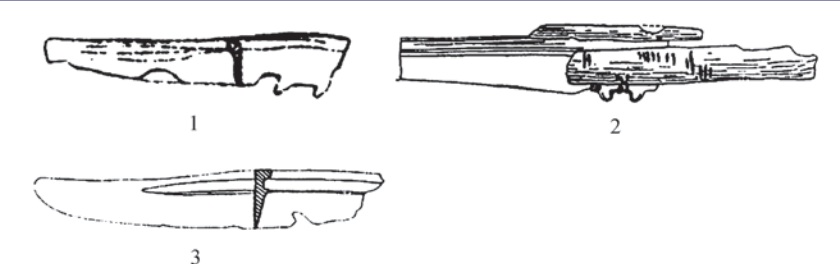
Ⅰ式：刀身短而窄。标本敖汉旗山湾子墓：263[40]，刀背一侧起棱。长9厘米（图一一，1）。标本敖汉旗周家地M2：1[41]，刀身前段残，直背，斜直刃，柄舌部位尚保存较长的木柄（图一一，2）。

Ⅱ式：刀身长而宽。标本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M5：13[42]，刃略凸，刀锋圆钝微翘，柄舌下缘有一凹缺，刀背一侧起棱。长11.17厘米（图一一，3）。

变化规律：刀身由窄向宽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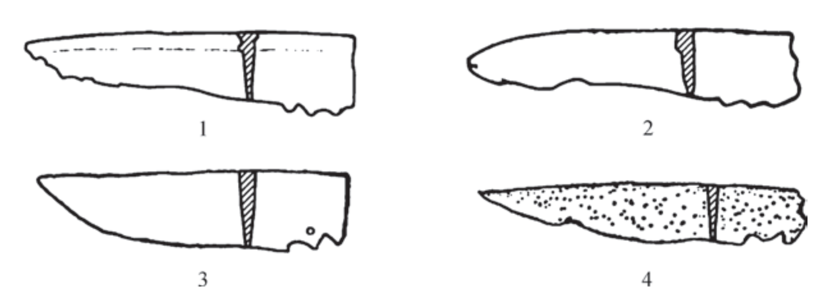
E型　刀身呈三角形，直背，柄舌部位最宽。可分二式。

Ⅰ式：刃平直或略内凹，刀锋圆钝。标本敖汉旗山湾子墓：262[43]，长8.3厘米（图一二，1）。标本敖汉旗山湾子墓：264，长8.8厘米（图一二，2）。



图一一　D型刀

1、2. Ⅰ式（敖汉旗山湾子墓：263、敖汉旗周家地M2：1）　3. Ⅱ式（林西县井沟子M5：13）



图一二　E型刀

1、2. Ⅰ式（敖汉旗山湾子墓：262、敖汉旗山湾子墓：264）　3、4. Ⅱ式（吉林市泡子沿前山M3：2、吉林市猴石山79西M47：4）

Ⅱ式：凸刃，刀锋尖锐。标本吉林市泡子沿前山M3：2[44]，柄舌下缘有二齿和一个小穿孔（图一二，3）。标本吉林市猴石山79西M47：4[45]，长14.2、宽2.3厘米（图一二，4）。

变化规律：刀身变宽大，由直刃变凸刃，刀身一侧由起棱到无棱。

F型　刀身短宽，凸背，凹刃。

标本吉林市狼头山M101：14[46]，长8.4、宽2.4、背厚0.6厘米（图一三，1）。标本吉林市猴石山79西M43：3[47]，长14.3、宽3.1厘米（图一三，2）。

G型　刀身长条形，凸背，凹刃，柄舌较短。

标本吉林市猴石山79M19：3（图一四，1）、标本吉林市猴石山80M4：4[48]（图一四，2）。



图一三　F型刀

1.吉林市狼头山M101：14　2.吉林市猴石山79西M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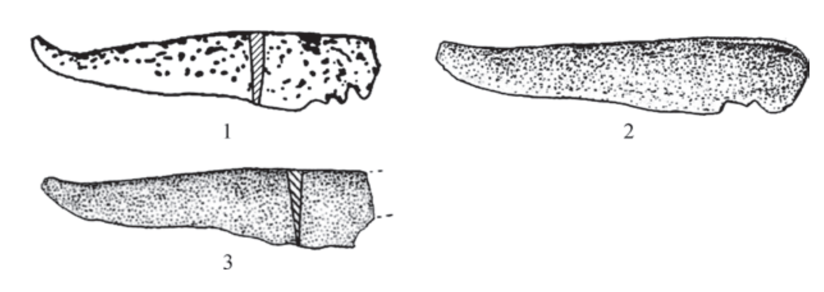


图一四　G型刀

1.吉林市猴石山79M19：3　2.吉林市猴石山80M4：4

H型　刀身呈长三角形，柄舌部宽大，刀锋尖细上翘。

标本吉林市猴石山79西M18：1[49]，背微凸。长9.5、宽2.2厘米（图一五，1）。标本吉林省双辽市后太平M9：4[50]，刀锋残，背微凹。残长7.8、宽1.5厘米（图一五，2）。标本黑龙江省讷河市大古堆M18：3[51]，背微凸，刃略凹，柄舌残断。残长5.5厘米（图一五，3）。



图一五　H型刀

1. 吉林市猴石山79西M18：1　2. 双辽市后太平M9：4　3.讷河市大古堆M18：3

（二）分期研究

可将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铜刀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三期。

1. 第一期

铜刀型式包括：A型Ⅰ式、B型、C型Ⅰ式。

出土铜刀的单位和地点包括：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M45[52]、敖汉旗大哈巴齐拉M1[53]，河北省宣化县小白阳墓地M31、M32、M37[54]、隆化县骆驼梁M8[55]、丰宁县五道沟门WM3[56]，北京市延庆县玉皇庙YYM386[57]。

小白阳、骆驼梁以及玉皇庙墓地的部分墓葬属于玉皇庙文化的早期遗存[58]。目前学术界对该文化年代下限的认识较统一，认为可延续至战国早期。而对其年代上限，尚未有一致意见。林沄将此类遗存划归为长城地带的A区，将其族属认定为被赵国所灭的“代”，并指出A区遗存中有相当多中原式的礼器、车马器和其他日用品，绝大部分都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流行的式样，是其发达繁荣时期[59]。乌恩则认为以上墓地的年代可达春秋早期[60]。本文认为，将上述遗存的年代上限定在春秋中期比较合适。玉皇庙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青铜短剑和铜刀，这两类器物都受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强烈影

响。如齿柄舌铜刀是夏家店上层文化铜刀的代表器物，这类刀在小白阳墓地、骆驼梁墓地也比较流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曲刃短剑在玉皇庙文化中也有发现。另外，玉皇庙文化短剑柄首上流行的卧虎纹、盘蛇纹，以及两兽首相对而成的环首形制，均可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找到母体。总的来说，无论是齿柄舌铜刀，还是短剑，从形制上看都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同类器。朱永刚认为，滦河上游流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以平泉县东南沟石棺墓为代表的遗存属夏家店上层文化。而以隆化县骆驼梁M8、滦平县苘子沟M16、M18为代表的遗存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很大区别，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61]。因此，这类遗存的年代应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春秋早期达到鼎盛，在春秋中期突然衰落。在燕山南麓新形成的玉皇庙文化确定继承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部分因素，随着强大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解体，玉皇庙文化得以兴起和发展则既合逻辑也合实际。

周家地M45的年代属于春秋中期，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大哈巴齐拉M1的墓葬形制、所出器物均与周家地M45相似，年代亦应相近。王立新指出，周家地墓葬的葬俗、随葬器物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已有较大区别，似不宜将其归入夏家店上层文化[62]。周家地墓葬的覆面、用牲习俗与玉皇庙文化很相近，说明二者之间有联系，也是玉皇庙文化上限在春秋中期的一个证据。

综上所述，第一期的年代为春秋中期。

2. 第二期

铜刀型式包括：A型Ⅱ式、B型、C型Ⅱ式、D型、E型Ⅰ式、H型。

出土铜刀的单位和地点包括：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63]、宣化县小白阳墓地M1[64]、隆化县西阿超村西南沟墓群[65]、丰宁土城东沟道下石板墓[66]，辽宁省朝阳县木头沟M1[67]、沈阳市郑家洼子第三地点M6512[68]，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M2[69]、敖汉旗山湾子[70]、宁城县孙家沟M7371[71]、林西县井沟子M5、M23[72]，吉林省吉林市猴石山1975M1[73]、猴石山79西M18[74]、双辽市后太平M9[75]、镇赉县坦途镇北岗子[76]，黑龙江省讷河市二克浅M42、M63[77]、讷河市大古堆墓地M15、M18[78]。

滦平县梨树沟门墓地为玉皇庙文化的晚期遗存，其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之际。郑家洼子共有三个地点，出土器物很有特色，与十二台营子是不同的。综合各方面因素，朱凤瀚将其年代定为春秋晚期[79]，还是比较合适的。林西县井沟子墓葬和敖汉旗铁匠沟墓葬出土遗物有很多相似之处，表明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王立新将二者之年代推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前后[80]，是有道理的。二克浅早期墓葬的年代为春秋至战国早期。

综上所述，第二期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3. 第三期

铜刀型式包括：E型Ⅱ式、F型、G型

出土铜刀的单位和地点包括：吉林省吉林市泡子沿前山M3[81]、吉林市猴石山79西M43、M47[82]、吉林市猴石山79M19、80M4、吉林市狼头山M101[83]、吉林市骚达沟山顶大棺[84]、九台市石砬山[85]、双辽市后太平M30[86]。

以上所列吉长地区的墓葬均属于西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猴石山的^{14}C年代数据为公元前325年[87]，据此可将出土铜刀诸单位的年代定为战国中晚期。

综上所述，第三期铜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

（三）文化归属

以玉皇庙、小白阳、梨树沟门等墓地为代表的是玉皇庙文化遗存，其年代从春秋中期延续至战国早期。周家地、大哈巴齐拉、井沟子一类遗存的年代晚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文化面貌还有待进一步确认。一些埋葬习俗与玉皇庙文化近似，年代当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之际。以猴石山、狼头山、骚达沟山顶大棺等墓葬为代表的是西团山文化遗存，其年代从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晚期。二克浅早期墓葬代表了黑龙江松嫩地区一种新的青铜文化类型，其年代为春秋至战国早期。

三、齿柄舌铜刀的源头与流布

综合本文以上讨论结果，齿柄舌铜刀最早出现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可以观察到清晰、完整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该文化晚期阶段，齿柄舌铜刀获得了极大发展，形式丰富、工艺精致，成为该文化最主要的铜刀类型之一。老哈河流域是此类铜刀的起源和分布中心。

十二台营子文化分布于辽宁西部的大、小凌河流域，位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南部，年代晚于后者。该文化出土的齿柄舌铜刀数量不多，受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影响。

玉皇庙文化和周家地、大哈巴齐拉、井沟子一类遗存兴起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衰落之后，其势力范围亦在曾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内。很自然，其齿柄舌铜刀承袭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齿柄舌铜刀的基因，并成为这两种文化类型铜刀的主要形制之一。

西团山文化齿柄舌铜刀出现较晚，其年代较早的铜刀形式均可在玉皇庙文化和周家地、大哈巴齐拉、井沟子一类遗存中找到母体。很显然，西团山文化齿柄舌铜刀受到了周家地、大哈巴齐拉、井沟子一类遗存的影响，并成为该文化铜刀的最主要类型。战国中晚期之际，当其他地区的铜刀趋于衰落之时，吉长地区的铜刀正处于发展期，成为齿柄舌铜刀分布的中心区。

讷河市二克浅早期墓葬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出土的齿柄舌铜刀形式单一、数量少，分布范围狭小，持续时间短。应该是受到周家地、大哈巴齐拉、井沟子一类遗存和西团山文化的共同影响。

齿柄舌铜刀起源、发展、成熟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并影响到其南部的十二台营子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齿柄舌铜刀发展的一个高峰。夏家店上层文化结束后，齿柄舌铜刀并未消亡，而是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多只考古学文化和更广大的区域内流行。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是齿柄舌铜刀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齿柄舌铜刀仅见于我国东北部地区，起源中心位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并向东西两侧的冀北山地、燕山山脉周围、第二松花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的广大区域扩展，成为该地区青铜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代表器类之一。

注　释

[1] 辽宁省博物馆等.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J］.辽海文物学刊，1986（2）.

[2] 靳枫毅.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J］.考古，1983（8）.

[3] 靳枫毅.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J］.考古，1983（8）.

[4] 辛占山等.喀左和尚沟墓地［J］.辽海文物学刊，1989（2）.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 辛占山等.喀左和尚沟墓地［J］.辽海文物学刊，1989（2）.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J］.考古，1981（4）.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1）.

[9]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西拉木伦河上游考古调查与试掘［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2）.

[10] 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J］.文物，1984（2）.

[11]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J］.考古学报，1973（2）.

[1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14]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J］.北方文物，1993（1）.

[1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J］.考古，1991（8）.

[16]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西拉木伦河上游考古调查与试掘［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2）.

［17］ 辽宁省博物馆等.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J］.辽海文物学刊，1986（2）.

［18］ 靳枫毅.辽宁建平县的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J］.考古，1983（8）.

［19］ 辛占山等.喀左和尚沟墓地［J］.辽海文物学刊，1989（2）.

［20］ 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J］.文物，1984（2）.

［21］ 辛占山等.喀左和尚沟墓地［J］.辽海文物学刊，1989（2）.

［22］ 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J］.文物，1984（2）.

［23］ 辛占山等.喀左和尚沟墓地［J］.辽海文物学刊，1989（2）.

［2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1）.

［25］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2）.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内蒙古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J］.考古，1981（4）.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4（1）.

［28］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J］.北方文物，1993（1）.

［29］ a.项春松.小黑石沟发现的青铜器［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总3）.
b.赤峰市博物馆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J］.文物，1995（5）.
c.《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十五卷・北方民族［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d.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4（5）.

［3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本文引用的玉皇庙墓地出土铜刀标本，如未经特别注明，皆引自此报告，不再另行注释。

［3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考古，2003（2）.

［33］ a.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1994（2）.
b.滦平县博物馆.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5（5）.本文引用的滦平梨树沟门墓地出土的铜刀标本皆出自此报告，不再另行注释。

［34］ 邱国彬.内蒙古敖汉旗大哈巴齐拉墓地调查［J］.北方文物，1996（3）.

［35］ 宁城县文化馆等.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A］.文物资料丛刊・9［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6］ 靳枫毅.朝阳地区发现的剑柄端加重器及其相关遗物［J］.考古，1983（2）.

［37］ 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J］.文物，1984（2）.

［38］　郑绍宗.长城地带发现的北方式青铜刀子及其有关问题［J］.文物春秋，1994（4）.
［39］　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0（2）.
［40］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J］.北方文物，1993（1）.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4（5）.
［4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考古与文物，2004（1）.
［43］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J］.北方文物，1993（1）.
［44］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J］.考古，1985（6）.
［4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J］.考古学报，1993（3）.
［46］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二道水库狼头山石棺墓地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89（4）.
［47］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J］.考古学报，1993（3）.
［48］　刘景文.试论西团山文化中的青铜器［J］.文物，1984（4）.
［4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J］.考古学报，1993（3）.
［50］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双辽市后太平青铜时代墓地［J］.考古，2009（5）.
［5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大古堆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2009（6）.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4（5）.
［53］　邱国彬.内蒙古敖汉旗大哈巴齐拉墓地调查［J］.北方文物，1996（3）.
［54］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等.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J］.文物，1987（5）.
［55］　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J］.文物，1984（2）.
［56］　白光.河北丰宁早期墓葬综述［J］.文物春秋，2008（1）.
［5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58］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9］　林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A］.林沄学术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60］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1］　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向南的分布态势与地域文化变迁［A］.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62］　王立新等.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考古与文物，2004（1）.
［63］　a.承德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墓群清理发掘简报［J］.文物春秋，1994（2）.
b.滦平县博物馆.河北省滦平县梨树沟门山戎墓地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5（5）.
［64］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等.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J］.文物，1987（5）
［65］　王为群.河北隆化县发现的两处山戎墓群［J］.文物春秋，2008（3）.

[66] 丰宁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丰宁土城东沟道下山戎墓[J].文物，1999(11).
[67] 靳枫毅.朝阳地区发现的剑柄端加重器及其相关遗物[J].考古，1983(2).
[68] 沈阳故宫博物馆等.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学报，1975(1).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4(5).
[70]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的青铜器及有关遗物[J].北方文物，1993(1).
[71] 宁城县文化馆等.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的研究[A]，文物资料丛刊·9[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72]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考古与文物，2004(1).
[73] 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0(2).
[7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J].考古学报，1993(3).
[7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双辽市后太平青铜时代墓地[J].考古，2009(5).
[76] 白城地区博物馆等.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青铜时代墓葬清理报告[J].北方文物，1993(1).
[7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考古，2003(2).
[7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讷河大古堆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2009(6).
[79]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80]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2002年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发掘纪要[J].考古与文物，2004(1).
[81]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J].考古，1985(6).
[8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J].考古学报，1993(3).
[83] 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二道水库狼头山石棺墓地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89(4).
[84] 佟柱臣.吉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J].考古通讯，1955(2).
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市骚达沟山顶大棺整理报告[J].考古，1985(10).
[8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九台市石砬山、关马山西团山文化墓地[J].考古，1991(4).
[86]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双辽市后太平青铜时代墓地[J].考古，2009(5).
[87] 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0(2).

A Study of Bronze Knives with Saw-toothed Handles

Lü Xueming

Abstract: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bronze knives with saw-toothed handles date to the Upper Xiajiadian period. These knives exhibit a great deal of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se knives spread west from the Laoha River drainage to northern Hebei and the Yanshan mountains; and east to the Di Er Songhua and Nen rivers. These knives are very typical of Bronze Age culture in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bronze knives; saw-toothed handles;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distribution

鲁东南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文化谱系研究 *

曹　斌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鲁东南地区是指沂山山脉以南，蒙山山脉以东至海的区域[1]。包括沂、沭河中上游流域及东部沿海地区。整个区域北至沂源，南与苏北接壤，西到费县，东达胶南市，均有周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该区域的主要水系为沂水和沭水。目前已发现的居址材料主要有沂源姑子坪[2]、沂南西岳庄[3]、费县防故城[4]等；墓葬有日照崮河崖[5]，沂水县李家坡、东河北村[6]，临沂中洽沟[7]，莒县钱家屯、西大庄[8]，日照陶家村、邱前村、董家、安丘[9]，沂源姑子坪[10]等。

关于鲁东南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目前尚无学者做讨论，相关的研究也很是缺乏，仅有任相宏先生对姑子坪遗址进行的分期、断代和文化因素分析[11]，刘延常先生对莒文化的陶器、铜器进行的型式划分、分期、年代推定、文化因素分析和莒文化特征的归纳[12]，以及禚柏红先生分阶段对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莒文化文化因素的重点分析[13]。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本地区材料的情况，本文放弃据典型遗址分别分期，再进行不同典型遗址间年代对应的理想模式。转而在对典型器类做型式划分时，将居址和墓葬两方面的材料相结合，同时利用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两方面的材料，做综合分析。

一、西周至春秋早期考古遗存的分期

鲁东南地区考古工作开展的较少，且材料零散。资料刊布形式主要为发掘、调查简报，考古报告不见。可提供较好遗迹单位的遗址极少，而能提供地层关系的更是不见。因此，本区域的分期仅能依据器物的形制变化规律以及与其他地区年代明确的器物比较后得出。

1. 典型陶器形制分析

鲁东南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器类相对略少，主要有鬲、簋、豆、盆、罐等。其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代的“东土”研究》（项目批准号13CKG013）阶段成果之一。

中，形制演变轨迹较为清晰，可用于分期排队的器类主要有鬲、簋、豆、盆，我们对其形制分析如下：

鬲

数量较多的一类器物，根据整体形态的不同，分为三型。

A型　绳纹联裆锥足鬲。依据形体、腹部等的差异，分为三个亚型。

Aa型　体形相对较宽扁，腹部较圆鼓，沿下均饰绳纹。依腹部、裆部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卷沿，口沿和腹部夹角相对较大，肩部微鼓，弧腹，腹部较深，裆部较高，所饰绳纹相对较细。标本姑子坪H38：1，夹砂黑陶。方唇，有小的实足尖。口沿下和颈部饰抹绳纹，其余部位饰绳纹。口径16.8、高18.4厘米[14]（图一，1）。

Ⅱ式：卷沿，口沿和腹部夹角略有变小，腹部圆鼓，腹变浅，弧裆变矮，所饰绳

期段＼器物		鬲				
		A			B	C
		Aa	Ab	Ac		
第一期	1	1.Ⅰ	3.Ⅰ		6.Ⅰ	
	2					
第二期	3	2.Ⅱ				
	4		4.Ⅱ	5	7.Ⅱ	8

图一　鲁东南陶鬲分期图

1. 姑子坪H38：1　2. 姑子坪M4：3　3. 揪齐园6　4. 姑子坪M2：6　5. 防故城采：01　6. 揪齐园10　7. 防故城M5：4　8. 姑子坪M2：5

纹较粗。姑子坪M4：3，夹砂褐陶。圆唇，肩部以下饰绳纹。口径12.4、高10.7厘米（图一，2）。

Ab型　体形近方体，腹相对较浅，弧裆较高，足下有小的实足尖，沿下均饰绳纹。依口沿、腹部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腹部圆鼓，弧裆较高，所饰绳纹较细。标本楸齐园6，泥质灰褐陶。尖唇，窄沿。沿下均饰绳纹。口径13.6、高12.8厘米[15]（图一，3）。

Ⅱ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沿变宽，耸肩明显，弧裆略有变低，所饰绳纹有所变粗。标本姑子坪M2：6，夹砂黑陶。方唇，弧形裆内凹。肩部磨光并饰三周旋纹，其下皆为绳纹。器表有烟炱痕。口径17.8、高15.8厘米（图一，4）。

Ac型　体形稍高，呈长方体，肩部微鼓，深腹，弧裆近平，裆极矮，所饰绳纹较粗。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防故城采：01，夹砂灰陶。平折沿，直壁稍内收。口沿下饰绳纹，肩部一周旋纹抹断。口径22.1、高20.3厘米[16]（图一，5）。

B型　绳纹联裆柱足鬲，体形瘦高，高弧裆，柱足较高，沿下均饰绳纹。数量较少，不分式。依口沿、腹部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腹壁微弧，深腹，所饰绳纹相对较细。标本楸齐园10，泥质灰褐陶。方唇，足尖残。器腹的绳纹被两道旋纹抹断。口径12.2、残高12厘米（图一，6）。

Ⅱ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肩部微耸，腹变浅，弧裆微略变高，所饰绳纹变粗。标本防故城M5：4，泥质灰陶。方唇，足尖残。肩部以上部分器表抹光，肩以下饰绳纹。口径14.4、高12.5厘米（图一，7）。

C型　绳纹分裆鬲，卷沿，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腹部微鼓，高分裆，尖锥足，所饰绳纹相对略细。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M2：5，夹砂黑陶。圆唇，宽沿。肩部磨光，肩以下饰绳纹。器表有烟炱痕。口径13.8、高10.7厘米（图一，8）。

簋

折沿，沿面较宽，浅腹，高圈足，素面或圈足仅饰旋纹。数量较少，不分型。依口沿、腹部和圈足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卷沿，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小，腹较浅，圈足较粗，素面。标本姑子坪H38：4，泥质黑陶。圆唇，圜底。器表磨光。口径24.1、高15厘米（图二，1）。

Ⅱ式：折沿，口沿和腹部的夹角变大，腹较浅，圈足明显变高、变细。沿面多有旋纹，圈足多饰旋纹。标本中洽沟采：25，泥质灰陶。尖唇，大喇叭形圈足。沿面饰两道旋纹，圈足饰有旋纹。口径26.5、高21.6厘米[17]（图二，2）。

豆

数量较多的一类器物，依豆盘的差异，分为二型。

A型　弧盘豆。依豆柄的差异，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豆柄相对较粗，豆盘较深，豆柄相对较矮，器表光素。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H38：15，泥质灰陶。方唇，圜底。器表磨光。口径16、高12.7厘米（图二，3）。

Ab型　豆柄较细，豆盘较浅，豆柄较高，器表光素。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M2：10，泥质黑陶。圆唇，喇叭形圈足。器表多施一层黑衣，但多已脱落。口径13.3、高10.5厘米（图二，4）。

B型　折盘豆。据豆柄的差异，分为两个亚型。

Ba型　豆柄相对较粗，盘壁方折，豆盘较深，豆柄相对较低，器表光素。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H38：17，泥质黑陶。圆唇，直口，圜底。豆柄残，器表磨光。口径17.8、残高6.4厘米（图二，5）。

Bb型　豆柄较细，豆盘较大，豆盘壁多饰旋纹，豆柄多有凸棱。据口、盘、豆柄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豆盘较浅，豆柄较高，豆柄多饰凸棱。标本姑子坪M4：2，泥质灰褐陶。圆唇，折壁明显，圜底，喇叭形圈足。豆柄饰一周凸棱。口径16.85、高13.4厘米（图二，6）。

期段＼器物		簋	豆			
			A		B	
			Aa	Ab	Ba	Bb
第一期	1	1. Ⅰ	3		5	
	2					
第二期	3					6. Ⅰ
	4	2. Ⅱ		4		7. Ⅱ

图二　鲁东南陶簋、豆分期图

1. 姑子坪H38：4　2. 中治沟采：25　3. 姑子坪H38：15　4. 姑子坪M2：10　5. 姑子坪H38：17　6. 姑子坪M4：2　7. 防故城M5：1

Ⅱ式：豆盘变浅，豆柄变高，豆柄多饰凸棱。标本防故城M5：1，泥质黄褐陶。尖唇，口微内敛。豆盘和豆柄底各饰三道旋纹，豆柄饰两道凸棱。口径15.8、高13厘米（图二，7）。

盆

数量相对较多，依纹饰的差异，分为二型。

A型　绳纹盆。依腹部和个体的大小，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弧鼓腹盆，体量较大。折沿，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大，腹部圆鼓，腹较深，平底，所饰绳纹较粗。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H38：16，泥质灰陶。尖唇，窄沿。颈部绳纹抹平，腹部饰绳纹。底残。口径28、残高14厘米（图三，1）。

Ab型　斜直腹盆，体量相对较小。腹壁斜直，底中部微内凹，所饰绳纹较细。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H38：2，泥质黑陶。圆唇，口沿外部绳纹抹平，腹、底饰绳纹。口径19.5、高9.5厘米（图三，2）。

B型　旋纹盆。依腹部和个体的大小，分为三个亚型。

Ba型　弧腹盆，体量相对较大。卷沿，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弧腹，平底，腹部饰有旋纹。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M2：12，泥质黄褐陶，局部黑色。圆唇，宽沿。器表凹凸不平，颈部贴附一周泥条凸棱。口径27.5、残高14.3厘米（图三，3）。

<table>
<tr><th colspan="2" rowspan="3">器物
期段</th><th colspan="5">盆</th></tr>
<tr><th colspan="2">A</th><th colspan="3">B</th></tr>
<tr><th>Aa</th><th>Ab</th><th>Ba</th><th>Bb</th><th>Bc</th></tr>
<tr><td rowspan="2">第一期</td><td>1</td><td>1</td><td>2</td><td rowspan="2"></td><td></td><td rowspan="2"></td></tr>
<tr><td>2</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2">第二期</td><td>3</td><td></td><td></td><td rowspan="2">3</td><td rowspan="2">4</td><td rowspan="2">5</td></tr>
<tr><td>4</td><td></td><td></td></tr>
</table>

图三　鲁东南陶盆分期图

1. 姑子坪H38：16　2. 姑子坪H38：2　3. 姑子坪M2：12　4. 中沿沟采：26　5. 防故城采：05

Bb型　折腹深腹盆，体量相对较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折腹，腹较深，平底。沿面和肩部多饰旋纹。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中洽沟采：26，泥质灰陶。圆唇，宽沿。沿面和肩部饰旋纹。口径21.8、高13.2厘米（图三，4）。

Bc型　折腹浅腹盆，体量较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折腹，腹较浅，平底。肩部多饰旋纹。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防故城采：05，泥质褐陶。圆唇，宽沿。肩部饰三周旋纹。口径15.5、高7.3厘米（图三，5）。

2. 典型铜器形制分析

鲁东南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铜器器类较多，主要有鼎、簋、鬲、甗、瑚、盘、匜、盆、壶等。其中，我们选取数量较多，形制演变轨迹较为清晰，可用于分期排队的十二类铜器，对其进行形制分析。

鼎

数量较多的一类铜器，据整体形态的差异，分为四型。

A型　圆鼎。圆腹，立耳，三蹄形足。依腹部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圆腹，腹较浅，圜底，三蹄形足较矮，口沿下多饰一周重环纹或窃曲纹。标本西大庄M1：1。方唇，折沿近平，三半环形蹄足。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一足残。口径26.4、通高23.8厘米[18]（图四，1）。

Ⅱ式：圆腹，腹变浅，圜底，三蹄形足较矮，口沿下多饰一周重环纹或窃曲纹。标本西大庄M1：2。方唇，折沿近平，三半环形蹄足。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一足残。口径24.6、通高21厘米（图四，2）。

B型　方鼎。附耳，浅腹，腹部呈长方体，四蹄形足，纹饰繁缛，多饰窃曲纹等。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崮河崖M2：2。方唇，平沿，四半圆形蹄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龙纹，足上部饰饕餮纹。器底四边留有明显的铸缝。口长22.7、口宽17、通高23.5厘米[19]（图四，3）。

C型　盆形鼎。立耳、盆形腹、马蹄形足，依腹部、足部等的变化，可分为四式。

Ⅰ式：腹相对较深，半圆形实足。纹饰多见于口沿下部，窃取纹、重环纹多见。标本崮河崖M1：5。方唇，平折沿。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垂鳞纹纹。口径17、通高15.5厘米（图四，4）。

Ⅱ式：腹相对较深，蹄足变细。纹饰多见于口沿下部和腹部，窃取纹、重环纹、垂鳞纹多见。标本邱前村鼎。方唇，平折沿。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垂鳞纹纹。口径24.8、通高24.4厘米[20]（图四，5）。

Ⅲ式：腹明显变浅，半环形足，蹄足变高。口沿下多见带状纹饰，窃曲纹多见。标本姑子坪M1：2。方唇，折沿近平。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足上部饰简化兽面纹。口径25.2、通高26.2厘米（图四，6）。

Ⅳ式：腹更浅，立耳微略外撇，半环形足，蹄足更细。口沿下多见带状纹饰，窃

期段＼器物		铜鼎			
		A	B	C	D
第一期	1		3	4. I	8. I
	2	1. I		5. II	
第二期	3	2. II		6. III	9. II
	4			7. IV	

图四　鲁东南铜鼎分期图

1. 西大庄M1：1　2. 西大庄M1：2　3. 凿河崖M2：2　4. 凿河崖M1：5　5. 邱前村鼎　6. 姑子坪M1：2　7. 中洽沟M1：1　8. 凿河崖M1：3　9. 陶家村鼎

曲纹多见。标本中洽沟M1：1。方唇，平折沿。口沿下饰窃曲纹，其下有一道弦纹。腹底有烟炱痕。口径34、通高31厘米（图四，7）。

D型　附耳圆鼎。附耳，圆腹，腹较浅，三蹄形足。依腹部、足部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腹较浅，三半圆形实足。上腹多见带状纹饰，窃曲纹多见。标本凿河崖M1：3。方唇，平折沿，有盖。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有一道弦纹。附耳饰重环纹，盖

饰重环纹和窃曲纹，足根饰饕餮纹。口径29、通高27厘米（图四，8）。

Ⅱ式：腹较浅，立耳微略外撇，三蹄形足明显变矮。纹饰简化，口沿下多见弦纹。标本陶家村鼎。方唇，平折沿。口沿下饰两道弦纹，器底有烟熏痕迹。口径29.2、通高32.8厘米[21]（图四，9）。

簋

数量较少，均为圈三足簋，圆腹，有盖，其上为圆形捉手，双兽首形耳，圈足下有三足。多通体饰有纹饰。依腹部、足部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腹部圆鼓，耳下均有小的附珥，三足较高，多见窃曲纹、瓦纹。标本姑子坪M1：6。子母口，半环形足。盖和沿下饰窃曲纹，盖顶和器腹饰瓦纹，圈足饰垂鳞纹。口径20.3、通高27.3厘米（图五，1）。

Ⅱ式：腹部倾垂，整体更胖，三足变矮且明显简化，多见窃曲纹、瓦纹。标本西大庄M1：6。子母口，三足简化为条状。盖和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瓦纹，圈足饰垂鳞纹。口径14.8、通高17.8厘米（图五，2）。

鬲

较常见，据腹部、足部的差异和扉棱的有无，分为二型。

A型　带扉棱鬲。腹部微鼓且有三道高扉棱，弧裆近平，三柱状足较高，腹部多饰窃曲纹、波曲纹和重环纹。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崮河崖M1：7。卷沿，方唇，有盖，三半圆形足。口沿下饰重环纹，腹部饰波曲纹。口径16、通高19.5厘米（图五，3）。

B型　耸肩空锥足鬲。耸肩明显，弧裆较高，三足近锥状，口沿下多见带状纹饰。依口沿、腹部、裆部和足部等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大，肩部微耸，弧裆较高，口沿多饰重环纹、窃曲纹。标本董家滩鬲。圆唇，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口径17.8、通高18厘米[22]（图五，4）。

Ⅱ式：折沿，口沿和腹部夹角变小，耸肩明显，裆部变高，尖锥足明显细高，口沿下多饰窃曲纹。标本中洽沟M1：5。圆唇，肩饰一周夔龙纹。口径16、通高15.4厘米（图五，5）。

甗

均为分体圆甗，甑部、鬲部均为圆腹，甑部立耳，鬲部附耳，弧裆近平，三蹄形足较高，腰部有圆形箅。纹饰简单，多见弦纹。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西大庄M1：5。方唇，鬲部附耳与口沿有短柱相连。甑部口沿下饰两道弦纹。鬲部口沿有铭“齐侯作宝……子子孙孙永宝用”。口径36.06、通高56.1厘米（图五，7）。

瑚

器、盖为上下相同的两部分，平口对合，均呈折角梯形，各有两半环形兽首形耳，器体较宽扁，窄唇，腹较深，折角明显，圈足有缺口，通体有纹饰且较繁缛。数量

期段 \ 器物		铜簋	铜鬲		铜瑚
			A	B	
第一期	1		3		
	2	1. Ⅰ			6
第二期	3	2. Ⅱ		4. Ⅰ	甗
					7
	4			5. Ⅱ	

图五　鲁东南铜簋、鬲、甗、瑚分期图

1. 姑子坪M1：6　2. 西大庄M1：6　3. 崮河崖M1：7　4. 董家滩鬲　5. 中洽沟M1：5　6. 姑子坪M1：8　7. 西大庄M1：5

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M1：8。口沿饰变体夔龙纹，盖、腹部饰窃曲纹，圈足饰重环纹。口长18.5、宽15.5、通高45.3厘米（图五，6）。

盘

数量相对较少，根据足部的差异，分为二型。

A型　圈足盘，弧盘下有圈足，圈足下一般有小台，盘外壁和圈足多有纹饰。依整体形态的变化，可分为二式。

Ⅰ式：平沿，沿较窄，立耳，盘腹较浅，圈足较矮，纹饰多见重环纹。标本西大

庄M1∶13。方唇，平底，圈足下小台较低。盘外壁饰重环纹和圈足饰垂鳞纹。口径33.3、通高12.6厘米（图六，1）。

Ⅱ式：平沿，沿较窄，附耳，耳与盘相接处在盘壁底部，盘微略变深，圈足变高，纹饰多见重环纹、夔龙纹。标本中洽沟M1∶6。方唇，底近平，圈足下小台较高。盘外壁饰夔龙纹，盘内壁饰云雷纹一周，内底部饰蟠龙纹。口径36、通高14.8厘米（图六，2）。

B型　圈三足盘，圈足下为三人形足，窄沿，附耳，纹饰较繁缛。数量极少，不分式。标本姑子坪M1∶13。方唇，平折沿。盘外侧附两龙，三足为裸人形。腹部和圈足均饰窃曲纹，双耳饰重环纹。口径40、通高19厘米（图六，3）。

匜

数量相对较少，根据流部、腹部等的差异，分为二型。

A型　瓢状体匜，有流，带鋬，器身呈瓢状，四人形或蹄形足，腹部一般均有纹饰。依流、足部等的变化，分为二式。

Ⅰ式：流相对较窄较长，流略上翘，半环形鋬，人形或蹄形足，腹部多饰重环纹、窃曲纹和瓦纹。标本西大庄M1∶12。兽首鋬，四人形足。腹上部饰重环纹。长32.4、通高14.6厘米（图六，4）。

期段＼器物		铜盘		铜匜	
		A	B	A	B
第一期	1				
	2	1. Ⅰ		4. Ⅰ	
第二期	3		3	5. Ⅱ	
	4	2. Ⅱ			6

图六　鲁东南铜盘、匜分期图

1. 西大庄M1∶13　2. 中洽沟M1∶6　3. 姑子坪M1∶13　4. 西大庄M1∶12　5. 董家滩匜　6. 中洽沟M1∶7

Ⅱ式：流略变宽变短，半环形鋬，足明显简化，腹部多饰重环纹和瓦纹。标本董家滩匜。兽首鋬，四简化兽形足。腹上部饰重环纹，下部饰瓦纹。长14、通高15.6厘米（图二六，5）。

B型　鼎形匜，器体呈鼎形，半圆形耳，管状流，圆腹，圜底，三蹄形足较高。腹部多饰窃曲纹。标本中洽沟M1：7。兽首鋬，兽头流，有盖。腹部饰夔龙纹。长31.5、口径23.6、通高21.6厘米（图六，6）。

3. 分期和文化特征

鲁东南地区是整个山东范围内发现遗址较少的地区，同时由于遗址相对零散，且时代都集中在某一个时段，缺乏长时段连续发展的典型遗址，因此缺乏可依据的地层关系。我们主要依据典型器类的形制分析以及器类、陶器、纹饰、器物组合等的变化，对鲁东南地区进行分期研究。通过分析，我们将其分为二期4段，现将分期理由和各期文化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期，本期发掘的材料较少，居址、墓葬均有。墓葬主要为崮河崖、邱前村，居址主要为姑子坪、揪齐园等。本期包括1、2段，从个别器物的形制演变上可以看出两段之间的变化，但其他方面的变化并不明显，而1、2段和3、4段之间各方面的差别却相对明显，因此，我们将1、2段归为第一期。对于其具体特征归纳如下：

本期陶器的种类不多，主要有鬲、簋、豆、罐、绳纹盆、瓮等，而同类器的形体也不复杂。主要包括的典型陶器器型有：AaⅠ、AbⅠ、BⅠ鬲，Aa、Ba型豆，Aa、Ab型盆；铜器基本为食器和水器，主要器类有鼎、簋、鬲、甗、瑚、盘、匜、壶、盆等，典型铜器器型有AⅠ、B型、CⅠ、CⅡ、DⅠ鼎，Ⅰ式簋、A型鬲、AⅠ盘、AⅠ匜和瑚。其中，Ba型陶豆仅见于本期，Aa陶豆、Aa和Ab型陶盆、B型铜鼎、A型铜鬲仅见于第1段，铜瑚仅见于第2段。由于材料很少，仅能从目前已知材料判断陶簋、Aa和Ba型陶豆、Aa和Ab型陶盆多见于遗址，其余器型居址、墓葬均有发现。

在器物形态上，本期陶鬲体型较显矮胖，折沿多见，口沿和腹部夹角较小，裆部较低。陶簋腹很浅，柄较细较高，有点接近豆形。陶豆豆盘普遍较浅，陶盆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小。铜鼎主要为盆形鼎，器腹呈盆形，足为蹄形足。也有个别圆鼎和方鼎的存在。铜簋只见圈三足簋，足较高。铜鬲联裆，蹄形足且较高，腹上有高扉棱。铜瑚相对略显瘦高，器、盖明显有唇。铜盘的腹变浅。铜匜腹较浅，流较长，足为人形或兽蹄形。1、2段之间的变化比较细微，仅能从铜鼎、铜簋等个别器物看出，但是1、2段和3、4段之间的变化却比较明显，因此，将1、2段归为第一期比较合适。

纹饰方面陶器上绳纹占绝大多数，旋纹和素面器占一定数量。多数陶器上的绳纹都相对较细。铜器纹饰多为重环纹、窃曲纹、波曲纹和瓦纹，此外还有弦纹等，2段还常见垂鳞纹。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鬲中夹砂陶占绝大多数，其他的泥质陶较多。陶

色方面灰陶、黑陶、灰褐陶各占一定比例，其他相对较少。一般遗址主要为姑子坪和揪齐园遗址，崮河崖墓葬等级相对较高。器物组合方面，等级较高的墓铜器组合为鼎、鬲、盘、匜、壶、盆，等级略低的墓只出鼎、壶。

第二期，本期材料多于第一期，发掘的主要为墓葬，居址多为调查材料。墓葬主要为姑子坪、西大庄、防故城、中洽沟和陶前村，调查材料主要为中洽沟和防故城的。本期包括3、4段，从个别器物的形制演变上可以看出两段之间的变化，但其他方面的变化并不明显，而1、2段和3、4段之间各方面的差别却相对明显，从整体上可以看出3、4段与1、2段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将3、4段归为第二期。对于其具体特征归纳如下。

本期陶器的器类与上期比较接近，形体略较上期复杂。主要包括的典型陶器有：AaⅡ、AbⅡ、Ac型、BⅡ、C型鬲，Ab型、BbⅡ豆，Ba、Bb和Bc型盆，Ⅱ式簋；铜器器类与上期也比较接近，主要是食器类的鼎、簋、鬲和水器类的盘、匜、壶等。典型铜器器型有AⅡ、CⅢ、CⅣ、DⅡ鼎， BⅠ、BⅡ鬲，AⅡ、B型盘，AⅡ、B型匜，Ⅱ式簋和甗。其中，C型陶鬲、B型陶盆和铜甗仅见于本期，A型铜盘仅见于第3段，Ac型陶鬲、Ab型陶豆、B型铜匜仅见于第4段。Bb型陶豆和B型铜鬲开始出现。由于材料较少，仅能从目前已知材料判断Ac型陶鬲、陶簋、Bb和Bc型陶簋多见于居址，其余器型多见于墓葬。

在器物形态上，本期陶鬲最大的特点是相当一部分耸肩明显，体型向瘦高和矮胖两个方向发展。陶簋的柄更高，腹更浅。陶豆豆柄变高，多数盘变浅，有的柄上有一周凸棱。陶腹变浅，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较小。铜鼎腹明显变浅，足有变细、变高的趋势。铜簋更显瘦高，足开始简化。铜鬲裆部更高，足更高、更尖。铜甗只见分体甗，足较细高。铜盘的附耳更接近圈足，铜匜四兽形足明显简化。从以上特征看，虽然继承一些上期的特点（特别是铜器），但是整体上还是有变化的。因此，可将3、4段归为第二期。

纹饰上陶器绳纹和旋纹仍较多，其他还有素面等。多数陶器上的绳纹都有不同程度的变粗。铜器纹饰与上期较为接近，重环纹、窃曲纹、波曲纹、瓦纹大量流行，此外还常见一类夔龙纹。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鬲基本为加砂陶，簋、豆、盆基本为泥质陶。陶色多见灰陶、黑陶和褐陶（包括黄褐、灰褐、红褐陶），由于本期遗址材料较少，且缺乏对陶质、陶色、纹饰和器形的统计数据，因此缺乏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比对。一般墓葬主要发现于姑子坪、西大庄、防故城、中洽沟、陶家村等，有的墓等级较高。器物组合方面，陶器鬲、豆、罐的组合较常见，一些还有盆等。铜器是鼎、簋、盘、匜的组合，有的还配有鬲、甗、瑚、壶等。从陶系、纹饰和组合方面，也可看出本期与第一期的一些差别。以上是鲁东南地区各期文化特征的简单概括，由于本地区材料较少且缺乏相关单位的统计数据，因此只能从已有材料大致看出，陶器上夹砂陶的主要为陶鬲，泥质陶主要为簋、盆。陶色上灰陶、黑陶和褐陶均占一定比例。纹饰上绳纹仍最常见，另外旋纹、素面都占一定数量。器类上两期较为接近，第二期略多。器型演变上，鬲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越来越小，器体向矮胖和瘦高两个方向发展，肩部在第二期明

显耸出。簋腹略变浅，柄部明显变高。豆盘大体上有变浅趋势，豆柄逐渐增高，第二期豆柄上还常见一道凸棱。盆的腹略有变浅，口沿和腹部的夹角越来越小。墓葬组合第二期多见鬲、豆、罐的组合。铜器纹饰多见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瓦纹和弦纹等，两期差别不大。器类差别亦较小。器型演变上，鼎腹逐渐变浅，足有变细、变高的趋势。簋均为圈三足，器体逐渐瘦高，足有简化趋势。甗为分体，足较细高。鬲均为联裆，且裆部、足越来越高，肩部逐渐耸出。盘的附耳较接近圈足，匜的人兽形四足逐渐简化。等级较高的墓葬组合以食器的鼎、簋配水器盘、匜的组合最为常见。

因此，根据各类器物的形制演变规律，并结合陶质、陶色、纹饰和组合的变化，可将鲁东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二期4段。从以上分析看，期与期之间的变化较为明显的。而关于各类器物型式的变化，详细统计在上表（表一）。

二、西周至春秋早期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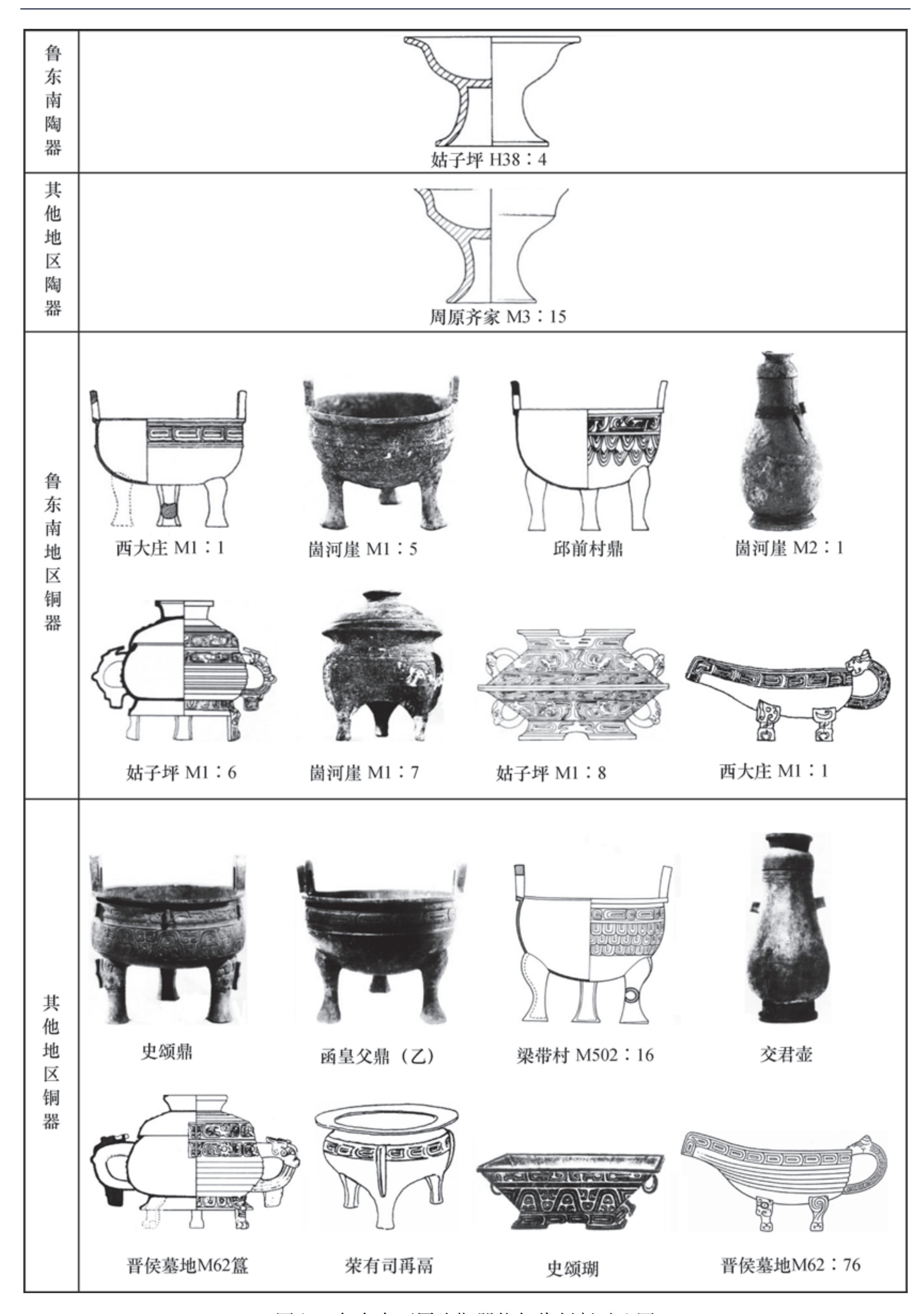
关于鲁东南地区各期的年代，主要依据典型单位以及与其他地区年代明确的陶器、青铜器对比来确定。

第一期，本期的典型单位有姑子坪H38、崮河崖M1和M2等。陶器中，AaⅠ鬲和张家坡西周晚期M269∶1鬲形制较为类似，而从裆部较高等特征判断，可能略早于后者，时代当在西周晚期偏早或略早。Ⅰ式陶簋与周原齐家西周晚期偏早M3∶15簋形制接近，时代当与之相差不远。铜器中，AⅠ鼎与西周晚期的史颂鼎形制较为接近，惟器底微圜的特征与后者的平底特征稍有差别。CⅠ鼎与西周晚期偏早的函皇父鼎（乙）形制、纹饰接近，CⅡ鼎与梁带村西周晚期偏晚的M502∶16鼎形制、纹饰接近。方鼎的时代一般认为不晚于西周中期，但是崮河崖M2所出B型方鼎沿下饰有一周窃曲纹，纹饰特征不早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而该墓同出的一件贯耳铜壶（M2∶1）盖、圈足均饰重环纹，器型、纹饰也与《商周彝器通考》收录的交君壶接近，后者容庚[23]、朱凤瀚[24]均定在了西周晚期。因此，这件贯耳壶和B型方鼎的时代可能晚至西周晚期偏早，崮河崖M2的时代也当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Ⅰ式簋与晋侯墓地M62所出西周晚期偏晚的窃曲纹铜簋形制、纹饰近同，A型鬲与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的西周晚期偏早荣有司爯鬲形制接近，铜瑚与西周晚期偏晚的史颂瑚形制接近。AⅠ盘与宣王时期的寰盘形制、纹饰接近，惟耳部特征不同，该盘也是已知较晚的一件立耳盘。而AⅠ匜则与晋侯墓地西周晚期偏晚的M62∶76匜形制、纹饰近同（图七）。综上所述，本期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其中，本期可从姑子坪H38所出Ⅰ式陶簋以及崮河崖M1、M2所出B型、CⅠ铜鼎和A型铜鬲等具有西周晚期偏早特征的器物看出1、2段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1、2段的年代可能分属西周晚期偏早和西周晚期偏晚两个阶段。由于材料相对较少，也不排除崮河崖M2早到西周中期偏晚的可能性。

第二期，本期的典型单位有姑子坪M1、M2和M4、西大庄M1、中洽沟M1和防故城

表一　鲁东南陶器、铜器型式统计表

<table>
<tr><th colspan="2" rowspan="3">器物
期段</th><th colspan="14">陶器</th><th colspan="13">铜器</th></tr>
<tr><th colspan="5">鬲</th><th rowspan="3">簋</th><th colspan="4">豆</th><th colspan="5">盆</th><th colspan="4">鼎</th><th rowspan="3">簋</th><th colspan="2">鬲</th><th rowspan="3">瑚</th><th rowspan="3">甗</th><th colspan="2">盘</th><th colspan="2">匜</th></tr>
<tr><th colspan="3">A</th><th rowspan="2">B</th><th rowspan="2">C</th><th colspan="2">A</th><th colspan="2">B</th><th colspan="2">A</th><th colspan="3">B</th><th rowspan="2">A</th><th rowspan="2">B</th><th rowspan="2">C</th><th rowspan="2">D</th><th rowspan="2">A</th><th rowspan="2">B</th><th rowspan="2">A</th><th rowspan="2">B</th><th rowspan="2">A</th><th rowspan="2">B</th></tr>
<tr><th colspan="2"></th><th>Aa</th><th>Ab</th><th>Ac</th><th>Aa</th><th>Ab</th><th>Ba</th><th>Bb</th><th>Aa</th><th>Ab</th><th>Ba</th><th>Bb</th><th>Bc</th></tr>
<tr><td rowspan="2">第一期</td><td>1</td><td rowspan="2">Ⅰ</td><td rowspan="2">Ⅰ</td><td></td><td>Ⅰ</td><td></td><td>Ⅰ</td><td>√</td><td></td><td rowspan="2">√</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Ⅰ</td><td>Ⅰ</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2</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Ⅰ</td><td></td><td>Ⅱ</td><td></td><td>Ⅰ</td><td></td><td></td><td>√</td><td></td><td>Ⅰ</td><td></td><td>Ⅰ</td><td></td></tr>
<tr><td rowspan="2">第二期</td><td>3</td><td>Ⅱ</td><td></td><td></td><td></td><td rowspan="2">√</td><td></td><td></td><td></td><td></td><td>Ⅰ</td><td></td><td></td><td rowspan="2">√</td><td rowspan="2">√</td><td rowspan="2">√</td><td>Ⅱ</td><td></td><td>Ⅲ</td><td>Ⅱ</td><td>Ⅱ</td><td></td><td>Ⅰ</td><td></td><td rowspan="2">√</td><td rowspan="2">Ⅱ</td><td>√</td><td>Ⅱ</td><td></td></tr>
<tr><td>4</td><td></td><td>Ⅱ</td><td>√</td><td>Ⅱ</td><td>Ⅱ</td><td></td><td>√</td><td></td><td>Ⅱ</td><td></td><td></td><td></td><td></td><td>Ⅳ</td><td></td><td></td><td></td><td>Ⅱ</td><td></td><td></td><td></td><td>√</td></tr>
</table>



图七　鲁东南西周晚期器物年代判断对比图

M5等。陶器中，AaⅡ陶鬲与曲村春秋早期M5209：1鬲腹部、裆部特征接近，惟口沿有所差别，时代当较为接近。AbⅡ鬲与曲村ⅢM3006：1鬲形制较为类似，均耸肩明显，其可能已晚至春秋早期偏晚阶段。Ab型豆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偏早M1724：5豆相比，豆盘更浅，豆柄更加细高，可能已晚至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而BbⅠ豆与曲村春秋早期偏早ⅢT335③A：23豆较为接近。Bb型盆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M1826：1盆形制接近，Bc型盆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M1805：3盆形制接近，唯无盖与之区别。铜器中，CⅢ鼎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偏早的M1602：148鼎形制、纹饰近同，CⅣ鼎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偏晚的M1744：2鼎形制、纹饰接近，DⅡ鼎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偏早M2012：20鼎形制较为接近。Ⅱ式簋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M1706：99簋形制、纹饰接近。BⅠ铜鬲除腹部无扉棱外，器型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偏早M1602：151鬲有类似之处。Ⅱ式盘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M1761：2盘形制接近，AⅡ匜与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偏早M1602：150形制近同（图八）。综上所述，本期的年代已进入春秋，大致相当于春秋早期。其中，3段的姑子坪M1和M4、西大庄M1所出AaⅡ陶鬲、BbⅠ陶豆、CⅢ铜鼎、Ⅱ式铜簋、AⅡ铜匜等器型具有春秋早期偏早阶段的特征，而4段的姑子坪M2、中洽沟M1、防故城M5等单位所出AbⅡ陶鬲、BbⅡ陶豆、CⅣ铜鼎等器型具有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特征。因此，从这些典型单位所出器物上可以看出早、晚的一些差别，所以3、4段的年代可能分属春秋早期偏早和春秋早期偏晚阶段。

三、西周至春秋早期考古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对鲁东南西周至春秋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时期各地区的铜器共性较多，地域特征不甚明显，因此本部分的讨论将以陶器材料为主，铜器仅涉及个别地域特征明显的器形。

1. 鲁东南的诸类文化因素和性质

关于鲁东南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本文在与同时期相关考古学文化进行比对后，主要分为五类因素，并分别分析其文化性质。

（1）A类因素

1）主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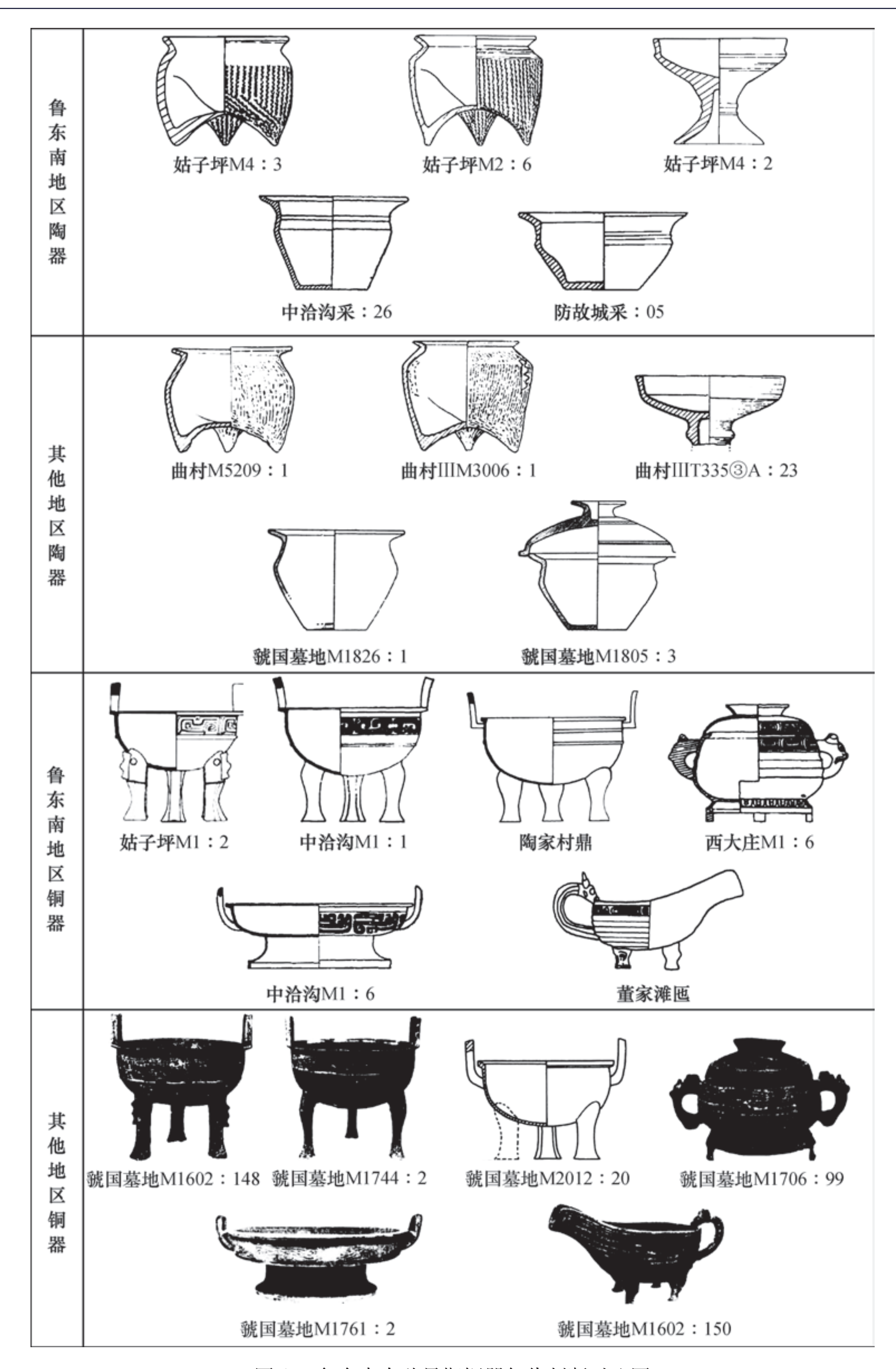
主要包括的陶器器型有Aa型鬲、Ab型鬲、簋、Aa型豆、B型豆、Aa型盆、Bb型盆、Bc型盆、敞口罐等。夹砂和泥质陶均有，陶色主要为灰陶和黑陶。

Aa型陶鬲，卷沿或折沿，弧腹，联裆，锥状足。口沿下饰绳纹。

Ab型陶鬲，折沿，沿相对较窄，弧裆相对较高，锥状足。口沿下饰绳纹。

陶簋，折沿近平，浅腹，高圈足。素面或饰简单的旋纹。

Aa型陶豆，弧盘，圈足相对较粗。素面或饰简单的旋纹。



图八　鲁东南春秋早期铜器年代判断对比图

Ba型陶豆，折盘，豆柄残缺。口下饰简单的旋纹。

Bb型陶豆，折盘，圈足较细、较高，圈足多有一道凸棱。豆盘外壁饰有简单的旋纹。

Aa型陶盆，折沿，弧腹下收，底多残。口沿下饰绳纹。

Bb型陶盆，折沿，口沿微内凹，折腹，平底。肩部饰有旋纹。

Bc型陶盆，折沿，折腹，腹较浅，平底。肩部饰旋纹。

敞口陶罐，多为卷沿，大敞口，多为圆肩，有的肩部微折，平底或底略内凹。纹饰分旋纹和绳纹两种，旋纹多见于颈部和肩部。绳纹多见于下腹部，有的其间还饰有旋纹。

2）文化性质

A类因素的主要陶器器类有鬲、簋、豆、盆、罐等。从器形分析，Ab型鬲、Aa型盆口沿部分与我们常见的周文化的类似器形可能略有差别，但鬲联裆、盆弧腹等形制均与同时期的周文化器形近同。而其他器形都是关中地区先周至西周常见的器形，相关问题在前文都已详述，此处不再敷言。总之，以上器形都是周文化的产物。

因此，A类因素当为周文化因素。

（2）B类因素

1）主要特征

主要包括的铜器器型有B型鬲。

B型铜鬲，折沿，肩部微耸，弧裆较高。肩部饰重环纹。

2）文化性质

B类因素的器类仅铜鬲一种。此类铜鬲肩部明显耸出，弧裆较高。此类鬲无论是陶器抑或铜器，都最早见于淮河流域，在鲁东南直到春秋初期才出现，至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才开始较多的出现，因此其是鲁东南地区陶鬲受淮夷文化影响的产物。

因此，B类因素为淮夷文化因素。

（3）C类因素

1）主要特征

主要包括的陶器器型有B型鬲、Ab型盆、Ba型盆、侈口折肩罐、双耳罐、球腹罐等。夹砂和泥质陶均有，陶色主要为灰陶和黑陶。铜器器型有B型盘。

B型陶鬲，折沿，腹部微弧，弧裆相对较高，柱状足。口沿下饰绳纹，腹部绳纹有被抹断痕。

Ab型陶盆，尖唇，侈口，斜直腹，平底或底部微凹。口沿下饰绳纹。

Ba型陶盆，折沿，弧腹下收，平底，体形相对较小。上腹有一道凸棱。素面。

侈口折肩陶罐，折沿，折腹，腹较深，平底。上腹饰竖绳纹，下腹饰横绳纹。

双耳陶罐，口微侈，折肩，肩部有双耳，平底或底部微圜。肩部以下饰绳纹。

球腹陶罐，折沿，球腹，小平底或圜底。口沿下饰绳纹。

B型铜盘，平沿，弧盘，圈足下为三裸人形足。盘壁有二附耳，其上各附一卧兽，盘壁其余两侧各有一卷尾龙。腹部和圈足均饰窃曲纹，双耳饰重环纹。

2）文化性质

C类因素的主要陶器器类有鬲、盆、罐等。B型鬲体形瘦高，整体造型在其他地区罕见。Ba型盆呈钵形，体形相对较小，此类器型基本只见于山东的鲁北和鲁东南地区。Ab型盆的上腹附加一周泥条，形成一道凸棱，从而具有了一些自身特色。侈口折肩罐和双耳罐都基本不见于其他地区，它们都应是本地文化的产物。球腹罐仅在西周晚期发现于山东的鲁北、鲁东南和胶东半岛地区，其他地区罕见。铜器方面，B型盘在双耳上附加卧兽以及在其余两侧附加卷尾龙的造型少见于其他地区，这样的装饰形成了自身特色。

因此，C类因素当为本地文化因素。

（4）D类因素

1）主要特征

主要包括的陶器器型仅C型鬲一种，为夹砂黑陶。

C型陶鬲，卷沿，腹部微弧，分裆，锥状足。下腹饰绳纹。

2）文化性质

D类因素的陶器器类仅鬲一种。此类鬲的整体造型与周式陶鬲近同，但是分裆的特征应是在周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分裆特点，从而形成了一种混合型文化特征。因此，D类因素应为混合型文化因素。

2. 鲁东南各类因素的比较

由于鲁东南地区已知的西周时期仅有西周晚段的材料，而春秋初年的文化面貌又和西周晚期很接近，因此不再分阶段，以鲁东南地区第1至3段的材料为主，对比各类文化因素。

本阶段包括的文化因素有A类周文化因素、B类淮夷文化因素、C类本地文化因素、D类混合型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复杂程度一般，每类因素包括的器类和器形都不多。本阶段的材料居址和墓葬均有，还有一部分调查材料。从陶器的器类和器型上分析，A类周文化因素包括的器类主要有鬲、簋、豆、盆、罐，器型有Aa型鬲、Ab型鬲、簋、Aa型豆、B型豆、Aa型盆、Bb型盆、Bc型盆、敞口罐；B类淮夷文化因素陶器缺乏时代清楚的器形，铜器只有B型铜鬲一种；C类本地文化因素包括的器类主要有鬲、盆、罐，器型有B型鬲、Ab型盆、Ba型盆、侈口折肩罐、双耳罐；D类混合型文化因素器类只有鬲，器型仅C型鬲一种（图九）。A类因素器类有5类，器型大致有10种；B类因素无时代清楚地陶器发现，铜器的器类和器型也仅为一种；C类因素器类有3类，器型大致有6种；D类因素器类和器型都仅有1种。从中可知，周文化因素的主要器类都有发现，但器型并不复杂。本地文化因素的器类和器型大致只有周文化因素的一半，混



图九　鲁东南文化因素对比图

合型文化因素和淮夷文化因素的器类和器型都仅有一种，商文化因素消失。由于鲁东南地区材料较少，且很零散，各遗址均无具体统计数据，因此无法做定量分析，只能据各遗址发表的陶器标本作大致判断。从鲁东南地区的整体情况看，A类周文化因素数量最多，C类本地文化因素占有一定比例，B类淮夷文化因素和D类混合型文化因素的数量都极少，B类淮夷文化因素的数量在鲁东南地区从第4段开始才大量出现。各类因素的数量和器类、器型反映的情况也较为接近。

四、结　　语

本文在对鲁东南西周至春秋早期考古材料梳理的基础上，将该地区这一时段内的考古文化分为了二期4段，第一期为西周晚期（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材料早至西周中期偏晚阶段的可能），第二期相当于春秋早期，期与期之间的差别易于把握。目前在该地区尚未发现明确的西周早期的考古遗存，其特点与山东的鲁南、鲁北和胶东半岛相异，这种考古现象可能与此时期周王朝的势力尚未渗透至鲁东南有关。文化因素上第1至3段周文化因素数量最多，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文化因素均较少。其文化面貌与鲁南、鲁北西周晚期的情况比较接近，都是周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优势地位没有以上两个地区明显。此外，不见商文化因素的情况可能与周王朝在西周早期未分殷遗民至该地区有关。而从第4段开始，淮夷文化因素大量出现，两周历史格局的变动也引起了考古学文化面貌方面的变化。

总之，本文在对鲁东南地区考古遗存进行分期编年以及文化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据有限的材料尝试建立了该地区西周至春秋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希望该研究能对学界有所裨益。

注　　释

［1］ 处于边缘地带的沂源、费县等我们也纳入了本区域.

［2］ a.任相宏.沂源县姑子坪龙山文化至周代遗址［A］.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b.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沂源县姑子坪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3（1）.

［3］ 详细资料未发表，见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20世纪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4］ 防城考古工作队.山东费县防故城遗址的试掘［J］.考古，2005（10）.

［5］ 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J］.考古，1984（7）.

［6］ a.孔繁刚.山东沂水县出土一批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1992（2）.

b.马玺伦.山东沂水县发现一座西周墓［J］.考古，1986（8）.

［7］ a.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M］.济南：齐鲁书社，1987.

b.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中洽沟发现三座周墓［J］.考古，1987（8）.
［8］ a.苏兆庆等.莒县文物志.济南：齐鲁书社，1993.
b.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J］.考古，1999（7）.
［9］ a.杨深富等.山东日照市周代文化遗存［J］.文物，1990（6）.
b.贾德民等.安丘出土一批青铜器［N］.中国文物报，1994-9-18.
［10］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墓葬［J］.考古，2003（1）.
［11］ 任相宏.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遗存相关问题探讨［J］.考古，2003（1）.
［12］ 刘延常.莒文化探析［J］.东南文化，2002（7）.
［13］ 禚柏红.莒文化研究［J］.东方考古（第6集），2009.
［14］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沂源县姑子坪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3（1）.
［15］ 杨深富等.山东日照市周代文化遗存［J］.文物，1990（6）.
［16］ 防城考古工作队.山东费县防故城遗址的试掘［J］.考古，2005（10）.
［17］ 临沂市博物馆.山东临沂中洽沟发现三座周墓［J］.考古，1987（8）.
［18］ 莒县博物馆.山东莒县西大庄西周墓葬［J］.考古，1999（7）.
［19］ 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J］.考古，1984（7）.
［20］ 杨深富等.山东日照市周代文化遗存［J］.文物，1990（6）.
［21］ 杨深富等.山东日照市周代文化遗存［J］.文物，1990（6）.
［22］ 杨深富等.山东日照市周代文化遗存［J］.文物，1990（6）.
［2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M］.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社，1941.
［24］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A Study on Cultural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Southeastern Shandong

Cao Bin

Abstract: In conjuncture with ceramics and bronzes, the thesis studies the periodization, absolute date of each phrase and analysis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divides the remains dating to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Early Springs-and-Autumns period into 2 phrases and 4 sub-phrases, which is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Early Springs-and-Autumns. From 1 to 3 sub-phrases, Zhou Culture is dominant, but Huaiyi Culture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 from 3 sub-phrases in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first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periodization, dating of this region and analysis of cultural elements, the thesis contribut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cultural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n Southeast Shandong during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Early Springs-and-Autumns Era.

Key words: Southeast Shandong; Western Zhou; early Springs-and-Autumns; periodization analysis of cultural elements; cultural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周代燕国都城研究

陈姝婕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北京，100872）

城市是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而都城作为一个国家或朝代的政治中心，更是其整个兴衰历程的缩影。每个国家或者王朝在建立之初，都城的选定和兴建都是统治者面临的首要任务。都城既是上层政治力量汇集之地，同时也承担着经济、文化重心的角色。因此，一个都城从选址规划到修建完工，都是与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力量分布状况等因素密不可分的。搞清楚一个都城的发展、演变脉络为我们了解其所处国家或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失为进行“大历史”研究的一个良好切入点。

王国维曾说过：“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都城的营建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迎合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渗透着其所在族群的特有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因此都城也就成为一定历史时期内某一文明的缩影。从纵向上来说，每一时期的都城都各不相同，反映了其时代性差异，同时在横向上，每一政权所在的都城也各有特点，反映出民族性、地域性差异。

两周时期处于中国都城制度从产生到成熟的重要阶段。西周时期，在宗法制度的控制下，全国实行王城、诸侯国首邑和卿大夫采邑为单位的三级城邑建设体制。周王室所在的王都这时已经开始遵循特定的营建、布局模式。具体到各诸侯国，虽然规模上都要符合礼制约束，不得僭越，但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传统、民族属性等方面的差异，都城址的构筑上就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应用使得社会经济得到飞跃性的发展，思想文化也空前繁荣，同时各诸侯国间关系错综复杂，兼并战争不断，势力此消彼长，这就使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征都各不相同。在都城方面，其规模、形制、布局、建筑都有所区别，各国的都城发展、变迁正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前行。其中燕国的都城变迁呈现出较其他诸侯国更为复杂的面貌。

一、燕都的发现和研究概况

两周时期的城市体系有极大地松散性和不稳定性，城市核心的迁徙、转移是非常频繁、普遍的。燕国是两周时期处于中国最北方的诸侯王国，是中原与北方的交界地带。

北有戎狄等北方民族的侵袭之忧，南有齐、赵、中山等诸侯国的吞并威胁，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燕国的发展受外界影响极大，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其国家中心也在不断南下或北上的反复中。这种国家局势的变动在燕国都城方面表现得极为显著。每当受到外部势力威胁或进攻时，燕国都城就会进行转移，以趋利避害；而当国力较为强盛时，统治中心就会固定在相对稳定的地域，都城的规模也是国内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

燕国都城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西周燕都虽不见文献记载，但已被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证实；燕上都蓟见于诸多文献中，但缺乏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燕下都既在史籍文献有记载，遗址也在河北易县被发现；燕中都和临易城在文献中有所提及，但具体位置语焉不详，虽然已经发现了与之吻合的遗址，但仍存在较多争议。因此，燕国各个都城的具体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这也为研究带来了很大难度。

学界对燕国都城的研究往往在其使用年代、位置地望和迁徙过程上。西周燕都琉璃河遗址和燕下都遗址的相关研究都是建立在二者性质已无异议且考古材料充足的基础上的，但在使用年代断定上还存在较大争议。地望和位置存在较大争议的是临易城和上都蓟，主要原因就是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匮乏。燕国都城众多，它们之间的迁移、演变过程是燕国都城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众多学者较为感兴趣的课题，但是由于各个都城的年代、位置问题都还有诸多疑惑未得到解决，因此各家对燕国都城迁徙过程的复原也不尽相同。简而言之，目前燕国都城研究领域的现状就是各个城址受关注程度不平衡、分歧众多，造成这种状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献、考古材料的匮乏。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不能因此就疏于进一步的研究，如何在有限的资料内最大程度的发掘有效信息，运用严谨科学的方法得出客观合理的研究结论是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尝试和探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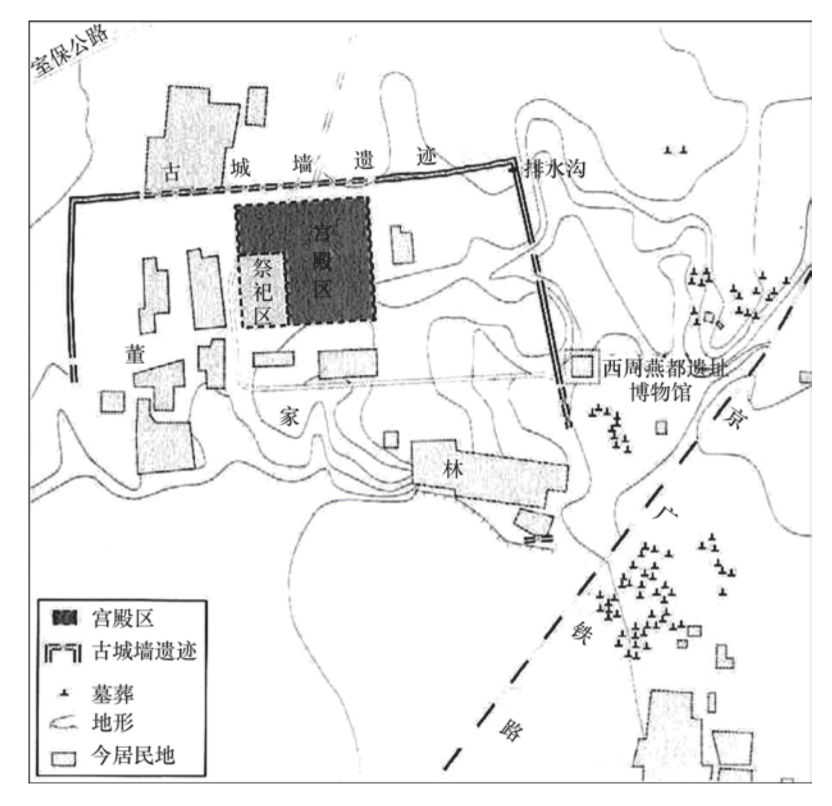
二、燕国都城的考古学观察

燕国都城址的涵盖范围不仅包括目前已经得到考古学证实的已确认都城址，还将一些在性质上尚存较多争议或前人较少注意到的遗址，我们可以将其划归到疑似都城址的范围中来，因此，燕国可确认和疑似都城址共有六座。

（一）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

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约3千米处，坐落于大石河北岸台地上。遗址面积5.25平方千米，是包含古城址、墓葬区和一系列遗迹在内的大遗址。遗址范围内已发现古城址1座、各等级墓葬400余座以及居址多处，出土物十分丰富（图一）。

董家林古城是琉璃河西周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城的北墙全长829米，东、西墙仅存北半部的一段，各300米左右，宽约10米。南城墙无存。距离城墙外侧约10米有护



图一 琉璃河遗址平面图

城河，整个地层堆积分为8层，其中第4～7层为护城河内堆积，发掘结果显示第5～7层是河内有水时的沉积层，土质较硬，黏性大，出土有少量陶片，从纹饰和质地来看年代应在西周早期到早期偏晚阶段。第4层堆积则没有水浸痕迹，并且已将护城河填满，这说明这层堆积形成时河内应经没有多少水了，护城河失去了原有的防御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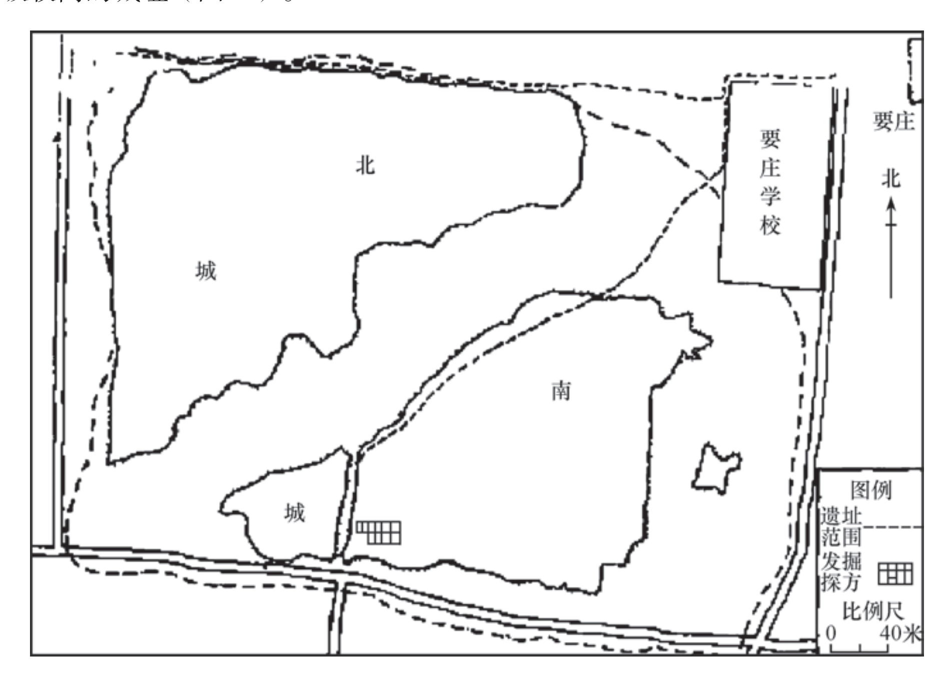
出土遗物中有多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戈上有“成周”和“匽侯舞戈”铭文，泡饰背面多有“匽侯舞”或“匽侯舞昜”铭文，其他一些青铜器上也可见“匽侯”或“侯”的字样。这些铭文为研究燕国早期历史、断定琉璃河遗址的性质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

古籍文献上对燕国西周中前期历史的记载阙佚，因此这一时期燕国都城的研究主要依靠考古学材料。经过半个多世纪来的系统考古发掘，已经基本可以断定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始封地和早期都城。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作为燕国都城是从成王时期封召公奭之子于燕开始的。

（二）河北满城要庄遗址

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北郊区要庄乡要庄村西，是一处较大规模的西周

时期遗址，遗址的文化层很厚，遗迹丰富。要庄遗址为一长方形高台，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一条宽约80米的东北—西南向大沟将遗址分为两部分。出土大量可复原的陶器具有明显的西周中晚期特点，也说明生活在此的人口数量较多。遗址的东南方向是墓葬区，这与琉璃河遗址的情况极为相似。这一地区曾有农民发现五鼎列鼎，形制初步判断为春秋早期，这说明这一区域存在过相当于“大夫”一级的高规格墓葬，这也说明了要庄遗址可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居民聚集区，而是一个政治等级较高的城址（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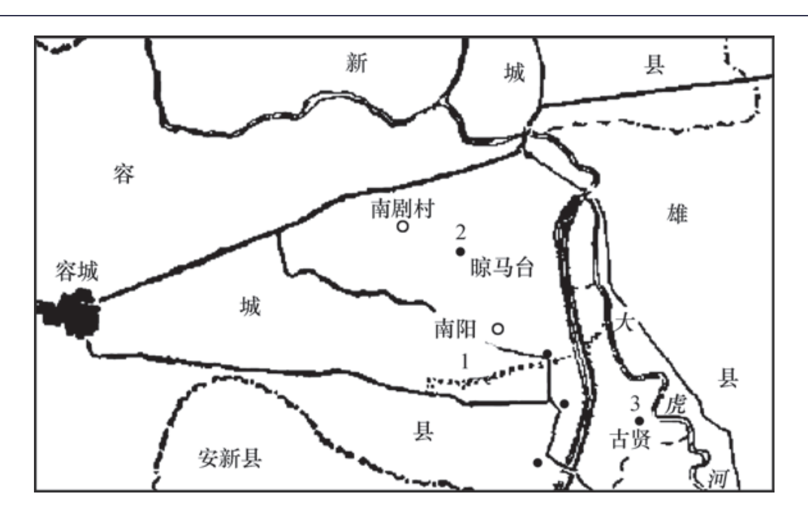


图二　要庄遗址平面图

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之后，燕国都城转移到了何处呢？由于史籍中对燕惠侯之前的九代燕侯没有任何记载，而这恰好是西周中期燕国都城可能发生重要变迁的时候，我们无法从文献中寻找线索，目前的考古发现中也没有发现较为明确的另外一个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因此我们只能在已发现的遗存中寻找可能性。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赵福生先生是最早提出关注河北要庄遗址的研究者之一，从要庄遗址的规模和年代来看，其对解决燕国都城迁徙上的缺环问题有重大意义。

（三）河北容城遗址

容城县古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容城县城东约14千米范围内，以晾马台乡南阳村附近最为集中，发现几处较大的古代遗址（图三）。



图三　容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1. 南阳村高台地　2. 晾马台高台地　3. 古贤古城

遗址以东3千米处的古贤村有古城址1座，分为“大城”和“南城”，二者相连。“南城”南北宽约1000米，东西长约1200米。古贤古城的西北方向有2座高台遗址。其中南阳村南250米处的遗址最大且遗存丰富，当地群众称之为“燕国城”。

自1958年以来，这里就发现多件较为完整的青铜器、陶器、骨角器等。在南阳村所出铜壶一件带有“西宫”“右征尹”字样，右铺首处有“匽”字样；另外一件带有“左征”字样，装饰风格均具有春秋时期作风。所出铜戈中有一件刻有 “郾侯载之萃锯”6字铭文。出土的其他铜鼎、陶鬲、陶豆等器物的纹饰、形制也均表现出春秋战国时代风格。南阳村台地的东侧断面上部曾采集到有“易市”字样陶碗1件。从出土物来看，容城遗址的使用年代主要在春秋时期，可晚至战国甚至秦汉。

史籍中对燕国临易城述及颇多，《世本》云“桓侯徙临易”，虽然临易的位置和迁都至此的时间，各代记载莫衷一是， 但燕国临易城基本就是后来的易县故城或大易故城是基本达成共识的。从位置上看，容城文化遗址与记载中易县故城的位置是相符的。从出土青铜器的铭文来看，“匽”和“郾侯”字样都证明这与燕国有关带有“易市”字样的陶碗也证明这一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目前对这片遗址只是地面调查，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但是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片遗址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境内的一个城邑，有助于燕国临易城的确认，进而有望补充、纠正文献记载的混乱之处，对这一历史时期燕国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四）北京蓟城遗址

关于蓟与燕国都城的记载，最早可见《韩非子・有度》篇：“燕襄王以河为境，

以蓟为国”，此后历代学者都有“燕国都蓟”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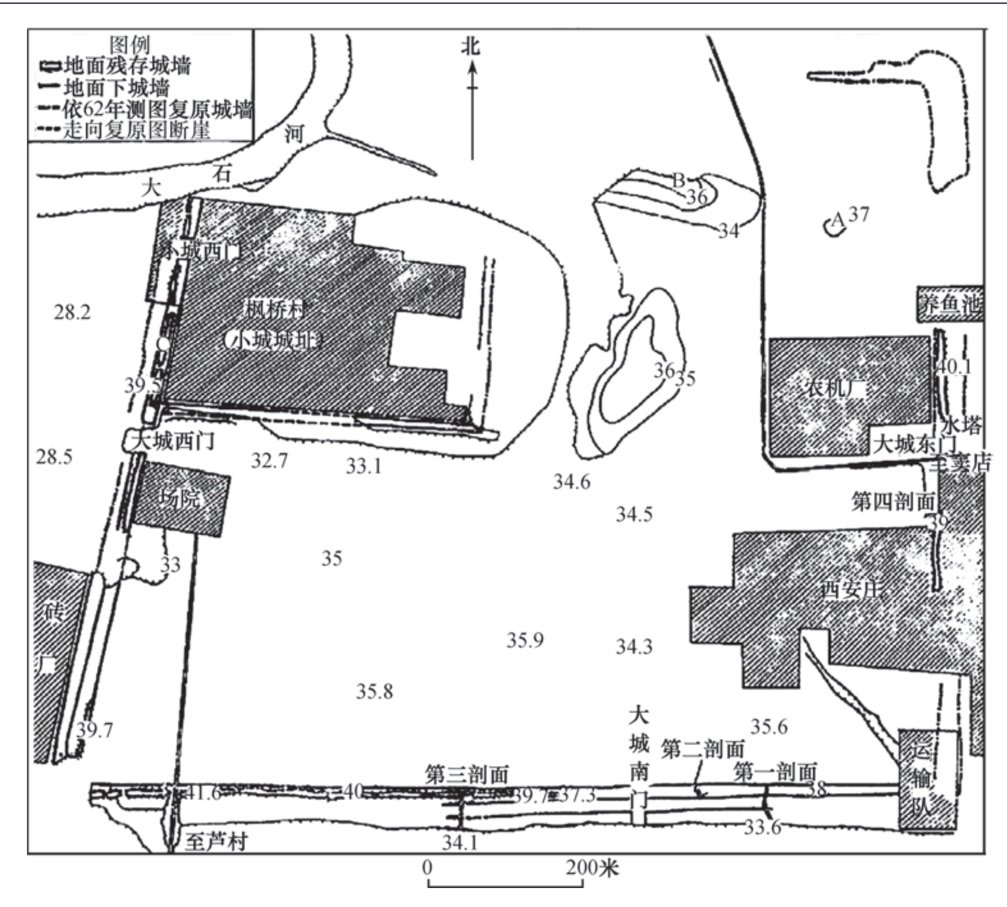
1956年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一座陶井内出土一件带有“[illegible]”字样陶文的陶罐，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的陈平认为这一陶文就是“蓟”字，从而推断蓟城应当就在白云观至宣武门一带[2]。1965年，北京西郊八宝山南侧在修建地铁时发现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墓志记载，华芳是永嘉元年（307）“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的。这一发现明确指出了“燕国蓟城”与华芳墓的相对位置和里程，有重要的意义。1965年至1970年，北京西南城区附近的陶然亭、广安门、北线阁、白云观、琉璃厂、新华街、象来街、校场口、白纸坊、西单大木仓一带陆续发现战国秦汉古瓦井60余座，以西便门东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最为密集，约50余座。一直以来，饕餮纹半瓦当都被视为是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特有的屋顶防水建筑构件，在北京地区也发现过两次。一是1957年在广安门桥南约700米的护城河西岸发现饕餮纹残半瓦当1件，同出的还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陶鬲足、陶豆把等，当时发掘者推想出土地很可能与文献中的燕都蓟城有关。1972年5月，宣武区韩家潭图书馆院内在取土时又发现2块保存基本完好的饕餮纹半瓦当，同出的有燕明刀钱约10枚和一些细绳纹陶片。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文献记载中的燕国上都蓟城应在今北京城区，北京城区自建国之后就陆续发现春秋战国时代遗存，其中包括瓦井、墓葬以及出土的青铜器、建筑构件等，但还没有城址等大型遗存的发现。总的来说，这些发现都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为燕国蓟城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的结论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尽量合理的推断。

（五）北京房山窦店古城遗址

窦店古城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乡以西，根据城址的时代、规模、夯筑方法、地理位置推测，学界基本认定为燕中都。城址分为大城和小城。大城城墙分内外两重，外城墙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960米，内外城墙内侧间隔16.9～19.5米。综合城墙剖面情况，大城的堆积经历了从战国早期到北朝时期的几个时代。遗物中最多的是板瓦等建筑构件，其中尤以战国至汉代的板瓦居多。此外还有铁器、陶器等，年代也在战国至汉代。其中战国时代的釜、罐、豆、钵、瓦等遗物均与燕下都同类器物相类似，应属燕文化范畴（图四）。

城墙的地层堆积来看，最早构筑的城墙夯土和基槽中夹杂的陶片具有战国早期特征中，说明该城应该始建于战国早期。但是建城之初，城墙的施工似乎不是那么严格、规范。基槽并没有按照统一的尺寸全部开挖，只是在原有土地上稍加平整，夯土层的厚度不一，夯打得也不是十分坚实，这都说明古城在最初的修筑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或者说修建得较为匆忙。夯土堆积表明，战国晚期土城曾经做过大规模的整修，城墙夯筑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采用了当时盛行的分块版筑方法，夯层致密，夯窝规整。城墙



图四　窦店古城平面图

堆积最晚可到西汉时期，主要是内墙的内外护坡，说明土城在西汉时期又进行了一定的整修。

再从城内文化层堆积来看，战国早期的堆积较薄，出土的遗物少且破碎，器物种类以罐为多，比较单一，由此可见古城刚建成的时候，城内居民并不多。出土遗物中有很多板瓦等建筑构件，贯穿整个战国时期以至汉代，说明当时城内有过较多建筑，并随着时代发展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燕国有中都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其卷六九《幽州良乡县》条目下云："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水经注》对汉良乡县的位置有过详细记载，这与窦店古城的位置是基本吻合的，再结合调查发掘结果，我们应该可以确认窦店古城应该就是汉代的良乡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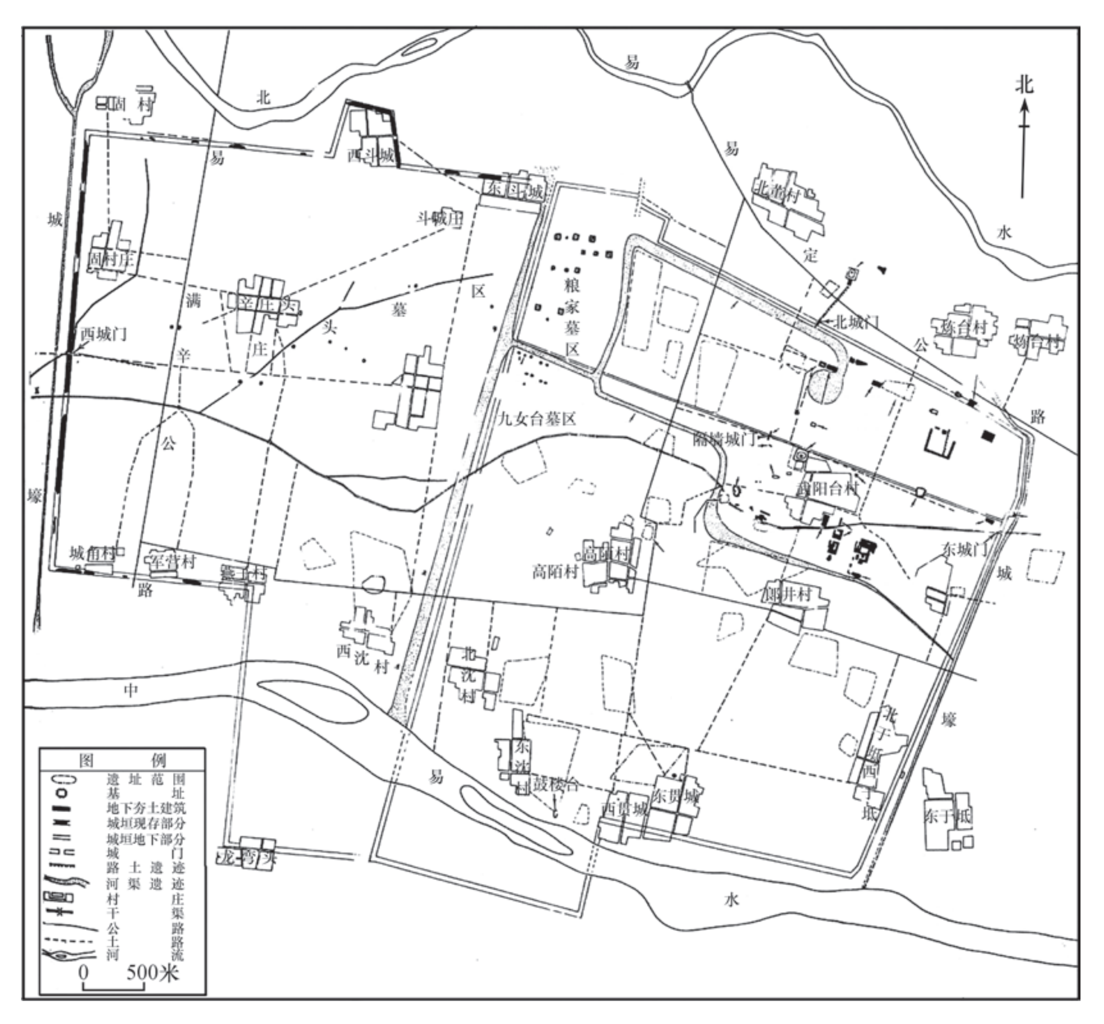
（六）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

燕下都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城东南2.5千米处，是各个燕国都城之中系统发掘开始

最早、受到关注最多的城址，也是各燕国都城中材料最丰富、存疑最少的可确认的都城，也是燕国都城研究的重中之重。

城址总体平面并不规整，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宽4000～6000米，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四面皆有城垣，西城紧邻东城西垣外侧起建，因此没有东垣。城内现发现夯土建筑台基12座，夯土建筑遗迹14座，文化遗址30处，古墓葬群3处，功能上可分为宫殿区、作坊区、居住区和墓葬区等。遗址大多位于东城。燕下都城内外发现的遗物数量十分丰富，依质地可分为建筑构件、陶器、铁器、铜器、骨角器、玉石器、钱币等多类（图五）。

从考古发掘成果来看，城址在战国早期可能就已经开始兴建了，只不过那时只称为武阳城，是燕国南境的一个重要城邑，在昭王时期才开始与蓟城分列为上、下都。由于东城城垣一直未做解剖发掘，我们无法判断东城建造的具体时间。但从西城城垣的发掘来看，西城的修建不早于战国早期，而一般认为西城要晚于东城，所以东城的修建可



图五　燕下都遗迹图

能在战国早期或更早。

城址在一个地区的兴起要依托一定的外部条件，燕国之所以选择在此建造武阳城，应该是考虑了各方面条件的结果。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愈演愈烈，加强南部疆土的防御是燕王室优先考虑的问题。武阳城处于北易水、中易水之间的狭长地带上，东西各有两条城壕沟通两条易水，具有优越的防御性能。在城内的设施上，城墙和隔墙上建有多个具有驻兵、监视、瞭望、报警功能的防护建筑，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因此燕国最初在此修筑武阳城是为了加强南方地区的防御，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谋求南进。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位优势的日益凸显，武阳城的规模和城市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城内在战国中后期的遗存增多便是证明。这时武阳城已经与蓟城并列燕国二都，开始称为下都了，具体时间可能在燕王哙时期。

三、燕国都城的变迁

通过以上资料的分析，再结合史籍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两周时期燕国都城的迁徙、演变过程。

西周初年，武庚之乱被平定之后，成王为稳定东土的殷移民和当地土著，巩固周王朝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将现在的北京房山一带分封给位列三公的太保召公奭，但由于地位的特殊性，召公不可能亲自就封，于是以元子克就封，是为第一代燕侯，都城就在琉璃河遗址的董家林古城。古城南邻圣水，北依燕山地区，防御性能很好，而且燕地富庶，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周人、殷商遗民和当地的土著在这里杂居，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文化逐渐成为主流，商文化因素和当地土著的文化因素都逐渐被融合。琉璃河燕都也成为集都城、墓葬区、居住区于一体，有着统一、明确规划的诸侯级都城。第一代燕侯去世之后也被埋葬在城东南的墓葬区。

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发展，南部大石河的水患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逐渐影响到都城的安全。西周早期以晚或中期，河水泛滥问题迫使燕侯决定迁都，琉璃河由政治中心降为了普通的居民聚集区。新都城的所在可能就在今天河北满城县的要庄一带。无论是城市选址还是功能布局，这里都与董家林呈现出相似性。首先，要庄北临漕河，不但解决了城内的居民用水问题，而且防御功能也很突出。同时又地处平坦的高台地，避免了像董家林古城一样面临河水侵蚀的问题。与董家林古城一样，城址的东南部都是墓葬区，由于未经系统发掘，我们无从判断墓葬区的规模，但从出土的列鼎来看，这里也曾埋葬过等级较高的人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要庄遗址等级的不一般。不可否认的是，这里距离燕国初封地较远，不利于燕国对于北方燕山一带的控制，因此这次迁都并非长久之计，从燕国的政治、军事需要来看，都城还是要回到现在的北京一带。这也是燕国都城在西周末期或春秋早期再次进行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春秋之后，燕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北方戎狄势力。他们以牧业为生，善攻

战，好夺掠，史籍记载山戎、东胡民族在对燕国边境的侵扰中“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3]，国力较弱的燕国疲于应付。燕桓侯之子庄公在位时期，山戎势力不断侵袭，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在此之前，无力对抗山戎的燕桓侯可能就已经将都城迁至临易，因此古贤古城才会紧邻古易水，并在西北建立晾马台、南阳两处高台进行防御。庄公即位之后临易城也逐渐受到威胁，倘若连临易城都不保，首当其冲的便是南方的齐国，因此齐桓公才会不遗余力的出兵救燕，将山戎势力一直驱赶到孤竹（今河北卢龙）而还。既然国家得以保全，与齐国也开始了密切的往来，燕庄公也就没有继续在临易避难的必要了，于是将都城又迁回原处。易都却没有就此没落，而是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燕国南陲的一个重要城邑。直到燕国被灭，秦一统天下，易都才逐渐废弃。古城东墙在古易水的冲蚀下逐渐坍圮，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需要指出的是燕国都城并非是从要庄直接徙都临易的，因为要庄与临易相距不远，迁都临易又是由于山戎的南侵，所以不可能直接从要庄迁往临易，那根本起不到避祸的作用。燕国迁都临易应是从北方被迫南迁的。燕桓侯徙都临易之前的都城在何处呢？《史记・周本纪》曰“封召公奭于燕”，张守节《正义》云：“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西周初封之时，燕、蓟同为封国，但蓟只是“褒封”，燕则是周王室出于政治、军事考虑而分封，因此燕的实力显然明显强于蓟。随着周人势力在燕地的日益强大，蓟逐步被纳入燕的统治体系内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燕“并蓟居之”的方式可能是军事上的战争行动，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同化作用。因此，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在吞并了蓟之后，燕占据了整个燕山以南地区。燕国都城从要庄迁出后应当是迁回了北方，最大的可能就是蓟所在的北京地区了。庄公时期，齐国将山戎势力驱逐到孤竹、令支之后，燕国又将都城迁回蓟城。直到战国中后期武阳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下都之前，蓟城都是燕国的政治中心所在。

春秋晚期，晋国击败众狄，燕国一直以来面临的外患也基本得到解除。三家分晋之后，各诸侯国之间的形势更为复杂，兼并战争兴起不断。与燕国南境毗邻的齐、中山等国开始成为燕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战国早期，燕国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选取了一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带兴建了武阳城，一来是扼守齐赵通往上都蓟城的咽喉地带，二来是希望以此为据点谋求南进。由于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和较高的社会生产水平，武阳城很快便发展起来，规模不断扩大，在燕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至迟从燕王哙开始，国家的政治中心地位就转移到武阳城来了，但蓟城国都的地位并没有终止，武阳与蓟城成为据守燕国南北地区的上、下二都，二者地位是相当的。

战国初期，在燕国疆域的西南，窦店古城也兴建起来，这里西邻大石河，同时处于一片山前平原地带，防御功能十分突出。窦店古城附近的战国时代遗址较多，也都

位于山前制高点、文化堆积薄、遗物单一，这些遗址都是与军事防御有关的。这就为我们判断窦店古城的性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战国中晚期，窦店古城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整，对城墙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夯筑，还运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分块板筑的方法。一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燕国处于齐、赵夹击之间，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御显得尤为重要；二是随着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窦店古城已经初具规模，人口也大为增加，成为当时较为重要的城市之一。无论是处于加强防御的考虑还是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都有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整修的必要。这时的窦店古城成为与当时上、下两都可以相提并论的重要城市，有燕国中都之称。燕国为秦所灭之后，这座城市并未遭到废弃，而是一直沿用下来。汉朝建立之后，在其原有基础上稍加修整，成为良乡县治所在。

公元前316年，第三十八代燕王哙因轻信苏代谗言将王位让与子之，子之执掌国政三年，造成燕国内乱。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在齐滑王的支持下密谋进攻子之夺取王位，但是久攻不克，市被反戈，转而进攻太子平。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燕国内部伤亡惨重，死者达数万，民心涣散。齐宣王趁机命令章子率领齐国都之兵入侵燕国，燕王哙被杀，燕国宗庙被毁、宝器被掠，几近亡国。两年之后，燕人立太子平为王，是为昭襄王，昭襄王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广纳贤士，短短二十余年间燕国就国富兵强。昭王联合“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4]，大破齐军，“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5]并连下齐七十余城，收复了大部分国土。《韩非子·有度》篇云：“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对于记载中的“燕襄王”，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是认为襄王为襄公之误，推断春秋中期在位的燕襄公时才开始以蓟城为都，另一看法则是认为燕襄王与燕昭王一样，是燕昭襄王的简称，为一王双谥。对这一问题，陶宗震、陈平等学者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证，在此不赘言。笔者个人较为赞同后一种看法。

燕王哙时期的内乱发生在下都，这里被齐军攻破，宗庙被毁，国之重器也迁往齐国。而燕昭襄王即位之后回到了另一个都城——上都蓟城，将黄河作为了燕的南境，防御齐国的进攻，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复国的历程，然后才有实现了“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的局面。之后的历代燕王都是将上下二都同时作为政治中心的，无论哪个都城受到攻战，对燕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因此燕王喜二十九年，秦国攻陷了上都蓟城，燕王喜被迫逃亡到了辽东一带。蓟城失陷之后，下都就成了燕国唯一的都城，所以燕太子丹以此为据点积蓄力量，派遣荆轲行刺秦王嬴政，“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在燕下都时的慷慨悲歌。

两周时期的燕国都城研究是考察、复原燕国历史发展脉络的重要一环，是进行燕国“大历史”研究的切入点之一。通过对各个都城进行“点”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进而还原出燕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研究过程中不但需要文献记载的交叉印证，更需要当代考古学发现的支撑。通过总结、分析关于这六座城址形制布局、功能分区、出土遗物等考古学材料，再与已有的文献记载相比照，我们对其各自

的沿用年代、建造方式和所处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信息有了相对准确而全面的把握。在性质上，这些城址并非全都可以称为都城，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都，有的是王室临时避难所，有的仅是比较重要的城邑，而那些可称之为都城的城址在燕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时间上，各个城址有的有先后承继关系，有的则并行发展。这些都是由燕国复杂的历史所决定的，反之也影响了燕国历史的发展。

注　释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　陈平・释“*”——从陶文“*”论定燕上都蓟城的位置［J］.中国历史文物，2007（4）.
［3］　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M］.
［4］　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M］.
［5］　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M］.
［6］　陶宗震.燕都蓟城考——兼论北京城的起源［J］.北京文博，1996（1）.
［7］　陈平.北方幽燕文化研究［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6.
［8］　韩非子・有度第六［M］.

The Research on the Capital City of Yan State of Zhou Dynasty

Chen Shujie

Abstract: The capital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of a country or a dynasty, therefore the capital city research may become one of the breakthroughs points to inspect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Zhou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hase when the Chinese capital city system moved from occurrence towards maturity, and Yan’s capital city vicissitude presented more complex comparing the other vassal states. Consequently, the summariz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about every capital city of Yan State are significant to the research of Yan history even the whole Chinese history. The research of Yan capital city before always focused on just one city and lacked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all cities. The archaeology materials of each city site are uneven, which leads the attention degree and the research level of them to an imbalanced condition. So the Yan capital city research area also has a big promotion space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which is one of this article’s original writing intentions. The research on Yan capital city of Zhou Dynasty hopes to inspect the entire Yan capital city history from a new angle of view which is founded on comprehensive archaeology and literature material. The

whol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whose mean content is below. Chapter One outlin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Yan capital city research, simply reviews the study history and proposes research mentality and technique of this article. Chapter Two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archaeology achievements including the city site aspects, construction layout, matching facilities and unearthed relics of Beijing Liulihe city, Hebei Yaozhuang ruin, Hebei Rongcheng ruin, Beijing Ji ruin, Beijing Doudian city and Hebei Yanxiadu. Chapter Three criticizes six city sites' age in us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so on according to archaeology and literature material. Then the article Chapter Four classifies the six capital cities' character and function, inspects the Yan capital citie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and restores their vicissitude history. The research technique that was utilized and the conclusions we have obtained are just some preliminary attempts. We believe that along with increasing archaeology material and enhancing research level, the Yan capital city research area will have a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Yan state; capital city; research

新疆北部青铜至铁器时代古代人群的颅骨测量学研究

张林虎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自然地理特征上“新疆北部地区”大致可分为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伊犁河谷和天山几大地形板块。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区域是古代游牧人群驰骋的舞台，游牧经济占主导辅以少量的农业经济。

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是欧亚草原游牧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欧亚草原中、东部地区在游牧化过程中是较为先进的，活动于新疆北部、蒙古中西部地区、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人群是其主角。这些古代人群在新疆北部的伊犁河流域有着广泛的分布。已有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表明，新疆北部地区是欧亚大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在整个欧亚草原游牧化的进程中，又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1]沿着横亘中部的天山山脉，向西通过伊犁河谷可以进入七河地区，并进而联系着费尔干纳盆地；穿过西北部阿尔泰山，可以进入南西伯利亚和东哈萨克斯坦地区，如切木尔切克文化和索顿布拉克文化。

从目前已发表的材料来看，伊犁河流域无疑是这一地区考古工作开展最充分的，特别是吉林台古墓群的发掘不仅为认识伊犁河上游史前文化结构、序列提供丰富而珍贵的材料，同时也为开展人类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这一区域曾有多支古代族群先后活跃于此，如塞、乌孙、月氏、匈奴等。目前我们还无法将人类学材料与这些古代族群相对应，但对这些古代人骨材料进行深入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了解人群的混合交流的历史。

一、材料与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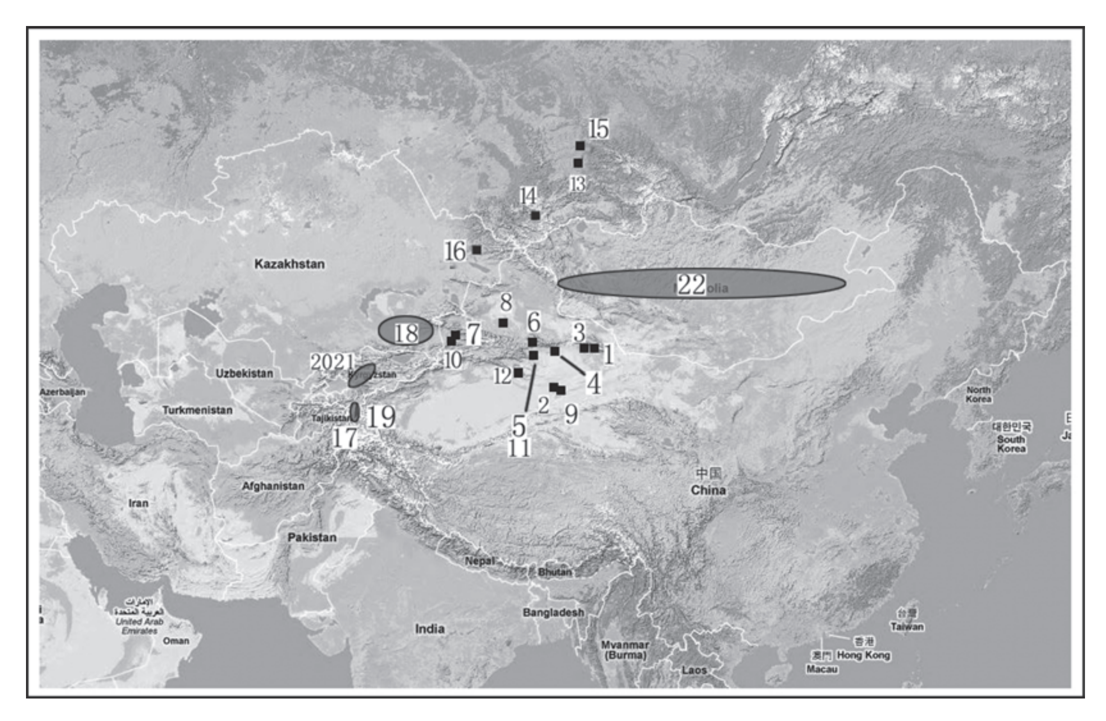
1. 样本和颅骨测量学标准

吉林台古墓群于2000～2004年间发掘，共发现古代墓葬700余座[2]。采集出土人骨269例，主要包括穷科克一号墓地、阿克布早沟墓地、吉仁托海墓地、别特巴斯陶墓

地、加勒格斯卡茵特墓地、铁木里克墓地、彩桥门墓地等7个墓地。依据颅骨测量标准，可判定为男性122例，女性107例，性别不明确有40例。本项对其中较完整179例颅骨，进行88项测量项目和29项形态指数进行调查。测量标准主要参考了俄罗斯[3]、中国[4]和日本[5]的颅骨测量学标准，这些标准无显著差异[6]。由于吉林台古墓群包含有多个墓地，且不同墓地间年代跨度较大，整个墓群所代表的古代人群形态特征变异较大。为了更加有效的与其他古代人群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将吉林台古墓群所代表个体依据t检验结果分成吉林台一组和吉林台二组两个人群[7]。

2. 聚类分析

应用多维尺度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吉林台古墓群人骨测量学结果（15项）与新疆[8~17]、中亚材料[18~22]的青铜至铁器时代22个样本组进行对比分析（图一）。由于各个对比组间年代跨度较大，人群差异明显，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同人群间的历时性变化，本项研究将对比组分为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组和铁器时代组。各对比组采用组间差异均方根和欧氏距离系数的距离量度，在此基础上对前4个PC（占总信息量的84.9%~86.6%）进行聚类分析，绘制树状结构图。



图一　各古代组的地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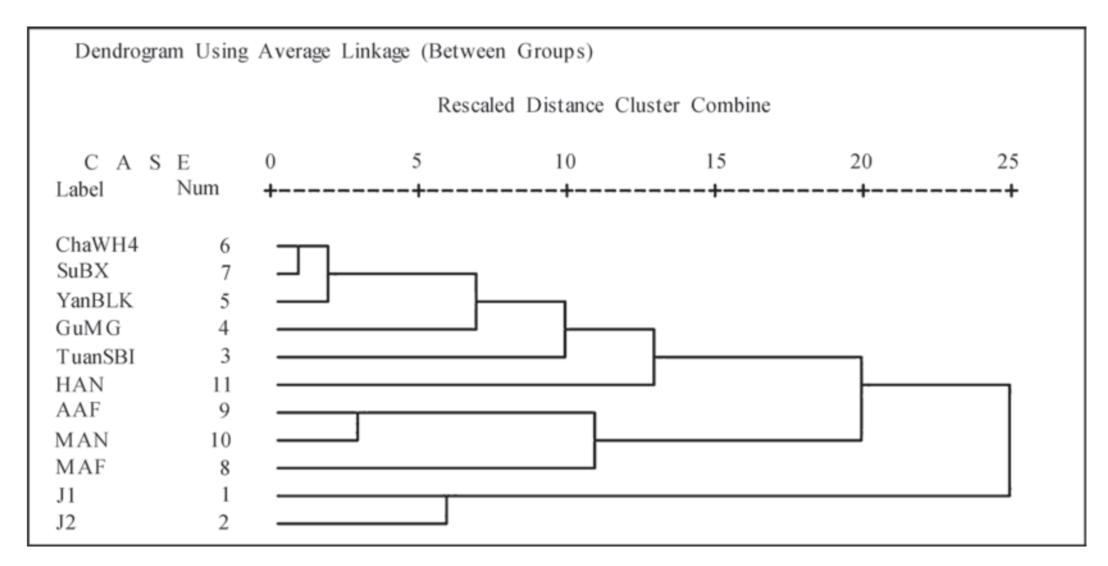
1. 天山北路组　2. 古墓沟组　3. 焉不拉克组　4. 苏贝希组　5. 察吾呼四号墓地组　6. 阿拉沟组　7. 索墩布拉克组　8. 石河子南山组　9. 楼兰城郊组　10. 昭苏组　11. 察吾呼三号墓地组　12. 营盘组　13. 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　14. 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　15. 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　16. 阿尔泰安德罗诺沃组　17. 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　18. 七河乌孙组　19. 阿莱塞克—乌孙组　20. 肯科尔匈奴组　21. 天山匈奴组　22. 蒙古匈奴合并组

二、结　　果

1. 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各古代组的对比研究

1）聚类分析

首先将吉林台组古代居民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各组古代居民进行对比，对比材料选取了9组颅骨标本。依据数据计算出各古代组的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表一）和欧氏距离系数（表二），并根据欧氏距离的结果绘制出树状聚类图（图 二）。



图二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古代组组间联系的树形聚类图

1.吉林台一组　2. 吉林台二组　3. 天山北路组　4. 古墓沟组　5. 焉不拉克C组　6. 察吾呼四号墓地组　7. 苏贝希组　8. 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　9. 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　10. 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　11. 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

表一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各古代组的组间差异均方根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X	0.60	1.43	1.13	1.36	1.22	1.27	1.38	1.35	1.10	1.26
2		X	1.48	1.37	1.48	1.46	1.54	1.23	1.35	1.13	1.51
3			X	0.93	0.68	1.09	0.81	0.94	0.97	1.24	1.27
4				X	0.72	0.68	0.48	1.00	0.64	0.71	0.65
5					X	0.59	0.56	1.24	1.02	1.27	0.92
6						X	0.56	1.14	1.05	1.16	0.90

续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7							X	1.11	0.98	1.07	0.89
8								X	0.77	0.86	1.35
9									X	0.59	0.88
10										X	0.94
11											X

注：1.吉林台一组，2.吉林台二组，3.天山北路组，4.古墓沟组，5.焉不拉克C组，6.察吾呼四号墓地组，7.苏贝希组，8.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9.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10.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11.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

表二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各古代组的组间欧氏距离系数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X	2.51	4.89	4.13	5.00	4.29	4.33	5.38	5.45	4.42	4.90
2		X	5.16	5.12	5.97	5.38	5.55	4.61	5.30	4.50	5.88
3			X	3.26	2.82	3.49	3.02	4.03	4.24	4.62	4.73
4				X	2.84	2.48	2.13	4.30	3.04	2.94	2.68
5					X	1.95	2.32	5.42	4.64	5.10	3.83
6						X	2.05	4.86	4.50	4.60	3.64
7							X	4.68	4.41	4.45	3.54
8								X	3.22	3.60	5.42
9									X	2.30	3.63
10										X	3.74
11											X

注：1.吉林台一组，2.吉林台二组，3.天山北路组，4.古墓沟组，5.焉不拉克C组，6.察吾呼四号墓地组，7.苏贝希组，8.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9.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10.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11.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

由于组差均方根函数中用到同种系标准差，而在鼻颧角和垂直颅面指数这两项上没有同种系标准差数值，所以导致了欧式距离系数的结果与组差均方根的结果有差异，但吉林台两组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最紧密的。

从聚类分析来看，这个时期11组古代居民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吉林台一组、二组，这两组居民的体质特征为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杂人群，并具有明显的短颅特征，所以与其他的欧罗巴人种古代居民距离较远。第二类为米努辛斯克阿凡纳羡沃组与

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这一组居民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23]；第三类为察吾呼四号组、苏贝希组、焉不拉克C组、古墓沟组、天山北路组、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这一类中除去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其余各组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分别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孔雀河下游的罗布泊地区。聚类的结果显示这四个地区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4]。察吾呼四号组、苏贝希组、焉不拉克组具有较相似的形态特征，而与古墓沟组相对较远，或许这正是古欧洲类型与“现代型”[25]之间差异的体现。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组居民偏高偏狭的颅型与古墓沟组较为相似致使其与其他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和阿凡纳羡沃文化居民关系相对疏远。

2）因子分析

由于欧氏距离比较的是全部项目点对点的距离，没有区分各项目间的权重。因此为了更加系统地、全面的分析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各古代组居民之间的亲属关系，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四个主成分来考察这一时期11组古代群体之间的关系。前四个主成分因子是，贡献率达到了84.903%，达到理想值，可以认为其包含了全部15个项的大部分特征信息量（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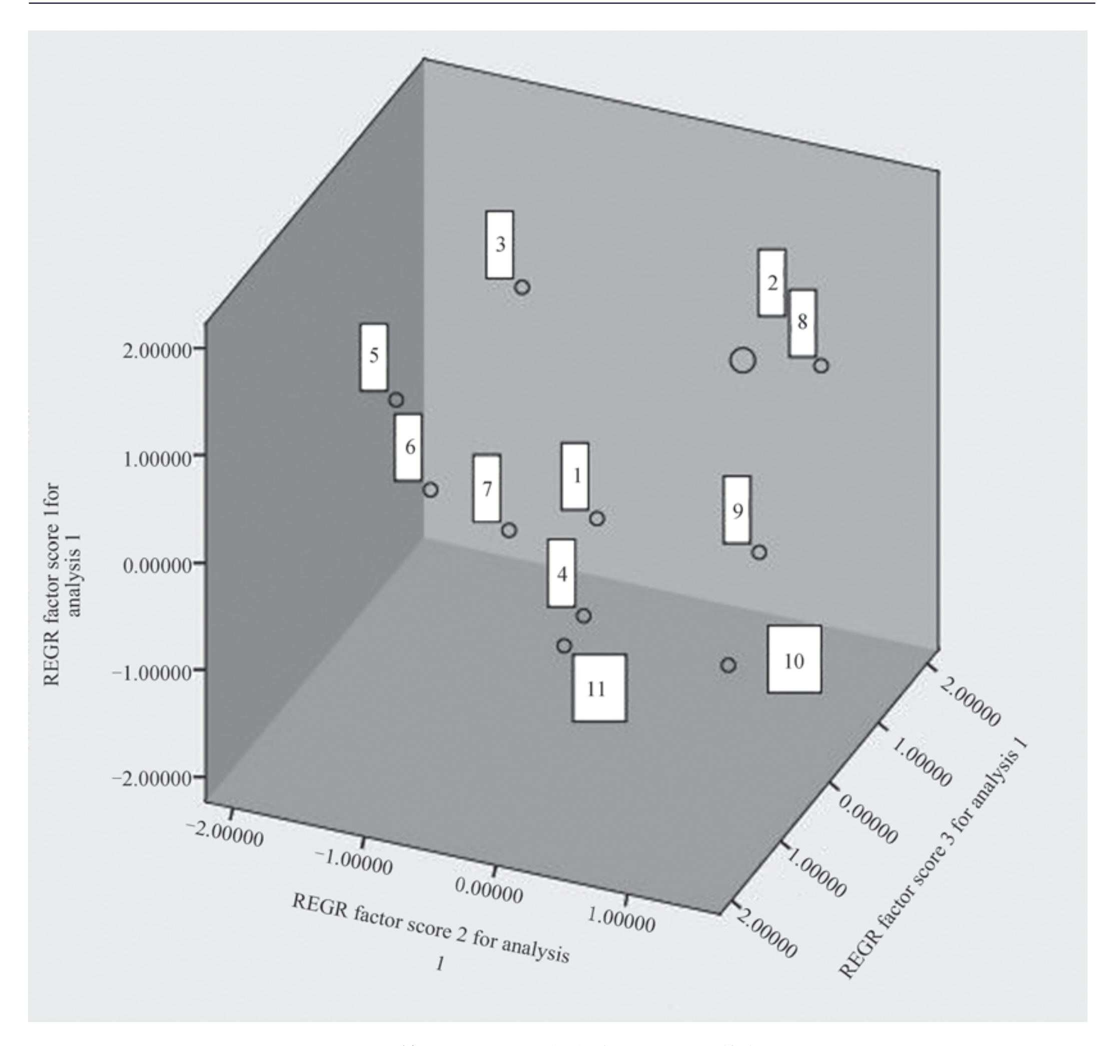
表三　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比及累计贡献率

成分	特征根值	方差贡献率%	累及方差贡献率%
Component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1	5.326	35.505	35.505
2	3.638	24.256	59.761
3	2.529	16.863	76.624
4	1.242	8.279	84.903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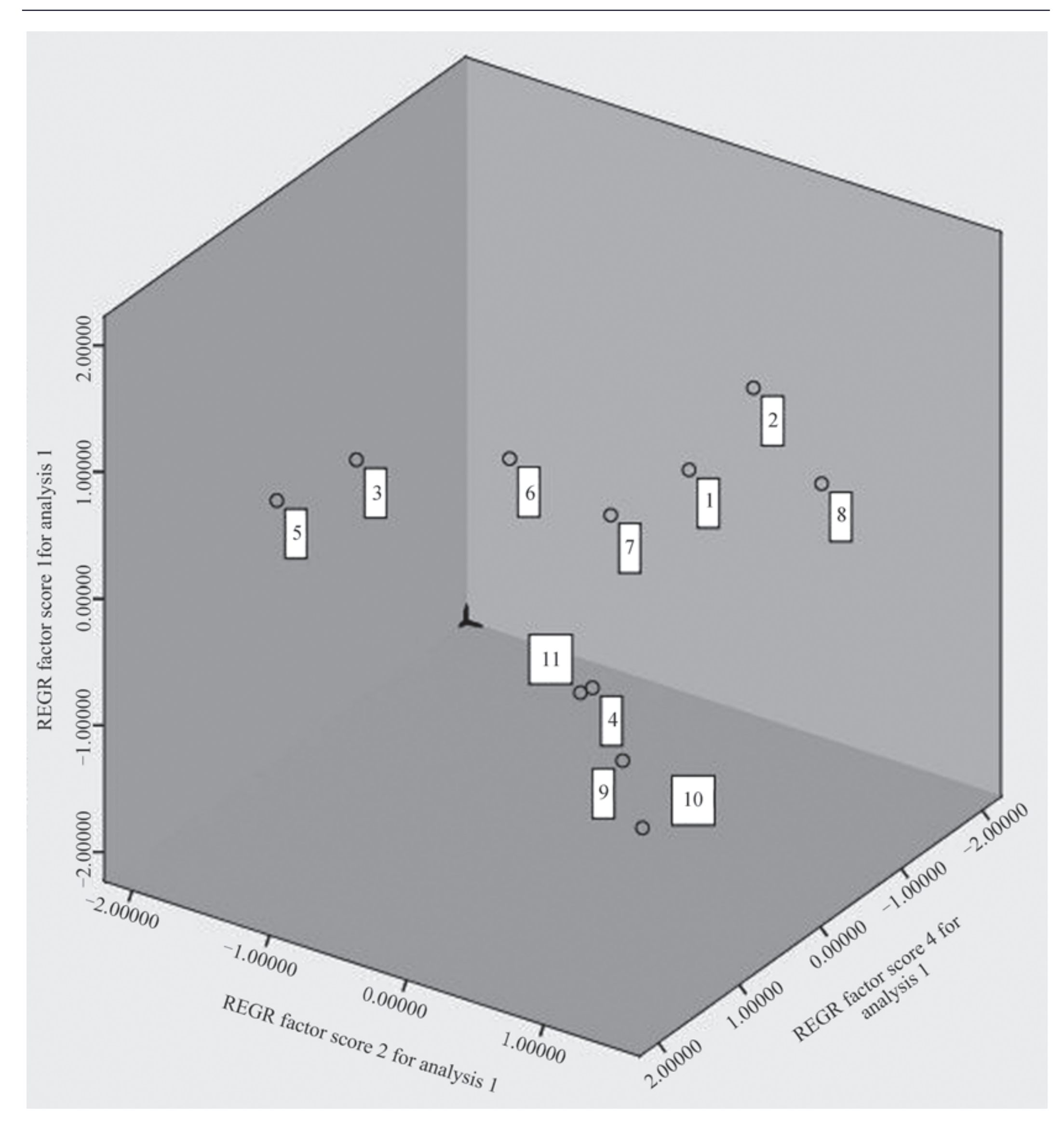
根据因子得分矩阵绘制出四个主成分因子的散点图（图三、图四）可以看出，在第一、二、三主成分因子所代表的变量作用下，吉林台一组、二组之间呈现一定分离的态势，吉林台一组与古墓沟组、苏贝希组、焉不拉克C组、察吾呼四号组呈现较近的距离；而吉林台二组、阿凡纳羡沃文化组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组呈现靠近趋势。在第一、二、四主成分因子构成的散点图中，吉林台一组、二组的距离重新拉近，同时呈现与天上北路组、焉不拉克C组、察吾呼四号组、苏贝希组接近的趋势，而古墓沟组比较接近阿尔泰阿凡纳羡沃组、米努辛斯克安德罗诺沃组、哈萨克斯坦安德罗诺沃组所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

综合分析，虽然应用平均数组间差异均方根和欧氏距离方法所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缺少鼻颧角和垂直颅面指数两个项目标准差所致；但聚类分析与主成



图三　第一、二、三主成分因子的3D散点图

分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吉林台一组、二组相比其他各古代组颅面形态特征迥异，呈现较为疏远的距离关系。而吉林台的两组居民之间相比其他组的古代居民表现出较为相似的形态特征，但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现象与形态特征分析研究结果颇为吻合[26]，因为吉林台一组、二组居民具有较为一致的颅型，致使两组聚为一类；而两组居民在面宽和颅面比值的差异又导致两组并没有紧密的聚合在一起。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两种方法进一步证实了吉林台两组居民具有相同的基因来源的可能性，而只是在各人群的构成比例上存在差异。



图四　第一、二、四主成分因子的3D散点图

2. 与铁器时代各古代组的比较

1）聚类分析

这一时期选取13组人群样本，同样选取15项主要线性、角度、指数值进行对比（表四）。依照表四数据计算出各古代组的组间差异均方根函数值和欧氏距离系数（表五、表六），利用欧氏距离系数矩阵绘制树状聚类图（图五）。

表四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铁器时代各古代组之比较

马丁号	项目	吉林台一组	吉林台二组	阿拉沟II&III组	察吾呼三号墓地组	索墩布拉克I组	石河子南山组	楼兰城郊组	昭苏组	营盘组	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	七河乌孙组	阿莱塞克—乌孙组	肯科尔匈奴组	天山匈奴组	蒙古匈奴合并组
1	颅长	175.93	178.43	184.20	180.40	177.50	178.30	193.80	179.90	183.60	177.80	181.90	178.00	179.30	178.10	183.70
8	颅宽	144.40	146.79	141.90	139.60	145.00	144.90	138.00	150.50	140.80	145.70	144.60	139.90	140.20	147.00	147.40
17	颅高	135.91	134.11	135.60	140.50	136.40	137.70	145.30	135.10	140.90	136.50	138.10	136.80	137.70	137.60	130.10
45	面宽	133.68	139.50	131.10	133.60	137.80	137.50	134.20	139.20	137.10	136.00	139.70	137.00	137.90	138.30	140.00
48	上面高	70.88	74.80	71.90	73.00	70.50	73.70	79.70	73.40	77.20	70.90	73.20	69.90	74.70	73.70	75.20
52	眶高	32.78	34.09	33.10	34.40	31.60	32.00	34.80	33.70	34.70	33.70	33.30	32.80	33.20	34.60	34.60
72	总面角	83.92	84.23	85.70	91.10	85.50	86.40	92.50	87.30	87.20	85.80	87.40	85.00	84.40	84.90	86.90
77	鼻颧角	138.51	138.86	142.20	139.20	138.00	145.40	132.20	140.80	139.50	143.60	143.70	145.30	143.30	139.40	145.60
8：1	颅指数	82.17	82.49	77.05	77.20	81.80	81.20	71.10	83.84	77.30	82.20	79.90	79.30	78.40	82.60	80.40
17：1	颅长高指数	77.12	75.14	73.59	78.50	77.00	76.80	74.90	75.17	77.30	76.90	［75.92］	77.80	76.00	77.40	［70.80］
17：8	颅宽高指数	94.38	90.99	95.52	100.50	94.10	94.50	105.40	89.76	100.20	92.30	［95.50］	97.80	96.90	93.80	［88.30］
48：17	垂直颅面指数	52.76	56.05	52.29	52.30	51.80	53.30	55.00	54.30	55.20	51.70	53.50	50.20	55.10	53.70	57.80
48：45	上面指数	53.46	53.73	54.98	55.10	49.00	50.90	59.20	52.68	54.20	52.10	52.70	51.20	54.40	53.30	54.00
52：51a	眶指数	82.83	83.09	84.86	86.90	80.40	82.10	90.20	82.10	87.10	83.70	87.00	81.90	85.10	85.20	81.50
54：55	鼻指数	48.36	47.12	47.90	48.40	48.80	47.10	45.20	49.35	45.30	49.90	49.30	51.30	49.00	49.20	50.10

注：由于原始材料的作者使用眶指数为52：51a，故本文在这一时期的对比中眶指数相应改变；七河乌孙组和蒙古匈奴组中［　］内数值为平均值计算所得，天山塞克乌孙和阿莱塞克—乌孙数据来自［27］。

由表五可以看出，吉林台一组古代居民在组差均方根函数值上与天山塞克—乌孙组居民最为接近，其次为石河子南山组、天山匈奴组、索墩布拉克Ⅰ组、阿莱塞克—乌孙、吉林台二组、肯科尔匈奴组、七河乌孙组、昭苏组、阿拉沟Ⅱ&Ⅲ组。而与营盘组、蒙古匈奴合并组关系疏远，与楼兰城郊组更为疏远。吉林台二组古代居民在组差均方根函数值上与天山匈奴组古代居民最为接近，其次为昭苏组，天山塞克—乌孙组、石河子南山组、蒙古匈奴合并组、七河乌孙组、索墩布拉克Ⅰ组、肯科尔匈奴组依次与之疏远，与阿拉沟Ⅱ&Ⅲ组、察吾呼三号组和楼兰城郊组较为疏远。

欧氏距离系数显示的亲疏关系与组差均方根函数值的结果有些差异，与吉林台一组古代居民最为接近的是索墩布拉克I组、天山塞克—早期乌孙，与天山匈奴组、石河子南山组、肯科尔匈奴组、阿莱塞克—乌孙组、昭苏组、阿拉沟Ⅱ&Ⅲ组、察吾呼三号组、营盘组、蒙古匈奴合并组依次疏远，关系最为疏远的是楼兰城郊组。吉林台二组古代居民与天山匈奴组、昭苏组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吉林台一组、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同样与楼兰城郊组关系最为疏远。

表五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各古代组的组间差异均方根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X	0.60	0.82	1.07	0.53	0.49	2.10	0.76	1.06	0.35	0.69	0.60	0.67	0.51	1.09
2		X	0.97	1.27	0.73	0.59	2.12	0.45	1.08	0.50	0.65	0.93	0.76	0.41	0.68
3			X	0.85	1.02	0.86	1.50	1.14	0.82	0.87	0.74	0.83	0.62	0.97	1.02
4				X	1.21	1.01	1.24	1.37	0.58	1.06	0.81	0.88	0.78	1.06	1.47
5					X	0.34	2.21	0.74	1.18	0.48	0.69	0.57	0.82	0.68	1.10
6						X	1.96	0.67	0.91	0.45	0.49	0.61	0.62	0.54	1.00
7							X	2.25	1.17	2.09	1.68	1.90	1.60	2.02	2.09
8								X	1.29	0.52	0.73	1.06	1.02	0.54	0.70
9									X	1.06	0.70	0.93	0.60	0.95	1.33
10										X	0.54	0.63	0.71	0.35	0.91
11											X	0.64	0.48	0.52	0.89
12												X	0.54	0.76	1.23
13													X	0.68	1.05
14														X	0.93
15															X

注：1. 吉林台一组，2. 吉林台二组，3. 阿拉沟Ⅱ&Ⅲ组，4. 察吾呼三号组，5.索墩布拉克Ⅰ组，6. 石河子南山组 7.楼兰城郊组，8. 昭苏组，9.营盘组，10. 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11. 七河乌苏组，12. 阿莱塞克—乌孙组，13. 肯科尔匈奴组，14. 天山匈奴组，15. 蒙古匈奴合并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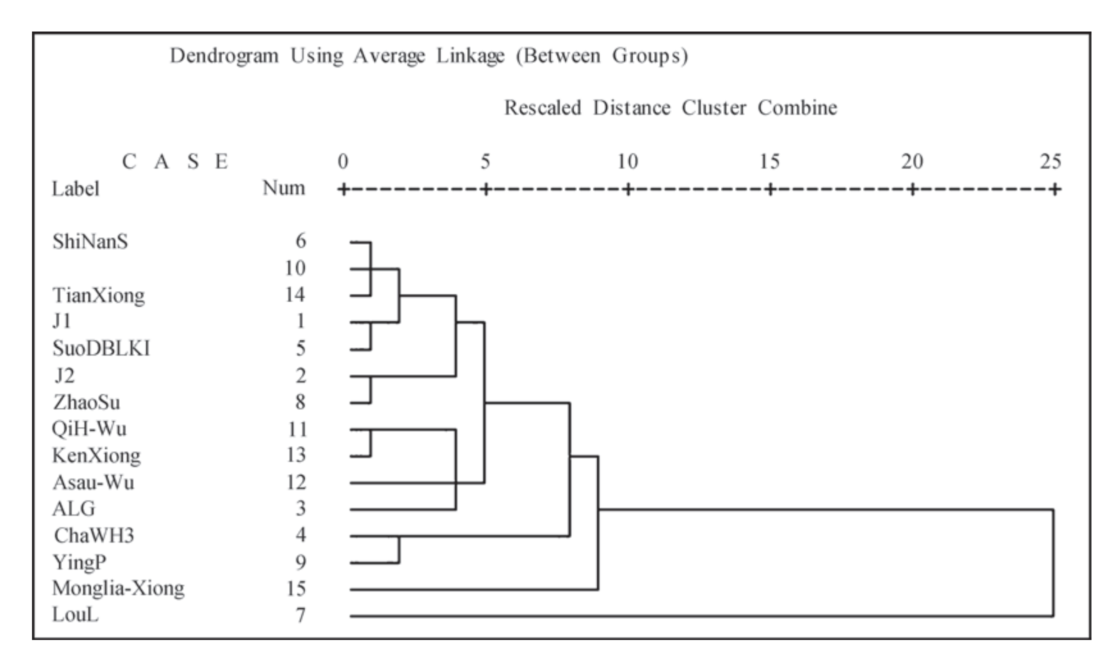
表六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各古代组的组间欧氏距离系数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X	2.51	3.12	3.71	1.85	2.53	8.15	3.06	4.13	1.86	3.15	2.90	2.85	1.94	4.72
2		X	3.87	4.79	2.62	2.67	8.28	1.75	4.22	2.51	2.89	4.10	3.07	1.70	3.08

续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3			X	3.10	3.78	3.25	6.41	4.21	3.29	3.11	2.90	3.26	2.67	3.54	4.36
4				X	4.19	3.83	5.30	5.17	2.27	3.96	3.19	3.49	2.90	3.77	6.14
5					X	2.32	8.38	2.74	4.39	2.08	3.05	2.82	3.27	2.22	4.60
6						X	8.07	2.71	3.66	1.62	1.99	2.40	2.26	2.20	3.86
7							X	8.77	4.71	8.46	6.92	8.11	6.80	7.75	9.01
8								X	4.92	2.28	2.95	4.30	3.88	2.07	2.89
9									X	4.27	2.82	4.09	2.48	3.55	5.57
10										X	2.22	2.42	2.71	1.76	3.84
11											X	2.81	1.90	2.08	3.78
12												X	2.39	3.31	5.07
13													X	2.57	4.27
14														X	4.05
15															X

注：1.吉林台一组二，2. 吉林台二组二，3. 阿拉沟Ⅱ&Ⅲ组二，4. 察吾呼三号组二，5.索墩布拉克Ⅰ组二，6. 石河子南山组二，7.楼兰城郊组二，8. 昭苏组二，9.营盘组二，10. 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二，11. 七河乌苏组二，12. 阿莱塞克—乌孙组二，13. 肯科尔匈奴组二，14. 天山匈奴组二，15. 蒙古匈奴合并组。



图五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铁器时代各古代组组间联系的树状聚类图

1. 吉林台一组　2. 吉林台二组　3. 阿拉沟Ⅱ&Ⅲ组　4. 察吾呼三号组　5.索墩布拉克Ⅰ组　6. 石河子南山组　7.楼兰城郊组　8. 昭苏组　9.营盘组　10. 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　11. 七河乌苏组　12. 阿莱塞克—乌孙组　13. 肯科尔匈奴组　14. 天山匈奴组　15. 蒙古匈奴合并组

通过图五可以更为清楚看出各组古代人群之间关系。总体来看，大部分的组别在0～5的刻度内完成聚合。0～5的刻度内主要有两个类群和一个小的聚类组，第一个类群中石河子南山组、天山塞克—乌孙组、天山匈奴组的关系密切首先聚合，吉林台一组与索墩布拉克Ⅰ组关系较近，吉林台二组与昭苏组距离较近聚合在一起。

石河子南山组古代居民与中亚两河类型最为接近，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古代居民具有古欧洲类型向中亚两河类型过渡的特点，天山匈奴组被归入了具有少量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索墩布拉克Ⅰ组古代居民为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昭苏组居民主体为中亚两河类型少数个体属于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间的过渡类型[28～31]；这一个类群中，各古代组具有显著的共性，即具有短颅特征，与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关系密切。另一个类群里面，七河乌孙组与肯科尔匈奴组首先聚合，在接近刻度5的位置上与阿莱塞克—乌孙和阿拉沟组聚合。七河乌孙组中的53例欧洲人种颅骨分为四个类型，即安德罗诺沃型、中亚两河类型、北欧型及地中海与北欧型之间的过渡类型，还有少量欧洲人种蒙古人种间混杂类型与个别蒙古人种头骨[32]；肯科尔匈奴组存在多例人工变形颅骨，既有欧洲人种特征又有蒙古人种特征，蒙古人种成分较为复杂，总体上颅型属于短颅类型，面部与突厥人接近；阿莱塞克—乌孙组居民接近欧洲人种中亚两河类型并有少量蒙古人种的混杂，阿拉沟Ⅲ组为中亚两河类型，Ⅱ组为中亚两河类型与地中海东支的过渡类型。这一类群各组居民中虽然仍表现为短颅特征，但表现人种成分构成复杂，不仅受到中亚两河类型的影响，同时也都受到地中海东支类型及多种类型的蒙古人种的影响[33]。

察吾呼三号组与营盘组距离较近，这两组居民具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杂特征并显现出欧罗人种特征弱化的特点。这两组与前面各组居民在5～10的刻度内聚合。[34]

蒙古匈奴合并组距离其他各组较远，这组居民多数形态特征与西伯利亚类型相似，但从突起的鼻骨等特征上来看或许包含某些不确定的欧罗巴人种成分。[35]

楼兰城郊组与其他各组距离最远，在刻度25的位置上完成与其他各组的聚合，这组居民被认为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36]

综上所述，同属索墩布拉克文化的石河子南山组、索墩布拉克组、吉林台一组、二组、昭苏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呈现一致性，主要特点是短颅化，与中亚两河类型居民比较接近；吉林台一组和二组在表现体质特征相似的同时，又呈现出差异性，表明这两组居民在人群构成上不一致；这一时期的古代居民人种类型关系逐渐清晰，各组间形态特征相似性与差异性初见端倪；宏观来看典型的古欧洲类型和地中海东支类型的居民在这一时期与伊犁地区的古代居民几乎不存在人群交流。

2）因子分析

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继续对这一时期的15组人群进行深入分析。表七列出前4个因子的特征根值、方差比及累计贡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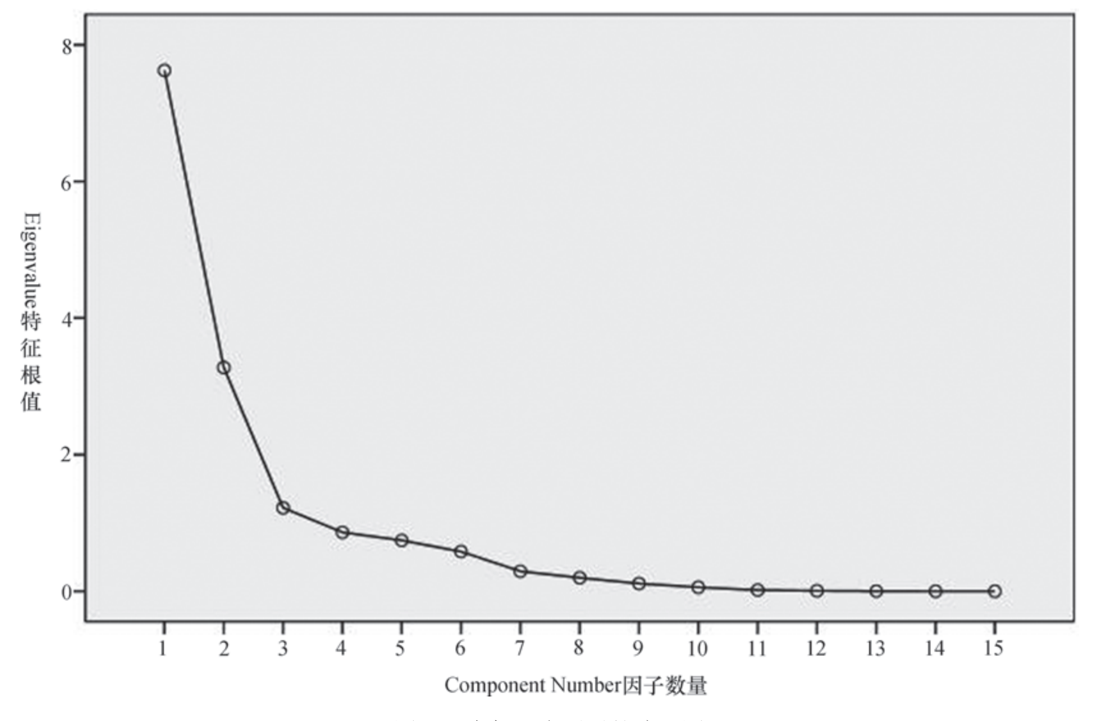
表七　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比及累计贡献率

成分	特征根值	方差贡献率%	累及方差贡献率%
Component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1	7.625	50.83	50.83
2	3.276	21.839	72.67
3	1.221	8.143	80.813
4	0.863	5.753	86.566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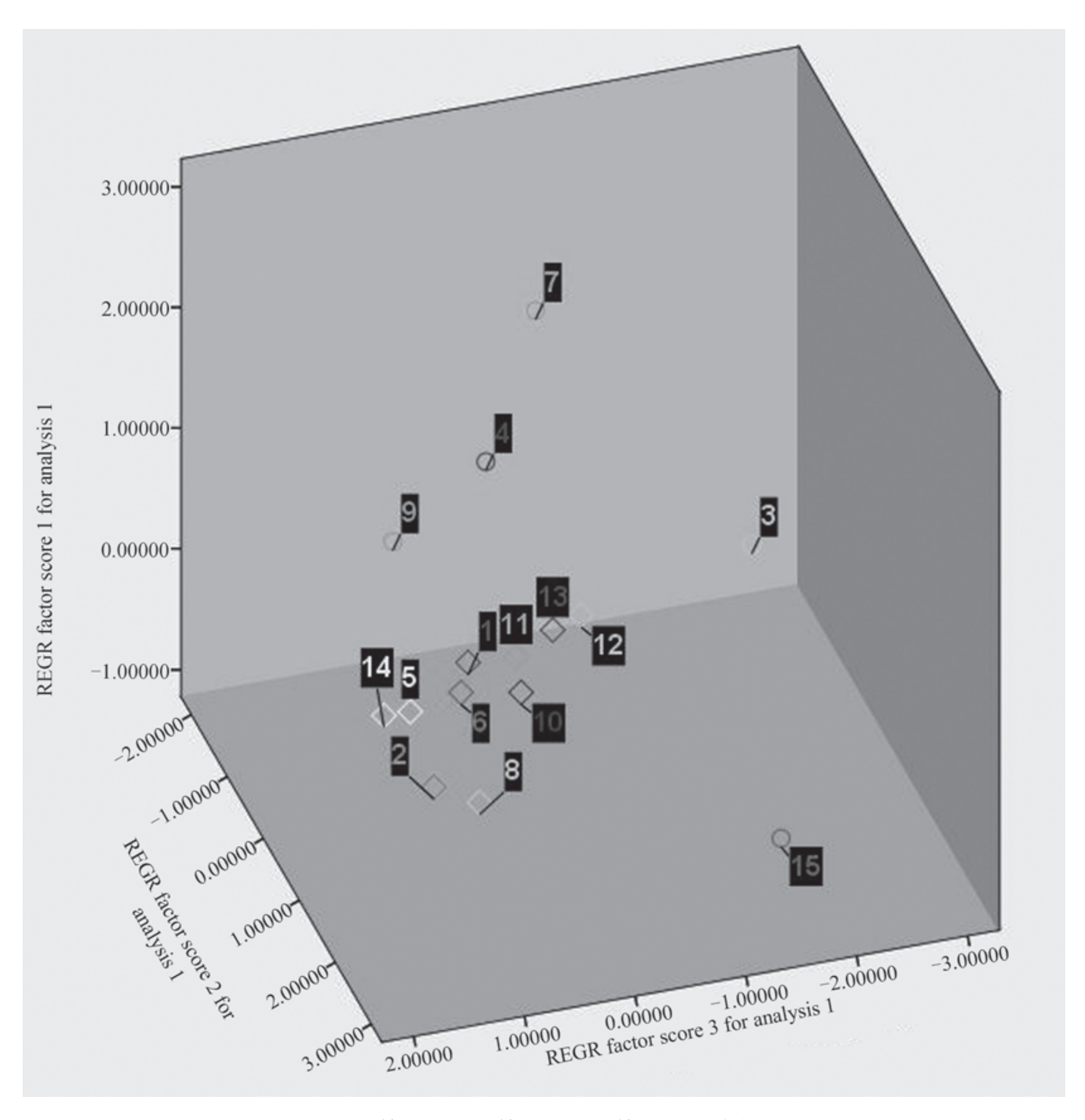
前三个主成分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80.81%，已经达到理想值；第四主成分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86.87%，但方差贡献率比较小仅为5.75%，表明第四主成分因子所代表的变量对解释原有变量贡献不大。可以认为前三个主成分因子已经包含原有15个项目所代表的变量，并就有较高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由图六碎石图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第一主成分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前三个点显示的高度十分陡峭，可以认为基本包含原有变量的绝大多数特征，而后的第四点已经开始趋于平缓，对解释原有变量帮助不大，故可以忽略。



图六　全部15个因子的碎石图

第一主成分因子最大载荷的原变量包括颅长、颅宽、颅高、上面高、总面角、鼻颧角、颅指数、颅宽高指数、上面指数、眶指数、鼻指数，基本代表了颅面部的主要形态特征，方差贡献率为50.83%；第二主成分因子最大载荷的原变量包括有面宽、眶高、颅长高指数、垂直颅面指数，基本代表面部宽窄和颅面比例，方差贡献率为21.84%；第三主成分因子载荷的原变量不够明显，又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结果显示各主成分因子信息不重合，但是主成分因子的载荷变量无法所对应的颅骨性状，且过于分散，故仍然使用无旋转的结果进行分析。根据因子得分矩阵绘制出的三个主成分因子的散点图（图七）。



图七　第一因子、第二因子和第三因子散点图

1. 吉林台一组　2. 吉林台二组　3. 阿拉沟Ⅱ&Ⅲ组　4. 察吾呼三号墓地组　5.索墩布拉克Ⅰ组　6. 石河子南山组　7. 楼兰城郊组　8. 昭苏组　9. 营盘组　10. 天山塞克—早期乌孙组　11. 七河乌孙组　12. 阿莱塞克—乌孙组　13. 肯科尔匈奴组　14. 天山匈奴组　15. 蒙古匈奴合并组

菱形图案所代表的各古代组居民表现为较近的空间距离，说明这些组古代居民在颅骨形态上呈现较为相似的体质特征；编号4、5所代表的察吾呼三号组和营盘组古代居民呈现相似的体质特征，远离菱形标记所代表的各组居民；3号阿拉沟组居民体质特征上呈现了欧罗巴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同时呈现部分地中海东支类型因素，所以呈现疏远的趋势；7号的楼兰城郊组和15号的蒙古匈奴合并组表现为游离在边缘，说明这两组古代居民体质特征与多数组别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与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居民较为相似，后者表现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及不确定的欧罗巴人种因素，所以这两组距离非常远。

三、讨论与结论

1. 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的关系

这一阶段，聚类分析研究表明吉林台一组、二组古代居民为一个独立的聚类，其体质特征呈现一定的相似性，总体上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群。从颅型上看，两组居民为典型的圆颅型。而其他组别无论是境外的阿凡纳羡沃文化组、安德罗诺沃文化组，还是塔里木北缘的察吾呼四号组、吐鲁番地区苏贝希组、罗布泊地区古墓沟组、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组、焉不拉克C组居民颅型明显偏长，多为长颅型或中颅型。颅型上的差异使得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其他各古代组人群表现出较远的距离，暗示吉林台组居民与其余各古代组具有不同的基因来源或者人群间几乎不存在交流。进一步观察，吉林台一组、二组虽然为一个小的聚类，但是这一个小聚类是在刻度5以外才完成；这一现象说明，吉林台一组、二组居民体质特征在相似的前提下又存在差异。在与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具有不同人群来源的群体比较时，吉林台一组、二组居民间体质特征的共性被突显出来，直接导致两组聚为一类。

吉林台库区墓葬从考古学文化上属于索墩布拉克文化[37]，对于索墩布拉克的文化面貌学界认可其为东西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来源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代表性的观点：① 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甘青地区的沙井文化都可能是其来源。② 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差异明显，基本不存在承继关系；偏室墓因素与中亚地区的萨帕利文化和瓦克什文化关系密切；陶器形制和彩陶纹饰与察吾呼文化密切；陶器上的杉针纹可能是受到西伯利亚的影响；仰身直肢葬俗的源头可能在卡拉苏克文化。③ 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形成与中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形成时间基本一致，目前还不能确定安德罗诺沃文化与索墩布拉克文化毫无联系[38]；石棺墓和仰身直肢的葬俗可能都来自卡拉苏克文化；除了与察吾呼文化的联系以外，彩陶和单耳器也可能来自苏贝希文化。总的看来索墩布拉克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文化而形成的，但在葬俗和文化形成大背景上，尤其需要注意与中亚地区和新疆伊犁河流域以东的地区诸文化之间的联系。

反观人类学材料，目前缺乏来自中亚地区早于索墩布拉克文化的青铜时代居民的对比数据。伊犁地区以北的人骨数据只有来自分布在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斯坦地区的阿凡纳羡沃、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从颅骨测量学研究的结果来看，吉林台组居民与以上组别居民呈现较远的形态距离，还不能证明人群间存在遗传关系。

基于测量学性状的多元统计分析表明，察吾呼组四号墓地和苏贝希墓地居民与吉林台一、二组居民具有较远的形态距离；但是从牙齿非测量性状反映的人群关系，可以看出吉林台组居民与洋海墓地居民间无显著差异，表明两组居民可能存在相同的基因来源或者存在较多的人群交流。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洋海组材料主要取自洋海一号墓地，苏贝希组材料主要来自苏贝希一号、三号墓地。这一结果可能暗示了吉林台组居民与苏贝希文化早期阶段居民存在人群交流，而年代稍晚阶段这种人群间交流在减少或中断。

与新疆境内年代较早的古墓沟组、天山北路组居民的对比结果显现，吉林台组与古墓沟组所代表的古欧洲类型居民和天山北路组所代表的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混合的“过渡类型”居民关系疏远，表明人群间几乎不存在遗传关系，或者具有不同的基因来源。在与新疆东部天山北路组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两者间较大的形态差异，故没有必要在更远的地区选取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古西北类型）居民材料来进行比对，因此本文研究中没有选取青铜时代甘青地区人骨材料。

2. 与铁器时代居民的关系

通过与铁器时代各个古代居民组的聚类分析，可以看出多数组别的聚类在10的刻度范围内完成，表明相关人群体质特征差异性不显著。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天山塞—早期乌孙组、天山匈奴组、七河乌孙组、肯科尔匈奴组、阿莱塞—乌孙组等在刻度5范围内已经完成聚类，此外在因子分析中这些古代组也呈现趋近的态势。这一结果暗示这些组别所代表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同属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各组关系更为紧密。这一阶段由于更多相似人群的介入，使得吉林台一组、二组之间的差异性“被放大”。这种差异性“被放大”的结果导致吉林台一组与索墩布拉克Ⅰ组直接聚为一组，吉林台二组与昭苏组聚类在一起；石河子南山组虽然没有与吉林台一组或二组直接聚合，但组差均方根函数值和欧氏距离系数均反映石河子南山组与吉林台一组距离更近，表明二者之间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这一结果在因子分析（图七）中具有更直观的表现。

吉林台一组居民中主体因素为中亚两河类型，短颅化是其最主要特征，同时面部相对窄而低；索墩布拉克Ⅰ组和石河子南山组均为欧洲人种的中亚两河类型，面部特征与吉林台一组也较相似；吉林台二组同样具有中亚两河类型的短颅化特征，但是相对吉林台一组其面宽明显增加同时伴有面高轻微增高的趋势，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因素混入可能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正是面部特征的改变使得二组居民与昭苏组居民呈现较近的距离。

吉林台一组、二组与察吾呼三号组、营盘组、阿拉沟组、楼兰组、蒙古匈奴合并组距离较远，显示出离散的趋势；而察吾呼三号组与营盘组相对较近，两组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均表现为既接近欧洲人种又接近亚洲人种。阿拉沟组中的Ⅱ组为中亚两河类型居民，Ⅲ组为中亚两河类型、地中海东支类型混合类型，这样的体质特征显然与吉林台组居民有明显差异，所以距离较远。楼兰城郊组被认为是地中海东支类型，蒙古匈奴合并组虽然含有不确定的欧罗巴人种因素但还是蒙古人种成分为主，所以这两组最为疏远并向不同方向离散。

综合来看，吉林台组居民与伊犁河流域的索墩布拉克文化所属各组居民体质特征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并与中亚地区各组居民呈现一定的相似性，表明这些人群交流较多或具有相同的基因来源；而与新疆其他地区的古代居民关系相对疏远，表明之间人群交往并不密切。

3. 多元同流

汉代以后中国文献开始逐渐涉及新疆（西域）各民族的情况，天山以北主要有月氏、乌孙，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行国”；月氏，原居住在“敦煌、祁连间”（今天新疆东部天山）[39]约在公元前177～前176年，大月氏被匈奴击败，迁至伊犁河流域，赶走了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塞人。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又被臣服于匈奴的乌孙人攻击，大月氏向西迁徙至阿姆河流域并征服大夏，建立都城（巴克特里亚，蓝氏城，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40]）居住下来。乌孙，与大月氏同在“敦煌、祁连间”，曾经被大月氏所攻，人民逃至匈奴的领地；公元前130年左右，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又攻打已经在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居住下来并游牧于此[41]。除月氏、乌孙以外还有44国，泛称“西域三十六国”，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各绿洲，这些小国多为城郭国，经济结构主要是畜牧兼农业。[42]

“乌孙国……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之种云”。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塞、月氏、乌孙、匈奴先后在特定的地域和时间内存在过接触，而且应该伴有人群间交流。这些人群（民族）通常被认为是游牧性质的，或者说至少存在部分游牧性质。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进行对比研究：索墩布拉克墓葬形制和陶器风格与哈萨克斯坦伊犁河流域同类型墓葬相近，其文化属性可能与伊犁河流域的塞克人有关[43]。石河子南山墓地属于索墩布拉克文化，墓葬中普遍见有羊骨和小铁刀，墓葬偏室皆开在竖穴北壁，与伊犁河下游哈萨克斯坦境内发掘的塞克—乌孙的墓葬和索墩布拉克墓葬完全一致[44、45]。昭苏土墩墓地表有封堆，墓室均竖穴，大部有木椁结构，死者仰身直肢；随葬品较贫乏，多为日用陶器，器形朴实简单制作粗糙，铁器比较普遍，多为小刀、锥类，伴有马、羊等骨骼。这些墓

葬可能与公元前后几个世纪占据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有关，其中个别材料也可能与塞克有关[46]。阿克布早沟墓地，从墓葬形制看基本延续了索墩布拉克文化特点；头北脚南的葬式，出土的长铁剑和铁刀，还有颅骨变形等现象与蒙古汉代匈奴墓比较相似，总体来看受到匈奴的影响较多[47]。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塞人除帕米尔以外地区体质特征基本一致，为短颅型、相当宽的面部，并具有面部扁平性质和中等突起的鼻等，主要为安德罗诺沃类型向中亚两河类型过渡形态，阿莱地区和哈萨克斯坦的塞人存在蒙古人种因素；帕米尔塞克为长颅、狭而高的面，极端突出的鼻及面部水平方向强烈突出，与地中海东支类型居民形态相似。乌孙以欧罗巴人种为基础，混有蒙古人种因素，人种构成复杂，但基本上为体质特征一致的民族人类学共同体；其中欧罗巴人种因素可能为安德罗诺沃型向中亚两河类型过渡或者中亚两河类型，蒙古人种因素还不确定为何种区域类型。[48]中亚匈奴存在地区差异：肯科尔匈奴具有不特别强烈的蒙古人种性质和轻度欧洲人种成分，而天山匈奴具有强烈欧洲人种成分，可能为少量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中亚两河类型。[49]

综合文献、考古资料来看，塞、乌孙、月氏、匈奴都曾经在伊犁河流域活动过，文化上存在交流，并存在向中亚地区流动的可能性。本文研究发现吉林台组居民与北疆及中亚铁器时代居民具有较近的距离，尤其与同为索墩布拉克文化居民及中亚地区塞克（天山、阿莱）、乌孙（七河、昭苏）、匈奴（天山、肯科尔）居民体质特征呈现一定的相似性，表明伊犁地区，的确如考古学研究和历史文献记载的那样，人群交流十分复杂。

虽然目前无法确认吉林台库区墓葬人群的族属，但通过对比发现，吉林台全组居民与塞、乌孙人群体质特征的确存在着趋同性，偏短的颅型，面部扁平性质和面部宽度均超过欧罗巴人种的一般变异范围。但通过分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吉林台二组的面部宽度、颅面比值增加的特点；这一现象在中亚其他乌孙居民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差异性是由于不同体质特征人群的混入造成的，单纯的欧罗巴人种面部一般较窄，蒙古人种因素的介入似乎可以更好的解释其面部特征的改变。考虑到种系特点、地理位置、经济生活方式等因素，这种高面、阔面的蒙古人种因素来自北亚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可能性更大。

现代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小人种有两个：南西伯利亚人种和乌拉尔人种。前者属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的一个中间类型，其蒙古人种的成分占明显的优势。他们一般具有中等深度的色素，中等硬度直发和比较发达的胡须，鼻根较高，鼻突度较大，眼部具有不十分发育的内眦皱褶（蒙古褶），面部既高且宽，并相当扁平，多为短颅类型，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为这一人种的典型代表；乌拉尔人种蒙古人种成分要少一些，内眦皱褶出现率不高，鼻子不很突出，鼻梁凹陷，面部较垂直，面宽中等，颧骨欠突出，显示出白海—波罗的海人种和北亚人种相混合的性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形成在公元前后甚至更晚的蒙古帝国时

期，是蒙古人大量西迁的结果，同时古代月氏、乌孙、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等对其形成产生过影响。[50]

吉林台库区墓葬无论是考古学文化上、体质特征上均属于一个整体，吉林台一组、二组均为短颅类型，与欧罗巴人种中亚两河类型居民接近，而吉林台二组居民中蒙古人种因素略有增加，并呈现出一些南西伯利亚人种特征。正是人群种系结构方面的原因，使得吉林台二组与昭苏组呈现出较为一致的体质特征形态。伊斯马戈洛夫曾提出乌孙体质特征是形成南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重要因素；韩康信先生也指出乌孙的体质类型可以较为合理的解释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开始。

任何人种的形成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形成同样是漫长而复杂的，期间有很多民族或者人群参与其中，不能简单地视为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大量西迁与欧罗巴人种混合，一蹴而就形成南西伯利亚人种。综合以往的观点及本文研究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做出如下大胆的推测：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以吉林台组尤其是吉林台二组居民为代表的欧罗巴人种中亚两河类型人群已经与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存在一定的人群交流并形成比较稳定的人类学群体，初显南西伯利亚人种体质特征；这样的群体游走于北疆及中亚地区并不断地与周邻人群发生基因交流，为南西伯利亚人种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遗传学基础。

致谢：本项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第三期专项经费的资助。

注　　释

［1］　郭物. 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

［2］　刘学堂. 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初步研究［J］. 新疆文物，2011（1）：85～105.

［3］　Alekseev V P, Debets G F. *Craniometry: Methodoloqy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M］. Moscow: Science Press, 1964.

［4］　邵象清. 人体测量手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5］　Baba H. Anthropology Course, Supplement 1［A］. *Anthropometry II, Human Skeleton*［C］. Tokyo: Yuzankaku Press, 1991.

［6］　Jantz, R. L. Craniofacial Anthropometry: Practical Measurements of the Head and Face for Clinical, Surgical and Research Use［J］. *Am. J. Phys. Anthropol*, 1999(109): 415~416.

［7］　张林虎，朱泓. 伊犁吉林台库区墓葬出土古代人类颅骨测量学性状的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93～308.

［8］　韩康信. 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J］. 考古学报，1986（3）：361～384.

［9］　韩康信. 哈密焉布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176～260.

［10］ 陈靓. 鄯善苏贝希青铜时代墓葬人骨的研究［A］.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C］.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237～254.

［11］ 韩康信，张君，赵凌霞. 察吾呼三号、四号墓地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A］. 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299～337.

［12］ 韩康信. 阿拉沟古代丛葬墓人骨的研究［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71～122.

［13］ 陈靓. 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出土人头骨研究［J］. 考古，2003（7）：87～98.

［14］ 陈靓. 石河子市南山古墓葬人骨种系研究［J］. 新疆文物，1999（1）：66～78.

［15］ 韩康信. 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J］. 人类学学报，1986（3）：227～242.

［16］ 韩康信，潘其风. 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特征的研究［J］. 考古学报，1987（4）：503～522.

［17］ 陈靓. 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23～341.

［18］ 阿凡纳羡沃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四组人骨数据转自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J］. 考古学报. 1986（3）：361～383.

［19］ B.B.金兹布尔格. 中部太南山和阿莱古代居民之人类学资料［A］. 苏联民族学研究所报告集・第21卷.［C］. 1954. 本文转引自韩康信・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 1993：378～413.

［20］ O.伊斯马戈洛夫. 七河乌孙的人类学特征. 哈萨克斯坦民族学和人类学问题（俄文）. 1962.本文转引自韩康信・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378～413.

［21］ B.B.金兹布尔格，E.B.日罗夫. 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塔拉斯河流域肯科尔卡达空拜墓葬出土人类学材料（俄文）［A］. 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汇集［C］. 1949. 本文转引自韩康信・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378～413.

［22］ 阿列克谢耶夫，格赫曼，杜门. 中央亚细亚古人类学概况（石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J］. 蒙古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 1987：208～241.

［23］ 韩康信. 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J］. 考古学报，1986（3）：361～384.

［24］ 魏东. 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5］ 韩康信，张君，赵凌霞. 察吾呼三号、四号墓地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A］. 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299～337.

［26］ 张林虎，朱泓. 伊犁吉林台库区墓葬出土古代人类颅骨测量学性状的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93～308.

［27］ 韩康信. 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J］. 考古学报，1986（3）：361～384.

［28］　陈靓. 石河子市南山古墓葬人骨种系研究［J］. 新疆文物，1999（1）：66～78.

［29］　韩康信. 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378～413.

［30］　陈靓. 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墓地出土人头骨研究［J］. 考古，2003（7）：87～98.

［31］　韩康信，潘其风. 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特征的研究［J］. 考古学报，1987（4）：503～522.

［32］　O.伊斯马戈洛夫. 七河乌孙的人类学特征. 哈萨克斯坦民族学和人类学问题（俄文）. 1962.本文转引自韩康信・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378～413.

［33］　B.B.金兹布尔格，E.B.日罗夫. 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塔拉斯河流域肯科尔卡达空拜墓葬出土人类学材料（俄文）［A］. 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汇集［C］. 1949. 本文转引自韩康信・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378～413.

［34］　陈靓. 尉犁县营盘墓地古人骨的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323～341.

［35］　阿列克谢耶夫，格赫曼，杜门. 中央亚细亚古人类学概况（石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J］. 蒙古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 1987：208～241.

［36］　韩康信. 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J］. 人类学学报，1986（3）：227～242.

［37］　羊毅勇. 新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J］. 新疆文物，1999（3～4）：116～126.学者在讨论伊犁地区考古文化时，一般以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发现的墓葬遗存为代表，称之为“索墩布拉克文化”，这一命名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陈戈先生将伊犁河以及周围一些地区大致相似的文化统称为“伊犁河流域文化”.而刘学堂先生则把这一类遗存称为穷科克上层文化.

［38］　邵会秋. 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临地区文化关系［D］.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

［39］　王建新. 古代月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N］. 中国文物报. 2003-02-28.

［40］　宋蜀华，陈克进. 中国民族概论［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536～542.

［41］　余太山. 塞种史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2］　周伟洲.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A］. “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49～61.

［4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J］. 考古，1999（8）：17～28.

［4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石河子市南山古墓群［J］.新疆文物，1999（1）：1～7.

［45］　郭物. 新疆天山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考古学文化研究［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5：114～117.

［4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

获［A］.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69～175.

［47］ 郭物. 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37.

［48］ 韩康信, 潘其风. 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特征的研究［J］. 考古学报，1987（4）：503～522.

［49］ B.B.金兹布尔格, E.B.日罗夫. 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塔拉斯河流域肯科尔卡达空拜墓葬出土人类学材料（俄文）［A］. 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汇集［C］. 1949. 本文转引自韩康信・塞、乌孙、匈奴、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A］. 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C］.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378～413.

［50］ 朱泓. 体质人类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Craniometrical Evidence for Population Affinity of Bronze Age through Iron Age in Northern Xinjiang

Zhang Linhu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two Jilintai groups to Bronze and Iron Age samples from Xinjiang Province, Kazakhstan, Mongolia, and Rus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 the two groups from Jilinati are mo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than to all the other samples. This implies a high degree of heterogeneity between populations during the Bronze Age. The early Iron Age results show a large amount of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admixture, changing the population makeup at Jilintai. The Jilintai group one sample had admixture from neighboring Caucasoid populations. The Jilintai group two sample had admixture from neighboring Caucasoid and Mongoloid populations. The Mongoloid populations were from north of Jilintai, possibly originating in Mongolia or Siberia. The Mongoloid populations were not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Key words: population affinity; craniometry; morphology; bronze Age

中国北方地区汉代仿木构墓葬建筑形制研究

赵明星

（河南省法学会，郑州，450018）

仿木构墓葬，是指模仿地上木结构建筑的形式而建造的墓葬，模仿的内容既包括木结构建筑主体部分的柱子、铺作，也包括属于木结构建筑装修部分的门、窗，以及顶、铺地、砌筑方式等情况。限于资料，本文主要讨论柱、铺作及门、窗等装修部分。

仿木构墓葬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有发现，本文所涉及的北方地区，是指中国东部季风区的北部，主要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大兴安岭、乌鞘岭以东的地区，东临渤海和黄海。在现行行政区划上，包括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省）、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天津市、北京市），以及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及江苏、安徽北部部分地区。

一、类型划分

根据墓葬仿木构部位和内容的不同，将两汉时期的仿木构墓葬划分为七个大的类型。

A型　仿木构石门。墓门或墓室门仿木门建造，一般包括门楣、门柱、门扉、门槛等，具备一座木门的基本形象。墓葬其他部位没有仿木构因素，且门上部不设明显的铺作、门楼等。依据主室的数量和平面布局方式的不同，分成五个亚型。

Aa型　方形单室。如江苏徐州市韩山M2，砖石结构，墓门有门额、门柱、门扉等，石扉中部刻铺首衔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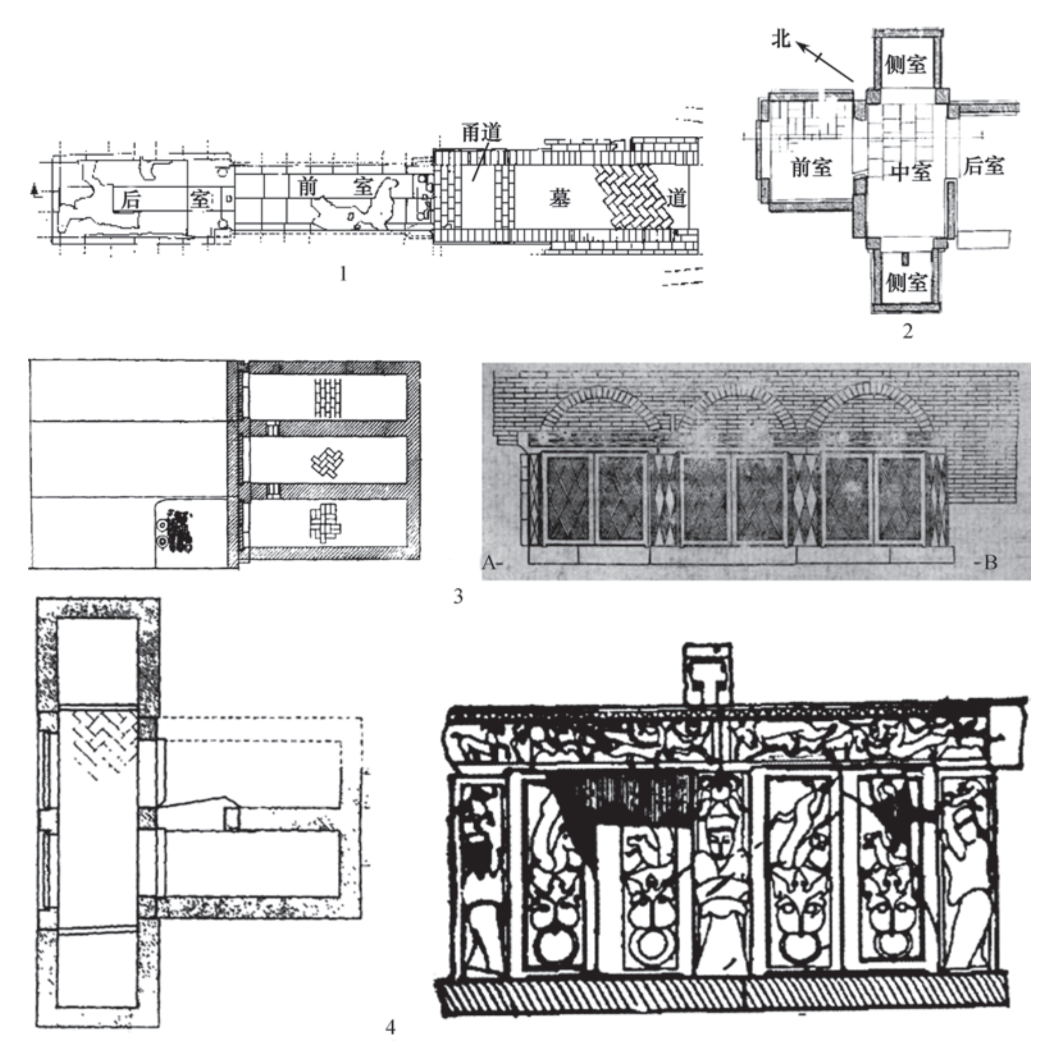
Ab型　前后方形双室。如陕西龚家湾M1，后室门为石门，有门扉、门楣、门枢等。前室长7.74、宽1.83米，后室长5.34、宽2.56、高3.1米（图一，1）。[2]

Ac型　前后方形三室，如江苏徐州利国画像石墓，中室东西各附一侧室。墓门有门柱、门楣、门枢、门扉等。中室四壁也都发现有门。前室长1.4、宽1.64、高1.4米，中室长1.36、宽2.2、高2米，后室宽1.92米（图一，2）。[3]

Ad型　并列方形多室。如河南唐河县湖阳镇画像石墓，三条墓道并列，各对应一个墓室，墓室与墓道之间砌门。墓门有三个门楣、四个门柱、六个门扉和门槛组成。中室与两侧墓室的隔墙前部，设有过道。墓室长4.76～4.8、宽1.42、高2.06～2.09米（图

一，3）。

Ae型　纵横混列方形多室墓。墓室至少有三个，左右横向排布与前后纵向排布两种形式共存。如河南南阳王寨墓，墓室由前、后两部分，前室为单室，左右各带一耳室，后室正中筑一道隔墙，分作并列二室。隔墙中有小门，连通二室。前、后室间并列二石门，分别对应一个后室。门上刻有铺首衔环。前室长3.2、宽1.8、高2.54米，后室长2.68、宽2.26米（图一，4）。[4]



图一　两汉时期A型仿木构墓葬图

1. Ab型：陕西龚家湾M1平面图　2. Ac型：江苏徐州利国画像石墓平面图　3. Ad型：河南湖阳画像石墓平面图及墓门　4. Ae型：南阳王寨画像石墓平面图及墓门

B型　仿木构柱子。墓葬在墓门、墓室内或墓壁上砌有柱子，具有木结构建筑中柱子的支撑功能或表达出此种意蕴，但其上不见铺作等构件。依据主室的数量和平面布局方式的不同，分成五个亚型。

Ba型　方形单室。如南阳二化M21，南壁和北壁分别有三立柱，上置两横梁，东壁中间只有一立柱，横梁两端分别放在南壁和北壁的东立柱上。墓室长3、宽2.9米。[5]

Bb型　前后方形双室。如陕西绥德延家岔画像石墓，后室前壁正中竖一断面为长方形的石柱，将门洞平分为南北并列的两个门道。前室边长3、高2.8米，后室长3.6、宽2、高2米（图二，1）。[6]

Bc型　前后方形三室。如山东枣庄市桥上画像石墓，前室近方形，室内四角各有立柱石，其上各有横梁石。长1.9、宽1.62、高1.85米。中室长2.66、宽2.36米，后室长3.7、宽2.2、高2米。[7]

Bd型　并列方形双室。如河南南阳辛店熊营墓葬，两个并列的墓室，以过梁和梁柱间隔。墓室长3.16、宽2.87米。顶门梁柱下面垫有石块（图二，2）。[8]

Be型　混列多室墓。如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大型横穴崖洞墓，全长83.5、宽33米。共有15个墓室，其中2号室内凿一檠天柱，略偏于室西北一侧，断面近方形。3号、7号、9号室内均有柱，为支撑墓顶而建（图二，3）。[9]

C型　仿木构单斗。铺作只设置一个栌斗，不见栱及散斗等其他构件。依据墓室数量和排布形式，分成四个亚型。

Ca型　前后方形双室。如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墓室壁砌柱，上砌栌斗，栌斗上砌枋、蜀柱斗子。枋、阑额及铺作皆以墙砖略砌出轮廓。前室长2.37、宽1.86、高1.94米，后室长3.36、宽1.54、高1.7米（图三，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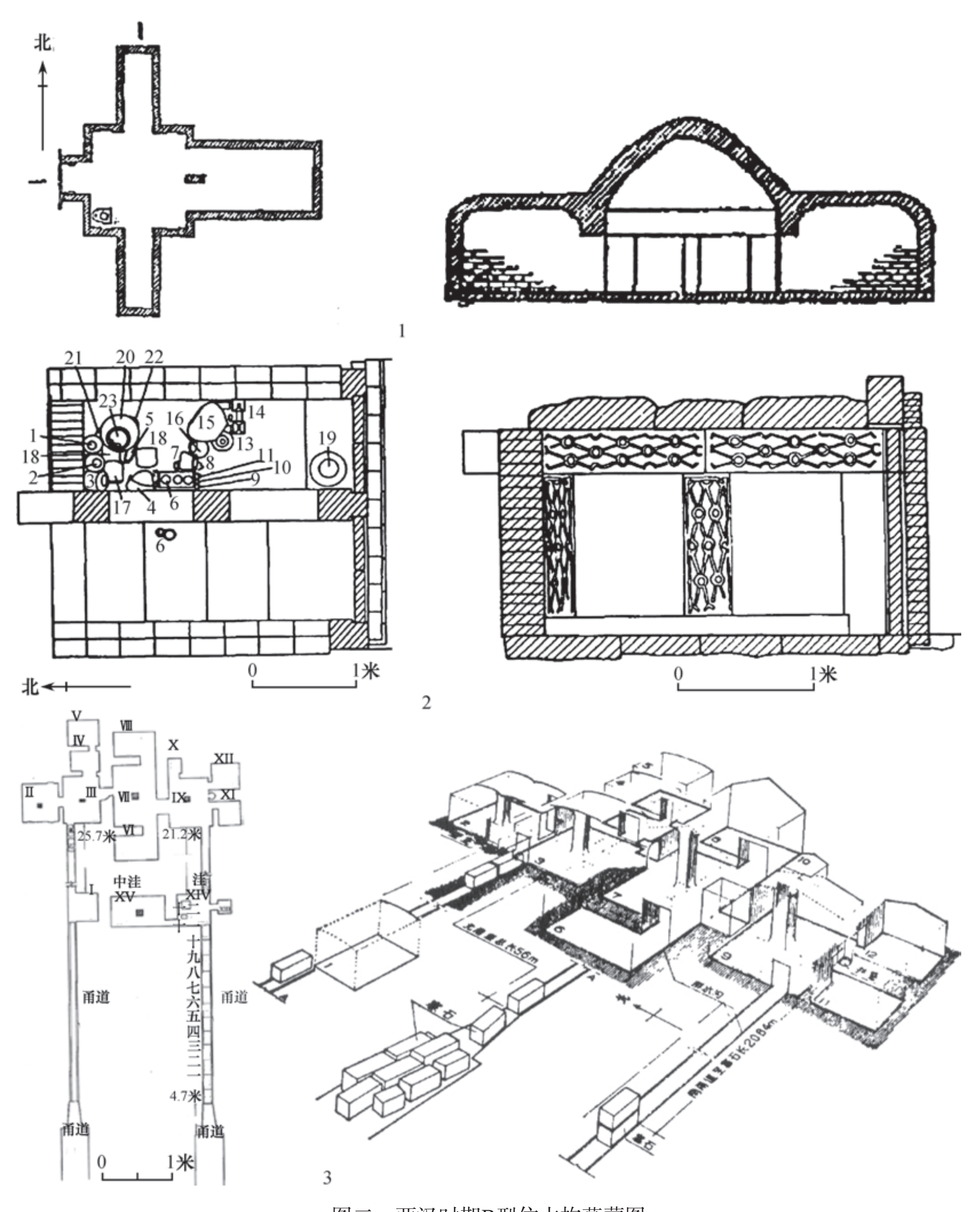
Cb型　前中后三室。如江苏徐州贾汪古墓，长7.43、宽2.73米。前室与中室之间有地栿，地栿中间的石柱承托横额，下有础，上有栌斗（图三，2）。[11]

Cc型　并列多室墓。如辽宁锦县右卫乡昌盛汉墓，墓室中央有石柱两个，将墓分为南北二室。两柱上分别有栌斗一个（图三，3）。[12]

Cd型　混列多室墓。如河南南阳安居新村汉画像石墓，两前室两后室。墓门由南北两门柱、一斗形梁柱、两门楣、两垫石组成。斗形梁柱由斗和正方体立柱组成。后室长2.74、宽2.52、高1.92米（图三，4）。[13]

D型　仿木构一斗二升。铺作有栌斗和栱组成，栱上有两个散斗。

如江苏昌梨水库汉墓M1，前室中央立一柱，上为过梁。过梁下部砌一斗二升铺作，上托替木，中间有蜀柱。前室长2.08、宽1.5、高2.1米，后室长1.95、宽3、高1.53米（图三，5）。[14]又如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前室中有八角形擎天柱，上承铺作为一斗二升，两散斗之间加蜀柱。栱两侧整体呈两断式，有明显弯折。中室与前室结构相同，栱距离缩短，无蜀柱。后室支柱与中室略同，没有栌斗和柱及础，唯有一倒斗上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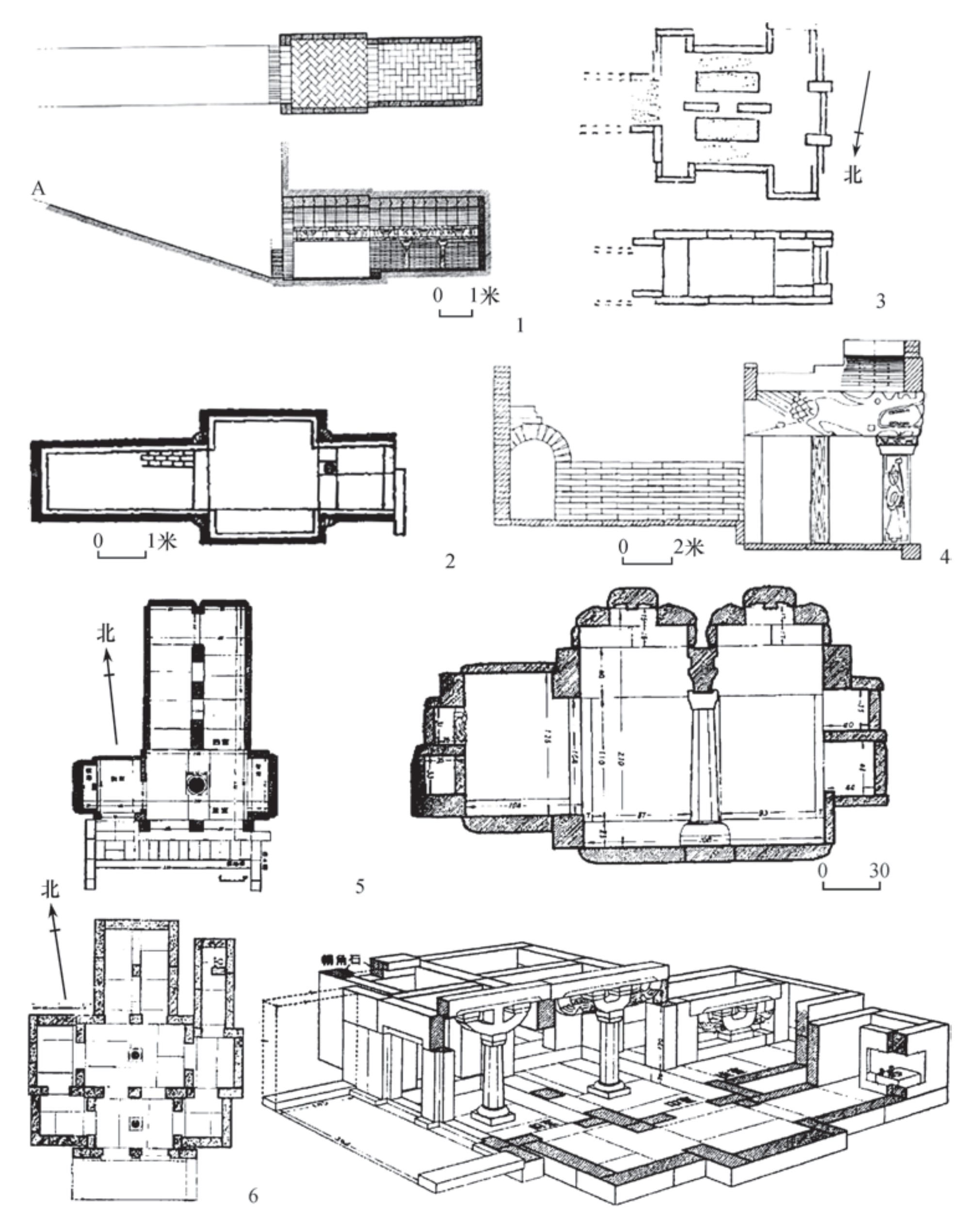


图二　两汉时期B型仿木构墓葬图

1. Bb型：陕西绥德延家岔画像石墓平、剖面图　2.Bd型：南阳辛店熊营墓葬平面图及墓门　3. Be型：江苏铜山龟山二号墓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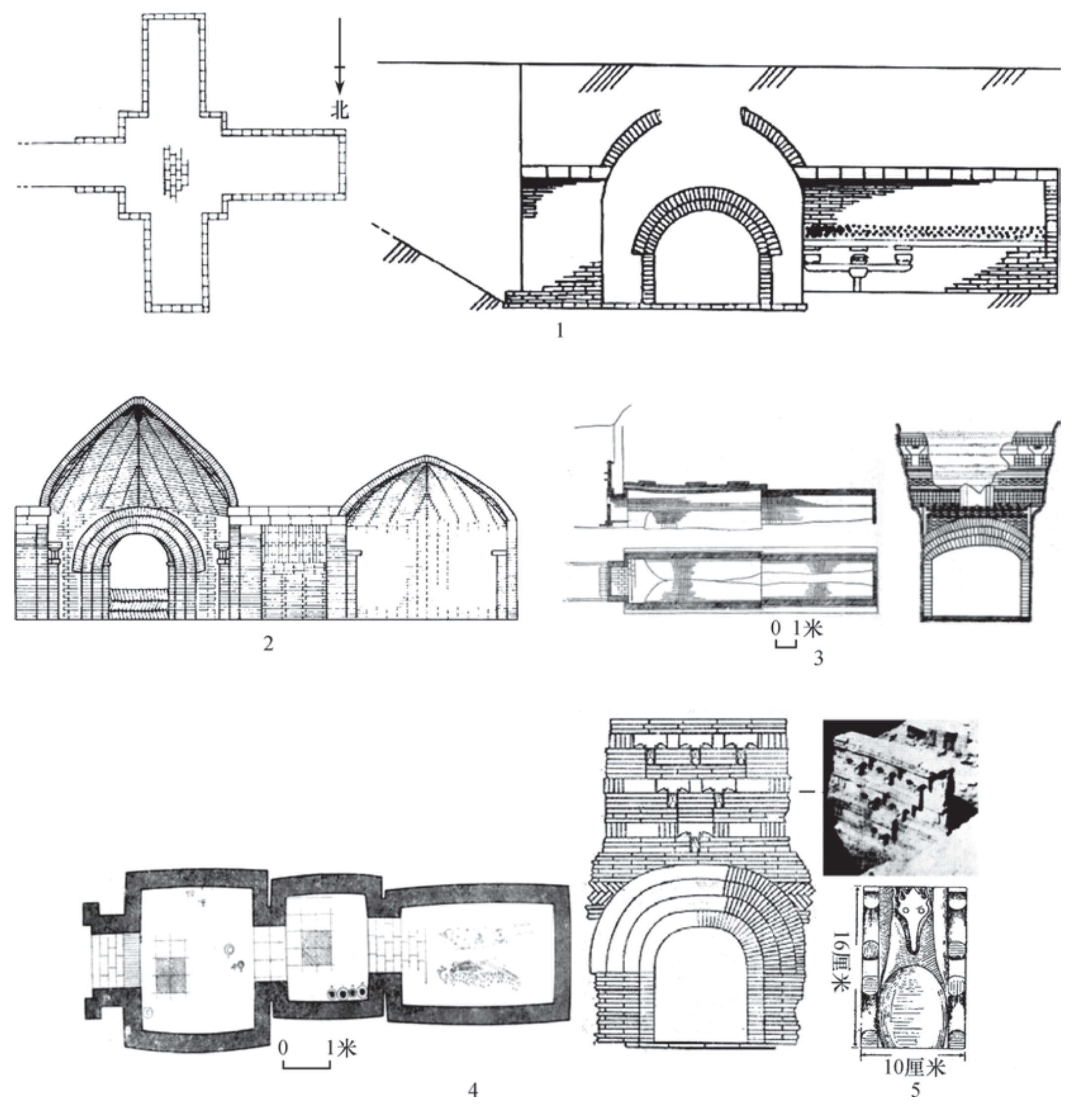
二升（图三，6）。[15]

E型　仿木构一斗三升。如陕西渭南市区94渭铁校东汉M1，由墓道、过洞、过厅及左右耳室和后室构成。后室前端砖砌铺作，一斗三升。其上为三排仿木椽叠伸。前厅长3.05、宽3、高2.75米，后室长2.8、宽3.6、高1.8米（图四，1）。[16]



图三　两汉时期C、D型仿木构墓葬图

1. Ca型：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平、剖面图　2. Cb型：江苏徐州贾汪墓平面图　3. Cc 型：辽宁锦县右卫县昌盛汉墓平、剖面图　4. Cd型：河南南阳安居新村M2剖面图　5. D型：江苏昌梨水库M1平面及前室剖面图　6. D型：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平、剖面图



图四　两汉时期E、F、G型仿木构墓葬图

1. E型：陕西渭南铁校M1平、剖面图　2.F型：山西永济上村东汉墓剖面图　3.Ga型：潼关杨氏墓群M2平、剖面及门楼图　4.Gb型：甘肃下河清M1平面及门楼图　5.酒泉下河清M1门楼坐斗

F型　仿木构假门。墓壁砌有仿木构假门，没有仿木构柱子及铺作等其他仿木构因素。如山西永济上村东汉壁画墓，有前室、后室和侧室。后室方形，边长3.21、高4.18米。四壁辟券门，西、北二门为假门（图四，2）。[17]

G型　仿木构门楼。墓门上砌筑门楼，不见其他仿木构样式。多为分层建造，每层砖雕力士、铺作、猛兽、阁门或者素面砖，这些要素多为交替进行砌造。根据主墓室数量分成两个亚型。

Ga型　前后双室。如潼关吊桥杨氏墓群M2，门楼有圆形、菱形图案，菱角牙子、

檐、瓦垅、斗子蜀柱等。前室长7.4、宽2.7、高2米，后室长6.46、宽2.4、高1.5米（图四，3）。[18]

Gb型　前中后三室。如甘肃酒泉下河清M1，券门洞上有平卧、丁卧、侧卧等砖砌檐壁，立面附加三层雕刻的铺作，在栌斗处浮雕马头。攒当处和下两排的两旁侧卧砌砖面彩绘人物走兽。前室长2.48、宽2.74、高3.68米，后室长3.28、宽1.94、高1.85米。东汉（图四，4、5）。[19]

二、分　　期

以纪年墓为主要参考资料（表一），结合其他类型墓葬在资料报道中所确定的年代，将汉代的仿木构墓葬划分为以下五期。

表一　汉代纪年及年代较明确仿木构墓葬表

墓葬名称	类型	年代	其他	资料来源
河南保安山M1	Aa	前154～前144	16侧（耳、角）室，回廊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江苏徐州北洞山	Ab	前175～前128	耳室、廊，厕所	《文物》1988（2）
河南保安山M2	Ab	前123	34侧室，回廊，前庭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
河南柿园汉墓	Aa	前136～前118	8侧室，木门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江苏铜山龟山M2	Be	前115	15室	《学报》1985（1），《考古》1997（2）
河北满城刘胜	Ab	前113	两耳室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河北满城M2	Ab	前118～前104	两耳室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河南唐河湖阳镇	Ad	前94～前74		《中原文物》1985（3）
南阳赵寨砖瓦厂	Ab	前87～前49	二侧室	《中原文物》1982（1）
河南冯君孺人墓	Ae	天凤五年，18	窗	《河南文博通讯》1978（3），《考古学报》1980（2）
洛阳金谷园	Bb	地皇年间，20～23	窗、石门	《文物资料丛刊》1985（9）
偃师姚孝经	Ab	永平十六年，73		《考古》1992（3）
山东肥城	Ca	建初八年，83	石板封门	《文物参考资料》1958（4）
陕西四十里铺田鲂	Ab	永元四年，92		《考古与文物》2002（3）
陕西绥德苏家岩	Ab	永元八年，96		《文物》1983（5）
陕西绥德延家岔M2	Ab	100年左右		《考古》1990（2）

续表

墓葬名称	类型	年代	其他	资料来源
陕西绥德延家岔	Bb	100年左右	方柱	《考古》1983（3）
陕西绥德黄家塔M6	Bb	永元十六年，104		《考古与文物》1988（5、6）
陕西米脂M4	Ab	永初元年，107		《文物》1972（3）
山东泗水南陈	Ac	汉安元年，142	耳室	《考古》1995（5）
东汉彭城相缪宇	Ca	元嘉元年，151	石门、回廊	《文物》1984（8）
洛阳唐寺门M1	Ab	永康元年，167		《中原文物》1984（3）
山东梁山M1	Ab	永康元年，167	柱八角，础雕兽	《考古》1988（11）
安徽宿县褚兰M1	Ae	建宁四年，171	直棂窗	《考古学报》1993（4）
山西离石马茂庄	Ca	建宁四年，171	石门，柱六角、八角	《文物》2009（11）
山西离石M14	Aa	熹平四年，175	屋檐，八角柱	《文物》1996（4）
河北望都M2	Ac	光和五年，182	中5侧8室	《望都二号汉墓》
江苏班井村	Ca	桓、灵，167～189		《考古》1997（5）

第一期：西汉前期。大约从高祖到昭帝，即公元前202年到前74年。发现有A、B类型，包括Aa、Ab、Ad、Bb、Be等亚型。其中：Aa、Ab型各5座，Ad型2座，共12座；Bb、Be型各1座，共2座。在大的类型上，A型居首；从亚型上看，依次为Aa、Ab、Ad、Bb、Be。

第二期：西汉后期。大约从宣帝到新莽，即公元前73年到公元8年。发现有A、B类型，包括Ab、Ad、Ae、Bb、Be等亚型。除2座Ab型外，其他均为1座。较之第一期，新出现了Ae型，不见Aa型。共有类型中，Ab型数量略有减少，其他变化不大。

第三期：新莽时期。王莽执政时期，即8年到25年。发现有A、B、C型，包括Aa、Ab、Ac、Bb、Be、Cd等亚型。其中：Aa、Ab型各3座，Ac型2座，共8座；Bb型2座，Be型各1座，共3座；Cd型1座。从大的类型上看，依次为A、B、C；从亚型上看，依次为Aa、Ab、Ac、Bb、Be、Cd。较之第二期，新出现了Aa、Ac、Cd等类型，不见Ad、Ae类型。共有类型数量变化不大。

第四期：东汉前期。大约从光武帝到安帝，即25年到125年。发现有A、B、C、D、E型墓葬为主，包括Aa、Ab、Ae、Bb、Bd、Ca、Cc、Cd等亚型。其中：Aa型7座，Ab型19座，Ae型12座，共38座；Bb型4座，Bd型1座，共5座；Ca型2座，Cc型1座，Cd型2座，共5座；D型1座；E型1座。从大的类型上看，依次为A、B、C、D、E；从亚型上看，依次为Ab、Ae、Aa、Bb、Ca、Cd、Bd、Cc。较之第三期新出现了D、E及 Ae、Bd、Ca、Cc等类型，不见Ac、Be等类型。共有类型中，Ab型数量大幅增加，其他变化不大。

第五期：东汉后期。大约从顺帝到献帝，即126年到220年。发现有A、B、C、D、F、G等类型，包括Aa、Ab、Ac、Ae、Ba、Bb、Bc、Be、Ca、Cb、Cc、Cd、Ga、Gb等亚型。其中：Aa型3座，Ab型 11座，Ac型21座，Ae型3座，共38座；Ba型2座，Bb型2座，Bc型1座，Be型2座，共7座；Ca型12座，Cb型8座，Cc型1座，Cd型4座，共25座；D型4座；Ga型2座，Gb型4座，共6座；F型1座。从大的类型上看，依次为A、C、B、G、D、F；从亚型上看，依次为Ac、Ca、Ab、Cb、Aa、Ae、Bc、Cd、Ba、Bb、Be、Cc。较之第四期，新出现了G、F及Ac、Ba、Bc、Be、Cb等类型，不见E及Bd等类型。共有类型中，Aa、Ab、Ae等数量有所减少，Ca型有所增加，其他共有类型数量变化不大。

综上，将汉代仿木构墓葬的演变规律简要概括如下（表二）。

第一期，类型和数量不多，主要为仿木构石门，多为单室、前后双室。

第二期，类型和数量较少，见有仿木构石门和柱子，前后双室略多。

第三期，类型和数量较少，以仿木构石门为主，多为前后双室和单室。仿木构单斗和前后三室墓在此期始出现。

第四期，数量和类型均有明显增加，以仿木构石门为主，多前后双室和混列多室墓。仿木构一斗二升和一斗三升铺作均在此期始出现。

第五期，数量和类型进一步增多，以仿木构石门和单斗为主，多前后三室和前后双室墓。仿木构假门和门楼均在此期始出现。简单的长方形门簪开始出现。柱子呈现多样化，多角形柱增加，出现龙、兽浮雕柱。

表二　汉代仿木构墓葬分期表

类型	A型					B型					C型				D型	E型	F型	G型	
期别	Aa	Ab	Ac	Ad	Ae	Ba	Bb	Bc	Bd	Be	Ca	Cb	Cc	Cd				Ga	Gb
一	√	√		√			√			√									
二		√		√	√		√			√									
三	√	√	√				√			√				√					
四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总体上，虽然汉代仿木构墓葬始终以仿木构石门为主要类型，但是在演进过程中，仍然表现出了明显的仿木构墓葬数量和类型的逐步增加，仿木构因素复杂程度的不断加大，以及墓室数量的逐步增多和排列复杂性的逐步加大等演变规律。

三、分　　区

首先看一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仿木构墓葬的分布情况。

第一期，在河南、河北、江苏北部、陕西、北京等地有发现。初步统计，河南有Aa型4座，Ab型2座，Ad型1座；河北有Ab型2座；江苏有Aa、Ab、Ad、Be型各1座；陕西有Bb型1座。

第二期，在河南、陕西、山东、安徽北部等地有发现。初步统计，河南有Ab、Ad、Ae、Be型各1座；山东有Ab、Bb型各1座；安徽有Ab型1座。陕西有1座前后双室墓，前后各壁作仿木构筑，呈现铺作雏形，但具体形制不明。

第三期，在河南、陕西、安徽北部、甘肃等地有发现。初步统计，河南有Aa型2座，Ab型1座，Ac型2座，Bb型2座，Be、Cd型各1座；陕西有Ab型1座；安徽有Ab型1座；甘肃有Aa型1座。

第四期，在河南、江苏北部、陕西、山东、辽宁等地有发现。初步统计，河南有Aa型1座，Ab型3座，Ae型11座，Bd型1座，Ca型1座；江苏有Aa型1座，Ab型2座；山东有Ab、Ae型各1座，Bb型2座，Cd型1座，D型1座；陕西有Aa型5座，Ab型13座，Bb型2座，Ca型1座，E型1座；辽宁有Cc、Cd型墓葬各1座。

第五期，在河南、河北、江苏北部、陕西、山东、安徽北部、甘肃、辽宁、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地有发现。初步统计，河南有Aa型1座，Ab型4座，Ac型8座，Ba、Be型各1座，Ca、Cd型各2座；河北有Ac型3座，Ae型1座；江苏有Ab、Ac型各3座，Ae 型1座，Ba、Bb型各1座，Ca型5座，Cb型2座，Da型1座；山东有Aa型1座，Ab型4座，Ac型5座，Bc型1座，Be型1座，Ca型2座，Cb型6座，Cd型1座，Da、Db型墓葬各1座；安徽有Ae型1座；山西有Aa 型1座，Bb型1座，Ca型2座，Db型1座；陕西有Ac型1座，Ca型1座，Da型1座， Ga型2座；甘肃有Gb型4座；辽宁有Ac型1座，Ca型2座，Cc、Cd型各1座。内蒙古和宁夏均发现有仿木构墓葬，但具体形制不明。

根据地缘关系和墓葬类型的分布及历史演进情况，将汉代的仿木构墓葬分作如下几区：第一区，中东部地区，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及安徽、江苏北部等地；第二区，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地；第三区，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地区。

第一期时，仿木构墓葬主要发现于中东部地区，以单室和前后双室仿木构石门墓葬为主。西部地区发现有仿木柱的前后双室类型。东北地区没有资料见诸报道。

第二期时，仿木构墓葬基本发现于中东部地区，主要为仿木构石门和柱子两种类型，见有前后双室和混列多室及并列多室等。其他两个地区的资料相对匮乏。

第三期时，仿木构墓葬主要发现于中东部地区，以仿木构石门为主，墓室多为前后双室，仿木构单斗类型的墓葬在此时于此区始见。西部地区见有单室、前后双室的仿木构石门墓葬。东北地区不见有材料报道。

第四期时，仿木构墓葬的范围有所扩展，中东部地区仍以仿木构石门为主，混列多室墓流行，出现了一斗二升铺作。西部地区，以前后双室仿木构石门墓为主，出现

了一斗三升铺作。东北地区，主要流行仿木构单斗类型，墓室主要为并列多室和混列多室。

第五期时，仿木构墓葬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东部地区仍以仿木构石门为主，但其他类型也有所增加，前后三室墓流行。出现门簪、额上雕羊等情况，柱子式样增多。西部地区出现并较为流行仿木构门楼，墓室以前后三室或双室为主。东北地区多仿木构单斗形式，墓室以多室为主，出现假门。

总体上看，中东部地区是汉代仿木构墓葬的核心区域，主要体现在出现时间早、数量多、类型变化明显。且与上文分期相比，演变规律基本上可以与中东部地区相对应。也就是说，中东部地区代表了汉代仿木构墓葬的演变趋势。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仿木构墓葬出现时间略晚，数量较少，总体上要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两个地区也有自身特色，尤其是西部地区，仿木构一斗三升和门楼均是率先在这个地区出现，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开拓创新意识。

四、建筑技术

1. 门

带有仿木构石门的墓葬除了A型外，在其他类型中也或有涉及，这里一并讨论（图五，1～3）。

墓葬中使用石门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墓门；其二是室门。多数门均包括门柱、槛、楣、扉等，少数只使用门扉或不使用门扉。石门均为板门，多双扉，单扉偶见于侧室门。并列墓室中，墓室多与墓门相对应，每个墓室对应一座门。几座门并排建在一起，见有二门、三门者，均双扉，门之间以柱相隔。

石门每扉大多高1～2米，宽0.4～0.9米，个别小者高0.8、宽0.49米，大者高3、宽1.8米，但比较少见。总体上看，高：宽比大多为3∶2至3∶1，而尤以2∶1左右为多，使得门整体近方形。有的高0.9、宽0.75米，宽度较大，呈横长方形，比较特殊。

双扉上多对称刻铺首衔环，有的环内饰双鱼、人面等。但扉上不见门钉。门簪已有发现，唯墓例较少。簪多位于门楣或门额上。数量3个或5个，多为横长方形，等距排列。多出现在东汉晚期。如后士郭M2门额上砌四个突出的小型长方形柱，方柱间凿成长方形凹槽；打虎亭M1门额上砌三个横长方形簪，之间凿二条横长方形凹槽，而M2后室门额上有五个横长方形门簪。门楣上多有雕刻，山东地区比较流行刻羊头。

部分门在楣和槛上开有门臼，呈圆形，其内还见有铁质门柱包角，呈矩尺形或长方形。

假门发现较少，见有一例，砌设在墓壁上，进深0.31、高1.2、宽1.23米，门上有高0.41、长1.85米的门楣。

2. 窗

砌窗的墓葬发现不多，主要在墓室隔墙上砌设，使相邻两室可以通透。见诸报道的，如江苏铜山周庄一号墓，后室前壁开一直棂窗；洛阳金谷园汉墓，后室南壁中间安门，两旁设窗，陶质；冯君孺人墓，隔墙由两窗楣、三窗柱和两窗台构成，东窗高68、宽58厘米，西窗高68、宽56厘米。其他还有永城保安山汉墓，后室东西向隔墙上有三个长方形窗户；江苏邳州山头M21，两门道之间的石板透雕有一窗棂，宽52、高35厘米。

总的来看，此时的仿木构窗发现较少，作法简单，多为直棂窗，具有使墓室相通的意味。而严格地讲，在隔墙上留有的窗洞，并不能称之为窗，虽然也具有使墓室相通的功能（图五，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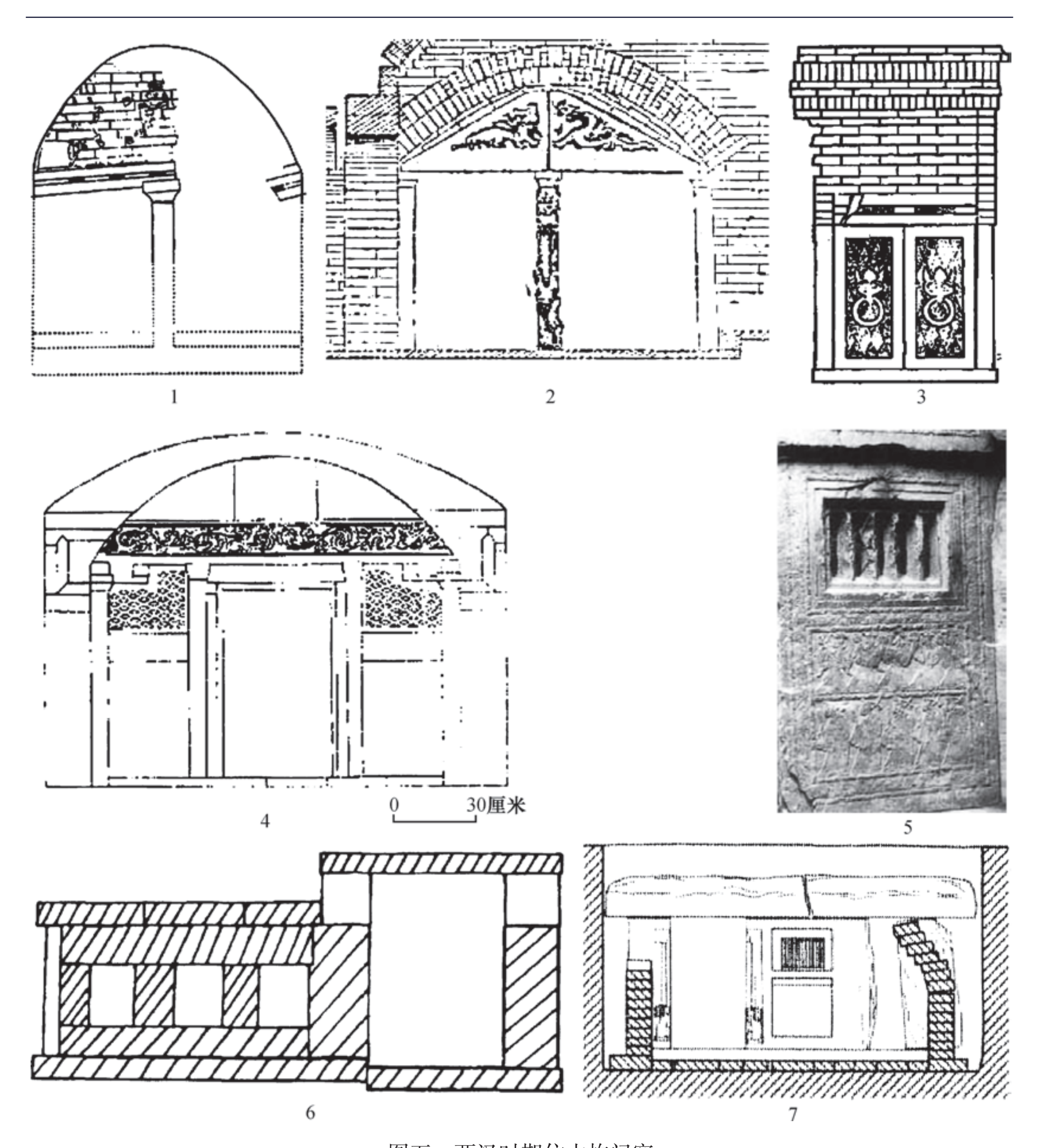
3. 柱和础

柱子多石砌，主要用于多个并列门之间或门两侧、墓室中间、墓室隔墙及墓壁四角。用于门之间者，多一根。门两侧者，均一侧一根。墓室中间者，有1至4根不等。1根者或称都柱，2根或3根的具有分割室内空间的作用。用于隔墙者，有1根至3根不等。用于墓壁者，多于四角各1根，加固作用明显，支撑作用较弱。室壁中部个别也有加砌壁柱的（图六、图七）。

柱或以石雕刻，或以砖砌筑。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菱形，以及不规则多边形、六角、八角、十六角形，8条或16条瓜棱柱、盘龙柱、雕兽柱等。见有柱身浮雕六条龙，头上尾下，相互缠绕。其中，以方形居多，其他样式均不多见，且出现时间都比较晚，集中于我们划分的第五期，也就是东汉后期。以石筑者，多将柱础、柱身、斗用整石凿成。分筑者，柱上下多有圆形榫卯与栌斗、柱础扣合。

柱高小者仅57厘米，大者可达1.66米，边长或直径16～41厘米不等。如方形柱，边长16厘米；长方形柱，宽26、厚21厘米；八边形柱，左右面边长19厘米，前后面长11厘米，其他四面长7.5厘米。从柱径比分析，最小者仅1∶1.13，但并不是柱子矮，而是方形柱子的长度过长，充分体现出了柱子的支撑作用。最大者达1∶10。介于二者之间的多有发现。柱子中有的有收分，收分比例见有3.75%、6.4%、9.2%等，最甚者高达约18%。较特殊者柱宽14、高9厘米，斜刹达2厘米，柱径高比约1.56∶1，收分2.22%。

础有长方形、方形、圆台形、圆柱形、覆盆式、覆斗式等，有的刻成绵羊形状或雕人像、石狮、龟座等。部分雕出榫卯，以与柱连接。圆台形柱础，底径40～41、顶径18～32、高15～28厘米。方形础，边长21～42厘米。长方形础，长25～48、宽24～40厘米。覆盆式础，上部为圆形，高13～20厘米，下部为正方形，边长32～48厘米。有的柱子下面不用柱础，而是垫石、铁片，也具有础的功能。



图五　两汉时期仿木构门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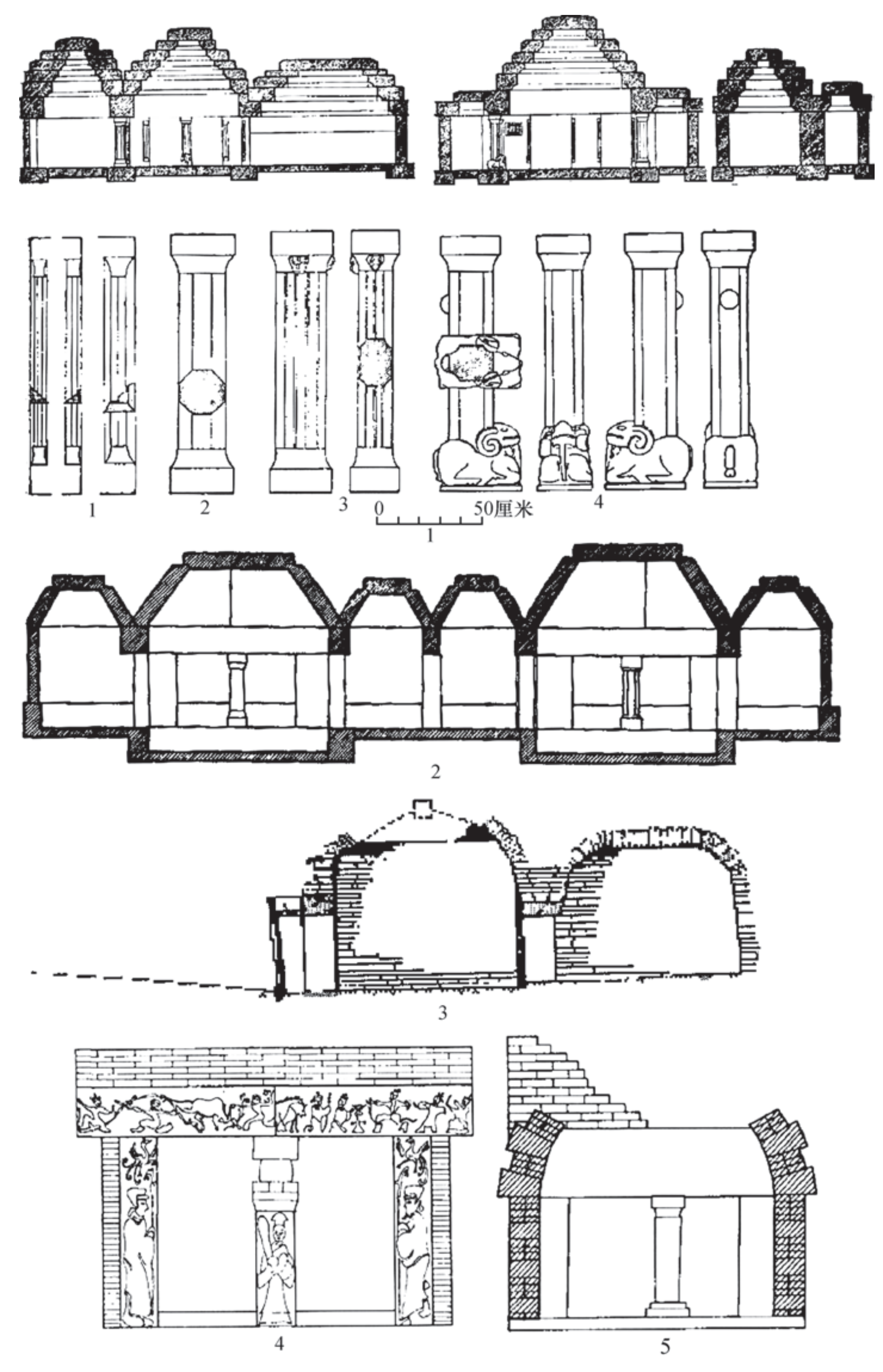
1. 河南密县后士郭M3石门　2. 洛阳M30.14石墓门　3.偃师杏园东汉墓石墓门　4. 洛阳金谷园汉墓后室门窗
5. 安徽宿县M1南后室门旁窗户　6. 永城保安山汉墓后室窗户　7. 江苏邳州山头M21窗户

4. 铺作

（1）栌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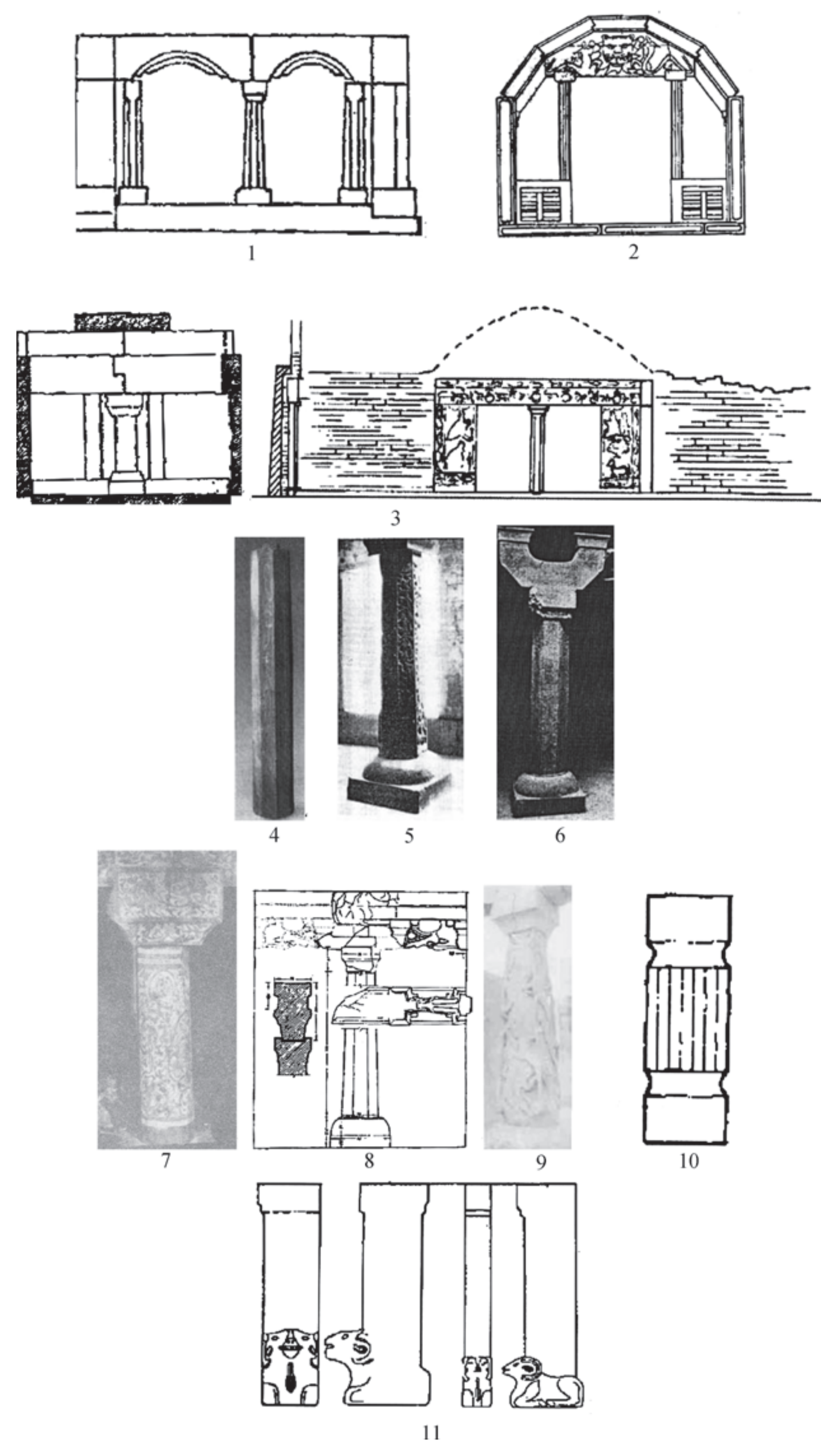
一般直接砌于柱子上，按形制有以下几种情况（图八）。

其一，用一长条形石，长35.5～116、宽20～36、高16～50厘米不等。与柱高比大者1∶8，小者仅1∶2.26，其他有1∶3.27、1∶3.35、1∶3.75、1∶7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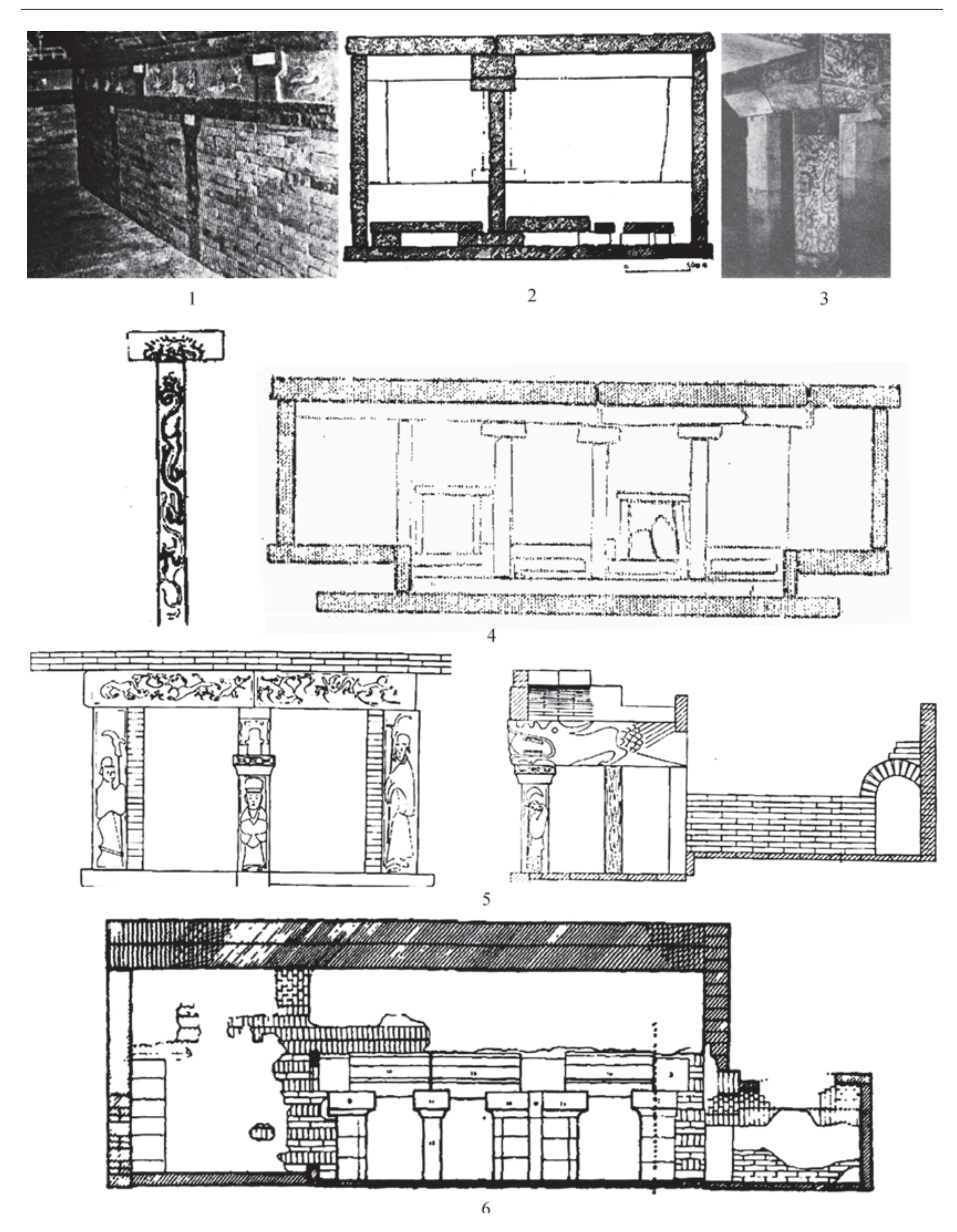
图六　两汉时期仿木构柱

1. 徐州青山泉白集画像石墓中室立柱　2. 山东东阿邓庙M1八棱柱和M2圆柱　3 .陕西绥德黄家塔M6前后室间T形石柱　4. 河南南阳刘洼村汉墓门柱　5.江苏班井前后室隔梁立柱



图七　两汉时期仿木构柱

1. 山东莒县沈刘庄前室八棱柱　2. 河南偃师新莽壁画墓前中室之间八面体棱柱　3. 山东邹城车路口汉墓前室立柱　4. 山西马茂庄建宁四年前室石柱　5.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前室八角柱　6. 沂南画像石墓中室柱　7. 后士郭M2后室门洞十六边形柱　8. 江苏昌梨水库M1前室中柱复原图　9. 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前室盘龙柱　10. 江苏邳县白山故子M1后室石柱　11. 江苏徐州茅村画像石墓前后室间倚柱



图八　两汉时期仿木构栌斗

1. 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后室东壁栌斗　2.辽宁辽阳旧城东门里壁画墓石柱栌斗　3. 河南密县后士郭M1后室门洞中柱及栌斗　4. 辽宁辽阳棒台子M2石柱栌斗　5. 河南南阳安居新村M2斗形梁柱　6. 河南密县后士郭M2柱及栌斗

其二，呈方台形，上宽25～31、下宽18～21、高15～21厘米。与柱高比小者1∶4.3，大者1∶8.47。如栌斗高15、上部边长28、下部边长21厘米，栌斗凿出榫卯与柱相连，榫高3.5、径7、卯深5厘米。

其三，有耳、欹两部分，耳、欹高度比约为4∶3，与柱高比约1∶2.29。

其四，有平、欹两部分，二者近高，欹有幽，与柱高比约1∶4.5～1∶8。如斗平部边长43、高10厘米，欹边长35、高9厘米。铺作与柱比1∶7。

其五，有平、欹两部分，二者高度比约2∶1，与柱高比约1∶4。欹部两侧叠涩内凹。

其六，有耳、平、欹三部分，三者高度比见有0.6∶1∶0.8，或0.75∶1∶1。与柱高比约1∶4.1。如见有上宽44、下宽25、厚18、高25厘米的栌斗，耳长44、宽13、深5厘米。

其他斗与柱高比尚有1∶1.67、1∶2、1∶3、1∶4.1、1∶5.5等情况存在。栌斗下宽一般都大于柱宽，个别二者相等。有的栌斗在耳部雕刻一鸟，欹部置一对称的鸟，比较特殊。个别墓室壁上砌斗和斗子蜀柱，二者以枋相隔，上下交错等距排列，支撑功能较弱，装饰意味较重。

（2）一斗二升

一斗二升上面有无替木，中间有无蜀柱的情况均有发现。个别栱两端附有倒衔的半身龙和龙首，使栱加长了。有的栌斗无耳，平、欹高比约2∶1。有的在栌斗上置横栱，上面二个散斗，在每个散斗上又各加一横栱或各托二升，形制较特殊（图九，1～4）。

（3）一斗三升

见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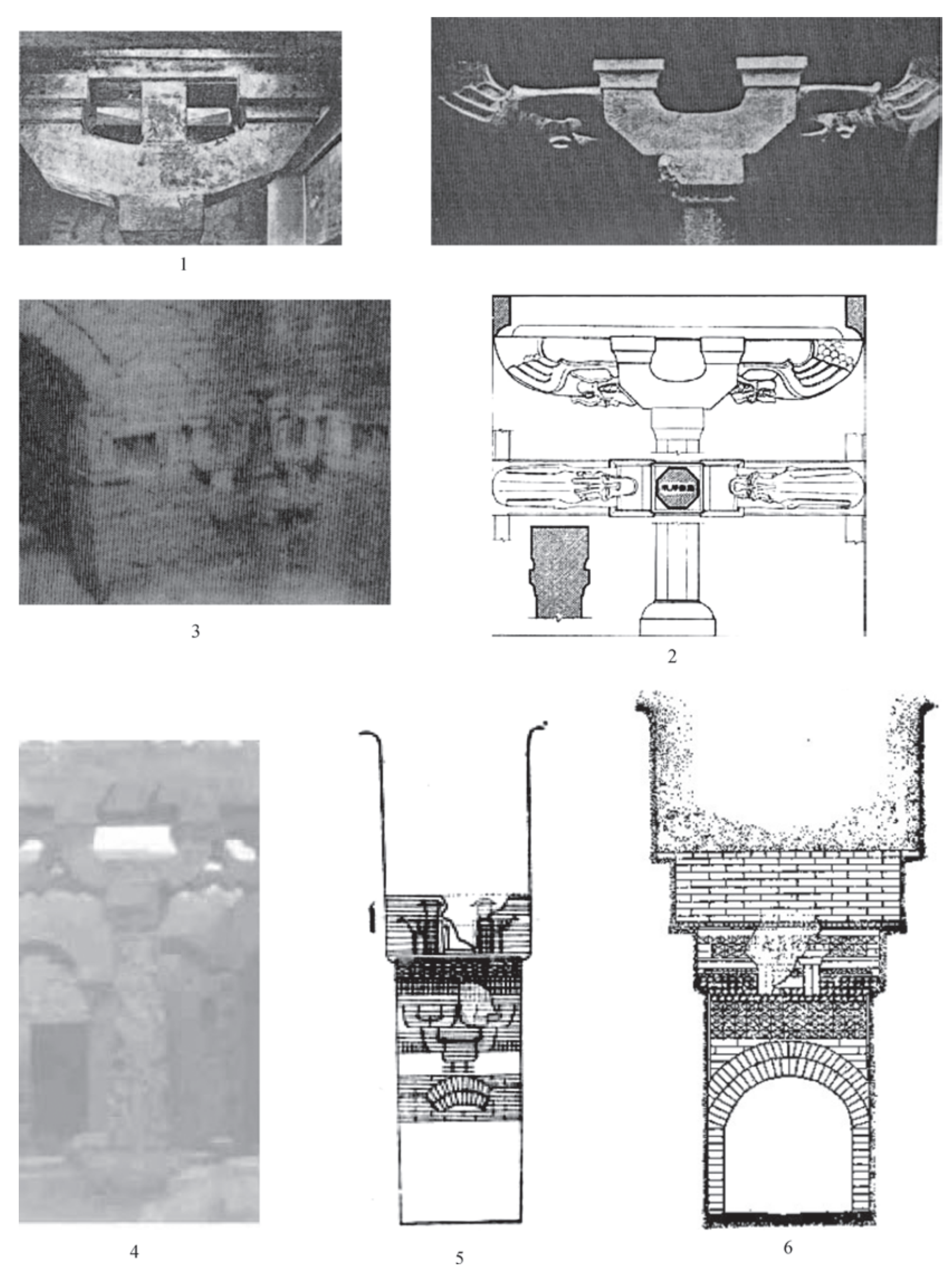
其一，栌斗无平，上宽与下宽比约3∶2，耳与欹高度比约2∶1。栱两端弧曲，上部平直，无栱眼。齐心斗似两斗欹上下扣合。栱高与长的比约1∶20，与栌斗高比1∶2，与散斗高比1∶2。散斗无耳，平、欹高度比约2∶1。欹无幽，斜收。齐心斗和散斗上方各有一砖，长与散斗近等。此处为替木的位置，但与散斗并未连接。上平砌一层砖，作枋。铺作与柱高比约2∶1。

其二，栌斗有耳、平、欹三部分，高度比约2∶1∶2，欹无幽。砌于阑额之上，位置与阑额下的柱子和两侧半栱相间分布。铺作与柱高比约1∶5。

（4）梁与蜀柱

梁，一般位于墓门上方或隔墙、立柱上方。有的过梁雕龙，龙头突出。有的过梁雕兽，兽首朝外侧，与身子的比例明显偏大。柱、梁之间，或放置铁片。

蜀柱，有的隔墙呈工字形，工字上放两个小蜀柱。有的壁龛上层中间置短蜀柱，还雕刻栌斗。这可能是仿木构龛的最早形式与发现。在仿木构门楼上，有的砌有斗子蜀柱，作为装饰之用（图九，5、6）。



图九　两汉时期仿木构铺作

1.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前室柱上一斗二升　2. 沂南画像石墓中室柱上一斗二升　3. 山西芮城石门村前室转角八棱柱及一斗二升　4. 山东临沂吴白庄前室盘龙柱一斗二升　5. 陕西潼关吊桥杨氏M6门楼上斗栱　6. 陕西潼关吊桥杨氏M7门楼上蜀柱

五、汉代仿木构墓葬的建筑成就

梁思成先生曾言，“汉朝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新兴的封建制度已经确立，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争已经结束，强大的中央集权已经建立，经济、文化得到巨大的发展。汉朝的军事力量也日益增大，遏止了北方的匈奴的南侵，开拓了通向中亚西亚的交通结，促进了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一切都为建筑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21]但可惜的是，目前现存两汉时期的建筑所存不多，木结构的更是无一留存，使得我们对这一时期建筑技术和成就的研究，较多地依赖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而后者一般都依赖于大量出土的陶质建筑明器、画像石以及部分地面留存的汉代建筑。如鲍鼎等先生的《汉代建筑式样与纹饰》、张家泰先生的《汉代建筑若干问题试析》、刘叙杰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22]等，均有叙说。但根据墓葬本身进行系统讨论的尚不多见，因此，这里根据上文的相关论述，作进一步地叙述。

1. 丰富多彩的建筑式样

如前文所述，汉代仿木构墓葬中，除了装修稍似简略外，其他如柱、础、铺作等的样式，非常丰富。有些开创了后世制作方式、方法的先河，在后世的仿木构墓葬和木结构中仍有发现；有些则具有独一无二的时代特征。

前者，如双扉板门，施铺首衔环，额上施门簪；数量较少的窗，也有后世长期沿用的直棂窗；柱子以方形、圆形为主，个别有盘龙柱，盘龙柱在北宋时期的山西晋祠圣母殿中还能见到，也见于北宋官修的《营造法式》；铺作如一斗二升、一斗三升等，尤其是后者，更是常见，也见于《营造法式》。而难得的是，在个别墓葬的转角部位，出现了依壁砌筑的铺作，其方式、方法均为后世所依。方形、覆盆础等后世也屡见不鲜，而覆盆础在唐宋时期更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替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宋金时期，而直到明清时期，在河南的地方建筑中仍有使用。皿板的使用，则至少沿用到南北朝时期。仿木构门楼上的雕刻，虽然各时期均有所变化，但在券门之上砌筑门楼的做法，也自东汉始。栌斗的耳、平、欹结构，相沿至清。

后者，与墓室对应的并排墓门；板门上的门簪制作方法和式样；六角、十六角、瓜楞柱等；长方形石条状的栌斗；带蜀柱的一斗二升；一斗二升附加两个一斗二升或重叠一斗二升；覆斗状的柱础；斗、柱、础同体雕刻；龙头大梁；栱两侧附龙、鸟雕刻；柱下、柱与梁之间垫铁片；柱与础之间的榫卯结合，等等，都是后世不多见的建筑方式或方法，成为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2. 结构和构造上已有一定权衡

限于材料，这里只着重提出两点：一是门的比例关系，相对比较集中于2：1左

右，无疑是有意为之，并且以后各时期的仿木构墓葬中的门也多遵从于此；二是栌斗的耳、平、欹比例，已有2∶1∶2的结构，与北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作法则例》完全相同，说明这种比例关系在汉代就已有出现，并被后世所承袭。

同时，柱径高比从1∶1.13到1∶10，柱子收分自3.75%到约18%，铺作与柱高比自1∶1.67到1∶8，虽然从数字上看似乎差距较大，但与其他时代相比，仍然可以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仍可说明此时在尺寸权衡上的相对一致性。

3. 转角部位的处理已有一定的进展

在目前发现的陶楼等明器上，所见的转角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墙外角的两面各出挑水平梁，梁端置附小斗的横栱一重或多重；二是在角部施斜撑或斜撑加铺作；三在屋角斜出挑梁，上置角神或铺作，或在梁下另加斜撑，或在梁上置横木，横木两端再置铺作等。[23]

汉代，建筑转角部位的铺作设置问题虽已解决，但与后世普遍流行的式样不同。而从山西芮城石村汉墓前室转角部位的铺作结构看，其与后世仿木构墓葬的处理方式几无二致，且都与木结构中的转角铺作处理方法相仿，即正面出跳者，在侧面即为横栱。这说明，虽然没有地上木结构建筑实物和明器、画像石的佐证，但无疑可以确定，汉代在转角部位的铺作处理上，已有了与后世一样的处理方式。

六、结　　语

汉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工具和技术的逐步提高，砖、石等材料逐步广泛地应用于墓室的建造，这为仿木构墓葬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在“事死如生”及厚葬、孝道等观念的直接影响下，为死者模仿生前居住而建造墓室的风气在社会上逐步推广。

在仿木构墓葬的类型和技术上，多集中于门、柱等方面的模仿和营造，铺作最复杂的为一斗三升，这与现有的实例和研究结论吻合。但同时，汉代仿木构墓葬的建筑资料要比地面留存和文献记载的情况丰富得多，而一些作法为后世所承袭，一些则成为独特的时代特征。门簪的发现，则为这种构件的出现时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构件权衡上，则表现出一定的比率关系，开创了后世此种处理方式的先河。尤其是在转角部位的处理上，长期以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领域都认为汉代建筑还没有找到类似后世的转角铺作结构，但墓葬中的材料无疑否定了这一种说法。

在时代演进上，汉代的仿木构墓葬可分作五个阶段，即西汉前期、西汉后期、新莽时期、东汉前期、东汉后期。在数量和类型都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仿木构因素的复杂程度不断加大，出现了一斗三升等铺作结构。墓室数量和布局上，也表现出了逐步增多和排列复杂性逐步加大的演变趋势。

在分布方面，汉代的仿木构墓葬主要分布三个大的分区，即中东部、西部、东北地区。中东部地区是汉代仿木构墓葬的核心区域，主要体现在出现时间早、数量多、类型变化明显，且演变规律与汉代仿木构墓葬的整体演进趋势相一致。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仿木构墓葬出现时间略晚，数量较少，但率先出现一斗三升和门楼等较为复杂的类型，所以也是汉代仿木构墓葬的重要分布和值得特殊关注的地区。

附记：本文为笔者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地区仿木构墓葬建筑形制研究》的一部分，材料收集截至2009年底。写作过程中，得到魏坚教授等诸位老师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注　释

［1］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韩山东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0（9）.

［2］ 孙德润，贺雅宜.龚家湾一号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7（1）.

［3］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徐州、铜山五座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4（10）.

［4］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王寨汉画像石墓［J］.中原文物，1982（1）.

［5］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第二化工厂21号画像石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3（1）.

［6］ 戴应新、李仲煊.陕西绥德县延家岔东汉画像石墓［J］.考古，1983（3）.

［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枣庄市桥上东汉画像石墓［J］.考古，2004（6）.

［8］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辛店熊营汉画像石墓［J］.考古，2008（2）.

［9］ a.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J］.考古学报，1985（1）.
b.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县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材料的再补充［J］.考古，1997（2）.
c.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J］.考古学报，1985（3）.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J］.文物，2009（2）.

［11］ 南京博物院.徐州贾汪古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3）.

［12］ 傅俊山.辽宁锦县右卫乡昌盛汉墓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1987（4）.

［13］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市安居新村汉画像石墓［J］.考古，2005（8）.

［14］ 南京博物院.昌梨水库汉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参考资料，1957（12）.

［15］ a.华东文物工作队山东组.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4（8）.
b.曾昭橘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

［16］ 崔景贤，王文学.渭南市区战国、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8（2）.

［17］ 运城行署文化局、永济市博物馆.山西永济上村东汉壁画墓清理简报［J］.文物季刊，1997（2）.

［1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J］.文物，1961（1）.

［19］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酒泉下河清第1号墓和第18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59（10）.

［20］ 梁思成.《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A］.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C］.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1981.
［21］ a.鲍鼎，刘敦桢，梁思成.当代建筑式样与纹饰［A］.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27.
b.张家泰.汉代建筑若干问题试析［A］.文物建筑（第一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5～43.
c.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2］ 河南博物院.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The Architecture Research on Han Dynasty Wood-imitation Tombs in Northern China

Zhao Mingxing

Abstract: In point of current materials, the wood-imitation tomb 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Wood-imitation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in north China were built by imitating door,column and bracket set such as one cap block with three small blocks. The wood-imitation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coffin chamber increased gradually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wood-imitation tombs in the Han dynasty could be divided middle-east, west and east-north districts and the middle-east district is central district in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north of China; the Han Dynasty; the wood-imitation tomb

南匈奴概念的界定及其文化遗存的辨析[a]

马利清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一、“南匈奴”概念的界定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建武二十四年（48）春，匈奴日逐王比袭呼韩邪单于号，率领南边及乌桓八部众四五万人，款五原塞向汉称臣，自称“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他们被安置在汉的北边诸郡，完全脱离了其原生环境，失去了政治和领土主权上的独立性。建武二十六年（50），在东汉政府帮助下建立南单于庭，先在“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不久又“入居云中”，其后“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1]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列置诸部王。附汉的南匈奴人与汉人错居杂处，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对抗、互动、交流与融合，在东汉政权对北部边疆的开发过程中，南匈奴的参与和贡献，不仅发展了当地经济、养活了大量人口，保障了对匈奴战争的军需供给，而且大大缩小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差距，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南匈奴汉化的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以至于在考古学上几乎无法将南匈奴遗存从同时期的汉文化遗存中区分出来。据文献记载，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2]”在中国北方南匈奴活动的核心地区，理应留下较多考古学文化遗迹可供研究。然而，直到今天关于南匈奴考古学文化的辨认问题仍然尚未解决，甚至如何界定南匈奴都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如何将汉化的南匈奴从同时期汉墓中区分出来。如何把南匈奴墓与匈奴南北分裂之前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及其后裔墓区分开来，以及如何辨别鲜卑化南匈奴墓与胡化的鲜卑墓等问题，都是南匈奴研究中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有关南匈奴汉化进程的研究、南匈奴社会文化的变迁、南匈奴与汉以及其他民族的融合等各种问题的探索就难以深入。

关于“南匈奴”概念的界定，学界过去也存在误区，一些学者以大漠南北地域范

a　本文的研究获得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新时期项目经费资助。

围为界划分南北匈奴，认为南匈奴起源于漠南地区的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北匈奴源于漠北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石板墓文化。故历史上南北匈奴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地域与人种构成上的差异。[3]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学、人类学实践证明这一观点是无法成立的。匈奴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多次叛乱与分裂既有东西方之间的斗争也有南北方之间的对抗[4]。考古学上在鄂尔多斯以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应属文献记载的林胡、楼烦族群，他们在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被匈奴帝国征服，成为加入匈奴大联盟的别部成员。人类学鉴定已证明南匈奴与漠北匈奴一样其主体构成以北亚类型蒙古人种为主，带有部分东亚类型蒙古人种的因素是因为长期与当地汉人通婚融合而发生混血现象。南北匈奴的分裂原因主要是匈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不完善的继承制度扩大了候选人队伍以及单于庭与左右贤王庭之间三元对立的制度，这些都为分裂割据埋下隐患，或许曾经活动在汉匈交界地区的幕南王廷在西汉中期被逐步击溃退回漠北以后与漠北原住民势力之间在权力和牧场的重新分配上的矛盾斗争以及亲汉势力与传统势力之间的文化碰撞也是匈奴不断分裂的原因之一[5]，但归根结底是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的争夺战，在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迫远走南方依附强大的汉政权，企图借助于汉朝的支持重演呼韩邪单于在五单于争立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幕。而别部成员仅仅是被上层统治者裹挟着被动参与其中，不是分裂的根本原因和主体力量。

严格地说，南匈奴的概念应以公元48年日逐王比率部南下归附汉朝为时间界限来划分，留居原地的为北匈奴，南迁入汉的被称为南匈奴。而在后者的地域范围内，还包含了公元48年之前居住和陆续归附汉朝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的遗存，需要将其与南匈奴区分开来。在南匈奴内附以前，从西汉中晚期以来一直不断有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被安置在北方黄河流域周围地区，汉武帝时设天水、安定、上郡、西河、五原属国都尉管理归附的匈奴人。所以把中国境内的所有匈奴遗存统统作为南匈奴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从汉遗存中甄别出匈奴遗存就是一个艰深的难题，而进一步细致地区分出哪些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南匈奴，哪些属于先前归附的匈奴及其后裔，前后归附的匈奴人遗存之间有什么差别，如何来区分，对于我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一方面发现的可确认为匈奴人的墓葬数量很少，另一方面因为附汉的匈奴人汉化速度很快。通常我们只能笼统地把东汉以后的匈奴墓葬罗列出来，这些墓葬中属于南匈奴的可能性较大，但不排除其中一部分东汉前期匈奴墓属于较早归降汉朝的匈奴人及其后裔，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南匈奴。这是将来的考古工作有待加强的地方。

二、南匈奴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已发现的东汉时期匈奴墓葬有以下几处。

东胜补洞沟墓地[6]，位于鄂尔多斯西南约20千米的准格尔旗境内，发掘的9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除M1为男女合葬外，余均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

死者头向北，在尸骨的上部均发现了数量不等的马、牛、羊的骨骼。出土肩饰波浪纹以及近底部有一直径约1厘米的小孔的陶罐，以及铁鍑、带扣、环、铁镞、铁刀、马衔、铜耳环和骨勺、骨铲、骨簪等，这些特点与诺音乌拉、外贝加尔匈奴墓完全相同。在蒙古和苏联学者眼里这是最有匈奴味的匈奴墓地。原发掘简报将时代定为西汉末—东汉初，但根据所出的四神规矩镜、M1所出陶罐和M4、M5所出铁鍑等器物的形制分析，应该更晚些，这种陶罐与铁鍑在东汉初年的扎赉诺尔等遗址中有相似的器物[7]，但鍑的形态更接近东汉晚期至北魏时期鲜卑墓出土铜（铁）鍑。又较西安北郊岗寨村Ⅲ区M13铜鍑形制瘦长，后者较为明确的年代可以反证其应在其年代或在东汉中晚期，不晚于东汉晚期。秦汉时期，这里是匈奴和中原王朝交替控制的地区。汉代中期以后，在这里设置郡县属国，仍是安置匈奴归附者的地方。南单于庭一度迁居西河美稷（今准格尔旗），这里距南匈奴单于庭不远，是北边八部划归南匈奴驻牧的中心地带，故有学者认为南匈奴嫡系部族集团很可能曾安置在这里。

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8]，清理4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人骨均残乱。出土陶罐5件与汉代匈奴墓葬所出的A、B二型匈奴特色的陶器完全相同，一类为侈口矮领鼓腹罐，一类为小口细颈罐，肩部或颈部饰波浪纹或弦纹，另有铜带扣、铁马衔、骨簪及铁器残段，并采集3件残铜镜，基本是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流行的样式。原报告作者认为属北朝时期。笔者曾著文考证其应属东汉中晚期南匈奴墓葬[9]。

包头市麻池乡张龙圪旦一号汉墓[10]，是带长斜坡墓道和封土的有前、中、后室和多耳室的穹隆顶砖室墓，距麻池汉代古城约1千米，是包头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墓室最多的汉墓，前室至中室的甬道和中室四壁壁面残留壁画，可辨认的有带榜题的人物形象。出土随葬品40余件，以汉式器物为主，多为陶器、石器。所见匈奴文化因素较多，使用牛、马、羊头骨殉牲，填土中还见较多零散的动物骨骼；出土人骨下垫有皮革状物残片；见一画像砖，图案刻画相对奔驰的二马形象，风格粗犷；石屋屋顶垂脊上装饰的双兽尾尾相对，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为匈奴惯用的艺术题材和表现手法；墓葬附近采集有肩部饰有波浪纹的夹砂陶罐残片，与补洞沟墓地出土陶罐造型装饰手法均相同；墓葬北向，墓道在北，死者头向北，正是匈奴人“长左而北向”观念的反映；随葬陶俑中的一件标本M1：11为发型奇特的披短发的所谓男性胡人俑。其时代约在东汉后期。而当时包头地区是南匈奴活动的中心范围所在，笔者曾撰文详加讨论[11]，认为该葬很可能与南匈奴有关。

陕西神木大保当城址和墓地[12]，这座规模不大的五边形城内出土了匈奴典型的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时代在东汉中晚期，上限可早到西汉晚期[13]。按其地望可能是上郡属国都尉治所龟兹县城，文献记载这里西汉末期以来就是安置降汉匈奴人的处所之一，东汉时期南匈奴入居鄂尔多斯一带，这里距离鄂尔多斯很近。城外的墓地发掘墓葬26座，均为有封土的带斜坡墓道砖室墓，墓葬形制、多数随葬品和画像石内容与汉墓无异。但同时出土有肩部饰波浪纹、近底部器壁有一小孔的小口细颈陶罐，大量的铜质

车马具和装饰品，如马衔、马镳、带钩、饰牌、环、泡、包边、包角等，有较多的骨器，如骨刀、骨铲、骨刷、骨簪、骨片、骨弓弭、骨勺、骨筷子。有三座墓出土动物骨骼，有马、狗和狗獾的头骨，具有较为浓厚的匈奴文化的遗留特点，人骨鉴定也表明接近于北亚蒙古人种。故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汉化了的南匈奴墓葬，时代为东汉初到中晚期。

西安北郊岗寨村Ⅲ区M13[14]，墓葬形制与当地千余座汉墓相同，而出土器物迥然有别。有陶罐、铜鍑、铁镜、青铜头饰、金银手镯，殉牲有鹿、羊头蹄。其中的2件陶罐与崞县窑子、伊金霍洛匈奴墓所出相同，铜鍑形制与东胜补洞沟Ⅰ式铁鍑、神木出土的铜、铁鍑接近而较矮胖，与陕西陇县、宝鸡所出相似。并有明确的被东汉晚期M10打破的地层关系，说明下限不晚于东汉晚期。从时代和葬俗上看，应属南匈奴墓葬。

上孙家寨墓地乙区墓地[15]，发掘的12座墓葬，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均与中原汉地无异。但因出土了铜带扣、环、玉石、玻璃、琥珀、骨质筒、簪等装饰品和刀、削、镞等小件器物以及马衔、马镳、铃等"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遗物"，M3出土银壶和石饰，M8出土指环并发现有殉牲马牛羊狗骨的现象，并在M1出土了一件"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纽铜印，从而推断为南匈奴墓。年代为东汉末期。据头骨鉴定显示出以北亚人种为主而兼有东亚类型的特征，说明该墓主人从习俗到人种都已汉化很深。

归汉的匈奴人墓葬迅速汉化，到东汉晚期，墓葬中除了以马、牛、羊的头蹄作为殉牲的习俗和随葬品中零星出土的典型匈奴文化遗物（如肩饰波浪纹的陶罐）以及"长左北向"死者头向北方的习俗表明其匈奴文化特征外，在墓葬形制和结构上已完全汉化了。即使在匈奴聚居地我们也只能从当地汉墓中零星出土一些与一般汉墓风格迥异的出土物——披发的胡人俑、鹿羊虎等动物金箔、桦树皮器、骨筷子、骨鸣镝、带有华丽的枝状角的鹿形器物等蛛丝马迹去寻觅匈奴人存在的痕迹。匈奴传统在整个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已经完全处于弱势。但终汉一代，匈奴传统文化中那些融入民族血液中的因素并未绝迹，如包头、鄂尔多斯一带是南匈奴驻牧的中心地带，这些地区尚有较多可以辨认的匈奴遗迹保留，如包头市郊张龙圪旦、准格尔旗大饭铺墓葬、东胜市补洞沟等，而且匈奴传统文化因素在文化交流中也曾对汉人产生影响，一些长期与匈奴人错居杂处的汉人中也有习染胡俗的现象，甚至汉人中流行的壁画和画像砖的表现手法到达这里也沾染和流露出匈奴遗风的点滴痕迹，比如鄂托克旗凤凰山M1壁画墓中，带宽沿圆顶帽的壁画人物形象、尾尾相对的动物图像，并伴出披发男俑，明显受到匈奴艺术的影响。[16]

除此，在今内蒙古长城地带南匈奴核心分布区，东汉时期墓葬特征更多地与同期中原汉墓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墓葬均为砖室墓，盛行多室，有主室穹隆顶带多耳室墓、多主室穹隆顶墓、中轴线布局穹隆顶墓等。流行多人合葬，其中大中型墓墓葬结构复杂，地表都有高大封土堆，随葬品与中原地区无异。随葬罐、井、灶、壶、案、耳杯、火盆、鼎等陶明器等。大型墓葬多出土有石碑、石屋和其他石雕刻品，中原地区的壁画墓也波及这里，个别墓葬发现在陶器上彩绘人物。绘画题材基本都是反映中原传统

文化和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有的墓葬出土有画像砖，虎、马的形象粗犷而生动，近年在包头九原区阿嘎如泰苏木还发现与陕西神木大保当相似的东汉时期画像石墓。东汉后期墓地规模之大常至数百座，可见人口之众，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原地区经济得到较好的恢复重建，而这其中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当是归附汉朝并很快融入汉文化的南匈奴人的贡献，只是由于汉化程度之深，我们仅从墓葬特征几乎已无法将其从汉人墓中辨认出来了。正如学者张海斌指出的，东汉五原郡汉族人口骤减，而迄今发现的墓葬数量却与西汉时期相当，其中汉化的南匈奴墓葬应占相当数量。

三、南匈奴文化遗存的甄别

在1998年出版的《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一书公布的80年代末以来在巴盟、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和乌盟地区发掘的251座汉墓中，仅有可数的几座墓中残留有匈奴文化的因素。

出土殉牲的墓葬在包头最为集中[17]，见有：包头召湾汉墓，分别于1954年、1956年、1979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1986年、1992年多次发掘，共发掘97座墓葬，附近采集大量的“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四夷尽服”“千秋万岁”文字瓦当。1979年清理M44时发现封门内殉有骆驼骨；1982年清理的M51木椁墓和M59土洞墓再次发现殉有小猪骨，时代为西汉晚期。M51还出土与伊沃尔加墓地相同的方形铜扣饰；之后，清理M40砖室墓时出有殉葬羊头骨；M64、M70用羊头骨殉葬，其中M64可能为东汉中后期；M70还发现有兔、鱼骨和鸡蛋皮，时代为西汉晚期；M67砖室墓前室西侧也发现一堆散乱的畜骨，时代为东汉中后期；M72出土兽肩胛骨、肢骨、后室填土中有狐狸头、肋骨、肢骨，该墓还发现有图案为两匹马、虎的画像砖，时代为东汉后期；M91砖室墓填土中有不少畜骨，棺盖上还放置有石块，随葬陶罐较多，一些器形种类与补洞沟、神木大保当、张龙圪旦同类器相似。包头南郊麻池乡观音庙1992年清理3座汉墓，其中M1后室与耳室的甬道之间出土一完整的狗骨；包头召潭汉墓，1995年发掘M3砖室墓内殉有完整的羊骨架和部分骆驼骨，墓主人颈部发现铁项圈，这是匈奴流行的饰物，墓中出土陶俑鬓角头发披垂。1994年清理的包头市南郊麻池乡下窝尔吐壕汉墓M6也出土殉葬的动物骨骼。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三段地汉墓也有殉牲现象，M7有猪、羊骨，M8有4具马头骨，M12有猪、羊骨和鸡蛋，M21有鸡、羊、牛骨，M23有鸡、羊、牛骨和牛头骨，M25有鸡、羊骨。M5也出土不明动物骨骼；M10砖洞墓出土1件木牛。其中M12出土的陶罐形制风格比较独特，其侈沿罐与大保当墓地的B型罐相似，肩部饰波浪纹，近底部有一小孔。呼和浩特市郊区八拜汉墓M1殉牲有猪肩胛骨和下颌骨，年代为西汉晚期。1989年清理的乌海新地汉墓M10也发现动物骨骼，时代较早，当在西汉中期。

出土胡人俑的墓葬有：包头、邓口、鄂托克旗、杭锦旗等地汉墓中有发现披发

的胡人俑。其中召湾和召潭汉墓出土披发女俑形象，其装束和发式皆不同于汉人，或反映的应是汉代生活在这里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形象。如包头召湾汉墓M63：22、M63：23、M84：5；召潭汉墓M3：5；观音庙M2：4、M2：6、M3：2、M3：4；下窝尔吐壕M3：1以及西壕口[18]、孟家梁[19]汉墓中均有这种发式的女俑：两鬓各有一缕黑发下垂（釉陶则发施黑釉），头顶盘发上方形成一髻居中或偏向右前方，脑后垂发。在召湾M63、邓口县纳林套海、沙金套海、鄂托克旗三段地M6汉墓出土有头戴风帽的胡俑。三段地汉墓出土男俑4件，用手捏塑烧制而成，作直立状，长颅型，高眉弓，深目，眉目外下斜，垂鼻，高鼻梁，颧骨突出，尖下颌，八字胡，连鬓须，双手合抱于胸前，两脚并立。内穿长袍，宽腿裤，外披拖地风衣，头戴尖顶风帽。通体施白陶衣，眉、目、胡须及风帽、披风边缘用黑彩及红彩勾画。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征。鄂托克旗凤凰山M1、杭锦旗乌兰陶勒盖汉墓也出土有披发的胡俑。和林格尔县城麻沟汉墓M1出土骑马俑器座，器身粘贴骑马俑浮雕，戴尖顶风帽，马站立作嘶鸣状，同出陶质板状浮雕羊形饰件，卧姿，双足前伸，抬头平视，盘角。背面有一圆形泥贴饼。与战国时期北方民族金属饰牌相似。时代均在西汉末至东汉初。这些出土胡人形象的地点相距不远，历史上均与匈奴活动密切相关，史载匈奴人为披发椎髻，出土这种独特的披发形象当非偶然。

出土金银装饰品和骨、木制品的墓葬有：包头召湾M88、M63出土大量动物纹金箔片，有飞龙、凤、神鸟、虎、牛、羊、豹、狗、狐、怪兽、舞人等；M63出银四蒂饰、M70出银镳衔、M72出银镯。1980年清理的巴盟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汉墓M6为土坑竖穴墓，出土鹿、羊、虎等动物金箔片，银柿蒂饰、铜印章，灯，厌胜钱等，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M3出土2件铜鹿镇，昂首，卧状，圆眼，枝状鹿角向后延伸，形制与战国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匈奴墓葬中常见的鹿造型完全一致，墓中多出马具。表现出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乌海市新地汉墓M7出土一桦树皮筒形器、一长方形桦树皮器（箱）；匈奴人习用的骨器也有发现，召湾M81出骨笄、M74出骨筷子、M72出骨鸣镝等。

这些异族文化因素出土地点相对集中在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有的甚至在同一座墓葬中同时出现，如召湾M63既出胡人俑又出动物纹金箔片、银四蒂饰；M72同时伴出兽骨、银镯、骨鸣镝；召潭M3既有殉牲羊、骆驼骨，还在墓主人颈部发现铁项圈，同时出土披发胡俑等。可见，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这些具有零星匈奴因素的墓葬中，西汉早中期的可能与早期在幕南活动的匈奴有关，西汉中期以后的则可能与投降的匈奴降人及其后裔有关，西汉晚期的见证了呼韩邪单于归汉的历史事件，东汉以后的则可能与南匈奴有关。当然这其中也不排除一部分是习染胡俗的北方汉人使用殉牲等习俗，他们长期浸染在胡人中间，畜牧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匈奴人相互通婚、逐渐融合，在生活习惯、饮食特点和丧葬习俗方面相互影响也是必然的。比如包头召湾M59、呼和浩特市郊区八拜汉墓M1，均为西汉晚期墓葬，这一时期该地区主要为汉人聚居，墓葬用猪

殉牲，猪是适于定居生活饲养的家畜，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错居在内蒙古凉城毛庆沟、饮牛沟、崞县窑子一带的汉族人使用猪殉葬。所以，这些墓葬虽有殉牲习俗，但可能并非匈奴墓葬，而是长期习染胡俗的汉人墓。正如今天生活在内蒙古等地的汉人也多有不同程度地习染当地蒙古民族生活饮食习惯的现象，像喝炒米奶茶、烈酒、吃手扒肉、奶酪等。再如召湾91号墓、观音庙M1和鄂托克旗凤凰山M1壁画墓，前者填土中有畜骨发现，因出土墓碑“建宁三年（170）下祁令平原相扬允好……葬死年七十有五建宁三年十一……”可确认为东汉；观音庙M1则出带有“孝廉”等铭文的残碑，一般认为墓主应为汉官吏；后者壁画内容基本上是中原汉墓常见的传统艺术题材，如垂帐木门、执金吾门吏、持案、罐、捧衣物的仆侍、庭院（内有歌舞杂技、观赏宴乐）、车马出行、山林放牧、兵器陈设、星象图及所谓“独角兽”等。判断是一座东汉前期富有浓厚的中原汉文化气息的下级官吏墓[20]，而画中某些人物两鬓披发及头戴饰羽翎的宽沿圆顶帽的形象为中原地区同类题材所罕见，颇有少数民族特色，发掘者认为其族属应与南匈奴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其族属为羌人[21]。这种两鬓垂发的独特发型却在附近包头地区同期汉墓出土的女俑身上多次出现，同时常常伴出殉葬牛马羊头蹄的葬俗以及反映汉匈关系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等文字瓦当和“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等由汉颁发的官印。因此，有理由认为凤凰山汉墓壁画中的两鬓垂发及同出的披发俑应该就是这里生活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的习俗反映。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其很可能属于习染胡俗的汉人墓葬。而这类墓葬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也只是在胡人影响之下，使用猪、狗一类家畜作为殉葬，并非匈奴典型的殉牲。[22]

其他与匈奴相关的遗存还有：神木县马家盖沟[23]，1982年在城北30余千米的考考乌苏河畔孙家岔公社，河水冲出双耳平底铜鍑1件，与补洞沟铁鍑相类；此外神木县还发现有流散文物数件，鹰嘴形佩饰1、铜卧鹿1、“汉匈奴为鞮臺耆且渠” 铜印1方，与《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汉安元年（142）秋，吾斯与薁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仅一字之差，疑为一音之转，那么此印的年代应在汉安元年前后，当为东汉安帝时期内附匈奴之物。邻近内蒙古的山西平朔县发掘的2000余座秦汉墓[24]中部分东汉以后墓葬，出土波浪纹陶器、动物纹青铜饰牌、桦树皮制品、骨器、料珠、铜人镇等，与内蒙古发现的游牧民族墓葬同类文物相似，可能与东汉以来匈奴入居中原、鲜卑占据雁门郡地有关。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发掘的20座东汉前期墓葬[25]，虽现已被确认为鲜卑墓，但也存在明显的匈奴文化因素。《后汉书・郡国志》定襄郡辖有善无、中陵、骆、桐过、武成五县，善无、中陵在右玉县。这里也曾是安置匈奴降人的地区之一。

另外，各地还有一些传世和收集的汉朝封赐匈奴贵族的官印，应属南匈奴文物。如榆林出土“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1937年榆林出土“汉匈奴呼卢訾尸逐”、1936年伊金霍洛出土“汉匈奴左夫除渠日逐”、山西河曲县出土“汉匈奴呼律居訾成群”印，故宫馆藏“汉匈奴恶适姑夕且渠”“汉匈奴破虏长”“汉匈奴晋适尸逐王”“汉匈奴姑涂黑台耆”“汉匈奴伊酒莫当百”[26]以及鄂尔多斯征集的“汉匈奴栗借温禺鞮”[27]

印，包括上孙家寨南匈奴墓出土的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铜印等共20余枚。史书记载，南匈奴自呼韩邪之后，由五原、云中最后迁居西河美稷，名义上作为汉的属国，故汉于美稷设属国都尉，“掌匈奴降者”。单于及诸王以下颁以汉印，印文为汉名官号和匈奴名官号，作为代表汉王朝在本民族行使权力的凭证，王莽时期还曾因降单于“印”为“章”而导致汉匈关系失和。2003年，洛阳市洛龙区辛店乡后营村一座东汉中期单室墓葬中出土一方驼纽铜印，印文为“匈奴归汉君”[28]。这是首次在内地出土的罕见边塞文物，为研究南匈奴内徙以及东汉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

过去有学者把李家套子[29]墓地也归为南匈奴墓地，从出土文物观察并考之文献，似乎不确。李家套子墓地在宁夏同心县西北9千米，清理5座，为土圹竖穴木椁墓、长方形砖室墓和1座坑壁和底部用石板铺砌的石棺墓。墓地出土有镂空铜环、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骨弓弭、海贝等典型匈奴文物，采集有长方形透雕青铜饰牌，等级较高，汉化程度也较深。出土大量汉式车具（车軎）、剑具、镦、环、带扣、饰牌、泡饰、铁鍑、骨器、海贝、绿松石、玛瑙、漆器（奁、耳杯）、货泉和五铢钱等。李家套子匈奴石砌墓的年代被断在东汉初（1世纪初）。据文献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首领浑邪王杀休屠王归附汉朝，被封为“漯阴侯”。汉武帝在缘边五郡设属国，安置匈奴降者，为汉朝戍边。五属国即在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张掖五郡之内，据考证，安定属国都尉治所设在三水县，《水经注》“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30]，按安定郡治高平[31]（今宁夏固原县北），以地望推之，三水县在今同心县境内，那么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墓地应和同心县倒墩子西汉中晚期匈奴墓地[32]一样是西汉缘边五郡的匈奴移民及其后裔的墓地。李家套子匈奴墓地较倒墩子匈奴墓汉化程度深，说明这部分匈奴人到东汉初期已在汉地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与公元48年分裂归附的南匈奴无关。

四、南匈奴墓葬的分期与特征

目前大致可确认的南匈奴墓葬分布地点有：内蒙古东胜市补洞沟，准格尔旗大饭铺，包头张龙圪旦、召湾、召潭、观音庙，乌海新地，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陕西神木大堡当，西安北郊岗寨村，山西朔县等。其中的部分汉墓的族属应为南匈奴，这些墓葬在形制、埋葬礼仪和出土文物上几乎都与汉墓无异，多为砖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向不固定，多有封土。一般为多人合葬，仰身直肢，随葬品汉化特征十分显著，有汉式陶罐、壶、熏炉、灶、房屋等明器，铜钱、漆器、装饰品等。具有草原民族特征的马具、腰饰牌、兵器等物品很少出土，据以判别其为匈奴墓葬的依据主要是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有近底部钻有小孔、肩部和腹部饰弦纹和波浪纹的典型匈奴陶器，以及墓内殉牲、体质特征区别于汉族等，青海大通上孙家寨M1仅因发现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确定为南匈奴墓葬。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几乎很难把它们与一般汉墓区别开来。在南匈奴聚

居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发掘的大批汉墓，如内蒙古中南部汉墓，其中一少部分随葬匈奴文化特征的陶罐、胡人俑，并发现有殉牲马、牛、羊头蹄的习俗，很可能包含了部分汉化的匈奴民族的墓葬，但因为汉文化特征占据主导因素，已经无法辨认了。因此，北方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山西、青海等地汉墓中必定有一些是我们无法辨认或尚未辨认出来的南匈奴墓葬。显然，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其民族的整体意识已经瓦解，匈奴文化也失去了立足的基础，逐渐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压倒，其传统的特征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殆尽。

中国境内发现的东汉时期匈奴及相关墓葬时代较早的有：内蒙古鄂托克旗三段地M8、M12、包头召潭M3以及李家套子匈奴墓、大保当墓地部分墓葬。东汉前期的匈奴墓葬中，目前能明确认定为南匈奴的遗存很少，很可能其中一些墓主人属于西汉中晚期以来归附汉朝的匈奴人或匈奴人的后裔。他们中最早的一批的后代已在中国境内生活了百余年，已经开始逐步汉化，墓葬形制与一般汉人无异，有木椁墓、砖室墓，都是汉代流行的形制，墓中随葬的陶质明器等也接受了汉人的习俗，甚至可能墓葬本身和这些明器都出自汉人工匠之手。但随葬品中还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如铁鍑、动物纹带饰、肩部饰波浪纹的陶罐、弓弭等，相对于物质的东西，生活和丧葬习俗是比较不容易改变的，比如殉牲的习俗，在东汉时期还较多地保留着，而其他各方面汉化的趋势则越来越高。李家套子匈奴墓地、神木大保当城址和墓葬就属于这类匈奴遗存，凤凰山M1也属于这一时期墓葬，墓主人有可能也属于这类匈奴人，但更有可能是在匈奴人聚居地供职的、习染了胡俗的汉族下层官员，除了壁画中有一些匈奴人形象和匈奴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他则完全是汉墓流行的习俗。

东汉中后期的匈奴墓葬和具有匈奴特色的汉墓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南匈奴遗存，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墓葬、内蒙古东胜补洞沟、准格尔旗大饭铺、包头张龙圪旦M1以及大保当部分墓葬。南匈奴贵族汉化的程度已相当高，不论从葬俗还是体质特征，已基本上融入汉和其他民族。大通上孙家寨匈奴墓如果不是发现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官印，几乎完全无法把它与一般汉墓区分出来，墓葬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前后室，穹隆顶，有棺椁葬具，地面有封土堆。等级相对较高，应是东汉晚期南匈奴中下级军官墓葬。也有学者据文献考证，湟中地区是起源于张掖、祁连山以南卢水一带的匈奴别部“卢水胡”世居之地，他们与青海羌人关系密切。在《汉书》《后汉书》中没有关于南匈奴向这一带活动的记载，对三例人骨的鉴定也不完全同于匈奴的北亚蒙古人种特征，而掺杂了东亚人种的成分。所以，该墓地是否南匈奴墓地也还存在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出土印章和人骨鉴定都可说明其族属，而在汉境内生活了百年之后的匈奴统治阶层必定高度汉化，与汉族相互通婚，故在北亚类型蒙古人种血统中融入当地的东亚蒙古人种的成分亦属必然。补洞沟、大饭铺距离东汉初年南匈奴单于庭所处的美稷县（今准格尔旗一带）很近，故保留较多匈奴文化传统特征，特别是补洞沟在随葬品和葬俗上与漠北蒙古和外贝加尔匈奴墓葬十分接近，原报告认为其应是归附的南匈奴单于的嫡系部

族的遗存，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可能嫌早。张海斌认为补洞沟墓地某些器物如铁鍑、指环和某些陶罐的形制具有东汉晚期的特征，时代可晚至东汉后期，是东汉后期南匈奴平民墓葬[33]。而其长方形竖穴土坑、无葬具的墓葬结构应是沿袭了当地春秋战国以来林胡、楼烦族群的文化传统，属于被匈奴征服的别部成员。根据M1所出的陶罐和M6所出铁鍑等器物的形制分析，较接近东汉晚期的形制，如东汉晚期的山西右玉善家堡[34]、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二兰虎沟[35]的铜鍑，这种形制的陶罐和铁鍑在北魏时期也有发现，准格尔旗二里半墓束颈罐和铁鍑[36]、呼和浩特市钢铁厂工地发现的铜鍑[37]、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南宝贝梁北魏墓出土的铜鍑[38]形制就类似补洞沟，故有学者甚至认为补洞沟墓葬晚至北魏时期。但从陶器造型纹饰及近底部有小孔的特征看，特别是后者为鲜卑自身陶器所无，而是匈奴文化所特有。二者之所以具有相似特征缘于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早期鲜卑隶属于匈奴，受匈奴文化影响深刻；到东汉晚期鲜卑逐渐强大，尽占匈奴故地，匈奴余部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此时的匈奴则成为鲜卑文化扩张的受体，故南匈奴文化的鲜卑化也是必然的。综合分析，该墓地随葬品出现东汉晚期的某些特征，葬俗中却又保留较多的匈奴传统特征，显然入居汉地时间不很久，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少，有明显的鲜卑化迹象。墓中并出土有规矩镜。所以，补洞沟墓葬的年代应该比原报告估计的更晚些，但也不至于晚到东汉末甚至北魏，其年代或在东汉中晚期，张海斌的断代是合理的。张龙圪旦M1根据其与包头召湾M91墓葬结构和出土石屋的相似，并后者出土明确纪年为东汉建宁三年（170）的墓碑，可断为东汉晚期，墓葬规模宏大、有墓道和封土堆，属于身份地位高贵、汉化程度颇深的南匈奴贵族墓，但在许多细微之处精心地保留了显示其民族身份和传统习俗的特征。大保当一带也属南匈奴入居的范围，故不能排除东汉中晚期墓葬中有部分属于南匈奴人的墓葬。一般平民墓葬相对保留了较多的本民族葬俗，墓葬形制仍采用传统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中有传统的波浪纹陶器、鍑、饰牌、骨器等器物，较多地保留了殉牲习俗，但同时也大量使用汉式器物随葬，入居时间越久，汉化程度越高。大部分墓葬已经和汉墓完全相同，而无法辨认了。

通过对内蒙古、青海、陕北等地“南匈奴”墓葬以及相关遗存的综合研究分析，大致可总结概括出如下几条特征，或许对寻找和辨识东汉时期南匈奴墓葬有所帮助。

（1）墓葬形制基本汉化，尤其是匈奴上层集团汉化程度更深，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和张龙圪旦M1等墓。基本上与同时期汉墓相同，多有高大的圆锥形封土堆，长斜坡墓道砖室墓，有单室和双室，个别双室墓还带有耳室，有券顶、穹隆顶和四角攒尖顶，有的还用了画像石和画像砖。有木质葬具，多数为家族多人合葬，有的多达十几人，墓葬方向不一，能辨别出的葬式的有仰身直肢，头向多样，但也有刻意保留“头向北”习俗者。平民墓葬当中还有保持传统墓葬形制的，如补洞沟发现的无封土、无葬具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是鄂尔多斯地区青铜时代以来匈奴别部的传

统葬制，神木大保当也发现少量这类墓葬。同时，汉化的程度也与不同族系入塞的时间、地点有关。匈奴入塞并不是一次完成的，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一直持续到西晋，又有多次反复，因而各部之间的汉化程度也是不可能相同的。还有的部族因靠近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而沾染了某些当地习俗。例如补洞沟出土的鍑和某些陶器特点与同时期鲜卑文化近似。在匈奴强盛时期，鲜卑是匈奴附庸，随着北匈奴西迁，匈奴政权瓦解，鲜卑占领了匈奴故地，匈奴人十余万落并入鲜卑，鲜卑自此强大起来。匈奴与鲜卑原本就有很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文化特征，但前期是以匈奴为主导因素，对鲜卑文化造成影响，而东汉时期匈奴墓则成为被动的受体，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鲜卑文化的较大影响，直至完全的鲜卑化。1996～1997年，在乌兰察布草原发现一处鲜卑与匈奴混葬墓地，位于乌盟卓资县梅力盖图乡石家沟村，称“石家沟墓地”。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8米×0.6米—0.8米），西北至东南向。这个墓地有四分之一的墓葬用石块砌筑墓壁，上盖石板，属于典型的匈奴墓。一部分墓葬有木棺，并发现火葬现象。葬式大多仰身直肢，少数为屈肢葬。随葬马、牛、羊骨，以羊骨居多。随葬铜器和陶器都已鲜卑化，并以鲜卑文化特点为主。类似的墓葬在乌兰察布草原下黑沟和西拉木伦河流域亦有发现，时代大约在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反映了鲜卑人与匈奴人的初步融合。

（2）葬俗上相对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因素，如殉牲习俗在上层人物和一般平民墓葬中都较多的得以保留。一般用马、牛、羊头随葬，但数量和使用殉牲的比例较之前期已大为减少。一般放置在墓道或墓室里，随着定居的发展和汉化的加深，出现了用猪殉牲的现象，也有可能是当地汉人习染胡俗的结果。

（3）随葬器物组合总的趋势是逐渐汉化，汉文化因素加强，匈奴自身的因素减弱。如陶明器的大量使用、生产工具和车马器的明器化。出土大量的汉式陶器，有罐、壶、鼎、耳杯、薰炉、灯和仓、灶、井、鸡鸭等明器。但仍有一些与普通汉族墓葬不同的、可以标明其族属身份的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首先，随葬陶器组合中陶罐的数量和纹饰特征非常突出。在匈奴墓葬随葬陶器中以罐为主，甚至多数墓葬仅见罐一种陶器。匈奴陶罐最典型的特征是肩、腹部饰有波浪纹，近底部有一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孔。罐的形制普遍较高大，为实用器。与中原地区在形态上和使用方法上都明显不同。南匈奴墓葬或多或少延续了这一传统。其次，随葬大量的装饰品。如各类金属、玉石、玻璃、玛瑙、骨料制作的带饰、串珠、项饰、头饰、耳饰等。这类现象在同时期汉墓中少见，是游牧民族区别于汉族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三，随葬品喜用实用器。多用金属生产工具、武器、车马器（既有实用器也有明器）等。如铜刀、镞、铃、环、带扣、包边、包角、管状饰和铁刀、镞、剑、斧、锸、铲、马衔等。而西汉晚期以后的中原汉墓则以铜生活用具、钱币和铁生产工具为主，少见武器和车马器，饰牌、带扣等装饰品更是为少数民族所特有。第四，墓葬随葬品中使用较多的骨器。骨器种类主要有刀、铲、弓弭、刷、勺子、筷子、印章、筒、簪子、骨饰片等。骨器加工是匈奴传统的手工业门类之一，而随葬骨器是匈奴传统的丧葬习俗之一，在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匈奴墓葬中都有发

现大量的骨镞、弓弭、骨马镳、骨勺、筷子等。南匈奴墓葬随葬骨器的习俗与其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密不可分，也是对本民族自身文化因素的继承和延续。

南匈奴时期出土随葬品与其前期相比，箭镞的数量大为减少，尤其是较晚的墓葬，几乎不出土镞，马具的数量也较前期大为减少，质地多为铜，也有少量铅质，马衔仍以两节直棍式为主，个别为一体的，两端有安插马镳的环。马镳多为铜质，多S形，两端类似桨叶。带饰多为铜带钩、带扣等，带钩多为中国式带钩，饰牌少见，几乎不见动物纹饰牌。毁镜的习俗少见，出现随葬完整铜镜的情况。

（4）体质特征上，南匈奴人表现为以北亚类型蒙古人种为主体，掺杂了东亚类型蒙古人种的成分，在遗传学上可以解释为南下的匈奴主体民族与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通婚、混血的结果。

从考古资料来看，南匈奴的汉化程度是相当深的，无论从墓葬形制到埋葬制度和随葬品组合、种类已经基本上与汉族无异，很难区分了，除了少数墓葬因出现零星的胡俗遗痕比如墓葬北向、殉牲、动物纹带饰、波浪纹陶罐、鍑以及使用骨器等可以大致判断其与匈奴人有关，大部分的南匈奴墓葬已经无法从汉墓中区分出来了。这也与史籍记载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表明此时的匈奴民族文化已融入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一般而言，相对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往往更具有牢固性和稳定性，短时间内不容易改变。所以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往往最能真实地反映地域和民族的不同，这些遗迹遗物中殉牲习俗和服饰装束与中原民族截然不同，虽然在物质上已经很大程度地汉化，但仍可从中看到自身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绵延。尤其是今内蒙古、陕西北部、宁夏、青海一带，曾经的匈奴故地，匈奴北撤之后，又是安置降汉的匈奴人的属国地界，南匈奴归汉后，又成为南匈奴活动范围，这些地区汉墓中或多或少都发现带有典型匈奴文化的遗痕，应可作为寻找南匈奴踪迹的主要线索。

注　释

［1］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M］.2945.

［2］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M］.2951.

［3］　乌恩.匈奴族源初探［A］.周秦文化研究［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832～841.

［4］　马利清.南北匈奴分裂原因辨析［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0（17）.

［5］　马利清.南北匈奴分裂原因辨析［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10（17）.

［6］　a.伊盟文物工作站.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地清理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27～33.

b.田广金，郭素新.补洞沟匈奴墓葬［A］.鄂尔多斯式青铜器［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94～402.

［7］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369～383.

b.陈凤山、白劲松.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2）：27～30.

c.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J］.文物，1961（9）：16～19.

d.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1961（12）：673～680.

［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准格尔煤田黑岱沟矿区文物普查述要［J］.考古，1990（1）：1～10.

［9］ 马利清. 内蒙古准格尔旗大饭铺墓地族属和年代再探［J］.北方文物，2009（1）：16～19.

［10］ 张海斌等. 张龙圪旦墓葬［A］.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66～274.

［11］ 马利清. 包头张龙圪旦一号墓的族属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J］.郑州大学学报，2013（6）：137～143.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11 .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一号工程Ⅲ区13号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2（1）：13～15.

［15］ a.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J］.文物，1979（4）：49～54.

b.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16］ 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J］.考古与文物，2003（2）.

［17］ 张海斌等.包头汉墓［A］.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99～298.

［18］ 张海斌等.包头汉墓［A］.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99～298.

［19］ a.李逸友.包头市孟家梁汉墓［J］.文物参考资料，1956（8）.

b.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Z］，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92～93.

［20］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J］.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61.

［21］ 张海斌.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1）：14～28.

［22］ 马利清.内蒙古凤凰山汉墓壁画二题［J］.考古与文物，2003（2）.

［23］ 戴应新，孙家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J］.文物，1983（12）：23～30.

［24］ 平朔考古队.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7（6）：1～52.

［25］ 宁立新.右玉发现汉代匈奴墓葬［N］.文物报，1990-09-27.

［26］ 黄盛璋.关于博物馆藏传世汉匈奴语官印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4）：16～21，96.

［27］ a.陆思贤.内蒙古伊盟出土的三方汉代官印［J］.文物，1977（5）：95.
b.陆思贤.“汉匈奴栗借温禺鞮”印［A］.匈奴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3：524～525.
［28］ a.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学.洛阳辛店东汉墓发现“匈奴归汉君”铜印［J］.文物，2003（9）.
b.记者辛如记，赵飞.洛阳发现罕见边塞文物“匈奴归汉君”铜印［N］.中广网洛阳3月27日消息.2003-03-27-12:35.
［29］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匈奴墓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8（3）：17～20.
［30］ 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1］ 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八［M］.
［32］ a.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同心县文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组.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J］.考古，1987（1）：33～37.
b.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组，同心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J］.考古学报，1988（3）：333～356.
［33］ 张海斌.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1）：14～28.
［34］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J］.文物辑刊，1992（4）：1～21.
［35］ 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期二兰虎沟的古墓群［A］.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99～101.
［36］ 魏坚.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37］ 陆思贤.土默川平原上的北魏铜鍑［J］.呼和浩特文物，内部刊物（2）.
［38］ 李逸友.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北魏墓［A］.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118～120.

How to Define the Southern Xiongnu and Differentiate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Ma Liqing

Abstract: The misunderstanding from the previous studies in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Southern Xiongnu, makes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remains containing the Huns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ppeared in the south of the desert during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and Han Dynasties belonged to the Southern Xiongnu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Southern Xiongnu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ime when Rizhuwang Bi led his people to surrender to the authority of Han Dynasty in 48 A.D. These people assimilated by the Han culture quickly after they settled down in the northern border of the Eastern Han empire.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the South Huns culture remains and the Han's in the same period. Based on several Southern Xiongnu tombs, and several Han tombs with the Xiongnu element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basic clues to identify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Southern Xiongnu.

Key words: the Southern Xiongnu; assimilation; Southern Xiongnu tombs; Eastern Ha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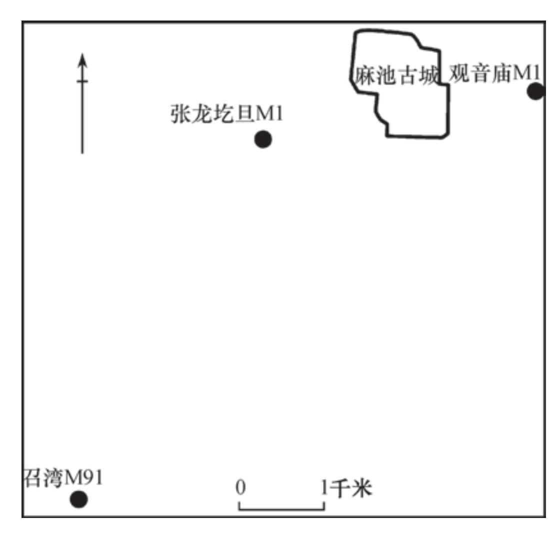
包头三座东汉中晚期墓葬比较研究

郝园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包头地区汉代墓葬的发掘始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清理已达百余座。包头汉墓因其丰富的出土物和独特的文化面貌引起了学界关注，其中张龙圪旦M1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1]。笔者注意到张龙圪旦M1与召湾M91、观音庙M1[2]等同一时期墓葬存在诸多相似性，因此试图通过对相关墓葬进行比较和讨论，以进一步加深对包头东汉晚期墓葬，特别是张龙圪旦M1的认识。

张龙圪旦M1（以下简称张M1）位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麻池村西1.5千米，召湾M91（以下简称召M91）位于麻池乡召湾村西北约1千米，观音庙M1（以下简称观M1）位于麻池乡观音庙村西北0.5千米。其中张M1距召M91约为5千米，距观M1的距离约为3千米，召M91距观M1的距离约为7千米，可见三者相隔之近。值得一提的是三者距麻池古城极近，张M1和观M1距古城的距离均为1千米左右，召M91所处的召湾汉墓群距古城距离也就是5千米左右（图一）。而麻池古城，据笔者考证，应为秦九原郡（汉更名五原郡）的治所，是秦、汉帝国北疆中心之一[3]，可知三座墓葬的重要意义。三座墓葬不论是从墓葬的结构还是陪葬品的种类和风格来说，均有很多的相似性，体现出东汉晚期墓葬的特征，并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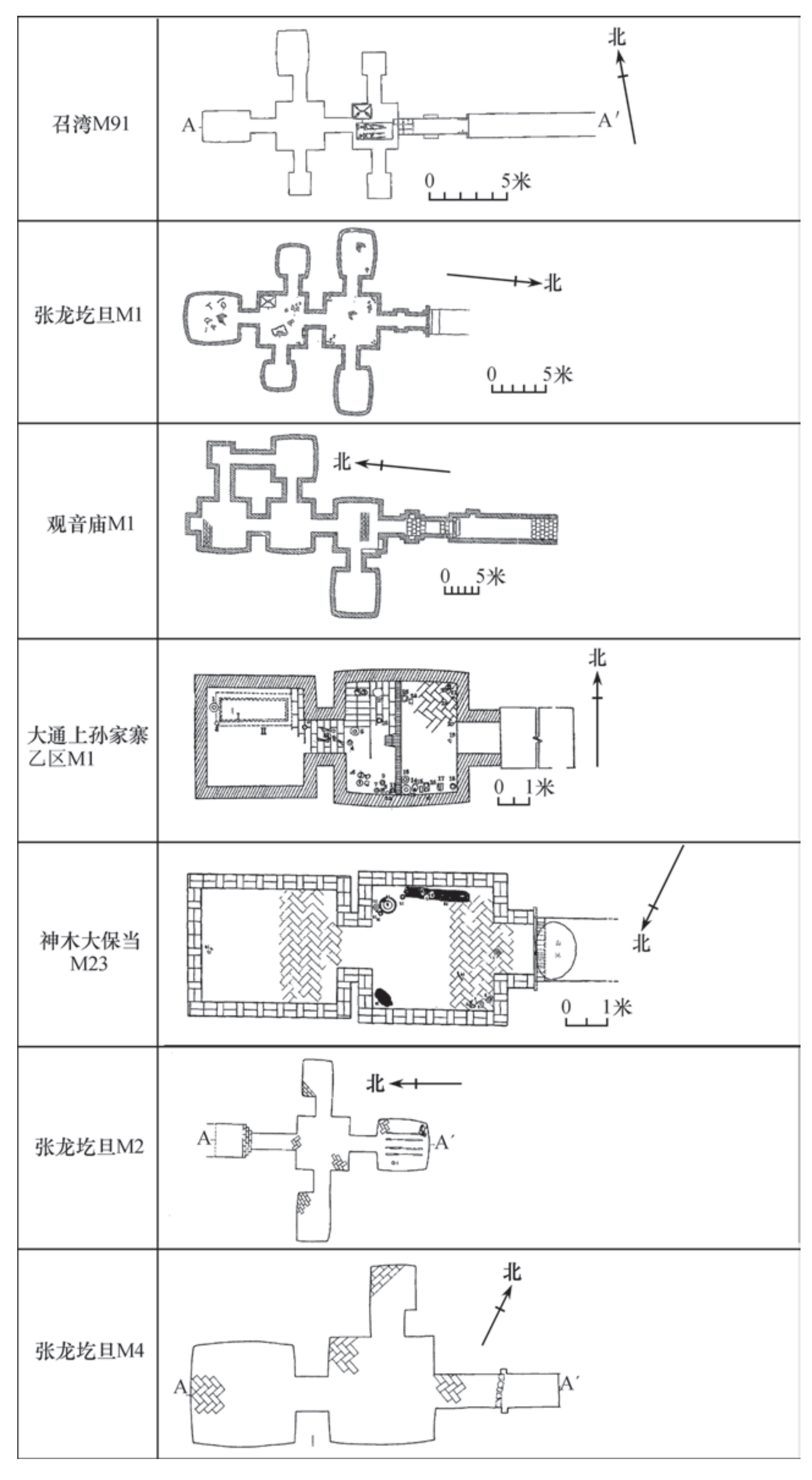
图一　召湾M91、张龙圪旦M1、观音庙M1三者位置关系图

一、墓葬结构

召M91有封土堆，直径约35米，高2.5米，为中轴线对称穹隆顶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及左右耳室、中室及左右耳室、后室组成，各室均为穹隆顶，方向100°。张M1亦有封土堆，直径约50米，高约4.5米，墓葬结构与召湾M91一致，方向357°。观M1封土堆在20世纪50年代平整土地时被削平，具体情况已不详，该墓结构亦为中轴线布局多室穹隆顶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及东耳室、中室及西耳室、后室及西耳室组成，后室耳室又与中室西耳室相通，方向约为180°。

三座墓葬在砌筑方式上完全一致，在用砖上大体相近。召M91采用的是三横一竖垒砌，墓底铺“富乐未央子孙益昌”印子方砖，砖长32.5、宽32厘米。张M1墓道及墓室均用长29.5、宽15、厚4.5厘米的素面砖垒砌，墓底铺砖为侧立人字形，墓壁砌砖为三横一竖砌法，墓内发现印有“大吉”“吉利”字样的印字砖。观M1用三横一竖的方法砌筑，墓底铺有方砖，方砖长31.8、宽31厘米，比召湾M91略小，印有“富乐未央子孙益昌”八字。

进入东汉中后期，汉墓形制转变为以砖室墓、石室墓和砖石合构墓为主，三座墓葬均为砖室墓则是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值得一提的是，已确定属于匈奴族属的墓葬亦被裹挟在这种向砖室墓转变的潮流中，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M1（孙M1），发掘者根据出土物认定其年代为东汉晚期，且墓主人应为匈奴人。该墓上有封土堆，残高6.2米，直径23米。墓葬结构较以上三座墓葬较为简单，由前后室组成，方向约为90°。所用砖均为长36、宽18、厚7厘米的长条砖。[4]另如陕西神木大保当M23（大M23），发掘者认为该墓修筑时间应为100年左右，属东汉中晚期，并且该墓出土有肩部饰波浪纹的小口细颈瘦腹罐，具有匈奴文化的特征，人骨鉴定也表明墓主人接近北亚蒙古人种。因此可以认为该墓是汉化了的匈奴人墓地。该墓结构为砖砌双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过洞及后室等部分组成，方向115°，与孙M1大体相近[5]。可以看出，本文之前所论三座墓葬较两座已知为匈奴族属的墓葬的基本结构是一致的，但较为复杂，在前后室基础上又加了中室、耳室等结构。它们之间的过渡形态，可以从张龙圪旦M2、张龙圪旦M4（张M2、张M4）找到线索。张M2、张M4位于张M1东约百米，年代为东汉中晚期[6]。张M2为多室穹隆顶墓，由前室及左右耳室、后室组成，采用三横一竖法垒砌，砖的规格为长32、宽16、厚5厘米。张M4为多室穹隆顶墓，由墓道、前室及左侧耳室、后室组成，采用三横一竖法垒砌，砖规格为长29、宽14、厚4.5厘米。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召M91、张M1、观M1较为复杂的形制是将前述两种基本墓葬结构结合的结果，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发展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张M2、张M4都随葬牛头骨、羊头骨，铁刃器，这在中原地区汉墓较少见，是具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随葬组合。因此张M1，召M91、观M1如果作为匈奴墓采用复杂的砖室结构墓葬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前后室与耳室组合的结构是东汉晚期汉墓较为常见的形制，因此简单地从墓葬结构是无法确定召M91、张M1、观M1的族属。因此对墓内随葬品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图二）。


召湾M91
A
A′
北
0 5米
张龙圪旦M1
北
0 5米
观音庙M1
北
0 5米
大通上孙家寨
乙区M1
北
0 1米
神木大保当
M23
北
0 1米
张龙圪旦M2
北
A
A′
张龙圪旦M4
北
A
A′

图二 相关墓葬平面图

二、随葬品比较研究

张M1共出土各类随葬品40余件，按质地分有陶器、石器、铜器等，以陶器为主。召M91出土有陶器、铜器、石器等，但因被盗出土较少。观M1发掘时已被破坏，只出土堆塑陶器1件。笔者首先通过对陶罐进行类型学排序研究，以判断墓葬间的相对年代及文化属性的关联性。根据陶罐形制、装饰，可将相关墓葬陶罐分为以下类型：张M1部分陶罐与召M91部分陶罐相似，均是直领，溜肩，鼓腹，平底状，足底微内敛，肩部或腹部饰弦纹数道，大M23亦出土该类型陶罐一件，编为Aa型；召M91另出一陶罐，口微撇，直领，溜肩，鼓腹，平底，素面无修饰，张M1出土一件陶罐与之类似，编为Ab型；召M91还出一件陶罐，口微撇，直领，溜肩，鼓腹，平底，肩部戳印三角纹带二周，之下饰波浪纹。另张M4所出一件残罐仅剩上半部，口、肩形制与召M91所出类似，肩部饰波浪纹，编为Ac型；张M4一件陶罐与80年代在麻池乡征集到的一件类似，为侈领罐，斜方唇，微折沿，鼓肩，平底微凹，编为Ad型；张M2所出一件残罐的口肩形制与大M23所出一件陶侈口罐类似，圆唇，束颈，颈部或肩部饰弦纹，编为Ae型；在麻池乡还征集到一件夹砂罐，器表呈黑色，侈口，肩部微隆，下腹斜收，平底，肩部饰一周波浪纹，编为B型。据研究，匈奴的典型陶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口细颈直腹高领罐，其特征是均为轮制，平底，以卷沿灰陶罐为多，肩部常常饰一两周弦纹或波浪纹，有的饰弦纹，中间夹波浪纹，颈部施磨光暗条纹；另一类是大口鼓腹矮领罐，敞口较大，斜沿、束颈较矮、溜肩、下腹部较直、素面，或在肩部饰波浪纹，或器表饰绳纹。[7]前一类与笔者所分A系陶罐有诸多相似特点，如肩部饰波浪纹、弦纹等。后一类则与笔者所分B型一致，该型在北匈奴的墓葬中多有出土，补洞沟墓地[8]亦有出土。从三座墓葬所出陶罐的组合关系及与匈奴典型陶器的关系来看，墓葬的年代应大体一致，并且较多体现出匈奴文化特征（图三）。

此外，三座墓葬均出土有动物骨骼：召M91墓葬填土中偶见牲畜残骨，种类则不详；张M1在前室四角各发现二羊头骨，后室出有一牛头骨、一马头骨，填土中亦发现较多零散动物骨骼；在观M1后室与耳室间出一完整的狗骨架。三座墓葬无一例外有牲殉现象，反映了一定的游牧民族墓葬文化特征。包头汉墓有牲殉现象者较多，牲殉动物种类有羊、牛、马、狗、猪等，此类形象在陶器、金属制品或绘画艺术题材中亦多有表现，反映了汉代包头地区胡汉交错杂居的历史事实。

召M91与张M1均出土有石屋。召M91所出位于前室西北角，四阿式顶，前面两垂脊左雕青龙、右雕白虎，后面二垂脊雕莲花瓦当，雕刻工艺精细，青龙、白虎造型栩栩如生，反映了较高超的工艺。石屋长110、宽90、高110厘米。发掘者认为该石屋置于前室，应作为享堂而作祭祀之用。张M1所出石屋残损较为严重，小平顶，四面坡屋顶，四垂脊，前面二垂脊各立雕一龙首，形象与召M91青龙龙首相似，口微张，双目圆睁，龙

类型 墓葬	Aa型	Ab型	Ac型	Ad型	Ae型	B型
召湾M91						
张龙圪旦M1						
张龙圪旦M2						
张龙圪旦M4						
张龙圪旦M1周围征集						
大保当M23						
补洞沟						

图三　相关墓葬出土陶器分析

首双角，双耳向后。石屋长113、宽100、高124厘米。发掘者认为龙首形象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那林套海墓葬M3（那M3）所出陶灶上烟筒的龙的造型类似[9]。那M3属西汉晚期，为汉人墓葬，可知这种龙的造型从西汉晚期便流行于河套地区。有学者认为张M1的

双龙题材是北方少数族所使用的，在其他属匈奴、鲜卑、契丹族属的器物中亦有发现，并且认为对龙的崇拜是匈奴的习俗[10]。提法新颖，令人颇受启发。

三、墓内装饰比较

张M1、观M1两座墓葬内部均有较为丰富的绘画装饰题材，均发现有画像砖，观M1石墓门上浮雕造型精美传神，为我们探讨墓葬族属提供了重要线索。张M1内画像砖刻画二马，作相对奔驰状。风格粗犷，写意性强。砖长29.5、宽14.6厘米。观音庙内画像砖刻画的是骑马图，一个人双手勒缰，骑于马上。马作奔跑状。线条简略，形象传神。砖已残，残长23、宽16.2厘米。画像线条都较简单流畅，但表现传神，借助夸张弯曲的线条使马有了动感。与召M91不远的召湾M72亦出有2块残画像砖，召M72为东汉晚期墓葬，其中一个画两马，前马仅剩尾部，后马作站立状，翘尾，线条简练、流畅，刻划生动传神。砖残长17.6、宽15.4厘米。该类画像砖的内容多为马，并且马的四肢偏短，个头略显矮小，似乎表现的是匈奴马，体现的应是匈奴墓葬习俗。

观M1出了双开石门，两扇门浮雕有朱雀，下有铺首环鱼，朱雀作展翅伸腿状，羽翅飞扬，造型精美，生动传神。相同题材的装饰在大M23墓门门扉上可见，门扉构图由三部分组成，中间为朱雀，下面铺首衔环，周围为辅助装饰题材青龙、花草等。朱雀展翅翘羽，左爪腾空作走姿。二者朱雀在造型、动作的设计上都极为相似，所表达的主题也应是一致的。

四、初步结论及问题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召M91、张M1、观M1之间在墓葬结构、随葬器物、墓内装饰上有诸多相似性，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反映出包头地区东汉晚期墓葬的独特文化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体现出了游牧文化的特征，与一些已确知为匈奴族属的墓葬有紧密的联系，蕴含了较多的匈奴墓葬文化因素。因此，笔者认为这三座墓葬为匈奴墓的可能性极大，但随着更多材料的发现，该结论应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三座墓葬的族属的确定，为匈奴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史载：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二十六年（50），“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其后“南单于入居云中”，之后“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11]。章帝建初八年（83），“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12]章帝章和元年（87）“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

中、五原、朔方、北地降。”[13]东汉时期，西河郡美稷县一度是南匈奴内附后的活动中心，西沟畔墓地即位于这一区域，部分墓葬的年代在东汉前期，文化面貌与漠北同时期匈奴墓文化面貌较为接近，有可能是此时迁居到此地的南匈奴贵族墓。神木大保当城址距准格尔旗较近，在西汉时已用来安置降汉的匈奴人[14]，到东汉初年南匈奴内附时又混入了部分南匈奴人，城址直到140年前后才被废弃，因此大M23应为东汉中后期南匈奴人所遗留。而五原则是匈奴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大批南匈奴、北匈奴族人穿阴山进入五原，再从五原扩散到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五原所在，如前述，即今麻池古城，本文所论三座墓葬均距麻池古城极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人若大量在麻池古城及周边活动，势必会留下相关考古遗迹，而召M91、张M1、观M1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匈奴人南下活动时在五原所遗留下来的。

注　释

［1］ a. 张海斌. 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1）.
b. 陈晓露. 论张龙圪旦M1的文化属性［A］. 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专家论文集［C］.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 其他相关论著亦多有涉及，此不赘述.

［2］ 如无特殊说明，三座墓葬材料均引自：张龙圪旦墓葬，召湾90—97号墓葬，观音庙墓葬［A］. 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 魏坚，郝园林. 秦汉九原—五原郡治的考古学观察［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4）.

［4］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J］. 文物，1979（4）：49～53.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7（9）:26～35.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包头市张龙圪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3～312.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用张M2、张M4资料均引自该处.

［7］ 马利清. 原匈奴、匈奴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72～73.

［8］ 伊盟文物工作站. 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81（1）：27～34.

［9］ 魏坚.纳林套海墓葬［A］. 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1～52.

［10］ 张海斌. 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1）：14～22.

［11］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八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945.

［12］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九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950.

［13］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卷九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951.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1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Tombs in Baotou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Hao Yuanlin

Abrtracts: Located in Baotou, Zhanglonggedan M1, Zhaowan M91, Guanyinmiao M1 are in relatively short distance and in the same time of Eastern Han Dynasty, they also shared many similarities in burial structure, funerary objects, decoration, so they are very likely to be in the same ethnic group.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three tombs reflect more burial customs of the Huns, they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be Huns' tombs.

Key words: Zhanglonggedan M1; Zhaowan M91; Guanyinmiao M1; Hun

曹操墓刻铭石牌名物小考

李梅田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2010年年初，安阳西高穴曹操墓考古发现的消息公布后，一度引起学术界内外的巨大争议，其中也包括对出土刻铭石牌的性质及内容的热烈讨论。迄今该墓出土的刻铭石牌资料尚未完全发表，但将散见于各处的材料汇总，已可知大部分石牌的铭文内容[1]。通过名物释读及与墓内实物对照，或有助于了解汉代丧葬礼仪之实施概况。

一、刻铭石牌的性质

据发掘简报，墓内发现刻铭石牌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厘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总长8.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2]。这种石牌的性质显然与以往发现的多例被称作“物疏”“遣策”[3]“木楬”的物品相似，即随葬物品的清单或签牌[4]。目前对这类物品的称呼并不统一，姑按习惯仍统称作“遣策”。

“遣策”之名源自《仪礼·既夕礼》的记载“书赗于方，书遣于策”：“凡将礼，必请而后拜送。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5]

郑玄注：“方，板也，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又，“策，简也。遣，犹送也”。故遣策是丧葬仪式的产物，所记物品包括死者生前旧物、宾客所赠之助丧物品及家属专为葬礼而备的物品，即所谓“赗、奠、赙、赠”之物[6]。遣策置于棺内，既是丧仪程序的一部分，也是为了确认亡灵对物品的所有权。

今所见遣策实物多属楚汉，常以木、竹材料制作[7]，汉以后又有石（或滑石）为之者。由于物品腐朽及墓葬盗扰等原因，遣策内容不尽与实物相符，但也并非虚夸，大部分遣策物品应该是真实存在过的。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丧礼所经历的招魂、衣衾、吊襚、设袭、敛奠、赗赠、入圹诸环节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实物遗存，其中一部分可与遣策内容相对应，包括死者生前旧物、丧仪中的衣衾、赗赠、敛奠、饰棺之物等。略举数例如下：

（1）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霍贺墓（出土了铜印章“霍贺之印”）[8]：在墓室内并置男、女二棺，不但二棺内物品种类明显有别，而且棺内、外也有差别。男棺内死者“头戴黑色冠帻，颈项围白色巾，身穿黄地朱绘云纹长袍，质地都似丝绸织品”，左手边置铁剑、铜印，右手边置铁匕首、铁刀，两脚放置铜镜、木梳、木砚盒、遣策、铁书刀（其一铭文“宜官腆二千石”）、丝质钱囊（内藏五铢钱）、竹笥（藏栗、枣、杏等）、小谷物袋（藏黍稷），棺外放鸠杖、木棍等；女棺内则是角簪一对、漆奁盒一套（内有化妆用具和化妆品）、铜镜，棺外有铅丸和葫芦。显然这些都是分别属于男女主人的私人物品（生前旧物、丧仪用物），丧仪中的衣衾类物品被记录在1块木质遣策上。私人物品以外的随葬品则不见于遣策内容，该墓的公共区域—共用的前堂—放置着男女主人的共同物品，可能是一套墓内祭奠的物品：漆案（上置耳杯）、漆食奁、竹笥（盛栗、枣）、釉陶壶等，另外还发现了木架，这里陈列的应是一套罩有帷帐的祭台，可能是合葬时墓内祭奠所用，故不见于遣策。

（2）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9]：出土了竹、木遣策，分别置于边箱内，竹遣策所记包括副食品、调味品、酒类、动植物、衣物、竹木器、明器等，木遣策做成上圆下长方形，顶部有小孔，以绳子系在竹笥上，记有笥内物品的名称，如“衣笥”“缯笥”“牛脯笥”等共49枚，在西边箱的6个竹笥内发现保存完整的衣物达60余件，其他笥内放置着食品、模型明器、泥质冥钱、乐器、草席等物。木遣策上所记为多为生前旧物和衣衾，竹遣策上所记多为祭奠用品。

（3）安徽南陵麻桥东吴墓[10]：出土了3件木质遣策，其中M3出土2件，其一出自棺内，以大字总括棺内衣物“各衣物合八种是丹杨宣成男子萧礼有”，并以小字罗列“巾一枚”“覆面一枚”“袜一量”等11件衣物；另一出自棺外，列有“酒器五十石”“□一仓千石”“□□五百石”“饭案”“□具”“宛（碗）□”等粮食和器具，所记当为棺外物品。另一座墓中仅在棺内出土1件，正反两面书写，可能包括了棺内和棺外物品，主要是各类衣物和布匹，如“绛被一枚”“绣两当一枚”“锦两当一枚”“锦十匹”“練十匹”“各□缯合百匹”“手巾二□”“枕二枚”等，也有器具如“竟（镜）一枚”“银叉六枚”“金叉四枚”“突无叉三枚”“铁刀一枚”“木一、椅一具”“麻三斤”“□□镜一具”“贝□五百万”等。此墓遣策所记棺内物品主要是衣衾类，棺外物品除生前旧物外，还有祭奠用品（如M3的酒器、碗、饭案及粮食等），不过这里的祭奠用品与前述海州霍贺墓的祭台物品性质不同，后者是墓内祭祀时设立的，前者是下葬前预备的，只有下葬前预备的祭奠物品才可能记录在遣策上。

（4）江西南昌东吴前期高荣墓[11]：棺内出土1件木质遣策，记各种衣物40余件，另列有“指函”“大刀”“研（砚）”“笔”“书刀”“官纸”“漆碗”“金叉”等用品，最后总括“大凡百一十枚皆高荣许”。此墓衣物皆以“故”字开头，且明确表明为死者高荣生前私人旧物。同样的情形常见于汉晋遣策，如长沙马王堆3号墓遣策“白縠衾二，素里，其一故”，江陵凤凰山汉墓M8遣策记有衣物三四十件，有的冠以“新”

或“故”字，长沙西晋潘氏墓遣策皆冠以“故”字[12]。凡书“故”者可能是死者生前旧物，书“新”者可能是亲朋所赠，即“致襚”之物。

（5）江西南昌西晋夫妇合葬墓[13]：墓内有两具木棺，木质遣策置于男棺内，列出了27件衣物及“严器”“铜镜”“刷”“面纸”“书箱”“书砚”“笔”“墨”“刺”“棺中笙”等生前玩好与器具，所有物品皆冠以“故”字。衣物已腐烂，衣物之外的物品多发现实物，但置于棺外的青瓷器皿并不见于遣策。值得注意的是，遣策中有“故棺材一枚”，则棺作为丧仪中预备的葬具也可记于遣策。

（6）长沙东晋升平五年（361）周芳命妻潘氏墓[14]：滑石板遣策所记内容为40余件衣物及“铜镜”“针囊”“剪刀尺”“细笙”“严具”“银叉”等用具，皆冠以“故”字，也列有“故棺材一口”，表明这些皆死者私人物品或丧仪用物。石板背面则是一段买地券式的文字，除记死者生平外，还特别说明“其随身衣物，皆潘生存所服饬，他人不得妄认抵债”，此表明了遣策埋入地下的意义之一在于确认物品的所有权。

遣策除流行于楚、汉、晋时期的南方地区以外，在吐鲁番和河西的十六国墓葬中也较为常见，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喇和卓一带发现过晋唐时期的遣策数十份[15]，不过唐代以后渐不见。

安阳西高穴“曹操墓”出土的62件刻铭石牌无疑与上述遣策的性质和功能相同，同是丧葬典礼中的“赗、奠、赙、赠”之物，是曹操的生前旧物和丧仪用物。其中7块圭形遣策发现于前室，皆刻有“魏武王”，多为兵器之属，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短矛”“魏武王常所用大刀”“魏□□常所用搏□□（椎）”“魏武王常所用长犀盾”等；其他大多数遣策都是平首斜肩，皆发现于后室（棺室），记有各类衣物、玩好及丧仪用品。

虽然曹操墓已被严重盗扰，已无从复原物品的原有种类、数量和陈列位置，但从圭形石牌出自前室、平首斜肩石牌出自后室来看，随葬物品在墓室内的摆放还是有迹可循的：平首斜肩者所记皆为衣物、玩好器用及陈设用器，可能是置于棺内的旧物和玩好，以及丧礼中的赗赠、祭奠用品；圭形者所记之“常所用”兵器可能正是代表其身份的一套生前旧物，武家璧认为正好构成了曹操“常所用”的侍卫警跸用具，相较《后汉书·舆服志》的天子仪仗，规模甚小，可证曹操之俭[16]。在实际出土遗物中，有些可能正是遣策所记物品，如前室散落的兵器、后室所见的金玉饰件、云母、石圭、石璧、铁镜等。至于墓中遗留的部分陶瓷器皿、陶俑、仓、灶、井等模型既不属于生前旧物，也不是丧礼中的赗赠、祭奠用品，而是丧礼之后陈设于墓中的明器，故不见于遣策。

二、刻铭石牌所记名物

曹操墓出土的刻铭石牌制作规整，多为规整的汉隶，文字大多可以辨识，除7块圭形石牌外，其余55件平首斜肩石牌所记物品以衣衾类最多，其次是器用类，也有少量丧

仪之物。兹分类简释如下。

1. 衣衾类

石牌所记衣衾包括袍、衫、裙、袴、襜襦、臂褠、袜、标、被、褥等织物。应该原是置于棺内的，但实物极难保存，墓内难觅踪迹。

（1）袍

黄绫袍锦领袖一

即以锦饰领、袖的黄绫袍。绫和锦都是极为珍贵的丝织品，绫是一种细薄光洁的丝织物，《释名・释彩帛》："绫，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17]；锦是有多彩图案的丝织品，《释名・释彩帛》："锦，金也，作之用功，重于其价"。

汉之五时朝服，即春、夏、季夏、秋、冬时节所服不同颜色的朝服，朝服经特许是可随葬的，《后汉书・礼仪志》"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五时朝服各一袭在陵寝，其余及宴服皆封以箧笥，藏宫殿后阁室"[18]。《三国志・魏志・王凌传》："加追戮陈尸斫棺，载在方策……乃发凌愚冢，剖棺曝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19]"黄绫袍是朝服中之至贵者，天子所服。《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虽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矣"[20]。故此黄绫袍当显示出墓主的特殊身份[21]。

（2）衫、衣架

紫绡披衫、黄绡不（襆）

白練单衫二

长命绮複衫丹文不（襆）

墨画衣枷一

绡是生丝织的缯帛，練指煮得变得柔软洁白的丝织物，绮是有花纹的细绫，皆为上衣之属—衫。《释名・释衣服》："衫，芟也，衫末无袖端也，有理曰複，无里曰单"[22]，故有单衫、複衫，加在一起为一袭，有功者常被"赐衣一袭"即指此，被赐之衣物要在丧仪中穿在死者身上，即设袭。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2件素纱单衣皆十分轻薄，身长128、160厘米，却重不到50克。

白練常用于敛尸、祭吊等丧葬之用，《通典・大丧初崩及山陵制》："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23]。《搜神记》："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绣裲裆"[24]。

绮上一般有花纹，《释名・释衣服》："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有杯纹，形似杯也，有长命，其采色相间，皆横终幅，此之谓也，言长命者服之，使人命长"。此长命绮複衫可能即此类。

（3）裙

白绮裙

白練单裙一

绛白複裙一

丹文直领一、白绮裙自副

裙属下裳，男女皆着裙，《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随时单複出入闺庭”[25]。《后汉书·马皇后纪》：“常衣大練，裙不加缘”[26]。

丹文直领与白绮裙为一套上衣下裳，直领为如袍的外衣，《释名·释衣服》：“直领，邪直而交下，亦如丈夫服，袍方也”。

（4）袴、襜襦、臂褠

绛文複袴一

丹绡襜襦

紫臂褠一具

袴即裤。襜襦是一种较长的单衣，类披风，《释名·释衣服》：“荆州謂褌衣曰布□，亦是襜襦”。《东观汉记·来歙传》：“来歙，字君叔，南阳人也，有大志，慷慨治左氏春秋，与刘嘉俱诣洛阳，世祖见歙，与之大叹曰：‘君叔劳苦’，解所披襜襦以衣，拜大中大夫”[27]。

臂褠是一种臂衣，《释名·释衣服》：“褠，单衣之无胡者也，言袖夹直形如沟也”，汉魏间士庶所著，《后汉书·马皇后纪》：“仓头，衣绿褠，领袖正白”。李贤注“褠，臂衣，今之臂褠。以縛左右手，于事便也”[28]。

（5）袜

黄绡袜

白練袜一量

《释名·释衣服》：“袜，末也，在脚末也”。汉魏时期有以袜赐臣者，《后汉书·鲁丕传》：“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29]。《后汉书·董祀妻》载曹操赐董祀妻蔡文姬“头巾、履、袜”[30]。

（6）标、被、褥、荐、篳、冒

绛标文绮四幅被一

黄绮被丹绮缘

紫绮大褥一□补自□

墨画零状荐蒻篳一具

标为冠帽上的坠饰，以繒为之，以颜色区分身份，《晋书·舆服志》：“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时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服，无定色，冠黑帽缀紫标，标以繒为之，长四寸、广一寸……中官紫标，外官绛标”[31]。

被褥为床上卧具，床榻上的垫具也可称褥。《三国志・卫觊传》：“武皇帝之時，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褥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此皆陛下之所亲览也”[32]。《晋书・杨柯传》：“常卧土床，覆以布被，裸寝其中，下无茵褥”[33]。褥也可赐功臣，《晋书・颜含传》：“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禄大夫，门施行马，赐床帐、被褥，敕大官，四时致膳”[34]。

“墨画零状荐篛簟一具”指墨画的席子，“荐”和“簟”都指席，“篛簟”即竹席。簟也用作葬具，《后汉书・赵岐传》：“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35]。周代丧礼中，尸体沐浴所在的床上“下莞上簟”，即下为草席，上为竹席。

以上衣物涉及的织品有绫、锦、绮、绡、練等质料，袍、披衫、不（襆）、襜襦、裙、袴、襛、袜、被、褥等种类，黄、紫、绛、丹、白等色。这些既是士人日常所服，也可作为馈赠、赏赐品在丧仪中陈列。衣衾是将遗体移至卧床后进行的，在给遗体穿衣和装殓（即设袭）、小敛和大敛阶段要对君长、亲朋所送之衣物尽数陈列，一些穿在死者身上，另外的则收藏在衣笥里以备一同下葬。在这个程序里，既有各类衾（被、褥），也有各类衣（祭服、散衣），仅在小敛、大敛阶段陈列的襚衣（亲朋所送之衣）就有数十套，因此，衣衾是考古发现的遣策记录最多的物品，故这些遣策又有“衣物疏”或“衣物券”之称。遣策所记的衣物不尽穿上死者身上，还有一部分陈放在棺旁的竹笥内，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穿了20层衣物，同时还发现了写有“衣笥”的签牌，若对衣服质料和种类进行分析，或许还可以分辨出分别属于设袭、小敛和大敛阶段的衣物[36]。又如前述南陵县麻桥东吴墓M3棺内遣策上记有“各□衣物合八种是丹杨宣成男子萧礼有”，并详细列出了“巾一枚”“覆面一枚”“袜一量”等11件衣物[37]，这些衣服应该是曾经穿在死者身上的，是设袭（如用于瞑目的覆面）和小敛、大敛的产物。

曹操墓遣策所记衣物将近20种，也应该分别是设袭、小敛、大敛阶段的产物，其中“白練单衫”“白練单裙”“白練袜”有可能是设袭时穿的一套衣服，白練常用做敛尸之用；而“绛标文绮四幅被”“黄绮被”“墨画零状荐篛簟”“紫绮大褥”等则是入殡之前的“凭尸”床第之物。

2. 器用类

包括帷帐、屏风等陈设器，书案、刀尺等文房用具，妆具、食具、沐具、戏具、钱财等，其中有生前旧物，也有亲朋赙赠之物，有的并非实物，而以模型随葬，这类物品的实物一般放置在棺外。

（1）帷帐、屏风等陈设类

广四尺长五尺绛绢斗帐一具，构自副

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

一尺五寸两叶绛缘镘屏风一

慰项石一

渠枕一

帷帐和屏风是士人居室的重要陈设，《汉书·文帝纪》：“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38]。《邺中记》记邺城铜爵三台：“三台相面各有正殿，上安御床，施蜀锦、流苏、斗账，四角置金龙头，衔无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戍屏风床”[39]。

帷帐又可作为丧礼中的陈设，《晋书·左贵嫔》载左芬为元杨皇后献诔，“臣妾哀号，同此断绝，庭宇遏密，幽室增阴，空设帷帐，虚置衣衾”[40]。

此处帷帐“广四尺长五尺”，按汉尺（1尺=23厘米），则仅有1.1米多长，屏风也只有0.8、0.3米（可能指宽度），所以它们可能并非实物旧物，而是祭奠仪式中的赙赠用品。

帷帐、屏风等多为木质，易腐朽，曹操墓后室曾发现大量不可辨识器形的漆木器和4件铁质账架构件，或许就是这类陈设器的残留。

慰项石和渠枕都是枕头，可能即指曹操墓中发现的形如马鞍的枕。枕不一定是卧具，而更多是一种倚靠之具，常置于几案、床榻或坐车之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1件绣枕和2件枕巾，与遣策所记“绣枕”“素乘云绣枕巾”相符，这种枕可能是卧具。

（2）书案、刀尺等文房用品

书案一

刀尺一

木墨敛二合

八寸机一

木□机一

书案是置于床榻前的桌子，可置饮食器具，《后汉书·刘玄传》：“（更始帝刘玄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41]。曹操墓实物中发现灰陶案及砚台等物。

刀尺是缝纫用具，即剪刀和尺子，本为女子用品，《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俗，儿生一朞，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鍼缕，并加饮食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42]。又喻品评人物、执掌政事，《晋书·李含传》：“中正庞腾，便割含品。臣虽无祁大夫之德，见含为腾所侮，谨表以闻，乞朝廷以时博议，无令腾得妄弄刀尺”[43]。曹操墓发现1件残骨尺。

木墨敛可能是墨盒，也是文房用品；八寸机可能也是书案上的文房用具。

（3）沐具、妆具

沐具一具

轩杅一

女藻豆、药□具

木墨行清一

镜台一

胡粉二斤

香囊卅双

竹簪五千枚

木绳叉一

文镟母

镘莱菌一

“沐具”“轩杅”“女澡豆”“药□具”皆为沐浴之物。轩杅可能是某种浴盆，杅即盂，与沐具相似。《礼记·玉藻》：“出杅，履蒯席。”可能是较大的浴盆。曹操《上杂物疏》中有“纯银澡豆奁”[44]，则澡豆可能是沐浴时洁身之用。“木墨行清”即漆木厕所，《史记·万石君传》宋裴骃集解：“厕，行清”，则东汉至曹魏时期将厕所称作“行清”[45]。

镜台为支放镜子的梳妆用具，曹操墓中未见实物，但发现了一面铁镜，直径21厘米，外包有织物[46]。镜是汉魏时期极为普遍的生活用品，也是棺内常见随葬物，汉代一般用铜镜，但曹魏西晋时期可能受北方铜料短缺、社会动荡等原因影响，出现了大量铁镜[47]，洛阳出土的铁镜数量仅次于当时流行的“位至三公”铜镜[48]。有的铁镜制作非常精致，曹操在进献给宫廷的物品中就包括错金银的铁镜：“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皇太子杂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另有“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纯银七，贵人公主镜台四”（曹操《上杂物疏》）。

“胡粉”是一种化妆用品，《释名·释首饰》：“胡粉，胡，餬也，脂和以涂面也[49]”。《后汉书·李固传》：“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首弄姿”[50]。《北史·独孤皇后传》：“后雅性简约，帝常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51]”。胡粉可能来自西域，《魏书·龟兹国》：“又出细毡，饶铜铁铅、麖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犎牛等[52]”。胡粉也可用作壁画的底料，《宋书·百官志》：“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涂壁，画以古贤烈士，以丹朱色地，谓之丹墀”[53]。

“香囊”是盛放香料的用具，常见于汉晋时期的遣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记有4件香囊，与实物相符，内装茅香、花椒、辛夷等物。

“簪”即笄，是绾发、系冠或固定发髻的用品，往往用金、银、玉、角、铜簪，

先秦丧礼死后不着冠，簪以木为之。《仪礼·士丧礼》：“鬠笄用桑，长四寸，缓中”，郑玄注：“桑之为言丧也，用为笄，取其名也，长四寸，不冠故也”。遗体沐浴之后、入殓之前需剪指甲、剃须、整理头发，桑木簪即为整理头发之用，但汉以后不仅以木为簪，可以别的材料代替，汉墓考古发现的簪即有各种材料，竹簪是其一种，如武威磨咀子汉墓M48、M62即以竹簪括发[54]，马王堆一号汉墓也出土了多枚发簪。后代竹簪仍做沐浴之后的括发用具，“括发免髽之具，麻绳、布头、裂布、竹簪[55]”。“木绳叉”“文鍤母”可能也是类似的括发用具。在曹操墓实物中有骨簪20余枚。

上述沐具与妆具可能是死者生前旧物，也可能在丧仪中使用。在汉代丧仪的设袭和敛奠之前，要先对遗体进行沐浴和整理（饭含、楔齿、缀足、剃须、括发）。沐浴在庭院内进行，浴发用盘、浴尸用盆（如“沐具”“轩杅”），沐浴之后对遗体进行整容，包括括发（如“竹簪”“木绳叉”“文鍤母”）和妆容（如胡粉）。

（4）食具、戏具

漆唾壶一

五尺漆簿机一、食单一

漆浆台一

木表漆里书水椀一

樗蒲扑一

唾壶是盛唾之容器，曹操墓中未见漆唾壶实物，但发现了陶瓷罐、壶等容器，青瓷唾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常见随葬品。

“五尺漆簿机”“食单”“漆浆台”指漆木餐桌及食具，“簿机”是一种较矮、似几案的桌子，“单”即“箪”，是一种圆形竹器，而“浆台”是放置浆饮的案子，常以箪盛食、以壶盛浆。“木表漆里书水椀”是漆木盛食用器。

漆木器具在长江流域的汉晋墓葬中常见，鄂城的一座东吴墓（郭家垴M16）中发现21件漆器，包括唾盂、盘、耳杯、案、钵、槅、碗等，制作精美[56]；安徽马鞍山朱然墓（赤乌十二年，249）共发现60多件漆器，包括漆案、凭几、盘、耳杯、果盒、砚、尺、勺等[57]。

“樗蒲扑”即樗蒲，“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樗蒲卜也”[58]，是东汉时传入的一种外来游戏，汉晋时期盛行于朝野上下，又称五木，即以五根木条为骰子，骰子一面涂白、一面涂黑，最好的投彩是五个全黑，叫“卢”。《资治通鉴》：“上征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为侍中，师伯以谄佞被亲任……上尝与之樗蒲，上掷得雉，自谓必胜，师伯次掷得卢，上失色。师伯遽敛子曰，即作卢。是日师伯一输百万”。胡三省注：“樗蒲，采名，有黑犊、有雉、有卢，得卢者胜”[59]。樗蒲也用来代表运气，《晋书·慕容垂载记》：“初，（慕容）宝在长安与韩黄、李根等因宴樗蒲，宝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岂虚也哉？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宝拜而受赐，故云五木之祥”[60]。马瑞志（Mather）认为樗蒲是源自印度的游戏，类似于西

洋双陆棋[61]。

3. 丧仪类

（1）敛奠物

黄豆二升

亿巳钱五万

白蜜银廿饼

黄蜜金廿饼

圭一

璧四

黄豆、亿巳钱、白蜜银、黄蜜金等可能是丧仪中的祭奠用品，用于供奉亡灵。“黄豆”是与肉脯一样用作供奉的食物，在汉晋遣策中常见豆类食品与肉、酱、脯、鱼、姜等一同出现[62]，“黄豆”一词也见于东汉熹平二年（173）的买地券：“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63]。

亿巳钱、白蜜银、黄蜜金都是代表钱财的，是丧仪之赙赠环节的产物，有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并未埋入实物。圭、璧在周礼中是用于敛尸的六瑞之二。在汉代天子丧仪中也有赠圭的环节，《后汉书・礼仪志》：“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玉珪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纁周缘”[64]。按汉之一尺约23厘米，则“尺四寸”长约32厘米，曹操墓后室发现了石圭1件，长28.9厘米，另有石璧4件，直径28厘米，与石牌所记“圭一”“璧四”数量相符[65]，可能是敛尸之物。

（2）饰棺物

竹翣一

白缣画卤簿、游观食厨各一具

玄三早绯

绒二幅二

《仪礼注疏》郑玄注“棺饰”：“孝子既启见棺，犹见亲之身，既载饰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时，居于帷幕而加文绣，丧大记曰，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加伪荒，纁紐六，齐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画翣二，皆戴圭，鱼跃拂池……礼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汉礼器制度，饰棺，天子龙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龙翣二，其戴皆加璧”[66]。

遗体入殓之后，棺木下葬之前，需对棺柩进行装饰，周至汉代礼仪对棺饰有详细的规定，除了荒帷外，翣是重要装饰，郑玄注：“汉礼，翣以木为筐，广三尺，高二尺四寸，方两角高，衣以白布，画者画云气，其余各如其象。柄长五尺，车行使之持之而从，既窆，树于圹中。”

翣是罩在棺上的木框架，上蒙有白布，布上绘云气等纹饰，即“画翣”，而天子又有“龙翣”，则绘龙纹、悬挂圭、璧者，当为天子之棺饰。画翣除了云气、龙纹外，也可绘其他象征身份等级的图案，“白缣画卤簿、游观食厨”可能也是翣上的装饰，卤簿即仪仗，帝王出行及下葬皆有相应卤簿，游观食厨指离宫别馆，《史记·李斯传》载李斯从狱中上书，自陈七宗罪，“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67]。游观也可入画，《后汉书·梁统附玄孙冀传》：“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68]。

“玄三早绯”“绒二幅二”可能是丧仪中赗赠的棺饰物，《后汉书·礼仪志》：“司徒跪曰，请进赠……赠币，玄三纁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69]。

以上棺饰皆为竹木或纺织物，墓中未见实物，但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属泡钉，当可作饰棺证据。

三、曹操墓与汉天子丧仪

周代的丧葬礼仪以《仪礼》中的《士丧礼》和《既夕礼》最为详细，汉代虽然有所变革，但基本程序没有很大变化，从初死到下葬大约包括如下几个仪式环节：招魂、衣衾、吊襚、设袭、敛奠、赗赠、入圹。仪式的每个阶段都会在考古实物遗存中有所反映，这已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将曹操墓刻铭石牌与墓内残存实物对照考察，可略窥汉代天子丧仪之实施情况。

曹操墓多次被盗，仍出土各类质地器物400余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骨、漆木及陶瓷器，而刻铭石牌所记物品大多为易朽的纺织物、木、竹及食品、化妆品类，或有一些残留，但已不可辨识，如后室“多处发现有漆木器，仅残存局部，器形不明”，可能就是书案、屏风、漆簿机等木质物品的残留。而残存的玉石器、金属器等可能与石牌所记物品有关，如石圭、石（玉）璧、铁镜、兵器、铜钱、铜叉、骨簪、骨尺等可能正是石牌所记各类器用或丧仪用品，至于食物、化妆品等物是否存在，还有待更细致的分析和鉴别。

《后汉书·礼仪志》载有天子丧仪明器及赗赠之物[70]：

>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列各种容器及所盛食物）……祭服衣送皆毕……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玉珪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缇里，赤纁周缘；赠币，玄三纁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

与曹操墓实物和石牌名物相对照，排除墓葬被盗扰等因素，墓内出土物应大致涵盖了以上明器及食物、用品，尤其出土的“常所用”兵器，圭、璧及棺饰之法等非普通之物，可能昭显了曹操死后的天子丧仪。

曹操墓刻铭石牌名物中，除衣衾、丧仪用品外，其他器用之物可能是曹操生前旧

物。东汉末年，献帝都许以后宫中物品匮乏，曹操将祖上所得赐品及搜罗所得进献，以补宫廷，其所献物品大抵与石牌所列器用、玩好相类。

曹操《上杂物疏》[71]载：

御物三十种，有纯银参镂带漆画书案一枚，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一枚。御物有漆画韦枕二枚，贵人公主有黑漆韦枕三十枚。（《北堂书钞》卷一三四）

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副；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北堂书钞》卷一三五，《艺文类聚》卷七〇）

御杂物用，有纯金唾壶一枚，漆圆油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太平御览》卷七〇三）

御物三十种，有上车漆画重几大小各一枚。（《北堂书钞》卷一三三）

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皇太子杂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太平御览》卷七一七）

御物中宫贵人公主皇子纯银漆带镜一枚，西园贵人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一，皇子杂用物十六种，纯金参带方严四具。（《太平御览》卷八一二）

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纯银七，贵人公主镜台四。（《太平御览》卷七一七）

纯银澡豆奁，纯银括镂奁，又银镂漆匣四枚。（《北堂书钞》卷一三五）

油漆画严器一，纯金参带画方严器一。（《太平御览》卷七一七）

御杂物之所得孝顺皇帝赐物，有容五石铜澡盘一枚。（《北堂书钞》卷一三五）

有银画象牙杯盘五具。（《太平御览》卷七五九）

中宫用物，杂画象列尺一枚，贵人公主有象牙尺二十枚，宫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太平御览》卷八三〇）

中宫杂物，杂画象牙针管一枚。（《太平御览》卷八三〇）

曹操《上器物表》：

臣祖腾，有顺帝赐器。今上四石铜鋗四枚，五石铜鋗一枚，御物有纯银粉粉铫一枚，药杵臼一具。（《太平御览》卷七五七、七六二）

曹操进献的物品当可代表汉至曹魏时期贵族的日常器用，自然也可进入丧仪中的赗赠环节并实际埋葬，将考古发现的汉晋遣策与随葬品对照，可知遣策所记并非虚夸，应体现了汉晋时期的实际埋葬情况。汉代的厚葬模式至汉末曹魏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丧葬一再简省，但墓葬的规模、随葬物品种类和丧仪程序依然要体现墓主的尊

显身份，曹操墓刻铭石牌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汉末高等级随葬物品清单，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天子丧仪。

注　释

[1] a. 曹操墓石牌的照片或文字材料零星披露于简报、论文，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J］. 考古，2010（8）.

b. 李凭. 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 “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成果简介”［Z］.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J］. 考古，2010（8）.

[3] 米如田. “遣策” 考辨［J］. 华夏考古，1991（3）.

[4] 武家璧. 曹操墓出土“格虎”兵器牌考［J］. 殷都学刊，2011（3）.

[5] 既夕礼，士丧礼，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标点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a. 关于“赗奠赙赠”的性质及分类，参杨华. 襚・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J］. 学术月刊，2003（9）.

b. 郑曙斌. 遣策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诠释［J］. 南方文物，2005（2）.

[7] 郑曙斌. 遣策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诠释［J］. 南方文物，2005（2）.

[8] 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 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J］. 考古，1974（3）.

[9] 本文所引马王堆材料，均出自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10]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J］. 考古，1984（11）.

[11]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 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J］. 考古，1980（3）.

[12] 史树青. 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J］. 考古，1956（2）.

[13]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南昌晋墓［J］. 考古，1974（6）.

[14] 史树青. 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J］. 考古，1956（2）.

[15] a.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 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 1991.

b. 柳洪亮.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书［J］. 考古，1991（1）.

c. 侯灿，吴美琳. 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附录). 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M］. 成都：巴蜀书社，2003.

d. 刘安志. 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A］.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C］. 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5.

e. 田河.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衣物疏考释［J］. 社会科学战线，2012（6）.

[16] 武家璧. 曹操墓出土“常所用”兵器考［J］. 中原文物，2010（4）.

[17] 释名・卷四［M］. 本文所引《释名》皆为四库全书本.

[18] 后汉书・礼仪下・卷一六［M］. 本文所引正史皆据四库全书本.

［19］　三国志・魏志・王凌传・卷二八［M］.
［20］　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卷九［M］.
［21］　牛润珍. 曹操高陵新释证——西高穴大墓形制与文物研究［N］. 光明日报，2011-07-14（11版）.
［22］　释名・卷五［M］.
［23］　通典・卷七九・凶礼・大丧初崩及山陵制［M］. 四库全书本.
［24］　搜神记・卷一六［M］.
［25］　三国志・卷一一・魏志・管宁传［M］.
［26］　后汉书・卷一〇・马皇后纪［M］.
［27］　东观汉记・卷一・来歙传［M］.
［28］　后汉书・卷一〇・马皇后纪［M］.
［29］　后汉书・卷五五・鲁丕传［M］.
［30］　后汉书・卷一一四・列女传・董祀妻［M］.
［31］　晋书・卷二五・舆服志［M］.
［32］　三国志・卷二一・魏志・卫觊传［M］.
［33］　晋书・卷九四・隐逸・杨柯传［M］.
［34］　晋书・卷八八・颜含传［M］.
［35］　后汉书・卷九四・赵岐传［M］.
［36］　范志军. 长沙马王堆女尸所穿裹衣衾探析［J］. 华夏考古，2007（3）.
［37］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J］. 考古，1984（11）.
［38］　汉书・卷四・文帝纪［M］.
［39］　邺中纪［M］. 四库全书本.
［40］　晋书・卷三一・后妃传・左贵嫔［M］.
［41］　后汉书・卷四一・刘玄传［M］.
［42］　颜氏家训集解・风操篇［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43］　晋书・卷六〇・李含传［M］.
［44］　曹操集・卷一・上杂物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5］　赵超. 西高穴大墓出土石牌的辨识与断代［N］. 中国文物报，2010-02-05（3）.
［46］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J］. 考古，2010（8）.
b. 李凭. 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47］　全洪. 试论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镜［J］. 考古，1994（12）.
［48］　徐苹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J］. 考古，1984（6）.
［49］　释名・卷四［M］.
［50］　后汉书・卷九三・李固传［M］.

［51］ 北史・卷一四・后妃传・隋文献皇后独孤氏［M］.

［52］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龟兹国［M］.

［53］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M］.

［54］ 甘肃省博物馆. 武威磨沮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2（12）.

［55］ 读礼通考・卷四一・丧仪节四・司马氏书仪［M］. 四库全书本.

［56］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 鄂城六朝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5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 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6（3）.

［58］ 太平御览・卷七二六・方术部［M］. 四库全书本.

［59］ 资治通鉴・卷一二九・世祖孝武皇帝下［M］. 四库全书本.

［60］ 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M］.

［61］ a. 转引自丁爱博（Albert E. Dien）著，李梅田译. 六朝文明（第十二章）［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b. Richard B. Mather (trans.) , *Shih-shuo Hsin-yü: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M］. 615. Mather将这种游戏称作*chaupar*, 来自梵文*catushpata*（“四块布”），或*catushpatha*（“十字相交”）.

［62］ a. 如张家山247号汉墓遣策有“豉一笥”，马王堆汉墓遣策中有盛于竹笥中的“豆食品”等，参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b. 湖南省博物馆等.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

c. 宋超对此有详细考证，参宋超. “黄豆二升”小考［A］. 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63］ 针对有人以“黄豆”一词晚见而怀疑曹操墓的真实性，宋超、王子今先生撰文指出了汉代“黄豆”的存在. 宋超引池田温先生《中国历代墓券略考》所录“张叔敬墓券”. 参宋超. “黄豆二升”小考［A］. 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另参王子今. 曹操高陵石牌文字“黄豆二升”辨疑［N］. 光明日报，2010-10-26.

［64］ 后汉书・卷一六・礼仪志下［M］.

［65］ 圭、璧的数量和尺寸在发掘者的“成果简介”与“发掘简报”中略有出入，此处据“成果简介”，参张志清，潘伟斌. 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成果简介［A］. 曹操高陵——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C］.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66］ 仪礼注疏・卷八［M］.

［67］ 史记・卷八七・李斯传［M］.

［68］ 后汉书・卷六四・梁统附玄孙冀传［M］.

［69］ 后汉书・卷一六・礼仪志下［M］.

［70］ 后汉书・卷一六・礼仪志下［M］.
［71］ 上杂物疏，上器物表. 均转引自曹操集・卷一［M］. 中华书局，1974.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s of Stone Slabs from Cao Cao's Mausoleum

Li Meitia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 survey on the inscriptions of 62 stone slabs from Cao Cao's Mausoleu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labs are actually a kind of burial inventory, and then classifies the funerary items in the inventory into three types in burial representation: clothing, utensils and furniture, funerary appliance, each bearing its own ritual significance. The funerary items which might actually exist in this tomb represent a typical repertory of the emperor's funeral in Later Han dynasty.

Key words: Cao Cao's mausoleum; inscription; burial inventory; funerary ritual

我国考古中发现最早的稻草人形象

杨　洋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610000）

我们经常看到农民们在农田里竖立假人来驱赶鸟雀啄食稻谷和小麦，此种风俗广泛存在于全国各个民族中。如云南独龙族在树上、地边吊扎起的持弓弩的草人[1]；再如哈尼族，常给草人穿上旧衣、草帽等，有时还有在他们手里挂一个迎风即响的铃铛[2]。在世界各地也均可以看到稻草人的身影[3]，如加拿大东南沿岸的米福德小镇，被列为世界十大特色旅游小镇之一，并曾在2002年以“拥有稻草人数量最多”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再如英国约克郡的凯特维尔村庄，美国密歇根州的历史小城马歇尔，日本东京等。

那么，这种风俗最早起源于何时呢？

“草人”一词最早作为词组出现于《周礼·草人》：“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书中对于草人的定义为掌管“土化”的方法，即针对作物种类与土地，看他们怎样配合才合适，然后决定该种哪一种庄稼[4]。这里草人是作为一种官职出现的。

我们从文献中所知的草人多用于巫术和萨满教，如《礼记·檀弓》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刍灵即为用禾草扎成的草人，可引导死者去天上[5]。时至今日我国许多民族也多将草人用于巫术和祭祀等。如满族和鄂伦春人的经幡为系有多条线的草人[6]；傣族祭祀谷神也是在田地中央竖立一稻草人象征稻田守护神，保护谷物生长[7]；黎族常用泥人、草人等代表病人，丢弃或埋葬草人则是代替病人死亡，病魂才会离开，真正的病人也就活了[8]；羌族也认为为使病人康复，需要到墓地焚烧泥偶或草人[9]。

而对于将稻草人用到农田里驱赶鸟雀的最早传说据说是与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有关。这则故事[10]内容大概如下：“草船借箭”后，大雾渐渐散去，有一位在长江里放划钩的渔翁，正巧捕鱼到此。不一会儿，钩绳摇动，渔翁急忙去收钩绳。可是，当钩绳渐渐收近时，不想钩挂到的却是一个头戴皮盔，身穿皮甲的稻草人，渔翁忙捞上船，将它藏进了小船暗舱里。这位渔翁家住荆州农村，从稻草人第一天放在渔翁家里，奇事就发生了。原来渔翁家里有很多老鼠，平常连猫都不怕，可是这天夜里，老鼠绝了踪影。全家人几经琢磨，不禁想到估计与稻草人有关。到了落种季节，下到田里的谷

种，又同往常一样，田鼠要来吃，麻雀要来啄，渔翁正感到无法可治的时候，突然想到了稻草人。于是他把稻草人搬出插在育种地。这法子还真灵！稻草人在田里一竖，田鼠不来了，鸟雀飞走了，他家种的苗长得整齐茁壮。这个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农村，农民们都纷纷仿效，扎上一个个稻草人立在田间。后来发展到每逢收获和种植季节，为防鼠防鸟都扎上了稻草人。

这些毕竟只是传说，要探讨稻草人的由来，我们还是要从考古发现中找到与稻草人相关的遗物。笔者目前收集到以下两条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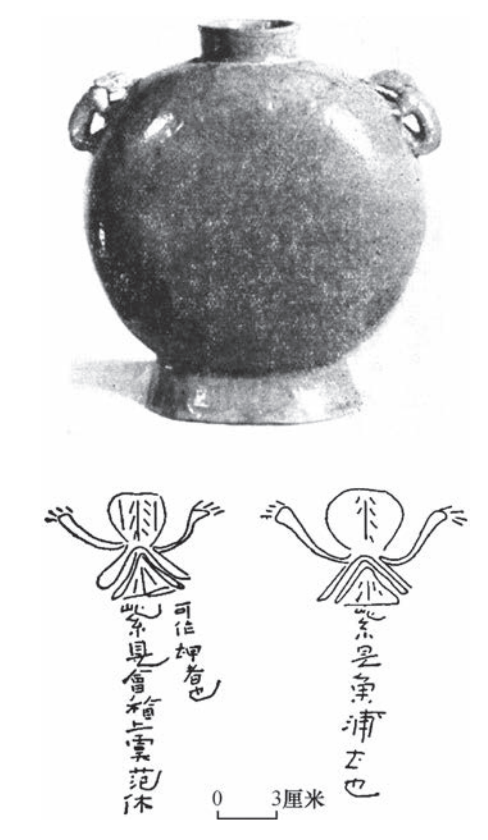
第一，陕南安康市的白河县文管所收藏有一块魏晋时期的青砖[11]（图一），应为稻草人图案。此砖上人物高15、宽5.5厘米。五官刻划写实随意，左脸颊斑驳不清，头顶似乎带了一个草帽，脖颈细长，身上披的网格和线条状长衣可能象征稻草编的长衣。

第二，江苏金坛县白塔公社惠群大队出土的一件青瓷扁壶[12]（图二），两肩各有一鼠形纽（该鼠有翼，短尾，可能是《山海经》上所说的飞鼠）腹上部刻划两个装饰图案，并刻划有文字，据瓷器的釉色和器物形制等推测为魏晋时期器物。据冯恩学先生观点，认为该扁壶装饰古朴简素，带有浓厚的农耕文化因素，粮仓中必有鼠活动，草人的目的自应是防鸟雀啄食[13]。





图一　白河县文管所收藏青砖



图二　金塔县惠群大队出土青瓷扁壶及刻划“稻草人”

这两件文物虽然器类不同，但是在时间上却有一个共性，都属于魏晋时期。再加上关于稻草人起源的传说亦是源于三国时期，因此笔者认为稻草人的起源时间应为魏晋时期。

注　释

［1］ 管彦波.谷魂信仰：稻作民最普遍的信仰形式——以云南少数民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5（3）.

［2］ 卢鹏.哈尼族传统稻作及其农耕祭祀[J].农业考古，2013（1）.

［3］ 琚北，小鹏.稻草人入侵[J].中华手工，2011（2）.

［4］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整理齐民要术的初步总结[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6（2）.

［5］ 陆思贤.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器纹饰研究［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1）.

［6］ 王纪潮.楚人巫术与萨满教的比较研究［J］.江汉考古，1993（2）.

［7］ 王纪潮.楚人巫术与萨满教的比较研究［J］.江汉考古，1993（2）.

［8］ 宋兆麟.黎族的鬼魂信仰［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2）.

［9］ 徐子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女神”问题略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1）.

［10］ 来自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cPoaT4f5ygzKS3bYZe3JtIWjqEpgkYJud9rqfgXKBgKxOJSWwIgZhWItskxkd6-7ahtD7woZ-PBQxtHaNUIF1q，2011-12-22.

［11］ 李挺.剪不断的魏晋情缘——两方羽人画像砖［J］.收藏，2012（9）.

［12］ 宋捷，刘兴.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J］.文物，1976（9）.

［13］ 冯恩学.胡风扁壶的时代风格［J］.北方文物，2013（2）.

The Discovery of the Earliest Strawman Image

Yang Yang

Abstract: The strawman image widely exists in our country and abroad. So, when did the strawman Custom originate?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ancient legends as well as the actual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earliest strawman image should be originated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strawman; literature lege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Wei and Jin dynasties

吐谷浑遗存的初步探索

李国华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810007）

吐谷浑，原是人名，是我国东北辽东慕容鲜卑首领涉归的庶出长子，据史籍记载，约在3世纪末吐谷浑率部西迁至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山脉），西晋永嘉末（312～313）吐谷浑又率部从阴山向西南迁徒，经河套，越陇山（今陕西陇县两陇山），达枹罕（今甘肃临夏）。不久，又向西向南扩展，征服了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羌、氐各族。至吐谷浑孙叶延时（329～351在位），遂以祖父名吐谷浑为姓氏、族名和国号，正式建立政权。至唐龙朔三年（663）为吐蕃所灭，历时16代，前后350余年。此后吐谷浑人一部分迁入内地，其余留在青海的吐谷浑各部则为吐蕃所统治，成为其邦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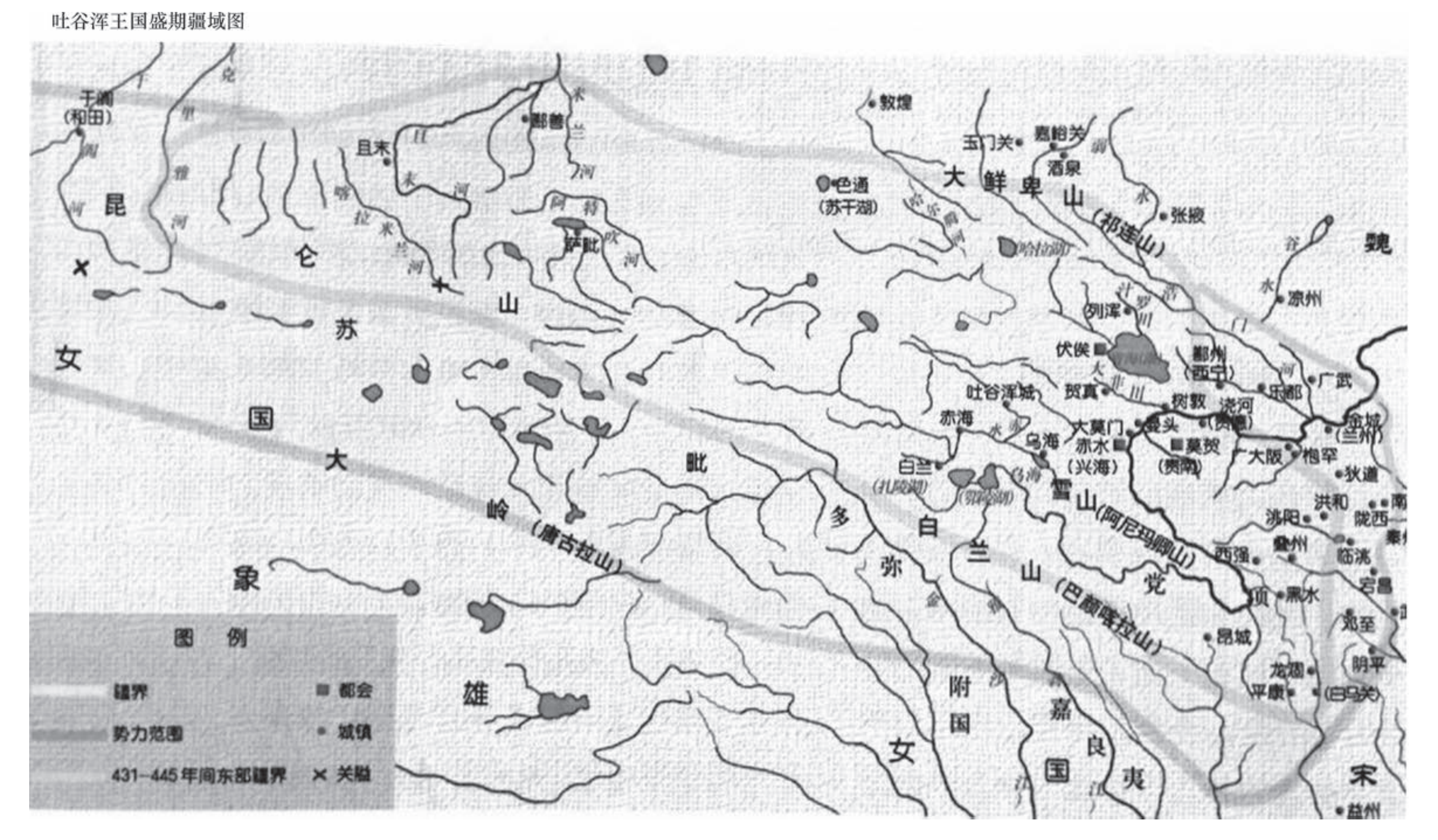
吐谷浑至伏连筹时期，达到鼎盛，疆域东至叠川（今甘肃迭部县），西与于阗（今新疆和田）相邻，南至昂城（今四川西北），北至祁连山、高昌（今新疆哈密），拥有东西2000千米，南北1000千米的辽阔疆域（图一）。吐谷浑的考古发现也集中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吐谷浑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等地，宁夏、陕西等地也有少量发现。时间范围大致从吐谷浑迁徙至甘南（313）到唐贞元十四年（798）慕容氏封嗣绝；研究的遗存包括城址、墓葬以及其他如墓志、岩画等遗存。吐谷浑遗存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不是十分系统和全面，但可以从已有发现中探索到吐谷浑遗存的分布与特征、把握吐谷浑文化的精髓，追溯其渊源和发展脉络。

一、吐谷浑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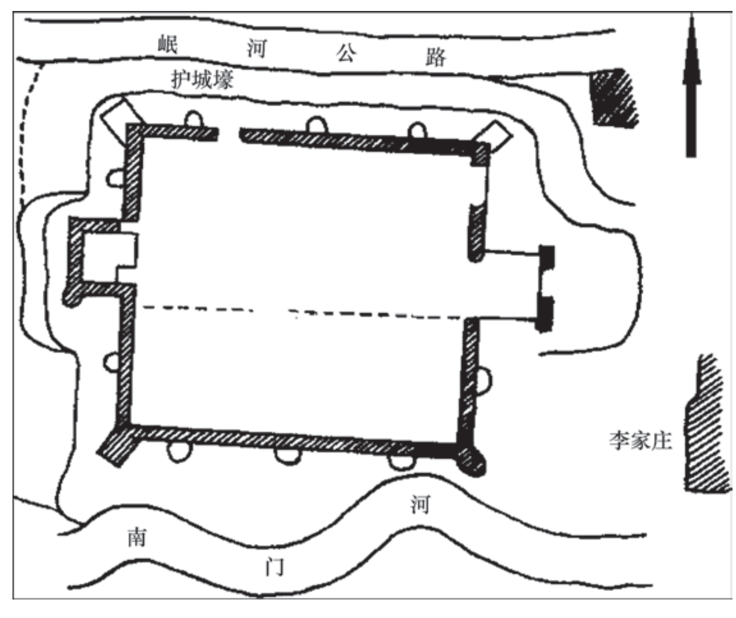
1. 城址

吐谷浑时期的古城主要分布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及青海湖周围[1]，根据构筑方式、出土遗物以及地理位置推测应是吐谷浑城址。

鸣鹤古城[2]，位于甘肃省甘南临潭县李家庄村，坐北向南，依山面河。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图二），东西长176、南北长162～185、残高5～8、基宽6、顶宽4米，城垣由红、白土混杂夹板夯筑而成，夯层厚12～15厘米，夯层中央横木棍直径约10～12厘米。四周有马面，角墩，东西两面开门，外有方形瓮城，城周有护城壕，宽10、深6米。


吐谷浑王国盛期疆域图
于阗（和田）
昆仑山
鄯善
且末
敦煌
玉门关
嘉峪关
酒泉
张掖
凉州
魏
大鲜卑山（祁连山）
色通（苏干湖）
萨毗
列浑
伏俟
鄯州（西宁）
乐都
广武
金城（兰州）
吐谷浑城
贺真
树敦
浇河（贵德）
赤海
乌海
大莫门
赤水（兴海）
曼头
莫贺（贵南）
大阪
枹罕
狄道
白兰
雪山（阿尼玛卿山）
洪和
洮阳
叠州
陇西
临洮
西强
宕昌
黑水
邓至
昂城
龙涸
平康
阴平
益州
宋
白兰山（巴颜喀拉山）
党
多弥
苏毗
女国
大岭（唐古拉山）
象雄
附国
嘉良夷
女
图例
疆界
势力范围
431-445年间东部疆界
都会
城镇
关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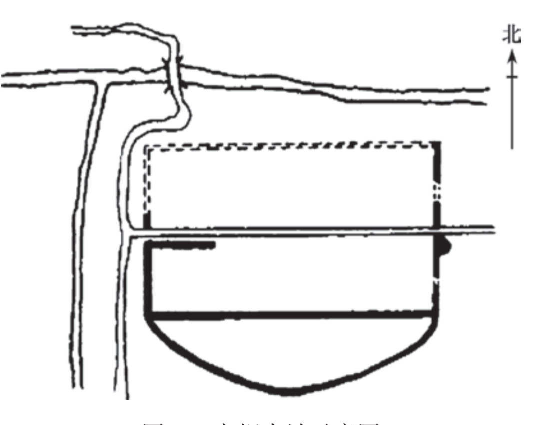
图一　吐谷浑盛期疆域图



图二 鸣鹤古城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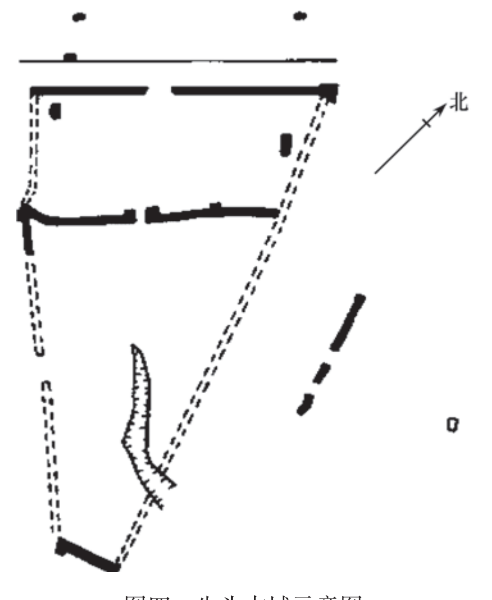
卡坝古城[3]，位于甘南迭部县卡坝乡。城址坐西朝东，两面临水，一面依山，是非常理想的置城设塞之所。卡坝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图三），南北长约110、东西宽约90、残高约4、基宽约4米，城垣夯筑而成。东门外侧发现了近似环状的瓮城。瓮城城垣夯筑，残高约1.5米。城内遗物以布纹板瓦和筒瓦残件居多。综合各种资料，卡坝古城应当是南北朝时期的“三足城”[4]，始筑于吐谷浑时期。

卡岗古城[5]，位于甘南迭部县卜岗村。城址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城址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60米。唯东垣保存基本完好，残高4.5米，基宽3.3米，采用素土拌以碎石片分层夯筑而成。城内没有发现建筑遗址，散布有少量素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残件。这座古城可能始筑于吐谷浑时期，被称作西强城或马牧城，是吐谷浑较早所建城郭之一，《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义熙中，阿柴遣其从子西强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6]，则西强城为西强公驻守，《旧唐书·地理志》“旧治吐谷浑马牧城武德三年，移于交成城”，此马牧城当为西强城[7]。



图三 卡坝古城示意图

牛头古城[8]，位于甘南临潭县古战村，坐西北向东南，凭山而筑，临河布垒，地形险要，是古代洮阳县西之门户。古城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其形略似牛头（图四）。



图四　牛头古城示意图

城垣周长935米[9]，城分前后两部，后城为全城三分之一。城垣高11米，基宽约5米，夯筑而成。城垣外壁置马面，城外有护城壕，宽20米，深5～6米。前城内有80平方米的两座大型建筑遗迹，后城中部另有一建筑物遗址。采集有陶器、瓦当、条砖等建筑构件。吐谷浑城堡（吐谷浑称大戍）主要是政治机构、军事堡塞之所在地。洮西地区之大戍，则以洮阳、洪和二城最为著名。史载伏连筹时“修洮阳、洪和城而置戍焉”[10]，牛头城正好在洮阳大戍的方位上，结合史料，可以肯定此城为吐谷浑的洮阳戍。洮西早在秦汉时期，就是羌人频繁活动的区域，又是吐谷浑民族渡河入陇的第一个立足点，也就自然成了它早期的统治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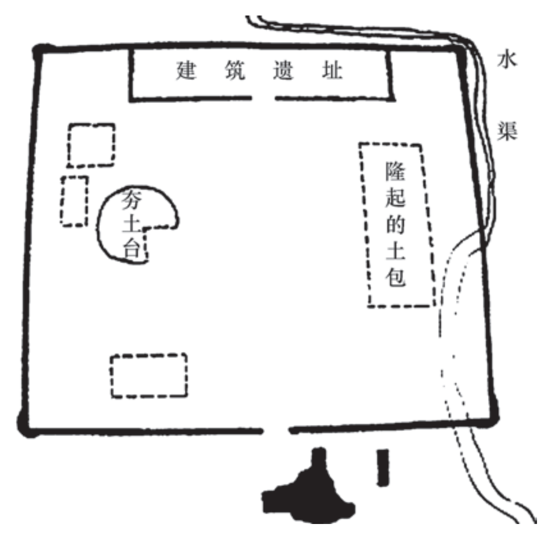
支冬加拉古城[11]，位于青海省兴海县河卡乡。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10米，南北宽250米，残高约0.8米，基宽约5米，由素土拌以碎石片夯筑而成。城内主要出土泥质灰陶器残件、素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残件。就其地层叠压关系而论，属南北朝时期。《北史・魏本纪》记载太平真君六年（445），高凉王那“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度流沙……”[12]，就地理位置观察，支冬加拉古城地处南北交通和东西交通两条干道的交叉点上，因而相当重要，由支冬加拉古城出发东南行可至贵南、东北行可至西宁、西北行可至茶卡，西南行往花石峡。关于这座古城，可能即文献多次提到的曼头城，曼头城是吐谷浑所筑建的重要城池之一。

夏塘古城[13]，位于青海省兴海县桑当乡夏塘村，北临河，南倚山。古城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长约170米，东西宽约160米，残高3米，基宽约4米，夯筑而成。东垣居中有城门，宽约15米。城内居中略偏西有一座圆形夯筑土丘，径3.8米，残高2米。城内散布有大量的泥质灰陶器残件，素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残件。该城始筑于南北朝时期，唐代沿用，应是文献所载河南国的赤水城[14]、隋河源郡城和赤水县城[15]。

曲沟古城[16]，位于青海省共和县菊花村东约500米。古城南面倚山，北面为滩，东临黄河，势高而地旷。古城平面略呈正方形，南北长约420米，东西宽约400米。城址有东门和南门，门外皆有瓮城。出土遗物有铁器残件、陶壶、陶罐等。普查报告认为该古城即文献中所载吐谷浑树敦城，“树敦、贺真二城，是吐浑巢穴”，自5世纪吐谷浑占据此地以来，树敦城是吐谷浑国都，隋代的树敦城是吐谷浑向东防守中央的重要门户。

铁卜卡古城[17]，位于青海省共和县石乃亥乡，城址坐落在青海湖畔比较平缓的草原中心地带，南依石乃亥北山，北临莱济河。古城平面略呈正方形（图五），东西

长220米，南北宽200米，残高6～12米，基宽17～18米，城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城垣用素土夯筑而成，晚期用土较杂。城垣四角宽大，疑似角楼。东墙处开门，门宽10米，门外有一折角形遮墙，应为瓮城，东西长约20米，南北宽约20米，城垣残高6米，夯层厚约8～11米。瓮城城垣用素土杂以碎石片分层夯筑，其筑建方法与其他吐谷浑古城完全相同。城内布局依稀可辨，城内自东门起有一条东西向大道，即为全城中轴线，最西端有一方城[18]，东西长70米，南北宽80米，建筑遗址西依城墙，其余三面是另筑的夯筑墙体，其基宽约2米，残高约1米，东墙居中有门，宽约5～7米，应该为内城。轴线南侧，残存一个平面近似圆形的圜丘状夯土台基，径约25～30米，残高约10米。台上有建筑遗址。在其南侧和西南处另有两座长方形的夯土台基，风化严重，夯土采用的方式类似吐谷浑城砌筑方式。轴线北侧有一个隆起的土包，是一平面近似长方形的建筑遗址，风化严重，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35米，根据辨认这个建筑可能为房屋基址。城内东南处即靠近东门处，出土大量素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残件以及夹砂灰陶残片[19]。城外有外郭围墙，墙基由河砾石垒砌而成，中轴线稍偏向东南，被一条内隔墙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较大，呈方形，东部较小，呈长方形，东部面积不及西部的1/2。外郭围墙南墙长1400米。根据黄盛璋、方永推断这方形外廓即是外城[20]。



图五　铁卜卡古城示意图

青海湖一带，是一片广阔丰美的大草原，适宜游牧生活，固定的建筑物极少。在都兰县以东，日月山以西的布哈河河谷一带，经过调查，这座巍然屹立的古城址颇具规模。史载“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21]这座古城，距青海湖以西最近处7.5千米，可能是吐谷浑在六世纪修建的都城。

加木格尔滩古城[22]，位于青海省天峻县。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750米，南北宽600米，高18米，基宽8米，夯筑而成。城内有3个小区。一号小区的建筑遗址内发现大量的粗绳纹板瓦、筒瓦和瓦当。中部探方内有大型铺地砖，并在该处南80米处清理出长方形房址两座。

香日德古城[23]，位于青海省都兰县。古城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320米，南北宽约300米。20世纪60年代，此城北城墙残迹尚存，城垣残高约3米，基宽约2米。古城的四角有四座马面，略高于城墙；城外有约8米多宽的护城壕沟。东城墙正中开一门，古城中有内城，筑在北城墙内，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70米，也是

东开一门。城南城北均有高大的烽火台遗迹。青海古城颇多，但城中有城，又有护城河、马面、烽火台的古城实属罕见[24]。《洛阳伽蓝记》载："宋云和惠生使西域经过吐谷浑境，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暖于余处"[25]。从宋云一行行程日数和吐谷浑城的气候条件来说，此城应为吐谷浑城。

1995～1996年发掘都兰香加乡科孝图遗址，内有宗教遗迹，此为吐谷浑遗存，但应报告未出，具体情况不详。

2. 墓葬

迄今为止，发现的吐谷浑墓葬遗存集中在青海乌兰、都兰一带，甘肃武威地区发现吐谷浑后期王族墓葬。由于墓葬都有不同程度的盗掘，无法完整表现文化特征，给研究带了困难，但也可以大致看到墓葬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反映吐谷浑与周边地区存在十分密切的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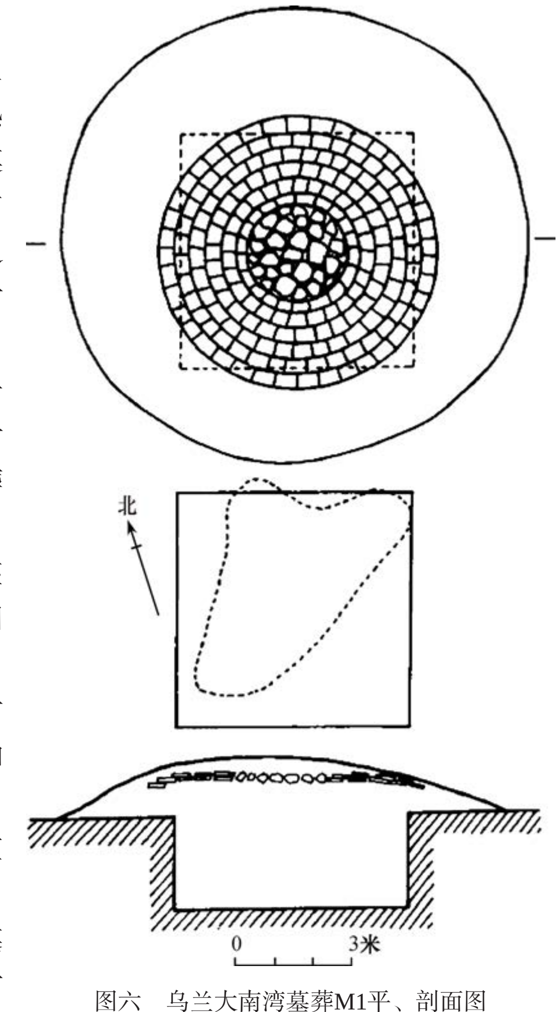
2008年青海省乌兰县茶卡镇茶卡乡采集到一块木棺盖板[26]，盖板前宽后窄，上有彩绘，盖板顶端凸起一直棱，高起，断面呈三角形，前部完整宽45.3厘米，厚12厘米，后部窄而残段。棺盖尖顶的两侧，绘有图案，其中一面较为完整部分脱落；另一面仅少数图像完整，余尽脱落。板画以白色打底，黑线勾勒，用绿、灰、红等色彩绘。盖板高起的中心线部位饰以红色的双连桃形或方胜图案，涂以红色。另一面只能见到一骑马射猎的纹样，骑马人缠头，身穿赭色窄袖交领上装，下身着裤，骑在黑色马背上，弯弓搭箭，向前方奔驰骑射，形象十分生动。从木棺盖板的彩绘装饰和所绘人物特征，结合相关文献，初步断定棺盖板上所绘人物的族属应为吐谷浑人。年代在6世纪左右。

茶卡墓葬[27]，2009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茶卡考古队在乌兰哈达村草场，发现一座建造规模巨大的陵墓。墓葬北依大山，面向茶卡盐湖，坐北朝南，南面宽约140米，南北长约240米，高约30米，平面呈椭圆形，墓葬位于西、北、东三面环山的中部。该墓尚未发掘。具体形制不甚清楚，年代族属也无法确定。鉴于墓葬的规模，以及附近的遗存如铁卜卡古城、加木格尔滩古城、茶卡彩绘木棺板等，推测这座陵墓应是吐谷浑国力强盛时期一位君主建造的陵。

乌兰大南湾墓葬[28]，位于青海省乌兰县东部铜普乡察汗诺村。2000年7～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6座，均被盗扰，墓葬形制破坏严重，M1，M3有圆形封土，M1（图六）封土直径12米，高1.7米。封土堆用长42米、宽28米，厚15米的土坯垒三层，呈阶梯状整齐排列。土坯下为厚10厘米的灰烬，内含少量牛骨、马骨等。M3封土直径13米，高0.5米，有盗洞至生土，墓葬形制为长方形，南北宽9.5米，东西长11米，用土坯垒砌而成，有门道、隔间，墓顶已被破坏。随葬品有陶环、铜扣、铜带、金币、银币等。

都兰墓葬群[29]，根据调查和发掘，都兰墓葬群主要分布在夏日哈河、察汉乌苏

河、柴达木河流域，目前发现近千余座，盗掘破坏严重，自1982年～1999年，都兰县的古墓发掘数量已达80余座，分别为热水墓群、夏日哈乡大什角墓地、香加乡莫克力沟墓葬等[30]。墓葬依山而建，多有封土，少数无封土，封土有圆形、梯形之分，一般均在地面砌梯形石墙，墓室上方盖有柏木，柏木大小与墓室大小成正比，柏木上再盖砾石一层。其中热水血渭一号墓上建筑极为特殊，该墓为双覆斗式封土，由上至下共铺有7层之多。都兰墓葬都发现封土祭祀习俗，即在封土中殉牲，墓冢从封土堆顶部往下约6米处，是一座长方形的动物陪葬墓，墓葬四周用石块圈砌而成，墓内有动物骨架70多个，有牛、马、羊、狗、鹿等动物。墓室常见长方形、方形、梯形等形式，分单室、双室和多室等几种，其中一号墓（99DRNM1）为多室墓，总共有5个墓室，每个墓室为2米见方，其南北各2室两两对应，各室之间有狭小的甬道衔接。二号墓（99DRNM2）为带墓道的前后室墓，前室为柏木结构，后室为石室。墓底以石块和柏木板铺地。葬具发现两种，一种为近方形的木制棺箱，一种是仅有底板和侧板的棺箱。无葬具的较多。葬式中多见屈肢葬，仰身直肢葬少见，火葬数量也较少，有单人葬、男女合葬和三人合葬等。



图六　乌兰大南湾墓葬M1平、剖面图

墓葬随葬器物有陶器、木器、皮革制品、骨器、桦树皮、古藏文木简、彩绘木片，以及金银饰件和大量绚丽多彩的丝锦、织物等。

武威青嘴喇嘛湾墓地[31]，位于甘肃武威市青嘴喇嘛湾，坐北朝南，靠山面水，经发掘清理的有9座墓，其中5号墓为弘化公主墓，6号墓是燕王慕容曦皓夫人武氏墓。以弘化公主的墓为例，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向南，为斜坡式，原长度不详，实际挖2米，宽1.4米，墓道最低处距现地表11米。甬道呈洞式，在墓室南壁中略偏东，长2.54米，宽1.8米。甬道用平砖叠砌，墓门前底层有封门砖。墓室为单室砖券墓，平面呈长方形，顶已塌，墓壁东面有盗洞。墓室东西长4.58米，南北宽4.4米，现存墓壁残高2.05米。四壁用条砖砌成。墓顶用长31厘米，宽16厘米的六瓣莲花砖封顶。墓底用边长36厘米的方砖平铺。墓室原用白灰粉壁，绘有彩色壁画。因多次盗扰，壁画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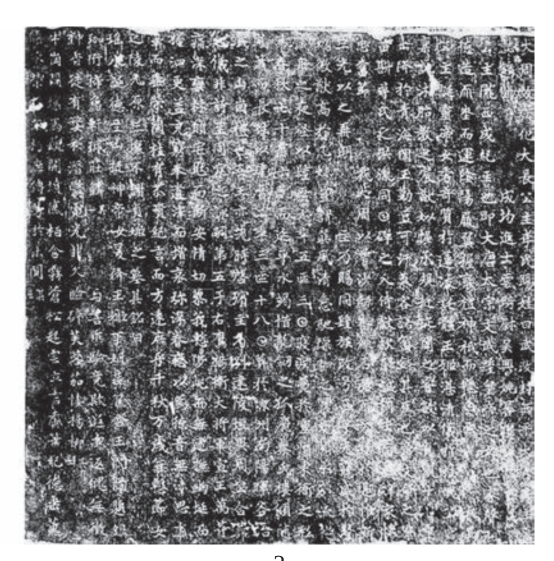
全部剥落。

由于墓葬多次被盗和自然破坏，许多文物都遗失。富有历史、科学价值的文物主要有墓志，包括：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大周故青海王慕容忠墓志、大唐故金城县主墓志、大唐故安乐王慕容宣彻墓志、大唐故政乐王慕容宣昌墓志、大唐故代乐王慕容明墓志、大唐故燕王慕容曦皓墓志、大唐故夫人武氏墓志、大唐故夫人李氏（元王慕容若妻）墓志[32]。除金城县主和慕容曦皓墓志铭存南京博物院，大唐武氏墓志存地区博物馆外，其余均在武威市博物馆保存[33]。这些墓志的出土，为考证唐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补正史书记载的不足，以及研究吐谷浑家族世系等方面，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大周西平公主墓志”（弘化公主墓志）为正方形，青石质，边长68厘米，厚6厘米，由志盖和志底两部分组成（图七）。志盖正中篆书“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四周雕刻缠枝草叶花纹图案，雕刻精美。志底文字25行，满行24字，字体端庄秀丽，展示出盛唐时期的书法艺术之美，四周饰以缠枝卷叶纹图案，雕刻精美，是研究唐与吐谷浑绘画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1



2

图七　弘化公主墓志

1. 弘化公主墓志盖　2. 弘化公主墓志铭拓片

除墓志外，随葬物品有木器、陶器、瓷器等，多以木器为主。彩绘木俑，造型生动，神态逼真，除木俑外，也有马、驼及家禽之类随葬，说明还保留有游牧生活习俗。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武氏墓中藏品中有一件唐代阮咸琵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阮咸琵琶。琵琶前后左右共镶嵌了37朵骨质梅花，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34]。

3. 其他相关遗存

包括墓志、岩画，出土文书等，这些资料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不足，也展示了吐谷浑的文化特征和其他政权的关系。

（1）墓志

魏故直寝奉车都尉汶山侯吐谷浑玑墓志[35]，1929年在洛阳出土。墓志长48.6厘米，宽51.3厘米。志文为楷书，共23行，满行21字，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吐谷浑玑为拾寅曾孙，是作为“世子”入仕北魏皇室，并受到魏宣武帝的重用，依魏孝文帝“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逐北”的汉化政策，于是像其他南迁者一样，成为“河南洛阳人”。吐谷浑玑墓志的出土和释读，为研究吐谷浑王国的历史及其与北魏王朝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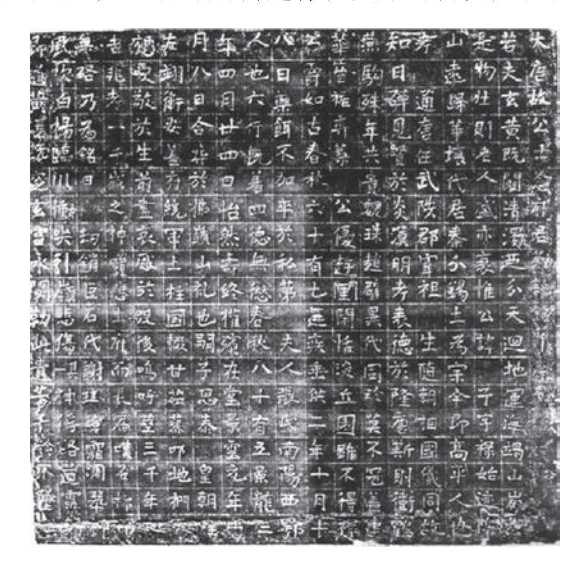
图八　魏故直寝奉车都尉汶山侯吐谷浑玑墓志铭图片

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羌县开国侯尧公妻吐谷浑静媚墓志[36]，1975年河北磁县文化馆发掘了北齐尧竣墓，共出土尧峻及其妻吐谷浑静媚、独孤思男三盒墓志。吐谷浑静媚墓志长63.5厘米，宽64厘米，志盖中心有篆书：“齐故尧公妻吐谷浑墓志之铭”，四角有铁环，志文属隶意甚浓的魏碑体，共27行，行28字，全文737字，从志文香，吐谷浑静媚应是吐谷浑玑的侄女，吐谷浑静媚的曾祖父吐谷浑头颓失利，投奔东魏，被授汶山公。后代与东魏、北齐的各族官员相互联姻。尧峻的另一个妻子独孤思男则是匈奴之后。这些墓志对于了解当时北方民族的文化融合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37]，1921年于洛阳出土，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元妃吐谷浑氏墓志，墓志长49厘米，宽47.7厘米，17行，行17字、21字、22字不等，计280字（图九）。妃为吐谷浑国王肖胤，安西将军、永安王斤之孙女，安北将军、永安王仁之长女，太尉公三老录尚书、东阳王之外孙。此墓志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得到了很多学者和专家的重视。

图九　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

大唐故公士念府君墓志[38]，2002年宁夏固原古雁岭唐代砖室古墓出土。此墓经早年盗掘，出土随葬品甚少，除散乱放置的4枚“开元通宝”外，唯有一盒墓志。墓志方形，白砂岩质。边长43厘米，厚6厘米，志文共19行，每行19字（图一〇）。根据墓志考释，可知“公士”是一种古雅的敬称，如同“府君”“使君”等。墓主姓念，为吐谷浑后裔，其夫人为南阳张氏，是汉族的名门望族。可见唐代少数民族后裔和汉族通婚不在限制之列。此墓志的出土是吐谷浑后裔遗存在固原的首次发现。



图一〇　大唐故公士念府君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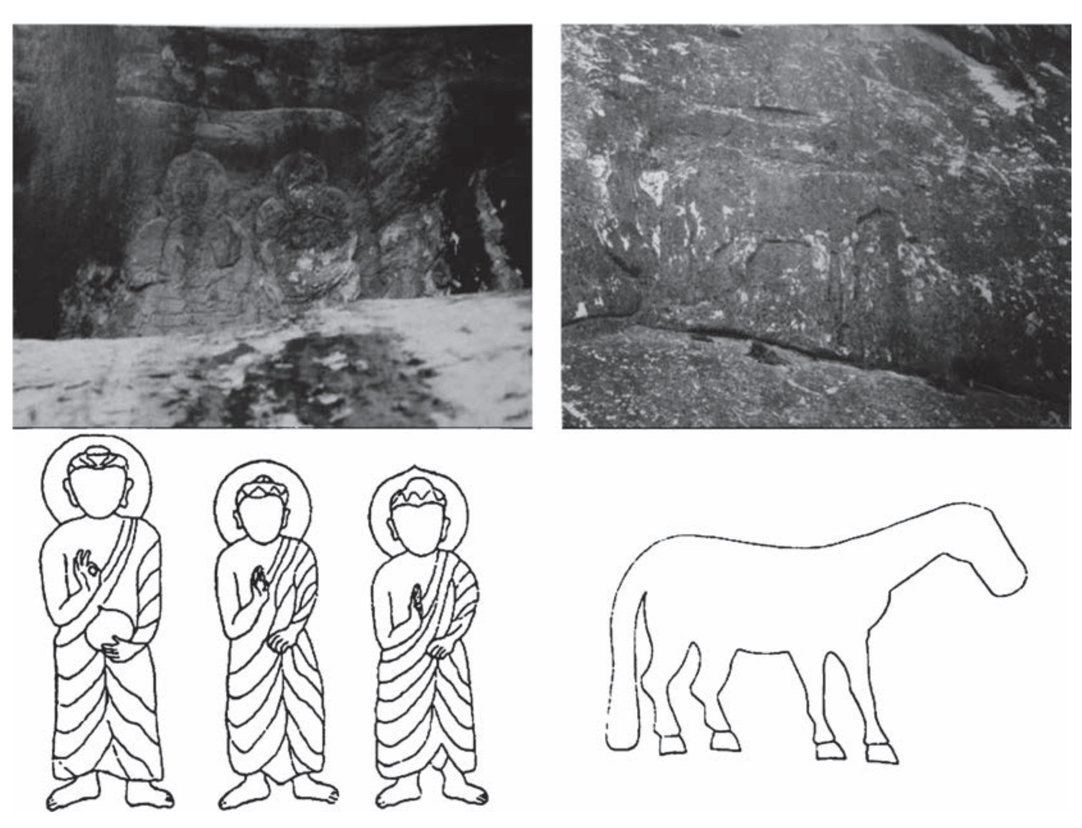
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神威墓志[39]，1974年宁夏同心县出土。据墓志铭记载，该墓主人为鲜卑族吐谷浑部慕容威夫妇。考之史书，慕容威为诺曷钵后人，曾任长乐州游击副使，乾元元年（758）葬于长乐州南之源。此为吐谷浑族于唐代长期封据今宁夏同心县境内之物证。

唐故慕容府君墓志[40]，该墓志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志现藏于西安市小雁塔保管所。此墓志的出土补充了吐谷浑末代王族世系。

（2）岩画

岩画是描绘、雕刻在岩石崖上的一种绘画，青海是我国岩画分布最多的省份之一，多以牛、马、鹿、羊等动物个体形象为主，还有宗教、文字、战争狩猎等内容。

露斯沟岩画[41]，位于都兰县热水乡，发现了以佛教题材为主要内容的岩画，露斯沟岩画大致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坐佛像，用阴刻手法表现，线条比较流畅；第二组为马图像，用浅浮雕手法表现；第三组立佛像。



图一一　露斯沟岩画

关于这三组岩画，学者将露斯沟岩画的年代断在5世纪～6世纪，属于北朝中期，族属为吐谷浑，表现对马的崇拜和佛教信仰。哈龙沟岩画，位于刚察县哈龙沟，巴哈毛力沟岩画位于都兰县。两处岩画以动物图像为主，有马、牛、羊，应是西北地区古代游牧

民族的文化遗存。历史上以游牧为主活动于青海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羌、吐谷浑、吐蕃等。吐谷浑曾在青海湖以西的伏俟城建都，哈龙岩画在青海湖附近，巴哈毛力岩画恰在吐谷浑活动的腹地都兰一带。这两处岩画可能与吐谷浑有关。[42]

（3）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20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发现了关于唐、五代时期吐谷浑情况的资料，其中敦煌文书有《吐谷浑〈阿柴〉纪年》[43] S・0367《唐光启元年（885）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S・0389的《肃州防戍都状》、S・0788的《沙州图经》、P・2962《张议潮变文》、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S・3074《吐蕃占领时期某寺白面破历》、P・4640《已未—辛酉（899～901）年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P・4640《已未—辛酉（899～901）年归义军衙内布纸破用历》[44]；吐鲁番文书[45]：吐鲁番阿斯塔那225号墓出土，阿斯塔那307号墓、阿斯塔那153号墓出土，吐鲁番出土哈喇和卓33号墓出土的文书中均有关于吐谷浑的记录。

二、吐谷浑遗存分区

青海、甘肃及陕西、宁夏、河北等地的吐谷浑遗存，由于不同的地理分布、不同时期活动范围的变迁，显示出多样性和差异性，这种差异是吐谷浑与其他民族互相渗透的结果，随着吐谷浑东西两部的分裂，以及东吐谷浑的内迁汉化、西吐谷浑的吐蕃化，各自的文化面貌因受不同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明显分化。

已知的吐谷浑遗存，可以划分为青南区、青海湖区、都兰区、甘肃河西及其以东地区。

青南区包括甘肃南部及青海东南部，主要遗存是城址，未有墓葬发现。该区发现数量较多的城址，古城大小形制、结构布局基本相同，建筑材料也大致相似，城的性质属于设防的军事堡垒，是吐谷浑初期为巩固其统治而修建，处于交通干道上也有商业性质。

青海湖区包括以青海湖为中心的茶卡、乌兰等地，发现了等级较高的墓葬、城址，如茶卡王陵、伏俟城等，此地为吐谷浑强盛时期的统治中心所在地。

都兰区，主要遗存是都兰墓葬群，这些墓葬中很难排除有吐谷浑亡国前的墓葬，但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所发现的均是亡国之后的墓葬遗存，文化面貌具有很强的吐蕃文化因素。

甘肃河西及以东地区，主要遗存有墓葬、墓志等。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吐谷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文化面貌上更多的是受汉文化影响。

三、吐谷浑的考古学文化特征

1. 城址的特征

关于城的性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随着吐谷浑与周邻政权关系的变化、各自力量的消长，以及适应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特点，城的性质也会被赋予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意义。总体来看吐谷浑这个民族是非常重视修筑城池的，这些古城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城的平面基本呈正方形或长方形，一般面积不大，长宽在100～200米，城垣用素土杂以碎石片分层夯筑，有的夯层中间夹杂木棍，起加固作用。多数东向开门，沿袭了鲜卑人“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46]的习俗。

（2）城内建筑物较少，有些古城如铁卜卡古城内有建筑台基，呈圆形，有学者认为是房屋基址、也有学者认为是佛教建筑基址[47]。城内主要出土泥质灰陶器残件、素面布纹里板瓦和筒瓦残件。

（3）吐谷浑城池基本都建在交通干道上，通过这些城，吐谷浑开辟了一条由自己控制的、能够沟通内地和西域的通道即吐谷浑道，这条道路的开通，影响深远。吐谷浑这些城镇是其交通网络上的联结点，除了用于军事、政治、生产之外，还有商业性质[48]。

吐谷浑都城有树敦城、吐谷浑城、伏俟城，树敦城是吐谷浑早期都城，地理位置重要，根据普查报告青海共和县曲沟古城为树敦城，平面呈方形，面积较大，出土物有铁器、陶器等；香日德古城、铁卜卡古城，两座城址的形制较特殊，有主城外城之分，主城仅于东向开一门，其内又有一内城，铁卜卡古城同时还设置外城廓，外城廓内以中轴线为界可分为两部分。吐谷浑是游牧民族，他们为了过不脱离水草的生活，以适应本民族与自然环境的特点，而建立了与内地不尽相同的城邑。说明吐谷浑人所建的城郭不但吸收了汉族建城郭的制度，而自己本身又有所变通。

敦煌文书中里反映吐谷浑有夏都和冬都，《吐谷浑<阿柴>纪年》[49]载：“6. 巡视……此年夏宫定于玛曲之滨的曼头岭murto-lying）……；17. 举行祭典，定夏宫于色通（Se-tong）；31. 圣寿大典于夏之孟月举行。夏宫定于郎玛（Langma）……；8. 之宫……其冬，在萨巴（Sra-bal）之羊山堡渡过……；15. 于羊山堡过夏（应为‘冬’）……；37. 此后，冬季住于查雪（Tsha shod）……”，这段文字中提到夏宫冬宫，说明吐谷浑有两都制度，需进一步研究。

2. 墓葬结构特征与葬俗

目前为止吐谷浑早期墓葬少有发现，因此结构形制不甚清楚，从茶卡采集到的木棺盖板可以略窥见早期的葬具形制，此木棺板前宽后窄，顶端凸起一直棱，高起，断面

呈三角形。这种木棺葬具，在其他地方的鲜卑墓葬中有发现，如辽宁北票慕容鲜卑贵族冯素弗墓[50]，该墓的木棺为前高宽、后窄低形制，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51]，其棺侧板的形状是分为“高帮”与“低帮”，由上、下两板合成，中间以铁钉相咬合。1981年宁夏固原发现一座北魏墓葬[52]，其葬具为漆棺，漆棺前宽后窄，棺盖顶端为三角形。这些墓棺多为前宽后窄、前高后低形状，棺盖的三角状顶端与茶卡出土的棺盖板完全相同，显然茶卡木棺是鲜卑的木棺形制，打上了鲜卑葬俗的烙印。

吐谷浑晚期的墓葬结构按地区分为两种。

青海地区发现的墓葬分为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地上建筑主要有梯形（覆斗形）封土、圆形封土，大型墓葬多为梯形封土，封土的构筑材料有黄土、沙石，大型墓葬的封土堆最底部有坚固的石砌围墙，其上是泥石混凝夯层，以及砂石夯层和夯土层组合而成的墓墙，呈梯形。封土从上而下，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冢丘的穿木，均为柏木，平面呈梯形。普通墓葬封土呈圆形，内含较多杂草根茎，其下用土坯垒三层，呈阶梯状整齐排列。封土堆下有殉葬的动物骨骸。地下建筑，墓室，常见长方形、方形、梯形等形式，分单室、双室和多室等几种，可见墓葬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葬式：有单人葬、男女合葬和三人合葬等，殉牲：多用马狗牛羊，一般位于封土之下，随葬品：一般为实用器，有陶器、木器、皮革制品以及金银饰件和大量绚丽多彩的丝锦、织物、彩绘木板、钱币等。葬具：一般采用木棺，木棺分为两种：一种为近方形的木制棺箱，一种是仅有底板和侧板的棺箱。木棺大多都有彩绘。

甘肃地区发现的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向南，墓道为斜坡式，甬道呈洞式，甬道用平砖叠砌，砖缝相错。墓室为单室砖券墓，平面呈长方形，顶已塌，四壁用条砖砌成。弘化公主墓葬的墓室原用白灰粉壁，绘有彩色壁画，因多次被盗，壁画已全部剥落。这时期由于受唐文化影响，汉化非常迅速，墓葬与同时期唐墓大体相同。有少量动物殉牲，也正反映了吐谷浑族特有的葬俗。随葬品中的漆器、陶俑、丝织品、铜器等，在制造工艺和器物造型上，都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相同或相似。另外从墓葬出土的墓志的记载来看，吐谷浑王族实行夫妻合葬制，如大唐金城县主墓志称：“开元六年岁次壬午正月十七日薨于部落，至七年八月十七日合葬于凉州南阳晖公北岗，礼也。”但据夏鼐先生考证“志称合葬，据实地踏查，慕容忠在县主墓东数武[53]，并非合穴。二墓平行排列。墓门皆向南”。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称，公主死后，“葬于凉州南阳晖公冶城之山岗，吾王亦先时启殡，主乃别建陵垣；异用公合葬之仪，非诗称同穴之咏”[54]，关于夫妻合葬制，并非真正的同穴，而是分穴葬于一地，这一点与汉族的夫妻合葬制度明显不同。

关于吐谷浑的葬俗，史书中有记载，吐谷浑人死后“皆埋殡”行土葬，“丧有服制，葬讫而除”，这种埋殡风俗应属鲜卑人的旧俗。无论青海地区还是甘肃地区发现的吐谷浑墓葬，主要是王族墓葬，都是依山而建，具有中原王族葬俗文化的特征。茶卡出土的木棺盖板，和其他地区鲜卑墓葬出土的木棺相比，可以看到浓厚的鲜卑文化特征。

从都兰墓葬和武威墓葬可以看出吐谷浑后期的葬俗，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内，如都兰墓葬的地上建筑非常特别，包括有柏木、混凝夯筑的围墙、动物殉葬墓等，《旧唐书·吐蕃传》曰："其赞普死……乃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这段史料记载与都兰墓葬存在的这种墓上祭祀相似，说明受吐蕃丧葬文化的影响。武威墓葬结构、及随葬品无不表现出汉文化对吐谷浑的影响。这两处墓葬所反映的不同特征说明吐谷浑葬俗文化随着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变迁发生了变异，也体现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3. 其他遗存的文化特征

（1）墓志。

吐谷浑墓志发现较多，时间从南北朝至唐，这个时期正是墓志兴盛时期，也是墓志形制定型时期，吐谷浑墓志集中在这时期，一方面说明，受到中原葬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吐谷浑与北魏、唐关系的印证。吐谷浑墓志分为长方形、正方形，北魏时期的吐谷浑墓志多为长方形，分为竖式长方形、横式长方形，长宽差距不大，如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长49厘米，宽47.7厘米，吐谷浑玑墓志长48.6厘米，宽51.3厘米，吐谷浑静媚墓志长63.5厘米，宽64厘米，个别墓志有志盖，如吐谷浑静媚墓志志盖，其中心有篆书："齐故尧公妻吐谷浑墓志之铭"，四角有铁环；铭文多以楷书，但不拘一格，如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字体打破了一般楷书四平八稳的特点，是以易方取长结字地表现突出其个性化的艺术美，内容方面以官职、家世、生平事迹为文，或配以骈文吟诵。字数多在数百之间。唐时期的吐谷浑墓志为正方形，边长60厘米左右，都有志盖，志盖装饰十分考究，如弘化公主墓志正中篆书"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四周雕刻缠枝草叶花纹图案。雕刻极为精美。铭文字体为楷书，另外武威墓葬中出土有两块墓志中有武则天时期创造的一些文字。铭文内容包括墓主人姓名、籍贯、先祖世系、为官、卒葬之地、子嗣等。

墓志所记内容真实，可作历史资料，补文献记载之不足，也是确定墓葬年代的依据。这批墓志也能展示南北朝、唐代的书法艺术之美，也是研究吐谷浑绘画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2）文书。

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关于唐、五代时期吐谷浑情况的资料，包括吐蕃文、汉文，内容分为地理、政治、纪年等，其中《吐谷浑〈阿柴〉纪年》是用吐蕃文写成的，为一份纪年性质的文献，记载了706～715年吐蕃统治下吐谷浑王庭所发生的大事，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吐蕃与吐谷浑、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以吐蕃文书写吐谷浑编年史，说明吐谷浑必在吐蕃役属统治下，接受吐蕃文字和纪年方式。其余大部分文书以汉文写成，对亡国以后在河西及西域东部地区活动的吐谷浑人有较多的

记载，成为又一种新的资料。这些文书的出土说明吐谷浑亡国后，大量的吐谷浑人迁徙到河陇与西域，从关陇经河西走廊到西域，丝绸之路上散布着吐谷浑人的聚落。晚唐五代宋初时期，吐谷浑人的聚落分布遍及归义军管内诸州，西起伊州、楼兰，东至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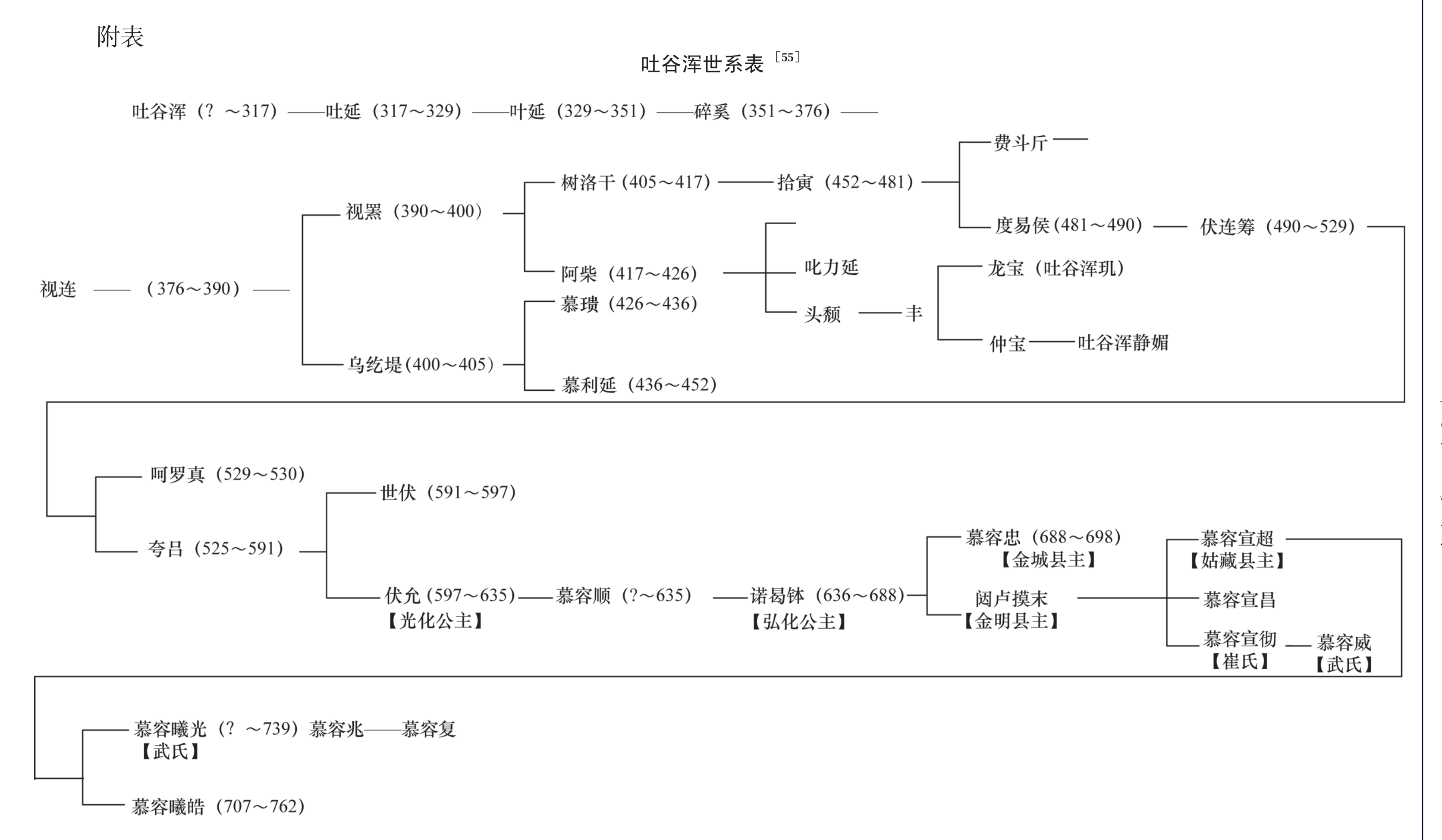
四、结　语

吐谷浑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在西北地区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西北高寒的青藏高原上，与大自然作艰苦的斗争，发展了畜牧业和商业，建设城镇，开发交通，充当当时中西交通的向导，吐谷浑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也把自己民族的先进住处传播到各处，在西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赋予了这片地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汇聚民族特色，构成了独具风格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面貌。

通过对吐谷浑遗存的梳理和研究并结合史书记载，吐谷浑具有鲜卑文化特征，如茶卡木棺板前宽后窄，及所绘人物特征，殉牲习俗、筑城特点都显示出浓厚的鲜卑文化特点，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在保留着鲜卑文化的同时，有变通和发展，经过发展的吐谷浑文化，具有了一些新的地域特征，在鲜卑文化中融入了汉、吐蕃文化的因素，形成东西两部，表现出较大差异的文化特性。

本文是对吐谷浑历史文化遗存进行系统整理、分析的尝试性之作，尽量囊括目前为止与吐谷浑有关的考古资料，但材料上的限制仍是文章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加之笔者水平有限，因而一些观点和论断难免显得不成熟和不妥当。相信随着未来吐谷浑考古工作的进展，会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附表


吐谷浑世系表[55]
吐谷浑（？～317）——吐延（317～329）——叶延（329～351）——碎奚（351～376）——
视连——（376～390）——
视罴（390～400）
乌纥堤（400～405）
树洛干（405～417）——拾寅（452～481）
阿柴（417～426）
慕璝（426～436）
慕利延（436～452）
费斗斤——
度易侯（481～490）——伏连筹（490～529）
叱力延
头颓——丰
龙宝（吐谷浑玑）
仲宝——吐谷浑静媚
呵罗真（529～530）
夸吕（525～591）
世伏（591～597）
伏允（597～635）——慕容顺（?～635）——诺曷钵（636～688）
【光化公主】
【弘化公主】
慕容忠（688～698）
【金城县主】
闼卢摸末
【金明县主】
慕容宣超
【姑臧县主】
慕容宣昌
慕容宣彻——慕容威
【崔氏】
【武氏】
慕容曦光（？～739）慕容兆——慕容复
【武氏】
慕容曦皓（707～762）

注　　释

[1] a. 本文所提及的古城大多根据青海、甘肃文物普查报告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队调查.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的重要城址［A］. 考古学集刊（13）［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b.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 冯建华. 鸣鹤古城考—兼谈吐谷浑的历史沿革［J］. 丝绸之路，2010（6）.

[3]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鸣鹤城、镇念城、三足城皆吐谷浑昔有此地时所筑”.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四［M］.

[5]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M］.

[7] 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李振翼. 牛头城调查与考释［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 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的重要城址［A］. 考古学集刊（13）［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9]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记录周长为1155米.

[10] 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M］.

[11]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 北史・卷二・魏本纪［M］.

[13]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4] 南齐书・河南传［M］. 记载吐谷浑有四大戍地：“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

[15] 隋书・地理志［M］. 记载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曼头山、积石山，河所出，有坞海…….

[16]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 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的重要城址［A］. 考古学集刊（13）［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b.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 在吐谷浑城址中，伏俟城是考古工作做得较为充分的一个，靳玄生最初发现这座古城，之后黄盛璋和方永两先生做过考察，并于1962年发表了《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一文. 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又曾对此城进行过多次调查，其后90年代初，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考察。

[18] 黄盛璋，方永. 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J］. 考古，1962（8）.

[19] 高东陆. 青海湖环湖文物调查［J］. 青海考古学会刊，1981（3）.

[20] 陈良伟先生认为外郭城的说法不成立，仅是挡水堤坝。见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 魏书・卷一〇一・吐谷浑传［M］.

［22］ a. 新中国考古六十年・青海篇［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b. 许新国. 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J］. 青海民族学院院报，2009（10）.
［23］ a. 朱世奎，程起骏. 吐谷浑东西两京巡礼［J］. 中国土族，2010（春季号）.
b. 陈良伟. 丝绸之路河南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4］ 朱世奎，程起骏. 吐谷浑白兰地望新考［J］. 青海社会科学，2008（2）.
［25］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6］ 许新国. 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J］. 青海民族大学，2011（1）.
［27］ 许新国. 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J］. 青海民族学院院报，2009（10）. 此墓葬还未做发掘.
［28］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报告［J］. 考古，2002（12）.
［29］ a.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都兰吐蕃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b. 新中国考古六十年・青海篇［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0］ 许新国. 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35.
［31］ a. 黎大祥. 武威青嘴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J］. 陇右文博，1996（1）.
b. 杨常青. 弘化公主墓的发现及吐谷浑在凉州［A］. 武威文史资料（2）［C］.
［32］ a. 芈一之. 弘化公主墓与吐谷浑王室播迁［A］. 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C］.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b. 党寿山. 武威县南山青嘴喇嘛湾又发现慕容氏墓志［J］. 文物，1965（9）.
c. 宁笃学. 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J］. 考古与文物，1981（2）.
［33］ 凉州史话编写组. 文物古迹・弘化公主墓［A］. 凉州史话［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158～160.
［34］ a. 宁笃学. 甘肃武威发现大唐武氏墓志［J］. 考古与文物，1981（2）.
b. 王子初. 中国音乐考古学［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此书对乐器残件介绍很详细但将其作为弘化公主墓出土文物，是不正确的.
c. 庄壮. 唐代“武氏阮咸”［J］. 中国音乐，1990（4）.
［35］ 马卓娅. 吐谷浑玑墓志考略［J］. 中原文物，2002（4）.
［36］ 朱全升. 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J］. 文物，1984（4）.
［37］ 黄立猷. 石刻名汇，王壮弘. 六朝墓志检要等书著录，赵万里.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收入图版.
［38］ 马东海. 唐公氏念公夫妇墓及墓志考释［J］. 考古与文物，2010（1）.
［39］ 钟侃. 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J］. 考古与文物，1983（2）.
［40］ 孙瑜. 唐慕容曦皓墓志考释［J］. 山西师大学报，2010（5）.
［41］ 许新国. 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42］ 许新国. 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43］ 周伟洲. 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A］. 吐谷浑资料辑录［C］.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吐谷浑《阿柴》纪年. 卷长49、宽约14厘米，共存文55行，每

行残缺16～27个字母.

［44］ a. 王尧，陈践.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b. 王尧，陈践. 敦煌吐蕃文献选［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45］ a. 齐东方. 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五号墓出土的部分文书的研究［A］.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C］. 1983.

b. 陈国灿. 武周瓜沙地区的吐谷浑归朝事迹［A］. 兰州敦煌学讨论会论文［C］，1983. 陈国灿、齐东方两文所用资料基本一致，即均系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五号墓出土的文书，陈文还补充了敦煌的有关文书，考证了武周时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欲投武周，瓜、沙二州官吏派兵应接的情况.

［46］ 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M］.

［47］ 吕建福. 土族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0.

［48］ 这样的商业城市，有树敦城、赤水城、曼头城、伏俟城、浇河城等，史载树敦城“多诸珍藏”，北周史宁攻掠，史称多获财宝；突厥入寇，史载“大获珍物”. 赤水城、伏俟城等亦屡受北朝劫掠，也是因为这些商业城市聚集财物珍藏. 根据考古发现，吐谷浑的商业城市，大都一地有数个城郭，城镇集丛，形成商业都市，相距不远，规模都比较大，如铁卜卡古城与天峻县加木格尔滩古城，也相去不远，均属同一时期古城，亦可能有商业性质.

［49］ 周伟洲，杨铭. 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A］. 吐谷浑资料辑录［C］.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50］ 黎瑶渤.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 文物，1973（3）.

［51］ 刘俊喜，高峰.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J］. 文物，2004（12）.

［52］ 韩孔乐. 固原北魏漆棺画墓的发现［A］. 宁夏文史资料・宁夏考古记事［C］.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53］ 所谓武，即三步之称。

［54］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A］.考古学论文集［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5］ 此表根据正史，文集，墓志尤其是对新发现的墓志（武昌王妃吐谷浑墓志，吐谷浑玑墓志，吐谷浑静媚墓志，慕容曦皓墓志）等资料，纠正和补充周伟洲先生所制《吐谷浑世系表》而成.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uyuhun Remains

Li Guohua

Abstract: Tuyuhun which existed in Northwest China from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had exert great influences on other nationalities. Tuyuhun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eastern Tuyuhun which joined Tang and incoporated in the Han nationality, the western Tuyuhun joined Tubo.Tuyuhun's in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history.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achievements of study of tuyuhun's history,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till has more space.With the ongoing work of archaeology, the materials have offered the imporant clues for the research. I tried to collect all of the materials,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to discuss about the tuyuhun' remains.

Key words: Tuyuhun; remains;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exchange

洛阳地区北魏鲜卑、汉人墓葬的比较分析

杨　玥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100006）

本文所谈的洛阳地区，主要指北魏时期的洛阳郡。“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493）改为司州，天平初复。领郡六，县十二……洛阳郡、河阴郡、新安郡、中川郡、河南郡、阳城郡……洛阳郡，天平初置。户三千六百五十九，口一万五千七十二。下辖洛阳、缑氏二县。”[1]据前人考证，洛阳为秦汉旧县，并无废弃之事，“天平初置”四字为衍文[2]。洛阳县治约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缑氏县治约在今偃师市南。据此，本文探讨的洛阳地区北魏墓葬，主要包括现在河南省洛阳市及其邻近已发掘并报道的30余座的北魏墓葬。

一、洛阳地区北魏墓葬调查发掘情况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已发掘的北魏时期墓葬主要包括洛阳及周边孟津、偃师等地。其中，在洛阳北郊的邙山地区分布着北魏时期的帝陵、皇族墓葬，如永平四年（511）的阳平王元冏墓[3]、延昌四年（515）的宣武帝景陵[4]、正光六年（525）的清河文献王元怿墓[5]、孝昌二年（526）的江阳王元乂墓[6]、孝昌三年（527）的南平王元暐墓[7]、建义元年（528）的常山文恭王元邵墓[8]，并发现与元冏墓一起的M14[9]、M15[10]、M18[11]。此外，洛阳市还发现了太和十二年（488）董富妻郭氏墓[12]、景明二年（501）横野将军甄官主簿宁懋墓[13]、正始三年（506）的燕州刺史寇猛墓[14]、正光三年（522）的河涧太守郭定兴墓[15]、孝昌二年（526）或正光五年（524）的孝子石棺[16]、孝昌五年（529）的都官尚书元谧墓[17]、太昌元年（532）的安东将军王温墓[18]、永熙二年（533）的度支尚书杨机墓[19]、涧西16工区82号墓[20]、衡山路HM621[21]，偃师地区发现了熙平元年（516）的杏园村洛州刺史元睿墓[22]及同出的正始五年（508）的YDM4031[23]、YDⅡM1101[24]和YDⅡM926[25]、孝昌二年（526）的乐陵太守染华墓[26]、南蔡庄89YNLTM4[27]、联体砖厂二号墓[28]、前杜楼2005LYDM1[29]，孟津地区发现了正光五年（524）的燕州治中从事史侯掌墓[30]和孟县发现永平四年（511）的豫州刺史司马悦墓[31]。

二、鲜卑、汉人墓葬的特点分析

1. 墓主身份

为了更好的分析比较洛阳地区鲜卑墓与汉人墓的特点，本文根据墓志、砖志等能够表明墓主身份的遗物，对上述墓葬进行梳理。其中，身份明确的墓葬共有15座，墓主分别如下：

元冏。根据墓志记载“王景穆皇帝之曾孙，故阳平王之孙……永平二年十二月廿四日薨于郡庭……皇朝故追赠持节、征虏将军、豫州刺史，王如故，曰恭王。”

元睿。根据《魏书》所载，“高阳王雍之子……与元雍俱遇害。赠车骑大将军、司空公、雍州刺史。”[32]

宣武帝元恪。根据《魏书》所载，“世宗宣武皇帝，讳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延昌）四年春崩于式乾殿，时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谥曰宣武皇帝，庙号世宗。”[33]

元怿。依据墓志记载，“太祖道武皇帝之七世孙。高祖孝文皇帝之第四子……神龟三年岁次庚子，春秋三十有四，七月癸酉朔三日乙亥害王于位。”

元乂。依据墓志记载，“道武皇帝之玄孙。太师京兆王之世子……孝昌二年三月廿日，与第五弟给事中山宾同时遇害。春秋卌有一。”

元暐。依据墓志记载，“王讳暐，字仲囧，河南洛阳人，太祖道武皇帝六世孙也……以孝昌三年十月廿日薨于长安之公馆。春秋卅八。”

元邵。正史无传。依据墓志记载，“高祖孝文皇帝之孙，丞相清河文献王之第二子也……武泰元年太岁戊申四月戊子朔十三日庚子暴薨于河阴之野，时年二十有三。”

由此可见，以上七人皆为北魏皇室成员，应都为鲜卑人。再看其余诸人。

董富妻郭氏。墓中出土刻铭砖2块，分别刻有“太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和“太原郡狼孟县董富妻郭暮”字样。据此，郭氏应葬于太和十八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前，且董姓、郭姓并非典型鲜卑姓氏，推测董富妻郭氏应为汉人。

寇猛。根据《魏书》所载，“上谷人也。出入禁中，无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别士庶也。家渐富侈，宅宇高华，妾隶充溢。”[34]

司马悦。依据墓志记载，“君讳悦，字庆宗，司州河内温县都乡孝敬里人也。故待中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贞王之孙，故待中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司空公康王之第三子。先是庶姓犹王封琅琊王故贞康二世并申上爵……永平元年十月七日薨于豫州。”《魏书》记载与墓志内容基本一致。司马悦与祖父司马楚之、父亲司马金龙皆为北魏时期高层官吏，应为汉人。

郭定兴。正史无传。依据墓志记载，“君讳定兴，太原晋阳人也……曾祖珍，

南来客，聪睿识讥，声和馆邸”。郭定兴墓志追溯其父祖世系，其曾祖郭珍为“南来客”，似乎由南入北，证以“声和馆邸”一语，疑是被俘入魏。据此推测郭定兴应为汉人。

侯掌。正史无传。依据墓志记载，“君讳掌，字宝之，上谷郡居庸县崇仁乡修义里人也……春秋六十九。正光五年岁次甲辰三月辛亥朔，二日壬子卒于洛阳仁寿宅。”另外，该墓中除M22出土的侯掌墓志外，还有出土一方侯刚墓志。侯刚是北魏晚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据《魏书·侯刚传》云：“侯刚，字乾之，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也……刚以上谷先有侯氏……欲为家世之基。……五年，领尝药典御、燕州大中正。”[35]侯掌担任燕州治中从事史，是侯刚统领下的燕州要职，应为侯刚所指“欲为家世之基”的体现。

染华。依据墓志记载，“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高祖闵，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可见染华为后赵冉闵后人，当为汉人。

王温。正史无传。依据墓志记载，“公讳温，字平仁，燕国乐浪乐都人……启源肇自姬文……祖评，魏征虏将军、平州刺史……父袭，龙骧将军、乐浪太守……至魏兴安二年，祖评携家归国，冠冕皇朝，随居都邑。”由此，王温当为汉人。

杨机。依据墓志记载，“君讳机，字显略，秦州天水郡冀县崇仁乡吉迁里人也。”《魏书》亦载“祖伏恩，郡功曹，赫连屈丐时将家奔洛阳，因以家焉……”[36]可见，杨机出生于身份较为低微的士族之家，祖籍天水冀县，其祖父杨伏恩在北魏初年将家搬到洛阳，杨机生于洛阳长于洛阳，推断杨机为汉人。

综上，上述墓葬中其中确定为鲜卑墓葬的有元冏墓、元睿墓、宣武帝景陵、元怿墓、元乂墓、元暐墓和元邵墓；确定为汉人墓葬的是董富妻郭氏墓、寇猛墓、司马悦墓、郭定兴墓、侯掌墓、染华墓、王温墓和杨机墓。以下将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两方面对鲜卑和汉人墓葬特点加以分析。

2. 墓葬形制

通过已发表的墓葬材料可以看出，上述墓葬多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向基本为南北向，墓道多为斜坡式，也有少量竖穴式，如元睿墓、侯掌墓和王温墓存在；后期出现带过洞和天井的类型，如郭定兴墓、染华墓、元暐墓和元邵墓。

为了方便找出墓葬特点，本文根据墓葬材质、墓室数量、墓室形状和墓室墙壁直曲程度的区别进行比较分析（表一）。

表一　洛阳地区身份明确的墓葬形制统计表

墓葬形制 民族	墓 主	墓葬 材质	墓室数量	墓室形状	墓室墙壁 直曲程度
鲜卑	元冏	砖室墓	单室	方形	外弧
	元睿	砖室墓	单室	正方形	外弧
	宣武帝	砖室墓	单室	近方形	外弧
	元怿	砖室墓	单室	方形	外弧
	元乂	砖室墓	多室，东西各有一假耳室	方形	直壁
	元暐	土洞墓	单室	近方形	直壁
	元邵	土洞墓	单室	近方形	外弧
汉人	董富妻郭氏	土洞墓	单室	长方形	直壁
	寇猛	砖室墓	单室	方形	外弧
	司马悦	砖室墓	单室	方形	直壁
	郭定兴	土洞墓	单室	平面近似梯形南宽北窄	直壁
	侯掌	土洞墓	单室	不规则方形	直壁
	染华	土洞墓	单室	方形	外弧
	王温	土洞墓	单室	近方形	直壁
	杨机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由表一可见，北魏时期的鲜卑及汉人墓葬在墓葬形制上已趋于相似，如都出现了土洞、砖砌两种建筑方式，墓室数量都以单室为主，墓室墙壁都有直壁和方形外弧两种。但细加分析还是可以看出鲜卑、汉人的差别。

（1）墓葬材质方面，鲜卑墓多为砖砌墓、汉人墓多为土洞墓。

鲜卑墓中，除元邵墓和元暐墓为土洞墓外，元冏墓、元睿墓、宣武帝景陵、元怿墓和元乂墓都为砖砌墓，砖砌墓约占全部鲜卑墓的71.4%，是为此时期鲜卑墓的主流。与此相反，汉人墓以土洞墓为主，占全部汉人墓的62.5%，如王温墓、侯掌墓、染华墓、董富妻郭氏墓和郭定兴墓。

（2）墓室数量及形状方面，鲜卑墓以单室为主，但也有三室墓，形状全部为方形墓；汉人墓全部为单室，但形状上较为多元，既有方形墓，也有长方形和梯形。

在墓室数量上，鲜卑墓与汉人墓都以单室为主，仅出现元乂墓一例带东西假耳室的墓葬。在墓室的形状上，鲜卑墓的墓室全部为方形或近似方形；而汉人墓虽以方形或近似方形为主，但出现了长方形墓室，如董富妻郭氏墓，同时出现了梯形墓室，如郭定兴墓。

（3）墓室墙壁的直曲程度方面，鲜卑墓以外弧墓壁为主，汉人墓以直壁为主。

从墓室墙壁的直曲程度上看，鲜卑墓以略外弧式的墓壁为主，约占全部鲜卑墓的71.4%，仅有元暐墓和元乂墓两例不同；汉人墓则以直壁墓为主，占全部汉人墓的62.5%，略外弧式的墓壁仅为全部汉人墓的25%。

3. 随葬品

根据随葬品象征意义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三组探讨：第一组，反映葬俗的特定物品，如墓志、镇墓武士、镇墓兽等；第二组，体现出行仪仗的俑群，如陶车、武士俑、侍者俑、伎乐俑、载物牲畜俑等；第三组，表现日常生活的物品，如仆役俑、家禽家畜俑、明器模型、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等（表二）。

表二　洛阳地区身份明确的墓葬随葬品统计表

墓葬形制／民族	墓 主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鲜卑	元冏			瓷器3
	元睿	镇墓武士一组	侍者11、伎乐1、马2、骆驼1、车1	鸡1、狗1、明器模型3、陶器4、瓷器4、金属器1
	宣武帝			牲畜残件1、陶器15、瓷器13、金属器11、玉石器5
	元怿			有俑头
	元乂			《时地记》载出土数百件人物俑、瓷片若干
	元暐			
	元邵	镇墓兽一组	侍者47、武士33、伎乐8、牛1、马1、骆驼1	仆役5、童俑1、卷发长衣俑2、猪2、驴1、陶器9
汉人	董富妻郭氏	刻铭砖2块		陶器1、金属器3
	寇猛			陶器2、金属器12、玉石器1
	司马悦			陶器2、瓷器9、金属器7
	郭定兴	镇墓武士一组、镇墓兽1件	侍者7、伎乐1、骆驼2、马1、车1	仆役3、胡俑1、鸡2、狗2、羊2、猪2、明器模型4、陶器11
	侯掌	镇墓兽一组	侍者1、武士2、伎乐2、骆驼1、马1、牛1、车轮2	胡俑4、童子5、驴2、狗2、鸡2、明器模型4、陶器29
	染华	镇墓武士一组、镇墓兽1件	侍者10、伎乐17、马2、骆驼1、车1	仆役4、猪2、羊1、狗2、鸡1、明器模型5、陶器11、瓷器3
	王温	镇墓武士一组、镇墓兽一组	侍者41、武士11、伎乐5、骆驼1、牛1、车1套	仆役1、羊1、明器模型3、陶器6、金属器9
	杨机	镇墓武士一组（胡人）、镇墓兽一组	侍者40、武士22、伎乐16、马1、骆驼1、牛车1	仆役5、狗2、猪2、羊2、鸡1、明器模型4、陶器2、瓷器11、玉石器3

由表二可见，本时期洛阳墓葬的随葬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来看：

第一组，反映葬俗的特定物品。

在这一组主要由墓志、镇墓兽及镇墓武士组成。除董富妻郭氏以刻铭砖记录个人信息外，其他墓主明确的墓葬都出土了墓志。由于这一地区墓葬被毁严重，镇墓武士与镇墓兽存量较少。从保存较好的墓葬来看，镇墓武士与镇墓兽一般都成对出现，其中镇墓武士一般位于墓室门口，比其他武士俑体积略大，通常一个扶盾、一个扶剑，如元睿墓、染华墓；镇墓兽一般为蹲伏式，一件人面、一件兽面，如元邵墓、王温墓等。在形态上，鲜卑墓与汉人墓在这一组上差异不大。

但是从数量上看，鲜卑墓中随葬镇墓武士及镇墓兽的情况并不多见，仅有元邵墓中存在镇墓兽、元睿墓中发现镇墓武士，宣武帝景陵中也未发现此类物品。而在汉人墓葬中，镇墓兽与镇墓武士较为常见，除北魏中期的董富妻郭氏墓、寇猛墓和司马悦墓外，其他墓中都有发现。

第二组，体现出行仪仗的俑群。

参考同期壁画图案，这一组是以车驾为中心，辅以侍者俑、武士俑、伎乐俑和载物牲畜俑而组成的俑群。鲜卑墓中此组物品并不常见，仅发现元邵墓和元睿墓两例。汉人墓中的此组物品较为丰富，除北魏中期的董富妻郭氏墓、寇猛墓和司马悦墓外，其他墓中都有发现。

第三组，表现日常生活的物品。

本组物品由仆役俑、家禽家畜俑、明器模型、陶瓷器、金属器、玉石器等组成，其中仆役俑指执盆、执箕、抱瓶、抱婴等人物俑，其他人物俑指胡俑、童俑等人物俑，明器模型指陶质的灶、仓、井、磨、碓等体积较小、不具实用功能的陶器。

与前两组情况类似，鲜卑墓中的本组物品并不发达，仅元邵墓、元睿墓和宣武帝景陵有一定量的发现；相对而言，汉人墓中的本组物品较为丰富。除北魏中期的董富妻郭氏墓、寇猛墓和司马悦墓外，其他墓中都有发现仆役俑、家禽家畜及成套的明器模型，且形制相似。

4. 墓主基本情况

根据墓葬的发掘报道材料及墓志的相关记载，统计墓主基本情况如下（表三）。

从下葬时间上看，洛阳地区身份明确的鲜卑及汉人墓葬都属于北魏中晚期墓葬，其中鲜卑墓全部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时段分布较为集中；而汉人墓时间跨度较大，各时段分布比较平均。

从发现地点上看，鲜卑墓集中于洛阳北郊的邙山地区，仅有元睿墓一例位于偃师地区；而汉人墓分布较散，看不出明显的聚葬地区。

表三　洛阳地区身份明确的墓主信息统计表

墓葬形制 民族	墓 主	身 份	年 代	地 点
鲜卑	元冏	阳平王	永平四年（511）葬	洛阳邙山
	元睿	洛州刺史	延昌三年（515）卒 熙平元年（516）葬	偃师杏园村
	宣武帝	宣武帝	熙平元年（516）	洛阳邙山
	元怿	清河文献王	正光元年（520）亡 正光六年（525）葬	洛阳邙山
	元乂	江阳王	孝昌二年（526）	洛阳邙山
	元暐	南平王	孝昌三年（527）	洛阳城北金家沟村
	元邵	常山文恭王	武泰元年（528）亡 建义元年（528）葬	洛阳邙山
汉人	董富妻郭氏		太和十二年（488）	洛阳西南郊区张庄村东北
	寇猛	燕州刺史	正始三年（506）	洛阳西车站
	司马悦	豫州刺史	永平元年（508）亡 永平四年（511）葬	孟县城关
	郭定兴	河涧太守	正光三年（522）	洛阳纱厂西路
	侯掌	燕州治中从事史	正光五年（524）	洛阳邙山
	染华	乐陵太守	正光五年（524）亡 孝昌二年（526）葬	偃师杏园村
	王温	安东将军	普泰二年（532）亡 太昌元年（532）葬	洛阳邙山
	杨机	度支尚书	永熙二年（533）	洛阳西南

从墓主身份上看，鲜卑墓全部为拓跋皇室成员；而汉人墓多为高级官吏，平民墓较少，仅有董富妻郭氏墓一例。

5. 小结

通过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和墓主基本情况的分析比较，洛阳地区身份明确的墓葬基本呈现以下区别（表四）。

（1）墓葬形制上，鲜卑墓以砖砌弧方形壁式墓为主；汉人墓以土洞方形直壁墓为主，此外也有其他类型。

（2）随葬品组合上，鲜卑墓在三组随葬品组合中都不发达，但从元睿墓及元邵墓中也可看到明显的汉化趋势；汉人墓可分为两段来考察，北魏中期的墓葬，如董富妻郭

氏墓、寇猛墓和司马悦墓，随葬品并不成熟，其组合也不完整；而晚期的墓葬随葬品组合则趋于稳定完备。

（3）从墓主基本情况来看，鲜卑墓全部为迁都洛阳后的皇室贵族墓，墓地集中位于洛阳邙山地区。汉人墓的时间跨度较大，兼有迁都前后的墓葬；墓主虽以官吏为主，但也有小型平民墓；墓地分布较为分散。

表四　鲜卑、汉人墓区别示意表

墓葬特点 / 民族		土洞	砖室	外弧壁	直壁	反映葬俗的特定物品	体现出行仪仗的俑群	表现日常生活的物品	邙山地区
鲜卑			为主	为主				少量	全部
汉族	中期		为主		为主			少量	少
	晚期	为主			为主	丰富	丰富	丰富	

三、对身份不明墓葬的推测

通过对洛阳地区身份明确的墓葬进行分析比较，本文已得出洛阳地区鲜卑墓与汉人墓的基本特点，据此，本文尝试对本地区身份不明的墓葬如杏园村YDM4031、杏园村YDⅡM1101、杏园村YDⅡM926、前社楼2005LYDM1、衡山路HM621、邙山朝阳村M14、邙山朝阳村M15、邙山朝阳村M18、偃师南蔡庄89YNLTM4、联体砖厂二号墓90YNLTM2、涧西16工区M82进行推测。根据上述墓葬的发掘报道材料，统计如下（表五）。

表五　洛阳地区身份尚不明确的墓葬特点统计示意表

墓葬特点 / 墓主	土洞	砖室	外弧壁	直壁	反映葬俗的特定物品	体现出行仪仗的俑群	表现日常生活的物品	邙山地区
邙山朝阳村M18		√	√					√
邙山朝阳村M14	√		√					√
邙山朝阳村M15	√		√			√		√
杏园村YDⅡM926		√	√				√	
联体砖厂二号墓90YNLTM2		√	√		√	√	√	

续表

墓葬特点 墓主	土洞	砖室	外弧壁	直壁	反映葬俗的特定物品	体现出行仪仗的俑群	表现日常生活的物品	邙山地区
南蔡庄89YNLTM4		√	√		√	√	√	
涧西16工区M82		√		√			√	
杏园村YDM4031	√			√			√	
杏园村YDⅡM1101	√			√	√	√	√	
前社楼2005LYDM1	√			√	√	√	√	
衡山路HM621	√			√		√	√	

依照表五的统计，本文做出如下推测：

（1）邙山朝阳村M14、M15、M18三墓位于邙山地区，与元冏墓毗邻，墓室墙壁外弧、随葬品不发达，体现出较明显的鲜卑墓葬特点，应为鲜卑墓葬，甚至有可能为皇室成员墓。杏园村YDⅡM926为砖砌弧方形壁式墓，随葬品组合并不完整，出土较多金属器，推测可能为鲜卑墓葬。

（2）联体砖厂二号墓90YNLTM2和南蔡庄89YNLTM4同为砖砌弧方形壁式墓，随葬品组合完整，体现出鲜卑与汉人双重特点，与元邵墓类似，推测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鲜卑墓或深受鲜卑文化影响的汉人墓。

（3）涧西16工区M82与杏园村YDM4031为直壁墓室，随葬品组合不完整，但出土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其中杏园村YDM4031出土一个带“正始五年（508）”朱书的小口罐，推测这两座可能为北魏早中期的汉人平民墓。

（4）杏园村YDⅡM1101、前社楼2005LYDM1和衡山路HM621均为土洞直壁墓，随葬品组合完整，体现出较明显的汉人墓葬特点，推测为北魏晚期的汉人墓。其中，前社楼2005LYDM1和衡山路HM621陶俑丰富多样，墓主有可能为汉人官吏。

四、余　　语

随着北朝时期墓志的广泛使用，我们得以通过文字更好地了解墓主与墓主所处之时代。凭借研究墓主身份明确的北魏墓葬，我们得到了洛阳地区北魏墓葬中的鲜卑墓和汉人墓异同的基本认识，并对身份不明的墓葬进行了初步的推测。除此，我们在墓葬分析中也发现了一些北魏时期洛阳地区墓葬的特点。

1. 邙山地区已形成北魏皇族墓葬区

从本文统计可以看出，洛阳有两大北魏墓地，一为邙山墓地，一为偃师附近墓地。根据《魏书》记载，孝文帝“及迁洛阳，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37]，可见他已把邙山定为最高规格的皇族墓葬区，并要求内迁的鲜卑各族人，死后必须葬入这个墓区内，不许归葬代北（今山西北端和内蒙古中部）。本文所讨论的宣武帝景陵、阳平王元冏墓、清河文献王元怿墓、江阳王元乂墓、南平王元暐墓、常山文恭王元邵墓都反映了这一历史。

2. 代人迁洛

前文对墓主身份进行认定时可以发现，洛阳地区的北魏汉人墓葬，除生于洛阳长于洛阳的杨机之外，大多墓主不是洛阳本地人，如上谷郡的寇猛与侯掌，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当与孝文时期的代人迁洛政策有关。

孝文帝学习中原文化，变革鲜卑习俗，于太和十九年（495）下旨，“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38]在此政策影响下，上谷郡的寇猛与侯掌死后都未还乡埋葬，而是葬于南方。同时，司州河内温县的司马悦、魏郡内黄人的染华和乐浪乐都人王温虽然不是“代人”，但也应受到这种影响，葬于洛阳。

3. 家族墓地所反映的北魏政治

世家大族的兴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与南方士族相比，北方世家大族保持了更为稳定的宗族结构和更为深厚的土著根基。”[39]“太和改制后，一个以王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包括汉人‘四姓’和代人‘勋臣八姓’在内的政治性婚姻集体逐步形成，新的门阀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政治。”[40]

作为世家大族传承的重要体现，北魏时期的家族墓地今天河北、山东及陕西地区多有发现，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景县高氏墓群、无极甄氏墓群，山东临淄崔氏墓群，陕西华阴杨氏墓群、西安韦氏墓群等。从现有材料来看，由于北魏早期的家族墓地材料并不丰富，推断上述家族墓地至迟也形成于北魏中后期，而同时期的洛阳却并未见到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

一面是集中在洛阳邙山地区的皇族墓地，一面是散落在河北、山东地区的家族墓地，这两者的分布似乎印证了北魏时期皇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与利用；而配葬在皇族墓地周围的高级官员、勋贵墓地，似乎也昭示着北朝政局正从门阀政治走向官僚政治。

注 释

［1］ 魏书·卷一六〇·地形志［M］.

［2］ 施和金. 北齐地理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09.

［3］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 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93（1）.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J］. 考古，1994（9）.

［5］ 徐婵菲. 洛阳北魏元怿墓壁画［J］. 文物，2002（2）.

［6］ 洛阳博物馆. 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J］. 文物，1974（12）.

［7］ 黄明兰. 西晋裴祇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J］. 文物，1982（1）.

［8］ 洛阳博物馆. 洛阳北魏元邵墓［J］. 考古，1973（4）.

［9］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 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93（1）.

［10］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 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93（1）.

［11］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 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93（1）.

［12］ 石战军. 北魏董富妻郭氏墓［J］. 中原文物，1996（2）.

［13］ 郭建邦. 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J］. 河南文博通讯，1980（2）.

［14］ 侯鸿钧. 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J］. 文物参考资料，1957（2）.

［15］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J］. 文物，2002（9）.

［16］ 黄明兰. 北魏孝子棺线刻画［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17］ 黄明兰.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18］ 朱亮、李德方. 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J］. 文物，1995（8）.

［19］ 洛阳博物馆. 洛阳北魏杨机墓出土文物［J］. 文物，2007（11）.

［20］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二队. 洛阳涧西16工区82号墓清理记略［J］. 文物参考资料，1956（3）.

［21］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衡山路北魏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9（3）.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J］. 考古，1991（9）.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J］. 考古，1994（9）.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J］. 考古，1994（9）.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J］. 考古，1994（9）.

［26］ 偃师商城博物馆. 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93（5）.

［27］ 偃师商城博物馆. 河南偃师南蔡庄北魏墓［J］. 考古，1991（9）.

［28］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 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93（1）.

［29］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偃师前杜楼北魏石棺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6（12）.
［3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1（8）.
［31］ a. 孟县人民文化馆，尚振明. 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J］. 文物，1981（12）.
b. 孟县人民文化馆. 河南省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J］. 考古，1983（3）.
［32］ 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M］.
［33］ 魏书・卷八・世宗纪［M］.
［34］ 魏书・卷九三・寇猛传［M］.
［35］ 魏书・卷九三・侯刚传［M］.
［36］ 魏书・卷七七・杨机传［M］.
［37］ 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M］.
［38］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M］.
［39］ 陈爽.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
［40］ 陈爽.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Xianbei and Han Tombs in Northern Wei Period in Luoyang Area

Yang Yue

Abstract: Luoyang w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having a lot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omb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dentified tombs of Xianbei and Han people, examining the main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n tries to differentiate the unidentified tombs.

Key words: Luoyang; Northern Wei; Xianbei; Hans; tombs; comparative

公元5～8世纪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初探

高　伟

（南京博物院，南京，210016）

“吐鲁番”系“吐蕃”谐音，古称“姑师”[1]，为丝绸之路重镇。西汉时期吐鲁番为车师前王庭故地；汉元帝元年在此设戊己二校尉屯田；东汉和帝三年迁戊己校尉驻地于高昌，时称高昌壁；晋置高昌郡；北魏称高昌国；继后又有张氏、马氏、麴氏相继在此建立政权，其中以麴氏高昌时间最长。640年，唐朝统一了新疆地区，设西州于吐鲁番，辖高昌、交河、天山、柳中、蒲昌五县，此即通常所说的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世纪初，英国人A・斯坦因、俄国人П・К・科兹洛夫、德国人A・von勒科克、日本人橘瑞超等就对阿斯塔那古墓进行了盗劫活动。1930年，我国学者开始介入本地的考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一带、交河故城沟西、巴达木和木纳尔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收获了大批家族墓葬资料。

关于吐鲁番地区家族墓[2]的研究，冈崎敬曾对交河沟西的茔内墓葬进行了排位分析，认为茔内最后排最右的墓葬一般年代较早，最后排最左或次左的墓葬可能最早，越靠前排的墓葬年代越晚[3]；冈内三真基本认同了冈崎敬的观点，认为茔内墓葬的排列不符合规律是与茔圈的扩张有关[4]；倪润安先生认识到交河沟西墓地是以尊者居后或居右的排列规律[5]；新华梳理了斯坦因发现的阿斯塔那墓葬[6]；徐苹芳先生认为阿斯塔那及雅尔湖交河故城附近的家族坟院墓葬大体上是由后向前依长幼辈分排列，不论是斜行或横行，都是从坟院的一个里角开始，向山门方向布列[7]；韩国河先生则认为吐鲁番家族坟院以修筑墓垣和聚族而葬为特征，反映了豪强大族的拥兵自保及其强烈的宗族观念[8]。

探讨家族墓葬的营建理念及其时代意义的文章相对较少，本文拟以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的布局为出发点，梳理墓葬的顺序位次，分析茔院的营建与变迁，结合相关史料展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吐鲁番地区相关家族茔院的发现

（一）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群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主要分布在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两个地区。阿斯塔纳古墓群位于高昌故城西北，唐代称其为“西北旧茔”；哈拉和卓古墓群位于高昌故城北部，西与阿斯塔那现代居民点相毗邻，向东沿克孜尔塔克南麓的戈壁断续分布[9]。

本地的考古工作可追溯至1915年斯坦因的盗掘活动，新华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译释整理。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阿斯塔那北发掘了6座墓葬，分属三个家族茔院，各茔院间以砾石圈作为界线[10]。1960年清理的4座范氏家族墓葬，墓葬外围以砾石铺出界线，各墓地表也以砾石摆出相应的甲字形形状[11]。1963～1965年清理的家族墓葬多由一两个到三五个墓组成，各家族墓间以砾石铺出四方形界线，四周绕以长宽各约30米左右的浅沟，一边留有通道，茔内墓葬方向一致[12]。1966～1969年，阿斯塔那以北、哈拉和卓以西地区清理古墓95座，在哈拉和卓以东地区清理墓葬10座，家族墓葬多有清晰的茔域，同一茔地往往有后期墓葬延续存在[13]（图一，1）。1972～1973年，考古人员清理了麴氏高昌豪门张氏家族墓，张氏家族墓茔圈明确，茔内共有墓葬65座，墓门全都向东[14]。1975年清理的哈拉和卓古墓多集中分布、聚族而葬，各家族墓间以浅沟或石块标示界域，茔内墓葬以死者先后排列[15]。1986年，阿斯塔那清理了8座古墓，其中6座同属于某张氏家族茔院[16]。

（二）交河沟西墓地

“交河沟西”位于交河故城西南，处在交河故城与盐山之间，与交河城毗邻相望，范围宽广。此地依山傍河，自车师前部王国奠基在交河城后，这里便被人们选为埋骨之所。出土墓志多称“葬于交河县城西原”，实际上，墓葬在交河沟西、沟南的台地上皆有发现。

1930年，黄文弼先生在雅尔崖调查清理的家族茔院有11处之多，皆以石栏圈作茔院围墙，茔内墓向一致[17]。1956年，刘观民等清理雅尔湖古墓葬23座，分属曹氏、袁氏和范氏家族茔院，茔院皆以卵石堆成长方形围墙[18]。1994年，交河沟西台地清理了一处茔院，茔院平面呈长方形，以砾石堆砌围墙，院内墓葬4座，集中于南部，墓向皆与茔门一致[19]（图一，2）。1995年，交河沟西清理3家族的9座墓葬，其中张氏家族茔院位于台地南端，茔内墓葬方向与茔院门道方向基本一致[20]。1996年清理的9座墓葬分属不同家族，茔院平面皆呈四边形，周围以石块堆砌围墙，茔内墓葬方向相同，墓道与茔门方向一致[21]（图一，

3）。此外在交河沟西墓地测绘时又发现高昌至唐时期茔院104处，墓葬1500余座[22]。2004～2005年，交河沟西清理了康氏家族茔院，茔院平面近方形，北高南低，以砾石围砌，茔内墓葬33座，均东向，分布有序[23]。

（三）巴达木墓地

巴达木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村东，北距哈拉和卓墓地1千米，南距高昌故城4千米，西距阿斯塔那墓地3.5千米，墓地位于火焰山南麓冲积地带南北相邻的两个台地上，地势开阔平坦。2004～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了白氏和康氏家族茔院[24]（图一，4）。两处家族茔院皆以围沟标界，茔内墓葬成排分布，错位排列，墓向与茔院方向基本一致。

（四）木纳尔墓地

木纳尔墓地位于吐鲁番市区东侧，地处洪水、溪流冲刷成的两处台地上。其中宋氏家族茔院位于1号台地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墙中部辟有长方形门道，围墙及门道墙用黑砾石垒砌，墙体均塌陷，墓葬4座，处于茔内北部，东西向呈一字形排列，墓向与茔院方向一致；张氏家族茔院位于2号台地北部，平面呈长方形，以石砌围墙为界，南墙辟长方形门道，茔内墓葬12座，分东西两排，墓向与茔院墓向基本一致（图一，5）；2号台地的中部偏南还发现不明姓氏茔院一处，此茔院坐北向南，平面近方形，用砾石围砌院墙，茔内发现墓葬4座，第一排3座，第二排1座，墓向与茔院门道方向一致[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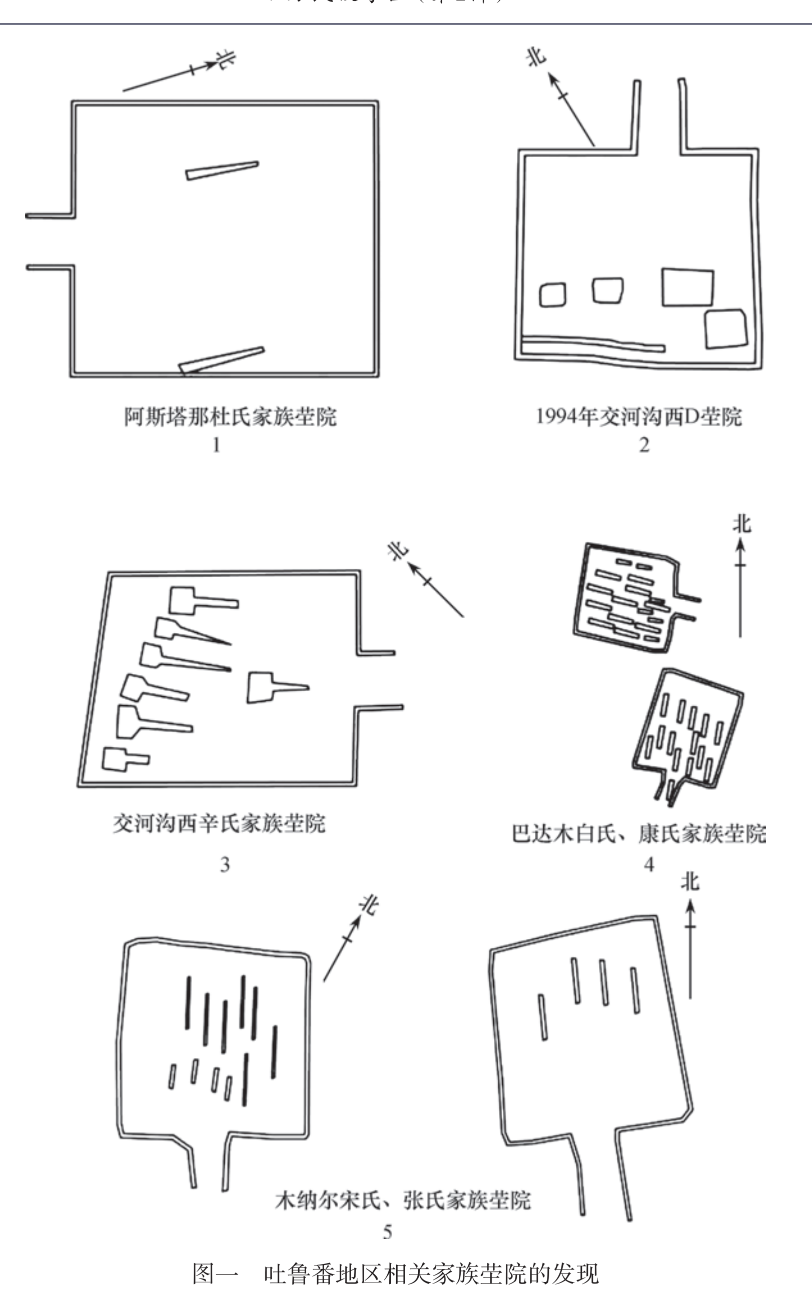
二、家族茔院的地理位置选择及其形制规模

通过梳理可知，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多以石围圈或围沟标示界域，茔内多为同姓家族成员，茔院的规划营建表现出诸多一致性特征（附表一、附表二）。

（一）地理位置选择

（1）家族茔院多集中分布在重要城镇的周边。如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处于高昌故城西北；交河沟西墓地位于交河故城西南；巴达木墓地位于高昌故城南侧4千米；木纳尔墓地处在吐鲁番市区东侧，地处高昌故城北部。家族茔院多位于城市周边，说明茔院家族成员生前应是城市或周边居民。吐鲁番地区多个家族墓集中分布，墓地地理位置选择或经过事先的整体规划。

（2）家族茔院多位于台地之上，或处于较为平坦的平地和砾石滩上，地势平坦开



图一　吐鲁番地区相关家族茔院的发现

阔。如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在吐鲁番市东南约40千米的戈壁上；交河沟西墓地位于交河故城雅尔崖子沟沟西的干沟南岸；巴达木墓地地处火焰山南麓冲积地带的台地；木纳尔墓地是洪水、溪流冲刷的台地。

（二）形制规模

家族茔院的平面多呈方形，长10多米至62米，宽10至58米。按照划分茔院界域不

同方式，可分作两类：一类以围墙为界，围墙以卵石或砾石堆砌，墙残宽0.2～1.5、残高0.05～1.2米，地表界线尚可看出；另一类以围沟为界，在茔院外侧开挖宽约0.1～0.5、深0.5米（残存）的围沟以标示不同家族墓地范围。

此外，茔院前部多发现有较长门道，最长可达27米。茔内墓葬数目不一，少者2～5座，多者30～40座，各墓葬位次清楚、排列有序、规划清晰。墓向与茔院方向基本一致。茔门方向不定，多作北、东、东北、西南向，也有南向，西北向少见。

三、茔院的营建与变迁

（一）茔院的营建者

出土的砖志资料显示，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家族家族茔院的大姓有张氏、贾氏、宋氏等，尤以张姓居多；交河地区以张、麴、王、索、任、唐、赵、汜、刘、画等姓氏为多，其次有孟、田、贾、袁、马、史等姓氏；巴达木墓地家族有索氏、白氏；木纳尔墓地有张氏、宋氏等家族茔院。根据吐鲁番地区姓氏资料，我们可将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的姓氏分作两类：一类是以张、袁、王、唐、范等为代表的汉姓家族，此为茔院的主要姓氏，约占家族茔院姓氏的89.66%；另一类是以康、史、曹为代表的昭武九姓家族及其他民族姓氏家族，这类姓氏较少，仅占10.34%（附表三）。吐鲁番出土文书统计数据也显示，汉族约占高昌国人口的70%～75%，少数民族居民仅占25%～30%[26]。可见，这些家族茔院的营建者以汉人为主，少数民族较少。

而汉族姓氏中以张氏家族茔院在吐鲁番地区发现较多，其中比较明确的是1973年清理的阿斯塔那墓地张雄家族墓。张雄家族茔院共发现墓葬65座，从出土墓志志文可明晰张雄、张定和、张怀寂和张礼臣等人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张雄生前曾位至高昌国左卫大将军、都管曹郎中，张雄妻出身于高昌麴氏王族，曾被封作永安太郡君，她的祖、父先后袭任高昌宁朔将军、横截太守，张雄的姑母则为高昌王的“太妃”。张雄长子张定和生前任唐前庭府折冲都尉，次子张怀寂则历官唐中散大夫、行茂州司马、上柱国。

《张雄妻麴氏墓志》载：

> 君讳雄，字太欢，本南阳白水人也。天分翼抄之星，地列敦煌之郡。英宗得于高达，茂族擅其清华，西京之七叶貂蝉，东土之一门龙凤，则有寻源昆间，倚柱凉城。跗萼散于前庭，波澜流于右地；因家遂久，避代不归，故为高昌人焉。

《武周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铭》称：

> 君讳怀寂字德彰，南阳白水人也。……襄避霍难，西宅敦煌。余裔迁波，奄居蒲诸。遂为高昌人也。

《范绍和及夫人张氏墓表》亦曰：

夫人敦煌张氏，享年六十二。

据墓志可知，高昌张氏，族源自南阳白水，应同敦煌张氏一脉[27]；张怀寂墓志亦提及其祖张襄为逃避霍光迫害而西迁敦煌。陈国灿先生考证认为："志文对张氏祖先西迁敦煌历史的叙述，实采自初唐《敦煌名族志》[28]。"而族志记载张襄是从清河西奔敦煌而不是南阳，张怀寂墓志与《敦煌名族志》明显不符。对此，孟宪实先生认为可能是张襄的故事在中国西部流传甚广，所以一些张氏纷纷附会以抬高自家出身[29]。

另据《武周长安三年（703）张礼臣墓志铭》（张怀寂之子）载：

苻坚肆虐，挺扰五凉。避难西奔，奄居右地。

前秦苻坚为灭北凉政权，战乱不断，大量汉族人口为躲避战火西迁高昌，张雄家族当是其中一支，他们在这里 "避代不归"，累世繁衍，逐渐发展成为高昌的望族。其他汉姓家族如宋氏、袁氏等也多自武威、张掖、敦煌等地而来，相关墓志记载可以印证[30]。如此，来自河西及中原的汉族移民在吐鲁番不断繁衍、壮大，逐渐发展成为高昌社会的重要力量。"国（高昌）有八城，皆有华人[31]"。

另外，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发现有康、曹等昭武九姓或其他姓氏民族，其中以2004～2005年清理的交河沟西康氏家族茔院较为明晰。康氏家族茔院共出土墓砖志5方，时代最早的为《延昌卅年（590）十二月康□钵墓表》，最晚的为《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愿铭记》。

《延昌卅年（590）十二月康□钵墓表》载：

①延昌卅年庚戌岁十

②二月朔甲寅十八日

③庚□领兵胡将康□

④钵春秋五十有四□

⑤疾卒于交河城内□

⑥柩启康氏之墓

据表可知，康□钵原为麴氏高昌延昌年间的一名胡人将领，于延昌卅年因病去世，死时五十四岁。

《唐龙朔二年（662）正月十六日康延愿铭记》载：

①讳厶字延愿交河群内将之子其先出

②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君以立

③性高洁禀气忠诚泛爱深慈谦让为质

④乡邦推之领袖邻田谢以嘉仁识干清

⑤强释褐而授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

⑥正正八品属大唐启运乘以旧资告身

⑦有二一云骑二武骑尉忽以不衰遇患
⑧缠躬医方药石将疗不绝转以弥留困
⑨笃今以龙朔二年正月十六日薨于私
⑩第也春秋七十有六即以其年其月十
⑪六日葬于城西暮也河期积善无征变
⑫随物化亲族为之悲痛乡闾闻之叹伤
⑬岂以川水难停斯人逝往故立铭记于
⑭□宫之左使千秋不朽
⑮正月十六日书

康延愿原为交河郡右领军岸头府队正，唐龙朔二年正月十六日因病医治无效身亡，死时七十六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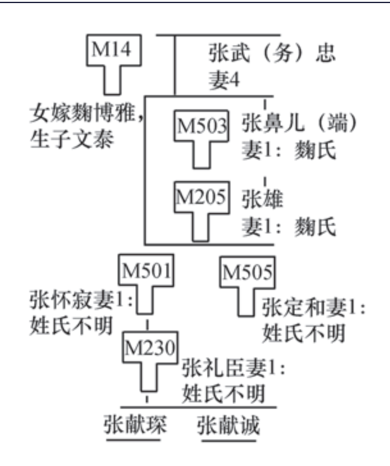
相较康□钵墓表，康延愿墓志内容更为华丽丰富。康□钵是康延愿之先，是为胡将，康氏当为胡姓。康延愿墓表却为何称“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呢？对此，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种可能：其一是康延愿父辈与汉姓家族有联姻关系，或许其母就是汉人，这样就可以顺利的解释康延愿墓表的内容；其二或许是康氏家族之前曾在中原地区活动，后来辗转来到高昌，康延愿从文化形态上依附华夏宗族之先；第三可能是铭文失实，或许书写铭文者为汉人代笔，书写过程中疏漏所致。但不管怎样，康延愿显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结合茔内其他墓志可知，定居在吐鲁番交河地的康氏家族世代为官，有一定政治地位，应是粟特地区昭武九姓中康国人的后裔，他们已入籍高昌国，后成为唐西州的属民[32]。

（二）茔内墓葬的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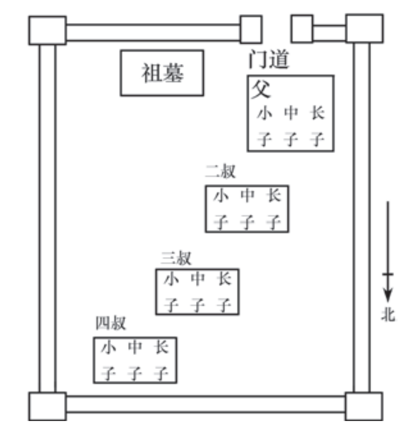
倪润安先生分析了交河沟西墓地墓主的生卒年份及其长幼关系，认为同一茔区内，一般辈分高者居于茔区后排，辈分低者居于茔区前排；当辈分处于不同排时，生年早者居后，生年晚者居前；当不同辈者处于同一排时，辈分高者居于右侧，辈分低者居于左侧；当同辈分处于同一排时，生年早者居右，生年晚者居左[33]。吴震先生认为吐鲁番地区流行聚族而葬的习俗，一个家族大都聚葬于一个茔地，同一茔地内，墓葬布列长幼有序，祖辈的墓居于最后一排，父辈居其前一排，以下按辈分依次延伸[34]。

张雄家族茔院地处阿斯塔那墓地，张雄祖墓居于最后一排，其父母墓居第二排，张雄夫妇墓在第三排，张雄长子张定和、次子张怀寂由右及左居于第四排，由此类推。在同一茔院的最后一排，八墓并列。张雄家族茔院内的墓葬主要依照辈分高低进行排列，最后一排并列的八座墓葬，可能为同一辈的子孙，张氏茔院墓门全都向东，茔院应是自西而东营建的（图二）。

阿斯塔那唐忠贤家族茔院墓葬的排位规律亦十分明确，墓葬排列是先确定祖坟的位置，然后依照伯仲顺序自右上至左下斜向排列（图三）。



图二　张雄家世及其祖孙墓葬位置示意图



图三　唐忠贤家族茔院图

该图祖坟方位在南，父叔方位在北，与北宋官定地理新书的角姓贯鱼图所记："在祖坟下，先列丙穴，丙穴之后列壬、甲穴……再于北偏西壬地作一坟"一致（图四）。

巽（xùn）	己	丙	午	丁	未	坤
辰		祖穴				申
乙						庚
卯			地心			酉
甲	穴					辛
寅				穴		戌
艮（gèn）	丑	癸	子	壬	亥	乾

图四　角姓贯鱼图

茔内墓葬的排位与斯坦因由敦煌窃取的《唐忠贤葬录残卷》所记"角姓"的方位也是一致的[35]。唐氏家族茔院内的墓葬祖坟即尊穴在前，相当于穆穴的叔父墓在后，而昭穴在穆穴的左下方，这种排位是按照中原昭穆制度进行排列的。

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的墓葬排序方式有多种，多是遵循了尊者居上的原则。墓葬先确定祖坟位置，正如宗法中大宗地位的确立，诸小宗顺次排布，之后再以小宗为下级小宗的大宗，以此类推，逐级排列。吐鲁番家族茔院的墓葬排列充分反映了昭穆制度和宗法礼制的影响。

（三）茔院的布局

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多出现于高昌王国至隋唐时期，在这3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一个家族要历经几十代甚至更多的传承，如果一个家族茔院不断营建，其规模难以预见。考古发现中，茔院墓葬多者30～60座，少者仅有2～4座，多数是几代人同茔，未见同一

家族茔院不间断的情况。

（1）茔院之间的大小规模不一，占地面积与家族墓葬的数量不一致。附表一中张氏、宋氏、康氏家族茔院占地面积较大，其他姓氏家族茔院规模较小。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张氏、宋氏、康氏皆为大姓强族，家族实力雄厚，家族茔院的规模与茔内墓葬较之其他大许多。茔院面积的大小应与家族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密切相关，茔院的大小与家族的强弱成正比。

（2）家族茔院多属汉姓家族。汉姓家族茔院是吐鲁番家族茔院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其他姓氏茔院如康姓家族已然汉化程度较深。事死如生的观念在中原社会由来已久，吐鲁番社会的家族茔院与中原传统文化联系密切。迁徙高昌的汉姓大族带去了中原丧葬文化，并依靠其社会地位在高昌社会继承发扬，他族大姓受此影响纷纷仿效（附表四）。

（3）茔院出土墓志表明，大姓家族之间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彼此间多有姻亲联系（附表五）。以敦煌清河张氏家族为核心的大族婚姻集团主要集中在索、马、宋等敦煌大姓成员，旁及河西移民中的大姓望族；而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其联姻伙伴的选择不再局限于敦煌移民的范围，而逐渐走向开放[36]。阿斯塔那50号墓出土了一册族谱，其内容集中反映了高昌早期敦煌张氏家族的婚姻状况[37]。阿斯塔那张雄之妻麴氏即为高昌王女。哈拉和卓54号墓出《高昌章和七年（537）张文智墓表》记载有张文智“夫人扶风马氏”，又“夫人张掖巩氏”，可知张、马、巩诸大族间的联姻情况。同时，张、索之间；汜、张之间；麴、袁之间；令狐氏与赵氏之间的等典型家族联姻，也有墓表为据。大姓家族间的联合互姻，共同构筑了高昌社会的上层力量。

（4）茔院间存在打破关系。2004～2005年发掘的交河沟西康氏家族茔院东北角被另一茔院打破，东围墙被破坏，范围不明。依据出土墓志，我们知道康氏家族茔院至少在延昌卅年（590）就已开始营建，延续时间不晚于唐龙朔二年（662），茔内墓葬33座，前后相隔七十多年之久，康氏家族力量足见一斑。只是旁边家族茔院何以破坏之，两者关系如何，因这里未做工作我们不得而知，推测或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家族的衰微导致了康氏家族茔院被破坏现象的出现。

（5）茔院方向不一致，多作东北、东南向，也有西南向，少见西北向开门（附表三）。黄文弼先生曾归结雅尔崖古坟茔方向的特征为：“墓门之方向，间不一致，有时冢向东而茔门向南，有时一茔之中，而每冢之方向，东西南不一者，盖其每冢之方向亦随意以为界也。然其墓门与冢门无一西北向者。”“盖西北风冷，不足以保死者之温暖，中土风水之谜，或传播西域人之脑中，而支配其安置死者也[38]。”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巴达木墓地、木纳尔墓地等的家族茔院也是多作东南、西南向开门，唯不见西北向者。中原堪舆学说是以罗盘子午线正北向为墓葬的最佳方向，综合本地山势地形考虑，墓葬的西北向可能就是风水学的禁区。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的营建受到风水学影响，认为葬地位置的优劣与否对贫富贵贱、贤愚寿夭有着极大的作用[39]。

（四）茔内墓葬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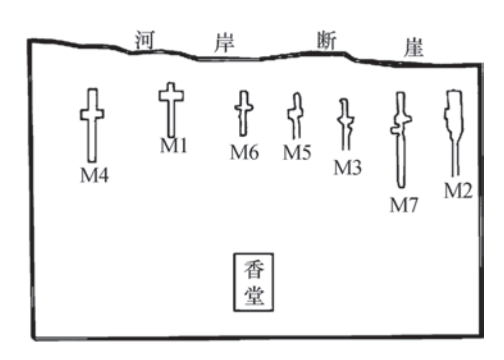
吐鲁番家族茔院内的墓葬以合葬墓为主，多见夫妇合葬墓，茔内墓葬多寡不一，延续时间长短不同，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张雄夫妇合葬墓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墓葬形制的前后差异。种种迹象表明，墓葬曾经改建。此墓原为斜坡墓道洞室墓，后在墓道尽头用弧形土坯增建了甬道，并且在两壁建有对称的小龛。随葬品也是分前后两次埋入，属于张雄的随葬品中有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等，总数达70多件，此外，还有残存的木马腿、木俑手脚200余件。龛中放置木俑，造型为盛唐风格，应是其妻葬时放进去的。据墓志记载，张雄死于唐贞观七年（高昌延寿十年，633），其妻麴氏死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前后相距55年，这就意味着两人是相隔55年后被葬在一墓。齐东方先生分析认为，张雄死时，唐朝尚未直接控制这里，自然其墓葬按当地传统营建，是普通的斜坡墓道洞室墓形制。其妻麴氏死时已是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唐朝在此经营已久。而且，张雄的长子张定和及次子张怀寂都在担任唐朝政府官吏，熟知唐朝制度，为其母亲举办丧事自然依唐制而行，于是出现了后期的改建和增筑现象。这一现象，正好反映出了吐鲁番地区墓葬形制的变化，以及中原唐墓对这里的影响[40]。

康氏家族茔院内出土有5方砖志，皆为青灰色正方形墓砖，长宽基本相当，砖志内容多简略说明死者的姓名、死亡日期、生前身份及年岁春秋，最多述及死因，文字朴素短少；而M20铭记则详细追述了康延愿家世生平，除姓名、身份、逝年、春秋多少、死亡原因外，还讲究辞藻的华丽，铭文对其品行大加歌颂，对其离世深切悲痛，甚而出现“千秋不朽”之语，文辞繁缛丰富。M4、M5、M6纪年皆在593年前后，M11康业相墓表正处于640年，M20出土的康延愿铭记则在唐龙朔二年（662）。这一现象说明了入唐以后吐鲁番社会逐渐趋同于中原的势头，充分说明康氏家族的汉化过程应是中原社会的影响所致[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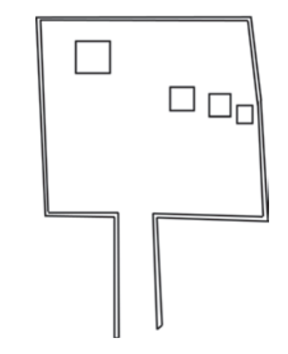
四、文化因素探析

5～8世纪吐鲁番地区的家族茔院无疑使中原家族墓的边疆类型，这一类型在我国的陕西潼关、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雅尔湖等地多有发现。其特点是在地面上建平面方形的坟院，用砾石堆砌院墙和山门。坟院内的墓葬或向左或向右呈斜行排列，或呈横行排列[42]。这种家族墓布局是在中原修筑茔垣的影响下，吸收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因素而形成的[43]。

陕西潼关吊桥发现的汉代杨氏墓群排列方式（图五）与交河沟西张氏家族茔院分布（图六）颇为相似。潼关吊桥杨氏墓群是杨氏祖茔，坐北朝南，北侧是河岸断崖，茔院以土墙围圈，茔内有墓葬7座，东西排列，墓道均南向，时代为东汉顺帝元年（126）至魏文帝黄初六年（226），延续约100年[44]。交河沟西张氏家族茔院位于沟西墓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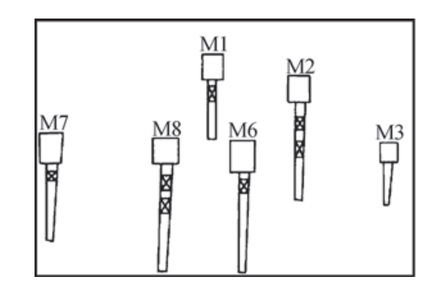
图五 潼关吊桥杨氏墓群平面图



图六 交河沟西张氏家族茔院图平面图

最南端，门向东北，茔院平面呈正方形，以砾石堆砌围墙，茔内墓葬5座，南北排列，方向一致[45]。

此外，西安市灞桥区5座迁葬墓[46]与吐鲁番家族茔院的墓葬排序方式也比较接近。根据出土墓志，可确定王氏家族墓葬的分布及其位置关系。西安市灞桥区5座迁葬墓的顺序为祖辈居后，父辈居中，按辈分依次排列，每一排墓葬由中间向两边布列（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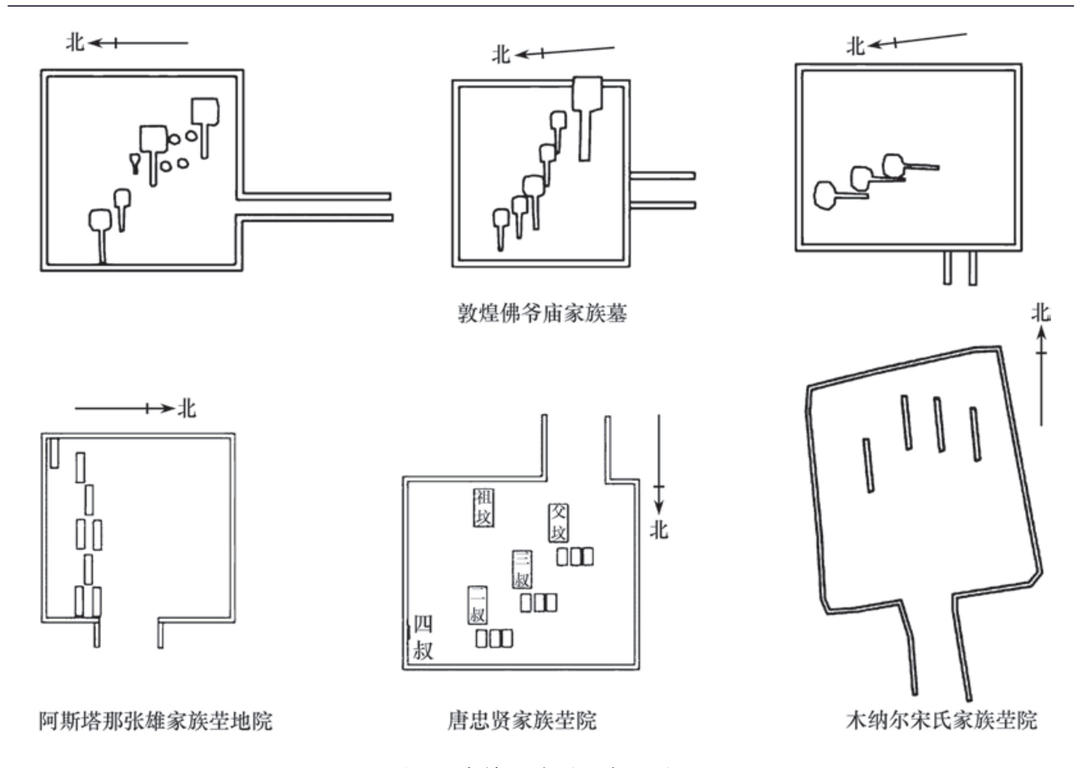




图七 西安洪庆家族墓示意图

甘肃敦煌地区佛爷庙—新店台墓群是敦煌地区古墓群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与吐鲁番家族茔院也很相近（图八）。敦煌佛爷庙墓群位于敦煌县城东南的戈壁滩，地势平坦而开阔，墓葬的地表封土和墓道清晰可见，保存完好。一些家族聚族而葬的墓地四周有砾石堆起的方形“坟圈”。1960年清理的敦煌晋墓以沙石围砌“坟圈”，圈内墓葬形制一致，方向相同，斜行排列[47]。1980年敦煌佛爷庙也发现“坟圈”，以沙石垒砌圈壁，圈内墓葬形制相似，墓道同向[48]。

结合史料可知，东汉时期地方豪强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孝道和厚葬之风流行，达官贵人在墓地上营建墙垣建筑成为一时风尚。诸如江苏邳县彭城相缪宇墓[49]、河北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50]、安徽宿县褚兰发现的汉画像石墓M1[51]、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52]等大中型墓葬皆发现围墙。河西地区东汉晚期出现的围墙式坟院家族墓，其实是吸收内地墙垣结构形成的聚葬模式，充分反映了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河西四郡经济稳定的状况及地方豪强割据一方的现实[53]。而高昌世族多由中原地区迁徙而来，其渊



图八　家族茔院平面布局对比

源与敦煌张氏前凉、李氏西凉等政权中的世家大族有着密切的关系[54]。吐鲁番地区墓葬的修筑墓垣和聚族而葬现象，应是逃避战乱的中原人传去的汉统[55]。

此外，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存在其地区特点。2004年清理的交河沟西康氏家族茔院发现3座竖穴偏室墓，在M28（斜坡道洞室墓）出土一件装有人骨灰的单耳陶罐，这与茔内大多斜坡墓道洞室墓有别。吐鲁番地区的竖穴偏室墓主要流行于前车师国时期[56]，骨灰罐祔葬则是粟特人固有的丧葬习俗，康氏家族茔院此类墓的发现，充分说明了康氏家族丧葬的多元文化特征[57]。而且，吐鲁番地区隋唐墓葬多以苇席为葬具或没有葬具，只有放置尸体的生土台。陈安利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合葬墓卒葬时间先后不同，不能一次入葬，不用木棺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尸体[58]。随葬品如丝织品锦绣等也十分有特色，其纹饰有联珠天马骑士纹、鹿纹、双人纹、猴头纹、小联珠对鸭纹、红地团花纹、彩条纹、龟甲王字纹、猪头纹、棋纹等，从生产技艺来看，这类丝织品有产自中国内地、中亚、萨珊波斯的产品，还有吐鲁番本地的丝织品，本地的产品借鉴了中西织工，融汇两家纹样图案，开辟了不同的系统[59]。随葬陶器多通体饰黑色、绘仰俯莲纹样，可能与当时佛教的传播影响有关；此外，料珠、玻璃器、波斯金币、仿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等随葬品常见。

五、结　　语

汉通西域以来，吐鲁番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不安，大量汉人西迁，其中大姓望族在吐鲁番地区定居联姻，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了高昌社会的上层力量。同当时中原社会类似，“（高昌）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60]。”在河陇移民的“文化移入[61]”及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吐鲁番社会逐渐趋同于中原社会的风俗习惯。家族茔院的鲜明文化特征、茔内墓葬形制由竖穴墓向斜坡墓道洞室墓的转变以及随葬覆面、眼罩、握木、钱币等物和《孝经》《论语》《三国志》等汉文化经典的较多出土，无不带着中原文化的影子。

同时，吐鲁番地区地处交通咽喉，自然是成为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62]。《隋书·高昌传》载麴伯雅称王却迫于突厥压力娶其“大母”，大业五年麴伯雅欲“解辫削衽”，却“畏铁勒而不敢改也”。可见，文化交融的地区差异有时写满了被动的文化接收。

640年，唐统一高昌，设西州和安西都护府，将高昌“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63]，并“遣使安抚西州”，招募“戍西州者”充实边防[64]，西州地区逐渐形成了“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65]”的局面；其后，唐王朝又有计划地把雍州无地或少地之民迁入西州，高宗时放还高昌王室及大族等一干人马，龙朔、总章年间，再迁西州民户，重点是昭武九姓粟特人[66]。如此循环往复的移民举措将（高昌）王族豪右打击消磨，固有的大姓望族已然面目全非。同时，隋唐王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新兴家族势力兴起，旧有大姓望族逐渐逝去了往日的辉煌，家族的强盛兴旺难以延续。唐庭对吐鲁番的开发促进了帝国境内的统一，前高昌社会在诸多方面逐渐趋同于中原社会。

附表

附表一　吐鲁番地区家族茔院统计

家族茔院		平面形制	长	宽	围墙	围沟	墓向	时代	备注
交河沟西墓地	雅尔湖曹氏家族茔院	长方形	不详	不详	宽1米，高0.01～0.2米	/	南偏东	麴氏高昌时期	围墙以藏青色卵石堆成，各墓以碗口大小卵石覆盖其上，似椭圆。墓葬6座
	康氏家族茔院	近长方形	东西现长52.6米	49.4米	宽0.7、残高0.3米	/	东南向	高昌至唐西州	茔院东北角被另一家族茔院打破，东围墙已被破坏，范围不明。墓葬33座
巴达木墓地	白氏家族茔院	长方形	东西长39米	南北宽36～38米	/	宽0.1～0.5、深0.5米	墓向99°	麴氏高昌晚期至唐西州早期	茔院北侧围沟被毁，其余三侧围沟保存完整。茔院东边正中辟有门道，东西长10、南北宽8米。17座墓
	康氏家族茔院	长方形	南北长40米	东西宽34米	/	以围沟为界	墓向195°		茔院北围沟被毁，门道南北长12、东西宽7米。墓葬13座
木纳尔墓地	宋氏家族茔院	长方形	南北长60.3米	东西宽54米	残宽1.3、高0.8～1.2米		墓向165°	麴氏高昌晚期至唐西州时期	南墙中部辟长方形门道。以黑砾石垒砌围墙及门道，墙体塌陷。墓葬4座
	张氏家族茔院	长方形	62米	58米	残宽1.5、高0.6～1米		墓向160°		围墙为石块垒砌，已坍塌，南墙辟长方形门道，长22、宽6米。墓葬12座
	姓氏不明	近方形	32米	30米	不详		西南		茔院坐北向南，石砌院墙，门道长10米。墓葬4座

附表二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家族茔院概况

发掘时间	发掘地点	家族茔院的调查清理情况
1959年	阿斯塔那北区	6座墓葬，分属于三个家族茔院。各茔院范围大小不一，但彼此之间有砾石圈作为明确的界限。时代为4世纪末至7世纪末，相当于中原十六国到盛唐时期
1960年11月	阿斯塔那墓地	4座古墓，同属范氏家族茔院。茔院以砾石铺出茔地的界线，茔地内的各个墓葬和墓室相对应的地表也以砾石摆出甲字形形状，时代为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1963～1965年	阿斯塔纳墓地	南北朝中期至初唐即麴氏高昌阶段，出现了聚族而葬的茔区；盛唐至中唐时期茔区多由一两个或三五个墓组成，四周绕以长宽各约30米的浅沟，一边留有通道
1966～1969年	哈拉和卓墓地	在阿斯塔那以北、哈拉和卓以西地区清理古墓95座，在哈拉和卓以东清理10座，时代为南北朝中期至初唐即麴氏高昌王国时期地表可清楚看出聚族而葬的茔地界限
1972～1973年	阿斯塔那墓地	为麴氏高昌豪门张雄家族茔院，共清理65座墓葬，墓门全都向东。从张氏茔地先后出土的几十方墓志可知，张氏是高昌地区望族，世代与高昌王麴氏互通婚姻
1975年	哈拉和卓墓地	主要是张氏茔院、贾氏茔院和宋氏茔院，时代为十六国高昌郡（阚氏高昌阶段）至唐西州时期
1986年	阿斯塔那墓地	发掘了8座墓葬，其中有6座同属于某一张氏茔院，时代为麴氏高昌时期，另二座墓为唐西州时期

注：1.墓向与茔院方向基本一致；

2.早期报道多是简略述及茔院的分布，缺少必要数据，故未予列表。

附表三　家族茔院方向登记表

墓地	家族茔院	方向	墓葬数量	备注
交河沟西墓地	麴氏家族茔院	东北	墓葬18座	1930年调查 见黄文弼《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载自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史氏家族茔院	东北	墓葬5座	
	氾氏家族茔院	东北	墓葬9座	
	赵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8座	
	画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4座	
	田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3座	
	孟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16座	
	曹氏家族茔院	东北	墓葬7座	
	卫氏家族茔院	东北	墓葬6座	
	袁氏家族茔院	东北	墓葬12座	
	唐氏家族茔院	西南	墓葬18座	
	马氏家族茔院	北	墓葬27座	

续表

墓地	家族茔院	方向	墓葬数量	备注
交河沟西墓地	刘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8座	1930年调查 见黄文弼《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载自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王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21座	
	任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22座	
	张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5座	
	曹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6座	1956年发掘
	D家族茔院	北	墓葬4座	1994年发掘
	张氏家族茔院	东北	墓葬5座	1995年发掘
	康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33座	2004～2005年发掘
巴达木墓地	白氏家族茔院	东	墓葬17座	2004～2005年清理
	康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13座	
木纳尔墓地	宋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4座	
	张氏家族茔院	东南	墓葬12座	
阿斯塔那墓地	杜氏家族茔院	西南	墓葬2座	1965年发掘
	张雄家族茔院	东	墓葬65座	1972～1973年发掘

附表四　家族茔院姓氏表

墓地	家族茔院	家族姓氏	备注
阿斯塔那墓地	东南区张氏家族茔院	张氏（汉姓）	1973年春发掘
	南区张氏家族茔院	张氏（汉姓）	1973年9月发掘
	张氏家族茔院	张氏（汉姓）	1986年发掘
哈拉和卓墓地	张氏家族茔院、贾氏家族茔院、宋氏家族茔院	张氏、贾氏、宋氏（汉姓）	1975年发掘
交河沟西墓地	麴氏家族茔院	麴氏（汉姓）	1930年调查发掘 见：黄文弼《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载自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史氏家族茔院	史氏（汉姓）	
	氾氏家族茔院	氾氏（汉姓）	
	赵氏家族茔院	赵氏（汉姓）	
	孟氏家族茔院	孟氏（汉姓）	
	卫氏家族茔院	卫氏（汉姓）	
	袁氏家族茔院	袁氏（汉姓）	
	唐氏家族茔院	唐氏（汉姓）	
	马氏家族茔院	马氏（汉姓）	
	刘氏家族茔院	刘氏（汉姓）	
	王氏家族茔院	王氏（汉姓）	

续表

墓地	家族茔院	家族姓氏	备注
交河沟西墓地	任氏家族茔院	任氏（汉姓）	1930年调查发掘 见：黄文弼《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载自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张氏家族茔院	张氏（汉姓）	
	雅尔湖曹氏家族茔院、袁氏家族茔院、范氏家族茔院	曹氏、袁氏、范氏（汉姓）	1956年发掘
	张氏家族茔院	张氏（汉姓）	1995年发掘
	康氏家族茔院	康氏（其他族姓）	2004～2005年清理
交河沟南墓地	索氏家族茔院（5处）	索氏（汉姓）	1930年调查发掘
巴达木墓地	白氏家族茔院	白氏（其他族姓）	2004～2005年清理
	康氏家族茔院	康氏（其他族姓）	
木纳尔墓地	宋氏家族茔院	宋氏（汉姓）	2004～2005年清理
	张氏家族茔院	张氏（汉姓）	

附表五　砖志所反映的家族联姻关系表

时段	砖志	联姻家族	备注
大凉政权时期	大凉张季宗及夫人宋氏墓表	张、宋	张氏家族茔院（1930）
	大凉张幼达及夫人宋氏墓表	张、宋	张氏家族茔院（1969）
	大凉张舆明及夫人杨氏墓表	张、杨	张氏家族茔院（1975）
高昌王国时期	高昌章和七年（537）张文智及夫人马氏、巩氏墓表	张、马、巩	张氏家族茔院（1969）
	高昌章和七年（537）张孝贞妻索氏墓表	张、索	张氏家族茔院（1969）
	高昌章和七年（537）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	张、索	张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张洪妻焦氏墓表	张、焦	张氏家族茔院（1972）
	高昌章和十三年（543）朱阿定妻杨氏墓表	朱、杨	张氏家族茔院（1975）
	高昌永平二年（550）画承夫人张氏墓表	画、张	画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永平二年（550）张武忠妻高氏墓表	张、高	张雄家族茔院（1969）
	高昌和平二年（552）氾绍和及夫人张氏墓表	氾、张	氾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建昌元年（555）赵荣宗夫人韩氏墓表	赵、韩	赵氏家族茔院（1930）

续表

时段	砖志	联姻家族	备注
高昌王国时期	高昌建昌二年（556）任叔达妻袁氏墓表	任、袁	任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建昌四年（558）麴那妻阿度墓表	麴、阿	麴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元年（561）任氏及夫人袁氏墓表	任、袁	任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二年（562）张氏及妻焦氏墓表	张、焦	张氏家族茔院（1972）
	高昌延昌三年（563）索演孙及妻张氏墓表	索、张	索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五年（565）曹仁秀妻张氏墓表	曹、张	曹氏家族茔院（1956）
	高昌延昌十三年（573）唐忠贤妻高氏墓表	唐、高	唐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十三年（573）索显忠妻曹氏墓表	索、曹	索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十七年（577）麴弹那及夫人张氏墓表	麴、张	麴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廿年一（581）范神武妻和氏墓表	范、和	范氏家族茔院（1956）
	高昌延昌廿一年（581）王理合妻董氏墓表	王、董	王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廿二年（582）苏玄胜妻贾氏墓表	苏、贾	苏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廿二年（582）画神邑妻周氏墓表	画、周	画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廿六年（586）将孟雍妻赵氏墓表	孟、赵	孟氏家族茔院（1960）
	高昌延昌廿七年（587）田孝养妻孟氏墓表	田、孟	田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廿八年（588）张买得夫人王氏墓表	张、王	张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廿九年（589）麴怀祭夫人王氏墓表	麴、王	麴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卅年（590）张顺妻马氏墓表	张、马	张氏家族茔院（1973）
	高昌延昌卅一年（591）张毅妻孟氏墓表	张、孟	张氏家族茔院（1973）
	高昌延昌卅年三（593）卫孝恭妻袁氏墓表	卫、袁	卫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昌卅年五（595）索氏妻张孝英墓表	索、张	索氏家族茔院（1930）

续表

时段	砖志	联姻家族	备注
高昌王国时期	高昌延昌卅年八年（598）张难陀妻孟氏墓表	张、孟	张氏家族茔院（1973）
	高昌延和元年（602）巩氏妻杨氏墓表	巩、杨	巩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和二年（604）唐元护妻令狐氏墓表	唐、令狐	唐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和三年（604）赵荣宗妻赵氏墓表	赵、赵	赵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和六年（607）张斤子妻高氏墓表	张、高	张氏家族茔院（1969）
	高昌延和七年（608）张叔庆妻麴太明墓表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3）
	高昌延和十一年（612）张武嵩妻氾氏墓表	张、氾	张氏家族茔院（1969）
	高昌延和十一年（612）张仲庆妻焦氏墓表	张、焦	张氏家族茔院（1972）
	高昌延和十一年（612）张鼻儿妻麴氏墓表	张、麴	张雄家族茔院（1973）
	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张伯叟王氏墓表	张、王	张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义和元年（614）张头子妻孟氏墓表	张、孟	张氏家族茔院（1973）
	高昌义和二年（615）唐幼谦妻麴氏墓表	唐、麴	唐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义和四年（617）张顺妻麴玉娥墓表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3）
	高昌义和五年（618）王尊妻史氏墓表	王、史	王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张师儿及妻王氏墓表	张、王	张氏家族茔院（1986）
	高昌延寿七年（630）赵悦子妻马氏墓表	赵、马	赵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寿八年（631）曹妻苏氏墓表	曹、苏	曹氏家族茔院（1930）
	高昌延寿十五年（638）氾延海妻张欢台墓表	氾、张	氾氏家族茔院（1956）
	高昌延寿十五年（638）张银子妻高台晕墓表	张、高	张氏家族茔院（1969）
唐西州时期	唐贞观十五年（641）任阿悦妻刘氏墓表	任、刘	任氏家族茔院（1930）
	唐贞观十六年（642）张谦佑妻严氏墓表	张、严	张氏家族茔院（1986）
	唐贞观十六年（642）张隆悦妻麴文姿墓表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3）
	唐贞观廿年（646）张延衡妻麴氏墓表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2）
	唐永徽五年（654）史伯悦妻麴氏墓表	史、麴	史氏家族茔院（1930）
	唐显庆五年（660）刘住隆妻王延台墓志	刘、王	刘氏家族茔院（1930）
	唐麟德元年（664）张氏妻麴姜墓表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2）
	唐麟德二年（665）张君妻麴胜墓志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3）

续表

时段	砖志	联姻家族	备注
唐西州时期	唐咸亨五年（674）曹怀明妻索氏墓志铭	曹、唐	曹氏家族茔院（1930）
	唐咸亨五年（674）张欢口妻唐氏墓表	张、唐	张氏家族茔院（1995）
	唐永淳元年（682）唐思文妻张氏墓志	唐、张	唐氏家族茔院（1969）
	唐永淳二年（683）张欢夫人麴连大墓志铭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2）
	唐永昌元年（689）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3）
	武周证圣元年（695）田府君夫人卫氏墓志	田、卫	田氏家族茔院（1975）
	武周圣历三年（700）张智积妻麴慈音墓志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3）
	唐神龙元年（705）康富多夫人康氏墓志	康	康氏家族茔院（1930）
	唐开元二年（714）张大及妻焦氏墓表	张、焦	张氏家族茔院（1972）
	唐开元三年（715）张公夫人麴娘墓志铭	张、麴	张氏家族茔院（1972）

注：1.砖志资料来自于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

2. 备注栏内“（××）”表示出土或获得年份，如（1930）表示：1930年黄文弼先生调查发掘获得；砖志出自各家族茔院墓葬内，与文章探讨的家族茔院相合。

注　　释

［1］曾炳煌. 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普通古籍）［M］. 传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藏抄本.

［2］古代文献中，家族墓地往往被称作“塚（冢）次”“先茔”或“旧茔”等.《说文》载：“茔，墓也.”《广雅》：“茔，葬地也.”在现代汉语里，茔即茔域，墓地.《广雅》：“院，垣也.”《玉篇》：“院，周垣也.”院即房屋围墙以内的空地. 吐鲁番地区的家族墓地以围墙的形式圈划界域，且留有门道门阙，似院落门庭，故笔者称之为“家族茔院”.

［3］冈崎敬. 东西交涉考古学序说——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A］. 东西交涉考古学［C］. 东京：平凡社，1973：87～127.

［4］冈内三真. 交河故城ヤールホト城南区古墳群と墓表墓誌［J］.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6辑第4分册2000年度］，2001：74～76.

［5］倪润安. 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A］. 西域文史（第二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5～74.

［6］新华.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分期研究——斯坦因阿斯塔那墓葬资料的在整理和研究［A］. 考古学集刊（12集）［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330～355.

［7］徐苹芳. 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J］. 考古，1981（6）.

［8］韩国河.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制度［J］. 考古与文物，1999（2）.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1973（10）.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1960（6）.

［11］ 新疆博物馆考古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三次考古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2000（3、4）.

［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1973（10）.浅沟的宽度疑是30厘米，而非30米.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J］. 文物，1972（1）.

［14］ a. 新疆博物馆考古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考古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2000（3、4）.

b. 新疆博物馆考古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考古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2000（3、4）.

c. 新疆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1975（7）.

［15］ 新疆博物馆考古队. 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1978（6）.

［16］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J］. 考古，1992（2）.

［17］ 黄文弼. 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A］. 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25.

［18］ 李文永. 交河故城寺院及雅尔湖古墓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1989（4）.

［1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4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1996（4）.

［2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5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1996（4）.

［2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吐鲁番交沟故城沟西墓地麴氏高昌—唐西州时期墓葬1996年发掘简报［J］. 考古，1997（9）.

［22］ 王炳华. 交河故城沟西墓地1994～1996年发掘报告［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3.

［23］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J］. 考古，2006（12）.

［24］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新疆吐鲁番地区巴达木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2006（12）.

［25］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新疆吐鲁番地区木纳尔墓地的发掘［J］. 考古，2006（12）.

［26］ 杜斗城，郑炳林. 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J］. 西北民族研究，1988（1）.

［27］ 北京图书馆藏位字79号敦煌唐写本卷子《姓氏录》记载唐南阳郡望姓中记有张氏：“南阳郡十姓，口州、张、乐、赵、滕、井、何、白、邓、姬.”

［28］ 陈国灿. 跋《武周张怀寂墓志》［J］. 文物，1981（1）.

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载“……时有司隶校尉张襄者，赵王敖□□□准襄奏霍光妻显毒煞许后. 帝以光有大功，寝其事。襄惧，以地节元年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天水，病卒. 子

□□年来适此郡，家于北府，俗号北府张，史荣□□，子孙莫睹. 游击将军上柱国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张端，自云是其后也.”

［29］ 孟宪实. 唐统一后西州人故乡观念的转变——以吐鲁番出土墓砖资料为中心［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2）.

［30］ 陈国灿. 从吐鲁番出土文献看高昌王国［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31］ 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3：2243.

［32］ 吐鲁番地区文物局. 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J］. 考古，2006（12）.

［33］ 倪润安. 麹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墓葬初论［A］. 西域文史（第二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5.

［34］ 吴震. 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J］. 文物，1981（1）.

［35］ 宿白. 白沙宋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82）.

［36］ 宋晓梅. 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3.

［37］ 王素. 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J］. 敦煌研究，1993（1）.

［38］ 黄文弼. 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A］. 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17.

［39］ 李蔚然. 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J］. 考古，1983（4）.

［40］ 齐东方. 隋唐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94.

［41］ 王宗磊. 鲁番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墓志及其相关问题［J］. 西域研究，1998（2）.

［42］ 徐苹芳. 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J］. 考古，1981（6）.

［43］ 韩国河.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制度［J］. 考古与文物，1999（2）.

［44］ 陕西省文管会. 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J］. 文物，1961（1）.

［4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5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发掘简报［J］. 新疆文物，1996（4）.

［4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洪庆北朝、隋家族迁葬墓地［J］. 文物，2005（10）.

［47］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 敦煌晋墓［J］. 考古，1974（3）.

［48］ 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 敦煌佛爷庙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1983（10）.

［49］ 尤振尧，陈永清，周晓陆. 东汉彭城相缪宇墓［J］. 文物，1984（8）.

［50］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64（2）.

［51］ 王步毅. 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J］. 考古学报，1993（4）.

［52］ 段鹏琦，林玉生，肖淮雁等. 汉魏洛阳城西东汉墓园遗址［J］. 考古学报，1993（3）.

［53］ 张小舟. 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J］. 考古学报，1987（1）.

［54］ 姜伯勤. 高昌世族制度的衰落与社会变迁：吐鲁番出土高昌麴氏王朝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A］.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A］.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0 ~ 43.

［55］ 韩国河.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家族墓地制度［J］. 考古与文物，1999（2）.

［56］ 羊毅勇. 交河故城沟北一号台地墓葬所反映的车师文化［J］. 西域研究，1996（2）.

［57］ 王维坤. 论西安北周粟特人墓和厨宾人墓的葬制和葬俗［J］. 考古，2008（10）.

［58］ 陈安利. 西安、吐鲁番唐墓葬制葬俗比较［J］. 文博，1991（1）.

［59］ 薄小莹. 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连珠纹织物［A］. 中国考古集成・西北卷（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C］.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3674～3692.

［60］ 周书・卷五〇・高昌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1：915.

［61］ 文化移入是研究移民适应主体社会时常用的一个术语，文化移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移民不可不与主体社会发生关系，但起初他们只能接受那些与自己固有文化有某些关联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与主题社会发生更深层的交流，从而逐渐在更大范围内与主体社会融合. 参见宋晓梅. 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2］ 王欣. 麴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J］. 西北民族研究，1991（2）.

［63］ 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296.

［64］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1.

［65］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太宗贞观十六年 ［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177.

［66］ 刘安志. 唐初西州的人口迁移［J］，中华文史论丛，2007（3）.

A Sudy on the Family Cemetery in Turpan Area from the Fifth Century to the Eigth Centry A.D

Gao Wei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study on the family cemetery in Turpan Area from the fifth century to the eighth centry A.D. It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amily cemetery, layout, sort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changes of tombs, and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n concluded that the family cemetery keep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society showed more convergence.

Key words: the fifth century to the eighth century A.D; Turpan area; family cemetery; Central Plains; funeral culture

宋元时期的五音地理书——《地理新书》与《茔元总录》

刘　未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汉唐以降乃至宋元，地理阴阳人常以五音分五姓，五姓配五行来指导堪舆活动。明清以来，这一系统的堪舆术衰微不传。时至今日，考古者面对宋元时期的家族墓地资料，已经很难分辨其中蕴含的五音择地理念了。幸而中古时期通行的一些五音地理书仍然能够流传至今，这就为我们了解五音墓地的规划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至少在六朝时期，已有五音地理书出现。《隋书·经籍志》五行类[1]有："《五姓墓图》一卷。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2]，《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书》四十五卷，亡。"唐代又有新的发展。《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3]有：《六甲冢名杂忌要诀》二卷、孙氏《五姓墓图要诀》五卷、胡君《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4]新增：《五音地理经》十五卷、由吾公裕《葬经》三卷、孙季邕《葬范》三卷。

以上作品原书均已亡佚，仅由吾《葬经》、孙氏《葬范》在后代地理书中有部分引用。唐代以降五音地理书保存至今的主要有四项[5]：①敦煌葬书[6]；②《地理新书》[7]；③《茔原总录》；④《大汉原陵秘葬经》[8]。本文将对②、③两项的成书情况及版本流传略作考述[9]。

一、《地理新书》

北宋早期所存五音地理书的情况略见于《崇文总目》五行类[10]，有史序《乾坤宝典》四百一十七卷、《乾坤宝典·葬书》三十卷、释一行《五音地理经》十五卷、孙季邕《葬范》三卷。有宋一代流行的五音地理书则可于《宋史·艺文志》五行类[11]中得到了解：史序《乾坤宝典》四百五十五卷、王洙《地理新书》三十卷、孙季邕《葬范》五卷、僧一行《地理经》十二卷、僧一行《地理经》十五卷、《五音地理诗》三卷、《五音地理经诀》十卷、《五音山冈诀》一卷、《李仙师五音地理诀》一卷、《五姓合

诸家风水地理》一卷、《五音二十八将图》一卷[12]、《五姓凤髓宝鉴论》一卷、《五姓玉诀旁通》一卷等。

这其中非常重要而又流传至今的是《地理新书》[13]。王洙《地理新书序》对成书过程有清楚的叙述：

唐贞观中，太常博士吕才奉诏撰《阴阳书》五十篇，其八篇地理也。至先朝更命，司天监史序等分门总辑为《乾坤宝典》四百五十篇，其三十篇地理也。书既成，高丽国王上表请于有司，诏给以写本。然序之书丛杂猥近，无所归诣。学者抉其讹谬凡三千五百。景祐初，司天监王承用又指摘阙误一千九百。始诏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嵇颖、冬官正张逊、太卜署令秦弁与承用覆校同异，五年而毕。诏付太常，命司天少监杨惟德与二宅官三十七人详其可否。惟德洎逊斟酌新历，修正舛盭，别成三十篇，赐名曰《地理新书》。复诏钩核重复。至皇祐三年，集贤校理曾公定领其事，奏以浅漶疏略，无益于世。有诏臣洙、臣禹锡、羲叟洎公定置局删修。以司天监主簿亢翼改正其旧，观文殿学士丁度典领焉。度薨，臣洙寔掌其属。于是，具阅三馆所藏，及古今占术验忌。披其奥突，诘其苞柢，管依体要，区以轻重，而各从擶部，先后可寻。自吕才成书，名以地理而专记冢墓，颇淆以室舍。吉凶同条，非著书之法。今首以城邑、营垒、寺署、邮传、市宅、衢術，则左阴右阳，刑祸福德所相也。辨之以四方，叙之以五行，媲之以八卦，参之以八变，为地事凡二十篇。终以冢穴、埏道、门陌、顷亩，则开三闭九，山垄水泉所相也。任之以八将，齐之以六对，董之以三鉴，傃之以六道，为葬事凡十篇。若乃冈原利害，则绘之以易民用，为地图一篇；种次有汇，则总之以便看读，为目录一篇；勒成三十二篇。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亦可与之参证。真宗景德二年（1005）五月丁巳条载[14]：

先是，上以天文、地理、阴阳、术数之书，率多舛误，乃命司天少监史序等同加编次，掇其精要，以类分之，为《乾坤宝典》四百一十七卷。丁巳，序等上其书，上作序，藏秘阁。

真宗天禧五年（1021）九月甲午条载[15]：

权知高丽国王事王询遣告奏使、御事礼部侍郎韩祚等百七十人来谢恩，且言与契丹修好，又表求阴阳地理书、《圣惠方》。并赐之。

关于《地理新书》的成书时间，序文中没有直接说明，只是提到："自有诏校正，距今二十一年。"夹注则解释称：

自仁宗皇祐三年辛卯奉诏校正，至六年甲午春，改至和。三年丙申秋，改嘉祐。八年癸卯仁宗崩，甲辰英宗改治平。四年丁未，神宗戊申改熙宁。今四年辛亥，中间相去二十一年。

据此，多以为书成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16]。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景祐三年（1036）六月己酉条[17]："命官重校阴阳、地理书。"仁宗皇祐五年（1053）正月壬戌条[18]："命知制诰王洙修纂地理书。"仁宗嘉祐二年（1057）九月甲戌条[19]："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吏部郎中王洙，被病踰月。上遣使问病少间否，能起侍经席乎？九月甲戌朔，洙卒，赐谥曰文。御史吴中复言洙官不应得谥，乃止。"又据王应麟《玉海》卷一五《地理》，皇祐地理新书条[20]：

初，真宗朝史序等撰《乾坤宝典》四百五十篇，其三十篇地里也。其书丛谬。景祐三年六月己酉，命嵇颖、胡宿重校阴阳地理书，五年而毕。司天少监杨惟德等别修成三十篇，赐今名。皇祐五年正月癸亥，复命知制诰王洙提举修纂地理图书。直集贤院掌禹锡、著作刘羲叟删修。嘉祐元年十一月，书成三十卷上之，赐名《地理新书》，赐洙等器币。

因知嘉祐二年王洙已病卒。序文中所谓"有诏校正"当指景祐三年，至嘉祐元年，累计二十一年。是以《玉海》所记成书年月为确。

《地理新书》采用吕才、一行、由吾公裕、孙季邕四家葬书内容最多，这些也都是为北宋皇家丧葬所多次采信的。《宋会要辑稿》礼三一之三四、三五云[21]：

（景德元）五月二十五日，按行使刘承珪言：得司天监史序状，园陵宜在元德皇太后陵西安葬。……其地西稍高，地势不平。按一行《地里经》，地有土□不平，拥塞风水，宜平治之。正在永熙陵壬地，如贯鱼之形。从之。

《宋会要辑稿》礼三七之七云[22]：

（乾兴元年六月）十六日，王曾等上言：得司天监主簿侯道宁状，按由吾《葬经》，天子皇堂深九十尺，下通三泉；又一行《葬经》，皇堂下深八十一尺，合九九之数，今请用一行之说。旧开上方二百尺，今请止百四十尺。并从之。

《宋会要辑稿》礼三一之二二云[23]：

（咸平三年二月）八日，宗正卿赵安易言：请因元德皇太后山陵之时并懿德、淑德、庄怀皇后各就旧位茔园改卜陵台。司天监状，《葬范》云：因凶亦可大葬。诸丧今因园陵增修陵台并吉。诏可。

北宋以后，《地理新书》主要在中原北方地区流行[24]。金代毕履道、张谦陆续加以修订增补。张谦《精加校正补完地理新书（序）》称：

伏睹古唐、夷门、蒲坂等处，前后印卖《新书》，未尝有不过目收购者。终莫能见其完本。唯我先师冯公传授，亦遗地图一篇。继有平阳毕先生者，留心考核，可无微失。而又增加图解等法度，真得其旨趣矣。自是更访求名士家藏善本，比对差互甚多。今据从来板内遗阙者，并以补完；元差互者，校雠改正；一两疑未详者，乃各存之。及其间写雕错误，亦以校定。……仆今见平阳数家印卖此书，虽有益于世，竟未见完者。

金元时期司天监（台）的堪舆活动和阴阳学考试也以其为重要依据。《大金集礼》云[25]：

（大安元年，1209）取责到将去司天台阴阳人张庆渊等三人状称：相视得自陵寝红排沙以西，过涧辘轳岭，已有南郊涧道，隔断山势。以西又过木浮岭，下有龙泉河，河身深阔，隔断地脉。按《地里新书·五音地脉篇》："凡隔坑潭江河，地势已绝，不相连接。[26]"兼山陵至此已三十二里，若将龙泉河便为禁限西界，委是别无窒碍。其东、南、北三面禁界，止合依元定界堠为限。

《金史·选举志》云[27]：

凡司天台学生，女直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试补。又三年一次，选草泽人试补。其试之制，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

《秘书监志》卷七云[28]：

旧例草泽人三年一次，差官考试，于所习经书内出题六道，……今具许习经书试格如后。所习经书：《宣明历》、《符天历》、王朴《地理新书》、吕才《婚书》。……《地理新书》题三道：假令问安（丘）延翰以八卦之位通九星之气，可以知都邑之利害者何如？假令问五姓禽交名（各）得是何穴位？假令问商姓祭主丁卯九月生，宜用何年月日晨（辰）安葬？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吏部卷三云[29]：

试选阴阳教授：元贞元年（1295）二月……于三元经书内出题。……婚元：吕才《大义书》；宅元：《周书秘奥》、《八宅通真论》；茔元：《地理新书》、《茔元总论》、《地理明真论》。

《通制条格》卷二八云[30]：

至大四年（1311）正月，尚书省刑部呈：二宅陆妙真出殡刘万一时，信笔差悮，于铭旌上书写"千秋百岁"字样。阴阳教授于《地理新书》并《茔原总录》券式内，照得虽有该载上项字样，理合回避。……

《地理新书》在明代的几种书目中还有著录[31]，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32]、钱溥《秘阁书目》[33]、朱睦㮮《万卷堂书目》[34]。至清代中期，《地理新书》重新得到收藏、影钞，现知保存下来的有两部刻本三部钞本。

（1）台北"国家图书馆"藏金元刻本[35]，十五卷，六册，书号：06509。递藏次序为[36]：陈揆—翁心存、翁同爵、翁同龢、翁之缮—蒋孟苹、蒋祖诒—张珩—"台湾图书馆"。

（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元刻本[37]，十五卷，六册，书号：SB/8890。递藏次序为[38]：黄丕烈—汪士钟—郁松年—丁日昌—李盛铎—北京大学图书馆。《续修四库全

书》收入子部术数类影印出版[39]。

（3）国家图书馆藏清影金元钞本，十五卷，四册，书号：5217。聊城杨氏海源阁旧藏[40]。

（4）国家图书馆藏清影金元钞本，十五卷，四册，书号：6847。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41]。

（5）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清影金元钞本，十五卷，六册，书号：06510。蒋孟苹、张乃熊旧藏，台北集文书局影印出版[42]。

经过比对，诸本版式相同，三个钞本同源于台北刻本[43]，个别字词略有小异，而北大刻本则与之差别较多，可以相互校正。

二、《茔原总录》

此书序文部分残存有“由吾公裕序”和“司天监杨惟德上表”，“庆历元年三月五日《茔原总录》一十一卷合成”等字样。前引《元典章》和《通制条格》中与《地理新书》并称的《茔元总论》及《茔原总录》应即此书。明代书目多有著录，如杨士奇《文渊阁书目》[44]、钱溥《秘阁书目》[45]、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46]等。此书现知至少存有四部刻本。

（1）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存五卷，二册，书号：2375。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刻本，存五卷，一册，书号：平图012088，平2913/06507。即前北平图书馆藏书[47]。

（3）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元明之际刻本，存五卷，二册，书号：06508。曾为匡源、陶湘收藏[48]。

（4）嘉德1997年春季拍卖会元明之际刻本，二册[49]。

（1）、（2）相同，卷前均有“由吾公裕序”及“杨惟德上表”，颇有残损。（3）、（4）相同，卷前无序及表，保存较好。今以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元明之际刻本为底本参校诸本，录各卷篇目如下：

> 卷一：五山局图论篇第一，五行所属论篇第二，山论篇第三，水论篇第四，九星论吉凶篇第五，论形势篇第六，择地论篇第七，主山论篇第八，放水论篇第九，总括吉凶论篇第十，辨俗姓顺合山水篇第十一，造作论篇第十二。
>
> 卷二：卜地吉凶篇第一、筮地吉凶篇第二、初终篇第三、庭丧论篇第四、送丧避忌篇第五、野外权厝篇第六、神杀地上合禁步数篇第七、三镜六道篇第八、上下利方篇第九、交射论篇第十。
>
> 卷三：择葬年月避忌篇第一、推魁刚法篇第二、择凶葬篇第三、择本命行年立成篇第四、择日吉凶法篇第五、诸土禁吉凶篇第六、择时吉凶篇第

七、择葬取八法篇第八、立明堂法篇第九、祭神祇立坛法篇第十、卜立宅兆破土祭仪篇第十一。

卷四：地合四兽法篇第一、丧庭冢穴篇第二、六甲冢开三闭九法篇第三、八卦冢开四闭十法篇第四、天覆地载法篇第五、门陌冲阡法篇第六、龙虎行法篇第七、阴阳门陌法篇第八、三会四福篇第九、禽交尺步法篇第十、座穴次序篇第十一、封树高下法篇第十二、幽穴浅深法篇第十三、取土培坟及修山门角阁篇第十四、丧葬之制篇第十五、棺椁之制篇第十六。

卷五：四折曲路法篇第一、埏道命祇法篇第二、葬杂忌篇第三、镇墓法篇第四、改葬开旧墓篇第五、葬后谢墓法篇第六、接灵除灵法篇第七、雌雄杀法篇第八、传符之篇第九、殃杀出去日时方位篇第十、岁杀历篇第十一、禳除仪物篇第十二、择师篇第十三、伪书篇第十四、三礼丧服图篇第十五、十六。

是书内容驳杂，为拼合之作，其具体来源大体可以分作五组：

（1）卷一除第十篇以外部分。这组内容以星卦相配论山水，与北方五音理论相乖，实际上袭自安徽绩溪人胡舜申于南宋绍兴乾道间所撰《地理新法》一书[50]。书前所谓由吾公裕序文也与《地理新法叙》相近。

（2）卷一《总括吉凶论篇》第十。这组内容为歌诀形式，其中提到“太古神仙海角经”“江西居士王希逸”等，似与《宋史·艺文志》所收王希逸《地理秘妙歌诀》[51]有关。

（3）卷二《初终篇》第三、卷四《丧葬之制篇》第十五、《棺椁之制篇》第十六。这组内容分别出自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二四和卷二一五[52]。

（4）卷五《三礼丧服图篇》第十五、第十六。这组内容来自聂崇义《新定三礼图》[53]卷一五《丧服图》上、卷一六《丧服图》下，以及卷一八《丧器图》上、卷一九《丧器图》下。

（5）卷二至五大部分。这组内容论述五姓选时择地，与《地理新书》相似。书前有庆历元年司天监杨惟德进书表，则又与《地理新书序》和《玉海》提到的庆历元年杨惟德别修成地理书一事相合，颇疑两者之间存在关联。

《茔原总录》的成书年代可以根据卷三所录买地券范本（据北平本）作出判断，券文作：

维年月朔日，某州某县某坊住人某甲，伏缘父母奄逝，未卜茔坟，夙夜忧思，不遑所厝。遂令日者，择此高原，来去朝迎，地占袭吉。地属本州岛本县某村之原，堪为宅兆。梯己出借（备）钱彩，买到墓地一方，南北长若干步，东西阔若干步。（以上为B）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管分擘四域。丘丞墓伯，封步界畔，道路将军，齐整阡陌。致使千秋百载（台北“国家图书馆”本作“千秋百岁”），永无殃咎。若有

牙（干）犯，并令将军亭长，缚付河伯。令（今）备牲牢酒脯，百味香新，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各已分付。令工匠修营，安告已后，永保休吉。知见人岁月主，代保人今日直符。故气邪精，不得干恡，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祸。助葬主里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以上为A）券立二本，一本奉付后土，一本乞付墓中，令亡父某人收把，准备付身，永远照用。今分券背上又书合同二字，令故气伏尸永不侵争。（以上为C）

券文可以分作三个部分，中间的A显然沿袭自《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四所载，是宋金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类范式，而首尾的B、C则属新添。收罗排比宋元以来买地券资料（附表），可知《茔原总录》所载券文范式自元代（尤指向元代后期）开始流行，明代前期加以承续，明代后期在此范式基础上，券末又添加代保人年月日时直符某某之神这样一段文字（D）[54]。这样一来，《茔原总录》系元人裒集宋代南北方地理书及礼书，并适当加以修订的情况也就比较清楚了。

2007年7月初稿

2009年8月修订

附记：本文曾刊于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会刊《青年考古学家》总第22期，2010年5月，此次发表正文略作删减，附表增补数例。文中所用中国台湾、韩国庋藏古籍承金蕙涵、金志园女士代为影印，谨致谢忱。

附表

元明地券文例

时间	地点	亡人	A	B	C	D	资料来源
宪宗八年，1258	河南焦作	冯三翁	●	○			河南文博通讯，1980（4）
乙亥年，1275/1335	山东章丘	杨某	●	●			华夏考古，1999（4）
至元二十五年，1288	河南卫辉	齐某	●	●			地券征存
至元三十一年，1294	河北涿鹿	郭某	●	●	○		文物春秋，1995（3）
大德元年，1297	山西孝义	曹某	●	○			考古，1960（7）
大德十年，1306	内蒙古正蓝旗		●	●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1994
皇庆二年，1313	山西岚县	康某	●	●			文物季刊，1992（4）
延祐元年，1314	北京	海某	●	●			北京文物与考古（二），1991
延祐六年，1319	宁夏固原	陈某	●	●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1）
延祐七年，1320	山西原平	卢子善	●	○	●		山西古迹志

续表

时间	地点	亡人	A	B	C	D	资料来源
泰定二年，1325	陕西西安	李新	●	○			文博，1988（2）
至正元年，1341	山西岚县	杨某	●	●	○		文物季刊，1992（4）
永乐十九年，1421	四川成都	徐道张	●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宣德元年，1428	青海	陈子名	●	●			中国土族，2005秋季号
正统三年，1438	河北安次	何某	●	●	●		文物，1959（1）
正统四年，1439	广西桂林	张法憘	●	●	●		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1998
正统九年，1444	安徽合肥	陶时	●	●	●		文物春秋，2005（3）
正统十四年，1449	江苏南京	陈妙真	●	●	●		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2006
景泰元年，1450	辽宁鞍山	崔源	●	●	●		文物，1978（11）
景泰六年，1455	辽宁辽阳	李妙善	●	●	●		辽阳博物馆藏石
景泰六年，1455	江苏南京	金英	●	●	○		文物参考资料，1954（12）
景泰七年，1456	山东蓬莱	李某	●	●	○		地券征存
天顺五年，1461	江苏淮安	赵妙安	●	●	●		东南文化，2012（1）
天顺八年，1464	四川平武	王玺	●	●			文物，1989（7）
成化六年，1470	辽宁辽阳	朱妙祯	●	●	●		辽阳博物馆藏石
成化七年，1471	陕西西安	上洛县主	●	●	●		考古与文物，2009（4）
成化十年，1474	四川都江堰	张氏三	●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成化十三年，1477	北京	黄子荣	●	●	●		首钢日报，2008-4-9（3）
成化十四年，1478	四川冕宁	李善	●	●	●		四川文物，1997（4）
弘治四年，1491	四川都江堰	唐成全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弘治五年，1492	四川成都	杨升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弘治九年，1496	陕西甘泉	张才	●	●	●		考古与文物，1995（2）
弘治十四年，1501	四川都江堰	黄瑄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弘治十六年，1503	四川成都	吴氏大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续表

时间	地点	亡人	A	B	C	D	资料来源
正德十年，1515	北京	夏儒	●	●	●	●	文物，1964（11）
嘉靖三年，1524	四川郫县	杨森	●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嘉靖六年，1527	河南尉氏	从宽	●	●	●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2002
嘉靖七年，1528	河南登封	李彪	●	●	●	●	郑州宋金壁画墓，2005
嘉靖十二年，1533	河北盐山	李明	●	●	●		文物春秋，2001（6）
嘉靖十六年，1537	河南	王氏	●	●	●	●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89
嘉靖十八年，1539	河南睢县	王佐	●	●	●	●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2002
嘉靖二十一年，1542	河南睢县	汤卿	●	●	●	●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2002
嘉靖二十三年，1544	河南尉氏	梁氏	●	●	●	●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2002
嘉靖三十六年，1557	辽宁辽阳	钟义	●	●			辽阳博物馆藏石
嘉靖四十二年，1563	安徽合肥	伦氏	●	●	●		文物春秋，2005（3）
隆庆元年，1567	四川都江堰	周洪范	●	●			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2012
隆庆二年，1568	江苏扬州	宋公淳	●	●	○		匋斋藏石记・卷四四
万历三年，1575	河南郑州	荆文德	●	●	●	●	东方博物，（31），2009
万历二十七年，1599	甘肃兰州	戴廷仁	●	●	●	●	文物，1998（8）
万历二十七年，1599	山西永济	仙梦松	●	●	●	●	河东出土墓志录，1994
万历四十年，1612	陕西高陵	刘扶	●	●		●	高陵碑石，1993
万历四十四年，1616	北京	田应敖	●	●	●	●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89
天启三年，1623	山西襄汾	丁某	●	●	●	●	文物季刊，1996（1）
天启七年，1627	山西芮城	王纪	●	○	●	●	河东出土墓志录，1994

注：●表示模式符合；○表示模式大体符合。

注　　释

［1］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039.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道家文献涉及五音择墓的内容. 真诰·卷一〇·协昌期第二. “若徵家甲向，朱鸟在西南；羽家庚向，朱鸟在东北，所不论耳。”（道藏·第20册［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550. ）赤松子章历·卷五. “角姓冢讼交通所属勾芒之神，徵姓冢讼交通所属祝融之神，商姓冢讼交通所属蓐收之神，羽姓冢讼交通所属玄冥之神，宫姓冢讼交通所属勾陈之神也. ”（道藏·第11册［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221. ）

［2］太平御览·卷五六〇·礼仪部（三九）·冢墓（四）［M］. “《图墓书》曰：大墓天刚，严父之门，八将之首，位处乾尊。欲得连堽隐轸，状如乱云，望之翙翙，絶而复连，小顿大起，千里相牵，寿过期颐，世世登仙. ”北京：中华书局，1960：2532.

［3］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044. 同书该页还载有葬经·八卷·又十卷·又二卷. 隋书·卷七八·萧吉传，记其著葬经·六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777. 又记其上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 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 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 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 ”这里根据的是五音理论.（张齐明. 风水“五音”流变述考［J］. 文史，2007（4）：169. ）如《旧唐书》所录《葬经》果为萧吉所著，则很可能也是一部五音地理书.

［4］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556～1558. 新志所载有与旧志重复而微异者，郭氏. 五姓墓图要诀·五卷.

［5］除此四项之外，另见有两部元代编辑的三元书：王履道. 阴阳备用三元节要. 国家图书馆藏元刻本，刘太真. 新刊京本纂集诸类阴阳地理玉钥三元. 国家图书馆藏明初刻本. 其莹元部分存有与五音有关的内容，为撮钞改编之作. 关于元明清时期的三元书，详另文.

［6］敦煌文书中共拣选出14件葬书，均与五音地理有关，即：S. 10639AV、S. 12456B、S. 12456C、P. 2534、P. 2550B、P. 2831、P. 3647、P. 4930、S. 2263、S. 3877V、S. 2263V、Φ279、S. 5645、S. 3877. 这批葬书已整理出版，参：金身佳.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但书中录文颇有脱讹，使用时须加注意.

［7］此书在考古学的最初利用，参：宿白. 白沙宋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1），2002（2）.

［8］此书在考古学的最初利用，参：徐苹芳. 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J］. 考古，1963（12）：87～106.

［9］关于两书内容与考古资料和对比研究，详参拙撰《宋元时期的五音墓地》，待刊稿.

［10］崇文总目·卷四［M］. 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本.

［11］ 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77：5244，5250，5253，5258，5259，5261，5263.

［12］ 当为《五音三十八将图》之误.

［13］ 王洙编，毕履道，张谦补. 重校正地理新书［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元刻本，校以台北“国家图书馆”藏金元刻本，下同.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〇［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1339.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2255.

［16］ 宿白. 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A］. 考古学研究（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后收入《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40. 冯继仁. 论阴阳勘（堪）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 文物［J］. 1994（8）：56. 刘屹. 上博本〈曹元深祭神文〉的几个问题［A］. 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50. 余欣. 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6：108.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790.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四［M］. 北京：中华书局，2004：4196.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M］. 北京：中华书局，2004：4490.

［20］ 王应麟. 玉海・卷一五・地理［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1987：294.

［21］ 宋会要辑稿・礼三一之三四，三五，又见礼三七之五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57：1170，1171，1346.

［22］ 宋会要辑稿・礼三七之七，又见礼二九之二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57：1323，1075.

［23］ 宋会要辑稿・礼三一之二二，又见礼三七之四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57：1164，1344.

［24］ 南宋皇室尚因以为据. 玉海・卷三・国朝天文书［M］：“《会要》建炎三年三月二日，诏：纪元历经等书有收藏者，令送太史局. ……《地理新书》一十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影印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1987：62～63. 此外，南宋曾慥编辑《类说》亦曾引《地理新书》十五条. 参，曾慥. 类说・卷四九［M］. 影印明天启刻本. 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25］ 大金集礼・卷一二至一七［M］. 丛书集成初编据史学丛书本.

［26］ 此段文字见于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七［M］. 后面还有“不为吉地”四字.

［27］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2～1153.

［28］ 秘书监志・卷七・司天监［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17～118.

［29］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吏部卷三，官制三，阴阳官［M］. 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刻本. 按，“吕才《大义书》”原文作“占才大义书”. 至顺镇江志・卷一七・阴阳学［M］：“至元二十八年，仿儒学、医学例设教授，掌以阴阳之书，教授后学. ……婚元则用吕才《大义书》，宅元则用《周易秘奥》，《八宅通真论》，茔元则用《地理新书》，《茔元总论》，

《地理明真经》.”据改.

［30］ 通制条格 · 卷二八 · 杂令［M］. 铭旌忌避.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20.

［31］ 叶盛《菉竹堂书目》和焦竑《国史经籍志》亦有著录，但前者系伪作（张雷.《菉竹堂书目》的真本和伪本. 江苏图书馆学报［J］. 1998（3）：52 ~ 53.），后者系抄撮前代书目.

［32］ 文渊阁书目 · 卷一五［M］.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读画斋丛书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48.

［33］ 秘阁书目 · 卷六［M］.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钞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682.

［34］ 万卷堂书目 · 卷三［M］.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光绪二十九年叶氏刻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091.

［35］ 是本诸家著录均作金刻本，若与北大藏本比对，似属同时.

［36］ a.稽瑞楼书目［M］. 光绪三年滂喜斋丛书本，叶三一B.

b. 潘景郑. 著砚楼书跋［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75 ~ 176.

c.中国台湾图书馆. 中国台湾图书馆金元本图录［M］.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1：7 ~ 9.

d.中国台湾图书馆特藏组. 中国台湾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M］. 1982：1249 ~ 1250.

e.阿部隆一. 增订中国访书志［M］. 东京：汲古书院，1983：514 ~ 515.

f.中国台湾图书馆特藏组. 中国台湾图书馆善本书目［M］. 增订二版（二），1986：516.

g.中国台湾图书馆特藏组. 中国台湾图书馆特藏选录［M］. 1986：87.

h.中国台湾图书馆特藏组. 满目琳琅： 中国台湾图书馆善本特藏［M］. 1993：76 ~ 77.

i.国家图书馆特藏组. 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 台北：国家图书馆，1998：329.

［37］ 是本早年著录均作金刻本，唯岛田翰目为元刻，参，岛田翰. 皕宋楼藏书源流考［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民国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大学图书馆手写本《李氏书目》抵配补抄第五册著录，作金刻本. 由赵万里主持编写，1956年铅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中册76页定为元刻本. 1957年出版的宿白《白沙宋墓》一书介绍该本时，称为元复金本.

［38］ a.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M］. 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影印宣统元年刻晨风阁丛书本.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325.

b.宋元旧本书经眼录 · 卷二［M］. 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影印同治年间独山莫氏刻本.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308.

c.丰顺丁氏持静斋宋元校抄名本书目［M］. 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影印光绪二十一年江标刻本.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60.

d.皕宋楼藏书源流考［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8）.

e.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 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79 ~ 180.

f.张玉范，沈乃文.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9］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 · 1054［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0］ a.楹书隅録 · 卷三 · 子部［M］. 王绍曾等. 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M］. 济南：齐鲁书社，

2002：179 ~ 180.

b.海源阁藏书目·子部［M］. 王绍曾等. 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M］. 济南：齐鲁书社，2002：651.

c.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312. 书尾有“爱日精庐藏书”印，然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未见著录，其编《金文最》则收录毕、张序文.

［41］ 瞿镛.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83 ~ 384.

［42］ a.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三册子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610.

b.张乃雄. 莛圃善本书目·卷五下［M］. 台北：广文书局，1969：148.

c.中国台湾图书馆特藏组. 中国台湾图书馆善本书目［M］. 增订二版（二）. 1986：517.

d.国家图书馆特藏组. 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M］. 台北：国家图书馆，1998：330.

e.图解校正地理新书［M］. 台北：集文书局，1985. 影印本扉页作“金明昌抄本”，误. 张氏藏本原当为蒋孟苹所藏，王国维为蒋氏撰写《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曾著录（王国维先生全集·续编九［M］. 台北：大通书局，1976：3573 ~ 3574. ）国家图书馆藏有民国钞本《传书堂善本书目》，卷六叶一二B著录此本. 该目所录一些古籍在天头上注曰“归张芹伯”，此书可能也是如此归于张氏，并进而经“文献保存同志会”售与“中央图书馆”者. 但王国维又称此本“出郁泰峰家”，期间究竟如何归于蒋氏，尚待查考.

［43］ 王国维. 传书堂藏善本书志［M］. 记蒋氏藏. 重校正地理新书. 景钞本云：“金刊本旧为平江黄氏、上河郁氏所藏，今在丰顺丁氏. 此外，惟聊城杨氏、常熟瞿氏有景钞本，皆出黄氏. 此本出郁泰峰家，殆亦黄氏景钞，字迹精雅. ”（王国维先生全集·续编九［M］. 台北：大通书局，1976：3573 ~ 3574. ）

［44］ 文渊阁书目·卷一五［M］.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读画斋丛书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49.

［45］ 秘阁书目·卷六［M］.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钞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682.

［46］ 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下［M］.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钞本.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778.

［47］ a.赵万里.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三［M］. 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叶一四A.

b.阿部隆一. 增订中国访书志［M］. 东京：汲古书院，1983：343 ~ 344.

c.王重民. 中国善本书提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90.

d.中国台湾图书馆特藏组. 中国台湾图书馆善本书目［M］. 增订二版（二）. 1986：516.

［48］ a.中国台湾图书馆. 中国台湾图书馆金元本图录［M］.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1：227 ~ 228. 阿部隆一.

b.增订中国访书志［M］. 东京：汲古书院，1983：514. 国家图书馆特藏组. 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M］. 台北：中国台湾图书馆，1998：329.

［49］　《中国嘉德'97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拍卖图录，北京：1997年4月，拍卖品第653号.
［50］　胡舜申所著《地理新法》二卷二十二篇图一篇，国内无存，是书明初收入《类集阴阳诸家地理必用选择大成》，传入朝鲜半岛，目前韩国奎章阁等机构尚存有明晚期朝鲜活字本、清同治五年重刊本及清钞本.《地理新法》的成书时间可以根据范成大《吴郡志》有关胡舜申的记载及胡舜申另外一部著作《阴阳备用》（前北平图书馆藏元刻残本）的相关内容推得，详另文.
［51］　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77：5259.
［52］　政和五礼新仪［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　新定三礼图［M］. 影印宋淳熙二年刻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4］　新形成的券文范本见于《三元总录》茔元篇，参：柳鈔纂辑. 三元总录［M］. 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A Study on the Books of Earth Patterns with Five Tunes Theory of Song-Yuan Period: *Dili Xinshu* and *Yingyuan Zonglu*

Liu Wei

Abstract: *Dili Xinshu* (The New Book of Earth Patterns) and *Yingyuan Zonglu* (The General Book of Cemetery), two kinds of books guiding peoples to select ideal earth patterns, were very popular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China in Song-Yuan Period.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for archaeologists to understand the planning principles of five tunes cemeteries. Dili Xinshu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enlarged in the Jin Dynasty. Yingyuan Zonglu was edited in the Yuan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several kinds of books about earth patterns and etiquette system written in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Dili Xinshu* (The New Book of Earth Patterns); *Yingyuan Zonglu* (The General Book of Cemetery); five tunes; books of earth patterns

宋元瓷枕

李增辉

（湖北省宜昌市博物馆，宜昌，443000）

枕是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寝具。我国古代曾普遍流行一种硬质陶瓷枕，样式繁多，历经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各代，连续烧造长达一千多年，而且各个历史时期烧造的瓷枕均具有时代特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目前最早的瓷枕见于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夫妇合葬墓，为箱形枕[1]。唐代瓷枕多箱形、兽形，形制相对单一。辽代墓葬中出现有石枕及瓷枕，数量较少[2]。宋元时期随着瓷器的发展，瓷枕大量出现，中国北方地区瓷枕大范围生产使用，南方地区瓷窑也生产瓷枕。1918年钜鹿古城（今邢台市巨鹿县）发掘出土了一批瓷枕，数量较大[3]，巨鹿古城据考证为大水淹没而至废弃，代表了当时城镇的普遍情况。

一、宋元代瓷枕分期

清代王士祯《居易录》记载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正月“田司寇纶霞（雯）云：……德州赵侍郎宅，亦掘得古冢，中有女子骷髅，枕一磁枕”。枕上有杜诗“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鞲。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四句[4]。这是最早关于瓷枕发现的记录。

新中国成立之前，1918年河北钜鹿古城出土大量磁州窑瓷枕[5]。新中国成立之后，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宋元时期瓷枕，如，1961年河北邢台曹演庄宋墓出土四件瓷枕[6]；1974年清江临江寒山南宋淳熙年墓出土吉州窑瓷枕[7]；1989年山西汾阳县北偏城宋墓出土瓷枕[8]；1994年山西平定宋金壁画墓M2出土两件瓷枕[9]；1997年安徽黄山宋墓出土吉州窑瓷枕2件[10]；2007年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群出土7件宋金时期瓷枕等。

1963年鹤壁集窑窑址[11]；1987年观台磁州窑窑址[12]等均出土有瓷枕。宋至元代瓷枕发展脉络大体一致，可放在一起讨论。经比较研究，可将宋元代瓷枕分为五期。

一期：北宋早期960～1048。

二期：北宋中期1048～1100。

三期：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1100～1149。

四期：金代中晚期1149～1234。

五期：元代1271～1368。

以下举例宋元时期主要瓷窑瓷枕，并分期。

1. 磁州窑

磁州窑瓷枕数量较多，这与瓷枕作为一种实用器具而磁州窑也为宋元时期北方最大的民窑相对应。

一期：主要为元宝形枕。磁州窑窑址发掘T11⑦：137[13]，书中作者定为997年之前。此元宝形枕（或称银锭形枕）枕面内曲。纹饰为刻花纹缠枝莲纹（图一，1）。

二期：主要为叶形枕。中国台湾谢良蕙旧藏“至和三年（1056）”款白地剔花叶形枕（图一，2），其装饰与美国弗利儿美术馆藏嘉佑八年（1063）款白地剔花笔架（图一，3）相似，均为缠枝莲纹。枕面剔字已在此期流行。大英博物馆藏珍珠地划花“家国永安”枕枕面两侧勾画“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熙宁四年（1071）三月十九日”字样（图一，4）。

三期：主要为八角形枕。八角形枕枕面呈八角形，白地黑花，枕面多绘图案及书写文字。河南文物商店藏“政和八年”（1118）八角形竹节枕，长26厘米（图一，5）。

四期：八角形枕及豆形枕。磁州窑八角形枕及豆形枕数量较多，枕面多绘图案及书写文字。此期枕有观台二街大定二年（1162）白地黑花豆形枕（图一，6），大定五年（1165）白地黑花豆形枕（图一，7），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泰和元年（1201）白地黑花双鸭戏水纹椭圆形枕（图一，8）。

五期：长方形枕及动物形枕。长方形枕尺寸普遍较大，枕面多绘图案及书写文字，已成为表达创作者表达内心思想的载具，存世数量较大。磁县都党乡冶子村出土“昌明六年”枕（图一，9），1995年山西侯马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院内元代墓葬M3长方形瓷枕（图一，10）即是此期代表。

2. 定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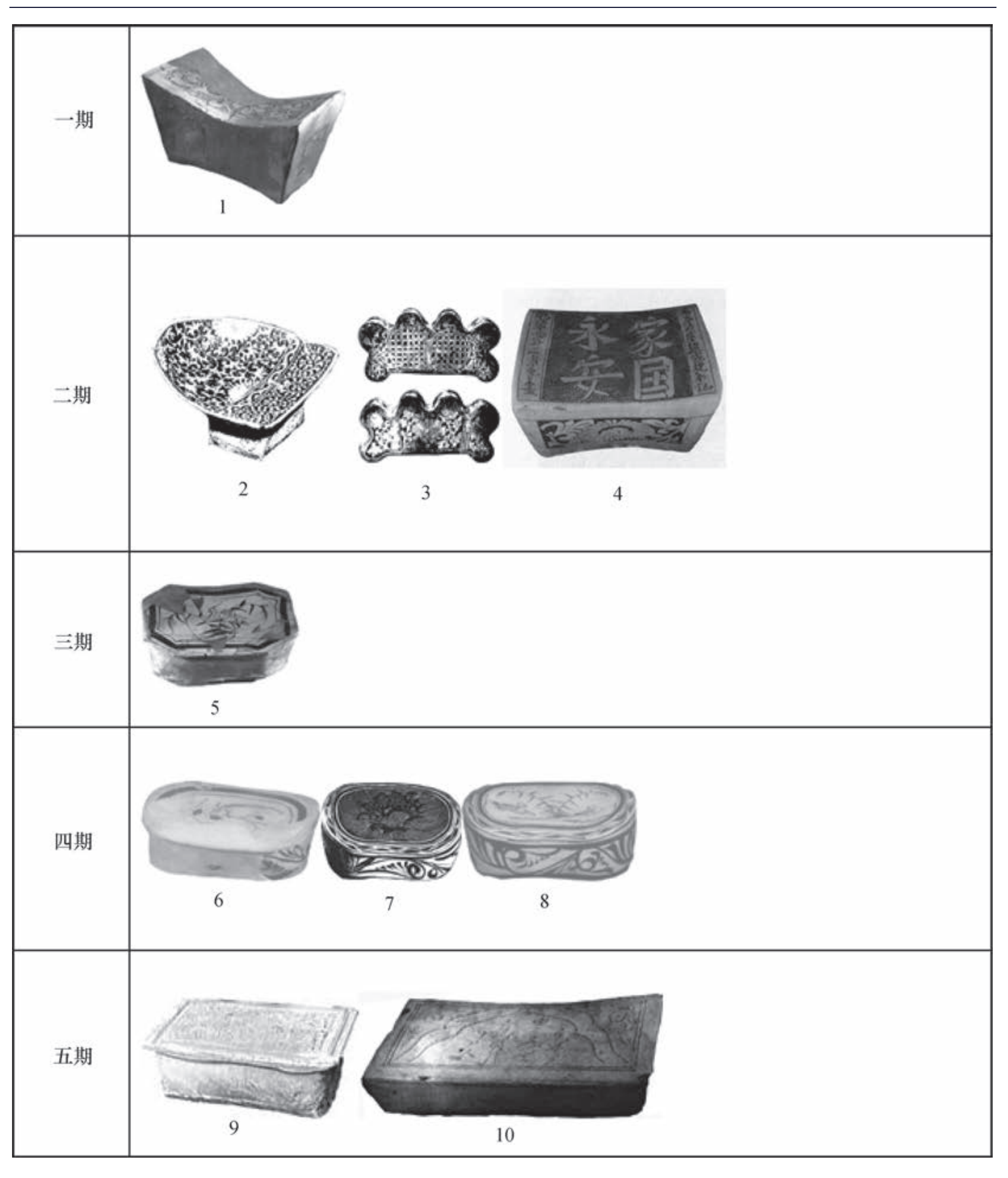
定窑瓷枕数量较少，类型装饰较单一，非定窑大宗产品。

一期：未见出土。

二期：主要为叶形枕。目前能断定为定窑瓷枕的只有2009年定窑发掘[14]出土的叶形枕枕面（图二，1）。因目前没有正式报告出版，只能根据磁州窑推断其为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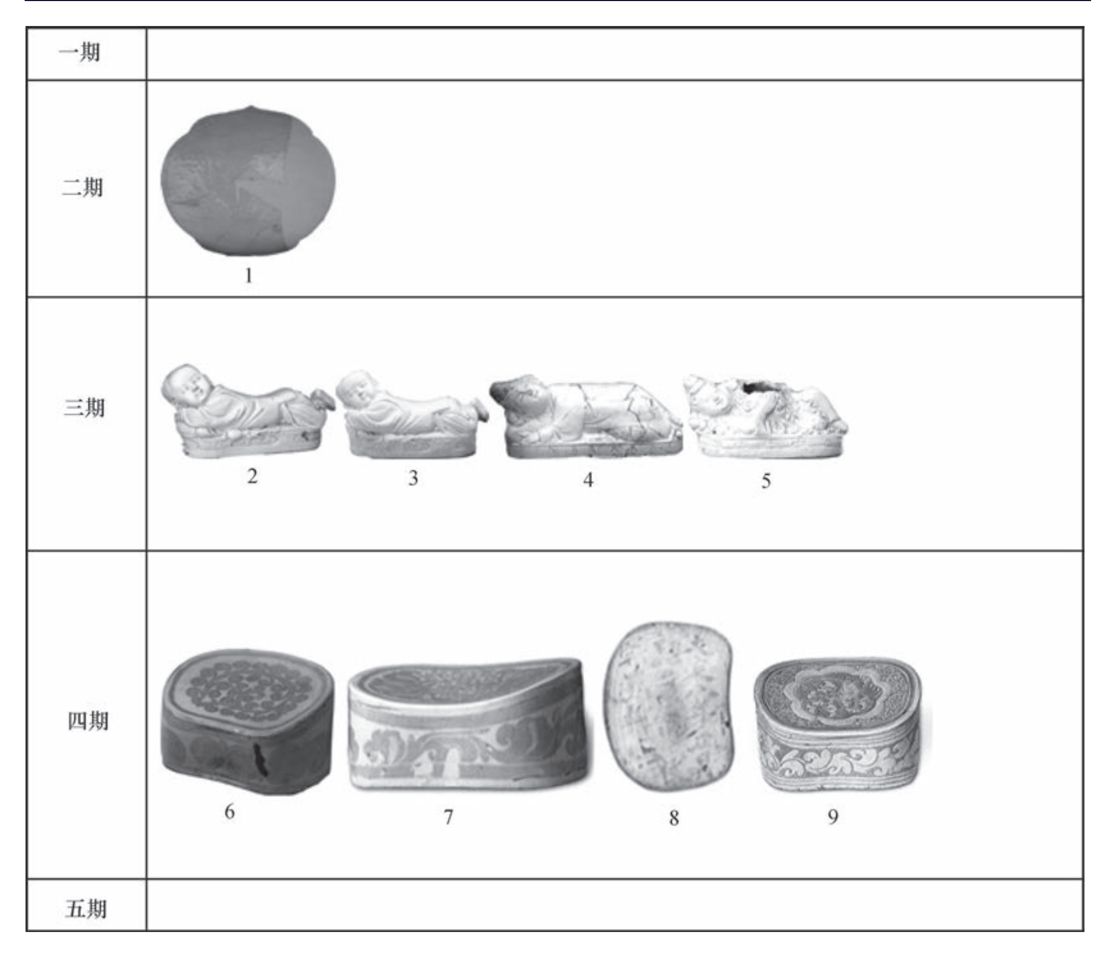
三期：主要为孩儿枕及仕女枕。定窑孩儿枕只见两例，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从枕座纹饰判断为三期。较完整仕女枕分别出自1987年及2009年定窑发掘（图二，4、5），但未见详细报告，暂定为三期。

四期：主要为豆形枕。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皇统元年（1141）白地剔褐花枕（图



图一　磁州窑瓷枕分期

1.观台磁州窑元宝形枕T11⑦：137　2.中国台湾谢良蕙旧藏“至和三年（1056）”款白地剔花叶形枕　3.美国弗利儿美术馆藏嘉佑八年（1063）款白地剔花笔架　4.大英博物馆藏“家国永安”枕　5.河南文物商店藏“政和八年”（1118）八角形竹节枕　6.观台二街大定二年（1162）白地黑花豆形枕　7.大定五年（1165）白地黑花豆形枕　8.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泰和元年（1201）白地黑花双鸭戏水纹椭圆形枕　9.磁县都党乡冶子村出土“昌明六年”枕　10.1995年山西侯马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院内元代墓葬M3长方形瓷枕



图二　定窑瓷枕分期

1.2009年定窑遗址发掘出土　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孩儿枕　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孩儿枕　4.1987年定窑遗址发掘出土仕女枕　5.2009年定窑遗址发掘出土仕女枕　6.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皇统元年（1141）白地剔褐花枕　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大定八年（1168）枕　8.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大定八年（1168）枕枕底"大定八年"字样　9.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白釉剔花花鸟纹枕

二，6），属于三期后半段，但与四期年代只差9年，故放到四期中。其他此期定窑瓷枕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大定八年（1168）枕（图二，7、8），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白釉剔花花鸟纹枕（图二，9）。

3. 河南中部地区瓷窑

生产瓷枕的河南中部地区瓷窑主要有鲁山段店窑、密县西关窑、宝丰清凉寺窑等。此地区瓷窑规模小，但数量多，几乎存在于同一时间段。因此断定此地区瓷窑瓷枕年代为二期。

如深圳市博物馆藏"杜家花枕"款花枕（图三，1），密县法海寺塔塔基出土刻有"咸平元年（998）十一月三日"题记的三彩宝箧印经式塔（图三，2），此塔纹饰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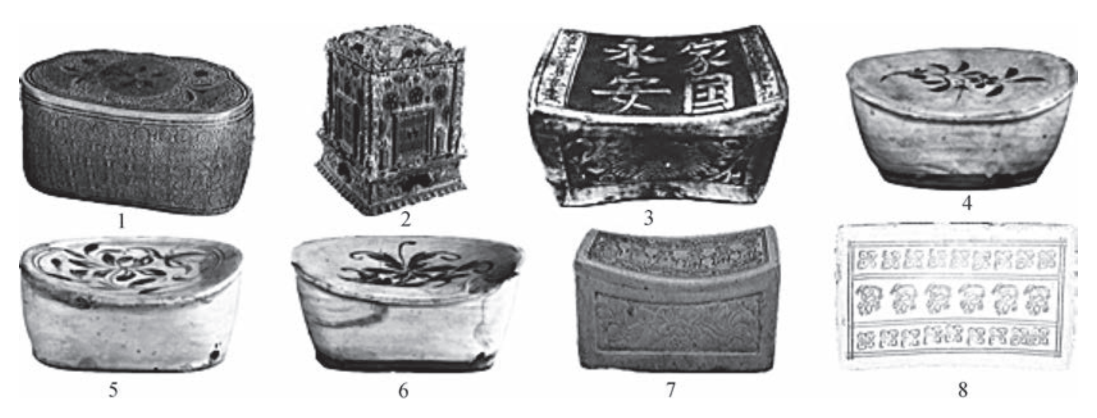
“杜家花枕”款枕及其类似，因此判定年代在998年左右。另有大英博物馆藏熙宁四年（1071）“熙宁四年，家国永安”枕（图三，3），当为此地区生产。

4. 井陉窑、介休窑

井陉窑，介休窑这两个个瓷窑均在北方地区，其鼎盛时期在宋金时期，因此其瓷枕也主要集中在三期。

井陉窑：如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M1：17（图三，4），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M40：4（图三，5），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M42：1（图三，6），井陉窑瓷枕仅见此一种类型，枕面出沿，枕面外侧有两圈划线，中间有断缺，意在呈现一种如意状。枕面内纹饰多为枝叶花草纹，由褐色黑色及浅黄色组成。器底不施釉。

介休窑：介休窑瓷枕仅也仅见此一种类型，即元宝形枕（图三，7）。枕面呈弧形，枕面纹饰多重复图案，如六仕女或六孩童依次排列（图三，8）。



图三　河南中部地区瓷窑以及井陉窑、介休窑瓷枕

1.深圳市博物馆藏“杜家花枕”款花枕　2.密县法海寺塔塔基出土刻有“咸平元年（998）十一月三日”题记的三彩宝箧印经式塔　3.大英博物馆藏熙宁四年“家国永安”枕　4.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M1：17　5.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M40：4　6.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M42：1　7.1966年河北宣化瓷厂出土白釉褐彩印童子纹饰元宝形枕　8.井陉窑仕女图枕

5. 长治窑、扒村窑、当阳峪窑

长治窑，扒村窑，当阳峪窑生产的瓷枕主要集中在四期，即金代。

长治窑：如郝家庄金墓出土“贞元三年（1155）六月五日王造”款虎形枕（图四，1），上海博物馆藏“大定二年”（1162）芦塘秋禽纹虎形枕（图四，2）。

扒村窑：如1982年年底遂平县城关镇城南宋代墓葬出土仕女枕（图四，3），1983年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附近出土大定十六年（1176）仕女枕（图四，4）。

当阳峪窑：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正隆元年（1156）绿釉划花牡丹纹枕（图四，5），2003～2004年当阳峪窑窑址出土，内刻“雨霖霖，寒蝉凄切”，红胎枕片（图四，6），大定二十五年（1185）白釉划花豆形枕（图四，7）。



图四　长治窑、扒村窑及当阳峪窑瓷枕

1.郝家庄金木出土“贞元三年（1155）六月五日王造”款虎形枕　2.上海博物馆藏“大定二年”（1162）芦塘秋禽纹虎形枕　3.1982年年底遂平县城关镇城南宋代墓葬出土仕女枕　4.1983年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附近出土大定十六年（1176）仕女枕　5.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正隆元年（1156）绿釉划花牡丹纹枕　6.2003～2004年当阳峪窑窑址出土，内刻“雨霖霖，寒蝉凄切”，红胎　7.大定二十五年（1185）白釉划花豆形枕

6. 南方地区瓷窑瓷枕

南方地区生产瓷枕的瓷窑主要有吉州窑和景德镇窑，且通过对比北方瓷枕来看，吉州窑和景德镇窑在烧制瓷枕时极有可能借鉴了北方瓷枕的造型及装饰手法。

吉州窑瓷枕虽然造型较少，但风格突出，造型优美，形制成熟属吉州窑精品瓷器。绿釉八角形竹节枕在磁州窑中见到，但真正普遍流行是在吉州窑当中。绿釉如意形枕略微不同于北方磁州窑如意形枕，吉州窑绿釉如意形枕如意头的形状已经变得模糊，弧度变大。吉州窑褐彩亚腰形枕特点突出，最长的亚腰形枕有44.5厘米，此种形制较难在北方看到。

吉州窑八角形竹节枕判定年代在三期。如安徽黄山宣和三年（1121）沈格夫妇合葬墓出土绿釉八角形枕（图五，1）。

吉州窑亚腰形枕及如意形枕判定年代在四期，即南方的南宋时期。如1960年镇江风车山出土白地褐彩花卉水波纹枕（图五，2）， 1974年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寒山南宋洪熙年间墓葬出土绿釉“陈家印置”蕉叶纹如意形枕（图五，3），1982年吉水县金滩乡南宋宝祐二年（1254）张宣义墓出土绿釉“刘家印号”蕉叶纹如意形枕（图五，4）。

景德镇窑瓷枕仅湖田窑窑址有确切的出土报告。湖田窑瓷枕共分为三类：孩儿枕、仕女枕及狮形枕。报告中总结孩儿枕如图湖田窑99H补・采：192孩儿枕（图五，5）年代为真宗时期。

仕女枕，如景德镇湖田窑99H补・T6③：46（图五，6），年代在真宗至北宋末年。

狮形枕又可分为两类：一为狮呈站立状，且鼻孔，牙齿，爪子夸张外露，眼睛狰狞圆瞪，尾巴收于两腿中间，如景德镇湖田窑99H补・H1：17（图五，7）。二三四期

中均有出现。

另一类狮呈双狮相互撕咬争斗的造型，瓷枕枕坐、枕面都较小，枕面呈如意形。如景德镇湖田窑99H补・H2：60（图五，8），湖北汉阳宋墓出土双龙瓷枕（图五，9）。此类枕年代属二期。



图五 南方地区瓷窑瓷枕

1.安徽黄山宣和三年（1121）沈格夫妇合葬墓出土绿釉八角形枕 2.1960年镇江风车山出土白地褐彩花卉水波纹枕 3.1974年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寒山南宋洪熙年间墓葬出土绿釉“陈家印置”蕉叶纹如意形枕 4.1982年吉水县金滩乡南宋宝祐二年（1254）张宣义墓出土绿釉“刘家印号”蕉叶纹如意形枕 5.景德镇湖田窑99H补・采：192孩儿枕 6.景德镇湖田窑99H补・T6③：46仕女枕 7.景德镇湖田窑99H补・H1：17 8.景德镇湖田窑99H补・H2：60 9.湖北汉阳宋墓出土双龙瓷枕

二、瓷枕使用问题

1. 瓷枕用途—瓷枕非冥器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磁州窑白地黑花如意形“勒鬼”枕（图六，1），枕面所绘为道士的一种灵符禁咒，有人认为是专为死者驱鬼用的。在众多的白地黑花枕中，目前只发现一例可能为冥器的“勒鬼”枕，并不能充分说明其作为冥器使用。有瓷枕枕底墨书记载“崇宁二年新婿”及“程二程三”；磁州窑“镇宅”枕等说明瓷枕可能用来作为嫁妆或起到镇宅的作用。2008年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M48出土黄绿釉亚腰形枕，报告中叙述枕面油亮光滑，为多次使用的结果。河北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叶县文

集遗址、镇安寺遗址，河南新乡市延津县沙门古黄河渡口遗址这些非墓葬遗址中都出土有宋元时期瓷枕，同样说明绝大部分瓷枕是实用器物而非冥器。1918年钜鹿古城发现磁州窑瓷枕多出土自房屋火炕之上，更是说明瓷枕是实用器而非冥器。

2. 瓷枕使用阶层

瓷枕多见于磁州窑及河南中西部一些小瓷窑中，低温釉瓷枕占据较大一部分，这可能跟瓷枕作为日常用瓷的性质有关，磁州窑和吉州窑都是当时著名的民间窑厂因此生产瓷枕较多，目前没有在龙泉窑，东南地区瓷窑及西夏瓷器中发现瓷枕，也不见于窖藏、塔基、沉船等中。但《枕》13号（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收录有一件汝窑如意形瓷枕，汝窑瓷器较为珍贵，出现汝窑瓷枕说明瓷枕被广大人民接受而非低等瓷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乾隆题诗钧窑枕；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有一件珍珠地乾隆题诗白釉豆形枕（图六，2）；日本馆藏有一件宋代耀州窑青釉刻划飞凤牡丹纹枕，因其有凤凰被认为是贡瓷，以上几件瓷器也说明瓷枕非底层大众的专属，而是广大阶层都会使用的瓷器。



1　　2　　3

图六　瓷枕的使用

1.广州南越王墓藏“勒鬼”枕　2.北京故宫博物院珍珠地乾隆题诗白釉豆形枕　3.磁州窑豆形枕

3. 瓷枕使用方式

1918年钜鹿古城发现磁州窑瓷枕出土自房屋火炕之上，并且发现当时瓷枕有许多是立着的，说明人们可能在不睡觉的时候把瓷枕立起来，以节约空间，防止破碎等。唐·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记载“黄粱美梦”的故事，在描述仙人给庐生睡觉的枕头时说“其枕青瓷，而窍生两端”，可见庐生美梦就是在一件青瓷枕上做的。

瓷枕装饰多采用莲池、荷花、蕉叶等纹饰推知瓷枕可能多在夏天使用。

另外有记载瓷枕使用的诗：

①南宋·赵彦卫（1195左右）《云麓漫钞》记载：“介甫尝言‘夏日昼睡，方枕为佳’问其何理，曰‘久睡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

②杨万里（1127～1206）《杨万里选集》记载：“竹床移遍两头冷，瓦枕翻来四面凉”

说明在瓷枕使用的时候，因为“久睡气蒸枕热”可能会把瓷枕翻一个面或再用另外的一个瓷枕。

宋元时期陶瓷业生产繁盛，瓷枕作为瓷器的一个品种亦是如此。本文以瓷枕为研究对象，比较详细梳理瓷枕在整个中国范围内的生产及分布情况。以瓷窑为中心，讨论瓷枕的类型、年代。总结瓷窑间的相互影响和瓷枕的装饰风格。

通过前文对宋元时期瓷枕的综合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宋元时期瓷枕最集中分布在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地区。河北北部、山西等周边地区瓷窑也生产少量瓷枕，但并未普及。南方地区出土瓷枕主要为吉州窑和景德镇窑产品，瓷枕形制上无太大创新，绝大多数瓷枕类型模仿北方瓷枕。

（2）宋元时期瓷枕最为集中的年代在北宋末及金代，此时段内瓷枕各类型均已出现，如豆形枕、方形枕、多边形枕、虎形枕等。金末元初瓷枕类型急速减少，新出现的长度在36厘米以上的长方形枕逐渐流行。

（3）瓷枕因其有广阔的枕面及枕墙作为装饰面，其装饰工艺十分丰富，其中最为显著的有珍珠地装饰，三彩装饰及白地黑彩诗文图画装饰等。虎形枕等动物形枕形制特殊，成为瓷枕形制上的一大特色。

耀州窑、龙泉务窑及山东地区瓷窑均有极少量瓷枕出土，未做讨论。

三、瓷枕装饰问题

瓷枕因其有相对较宽阔的枕面及枕墙做装饰，瓷器中的珍珠地刻划花工艺；白地黑花工艺及三彩工艺在瓷枕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下列举几例瓷枕装饰。

1. 定窑瓷枕与磁州窑瓷枕

河北省出土瓷枕的瓷窑主要有磁州窑、定窑和井陉窑。磁州窑出土数量最多，定窑和井陉窑数量较少，形制上借鉴自磁州窑，并融合了自身瓷窑的装饰风格。定窑在金代有衰落迹象，借鉴磁州窑工艺也在情理之中。定窑瓷枕釉色装饰在同时期的其他瓷器品种中少有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定窑豆形枕（图二，9）与磁州窑豆形枕（图一，7）相比，均为枕面剔刻如意形开光。

2. 吉州窑瓷枕与磁州窑瓷枕

吉州窑为南方著名民窑，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北方地区一些瓷窑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磁州窑部分工匠也迁到了安徽、浙江和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烧制瓷器。吉州窑如意形枕、八角形枕及镂空人物枕都可以在磁州窑瓷枕形制中找到源头。吉州窑绿釉八角形枕枕墙之间棱均为竹节状，竹节状枕棱见于北方的磁州窑，但数量极少，河北省文物商店收藏有件枕底墨书“政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记之”款的瓷枕。《观台磁州窑址》中

白釉枕VIID型及绿釉枕IC型即是此类枕。竹节状八角形枕在磁州窑中没有大量生产，在吉州窑瓷枕中这种工艺得到大量普及。

吉州窑的装饰技法也有自己特点，如划花与彩绘线条明快秀美，构图精巧细致，彩绘色调酱褐偏暖，系釉下彩绘。图案多水波、跃鹿、锦纹等，为北方瓷窑所少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它与北方瓷窑的庄端、沉着、持重的瓷枕风格又有着明显区别。

吉州窑戳印的形制多是上覆荷叶，下托荷花，如“陈家印置”“陈家号记”“舒家记”及1980年吉州窑发掘出土一件残元代“元祖郭家大枕记号”戳记的枕底。1981年12月，肖家岭又出土一件带款识的“元祖郭家大枕记号”枕残底（图七，1）。形制与北方磁州窑“张家枕”“张家造”戳印（图七，2）十分相似。

有人认为磁州窑较原始的白地黑花瓷，通过吉州窑白地酱花彩绘瓷的过渡，为景德镇釉下青花开创了道路。吉州窑笔划纤细，磁州窑粗放；吉州窑色泽艳丽，磁州窑则较黑褐；两窑花卉都富有变化，既有写实特征，又有适当的夸张，生动活泼，自然豪放，地方民族特色颇为浓厚。

3. 银锭图案

银锭图案在宋元文物中十分流行，包括瓷枕。陈万里《陶枕》中记载的“镇宅大吉”枕（图七，3），《枕》15号（图七，4）和第21号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白地黑花豆形枕（图七，5）枕面皆装饰有银锭形图案。此种图案在当时象征着人们对富足、殷实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图七　瓷枕的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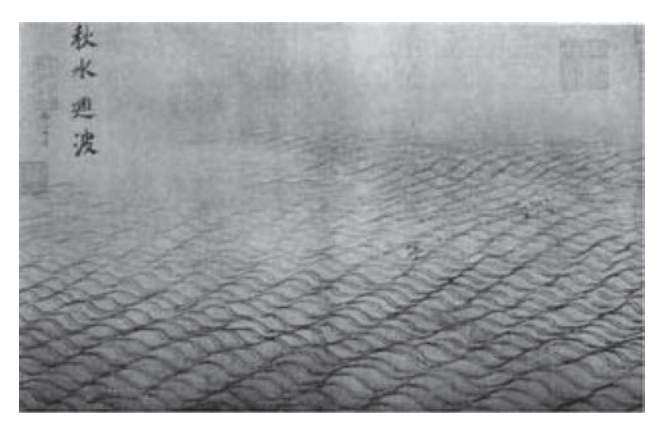
1.1980年吉州窑发掘出土残元代“元祖郭家大枕记号”戳记的枕片　2.磁州窑“张家枕”“张家造”戳印　3.陈万里《陶枕》中记载的“镇宅大吉”枕　4.西汉南越王墓藏瓷枕　5.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白釉剔花豆形枕　6.宋·马远《寒江独钓图轴》　7.白地黑花孩童垂钓豆形枕

4. 垂钓图案

宋・马远《寒江独钓图轴》（图七，6）描绘了一老翁寒江独自垂钓的画面，同磁州窑金代孩童垂钓豆形枕（图七，7）画面相似，画面简洁，耐人寻味。金代孩童垂钓枕虽为金代生产，但多数出自金统治下的汉人手工业者，表现了一种简洁、素雅的情怀。

5. 波浪纹图案

磁州窑金代白釉豆形枕、白地黑花豆形枕及定窑金代豆形枕枕面均刻划（或绘）有波浪纹饰（图一，7）。南宋吉州窑釉下彩瓷中，波涛纹十分流行。北宋白沙宋墓壁画开芳宴中，男女主人背后的屏风也以波涛纹为装饰。宋・马远《水图・秋水迴波》（图八）。至于波涛纹流行的社会原因，从宋・邵雍《梦林玄解》卷二九原・山川条："江海波涛为之薮"可知，在当时商品社会追财逐利的背景下，这种波涛纹的装饰，反映了人们渴求财富的期盼。



图八　宋・马远《水图・秋水迴波》

6. 戳记

磁州窑底款戳印有"张家造""张大家造""古相张家造""古相陈家造""福愿王家造"等。不同的戳印底款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作坊和商标意识（图九，1）。同时期的其他器物中也有与此类似的上下牡丹花，中间书写铭文的戳记，如北宋黑釉瓶（图九，2），元代"身芎丸"大口罐（图九，3），元代"梨花白"大口罐（图九，4）等。

四、结　论

对宋元瓷枕做简单分期，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到瓷枕大致的变化过程。通过以上分期可以看出河南中部地区瓷窑鲁山段店窑、密县西关窑、宝丰清凉寺窑等瓷窑瓷枕主



图九　戳记

1.磁州窑戳记 分别出自：豆形孩童扛荷叶后跟鸭子枕；苏轼“满庭芳”　2.北宋黑釉瓶　3.元代“身芎丸”大口罐　4.元代“梨花白”大口罐

要集中在二期。河北、山西地区的介休窑、井陉窑瓷枕集中再三期。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地区长治窑，扒村窑，当阳峪窑瓷枕集中在四期（表一）。

但分期包含了几乎所有主要瓷窑瓷枕，并且非某一瓷窑的分期，因此难度较大，也不够精确。

表一　瓷枕分期

瓷窑 分期	磁州窑	定窑	吉州窑	景德镇窑	其他瓷窑
一期：北宋早期 960 ~ 1048	元宝形枕			孩儿枕	
二期：北宋中期 1048 ~ 1100	叶形枕	叶形枕		仕女枕；狮形枕（站立）（相互撕咬）	鲁山段店窑、密县西关窑、宝丰清凉寺窑
三期：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1100 ~ 1149	八角形枕	孩儿枕 仕女枕	八角形 竹节枕	狮形枕（站立）	介休窑、井陉窑
四期：金代中晚 1149 ~ 1234	八角形枕 豆形枕	豆形枕	亚腰形枕 如意形枕	狮形枕（站立）	长治窑、扒村窑、当阳峪窑
五期：元代 1271 ~ 1368	长方形枕				

注　　释

［1］　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J］. 考古，1959（10）.
［2］　乌力吉德力根. 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辽代石枕和瓷枕［J］. 北方文物，2006（3）.
［3］　张厚璜，李洋耆. 钜鹿宋器丛录［M］. 天津博物院，1923.
［4］　居易录［M］.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本.
［5］　张厚璜，李洋耆. 钜鹿宋器丛录［M］. 天津博物院，1923.
［6］　唐云明. 河北邢台清理的宋墓［J］. 考古，1961（3）.
［7］　黄冬梅. 江西清江出土的几件吉州窑瓷器［J］. 文物，1987（5）.
［8］　张茂生. 山西汾阳县北偏城宋墓［J］. 考古，1994（3）.
［9］　郝亚山等. 山西平定宋、金壁画墓简报［J］. 文物，1996（3）.
［10］　程先通. 安徽黄山发现宋墓［J］. 考古，1997（3）.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1964（8）.
［1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观台磁州窑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14］　2009年定窑发掘报告尚未出版，图片来自北京故宫展览照片.

The Study of Glazed Pillow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Li Zenghui

Abstract: This paper put the porcelain pillow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to five periods, discussed about the using of the porcelain pillow and the decoration such as paintings and seals.

Key words: glazed pillow; Song and Yuan Dynaties; painting.

内蒙古东南部辽代城址的分类及研究初识

王晓琨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由北方民族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上承唐风，下启金元气韵，在中华多元一体文化体系形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辽王朝在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在包括现今赤峰、通辽等地区在内的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古代城市建设上，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这一地区自古就是东胡系各族生息繁衍之所，千百年来保持着单纯且原始的草原风貌。在这里大规模地营建城郭，设置州县，肇始于辽。辽王朝在此苦心经营，倾力建设，使这里成为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当地的城市建设也因之空前繁荣。金元两代继续在该地沿用旧有的城市，同时也兴建新的城市，至此当地的古代城市建设达到顶峰。至盈则亏，盛极而衰。当契丹人像草原的雄鹰掠上了天际，在元代中期以后彻底融入到北方诸族血液中的时候，随着中国行政统治中心的南移，该地区繁华日减，人去城空，契丹人精心创建的多数城市也逐渐荒废、淹没于黄沙黑土间，空余断壁残垣任人吊，但旧时韵致犹存，仍然留给我们后人不尽的唏嘘感叹。

一、学术简史

内蒙古东南部的辽代诸城很早就吸引了诸多中外学者的注意。1892年，俄罗斯人波兹德涅耶夫来到内蒙古，调查了包括庆州在内的多处遗址，著有《蒙古及蒙古人》一书[1]。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人鸟居龙藏来到东北及内蒙古一带活动，多次深入赤峰市和通辽等地，考察了许多辽代城址，著有《满蒙古迹记》《蒙古纪行》《辽之文化》《辽文化再探》等书。1920年，法国人闵宣化来上京考察，著有《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2]。1935年，日满学会的黑田源次、竹岛卓一等来上京古城调查，著有《林东古迹探察记》[3]一书。1936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组成的调查班，在内蒙古东部至中部的大青山前后，进行广泛考古调查，涉及辽上京等多处遗址，出版有《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4]。1944年，小山富士夫等人发掘了辽上京遗址内的白瓷窑址，并调查了多处窑址。1944年岛田正郎等人发掘了祖陵之奉陵邑（祖州城），1955年出版了《祖州城》一书[5]。抗日战争时期，我国著名学者李文信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进行过考古工

作，积累了不少资料，建国后发表了《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一文[6]。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张郁、贾洲杰、李逸友等对上京、中京等城址进行勘测、调查[7]。1959～1960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李逸友等组成的辽中京发掘委员会对辽中京进行勘查和发掘[8]。1997年秋，中国历史博物馆航空摄影考古中心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包括上京、中京、祖州、庆州等诸多辽代城址进行了航空摄影[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金考古队，对辽上京进行了勘探和局部发掘[10]。

辽代城址的研究成果，除上述提到的著作外，张郁[11]、李逸友[12]、冯永谦[13]、项春松[14]、贾洲杰[15]等诸位先生多有考证及精彩的论文，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部分辽代城址进行了定点，推进了辽城的研究[16]；李逸友先生的《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总结了前人的调查和发掘的成果，结合文献，对辽城的营建制度进行了探讨，很多观点颇具启发性。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经过考古学者们不懈努力，借助地面调查、考古发掘及航空照片等多种手段，目前在今赤峰市和通辽市等地区发现了近百座辽代古城[17]，学者对其中的某一或某几个城址多进行与文献的比对、考证，而对城址的类型学研究还鲜有见诸文字，现试将这批辽代城址以类型学入手，进行简要的梳理，以期能引发人们对昔日辽王朝城市繁华的种种怀想，并奢望推进该区域辽代城址的专项研究。不当和讹误之处，敬请诸位前辈、师长批评、指正。

二、城址分类

9世纪末，契丹开始兴起，阿保机伯父术澜时，“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麻桑，习组织”[18]，太祖、太祖两朝颇多设城置邑，中期的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又多增筑新城，辽代推动了其统治区的城市建设。赤峰、通辽市等地作为契丹龙兴之地，辽人也在此倾力最多，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发现的城址数量最多，也最为密集。这批辽代城址中，类型多样，外形上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回字形、横日字形以及多重城墙组成的城市等，城周200～15000米。下面就以行政级别为顺序，以都城、州城、县城等次序对发现的古城做以分类、研究。

（一）都　城

辽代先后设立五京作为其统治的重心，称五京道。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中京（大定府，今赤峰宁城铁匠营子村）、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辽太祖平定渤海国后，设置东京辽阳府及其所属州县；辽太宗时后晋割让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又增设易州等州县，先后设置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来统领这些地方。在这五京中，东京城利用了渤海辽阳旧城，经过修葺、扩建而成；南京城系扩建了唐代幽州旧城；西京

则利用唐代云州旧城。这三座京城都是在旧有的基础上，仅略有改变。而分布在契丹本土的上京和中京则均为辽人新筑，且这两京是辽代最为重要的的政治中心，城市的建设也集中体现了辽人的思想。从上京到中京，还明确体现了契丹人逐步汉化的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

我们把上京和中京分为二式。表一是这两城址的简要情况。

表一 上京中京简要情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上京式					
上京城［19］			6344（外城） 5829（汉城） 12173（合计）	巴林左旗林东镇南500米	由皇城和汉城组成，呈日字形。皇城有外城和内城，外城平面呈六边形；夯筑城墙，基宽12～16米，残高6～10米，南墙已被河水冲毁。四面设门，外加筑瓮城；墙外有马面；城外有护城河，河外筑堤。内城位于外城中偏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墙设门。汉城平面略呈方形，夯筑城墙，仅存三段，基宽约12米，残高2～4米。皇城、汉城内探明有多座建筑基址和街道。在上京城外有南塔、北塔等多处佛教遗迹（图一、图二）
中京式					
中京城［20］	4200	3500	15400	宁城县铁匠营子乡铁匠营子村内	由外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南北向。版筑土城墙，基宽5～20米，残高1～8米。外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墙正中设门，外加筑瓮城，四角有角楼址。城中南北向大道宽64米；北部有寺庙、廊舍、驿馆、官署建筑基址；现存有大塔、小塔两座佛塔；外城西南山坡上有密集的寺庙建筑基址。城外西南方现存半截塔。皇城位于外城中央偏北，东西2000米，南北1500米，四墙外设马面。宫城位于皇城北部中央，平面呈方形，边长1000米，北墙即皇城之北墙；东、南、西墙开门，宽约8米；四角有角楼址。在外城内东部内城南垣之南有一座密檐式砖塔，为八角十三层，高度超过81米，为现存辽塔中最为高大者（图三、图四）

（二）州　城

辽朝有“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辽人在燕云地区及原渤海地区的，辽代多沿用、改扩建原来的城垣，但在契丹的本土，城址多为新建。通过观察发现，州一级的城市规模较都城明显缩小，周长多在4000米～1500米，在这一地区发现周长1500米以上的城址共计31座，根据规模，细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周长

在2000米以上和周长2000～1500米的城址。

1. 周长在2000米以上的城址

共发现13座，根据城址结构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单一型、双城型和多城型城址。

（1）单一型城址

即由单一的四面墙体组成的城址。发现10座。根据外形，又分四个亚型：长方形、横长方形、方形、四边形。

1）长方形

5座。根据城门的位置和数量，分为三式（表二）。

包日浩特式：3座，四墙各开1门。

永州式：1座，东西北三墙各开1门。

井沟子式：1座，东墙开2门。

表二　长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包日浩特式					
包日浩特城址	630	470	2200	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包勒格苏木包日浩特嘎查内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8～10米，残高约2米，夯层厚12厘米。四墙各辟门，宽6米，外均加筑方形瓮城，边长12米。城内北部有房址，中部有土建筑台基，高约2米。地表散布有砖、瓦、陶片、瓷片等
哈通营城址	750	500	2500	松山区老府镇哈通营子村南500米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7～l0米，残高1～3米。四墙中部各开l门。城内有建筑址，并遍布沟纹砖、布纹瓦及灰陶片、瓷片等
黑城城址[21]	750	500	2500	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西南	平面呈长方形，基宽约15米，残高8～9米，四墙开门，外设瓮城
永州式					
巴颜塔诺城址[22]	545	525	2140	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巴颜塔诺嘎查东南5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北城墙为黄土夯筑，基宽约10米，残高2米；东、西、北墙中部各开1门；墙外附马面，四角有角台。城西有砖瓦窑址（原报告称“永州故城”）
井沟子式					
井沟子城址[23]	1000	500	3000	林西县双井店乡敖包吐井沟子	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南三面墙为土筑，基宽8米，残高1.5米，夯层厚15～25厘米；北墙建于山巅，以石块垒砌。东墙设两门。出土有石柱础、瓦当、滴水、鸱吻、砖、瓦及陶器、瓷器、金属器和石经幢等。（原报告称“临河县故城”）

2）横长方形

2座。文化面貌相似，四墙各开1门，视作一式：高州式（表三）。

表三　横长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高州式					
城子村城址[24]	510	510	2040	赤峰松山区城子乡城子村内	位于两山间的平地上，平面呈方形。城墙夯筑，基宽11米，残高1～6米，夯层厚10厘米。四角角台址突出城外，呈半圆形，直径10米，残高8米。四墙中部各开1门，宽12米。北墙外7米处有护城壕，宽11米。城内中部、东北部和城外西南部、西北部各有一处建筑址。城外西北山坡上还有一座塔基。采集有沟纹砖、布纹瓦、瓦当、建筑饰件，铁锈花双耳白瓷罐，黑釉牛腿瓶，酱釉四系罐等（原报告称松山州故城）
土城子村城址[25]	755	1030	3570	赤峰元宝山区丰水河镇土城子村东南侧	位于老哈河北岸山间平原上。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城墙，基宽8～12米，残高0.4～3米。四墙中部各开城门，南墙被老哈河冲毁。城内中北部有两处大型建筑台基，可能是衙署所在。地表散布砖、瓦、兽面纹和龙纹瓦当、滴水及陶、瓷片等。出土有铁锈花白釉瓷罐、盘，白瓷罐、碗，酱釉瓮、罐，铜佛像，雕刻石构件（原报告称高州故城）

3）方形

1座，韩州式。四墙各开1门（表四）。

表四　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韩州式					
五家子城址	696	696	2784	科左后旗浩坦苏木城五家子嘎查南500米	平面呈正方形，城墙版筑，南北向。四墙各开1门，外加筑瓮城。墙外筑马面，四角有角台址。东墙外以塘泥河为天然护城河，西墙外有护城壕。城内有建筑基址3处（原报告称韩州故城）

4）四边形

2座。分为二式（表五）。

灵安州式：1座。东北南三墙各开1门。十字形街道。

鹿山式：1座。南墙开1门。

表五　四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灵安州式					
黑城子城址［26］	南600 北540	东650 西700	2490	库伦旗扣河子镇黑城子村内	位于群山环抱盆地之中，平面近四边形，南、北墙长分别为600米和540米。东、西墙长分别为650米和700米。城墙夯土版筑，基宽20米，最高处约10米。东、北、南墙开门，外加筑瓮城。墙外侧有马面。城内有十字形街道、建筑台基。地表散布沟纹砖、布纹瓦、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白瓷片等。征集“灵安州刺史印”铜印1方（原报告称灵安州故城）
鹿山式					
鹿山城址［27］	南630 北630	西410	1670 （三面墙长度）	林西县新林镇鹿山村西50米	平面呈梯形，北、南墙均630米，西墙410米，东墙已被破坏；城墙夯筑，残高2.5～3米；南墙开门；墙外存马面7个。城内文化层厚0.3～0.8米。地表散布有沟纹砖、布纹瓦等。采集有泥质灰陶篦点纹壶、粗白瓷碗、细白瓷盘残片及唐、宋、辽代铜钱等（原报告称四方城城址）

（2）双城型城址

有东西向横日字形和南北向回字形两种亚型，共发现3座。

1）东西向双城型

2座。分二式（表六）。

全州式：1座。西方东圆两个城址。四墙各开1门。

饶州式：1座。横日字形城址，南、西墙各开1门，东墙开2门。

表六　东西向双城型遗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全州式					
四方城城址［28］			1200西 816东 2016总	巴林左旗四方城乡四方城村内	有东西两城。西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00米；墙基宽约6米，残高2～3米，四面各有门道，东门外加筑瓮城。东城近圆形，直径约260米；基宽约5米，高0.5～3米。采集有薄胎白瓷碗、绿釉牛腿瓶、薄胎刻花白瓷碟残片。（原报告称全州故城）

续表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饶州式					
樱桃沟村城址[29]	1050	700	3500	林西县双井店乡西樱桃沟村东南1千米	西拉木伦河北岸。东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西墙各设1门，东墙设两门，门外均加筑瓮城；四角设角台，墙外筑马面。西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其东墙借东城之西墙，东西350米，南北700米。南、西、北三面各设1门，门外加筑瓮城；墙外筑马面。两城城墙均为夯筑，基宽12米，残高2米，夯层厚15厘米。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建筑台基。出土有石柱础、瓦当、滴水、筒瓦、板瓦、琉璃瓦，鸱吻以及陶器、瓷器和金属器等。出土刻有“饶州安民县”字样的石经幢（原报告称饶州故城）

2）南北向双城型

1座，松山州式（上京道）。东墙开1门，东南向。由2个长方形城址组成（表七）。

表七　南北向双城型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松山州式					
布敦花城址[30]	520	590	2220	巴林右旗益和诺尔苏木布敦花嘎查内	平面呈回字形，外城平面呈长方形，外城东墙中部设一门，外加筑瓮城。方向215度。内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178米，南北160米。城墙夯筑，基宽3～5米，残高约0.5米，夯层厚约10厘米（原报告称松山州故城）

（3）多城型

1座，武安州式。三重城，外城的东南墙各开1门。城南、西南有寺院址（表八）。

表八　多城型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武安州式					
白塔子城址[31]			2600（第二重）	敖汉旗南塔乡白塔子村西。	现存城墙有三重：外城墙仅存北墙一段，周长不详；第二重城墙略呈方形，边长约650米，其东墙与外城东墙共用，东、南各设城门；内城略呈方形，边长约270米。城内有建筑址数十处，文化层厚3～7米。城北隔验马河对岸高丘上有佛塔；城南、西南各有寺院遗址。采集有辽代兽面纹陶瓦当、滴水、龙首及凤尾纹贴面砖等建筑构件（原报告称武安州故城）

2. 周长在2000～1500米的城址

13座。分单一和双城两种类型。

（1）单一型城址

12座，分长方形、横长方形、方形、四边形四个亚型。

1）长方形

4座。根据城门的位置和数量，分二式（表九）。

必图式：1座，东西墙各开1门。

宁州式：3座，形制不确定。

表九　长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必图式					
必图城址	440	340	1560	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必图独贵龙西500米	位于平缓的坡地上。平面呈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土筑，基宽15米，残高1.5～2米。东、西墙各辟1门，门宽1.8米。城区西北部有建筑台基和石头墙。地表散布有泥质灰陶罐和白瓷碗残片及沟纹砖、布纹瓦、绿釉琉璃瓦，石臼、碌碡等
宁州式					
巴雅尔图胡硕城址[32]	500	300	1600	扎鲁特旗巴雅尔图胡硕镇东	平面呈长方形，东、北墙保存较好，残高1.6米。城自出土有瓷罐、瓦当、滴水、铁镞和马具等（原报告称“宁州故城”）
西耳子城址	420	330	1500	林西县五十家子镇西耳子村南约1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4～6米，残高1～3米。城内遗物丰富。采集有绿釉鸡冠壶、三彩海棠盘残片及铲形铁镞、石臼、辽代铜钱等
乌兰沟门城址	600	400	2000	林西县板石房子乡乌兰沟门村南500米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4～6米，残高2～3.5米；每面墙各有马面2个。城内文化层厚约0.3米。采集有黑花白瓷碗、黑釉牛腿瓶、篦点纹灰陶壶残片及铲形铁镞

2）横长方形

2座。根据城门的位置和数量，分为二式（表一〇）。

下扣河式：1座，南墙开1门。

酒局子式：1座，形制不确定。

表一〇　横长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下扣河式					
下扣河城址	450	500	1900	库伦旗三家子镇下扣河子村南200米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约10米，残高2～5米。南墙有门道，宽约10米。四角有角台址。地表散布有陶片等
酒局子式					
酒局子城址	300	500	1600	库伦旗扣河子镇酒局子村两北500米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土版筑，残高2米。城内有三处建筑台基。地表散布有沟纹砖、布纹瓦、铁器。征集有白瓷碗等

3）方形

5座。根据城门的位置和数量，分为四式（表一一）。

玛尼图式：2座，四墙各开1门。

达更诺尔式：1座，东北西墙各开1门。

宇宙地式：2座，东北墙各开1门。

表一一　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玛尼图式					
玛尼图城址	500	500	2000	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玛尼图嘎查东南1千米	平面呈方形，夯筑土墙，基宽8～12米，残高2～3米，夯层厚5～12厘米。四角有角楼址，残高3～4米。四墙中部各辟门，宽6米，外均加筑圆角方形瓮城，直径11～15米。墙外有马面，高约3米，间距50～60米。城内偏北处有长方形建筑台基，长100米，宽40米。地表遗物较少，有砖、瓦、陶片、瓷片等
西城子城址	500	500	2000	库伦旗水泉乡西城子屯北50米	平面呈方形。四墙开门。城内西北角有大型建筑基址，主要建筑址在城中部，两侧也有少量建筑基址。地表散布大量砖、瓦、滴水等建筑材料和瓮、罐等陶器、瓷器残片及残铁器等
达更诺尔式					
达更诺尔城址	400	400	1600	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驻地东约4千米	位于达更诺尔湖北岸，平面呈方形，夯筑城墙，基宽4米，残高1～2米。东、西、北墙各辟1门，外加筑瓮城。墙上筑马面，间距80～90米。城内有建筑台基、街道。地表仅见残砖、瓦等

续表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宇宙地式					
城子城址	400	400	1600	克什克腾旗宇宙地乡城子村北20米	位于乌梁苏太河北岸台地上，平面呈方形。黄土夯筑城墙，基宽5米，残高1.5～3米。东、北墙中部各辟1门，宽约10米。地表散布砖、陶片、瓷片。城南现存石狮1尊。城西出土铜犁范1合
宇宙地城址	370	370	约1500米	克什克腾旗宇宙地乡宇宙地村南500米	平面呈方形，黄土夯筑城墙，基宽3～4米，残高1～3米。东、北墙各开1门，北门外加筑有方形瓮城。南、北墙有马面，间距50米。地表散布沟纹砖、布纹瓦、灰陶片、瓷片等

4）四边形

1座，庙苏式。东墙开1门（表一二）。

表一二　四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庙苏式					
庙苏城址	南416 北451	东300 西320	约1500米	科左后旗乌顺艾勒苏木苏莫台苏嘎查南500米	位于甸子地。平面呈四边形。城墙夯筑，基宽4～6米，残高1～2米。东墙正中设门，宽10米。城内南部有一建筑台基。地表散布有布纹瓦、沟纹砖、篦点纹灰陶片

（2）双城型

1座，格日朝鲁式。由内外两个城组成（表一三）。

表一三　双城型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格日朝鲁式					
格日朝鲁城址[33]	440	400	1680	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政府驻地北3千米	分内、外城。外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墙灰黑土夯筑，基宽6米，残高2米；四角有角台址；四墙外均设马面。内城城墙已遭破坏，形状不清。城内有多处高建筑台基，文化层厚约1米。地表散布有布纹瓦、篦点纹灰陶片、白瓷片、铜钱等。出土铁车辖、犁铧、斧等

（三）县　　城

从规模上看，县城的规模多在城周1500米左右甚至更小，个别的大县城周超过1500米。该区域发现周长1500米以下的城址52座，根据结构分为单一、双城和不确定三种类型。

（1）单一型城址

共计38座。分长方形、横长方形、方形、四边形、多边形等五个亚型。

1）长方形

14座。根据城门的位置和数量，分为三式（表一四）。

阿尔斯楞山式：4座。南墙开1门。

陶家堡式：1座，西北角开1门。

巴林道式：9座，形制不确定。

表一四　长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阿尔斯楞山式					
阿尔斯楞山城址	100	80	360	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义和村东北约3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2米，残高0.7～1米。南墙正中辟门，宽3米。地表散布有少量砖、瓦、陶片、瓷片
查干浩特城址	150	100	500	扎鲁特旗查布嘎图苏木查布嘎图嘎查东南4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3米，残高0.7米。南墙开门。内北侧暴露有房基址。采集有布纹瓦、沟纹砖、篦点纹陶片
满金敖城址	250	150	800	科左中旗宝龙山镇中满金敖村东500米	平面呈长方形，位于沙坨开阔地。城墙夯筑，残高0.5～1.5米。南墙正中设门，宽10米。采集有篦点纹灰陶片、砖、瓦等
下洼子城址	200	150	700	赤峰松山区穆家营子镇下洼子村内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5～8米，残高1～3米。南墙开门，四角有角台，墙外有马面。城内有建筑台基。地表散布有沟纹砖、布纹瓦，泥质灰陶盆、罐、壶，白瓷碗、盘、缸等砖片（原报告称“松山馆故城”）
陶家堡式					
陶家堡城址	200	100	600	扎鲁特旗查布嘎图苏木陶家堡嘎查北2.5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3米，残高0.5米。西北角设门，宽8米。城内有建筑台基2处，东侧有眼井。采集有灰砖、布纹瓦
巴林道式					
巴林道城址	450	300	1500	翁牛特旗广德公镇小巴林道村东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夯层厚30厘米。地表有石柱础、石狮、自瓷片、青瓷片

续表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哈拉图达城址	400	200	1200	科左中旗腰林毛都苏木南哈拉图达嘎查北500米	位于开阔沙坨地，半面呈长方形，残高1.5米，门址不清。采集有布纹瓦、青砖、兽面纹瓦当、铁锈花白瓷片
梯田山城址	300	200	1000	库伦旗奈林稿苏木老虎洞嘎查西屯东北约1千米	位于铁牛河南岸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城墙，残高1～3米。东北角有两处相距约50米的建筑基址，西南和东南角亦有建筑基址，直径约15米，残高10米。文化层厚约1米。采集有布纹瓦、青砖、绿釉缸、白釉碗、黑釉瓶、白釉铁锈花罐，灰陶瓮、罐残片
敖宝艾里城址	400	100	1000	扎鲁特旗巴彦宝力皋苏木敖宝艾里嘎查西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残高0.5米。采集有瓦当、灰砖、篦点纹灰陶片、白瓷片。
罕山城址	200	150	700	扎鲁特旗罕山乡罕山村北400米	位于罕山南坡，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2米，残高1米。采集有灰砖、布纹瓦、篦点皱陶片、白瓷片，铁犁铧、车辖，小石磨
四平台东城址	210	90	600	敖汉旗大甸子乡四平台村东	平面长方形。面积1.89万平方米。夯筑土墙。内侧暴露东西排列、圆形夯土建筑台基4处，面积16～36平方米，高出周围约6米。采集有乳白釉瓷盘、碗，绿釉瓷坛，泥质陶器及铁锅残片
小城子城址	270	220	980	林西县十二吐乡小城子村内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残高2米；城墙上有马面，四角有角台。地表散布有泥质灰陶壶，瓷罐、碗、盘，沟纹砖、布纹瓦等残片
板山图城址	200	90	580	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毛敦敦达嘎查东北13千米	冲沟北岸台地上，平面呈长方形，石砌围墙内有十字形街道，宽7米；东西街两侧为南北向石墙分隔的院落，宽20～30米。每处院落临街有2～3座方形或圆形房址，墙高0.3～0.5米。采集有沟纹砖和布纹瓦，还发现有篦点纹骨灰罐
胡杰城址	180	165	690	扎鲁特旗乌额格其苏木胡杰嘎查西北1.5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已被风蚀成土垅状。采集有布纹瓦、淘纹砖、篦点纹灰陶片、绿釉陶片、白瓷片。曾出土铜镜1件

2）横长方形

11座。根据城门的位置和数量，分为五式（表一五）。

西花和硕式：1座，东南西墙各开1门。

浩尔吐式：1座。南北墙各开1门。

小城子式：1座，西墙开1门。

哈日巴式：2座，南墙开1门。

好来式：6座，形制不确定。

表一五　横长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西花和硕式					
西花和硕城址	174	197	742	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下要日吐村西北2千米	位于平缓的坡地上，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土筑，基宽7～10米，残高1.5米；辟东、南、西3门。城内有建筑土台基。采集有泥质灰陶罐，白瓷碗、碟残片及铁锄、犁铧
浩尔吐式					
浩尔吐城址	280	300	1160	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浩尔吐嘎查南侧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约12米，残高2～3米；南、北墙各开1门，外加筑瓮城；城墙周围有马面11个，直径约10米，高约3米；城外散布有白釉铁锈花碗、罐残片及沟纹砖、素面砖、布纹瓦等。采集“咸平元宝”铜钱1枚
小城子式					
小城子城址	195	200	790	巴林右旗查干诺尔苏木小城子村东200米	位于草地上，平面呈长方形，方向255°（作者按照北偏东15°理解）。城墙土筑，基宽10米，残高1.1米。西墙正中设门，宽20米。城内中部东西排列建筑土台基3处，高约0.6米。地表散布有沟纹砖、布纹瓦、绿釉琉璃板瓦、筒瓦
哈日巴式					
哈日巴城址	74	100	348	巴林右旗胡日哈苏木塔然花村西3.6千米	位于草地上，平面呈长方形，方向135°（作者按照北偏西45°理解）；城墙土筑，基宽8～10米，残高1～1.8米；南墙中辟门，宽16米。城内西北部和城门处有圆形建筑土台基。采集有茶绿釉牛腿瓶、白瓷碗残片
下双井城址	80	100	360	阿鲁科尔沁旗双胜镇龙头山村西南4.5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土筑，基宽2米，残高0.7米。南墙正中辟门，宽3米。城内暴露有房址，散布有砖瓦、陶片

续表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好来式					
好来城址	100	150	500	科左后旗茂道吐苏木敖瑞艾勒村西北1千米	位于甸子地上。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残高1～1.5米。采集有布纹瓦、沟纹砖、兽面纹瓦当、篦点纹灰陶片
陶海城址	180	250	860	阿鲁科尔沁旗赛罕塔拉苏木陶海嘎查北约200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约3米，残高1.5～2米。城内有建筑台基，散布有半浮雕目纹贴面砖、瓦块、瓦当、陶片、瓷片
下坎北城址	150	300	900	敖汉旗敖音勿苏乡北围子村内	平面呈长方形，夯土筑墙，残高约2米，有城门。城西50米处有一处建筑址，高出周围约5米。文化层厚约2米。采集有篦点纹陶片等
五十家子村城址	240	260	1000	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村西侧。	平面呈长方形，夯土筑墙，残高约3～5米，四角略高。城内有佛塔一座，并有建筑址。城外西侧约180米处有建筑群址，并见城墙遗迹（原报告称降圣州故城）
宝泉城址	150	175	650	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宝泉村内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约4～5米，残高约1米。地表散布有沟纹砖、布纹瓦、铁镰、白瓷碗等
台子洼城址	200	390	1180	库伦旗奈林稿苏木奈林稿村西	位于西沟南岸。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土筑。东南角及城内有建筑基址，文化层不详。采集有兽面纹瓦当、布纹瓦、青砖、滴水、白釉瓷碗、灰陶篦点纹罐残片

3）方形

9座。根据城门的位置和数量，分为四式（表一六）。

半拉式：1座，四墙各开1门。

上台式：2座，南北墙各开1门。

布日顺式：2座，南墙开1门。

安民县式：4座，形制不确定。

表一六　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半拉式					
半拉城城址	160	160	640	奈曼旗白音昌乡半拉城子村西北300米	位于山坡上，平面呈正方形。城墙黑土夹砂夯筑，残基宽5米。残高3米。四墙均设门，东、西门宽6米，南、北门宽11米。东墙外有石板砌筑的排水道。城内散布有沟纹砖、布纹瓦、白瓷片
上台式					
上台城址	146	146	584	翁牛特旗桥头镇上台村北50米	平面呈方形，城墙土筑，基宽2米，残高1.7～2米；南、北墙中部各开1门。采集有白釉、青釉和酱釉罐、壶、碗残片
小城子城址	310	310	1160	巴林左旗哈拉哈达乡小城子村内	平面呈方形，夯筑城墙，基宽约6米，残高0.5～3米；南北两墙中部辟门。城外有护城壕。地表散布有布纹瓦、沟纹砖、泥质灰陶罐、粗白瓷碗等
布日顺式					
布日顺城址	250	250	1000	科左中旗额伦索克苏木布日顺嘎查北1千米	位于平坦甸子地，平面呈正方形。城墙夯筑，残高0.5～1米。南墙正中设门，宽8米。城内发现建筑台基6处，面积均约100平方米。采集有砖、布纹瓦、兽面纹瓦当、篦点纹灰陶片等
查干哈达城址[34]	300	300	1200	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查干哈达村西	平面呈方形，夯筑土城墙，基宽4～3米，残高0.5～1米，南墙中部辟门（原报告称于越王故城）
安民县式					
土城子北城址	400	400	1600	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驻地北约1千米	位于苇塘河西岸。平面呈方形，方向172°（作者按照北偏西8°理解）。现仅存南墙，夯筑，夯层厚15～28厘米。地表散布大量砖瓦及陶、瓷片。城内曾出土八棱形石经幢，所刻铭文可辨者有"……大安七年闰八月十日……饶州安民县主簿兼县尉太……"（原报告称安民县故城）
八里庄城址	370	370	1480	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八里庄村东200米	平面呈方形，黄土夯筑城墙，基宽2米，残高0.5～0.8米。采集有白瓷盘、碗残片
北果园村城址	280	280	1120	喀喇沁旗昌盛远乡北果园村	平面呈方形，城墙夯筑，基宽5～8米，残高0.2～0.5米，夯层厚15～20厘米。文化层厚0.5～1.5米。地表散布大量砖、瓦。采集有泥质灰陶盆、白瓷碗、黑釉瓮残片
蒙古营城址	300	300	1200	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蒙古营子村内	平面呈方形，土筑城墙，残高1.7米。城东侧有1眼古井，深约7米。采集有布纹板瓦、沟纹砖，粗白瓷碗、灰陶盆残片。征集有篦点纹陶罐

4）四边形

1座。分二式（表一七）。

北山式：1座，形制不确定。

表一七　四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北山式					
北山城址	南55 北85	东100 西70		阿鲁科尔沁旗赛罕塔拉苏木陶海嘎查西北约7.5千米	平面呈不规则形，方向120°（作者按北偏西30°？），东墙100米，北墙85米，西墙70米，南墙55米。夯筑土墙，基宽3米，残高1～1.5米。南墙外有圆形土堆，直径约10米，高3米。城内有夯土建筑台基，散布大量砖、瓦和少量陶片、瓷片及北宋铜钱

5）多边形

1座，石棚沟式。形制不确定（表一八）。

表一八　多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石棚沟式					
石棚沟城址			400	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石棚沟林场东南	依山而筑，平面呈五边形，墙宽10米，残高1.5米。采集有沟纹砖、布纹瓦

（2）双城型

发现南北向双城2座。均是由一个长方形和方形的城址组成，南墙开1门。形制接近，视为一式，乌兰白其式（表一九）。

表一九　双城型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乌兰白其式					
乌兰白其城址	350	250	1200	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乌兰白其嘎查内	有内、外两城。外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墙中部辟门，外加筑瓮城；内城呈方形，边长200米，夯筑城墙，宽8米，残高2米，内有长方形建筑基址1座，长35米，宽15米，高1～3米。采集有沟纹砖、布纹瓦、粗白瓷碗、灰陶罐残片
努和图白其城址	350	250	1200	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驻地西北18千米	分内、外两城。外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墙开门，外加筑瓮城；城墙有马面14个。内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200米；内有建筑基址14座。地表遍布沟纹砖、布纹瓦、灰陶片、瓷片等。采集有黑花白瓷罐、粗白瓷碗

（3）不确定

发现形制不确定的城址12座（表二〇）。

表二〇　不确定型城址概况

名称	位置	内容
友爱村西城址[35]	巴林右旗都希苏木友爱村西南	位于河边台地上四周城垣无存。城内可见方形建筑台基4处，边长约30米，高1～3米。城南500米处曾发现银器窖藏，出土银执壶、温碗、杯，玉熊等遗物（原报告称黑河州故城）
乌兰板村北城址	翁牛特旗山咀子乡乌兰板村北	城址已辟为耕地和村民住宅。城墙无存。地表遍布砖、瓦、瓷片、陶片（原报告称丰州故城）
孟家段城址[36]	奈曼旗平安乡西孟家段村北l千米	位于老哈河冲积平原上。城墙已被河水冲毁。地表散布有砖、瓦、陶片、瓷片等（原报告称龙化州故城）
牛夕河东城址[37]	敖汉旗四家子镇牛夕河（大凌河支流）之左岸台地上	西南距离羊山墓群5千米。形制不清（原报告称金原县故城）
乃林达坝城址	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乃林达坝嘎查西北1.5千米	西南侧残存城墙基一段，长约30米，城内有建筑基址7座，其中最大的1座为方形，边长约20米，高1米。采集有沟纹砖、布纹瓦、粗白瓷盘、灰陶罐残片
刘家营城址	巴林左旗白音敖包乡刘家营子村东北	文化层厚约2.1米。地表一侧残存断续的围墙，长200米，基宽8米，残高1.5米。采集有素面砖、布纹板瓦、琉璃瓦、粗白瓷碗，白瓷瓶、碟残片
小城子地城址	巴林左旗浩尔吐乡乌尔吉村西南1千米	西部残存1段城墙，南北长200米，基宽8米，高1.5米。地表散布有素面砖、布纹板瓦、粗白瓷碗、灰陶盆等
小城子屯城址	巴林左旗三山乡新农村小城子屯内	残存有2段夯土墙，长分别约11、19米，宽5～8米，残高0.6米。地表散布有沟纹砖、布纹板瓦、粗白瓷碗、泥质灰陶罐等
拉嘎赛花城址	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包勒格苏木拉嘎赛花嘎查内	城址形状不清，只残留1段土筑城墙，长40米，基宽15米，残高1.5米。城中部有长方形建筑台基，长20米，宽12米。地表散布少量青砖、布纹瓦、陶片、瓷片
巴彦塔拉东城址[38]	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驻地东3千米	位于平坦的草原上。城区大部被铲平建成草库伦，现仅存建筑土台基2处，呈圆丘状，高0.5～1.5米。地表暴露有方形花岗岩柱础。采集有沟纹砖、布纹瓦、白瓷碗残片（原报告称宣化馆故址）
前进村东城址[39]	巴林右旗巴彦汉苏木前进村一组东500米	位于河边台地上，城垣被夷为耕地或为沙丘埋没。城区内暴露建筑土台基3处，直径4～8米，高约2米。台基上下散布沟纹砖和布纹瓦。采集有兽面纹瓦当、滴水、黄釉长颈瓶残片（原报告称保和馆故址）
哈达英格乡北城址[40]	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驻地北200米	西北侧残存有土筑墙，长约600米，基宽11米，残高1米（原报告称长泰馆故址）

（四）奉陵邑

奉陵邑是兴筑在皇帝陵墓附近专门奉祀和守卫陵墓的城郭，其功能特定。辽人先后设立了五座奉陵邑，这一地区有祖州、怀州及庆州三座。分三式（表二一）。

表二一　奉陵邑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祖州式					
石房子村城址			1750	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西北	外城和内城。外城平面呈五边形，东南向；版筑城墙，基宽10米，顶宽2米，残高3米；西北墙两端设有角楼；设有四座城门和两座水门，其中三座城门外设有瓮城。内城位于外城的后部，南墙设门，门外有东南向大街，宽25米。城内、东关有密集的建筑基址。地表散布沟纹砖、布纹瓦、瓷片、灰陶片等。城西北1.5千米为辽祖陵。祖州城址内西北隅有一石房子，由7块花岗岩大石板支架而成，宽6.7米，进深4.8米，高3.5米，石板厚45～60厘米。正面左右各1块，留有门豁，地铺1块，两山墙及后墙各1块，顶盖1块（原报告称祖州故城）（图五）
怀州式					
浩特艾勒城址[41]	496	524	2040	巴林右旗岗根苏木浩特艾勒嘎查内	位于怀陵3千米川地上，平面近方形，正南北向。西墙大部分被床金河水冲毁。夯筑城墙，基宽8～10米，残高约1～4米，夯层厚0.08米。辟南北两门，四角有角楼。城内北部有建筑台基2处，高1米。城北侧分布大片居住址和夯筑台基1座。城址北侧磴磴山上有寺庙基址、石墙、水井、岩画等。地表散布有沟纹砖、布纹瓦、瓦当、滴水及泥质灰陶篦点纹罐、白瓷碗残片（原报告称怀州故城）
庆州式					
索博日嘎城址	1580	1420	6000	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驻地东北300米	建于川地上，平面呈回字形，内外双重城墙，方向174°（作者理解为北偏西6°）。外城平面呈长方形，现仅存西北角一段；内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1140米，东西960米。城墙基宽15～30米，残高3～4.5米。辟东、南、西、北4座城门，除北门外皆设瓮城；四周设马面。城内西北部有释迦佛舍利塔，主要建筑基址分布在内城北部；散布有汉白玉经幢、沟纹砖、布纹瓦、瓦当、滴水及白瓷片等。城内西北隅有释迦佛舍利塔，俗称白塔。塔平面呈八边形，砖木结构楼阁式，高73.27米。由重层台明、基座、塔身、塔顶、塔刹组成。出土法舍利塔、琥珀雕观音像、丝织物及各类经卷等珍贵文物600余件；覆钵内发现建塔砖碑2通（原报告称庆州故城）（图六、图七）

（五）寨　　址

发现10座。长方形和方形两种类型。

1）长方形

6座，分三式（表二二）。

扎拉格式：1座，四墙各开1门。

扎仁式：1座，南墙开1门。

西山式：4座，形制不确定。

表二二　长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扎拉格式					
扎拉格寨址	150	110	260	扎鲁特旗巨日河镇扎拉格村东500米	平面呈长方形，城墙夯筑，基宽1.8米，残高0.5米。四墙均设门。采集有陶片、瓷片、沟纹砖、布纹瓦。曾出土有铁镞、犁铧，石臼、陶瓮
扎仁式					
扎仁寨址	100	80	360	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镇扎仁嘎查北100米	位于鲁北河岸，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约2米，残高0.5米。南墙正中开门。采集有青砖、布纹瓦、篦点纹陶片
西山式					
西山寨址	100	75	250	扎鲁特旗香山乡农场三分场东南2千米	位于水库西山坡上，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19米，残高1.6米。四角有角台址。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较大的建筑基址，文化层厚约0.4米。采集有布纹瓦、沟纹砖、篦点纹陶片、白瓷片、泥塑小白塔
罕山南寨址	100	80	360	扎鲁特旗罕山乡罕山村东南15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基宽2.7米，残高l.5米。东南角有角台。文化层厚约0.5米。采集有沟纹砖、布纹瓦、篦点纹陶片、宋代铜钱
窟隆山寨址	81	60	282	扎鲁特旗工农乡窟隆山村东北700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土墙，残高1米。城内有建筑台基。采集有布纹瓦、砖块、灰陶片、白瓷片
查嘎拉吉寨址	110	79	378	扎鲁特旗嘎亥图镇查嘎拉吉嘎查西北5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城墙，基宽2.2米，残高1～3米。大部分已被风沙覆盖。城内有一眼古井。地表散布有青砖、布纹瓦、灰陶片、白瓷片、石臼

2）方形

4座。分三式（表二三）。

西白城式：1座，四墙各开1门。

嘎亥图式：2座，南墙开1门。

浩布勒图式：1座，形制不确定。

表二三　方形城址概况

名称	长东西	宽南北	周长	位置	内容
西白城式					
西白城寨址	100	100	400	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苏木梅林屯西2千米	平面呈方形，夯筑土墙，局部破坏，基宽2米，残高1米。四面墙各开1门。内有建筑台基8处，北部两处较大，文化层厚约1米。采集有龙爪形建筑构件、沟纹砖、布纹瓦、篦点纹灰陶片、白瓷片
嘎亥图式					
嘎亥图寨址	130	130	520	扎鲁特旗嘎亥图镇北1千米	平面呈方形，夯筑土墙，基宽1.7米，残高1～3米。南墙正中开门，四角有角台址。采集有砖、布纹瓦、灰陶片、白瓷片
偏坡营寨址	85	85	340	奈曼旗太和乡南偏坡营子村西南500米	位于教来河岸台地上，平面呈方形，城墙黑土夯筑，基宽5米，残高0.5～1米，夯层厚20厘米。南墙正中设门，宽10米。城内散布有篦点纹灰陶片、沟纹砖、布纹瓦，莲花纹、兽面纹瓦当
浩布勒图式					
浩布勒图寨址	60	60	240	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镇浩布勒图嘎查北200米	位于山前平地，平面呈正方形，夯筑土墙，基宽约2米，残高0.5米。北侧有护城壕。采集有沟纹砖、布纹瓦及篦点纹陶片

三、几点认识

以上是内蒙古东南部见诸报道的辽代城址的简况，我们在前辈学者调查和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分类首先按照城址的规模进行的，规模相仿的城址根据其特征，划分型和式。

城址的规模是和城市在行政体系上的位置息息相关的。辽代的地方行政体系在太祖和太宗朝初具规模，到圣宗和兴宗之世，臻于完善。中央政府以下，行政体系的最顶层是京城，在其五大行政区域，设立五京，称五京道。道下设府、州、军、县、边防城等各级、各类地方行政机构来管理基层。奉陵邑诸城是辽代城市特色之一，城市职能专门化，直辖中央。

从以上的城址的简况看，京、州、奉陵邑、县等各种类型的城址在这一地区都有发现，以下就是几点粗浅的认识。

都城在这一地区发现两座，分为二式。从列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城址的显著差别。规模上，上京城小于中京城。上京城周（皇城加上汉城之和）12173米，10千米有余，中京城外城周长15400米，约合15千米。上京城垣的整体设计，采取契丹、汉人分开居住的方式，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城，南为汉城，北为皇城。汉城的规模小，城墙上亦没有马面等防御设施；皇城规模较大，城墙高大且夹筑马面、敌楼等防御设施。上京皇城四面城门内各有一条大街，只有南街较宽且长，大街两侧布满建筑，但未形成中轴线，在大内的北部尚有大片空地，可能为搭设毡帐之地。靠近皇城西墙的日月宫等主要建筑台基，均为东向，这也突出反映了辽人早期尚东的传统。中京城整体平面呈三重城，且外城套皇城而呈回字形布局。外城南部为坊市分布区，建筑采用南北向，自外城正中的朱夏门直达阊阖门，为一条直线中央大道，大道两侧建筑对称布局，形成中轴线。这种城建设计，显然与上京有着很大的不同，却与中原都市的布局有着显著的联系与模仿，这也反映了辽人吸取汉族文化因素的趋向。

州城一级的城市（城周1500～4000米）共发现31座，根据规模，又分两类，一类是较大规模城址，2000米以上，另一类是较小规模城址，城周1500～2000米。在每一类中又分单一型、双城型和多城型等，在各型下再分若干式。

较大类的州城址，分单一型、双城型及多城型三个大的类型。单一型又分长方形、横长方形、方形和四边形等四个亚型。亚型下分保日浩特式、永州式、井沟子式、高州式、韩州式、灵安州式；双城型分全州式、饶州式和松山州式，多城型有武安州一式。

较小规模的城址，分单一型和双城型两大的类型。单一型分长方形、横长方形、方形和四边形，分必图式、宁州式、下扣河式、酒局子式、玛尼吐式、达更诺尔式、宇宙地式、庙苏式；双城型有格日朝鲁一式。

《辽史・地理志》中有明确设置记载的州城约137个，但新设的州县城是否都有城郭，是沿用旧城还是新筑，或将投下州城收归政府管辖，文献中未有明确的记录。州城的设置时间上，前期的太祖、太宗朝建置最多，中晚期的圣宗、兴宗、道宗也有较多增置。因此我们将城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相当于太祖、太宗以至穆、景宗，晚期相当于圣宗、兴宗、道宗乃至天祚。目前，经过详细考证，并得到多数学者认可的城址有：高州、灵安州、永州、武安州故城等，我们将城址进行类、型、式分析，正是基于已考证的结果并加仔细的观察进行的。早期的辽人营建的城市，多数是为了安置俘获的渤海、高句丽、汉人等营建的，因此，城市建设上表现突出的一点是：常出现隔墙或两个呈日字形城组成一个城。这反映了辽代南北分治的理念。城市多保留有草原民族尚东的传统，多数城址在东墙上辟门，城址多呈长方形，也有的呈五边形或多边形。晚期城址，具备了更多的汉化特征：多由单个城组成，正南北向。平面长方形或者方形。部分城市出现三墙开门的形式，中部偏西北部多是寺院，寺院的位置趋于固定。街道呈十字形和丁字形布局，城墙四角多有的半圆形、突出的角台。

基于以上的认识，属于早期的城址包括：井沟子式、韩州式、鹿山式、饶州式、松山州式、武安州式、格日朝鲁式、庙苏式。

属于晚期的城址包括：保日浩特式、永州式、高州式、灵安州式、全州式、玛尼吐式、必图式、下扣河式、达更诺尔式、宇宙地式。

不确定的包括：宁州式、酒局子式等10余座城址。

其中属于早期的井沟子式城址，原报告认定为“临河县故城”，城周3000米，就其规模看，超过一般的县城很多，且距离其25千米的饶州故城城周仅3500米，因此，认定该城属于州城一级。

县城一级的古城发现50余座，县城的规模，除个别的大县城周超过1500米外，多数县城城周少于1500米。其中1500～1000米的17座。1000～500米的18座，余下的城址周长500米以下。

该区域的辽代县城，经过考证且较可信的仅有安民县城等城址，且疏于对县城一级的城址的详细观察和报道，因此分类困难，但似乎至少存在三墙开门系统的西花和硕式和单一南墙开门系统的乌兰白其式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址。本文将此问题提出，相信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进展，以及对县城一级城址的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县城一级城址的分类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辽代共设五座城郭以奉祀、守卫皇帝的灵寝。其中安葬东丹王耶律倍和世宗耶律阮父子的显陵，以及景宗耶律贤的乾陵都在辽宁省北票县境内，且后期改筑、破坏严重，形制不清。因此，在该地区集中分布的三座奉陵邑无疑是现今考察辽代奉陵邑城址制度的最佳对象。三个城址分建于不同的时期，代表了早晚两个时期的特征。

祖州始建于太祖时期，由内外城构成，东南向。外城呈不等边五角形，四墙上各开一门，中部偏北有内城。外城东、南墙外有密集的遗迹分布。怀州城平面方形，四墙中部辟门，中部偏北和西南部分布有建筑基址。城北的床金河东岸边分布有城址。庆州始建于兴宗时期，平面呈回字形，正南北向，外城破坏殆尽，仅余西北两小段城墙。内城的建筑集中在中部偏北部，西北角有白塔及多处塔基遗迹。自南门起的南北大街，直通城中部的东西大街相交，形成丁字形街道。

祖、庆两州显然分别与辽代早、晚两期的城市特点相吻合，前期流行多边形城，东南向，晚期城址南北向，丁字形街道布局，主体建筑和寺院集中在中部和西北部。作为功能特定的奉陵邑，早期的祖、怀两城，守卫、奉祀的人住在外城外侧，而晚期的庆州城的居民则集中于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区域，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寨址作为军事遗迹，共性大，共发现10座。城周240～520米，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基宽1.7～2.2米，只有罕山南城址基宽2.7米。南墙正中开门的嘎亥图式城址与四墙各开1门的西白城式城址似乎有着年代上的差距。

至于在辽代的头下州，文献记载有丰州、豫州、宁州等，但多数保存较差，仅可推定大致位置，实地调查材料不完整，定论太少，本文将它们均统而分之，未做考证。

四、结　　语

我们通过对内蒙古东南部的辽代城址的进行的分类，获得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上京、中京两都，重要性自不待言，前辈学者亦倾力颇多，州城一级的诸城是辽人统治上传下达的枢纽，建置复杂，很多问题急需解决，辽代城址研究的深入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只是试着做了一些归纳和总结，着重将前人做工作较细的州城一级的城址进行分类，并试着分期。至于县城和寨址等小型城址的型式之划分，纯属抛砖引玉，旨在引起同仁之注意，期望更多的人去研究。

通过分期的尝试，我们发现：早期的辽人营建的城市，常出现隔墙或两个呈日字形城组成一个城，多保留有草原民族“东向拜日”的传统，多数城址在东墙上均辟门，城址多呈长方形，抑或五边形甚至多边形。晚期城址，趋于规整，多是长方形或者方形的单个城，正南北向。出现三墙开门的城址，同时寺院的位置多分布在城址的中部偏西北，这似乎反映了当时一定的规制，值得深入研究。城内的主要街道亦呈丁字形布局，这也是当时战事频繁的社会状况在城市修筑史上的真实反映。

从城址的分布图（图八）可以看到，这一地区有四大城址群：上京城址群、中京城址群、扎鲁特（今）城址群和库伦旗城址群。沿着潢河（西拉木伦河）往北、胡虎尔河以西的上京城周围，聚集了大小近40座城址，其中较大型城址（周长超过1500米）15座，是名副其实的辽代中心；以阴凉河、土河上游为中心的中京城周围分布13座城址（宁城东南的辽宁省西北部发现诸多的辽代城址，亦属中京城市群的范围），其中较大型城址5座；位于胡虎尔河以东、五河以西的扎鲁特旗境内发现了19座城址，其中较大型城址4座，扎鲁特旗作为上京的东部门户，密集城址反映了辽人防守的谨严，也侧面映射其东北方对手女真人的强大；位于辽河上游支流的羊肠河流域的库伦旗，接近渤海故地—东京辽阳府，集中分布的9座城址，其中较大型的城址有4座，大小城址的比例之高，值得重视。

以上是对内蒙古东南部辽代土筑城址的分析和认识。在这一区域，还发现了辽代石筑城址5座，分布在今通辽的北部和赤峰的东部地区，与上京和中京均有一定的距离。这5座石城址，城周多数在600～1200米，只有1座较小，周长300米。文化面貌相近，看作同一型，根据城门的方向，可分为东墙开门（1座，方形）与西墙开门（4座，长方形）二式。这些城址分布的地域接近，形制面貌近乎一致，同时代性明显。产生石城的原因可能与早期安置渤海人、高句丽人有关，即受东北山城的影响。当然，最终的结论还要靠日后更翔实的地面调查和发掘来解决。

（原文发表于徐光辉主编：《东北古代文化论丛》，《龙谷大学国际社会文化研究论丛6》，299～323页，北九州中国书店，2008年。）

注　释

［1］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及第二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2］　牟里，冯承钧译.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北京：中华书局，1956（再版）.

［3］　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4］　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5］　〔日〕岛田正郎.祖州城.中泽印刷株式会社社刊，1955.汪宇平译.祖州城［J］.物考古参考资料，1983（5）.

［6］　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J］.考古学报，1958（2）.

［7］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b. 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J］.考古，1966（5）.

c. 孙继民.辽仪坤州考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1、2）.

［8］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J］.文物，1961（9）.

［9］　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0］　塔拉、董新林.辽上京城址初露端倪—基本了解皇城内南北大街保存情况，道路遗存可分辽、金两期［N］.中国文物报,2001-11-14.

［11］　张郁.辽上京城址勘查琐议［A］.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2］　李逸友.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A］.辽金史论集［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13］　冯永谦.辽代部分州县今地考［J］.北方文物，1994（4）.

［14］　a.项春松.辽代交通、驿道、及驿馆述略［A］.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b. 项春松.辽国城镇聚落形态研究［A］.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C］.1993（未正式出版）.

c.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15］　贾洲杰.辽金元时代内蒙古地区的城市和城市经济［J］.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3、4）.

［16］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Z］.辽代上京道、中京道.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17］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本文收录的辽代城址共计有96座，以该报告刊布的资料为主，部分城址的名称略有变动（均有说

明）.

［18］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 a.〔日〕鸟居龙藏.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J］.燕京学报，1949（36）.
b.〔日〕鸟居龙藏.辽上京以南伊克山上之辽代佛刹［J］.燕京学报，1951（40）.
c. 辽宁省巴林左旗文化馆.辽上京遗址［J］.文物，1979（5）.
d. 方志云.辽上京城建筑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6）.
e. 金永田.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
f.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A］.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张郁.
g. 辽上京城址勘查琐议［A］.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0］ a.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J］.文物，1961（9）.
b.李逸友.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遗址［A］.中国考古年鉴（1987）［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c.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发掘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1）.
d.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博物馆.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发掘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1）.

［21］ 冯永谦，姜念思.宁城县黑城古城址调查［J］.考古，1982（2）.张郁.内蒙宁城县古城址的调查［J］.考古通讯，1958（4）.

［22］ 姜念思，冯永谦.辽代永州调查记［J］.文物，1982（7）.

［23］ 林西县文管所.辽饶州及长乐、临河、安民三县调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1）.

［24］ 张松柏，任学军.辽金松山州遗址调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4）.

［25］ 张松柏，任学军.辽高州调查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1、2），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192页高州条.

［26］ 贲鹤龄.内蒙古库伦旗发现辽代灵安州城址［J］.文物，1982（7）.

［27］ a.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地区中小城镇的发现与研究［J］.北方文物，1994（l）.
b.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148.

［28］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122.

［29］ 林西县文化馆.辽代饶州故城调查［J］.考古，1980（6）.冯永谦、姜念思.辽代饶州调查记［A］.东北历史与考古（丛刊）（第1辑）［J］.1982.

［30］ 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地区中小城镇的发现与研究［J］.北方文物，1994（l）.

［31］ 邵国田.辽代武安州城址调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1）.

［3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3：434 ~ 435.

［3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434.

［34］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J］.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123.

［35］ 苗润华.辽代黑河州考略［A］.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辑）［C］.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36］ 郝维彬.辽代龙化州调查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1）.

［37］ 邵国田.刘祜墓志铭考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1）.

［38］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134.

［39］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134~135.

［40］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Z］.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135.

［41］ a.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
b.韩仁信,青格勒.辽怀州出土窖藏陶器［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

Research on Walled Cities in Southeast of Inner Mongolia of China in Liao Dynasty

Wang Xiaokun

Abstract: Liao dynasty constructed a lot of walled cities in south east of now Inner Mongolia, and set up Zhou (州) and Xian (县). More than 100 walled city sites were found so far.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make a statement about classif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view of typological method.

Walled cities in early period were usually consisted by two parts and formed a shape of the character “日”, and a gate was made on the east wall. The shape was usually rectangular, but some have pentagon or polygon shape. We can notice their tradition of facing east and praying rising sun. In the latter period, many of them had rectangular or square shape, were consisted by single parts, and faced the direction of north or south. Gates were made on three walls, and roads shape of the character "丁" stood out. Temples located the middle or north-west part of

the city.

These ruins of walled city were divided 4 areas, i.e. Shangjing (上京) Area, Zhongjing (中京) Area, Jarud (扎鲁特) Area, and Hure (库伦) Banner Area. In Shangjing Area, more than forty ruins, large and small were found, and 15 of them are quite large. It indicates here was the true center of Liao dynasty. Around the Zhongjing ruins 13 ruins were found, and 5 of them had large scale. In Jarud Banner, 19 ruins were found, and 5 ruins were relative large. The background of this high density shows the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defense, especially the rise of Jurchen people. In Hure Banner and Liaoyang (辽阳) Area, which was the old territory of Bohai, 9 walled city ruins were crowded, and 4 of them were quite large. The fact that the ratio of the large ruins is nearly half is worthy of note.

Key words： walled cities; Inner Mongolia; Liao dynasty

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反映的社会生活

何　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壁画墓保存情况较好的有：赵德钧及妻种氏合葬墓（图一）[1]、青云店辽墓（图二～图四）[2]、韩佚墓（图五、图六）[3]、刘六符及夫人合葬墓[4]、百万庄1号墓[5]。金代的壁画墓发现得较少，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有晏家堡村金墓[6]、八角村金赵励墓（图七～图一〇）[7]和斋堂壁画墓（图一一、图一二）[8]。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不仅重现了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而且暗示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迁。

一、物质文化生活

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共同影响下，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必然会形成特定的物质文化生活。北京位于燕山南部、华北平原北端，具体来说，西有太行山与军都山相接，北有燕山山脉，东临渤海，南为华北平原北缘，这样子的地形地貌使北京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无论是辽代还是金代，这里都是汉人的主要居住地，物产丰富，农业生产力水平高，封建化程度深。当契丹、女真和其他北方民族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张南下时，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在此接触了汉人传统生活习俗，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各自对原有习俗的保持与坚守，也有彼此之间的文化互动交流，这一长达百余年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反映在衣、食、住、用上，从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中也可窥其一二。

1. 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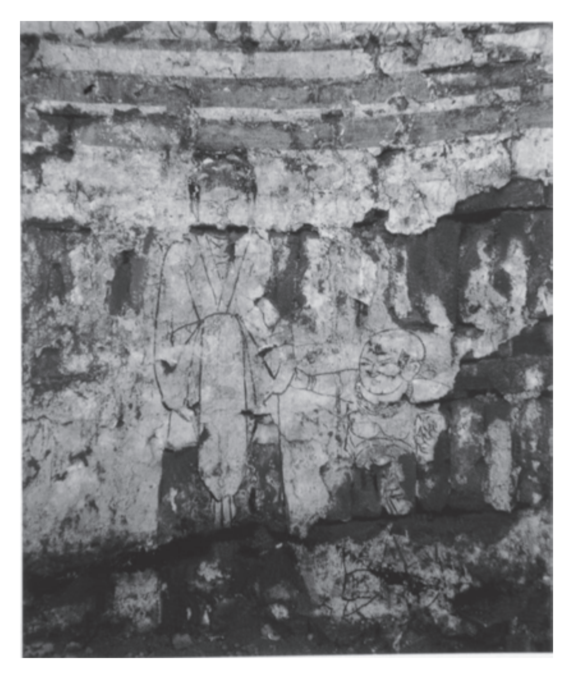
北京地区辽墓壁画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高髻簪花，有的以巾帕裹头，上身着圆领袍衫，分宽袖和窄袖两种，以窄袖居多，腰系带，下着裤或裙，有的脚穿皂鞋。在早期的壁画中还出现过方领长衫，颇有唐之遗风。目前所见女性着交领长衫的都是右衽，宽袖。男性形象出现很少，大多着圆领袍衫，腰系带，下着裤。



图一　赵德钧墓“奉食图”



图二　青云店M1南壁



图三　青云店M1东壁



图四　青云店M1东壁

金墓壁画中的女性形象基本都梳髻，以巾帕裹头，不见发饰。这一时期在女性当中圆领袍衫似乎不大流行，交领长衫成为流行的主题，颜色以青、红、白为主，下配长裙，长衫窄袖右衽，在其内还有数层“中单”。男性杂役者有的戴蹋鸱巾或软脚幞头，也有的以黑色巾帕简单裹头，鼓乐伎工则戴簪花长脚幞头。衣装方面圆领长衫是主流，腰束带，脚穿黑尖靴。在鼓乐伎工中也有穿右衽交领长衫的，着胸甲，腕部缚带。值得一提的是，在皇统三年（1143）赵励墓的备茶图中出现了髡发人物形象，这在之前的壁画中不见，可以看做是一个信号，反映了当时的北京地区确实是一派各民族杂居共处的情形。


图五　韩佚墓东壁


图六　韩佚墓墓顶


图七　赵励墓“备茶图”


图八　赵励墓“备宴图”

墓葬壁画反映出的服装发式特点是以传统汉式风格为主。自五代隋唐以来，圆领袍衫就成为了普罗大众的主流服装。这种式样的衣服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因其能较好地适应北方寒冷多风的气候而被北方诸民族所偏爱，后经过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胡服化”风潮，圆领袍衫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我国中古社会的主流服装。

宽衣博袖一直是儒家提倡和宣扬礼制而推崇的衣装礼制，曾一度是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尊贵形象的体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窄袖短衣因其方便行事而成为劳役人等的衣着，反映在壁画当中，无论是辽代还是金代，无论衣服长短，均为窄袖。所以，青云店M1的身着交领宽袖衫的女性，其地位和身份应当不是一般的侍女奴婢。另外，赵励墓鼓乐图中的伎师也多着宽袖长衫，有史料记载，宋代宫廷大宴时，“教坊乐部列于山楼下彩棚中，皆裹长脚幞头，随逐部服紫、绯、绿三色宽衫”[9]，所以，此处的长脚幞头和宽袖长衫应该看作是仿宋代官服的戏服。



图九　赵励墓“鼓乐图”



图一〇　赵励墓“侍洗图”



图一一　斋堂墓墓门西侧侍女



图一二　斋堂墓墓室西壁故事图

金代承袭了很多辽代的服饰特色，比如“缺胯”袍衫。所谓“缺胯”，又名“开衩”，是指在袍衫两侧胯部留有开口，比较像我们现在的旗袍。在劳动、行走或骑乘时，为方便起见，常将袍衫前襟下摆向上撩起，掖于腰带之间，谓之“缚衫”。赵励墓的“备茶图”“侍洗图”中的一些奴仆就是这样的打扮。

一般来说，服装发式是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表现。不过，随着人们的活动，经过数千年的交流融合，早已是一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景象。我们很难简单地通过圆领或交领，宽袖或窄袖来辨析着装者的族属。不过，衣襟是左衽还是右衽，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判断标志。无论契丹、女真，还是其他北方民族，衣装的最大特点就是左衽。《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右衽和左衽明显成为划分中原华夏族和周边诸族基本标志，在中原人的心目中，左衽具有“非我族类”和落后野蛮的含义。在辽故地的永庆陵、库伦辽墓和关外宣化辽墓中的契丹人形象的衣着无不是左衽的，而汉人的衣着无论是交领，还是圆领对襟均是右衽的。

髡发是最具北方民族特色的发式，契丹族和女真族，无论男女均有髡发习俗，这在墓葬壁画中多有反映。而汉地的传统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壁画中鲜见有汉人行髡发之俗。如此看来，赵励墓中髡发小奴应该是契丹或女真人。辽末年，天灾人祸，政府对人口的控制放松，允许奴婢买卖，使大量契丹人流徙南下，因此汉人墓葬壁画中出现髡发形象的外族人是可以理解的。

2. 食

辽、金是北方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其辖地内聚居着契丹、女真、汉、渤海、奚等多个民族。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物产资源，不同的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使各民族和地区间的人们在饮食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大体上来讲，就是游牧渔猎民族和农耕民族各有特点，但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相互影响。

北方民族大多以乳、肉为主食，粮食为辅，随着其南下汉地，与农耕民族的接触，粮食在主食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食肉饮酪的习俗并没有改变。农耕民族则多以谷物为主食，主要有馒头、煎饼、糯米饭、糕饼等。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宋史路振出使辽国，在他所著的《乘轺录》中描述了幽州官吏宴请他的盛况：“九日，虏（指契丹）遣使，置宴于副留守之第，第在城南门内，以驸马都尉兰陵郡王兰宁侑宴。文木器盛虏食，先荐驼糜，用杓而啖焉。熊肪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牛鹿雁鹜熊貉之肉为腊肉，割之令方正，杂置大盘中，二胡雏衣鲜洁衣，持悦巾，执刀匕，遍割诸肉，以啖汉使”[10]。这是接待使臣的较高规格的官宴菜品，席上的食物均为各式各样的肉类，颇具北方民族特色。而在北京辽金墓葬壁画的备宴图中反映的是偏重于士族平民日常家宴的情况，比如赵德钧墓壁画中的“揉面图”表现的正是制作面食的过程，而“奉食图”中大盘里放置的是类似现在的馒头、寿桃类的面食。再比如赵励墓备宴图中桌子上摆放的数个盘碟，包子、饼、鸡肉等一应俱全。

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我国北方地区的蔬菜瓜果等副食产品不如中原和南方丰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食用需要。蔬菜的品种主要有芹菜、菠菜、葱、姜、蒜、韭等。辽代还从西域引进了“回鹘豆”，从名字上看应该是来自回鹘，“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11]，为当时人们所喜食。

果品在日常饮食中也占有一定比例。青云店M1北壁启门侍女手中的托盘里有几只石榴，东壁砖砌影作桌子上的黑色圈足碗里也盛放着数枚石榴；斋堂墓壁画中侍女双手托盘，盘内盛着新鲜的桃、石榴和西瓜。除此之外，见诸文献记载的干鲜果品还有樱桃、枣、桃、李、栗、梨和葡萄等。其中，对于西瓜的记载尤其多，盖因“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盆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12]。南宋使臣胡皓流徙燕云之境，见西瓜“形如匾蒲而圆，色极青翠，经岁则变黄，其瓞类甜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13]，后来他归宋时，还将西瓜引种到中原汉地种植。对于西瓜的南传，范成大《西瓜园》一诗的题下注中写道：“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14]。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的一种水果，在历史上也有如此不凡的经历，是当时社会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在饮品方面，北方民族多以牛、羊、马等动物的乳汁为原料制成各种乳品，或进一步提炼、加工，制成精致的乳酪、乳粥、醍醐等，是乳品中的珍品，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比如宋使王洙言：“虏人馈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15]，朱彧在《萍洲可谈》中也提到：“先公（朱服）至辽，日供乳粥一碗，甚珍”[16]。而中原汉族风行的饮茶习俗亦深刻地影响着辽金时代的北方诸族，成为上至皇亲贵戚，下至平民百姓喜好追捧的饮料。北京辽金墓葬壁画中最常见的备茶题材，侍立人物手中所捧或砖雕木桌上所绘制的执壶、茶盏、盏托等，都说明了辽金时期饮茶之风盛行于世的真实情况。

茶叶产自南方，辽代主要是通过榷场贸易、岁贡和礼赠的方式从中原或南方地区获得茶叶。金朝占据中原之后，统治者曾提倡种植茶树，但茶叶还是主要来自于与南宋的榷场贸易[17]，因而显得格外珍贵。《松漠记闻》就曾记述女真人婚嫁，在酒宴过后，“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可见茶叶的贵重。

饮茶之风在北方地区的各阶层中都很盛行，这跟北方民族“食肉饮酪”的饮食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茶的解渴、去腻、助消化的功效，形成了“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18]的景象。除此之外，饮茶还被看作是汉文化文儒风雅的表现，在直接学习和仿效宋代社会普遍流行的点茶、斗茶风俗的基础上，也逐渐形成了茶文化。北京出土的皇统三年（1143）赵励墓中的“备茶图”就很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文化习俗：桌子上绘制的茶具有陆羽《茶经》中所载的“十二君子”中专门用来贮藏茶具的“都蓝”，还有“四之器”中用来敲茶饼的茶槌和量、舀茶末的茶则。画面右下方图像虽然残破不全，但是通过观察残存的人物动作和神态，参考同时期其他壁画“备茶图”的构图，缺损的部分应该是吹风炉烹茶的活动。

据墓志记载，墓主人赵励祖籍太原忻州，后迁至燕地，生前为宋的秘书省校书郎，一直在汴梁任官。宋宣和五年（1123）卒于汴梁，归葬燕地。其妻卒于金皇统三年（1143），夫妻合葬“燕城宛平县崇禄里”，即今石景山区八角村附近。赵励墓壁画的“备茶图”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之一，自南至北广泛流行的真实情况以及士人阶层儒雅的文化品位和生活追求。

3. 住

人们的居住形式往往受到地理条件、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在辽代，以畜牧渔猎为生业的契丹人一年四季随水草而迁徙辗转，“以车帐为家”，“靡有定所”[19]。宋人《契丹风土歌》中有“自有穹庐障风雨”的诗句，《契丹帐》亦云：“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20]，都生动地描绘了契丹人本身的居住状况。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集中生活着大量的汉人，他们所从事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要求固定的居所和稳定的聚居环境。于是，定居生活方式也就开始慢慢影响契丹人。有一部分契丹人由原先的畜牧游猎转为农耕或半农半牧的经济生产方式，逐渐开始定居生活，并仿效汉人营建汉式的房屋，建造固定的居室。北宋使臣王曾于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使辽所见：“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以草庵、板屋”[21]。由此可以得知，到了辽代中期前后，已经有不少契丹人的居住形式是“草庵”“板屋”这类汉式房屋了。

具体到北京，作为辽南京，这里生活着大量的汉人，也杂居分布着契丹、奚等各族。这一时期发现的墓葬形制以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墓葬壁画精心地绘制或砖砌柱、梁、枋、斗拱和破子棂窗等各种仿木构部件及建筑物，这些象征支撑起整个墓室的关键结构也是当时人们居住情况的真实写照。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载女真：“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耳其暖”。女真的原始生业有畜牧、渔猎和农业[22]，虽然农业所占比例小，却也影响着女真的居住形式，表现为早期的半地穴式建筑和迁居按出虎水之后如史籍记载的房屋院落。经营农业的生产形式和聚族定居的生活方式使女真人受自然环境制约少，不必四处辗转迁徙，同时更易于接受汉人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形式。

作为金中都的北京，历经了辽宋时期的百年互动与融合，在居住形式上保留了一贯的风格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以土圹石椁墓和砖室墓为大宗[23]，仿木构砖室墓中的壁画题材反映出汉人求田问舍的传统，壁画中出现的帷幔、屏风，砖砌破子棂窗、花格扇门等都进一步反映出居室的讲究华丽，蕴含着金代前堂后室、左右厢房的建筑布局特色。另外，由于北方气候寒冷，冬季时间长，女真人使用火炕来取暖。屋子

里三面围砌成炕，其下通烟，饮食寝息起居等活动都可以在火炕上完成，颇具特色。金代著名文人赵秉文有《夜卧炕暖诗》，诗云："地炕规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律初回邹"[24]，描写的就是他在中都生活时的情况，而金墓内大多砌有棺床，也许可以看作是当时流行的火炕的写照。

4. 用

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以墓主生前的家居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题材包括日常起居、备餐备饮和文娱活动等，常常采用砖雕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真实而具体地描绘着表现家居生活的日用什物和家具陈设。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当时生活器用方面的物质资料，也能够体会到其反映的生活重心的变化。

（1）日用什物

主要是指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各种器具，比如盛具和小工具等。墓葬壁画因为题材和内容的关系，表现盛具的部分较为突出。按照其用途，可分为盛放食物和盛放饮品的器具，以瓷质为主，还有木、金、银、玉、玻璃、水晶等材质。瓷器当时为盛具的主流品种，辽金墓葬出土的瓷器数量众多，有些精美的瓷器可能来自中原或南方的名窑。墓葬壁画中出现较多的水注、执壶、大盘、碗、碟、盏、罐等，在出土物中也有相应的发现。其中，凤首壶、鸡腿瓶等具有明显契丹特色的器物，在辽金时期的墓葬壁画中也多有出现，说明了当时存在普遍而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木质器具在北方民族中长期流行。前文提到的宋使路振在燕京"副留守之第"赴宴时的所见"文木器盛虏食"[25]，再有宋使孙仅在辽境内受到的款待也是"具蕃汉食味，汉食贮以金器，蕃食贮以木器"[26]。在金墓的"备茶图"中，桌子上的小槌和曲柄小匙应该就是木质的。

（2）家具陈设

主要是指居室内的家具。墓葬壁画中有所表现的有榻、桌、椅、几、箱柜、屏风、衣架、灯檠等等。榻出现于北壁；桌椅表现为一桌二椅或一桌一椅，常出现于侧壁，其上常置直棂窗或破子棂窗。五代隋唐以降，桌椅经历着由低到高的转变，而壁画砖雕彩绘桌椅的形制正是体现了这一变化；灯檠出现于南壁附近，旁有侍女作点灯状；屏风、衣架多用于分隔开画面或表现墓室的布局结构。由于家具多为木质，较难保存，所以出土遗物中并不多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墓葬壁画的图像资料管窥其貌，复原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态。

日用什物和家具陈设形象细致地营造着墓主生前的居住环境，同仿木构砖砌墓室结构一同拟构出了一个独立隔绝于世的自给自足的活动空间，其间恭立侍奉的男侍女婢，照料着墓主的生活起居，餐饮娱乐，反映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对现实生活的迷恋。

二、精神文化生活

墓室壁画属于物的文化。它以图像语言为表达方式，处理着逝者与生者、现实与来世、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既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由观念、信仰、知识、教养等各种文化因素混合而成的人们的思想精神世界的反映。在人们创造墓葬壁画的过程当中，既存在着意的选择和安排，也渗透无意识的表达和流露。这些隐匿在图像背后的有关人的心态、情绪、感情和思想，有助于我们“透物见史”，深刻地了解和复原那段历史。

1. 处世心态

北京所在的地理位置处于华北平原、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几大地理单元的交接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民族、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往来征战、互动融合的前沿阵地。由契丹、女真分别建立起来的辽、金王朝是典型的北方民族政权。会同元年（938）辽太宗从石敬瑭手中接过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为辽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五京之一。在吞并燕云十六州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即辽太宗至辽穆宗执政期间，对于这一地区的争夺不断，直到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宋景德元年），辽宋签订了“澶渊之盟”，和约商议双方以白沟为界分据南北。此后百余年间，辽宋之间基本处于和平相处的状态，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金建国后不久便与宋签订了史称“海上之盟”的盟约，共约灭辽之后宋得燕云十六州之地。宋宣和五年（1123，辽保大三年，金天会元年），依照此约定，金将南京及附近的顺、檀、涿、易、蓟、景6州交给宋。于是，辽南京成了宋的燕山府。但历时不到两年，金天会三年（1125，宋宣和七年）金兵便占领了燕山府，把它更名为南京。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于此，定名中都。不过，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仅维系了60余年，便随着蒙古军南下的铁蹄而被破坏殆尽了。

勾勒出这样一段动荡不安，飘摇不定的历史背景，意在说明这一时期生活在北京地区的汉人，受制于外族统治之下，面对战乱频发、复杂多变的时局，中原汉族处于相对劣势的现实情境下，其心态和观念也因之发生着变化。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随着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北京地区的汉人也接触到不同于中原汉族传统的外族文化，文化间的交流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互动过程，其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尽相同。契丹、女真对中原传统文化仰慕已久，其兼容并蓄、吸纳百川的态度和胸怀，令其毫无顾忌地学习和吸收，大刀阔斧地革新和创造，形成了融会众长、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相比较而言，生活在北京地区的汉人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则显得谨慎缓慢得多，这反映出强势文化与旁落权力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不可调和的心理落差。

从我们所使用的墓葬壁画资料来看，墓主或是有品秩的中层官吏或是地主富户，其中不乏辽金时期的汉族世家大族。应该说，这些人和统治阶层存在着接触互动，对于自身处境的理解和感触应该比常人更加复杂和丰富。处于政权频繁更替，势力此消彼长的社会现实下，这一地区的人们的社会身份不断受到冲击，以致造成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汉人的身份得不到中原统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亦不承认其蕃人的身份，可谓“两边不讨好”，成为处在夹缝之中的边缘人。这些社会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心态日趋内敛，带有一种“避世”情绪，更加关注现实的世俗生活。我们从墓葬壁画中也可有所察觉：本地区的墓葬壁画始终不离墓主的内宅生活，各种题材内容以一定的布局配置与墓葬结构紧密相扣，极力营造出一个安宁平静的理想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墓主“独善其身”，能够不为外界的纷扰所打搅，自愿蜷缩于梁栋之间，封闭于居室之内，过着平淡的生活，寻求内心的宁静。

2. 民间信仰

辽金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各个阶层，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普遍信奉佛教。据史料记载，契丹未建立辽朝之前就开始兴建佛寺[27]，佛教在契丹社会中比较流行。至辽代的势力版图扩展到燕云地区后，受到这里本身崇佛习俗的激发，佛教开始广泛传播，朝野上下的崇佛礼佛之风日益盛行，尤其是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对于佛教的崇奉和推行使这一宗教信仰达到鼎盛时期。金继辽之后兴起，直接受到了辽代崇佛之风的影响，佛教在金代社会中亦盛行不衰。不过，相比较而言，金代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显得较为理性。虽然信佛，但远不及辽人“佞佛”，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有所减弱[28]。因而，才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

从佛教在辽金时期的发展情况来看，崇佛礼佛的佛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墓葬壁画反映的正是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内容。不过，就目前发现来看，北京地区的墓葬壁画尚没有诵经图、备经图等直接描绘墓主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佛事的场景。对此，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和分析这一情况。首先，北京地区辽金墓葬普遍使用火葬葬式。根据《北京考古四十年》[29]统计，在北京地区的辽代墓葬，葬制主要分为土葬和火葬两种，火葬墓约占墓葬总数的40%，而北京地区所见之金墓，绝大多数是火葬墓。一般认为，火葬是佛教信徒往生之后处理肉身的一种方式。佛教在中国盛行后，火葬习俗先是在僧侣中迅速流行，后来为信教民众所广泛接受，一改儒家传统的“死必归土”的埋葬原则。其次，墓幢、墓志等石刻资料记载了不少墓主习佛的内容，比如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王泽墓志》载：“公素重佛乘，淡于权利……闲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而其妻李氏则“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常时唯切于诵□□”，墓主夫妇一个终日诵经，手不释卷；一个日日持戒，烧香拜佛，由此可见佛教在民众中普遍流行的态势。

所以说，可能是考古资料的限制，也可能是当时社会广泛使用火葬、墓幢、墓志等形式来表现墓主的佛教信仰，因此，人们在绘制墓室壁画时，为了高效利用有限的空间，避免重复繁缛的题材，于是“程式化”地选择在墓顶的位置绘制莲花。莲花是佛教中的圣花，在墓葬象征天空的墓顶正中出现，强烈地暗示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所在。这是佛教信仰的一种表现，也说明了佛教思想观念对于人们丧葬观念和丧葬形式的有力影响。

辽金时期的人们性格务实、讲求实际，格外迷恋现实人世生活。虽然处处弥漫着礼佛的青烟，响彻着崇佛的晨钟暮鼓，但是拨开这些浮于表面的雾霾，我们能够看到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在相当程度上是含有现实功用之心的。墓幢、墓志铭中关于修持礼佛的种种记录，墓葬壁画中莲花象征的净土圣境，皆是人们从现实经历中萌生出的解脱人世间烦恼与痛苦的精神依托和心理寄托，希冀破除一切业障，远离六道轮回之苦，祈求永生的宁静与幸福。

3. 丧葬观念

墓葬壁画是墓葬的一部分，它依附于墓葬建筑而存在，墓葬壁画的题材内容及各种表达形式同墓葬结构一起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墓葬壁画又自成系统，它的功能与意义总是从逝者的角度出发，以生者对逝者、对先人的追思和安抚为主题，以血脉传承的感情寄托为中心，体现着当时人们关于时空、生命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实现永恒的终极目的。

由于“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加之社会广泛流行诉诸佛教信仰去往莲花净土世界，因而在营造墓葬时，人们有意地将天地四时的时空观念纳入统一的墓葬结构和表达系统当中，体现了试图把握和顺应宇宙运动和生命规律的意愿。

墓葬壁画中有不少蕴含着时间性的题材内容。比如，人们常把出现在墓门附近的侍女和灯檠的组合称为“侍女点灯”图，但如果我们尝试从另一个角度阐释的话，这静止的动作可能是“点灯”，也有可能是“息灯”。灯檠的出现具有昼夜交替的指向意味，“点灯”之时应是夜幕降临，“息灯”之时应是白昼降临。因此，“侍女点灯”图暗示了“一天”的时间概念。再比如，绘于墓顶下方的十二生肖图，无论是韩佚墓中头顶十二生肖像的文吏，还是赵励墓中瘦可见骨的十二生肖像，都是天干地支的标志，既能够计时也可以纪年，代表着往复循环直至永恒的时间概念。在这些时间符号和时间概念的架构下，墓主依照墓壁所绘日常活动的内容，在逝后的世界中继续生活着。

墓葬壁画中还有不少蕴含着墓葬空间性的题材内容。绘于壁面上的墓葬壁画展现的是同一个平面上的活动，而门、屏风等图像和砖砌的直棂窗、破子棂窗等结构却表达了墓室具有多维结构的空间性。比如，此阶段普遍存在的“妇人启门”图或于墓室北壁

绘制的朱门，都暗含着在此门之后还有建筑物，这与当时“前堂后寝、左右厢房”的民居布局相一致，也是非常巧妙高效地运用了墓室空间，扩展了墓室的活动范围。

对墓葬顶部的营造和设计最能够体现出人们的时空观和丧葬观念，这是由于墓顶常常被赋予“天”或“宇宙”的概念。在墓顶绘制天象图的惯例由来已久，自秦汉至宋辽金历久不衰。《史记・秦本纪》称秦始皇的骊山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30]，也有学者分析过穹隆顶墓室的“象天地”思想以及其中包含的各种传统宗教方术信仰[31]。北京地区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也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墓顶绘制星象，另外还增加了新的时代特征，在墓顶中心镶嵌铜镜，并以此为中心绘制莲花，周遭遍布祥云，间绘飞鹤、十二生肖等。这些图像元素说明了墓顶所呈现的世界不同于墓室四壁表现的现实生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天”或“宇宙”的概念，也暗示了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

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始终不出现墓主的形象，无论是砖雕的桌椅，还是绘制的卧榻都是“空位以待”的状态。造成这种墓主“缺失”是因为辽金时期的人们普遍相信“灵魂不灭”，死亡是生命转化中的一个阶段。同时，“事死如生”的传统观念也促使人们在设计和营造墓葬时，尽可能地为逝者创造和生前一样的条件，满足其在另一个世界里衣、食、住、用等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这样一来，墓室便被赋予了墓主灵魂居所的意义，墓主在这个空间中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墓葬结构和布局同生前的居所形制一致，墓室内有桌、椅、几、凳、屏风、卧榻等家具，男侍女婢操持着各种器用服侍照料着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在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墓葬壁画中有些绘出了墓主端坐宴饮的场面。这种处理方式类似现在的照片，体现了后代对先人的供奉之意。这样的墓室好比一座私人纪念馆，具有对生命历史的追述和记录的意义。而未出现墓主形象的墓葬并不代表墓主不存在。我们能够从空置的家具，男侍女婢的眼神和站位，非常容易地判断出墓主的所在。墓主不以图像的形式被固定于某个画面，而是在被有意安排的空间里，随着时间和具体活动而穿梭于墓室之中，过着同生前别无二致的生活。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之中，墓主不灭的灵魂走向永恒。

从目前掌握的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管窥当时人们在衣、食、住、用等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时代特征。同时，人们在墓葬中精心地设计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幽冥世界中饱含着古代先民对于生活、生命和宇宙的认识和思考，客观上体现了人们的精神思想和信仰观念，揭示出社会风俗变迁和文化交融发展的时代风貌。

注　释

［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J］. 考古，1962（5）.

［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大兴区青云店辽墓［J］. 考古，2004（2）.

［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辽韩佚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84（3）.

[4] 周宇. 丰台云岗辽墓07FHM1发掘简报［C］. 北京考古（第一辑）［A］.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5] 苏天钧. 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63（3）.

[6] 李华，刘保山. 延庆县时尚纺织品有限公司壁画墓发掘报告［J］. 北京文博，2005（3）.

[7] 王清林，周宇. 石景山八角村金赵励墓墓志与壁画［A］. 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C］.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8]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门头沟区文化办公室. 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80（7）. 发掘简报将斋堂壁画墓年代定在辽中晚期，我们通过对墓葬形制、壁画题材内容的比较，认为其年代定在金代为宜.

[9] 东京梦华录・卷九［M］.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7.

[10] 转引自赵永春编注. 奉使辽金行程录［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15.

[11] 契丹国志・卷二七・回鹘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 胡峤. 陷北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年。

[13] 松漠纪闻［M］.

[14] 范石湖集・卷一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5] 王钦臣. 王氏谈录・北虏风物［A］. 全宋笔记（第一编第10册）［C］.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6] 杨復吉. 辽史拾遗补・卷五［M］. 朱彧. 萍洲可谈・卷二・南北食异［A］.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7] 金史・食货四："茶，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 ""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 "

[18] 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19] 辽史・卷三二［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20] 转引自蒋祖怡，张涤云整理. 全辽诗话［M］. 长沙：岳麓书社，1992：302.

[21] 契丹国志・卷二四.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2] 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其人勇悍，……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

[23] 丁利娜. 北京地区金代墓葬概述［J］. 文物春秋，2009（4）.

[24]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5] 路振. 乘轺录.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26]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M］. 景德二年二月癸卯.

[27] 辽史・卷一・太祖纪.（902）"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

[28] 魏婧. 北京地区辽金墓志研究［D］.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2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30] 史记・秦本纪.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1] 赵超. 式、穹隆顶墓室与覆斗形墓志［J］. 文物，1999（5）.

The Social Life in Beijing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Showed on the Grave Mural Painting

He Jing

Abstract: The grave mural painting is a special kind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saves many image data such as the food, clothing, architecture, furniture, etc. shows soci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customs, reflects the social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the meantime, those image materials embody the ideas of people' s spirit and the concept of faith, which are reflecting people' s spiritual world. Based on the mastery of the grave mural painting, we will discus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e in that time.

Key words: Beijing district; grave mural painting; social life

蒙古早期遗存的考古学观察*

魏　坚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北京，100872）

一、序　　言

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以及有关蒙古族源的探讨，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而多数学者认为蒙古的族源应与隋唐时期生活在大兴安岭、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有关。梳理文献记载，室韦之名始见于6世纪中叶的东魏时期，东魏武定二年（544）“夏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1]”此后，室韦就定期派使者向中原的东魏、北齐政权朝见并贡纳贵重的土特产品。[2]《隋书・北狄列传》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3]。据考证，隋代室韦五部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地区。7世纪时，在唐朝的望建河，也即今天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森林草原地带，蒙古族的先民便留下了活动的踪迹，《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4]。蒙兀室韦是唐王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其活动地域西接大室韦，北与落俎室韦隔额尔古纳河相望，东、南与黑水靺鞨为邻。由此可知，蒙古族的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的“蒙兀室韦”。

14世纪伊尔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的著作《史集》提到，当时的蒙古人曾普遍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额尔古涅—昆”[5]，即应是指额尔古纳河，与《旧唐书》记载相符。蒙古人记忆中最远古的历史，保存在《蒙古秘史》中。据记载，7世纪时，成吉思汗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带领着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的密林西迁，渡腾汲思海（腾汲思，当指呼伦湖），到了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今大肯特山）驻牧。

进入大草原的蒙古部，立即卷入了历史的旋涡。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于今北京一带设师州，蒙兀室韦属师州管辖。此后唐又置燕然都护府和瀚海都护府，虽然名称和地望有许多变化，但唐朝对蒙古地区设治的实质没有改变。8世纪中叶以后，蒙古部又先后受回纥和黠嘎斯控制。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促进了蒙古部与周围各部及中原的经济交往，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迅速发展。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批准号：12@ZH014）子课题“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的考古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

当辽代，即10世纪时，蒙古部已经分衍出乞颜部、扎答兰部、泰赤乌部等许多小的部族，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辽阔的草原上游牧。此时，蒙古部之外其他较大的部还有：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南部至锡林郭勒草原北部的是最强的塔塔儿部；在呼伦池东南，贝尔湖至哈拉哈河一带的是翁吉剌部；再往南靠近金长城的是汪古部；色楞格河下游的是蔑儿乞部；叶尼塞河下游的是斡亦剌惕部；蒙古部西南，处于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的是人口众多的克烈部；再往西靠近阿尔泰山的是文化发达的乃蛮部。这些部的出现，就是7世纪以来北方各族进一步交往、融合的结果。到11世纪时，塔塔儿、蒙古、蔑儿乞、翁吉剌、克烈、汪古等部结成以塔塔儿为首的联盟，以反对辽朝的统治。塔塔儿或“鞑靼”曾一度是蒙古草原上各部的通称。

12世纪初，蒙古部属金王朝的东北路招讨使统辖，这时的塔塔儿联盟已经瓦解，蒙古部在合不勒汗（成吉思汗的曾祖父）的领导下，逐渐壮大起来。金朝曾以8万精兵攻打蒙古，连年不能取胜，被迫与蒙古订立合约。直到铁木真起而争雄，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随着铁木真在斡难河畔被各部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族才作为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了。拉施特曾说：“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6]。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蒙古高原的各个游牧民族，都统称为蒙古，并接受成吉思汗的统治。

二、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室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属东胡系统，与鲜卑、契丹相近。在宋、辽、金文献中，他们也被称为“朦骨”“蒙古里”“萌古子”。由于早期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的大兴安岭北端，过着半狩猎、半游牧的氏族社会生活，近年来，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先后发现了几批属于蒙兀室韦的墓群和遗址。同时，在东蒙古草原的克鲁伦河北岸，也发现了蒙古汗国早期的遗存。

（一）西乌珠尔墓群与奇乾乡遗址

墓群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西北约80千米的西乌珠尔附近的一条长约2千米的沙丘台地上。台地西南距呼伦湖65千米，北距额尔古纳河35千米，南距海拉尔河0.5千米，海拉尔河在其西北注入额尔古纳河，这里是历史上蒙兀室韦的活动区域。

由于河水冲刷和长年季风的侵蚀，沙丘逐渐向东北方移动，逐渐暴露出地下的古墓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不断有零星文物出土。1986年和1995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站两次对这处墓地进行了调查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6座墓葬，出土并采集到一批

陶器、铁器、铜器和桦树皮器等随葬品。出土的墓葬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用完整的一根圆木挖凿而成的独木棺。其中一具用圆木挖凿的独木棺（M2），通长约190、宽50～55、高41厘米。棺内侧长约150厘米，棺中葬一成年男性，仰身，下肢弯曲。棺内随葬有马鞍、弓箭及生活用品[7]。

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曾记载蒙古贵族葬俗云："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8]"经^{14}C测定，该木棺的年代约为680年，约当7～8世纪阶段，正是史书记载的蒙兀室韦从额尔古纳河东岸，南迁到呼伦湖附近的过渡时期。据对墓葬出土遗物的判断，死者应当为蒙兀室韦武士。这是目前发现和可以基本认定的最早的蒙古早期遗存。

考古工作者在沿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考古调查中，由南到北在西乌珠尔、黑山头、七卡、室韦镇和奇乾乡等地，还发现了较多的室韦遗存[9]。奇乾乡和室韦镇均位于额尔古纳河东南岸。在奇乾乡一带发现了三处古代聚落遗址，其中的小孤山遗址坐落在奇乾乡东北1千米的小孤山东南坡上，西、北两面为陡崖，东南为额尔古纳河二级台地，在东西长270米，南北宽70米的半山腰上，分布着53个圆形坑穴，每个坑穴的直径在4～10米，文化层厚约70厘米，出土陶片和骨器等遗物。从5号坑穴采集的木炭做了^{14}C测定，其年代为距今910±75年，树轮校正为865±85年[10]。再根据出土的陶片分析，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隋唐，下限不应该晚于金代初年。

《契丹国志》记载宋人记述，辽国"正北至蒙古里国"，而蒙古"南至上京四千余里"[11]。辽上京往西北四千里恰好在呼伦湖以北一带，也即是西乌珠儿附近地方。这就是说，至辽初，蒙古部还没有西迁至肯特山一带，到金朝时才把蒙兀室韦推向西迁，开始了以斡难河为中心的历史。然而，即使蒙古部西迁到肯特山一带，因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岸属金朝修筑的岭北长城之外，在10世纪时，也仍然应该是蒙兀室韦活动的区域。

西乌珠尔古墓群的葬俗和奇乾遗址半地穴式居住址，有别于蒙古之前的鲜卑和契丹同类遗存，应当是属于蒙兀室韦的遗存。但陶器的器形和纹饰则又分别具有鲜卑和契丹的风格，这也许正好说明了蒙兀室韦的渊源所自。

西乌珠尔蒙兀室韦墓群和武士独木棺，以及奇乾乡三处古代蒙兀室韦聚落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谢尔塔拉遗址和墓地

谢尔塔拉遗址和墓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谢尔塔拉镇东约5千米的台地上，西南距海拉尔市区约15千米，南距海拉尔河2千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1997年9～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等，联合对该处

遗址和墓地进行了调查并清理墓葬1座。1998年9～10月进行正式发掘，揭露面积337.5平方米，清理墓葬9座。两次共清理墓葬10座[12]。

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有木质棺具，一般一棺，只有M6为一棺一椁，木椁有盖无底，棺盖由5块较长的木板纵向拼对而成。其中除M5为一座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外，其余均为单人葬。葬式仅M9为俯身屈肢葬，其余都是侧身屈肢葬。

出土的随葬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生活用器，主要有陶罐、壶、桦树皮罐、木盘、木杯、木箸和铁盘等；第二类为生产工具或武器，主要有矛、弓、箭、箭囊和刀等；第三类为马具，主要有马鞍、马衔；第四类为装饰品，主要有金或银鎏金耳坠、银螺旋形饰、铜人面形饰、玻璃珠和绿松石珠等。墓葬有随葬马或羊肩胛骨的习俗。随葬品存在着多寡之分，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差异。

经对谢尔塔拉6座墓葬棺木的^{14}C年代测定，确定该批墓葬的年代为9～10世纪，晚于西乌珠尔墓葬的年代，而与以奇乾乡小孤山聚落遗址为代表的蒙兀室韦遗存年代相当，当属同一考古学文化。该项发掘成果于2006年6月面世，发掘者建议将该类遗存命名为“谢尔塔拉文化”[13]。

（三）阿乌拉嘎遗址

阿乌拉嘎（Avraga）遗址位于蒙古国东部的肯特省德力格尔汗苏木。克鲁伦河在这里由南下转向东流，北岸是其支流阿乌拉嘎河。在蜿蜒南流的阿乌拉格河和克鲁伦河之间，有一处被称作阿拉善・奥哈的山丘，山丘的南麓地势平坦，顺着东北—西南向的等高线，有成排的狭长建筑基址分布于地表，遗址范围长约2000米，宽约500米，海拔在1197～1210米，与山丘的高差在70米左右。这个区域一直就流传着“成吉思汗宫殿（斡耳朵）遗址”的说法，很多的研究者也认为这里是成吉思汗时期的遗存。

这处遗址的调查研究开始于1961年，其后在1966～1968年和1976年又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发掘工作。1992年，日本和蒙古的联合调查团进行了测量。1997年，蒙古国的纳旺先生对其中的第九区进行了发掘。同年，日本的白石典之先生对这处遗址进行了踏查和补充测量，并制作了总平面图。此后，自2000年以来，连续进行了10余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4]。

1. 遗址的布局与年代

从阿乌拉嘎遗址的整体布局来观察，在北侧山丘下还留存有低矮的遗址北墙。在其南部的遗址群中，有一处每边长约30米的方形基址，外侧围有二重长方形的土墙，这是遗址的“中心基址”。这里不见瓦片出土，应当是以帐幕搭顶的。此外，遗址内的主要建筑基址都依等高线，呈弧形分布在中心基址的南侧，成为中心基址南侧的半圆形配置。从那里发现的陶片、铁钉等遗物判断，可能存在有木制的建筑物。在那些单体的建

筑群配置中，有明显的汉地“四合院”式的建筑风格。在一处建筑基址中出土了带绿釉的琉璃瓦，可能是属于政治或宗教性的重要设施，也有可能是身份较高人物的住宅。

这处遗址群可以划分为五个区。

A区：中心基址和周围的建筑基址群，方向为北偏西35° 。

B区：遗址东北部建筑群。遗址内使用砖瓦。北偏西30～45° 。

C区：与B区南侧相接。出土有瓦片和砖。北偏西10° 。

D区：遗址西侧，并排建有12栋“四合院”式的大型建筑，周围还有小的建筑基址。在此前蒙古国学者普日来的调查中，曾发现过铁工房。北偏西20° ～45° 。

E区：遗址西南部，有4间×7间的大型建筑物，基址上留有柱础石的坑穴周围还有小的建筑基址。北偏西20° 。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普日来调查中提到的“熔矿炉”。炼炉为进深3.6米，宽2.3米的圆角长方形，火口为0.9米，其南端是2米×0.4米的前庭。从炉内和前庭出土了较多的铁渣和木炭，附近也出土了铁镞和铸铁锅的残片。情况表明，这个有许多相邻的同样建筑基址存在的区域，一定分段作业的，分别承担着从冶炼到铸造的不同过程。此外，这里没有发现原料产地，可见原料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

在阿乌拉嘎遗址，除了砖瓦之外，还出有产自中原的瓷器、钱币、陶器、铁镞、铁钉、铁锅、铁车轴、簪子、青铜小刀、陶纺轮、石制品和各种动物的烧骨等。

瓷器中有元末至明初的龙泉窑瓷器，大多数是磁州窑系、钧窑系的瓷片。钧窑系的瓷片胎土细腻，色调暗灰，以金代的制品占多数，少量是质地较软的黄灰色胎土的元代产品。磁州窑系的大多是元代的制品。此外，还有一些产地不明的黑釉、褐绿釉长壶和元代的三彩片出土。

钱币有金代的“大定通宝”圜钱，其中有部分背酉钱。

出土的砖，厚约5厘米，同哈剌和林城址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

从出土遗物来判断，这些建筑物除一小部分为元代外，大部分是属于金代后期的，年代在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前半叶之间。

2. 中心基址的年代与性质

在2001～2004年的发掘中，中、日、蒙联合考古队发掘了阿乌拉嘎遗址群北端的“中心基址”。该建筑址外围有两重土墙，现存高约20～50厘米。其中，外墙为长方形，长149米，宽89米；内墙东西长63米。

2001年发掘了中心建筑址，在基址的上层，揭露出一处向南开口的“凸”字形的石砌建筑址。南北长8.3米，南端东西宽12.8米，凸出的部分在北端，南端中部没有墙基。基址内用黄白色黏土夯平，土层厚约20厘米。石砌的墙基高约30厘米，宽约60厘米，用黏土坐浆。堆积内没有发现任何砖瓦等遗物。从其结构来分析，很可能是一处直径在16米左右的大型毡帐建筑。

2002年发掘了基址的下层建筑址。在上层建筑的垫土下30厘米的高度，发现了成排的柱础，柱础之间相距约3.7米。柱础修整不太规整，仅是一块略加修整的石块，大致成不规则方形，上面平整，厚约15厘米。东西有4排，前后有两排，其结构应当是五间三进式。柱础之下垫有厚约30厘米的一层黄白相间的花土，结构紧密，经过夯打，其中含有早期的瓷片和木炭。经^{14}C测定，下层建筑基址的年代为1190～1270年；上层建筑基址的年代为1290～1320或1340～1390年。

通过对发掘现场相互叠压的两个建筑基址的观察，考虑到整个遗址各类遗存不同的年代关系，以及^{14}C测定的年代数据，可以认为该处基址应分属早晚两个时期。其中，下层的早期建筑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最早的宫殿建筑。

对于上层的晚期建筑，目前有两种推测：一种是据《元史・刘敏传》“己丑（1229），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殿。[15]”的记载，推定其可能为被改建后的窝阔台的宫殿。[16]另一种则认为可能与成吉思汗的祭祀陵寝有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第六次征伐西夏的战役中病逝后，北上归葬肯特山起辇谷，这里作为成吉思汗最早的宫殿建筑之地，很可能改建成了成吉思汗的祭祀陵寝。后来这个地方作为供奉成吉思汗和他的夫人孛尔帖及两个弟弟的陵寝，被称做“八白室”，明代晚期又迁在了漠南鄂尔多斯高原的伊金霍洛，即现在的成吉思汗陵。

三、结　语

从额尔古纳河两岸向西到广阔的蒙古高原东部，近年来发现了较多的蒙古早期遗存，这对于探讨蒙古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已经发现的呼伦贝尔西乌珠尔遗址与墓地、奇乾遗址和谢尔塔拉遗址与墓地，以及在蒙古国德力格尔汗苏木的阿乌拉嘎遗址群来看，呼伦贝尔地区发现的蒙古早期遗存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反映出诸多的一致性；蒙古国阿乌拉嘎遗址群中的早期遗存，则可能反映了蒙古汗国早期的历史。目前的主要收获有如下几点：

（1）西乌珠尔墓群的葬俗和奇乾遗址半地穴式居住习俗，有别于该区域此前的鲜卑和契丹同类遗存，但陶器的形态特征则又分别具有鲜卑和契丹的风格，这也许正好说明了蒙兀室韦的源流，故应属于蒙兀室韦的遗存。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论及[17]。这类遗存的年代约为7～8世纪。

（2）谢尔塔拉墓地文化内涵丰富，时代特征鲜明，当属9～10世纪的室韦遗存，为研究呼伦贝尔草原晚唐五代时期的室韦遗存增添了一批科学发掘的考古新资料。谢尔塔拉文化的命名，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

（3）阿乌拉嘎遗址群是目前在蒙古高原北部发现的蒙元时期最大的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基址的下层建筑，很可能是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畔最早的宫殿建筑。该基址的下层建筑，有可能在窝阔台时期改建为新的宫殿，或也可能在成吉思汗归葬肯特山

起辇谷时，改建成了最早的成吉思汗祭祀陵寝，其也许就是后来迁在漠南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的前身。

北方民族考古是一项世界性的学术研究课题，同时也是考古学界多年来关注的热点之一。近年来，东蒙古草原以西乌珠尔墓地、谢尔塔拉墓地和阿乌拉嘎遗址群为代表的蒙古早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在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相信随着北方草原地带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蒙古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以及北方民族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将会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为北方民族的考古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 释

［1］ 魏书·卷一二·孝静纪·第一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07.

［2］ 魏书·卷一二·孝静纪·第一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07，308，311，312.

［3］ 隋书·卷八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82.

［4］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列传第一四九下·北狄［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58.

［5］ 〔波斯〕拉施特.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6.

［6］ 〔波斯〕拉施特.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166.

［7］ a. 白劲松. 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清理简报［J］. 辽海文物学刊，1989（2）.
b.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 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2）.

［8］ ［明］叶子奇. 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59：60.

［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额尔古纳右旗奇乾乡文物普查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601～604.

［1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额尔古纳右旗奇乾乡文物普查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604.

［11］ 契丹国志·卷二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14.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6.

［14］ 〔日〕白石典之. 蒙古帝国史的考古学研究［M］. 东京：同成社，2002：179～194.

［15］ 元史·卷一五三·列传第四〇·刘敏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3610.

［16］ 〔日〕白石典之. 蒙古帝国史的考古学研究［M］. 东京：同成社，2002：194.

［17］ 赵越. 论呼伦贝尔发现的室韦遗迹［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598～600.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Remains of Early Mongolia

Wei Jian

Abstract: The name "Shiwei" first appeared in the 6th century during Eastern Wei period. In the 7th century during Tang Dynasty, Mongolian ancestors left traces of activity in Wang Jian River Basin which is the forest-steppe zone on the south bank of Erguna River today, and Jiutangshu called them "Meng Wu Shiwei". In recent years, archaeologists have discovered a number of remains of Meng Wu Shiwei and the early Mongol Empire, and the related sites include: West Uzhur Site and Cemetery, Qi Qian Site, Cher Tara Site and Cemetery in Argun River Basin (Hulun Buir, China), and Agu Laga Site in Kherlen River Basin (Ao Lun Su Mu, Mongolia). The remains discovered in Hulun Buir of Meng Wu Shiwei reflect much of consistency in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mong them, West Uzhur Site and Cemetery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7th to the 8th century, Cher Tara Site and Cemetery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 the period from the 9th to the 10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remains of Agu Laga Site which locates on the north bank of Kherlen River, may reflect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Mongol Empire.

Key word: Meng Wu Shiwei; Mongolia; the early remains; archaeology

蒙元政权都城的游牧民族特色

——以元大都为重点

李冬楠

（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日照，273165）

蒙元政权曾先后建有四个都城，即哈剌和林、元上都、元中都和元大都。元大都作为蒙元政权入主中原后营建的都城，不论是规整、形制还是具体的营造法式，很多方面都效仿了中原都城的建制，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但由于蒙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其都城营建更体现出许多与中原都城制度不同的特点。对于元大都宫苑的民族特色，具体论述的文章较少[1]。论述者也多是从多文献记载的宫殿样式、宫殿内部装饰等角度简要的提及。本文通过元大都考古勘探、发掘获得的考古资料，以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对于大都城所体现的民族特征从整体布局、宫殿样式、宗教建筑以及宫殿内外装饰四个角度作简要的论述，并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教。

一、都城整体规划受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影响，采取因地制宜，不拘传统的做法

《马可·波罗纪行》记载，哈剌和林“城周围环以土墙，辟四门。东门售粟及种种谷食，然其数不多。西门售绵阳及山羊，南门售牛及车，北门售马。”可见，哈剌和林城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牲畜贸易区域，这正是游牧民族游牧经济、生活方式在蒙元都城文化这个载体上的反映。这种特点元上都也得到了证实，在元上都城外存在发达的关厢遗址，根据考古发掘和元代诗人诗歌的描述，证实东西南北四大关厢不仅面积较大，且功能明确。西关街肆林立，成为商家云集之地，是元上都重要的商业区。东关由于地近皇城，王公贵族和他们的部众在此安放毡帐，等候觐见。元中都从整体规划而言，三重墙垣相套，宫城中以中央大殿为中心左右对称，以及自宫城南门到皇城南门中轴线的设计都充分体现了中原都城制度的特点。但皇城东西北三面用隔墙分成三部分，安放毡帐驻军保卫的做法仍然体现出游牧民族政权都城的特色。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四年春正月，城大都”，因此，以往研究多据此记载认为，元大都兴建于至元四年（1267）。但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于至元元年（1264）二月下令“壬子，修琼华岛”，并于至元五年十月万安宫离宫建成。在琼华岛离宫建设工程进行期间，至元四年四月便开始了太液池东部“宫城”的修建。因此，琼华岛应是大都城最先动工的工程，其次是“宫城”，再次是隆福宫、兴圣宫和外城。但文献同时也记载了至元四年刘秉中辨证方位，规划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之事。对于刘秉忠选定大都中心台和确定南北中轴线之原因，以往的研究多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城市水源等角度出发，探讨中心台选址之原因[2]。除以上原因，本文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出于琼华岛离宫位置的考虑。第一，金中都宫殿区在元初蒙古兵进攻过程中毁弃严重，而其东北部的万宁宫保存较好，在此区域兴建大都城可以利用金代离宫旧有基础。第二，水对于游牧民族有着非寻常的意义，以水域为中心营建都城应该是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的反映。第三，《析津志》载：“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3]。可见，大都城建设的总设计师虽然是刘秉忠，但其设计必须经过忽必烈的圣裁。同时，在汉族文人的思想中，多会把“以王气为主”理解为依据传统的堪舆之学来规划设计。但在蒙古人的思想中，水是他们生命之源，这里的“以王气为主”很可能包涵了规划大都城时以太液池水域为中心的意义。第四，以往的研究在论及大都规划的思想时，多提及刘秉忠深厚的儒学底蕴和对周易之学的精通，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受蒙古族传统怯薛体制的影响，元代的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官员也难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与自觉”[4]。刘秉忠虽然是忽必烈非常倚重的汉族官僚，但他首先是蒙古皇帝的私人奴仆，在设计规划时必然会在不违背其主子意图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

因此，本文认为大都城的规划遵循了两条原则：其一，是作为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统治者——忽必烈和蒙古贵族的需求。统治者的这种选择正是受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影响，是其“逐水而居”的传统习俗的再现[5]。其二，是以刘秉忠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持有者的需求。在这两条原则指导下，也相应产生了两条都城设计的思路：首先，考虑到统治者对琼华岛离宫区的钟爱，以太液池为中心规划皇城的布局，形成了三宫（宫城、兴圣宫和隆福宫）环绕水域分布的格局[6]。其三，在不违背蒙古帝王的意图下，刘秉忠将自己学说和理论应用到都城建设，选定了城市建设的中心台和中轴线。

二、都城中圆形建筑台基和毡帐式宫殿的存在，是游牧民族传统居所形态的再现

据考古资料证实，蒙元时期兴建的四座都城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圆形台基，并有大面积安放毡帐的区域，成为了蒙元政权都城区别于中原汉文化都城的重要特点。哈

剌和林万安宫建筑群中，在万安宫的周围围绕着四座圆形建筑台基，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宫城的正中是万安宫，万安宫的周围建有四座建筑，应是大汗兄弟、诸子和宗王的住宅[7]。对于元上都，考古发掘与探测已经证实其宫城西北角建筑台基最为密集，圆形和方形台基交错分布，且宫城东北角还有一个直径4米的圆形台基。元中都的情况文献记载较少，考古工作者虽然通过外形观察和局部勘测，确认了27处建筑台基，但对26处台基的形状都未予确定[8]，也就不能否认在这些台基中存在圆形台基的可能。

文献记载，元大都宫城内除了按照中原营造法式兴建的汉式建筑，还有按照蒙古旧俗设置的皇家府库、御苑和皇后斡耳朵。斡耳朵是元代蒙古帝王和贵族的毡帐式结构的宫殿，由于元代帝王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在上都度过，因此在上都建有失剌斡耳朵。无独有偶，元朝在大都的兴建过程中，也同样营建了这种传统的居所。大都皇城的隆福宫和兴圣宫都有棕毛殿式的建筑。如在隆福宫西御苑内，“有太子斡耳朵荷叶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间”[9]；棕毛殿用竹子做框架材料，用毛毡覆盖顶部，是一种类似于毡帐的大型穹庐式建筑。这种建筑造型无疑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传统有关。还有一种毡殿，《故宫遗录·北平考》记载，“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壬午，世祖御香殿、毡殿”，“至正十三年十月，撤世祖所立毡殿，改建殿宇”[10]。可见，这种毡殿可能比斡耳朵和棕毛殿结构更加简单，拆卸更为方便，类似于现在蒙古族居住的蒙古包。且大都外城北部也有大面积空白区域，有学者提出是为了安置部族来京朝贡的驼马车乘和毡帐的。可以说，圆形基址和大面积安放毡帐区域的存在，是蒙元四都共同的特点。构成了我国汉族政权都城制度中不见的，圆形建筑与其他形式建筑交错分布，木质建筑与毡帐并存的独特面貌。有学者提出，大汗和王公贵族的这类宫帐式建筑就是为了显示“马上人”的社会地位[11]，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圆形建筑和毡帐的设置既是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习惯在城市生活中的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汉化的过程中尽可能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心理。

三、蒙古政权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宗教建筑多位于都城中显要区域

志费尼曾经这样评价蒙元政权的宗教政策：“因为不信宗教，不尊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12]。在蒙元政权兼容并蓄的宗教方针的影响下，宗教建筑成为了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不鲁克游记》记载，哈剌和林外城“除此两街之外，尚有其他衙署，汗之书记居焉。有各国之偶像祠宇十二所，回教礼拜寺二所，基督教堂一所”[13]。兴元阁碑也记载，从乃马真皇后称制（1242～1245）到元顺帝（1333～1368）的126年时间里，哈剌和林的佛教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蒙古统治者分别于宪宗六年（1256）、至大元年（1311）、至正二年（1342）三次投巨资修缮和林的佛寺，使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14]。考古勘探证实，哈剌和林外城中有很多建筑基址，迄今虽然无法确定其具体性质，但根据文献记载推定其中包括较多的宗教建筑是完全可以的。元上都皇城内庙宇等建筑较多。现在从地表观察，在东西两侧临街巷内可以看到20余处较大的高台之上的官署和庭院遗址，其中包括乾元寺、大龙光华严寺、孔庙等建筑。关于他们的位置，文献有“世祖…首建学庙。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庙于东西”的记载。按八卦方位，乾为西北，艮为东北，这两座佛寺分别位于上都皇城的西北和东北两隅。魏坚老师对乾元寺、华严寺、帝师寺和文庙的位置进行了翔实的考证[15]。考古勘探证实，元中都宫城的东南角和西北角有两组建筑台基，元上都的乾元寺位于皇城的西北角，华严寺位于皇城东北角，宗教建筑位于城内一角的特点非常明显，本文认为元中都宫城中这两处建筑遗址很可能也是宗教建筑，但这还需要将来考古发掘的证实。

就元大都而言，大都城整体规划中，宗教建筑仍然是城市规划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多位于城市中的显要区域。在元朝修建大都城过程中，兴建了几座大型的国立寺院。如至元七年到至元十一年兴建的大护国仁王寺，是为帝师八思巴修建，文献只提到建于高粱河。至元七年由忽必烈皇后建的西镇国寺也是一所重要的寺院，《析津志辑佚・岁纪》记载西镇国寺位于平则门外三里许。有学者推断大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都在白石桥以北，各在桥北的东部和西部，位置几乎相当对称[16]。无论具体位置如何，这两座寺庙位于外城西部是确切无疑了。至元九年（1272），建设的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位于皇城西门和外城西门平则门之间的大道北面的金水河畔。元成宗所建的大天寿万宁寺位于元大都的中心，但相对于皇城位置，却是位于皇城北部积水潭附近。元文宗时期建设的大承天护圣寺位于西郊玉泉山脚下。可见，早期大都城新建的国立寺院都是位于城市的西部或北部，且在湖泊或河流附近，已有学者认识到元代国立寺庙这一分布规律[17]。从整体规划而言，隆福宫（太后宫）与兴圣宫（太子宫）均位于宫城西侧。综合这些因素考虑，大都城的西部相比较于东部确实是更为重要的区域。

四、都城整体色调和宫殿内外装饰尽显游牧民族传统

不同的文化渊源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趋向，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用这种稳定性去抗拒其他民族的影响，以保护、巩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导地位，构成自己的民族

个性[18]。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中原都城建筑物的色彩有着明显的等级限制。《礼记》说："楹，天子丹（红色），诸侯黝（黑色），大夫苍（青色），士黈（黄色）"。按阴阳五行学说，赤色象征喜庆、富贵，所以宫殿的宫墙、檐墙多用红色，宫殿的门、柱、窗全用朱色。从隋朝开始，黄色成为最显贵的代表色，为皇帝专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其他人不得穿着。殿式建筑琉璃瓦全用黄色[19]。与中原汉文化不同，生活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崇尚白色，以白色为吉，他们把白色视为圣洁、吉祥、长寿和善良的象征[20]。据《辍耕录》记载，兴圣宫墙体的色调是以白色为主，即"张白盖帘帷，皆锦绣为之"；《马可波罗纪行》也记载，元大都的所有城垛都是白色，皇宫内的矮墙也是白色。而且，与中原都城制度的殿式建筑全用黄色琉璃瓦不同，元代建筑中大量使用白色琉璃瓦，如兴圣殿"殿宇白玉重阶，朱栏涂金冒楯，覆白瓷瓦，碧琉璃饰其檐，亦极庄严富丽"[21]。对于蒙古族尚白之俗的由来，有学者认为这与蒙古族长期食奶相关，也有学者理解其尚白是其萨满教天神崇拜的结果，是宗教原因造成的[22]。但无论是从长期的生活实践而来，还是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尚白习俗已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审美观念，这种审美观念便在元大都的宫殿和墙体等方面彰显出来。正如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所说，"在这一般性的协调一致之中，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仍然在每个国家也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23]。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市镇中替合罕建造了一座有四扇门的花园……准备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墙上）绘有图画"。离城三里远的山中修造了一座契丹帐殿，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作，而它的帐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它整个覆以白毡，这个地方叫昔剌斡耳朵。关于元上都，《马可·波罗纪行》载："……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基结之，内涂以金，……宫顶之茎，又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而关于元中都文献记载较少，其内外装饰不得而知。可见屋内墙上绘制图画，确是游牧民族居所的传统做法。《故宫遗录》载，"至冬月，大殿则黄鼬皮壁幛，黑貂褥。香阁则银灰皮壁幛"。文思紫檀二殿"通壁皆冒绢素，画以金碧山水"[24]。《辍耕录》也载有，"紫檀殿在大明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檀香木为之，镂花龙涎香，间白玉壁饰，草色髹绿，其皮如地衣"[25]。可见，大都宫殿内壁也同样画以金碧山水，而且更加壮观瑰丽。蒙古族素有用毡习惯，从以上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大都宫殿普遍使用地毯铺地。而且，大明殿内设立帝后并列的座位，在重大庆典时共同接受百官的朝拜，正殿均设御榻，坐床及酒具等也是明显受蒙古族传统习俗影响。

蒙元政权兴建的四座都城，由于兴建时间和背景的不同，使其每个都城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民族特点。以往学者在研究元大都时，往往更多的关注中心台和中轴线的选定，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的建筑，大都外城九横九纵的街道将城市分割成方正规整的坊市等这些我国唐宋以来确立的中原都城制度。但大都皇城的整体规划，宫殿样式、宗教建筑位置的选择以及都城整体色调和宫殿内外的装饰等方面反映的游牧民族传统，同时

也是构成蒙元政权都城制度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元都城建设中诸多游牧民族特色的体现，如果简单的概括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蒙古族在建立政权之前，生活在气候寒冷的我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畜牧是其主要的生活方式，山水环境既是他们长期生活的家园，也是保证生存的重要载体。蒙哥称汗拥戴登极之时，颁布了对于各种生灵、动植物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诏令，充分反映了游牧文明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第二，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游牧业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的特征，使之对大自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且面对巨大的自然力感到的自身力量的渺小，常常使他们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始终融合于自然之中，因而与外部自然界始终保持了天然的和谐关系。可以说，不同于中原汉民族的生活方式，其万物有灵的宗教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使其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热爱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情感。

第三，追求享乐的心理和对原有生活状态的不舍。北方民族政权不仅通过都城建设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还通过城市建设阐发了对自然的情感。其对山水园林环境的建设固然有满足统治者奢侈享乐生活的一面，但也包含了对原有生活状态的不舍和试图维护本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心理。就像有学者认为的那样，“游牧民族经历了从狩猎到游牧、从游牧到定居、从单一畜牧业到多种经营等几次显著的文化选择过程。始终以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主线演绎着生活、艺术，既有自然生态环境决定的结果，也有人的创造性适应，二者相得益彰”[26]。

注　释

[1]　阎崇年. 燕京宫苑的民族特征［J］. 北京社会科学，1992（3）.

[2]　李孝聪先生认为，中心台位于大都城中海拔较高之地，“把一个城市的中心定在较高的位置，以此为生长点向外拓展，是中国王朝时代选址建城的传统之一”. 李孝聪. 历史城市地理［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陈高华先生认为，在太液池上游积水潭东北的地方选定中心台，“适应都市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新兴日用商品行市发展的需要，适应众多都城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的需要”. 陈高华. 元大都［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侯仁之先生认为，“在太液池上游选定中心台，确定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使城市发展取得了丰沛的水源，又为新城的水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侯仁之. 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3）.

[3]　（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 析津志辑佚［M］. 朝堂公宇. 天师宫.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4]　屈文军.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J］. 江海学刊，2004（1）.

［ 5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翠琴指出，元大都在皇家建筑上呈现出多元文化格局，如在宫室建筑中，既大量使用汉地传统的门阙角隅之制，又在后宫的布局方面保留一些纯蒙古式的帐幕建筑，而且以太液池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布局，折射蒙古族“逐水而居”的习俗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元代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特征. 转引自王建伟. 元大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 J ］. 北京社会科学，2009（ 6 ）.

［ 6 ］ 侯仁之先生在三十年前已经提到，“新建大都城的宫城，位于太液池东岸，另在太液池西岸，又分别建了隆福宫（ 南 ）与兴圣宫（ 北 ），三宫鼎立，今日团城所在之处，叫做园坻或称瀛洲，也就是三宫之间通过一带长桥（ 木桥 ）相互联系的中心，或许这里就是当时进行设计的出发点”，但多数学者往往忽略不顾. 侯仁之.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7 ］ 拉施特. 史集［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萨仁毕力格. 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 D ］. 内蒙古大学历史系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

［ 8 ］ 张春长. 元中都考古与初步研究［ D ］.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2000年硕士论文.

［ 9 ］ （ 清 ）魏源. 元史新编・卷七八・礼制・陵寝［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0］ （ 明 ）萧洵撰. 故宫遗录・北平考・卷四［ M ］.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44.

［11］ 〔 苏 〕B. H特卡切夫. 十三世纪的哈剌和林［ J ］.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 1 ）.

［12］ 〔 伊朗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 上册 ）［ M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29.

［13］ 〔 法 〕鲁布鲁克著，何高济译. 鲁布鲁克东行纪［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4］ （ 元 ）许有壬. 至正集・卷四五・勅赐兴元阁碑. 四库全书［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5］ 魏坚. 元上都［ M ］. 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8.

［16］ 王世仁. 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 J ］. 北京文博，2001（ 2 ）.

［17］ 诸葛净. 出世与入世——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与寺院宫观研究［ J ］. 建筑师，2006（ 4 ）.

［18］ 欧军. 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比较［ J ］. 文科教学，1994（ 1 ）. 牛森. 草原文化研究（ 第一辑 ）［ M ］.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

［19］ 蒋小兮，陶振民. 中国古代建筑美学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 J ］. 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学报，1995（ 12 ）.

［20］ 袁翼. 元代宫廷大宴考. 蒙古史研究（ 第八辑 ）［ M ］.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124.

［21］ 袁翼. 元代宫廷大宴考. 蒙古史研究（ 第八辑 ）［ M ］.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125.

［22］ 李自然. 蒙古族尚白原因及表现形式［ J ］. 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 3 ）.

［23］ 〔 法 〕伏尔泰. 论史诗. 西方文论选［ 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4］ （ 明 ）萧洵. 故宫遗录［ M ］. 74页.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25］（元）陶宗仪. 辍耕录・宫阙制度・卷二一. 四库全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6］吴琼，周亚成. 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J］. 西北民族研究，2001（4）.

Nomadic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 Regime Capitals: Focus on Dadu

Li Dongnan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Central Plains capitals, previous scholars always use the minority capitals as reference. But we should note that on one hand the capitals of the minority regime show the trend to emulate the capitals of the Central Plains, on the other hand minority capitals have strong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areas such as overall planning, styling, interior and exterior decoration and religious buildings orientation, Dadu differs a lot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apitals. 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achievement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nomad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gol Regime capitals.

Key words: Mongol regime; capital; nomads; Dadu

内蒙古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壁画观察

李雨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内蒙古阿尔寨石窟[1]以特色鲜明的回鹘蒙古文榜题及藏传佛教壁画闻名，是研究草原文明、蒙古族历史、藏传佛教的重要遗存。近二、三十年来，经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艺术学及佛教研究的深入，阿尔寨石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第28、31窟是壁画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拟将28、31窟的两幅供养人壁画作为切入点，进而观察两个洞窟壁画的特点，推测壁画绘制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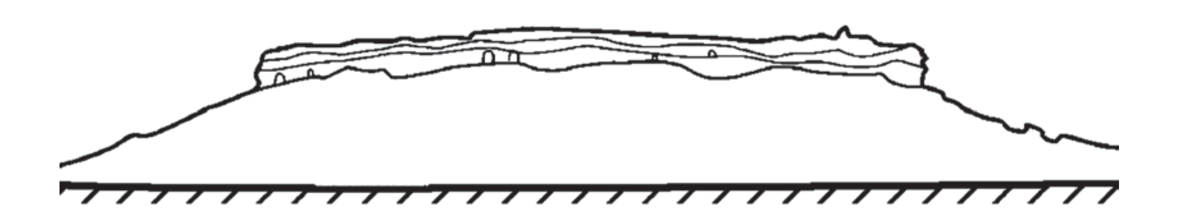
一、阿尔寨石窟保存现状及研究概况

1. 阿尔寨石窟保存现状

阿尔寨石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部鄂托克旗境内的阿尔巴斯苏木（图一），开凿于一座约80米高的孤立的红色砂岩山上。洞窟集中于石山上部，呈明显的三层分布（图二），其中南面较密集。由于山体石质疏松，石窟整体风化严重，加之多次人为、自然破坏，石窟外观很难复原，部分洞窟坍塌或被沙土掩埋。今年来已发现洞窟



图一　阿尔寨石窟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二　阿尔寨石窟山体结构示意图

数目至67个，其中较完整43座；岩壁浮雕塔26座，山顶建筑遗迹6座，蒙古包基址2座，此外，山坡上也散落有若干建筑残件。

目前发现的洞窟规模可划分为大、中、小有三种，面积分别约为30、20、10平方米。大型洞窟1个，已坍塌，应为石窟南壁主窟。中型洞窟平面形制呈正方形，在前壁正中位置开拱形或长方形窟门。小型洞窟中无佛龛，蒙古文榜题、壁画比较集中，部分窟中有僧床，应该为僧侣生活场所。阿尔寨石窟保存状况较差，已无完整的塑像，大部分壁画漫涣或剥落，但以第32窟中的回鹘蒙古文榜题、第28与31窟中的藏传佛教壁画为代表的遗存，仍然保留了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2. 有关阿尔寨石窟的废弃年代与第28、31窟壁画研究的学术回顾

20世纪70年代末，内蒙古考古所田广金先生对石窟进行了考察与测绘，并于1981年发表了简报《百眼窑[2]石窟》，判断阿尔寨石窟的开凿年代可能为元代或稍晚些[3]。1989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哈斯额尔敦先生带队对第32窟现存的50余首（条）回鹘蒙古文榜题进行了首次考察，随后发表《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概述》，指出这些回鹘蒙古文榜题可能为元末明初的产物[4]。1991年，丹森、布仁巴图、巴图吉日嘎拉等先生发表了《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遗址概述》，认为阿尔寨石窟可能始建于西夏时期或者更早，最晚的工程也许结束于北元阿勒坦汗在位时期，即1431年前后。又依阿尔寨石窟在晚期主要地方史志、佛教文献中未有记载，进而判断在16世纪时，石窟可能已经成为废墟[5]。

1994年，王大方、巴图吉日嘎拉、张文芳作《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之活动》一文，将阿尔寨石窟的建造年代分为北魏、西夏、蒙元、明代四期。同时，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山顶寺庙具有祭祀与礼佛双重功能，并在元代时逐渐取代洞窟成为礼佛重点场所，可能于明代毁坏。文章又分析了第28窟中南壁的供养人壁画，考证其为成吉思汗家族，认为第28窟是为祭祀成吉思汗的洞窟[6]。

2004年，仁钦道尔吉先生发表《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废弃年代考》，根据

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说，认为阿尔寨石窟在1632年时被战败西迁的林丹汗所毁[7]。

2005年，巴图吉日嘎拉、杨海英先生完成《阿尔寨石窟——成吉思汗的佛教纪念堂兴衰史》一书，该书列举大量材料表明阿尔寨石窟与黄金家族有密切关系，证明第28窟南壁供养人原型为成吉思汗家族，第31窟南壁供养人原型为忽必烈汗家族，并认为阿尔寨石窟不应是许多文献中所记被林丹汗所毁，而应是在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时，因藏传佛教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斗争而衰落[8]。

2006年，汤晓芳先生发表《阿尔寨石窟的密宗壁画及其年代》，同年，又与陈育宁先生发表《阿尔寨石窟男女双身佛探析》。两篇文章观点基本相同，认为第28、31窟壁画有明显的西夏绘画风格，应属西夏时期作品，因此具有藏密艺术风格的绘画进入阿尔寨石窟的最早年代应为西夏中晚期[9][10]。

2006年，罗文华先生作《“阿尔寨石窟学术研讨会”述评》，其中指出，位于阿尔寨石窟第28窟南壁供养人壁画中心的男性，戴藏传佛教密教法事时高僧所戴五叶冠、身着世俗装束，应表示他集世俗权贵与高级宗教身份于一身，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其身份。而比照洞窟内其他壁画，这幅供养人图应绘于18世纪。第31窟南壁供养人壁画，同样缺乏足够证据证明人物身份，又因洞窟其他位置壁画主要描绘了格鲁派僧人，说明该窟壁画为16世纪后期格鲁派占藏传佛教主导地位后的作品[11]。

2009年，陈育宁、汤晓芳二位先生发表《阿尔寨石窟第31窟毗沙门天王变相图释读》，认为洞窟南壁的毗沙门天王王尊像有集财神与战神为一体，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神的信仰和对财富的追求，东壁的上师说法图在于弘扬藏传佛教，该壁画应是蒙元时期作品[12]。

2010年，李少兵、索秀芬在《阿尔寨石窟》一文中提及，在阿尔寨石窟第31、32窟壁画空白处，标有蒙古语“不涂颜料”“无色”“空白”“青”“蓝”等字样，文章认为，这反映出构思和制作壁画的人通晓蒙古语并用蒙古语作为交流语言[13]。

2010年，奇・斯钦先生作《阿尔寨石窟部分壁画的绘制年代与个性化特点》一文，认为部分壁画应绘于北元时期。该文指出，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所依据的文献创作年代和翻译年代是15、16世纪，而在题写在墙壁上的年代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这些蒙古文同样保留了后期蒙古文的特点。据此，该文认为阿尔寨石窟的兴建年代始于北魏或西夏，到北元时被藏族喇嘛和蒙古人再度利用，具体时间很可能从二世迪鲁瓦活佛巴道尔吉建造寺庙到林丹汗摧毁阿尔寨石窟的几十年间[14]。

参照以往研究成果，我们发现，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向后推延，最迟可至18世纪。但是，由于有关阿尔寨石窟的历史记载较少，目前研究也只能通过人物服饰、绘画风格、其他壁画内容，并结合榜题进行推断。我们认为，在现有研究条件下，以壁画局部为切入点，客观面对壁画本身，或将对认识壁画有所帮助。

二、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壁画观察

1. 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壁画概况

第28窟属于阿尔寨石窟中的中型洞窟，是比较典型的中心柱窟。第28窟壁画整体毁坏严重，但东壁与西壁的藏密金刚与大成就者图、南壁右侧的毗沙门天与供养人图保存相对较好。东壁壁画可分为两层，上半层现存藏密金刚像7幅，下半层绘十余身背景为雪山的大成就者，残存壁画较清晰，内容能识别。西壁壁画结构与东壁对应，上半层现存较完整的藏密金刚像6幅，下半层大面积剥落，仅有少数人物残像。南壁右侧绘有毗沙门天、弥勒与供养人。其中，供养人壁画部分长约120厘米，宽约50厘米，中心台座上绘8人，前有供桌，上方似有牺牲，台座的左、右、下方有3组人物，共约50人，多为男性，呈盘腿坐、支左腿坐、站姿等（图三，1）。

第31窟同样为中型洞窟，平面形制方形，壁画保存情况较28窟为佳，四壁都有壁画保留，虽然部分漫涣，但基本内容能识别。洞窟正壁为佛龛，左右绘有两尊侍立菩萨。东壁壁画保存较完整，左侧为十一面千手观音，下方为僧人辩法图，四周绘方格构图的观音救难故事，每一方格中以观音为中心，描绘一佛教典故。东壁右侧绘忿怒莲师，下方为僧人礼佛图，礼佛图中共约50人，分组列队立于山峦中。西壁左侧绘马头明王，但仅有草稿，未敷色。右侧为长方格构图的六道轮回图，每一格中描绘一场景，多为人物、建筑与自然景观。南壁左侧以毗沙门天居中，上绘不动明王，周围为八夜叉，毗沙门天下方绘有20余人的讲经场面，另有马匹若干。南壁右侧为宝帐怙主与八大寒林图（图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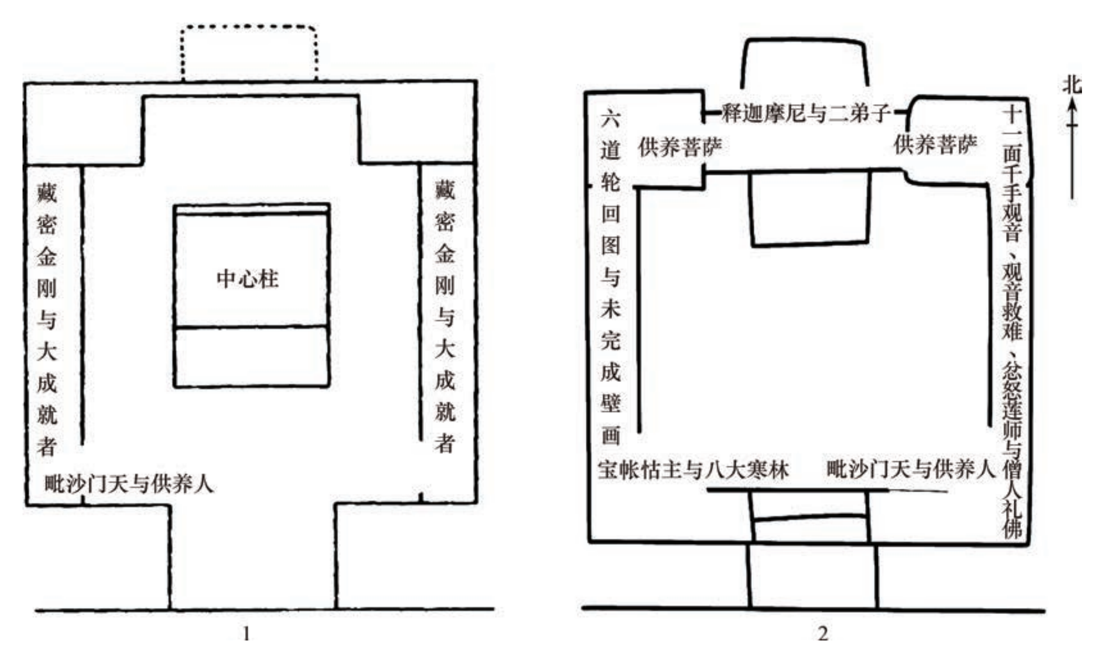
2. 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南壁壁画试析

我们以讨论比较集中的分属第28、31窟的两幅供养人壁画作为切入点。

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对第28、31窟中供养人的身份已作过很多讨论，一般认为，这两幅壁画中的人物应为与藏传佛教有密切联系的上层社会家族，但壁画究竟指代哪些历史人物尚无定论，有些研究明确这些人物为成吉思汗、忽必烈汗或阿勒坦汗家族[15]，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下，不应对壁画人物进行生硬推测[16]。我们暂将这些人物身份定为供养人。

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南壁供养人指示了某些上层社会家族的可能性非常大，理由如下：

第一，阿尔寨石窟地处内蒙古草原地区，与历史上生活在该地区的蒙古族很容易产生联系。阿尔寨石窟壁画中频繁出现的体现草原特征的壁画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在洞窟中出现某些蒙古贵族符合情理。



图三　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重点壁画分布示意图

1. 第28窟重点壁画分布示意图　2. 第31窟重点壁画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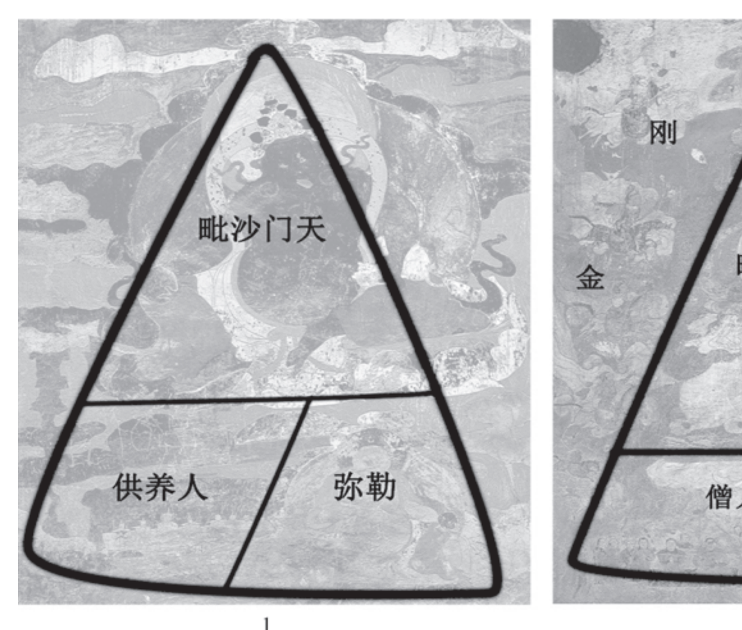
第二，第28、31窟壁画主要以藏传佛教题材为主，那么，这两组供养人应与藏传佛教有一定关联。通过历史材料找到与藏传佛教相关的蒙古族上层人物，进而限定其身份有很大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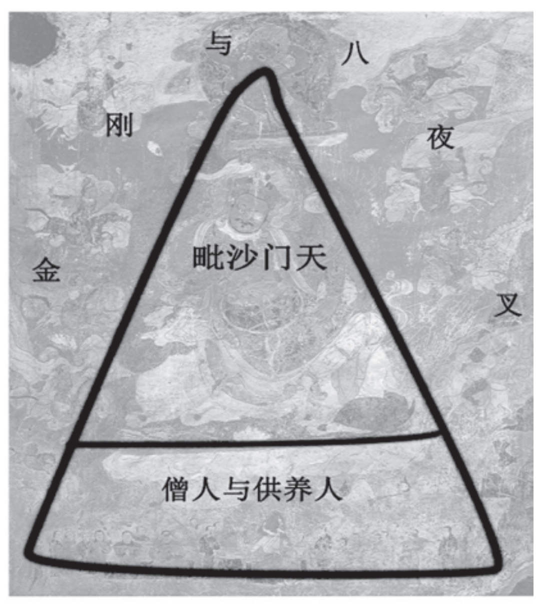
第三，阿尔寨石窟一带流传着很多有关于蒙古黄金家族的传说，其中以成吉思汗西的传说最盛，这些也能成为研究阿尔寨石窟的线索，对推断第28、31窟南壁供养人身份有一定作用。

但是，我们认为以上条件虽然对判断这些供养人身份有一定影响，然而，通过观察壁画，我们又发现如下问题：

首先，从第28、31窟供养人壁画的方位看，两幅壁画处于洞窟中的次要地位。在洞窟中，这两幅壁画分别位于两个洞窟的南壁位置；从所处壁面看，都位于底端部分（图四，1、2）。如果判断这些供养人原型为成吉思汗、忽必烈汗或阿勒坦汗家族，我们很难相信以蒙古族习惯他们会将民族英雄人物绘在这样的弱势位置，参考内蒙古美岱召壁画，世俗贵族形态庞大，地位明显高于四周僧侣。而若假设这些供养人是以上黄金家族成员，那也可能是绘于蒙古族势力较弱的时期，或者这些壁画并不是蒙古人所绘。简言之，这两个洞窟中的供养人地位与黄金家族的社会地位并不对等。

其次，从第28、31窟供养人壁画绘制的特点看，相比于周围其他内容，两幅供养人壁画勾勒比较粗略。特别是第28窟南壁供养人，除少数人物外，其余大部分面部并无绘制过五官的痕迹，有些人物侧面像无轮廓起伏变化，仅用圆滑单线表示；人物姿态虽





1　　2

图四　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南壁供养人壁画位置示意图

1. 第28窟南壁右侧壁画内容分布示意图　2. 第31窟南壁左侧壁画内容分布示意图

然清晰，但手指、衣饰等并未仔细刻画（图五，1）。但是，大部分人物虽并未敷色却墨线清晰，说明现今第28窟供养人壁画保留了绘制之初的情形，即是以勾线为主要技法的对人物的简易描绘。第31窟南壁供养人虽然比较于28窟精致，但就同窟其他壁画而言仍显简略（图五，2）。结合两幅供养人壁画在洞窟中方位，我们能进一步明确它们在各自洞窟中为从属的、次要的地位。

再次，一般认为，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中的南壁供养人所着衣物多有“云肩”，与早期蒙古族服饰不同，是判断供养人壁画年代应为明、清时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个根据有待充实。在早期的蒙古贵族画像中，一些典型的元代遗存表示，贵族男女多穿对襟长袍，无肩饰，妇女头戴固姑冠（图六，1），与美岱召中所绘土默特部蒙古贵族形象（图六，2）、八白宫中所绘蒙古贵族形象（图六，3）有明显不同。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阿尔寨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披戴的这种“云肩”，形态似硬厚而并不贴服，有边缘明显凸出身体的肩饰；头饰上，供养人帽饰比较坚挺，不同于美岱召壁画中的帽饰，也不及八白宫中蒙古贵族帽饰样细长（图六，4）。在晚期资料中，我们发现清代和当今的青海蒙古族服饰（图六，5、6）与阿尔寨石窟中的供养人服饰也很接近，但它们之间的联系需要更多实物资料证明。通过观察蒙古族各部落服饰，我们猜测阿尔寨石窟中供养人服饰也许是流行在阿尔寨地区的一种特殊类型。

另外的一点也值得注意，就是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中的一些形象汉化比较明显，而一些形象则带有西域民族特征。如第31窟东壁中的观音（图七，1）、第28窟南



1



2

图五　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南壁供养人壁画中心人物
1. 第28窟南壁右侧供养人壁画中心人物　2. 第31窟南壁左侧供养人壁画中心人物

壁右侧毗沙门天（图七，2），颅圆、额宽、面阔、长细目，是比较典型的中原绘画特点。同样，美岱召壁画中的蒙古人形象，也具有这类典型特征（图七，5）。而第31窟中诸多男子面部具有窄颅、折眉、杏眼、尖鼻、卷胡、钩颔等特点（图七，3、4），这些特点与以往壁画中西域人形象相似，至少和前文所述蒙古人形象不同。那么，这是否暗示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壁画的绘制与这些具有西域民族形象特征的人们有关？活跃在晚期阿尔寨石窟中的是否是这些人？目前尚未有相关证据，但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继续深入关注这些问题。

此外，从壁画绘制技法看，第28、31窟壁画实际上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由于阿尔寨石窟整体保存状况不佳，保存下的壁画也大多人为刮划严重、大面积漫涣，致使很难看清线条和色彩。但是仔细观察壁画可知，第28窟壁画线条简洁明确，填色饱满；第31窟壁画则具有更多现象，第一，画面整体不精致，比照北京法海寺和内蒙古美岱召壁画（图八，1、2），便知阿尔寨石窟壁画人物形态并不明确，线条杂乱，常是同一位置反复勾勒（图八，5）。产生这种情况，可能因为上层颜料剥落露出下层墨线底稿所致，也可能因为敷色尚未完成，许多草稿线条尚未用颜料覆盖。类似情况也是石窟壁画中常见情况，如榆林窟第4窟中的高僧像，右臂位置便能见到淡墨草稿（图八，3）。不



图六　不同时期几种典型蒙古族服饰

1.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元代大威德曼陀罗缂丝中的蒙古族贵族形象　2. 美岱召壁画中约晚明至清代期间所绘土默特部蒙古族贵族妇女形象　3. 八白宫中清代所绘蒙古族贵族形象　4. 阿尔寨石窟第28窟南壁右侧供养人形象　5. 晚清照片中的青海地区蒙古族妇女形象　6. 当今青海蒙古族妇女发式



图七　阿尔寨石窟、美岱召壁画中的人物面部特征比较

1. 阿尔寨石窟第31窟东壁观音救难图中观音形象　2.阿尔寨石窟第28窟南壁右侧毗沙门天形象　3. 阿尔寨石窟第31窟南壁左侧供养人中男子形象　4.阿尔寨石窟第31窟东壁观音救难图与高僧讲法图中男子形象　5.美岱召壁画中人物形象



图八　北京法海寺、内蒙古美岱召、甘肃榆林窟壁画与阿尔寨石窟壁画比较

1. 北京法海寺壁画水月观音局部　2. 内蒙古美岱召壁画局部　3. 甘肃榆林窟第4窟高僧像局部

4～7. 阿尔寨石窟第31窟壁画局部

过相比较于榆林窟高僧像，第31窟中这种反复修改现象更为严重；第二，虽然画面比较凌乱，但是笔法纯熟，线条粗细均匀、极为流畅，基本属于“高古游丝描”（图八，4、6、7），显示出了高超的技术水平，且比美岱召中线条为细，与法海寺中的精细技法更近；第三，色调清淡，以青、绿、白等色为主，但局部标有如“不涂颜料”“无

色”“空白”“青”“蓝”等蒙文字样[17]，而有些壁面则是大面积的墨线草图。因此，我们认为，阿尔寨石窟第31窟壁画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它没有能最终完成，如果完成的话，画面最终效果应和法海寺壁画类似；第四，东壁绘有服饰明显不同的各派僧人和各族官员，具体指代哪些派别还需继续研究，但从画面布局和场景气氛看，应在免回各派别、各民族间的和平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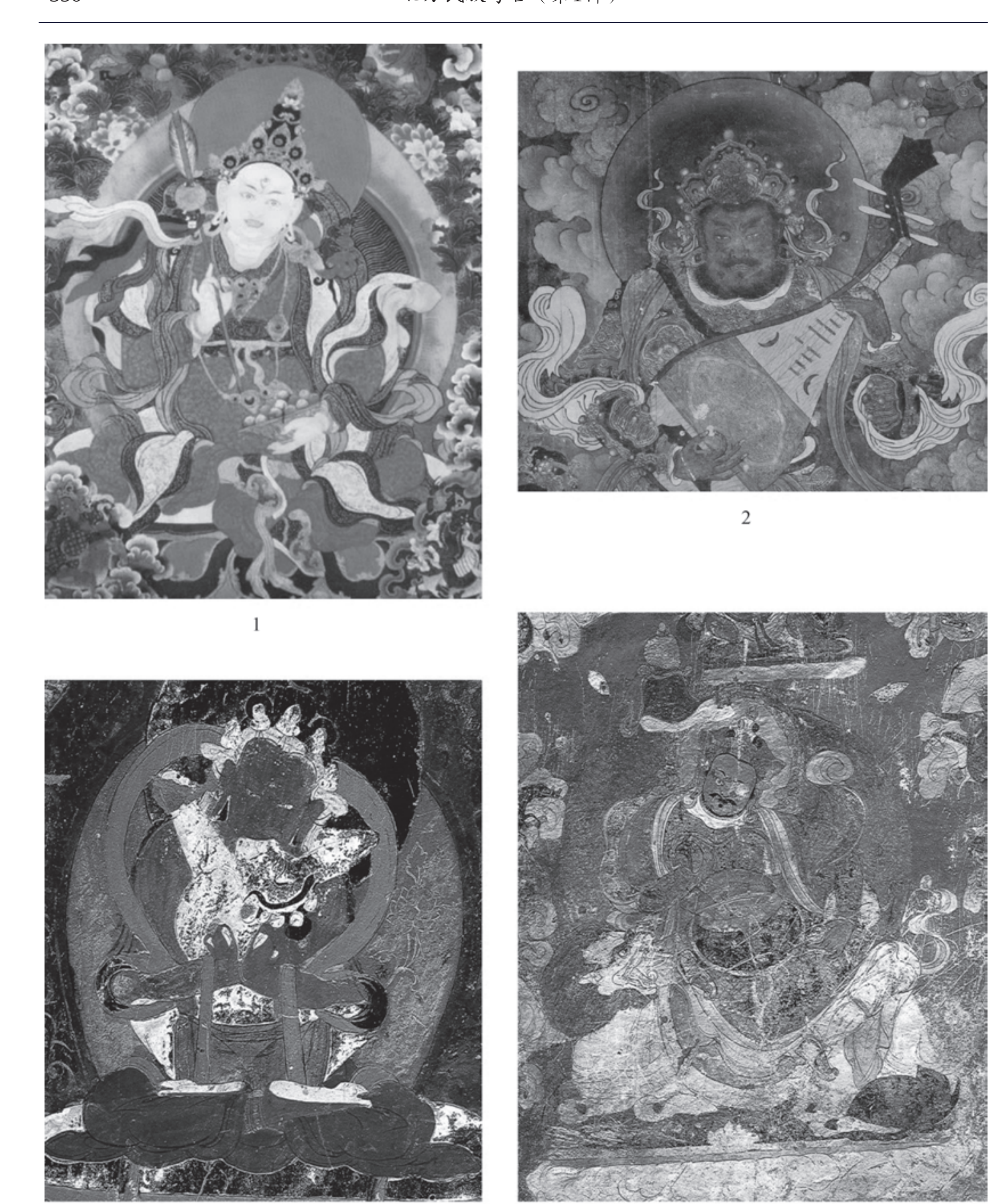
另外，第28、31窟还共有一些特点，即虽然画面内容多为藏传佛教题材，但特征上与西藏本地同题材差异很大。藏地神祇形象中普遍狞厉的面部特征基本不见，身体姿态也不似藏地形象中那样有明显的南亚风格，而是姿态柔和、动作松弛。色彩方面，色调比较沉稳，与西藏地区对比鲜明的形式不同，而是整体趋向于以北京法海寺壁画为代表的色彩间比较微妙的汉地风格（图九）。

三、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壁画的历史联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壁画反映出了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社会形态或历史事件。因为无论从石窟壁画整体风格还是供养人服饰角度看，这两个洞窟的绘制年代都不可能早于元代，而且，由于关于阿尔寨石窟的文献记载较少且都是晚出文献，真实性有待商榷，因此，借鉴元以来的和藏传佛教有关的历史宏观趋势比较实际。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统一了北方广大草原地区。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继承汗位，建元“中统”，又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有元一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皇室成员的宗教信仰也比较多样，而往往又是同一汗信仰、支持多个宗教，成吉思汗还曾言“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18]。就佛教而言，成吉思汗曾非常留意汉传佛教禅宗僧人，推崇临济宗大德中观沼公与其弟子海云印简禅师，而海云印简禅师的弟子刘秉忠后成为忽必烈近臣。在蒙古汗国时期和元代早期，汉传佛教非常兴盛。自忽必烈汗起，藏传佛教开始收到空前尊崇，萨迦派高僧八思巴被奉为帝师，自此，萨迦派中有14位高僧先后成为帝师，可汗在即位前都要收到帝师的灌顶、受戒。同时，噶玛噶举派、蔡巴噶举派、帕竹噶举派等也比较活跃[19]。

1368年，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北撤至蒙古高原，史称“北元”。这一时期中，蒙古地区仍然有藏区高僧活动。15世纪时，土默特蒙古达延汗与夫人满都海彻辰重新统一蒙古各部，蒙古族复兴。随后，其孙阿勒坦汗于16世纪30年代初向青海扩张，于1532年、1534～1535年、1543～1544年、1558年与其兄先后四次进入青海、甘肃。16世纪中叶，明朝与蒙古关系逐渐缓和。明隆庆五年（1571年），阿勒坦汗于边镇得胜堡接受明朝所封“顺义王”称号，“隆庆议和”，开始了数十年蒙古与明朝和平互市[20]。《阿勒坦汗传》中，记述蒙古与明朝的和平环境出现后后，阿勒坦汗欲“将尊八思巴喇



图九　西藏布达拉宫、北京法海寺与阿尔寨石窟的典型壁画比较

1. 布达拉宫晚期壁画　2.法海寺明代壁画　3. 阿尔寨石窟第28窟藏密金刚　4. 阿尔寨石窟第31窟毗沙门天

嘛、薛禅汗二人所建，无比之经教世政怀念向往”，弘扬佛法。期间，西藏阿兴喇嘛为阿勒坦汗讲述佛法，称其为忽必烈汗转世，劝导阿勒坦汗摒弃传统信仰萨满教而皈依佛教[21]。1578年，阿勒坦汗于青海湖畔迎请格鲁派活佛索南嘉，索南嘉措将阿勒坦汗称

为忽必烈汗的化身，赠其“梵天大力咱克喇瓦尔迪法王”，阿勒坦汗则将索南嘉措称作帝师八思巴的化身[22]，赠“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与金印[23]，成为三世达赖喇嘛。自此，蒙古政权与藏传佛教紧密结合，藏传佛教再次于蒙古地区兴盛，而格鲁派至今仍在藏传佛教中占主导地位。

可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两次繁盛都与蒙古政权联系紧密，忽必烈汗与阿勒坦汗成为直接推动者。似乎将两位大汗家族作为两幅供养人壁画原型合乎情理。但是，证据仍不充分。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关证据能证明阿尔寨石窟的准确开凿年代，对它的衰落原因也不能肯定，在石窟营造期间，也没有证据表示过有哪位大汗有关。如前文论证，两幅供养人壁画在洞窟中是处于次要地位的，至多解释为在蒙古势力较弱的时期内，僧人或当地居民为纪念他们的功绩而将其画像绘于窟内。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阿尔寨石窟保存状况不佳，我们不确定在已经毁坏的其他洞窟中，是否也曾绘有这样的供养人家族。实际上，蒙古族中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众多，黄金家族中自成吉思汗时期起，便有多位成员与藏传佛教关系甚密，至阿勒坦汗以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大盛，必然有更多的贵族与其产生联系，他们都有出现在壁画中的可能性。也许，正是因为目前仅存两组供养人，我们才将它们向对藏传佛教贡献最大的两位大汗靠拢。

因此，本文有如下结论：

第一，阿尔寨石窟第28、31窟的两幅供养人壁画处于洞窟壁画的次要位置，两幅供养人壁画不是主要祭祀对象。

第二，第28、31窟壁画显示出了很高的绘画技术水平，第31窟壁画尚未完成，中断绘制或因为突发事件。

第三，根据两个洞窟中供养人壁画的特点、藏传佛教壁画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两个洞窟壁画绘于藏传佛教兴盛、但蒙古族势力逐渐弱于其他民族的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之间。

据此，我们认为尚有以下方面需要做更多研究，如阿尔寨石窟更多洞窟壁画的发现和整理、藏传佛教历史与等传播研究、地方文献史料的研究；针对第28、31窟壁画，我们又需要分析壁面层次和成分，判断是否有局部重绘的迹象，以及需要对蒙古族服饰、藏传佛教各派服饰等进行更细致研究，以便开展更严密论证。

注　释

[1] 在阿尔寨地区被称作“阿尔寨”的山冈共有三座，分别为苏美图阿尔寨、伊克阿尔寨和巴嘎阿尔寨，汉语意思分别为“有庙的阿尔寨”“大阿尔寨”与“小阿尔寨”，其中苏美图阿尔寨即为通常讲的阿尔寨石窟，伊克阿尔寨与巴嘎阿尔寨也保存了一些遗迹。本文研究对象为苏美图阿尔寨.

[2] 阿尔寨石窟自20世纪中叶以来，常被称为“百眼窑”，在八九十年代的相关研究中，也多采

用“百眼窑”这个名称。2003年，阿尔寨石窟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尔寨石窟”一名被正式确定.

［3］ 田广金. 百眼窑石窟［A］. 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C］. 1981.

［4］ 哈斯额尔敦，嘎日迪. 阿尔寨石窟回鹘蒙古文榜题概述［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

［5］ 丹森，布仁巴图，巴图吉日嘎拉. 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遗址概述［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3）.

［6］ 王大方，巴图吉日嘎拉，张文芳. 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百眼窑地区之活动［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C］，1994.

［7］ 仁钦道尔吉. 阿尔寨石窟传说及其名称、废弃年代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4（2）.

［8］ 巴图吉日嘎拉，杨海英. 阿尔寨石窟——成吉思汗的佛教纪念堂兴衰史［M］. 日本：風響社，2005.

［9］ 汤晓芳. 阿尔寨石窟的密宗壁画及其年代［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10］ 陈育宁，汤晓芳. 阿尔寨石窟男女双身佛像探析［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4）.

［11］ 罗文华. “阿尔寨石窟学术研讨会”述评［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6）.

［12］ 陈育宁，汤晓芳. 阿尔寨石窟第31窟毗沙门天王变相图释读［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3）.

［13］ 李少兵，索秀芬. 阿尔寨石窟［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2）.

［14］ 奇・斯钦. 阿尔寨石窟部分壁画的绘制年代和个性化特点［J］. 前沿，2010（23）.

［15］ 持第28、31窟南壁供养人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汗家族为观点的主要以巴图吉日嘎拉，杨海英的《阿尔寨石窟——成吉思汗的佛教纪念堂兴衰史》（日本：風響社，2005）一书为代表，该书中对此观点有详细论证，诸多研究阿尔寨石窟的学者也持相同观点，在前沿，2010（23）. 奇・斯钦的《阿尔寨石窟部分壁画的绘制年代和个性化特点》一文中，提及现研究认为第31窟南壁供养人指代阿拉坦汗家族.

［16］ 罗文华. “阿尔寨石窟学术研讨会”述评［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128）.

［17］ 李少兵，索秀芬. 阿尔寨石窟［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2）.

［18］ 任宜敏. 中国佛教史・元代［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19］ 任宜敏. 中国佛教史・元代［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9、190～204.

［20］ 乔吉. 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8.

［21］ 乔吉. 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8、9.

［22］ 乔吉. 蒙古佛教史——北元时期（1368～1634）［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60、61.
［23］ 唐吉思. 藏传佛教与蒙古族文化［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54～56.

Observation on the Murals of Cave 28th and 31th of Arjar Temple Grottos in Inner Mongolia

Li Yumeng

Abstract: Arjar Temple Grottos Frescoesre flects the extensive connection between Mongolian history and Tibetan Buddhism history. The Donators’ images in Cave 28 and 31 are the keys to the study of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Donators’ images, the Donors’ clothing and the frescoescharacteristics, to remind theresearcher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a number of factors when studying the Donors’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determinesthat the two images were drawn in the 16th century or later.

Key words: Arjar Temple Grottos; mongolian history; donator’s image; frescoes study

入关后清代宗室王公茔地分布情况的初步考察

张利芳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清代是一个由满洲女真族上层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其政权的建设可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国算起。明天启六年（1626），皇太极继承汗位，崇祯九年（1636），改元称帝。天聪八年（1653），皇太极将国号“大金”改为“大清”。 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定鼎北京。此后，开始了她对中国长达200多年的统治。

入关之前，宗室成员去世后主要集中埋葬在辽阳城东的阳鲁山一带，今属辽阳市太子河区东京陵乡东京陵村。入关后，定居北京，据目前所知，未有再葬回关外的情况。

清朝早在入关前就已经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入关后，接受的程度越来越深。在丧葬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在墓位排列上接受了汉族传统的宗法思想，即遵照昭穆原则安排墓位。入关前，父母兄弟卒后葬在一起，入关后越来越注重宗法观念，别大宗小宗。只有同一宗派的继承人才能与其先祖同葬一处，别昭穆而葬。

一、清代宗室王公茔地在北京各区县的分布情况

据调查所知，清代宗室王公茔地在北京市各区县，除大兴区和延庆县外均有分布。为了一目了然地反映清代宗室王公茔地的分布情况，笔者以表格的形式予以表现。

按：茔地的建设年代指首位入葬者埋入茔地的年代。入关后，清代宗室同样实行家族式埋葬形式，只不过相较于在关外时，在埋葬时开始注重宗法制度，遵循昭穆原则。正因为实行家族式埋葬，就出现了在有些茔地上，先后埋葬了几代人的情况。关于同一块茔地上各个入葬人员的名字，笔者并未一一写明，当然，有些茔地上的入葬人员尚不能考证。但这并不影响本文对茔地分布情况的考察。在考察茔地分布情况时，只要知道一块茔地上的首葬者的情况，确切地说只要知道首葬者的卒年，即茔地的始建年代就可以了。

表一　北京各区县清代宗室王公茔地分布情况

		茔地	建设年代	入葬人员	具体位置
房山	1	敬谨亲王尼堪家族茔地	顺治朝	尼堪及其袭爵子尼思哈	长沟乡南甘石村
	2	顺承恭惠郡王棱德弘家族茔地	顺治朝	西甘池村葬有11位顺承郡王，即棱德弘（勒克得浑）、勒尔锦、勒尔贝、延奇、充保、诺罗布、恒昌、伦柱、春山、庆恩和讷勒赫；二龙岗村葬有3位顺承郡王，即锡保、熙良和泰斐英阿	西甘池村；二龙岗
	3	承泽亲王硕塞家族茔地	顺治朝	硕塞及后代所有袭爵者	磁家务
	4	温良郡王猛峨茔地	康熙朝	猛峨，可能还有其后代	羊耳峪，具体位置待考
	5	淳慎郡王弘暻家族茔地	乾隆朝	淳慎郡王弘暻及后代袭爵者	董家林
	6	多罗贝勒奕绘茔地	道光朝	奕绘	大南峪
	7	惠端亲王绵愉茔地	同治朝	绵愉和其袭爵子奕详	崇各庄
西城	1	克勤郡王家族茔地（1）	顺治朝	衍禧郡王罗洛浑、显荣贝勒喀尔楚浑、平比郡王罗克铎、革退平郡王讷尔图	木樨地
东城	1	睿忠亲王多尔衮茔地	顺治朝	多尔衮	东直门外工人体育馆以北的新中街一代
海淀区	1	郑亲王家族茔地（1）	顺治朝	济尔哈朗、富尔敦、敏郡王勒度、简纯亲王济度、简惠亲王德塞	白石桥
	2	礼亲王家族茔地（1）	顺治朝	代善、满达海、常阿岱、祜塞、杰书、椿泰	门头村
	3	多罗谦襄郡王瓦克达茔地	顺治朝	瓦克达	北下关
	4	多罗悫厚贝勒杜尔祜茔地	顺治朝	杜尔祜	羊坊店
	5	郑-简亲王家族茔地（2）	康熙朝	巴尔堪及其后的九位简亲王和郑亲王	五路居
	6	克勤郡王家族茔地（2）	康熙朝	平悼郡王纳尔福、革退平郡王讷尔苏、平敏郡王福彭、平僖郡王庆明、克勤良郡王庆恒	南平庄
	7	已革多罗敦郡王允䄉茔地	乾隆朝	允䄉，可能还有其后代	十王坟
	8	仪顺郡王绵志茔地	道光朝	绵志，可能还有其后代	据说在沙窝村
	9	瑞郡王奕誌茔地	道光朝	奕誌	瑞王坟村
	10	固山贝子载钧茔地	咸丰朝	载钧	马连洼
	11	醇亲王奕譞茔地	光绪朝	奕譞	北安河七王坟
	12	孚敬郡王奕譓茔地	光绪朝	奕譓	九王坟
石景山	1	饶余亲王家族茔地	顺治朝	阿巴泰及后裔成员	隆恩寺旧址
	2	礼亲王家族茔地（2）	雍正朝	崇安、永恩、昭连	金顶山
	3	礼亲王家族茔地（3）	乾隆朝	巴尔图	福寿岭

续表

		茔地	建设年代	入葬人员	具体位置
石景山	4	礼亲王家族茔地（4）	道光朝	礼安亲王麟趾、礼慎亲王全龄、礼恪亲王世铎	礼王坟
	5	睿恭亲王淳颖茔地	嘉庆朝	淳颖、仁寿	净德寺
	6	瑞怀亲王绵忻茔地	道光朝	绵忻	福田寺
朝阳	1	阿济格家族茔地	顺治朝	阿济格，可能还有其后裔成员	八王坟
	2	豫亲王多铎茔地	顺治朝	多铎及袭爵子多尼	豫王坟
	3	肃亲王豪格家族茔地（1）	顺治朝	豪格、后代袭爵者显懿亲王富绶、显谨亲王衍潢、肃良亲王隆懃	劲松
	4	多尔博家族茔地	康熙朝	多尔博及子苏尔发	慈云寺
	5	恭亲王常颖（宁）茔地	康熙朝	常宁，可能还有其后代	东大桥
	6	追封睿亲王、辅国公塞勒茔地	雍正朝	塞勒及后代功宜布	七棵树桥一带
	7	信郡王如松茔地	乾隆朝	如松	广渠门外马圈
	8	肃亲王家族茔地（2）	乾隆朝	追封肃亲王成信、肃恭亲王永锡	十八里店
	9	理郡王家族茔地	乾隆朝	弘昒及后代	长店村
	10	履懿亲王允祹家族茔地	乾隆朝	允祹及子弘昆	东直门外太阳宫一带
	11	和谨亲王绵伦茔地	乾隆朝	绵伦	据传在东直门外八间房
	12	睿慎亲王宝恩茔地	嘉庆朝	宝恩	据说在某村花园小口坟地
	13	裕郡王家族茔地	嘉庆朝	裕僖郡王亮焕、多罗贝勒文和、固山贝子祥端	广渠门外九龙山
	14	睿勤亲王端恩茔地	道光朝	睿勤亲王端恩、睿悫亲王德长、睿敬亲王魁斌和末代睿亲王中铨、中铭等	梆子井
	15	肃慎亲王敬敏茔地（3）	咸丰朝	敬敏	道口村
	16	肃恪亲王华丰茔地（4）	同治朝	华丰	万子营
门头沟	1	惠献贝子福喇塔茔地	康熙朝	福喇塔、福存	龙泉镇坡头村
	2	显密亲王丹臻茔地	康熙朝	丹臻	陇驾庄
	3	克勤郡王家族茔地（4）	乾隆朝	亨元、尚格及其后两位承继子孙	冯村
丰台	1	郑-简亲王家族茔地（3）	康熙朝	简修亲王雅布、简仪亲王德沛	右安门外郑王坟
	2	追封肃亲王、辅国将军拜察礼茔地	康熙朝	追封肃亲王拜察礼及子肃亲王蕴著	成寿寺
	3	革退简亲王雅尔江阿茔地	雍正朝	雅尔江阿	湾子村
	4	革退简亲王神保住茔地	乾隆朝	神保住，可能还有其后代	西局
	5	荣恪郡王绵亿茔地	嘉庆朝	绵亿、溥芸	大灰厂
	6	隐郡王奕纬家族茔地	道光朝	奕纬及后代	王佐

续表

		茔地	建设年代	入葬人员	具体位置
平谷	1	诚隐郡王允祉家族茔地	雍正朝	允祉及后裔	樊各庄
	2	诚恪亲王允祕家族茔地	乾隆朝	允祕及后裔	打铁庄；疙瘩头
怀柔	1	克勤庄郡王雅朗阿茔地（3）	乾隆朝	雅朗阿	峪口村
密云	1	和恭亲王弘昼茔地	乾隆朝	弘昼，可能还有贝勒衔、固山敏恪贝子载容	西田各镇署地村
	2	追封定安亲王永璜茔地	乾隆朝	永璜、荣纯亲王永琪、追封循郡王永璋	不老屯镇杨各庄村
	3	定恭亲王绵恩茔地	道光朝	绵恩，溥煦可能也葬在此茔地内	穆家峪乡羊山村
顺义	1	和亲王永壁家族茔地	乾隆朝	和硕勤亲王永璧、多罗和恪郡王绵循、多罗贝勒奕亨、奉恩镇国公溥廉	庄子营村
通州	1	革爵豫亲王裕丰茔地	道光朝	革爵豫亲王裕丰，可能还有革爵豫亲王裕兴	次渠村
	2	裕慎亲王义道茔地	同治朝	义道	北神树
	3	惇勤亲王奕誴茔地	光绪朝	奕誴	宋庄镇北窑上村。惇勤亲王奕誴的后代葬在奕誴墓地东约200米处的位置，俗称“小五爷坟”
昌平	1	弘晳茔地	乾隆朝	弘晳	黄土南店
	2	弘昞茔地	乾隆朝	弘昞	黄土南店
	3	弘晋家族茔地	康熙朝	弘晋及后代	黄土南店
	4	郑亲王家族茔地（4）	嘉庆朝	绵惠	崔村东北麻峪
	5	庆僖亲王永璘家族茔地	嘉庆朝	永璘及后代	白羊城
	6	成哲亲王永瑆茔地	道光朝	永瑆，可能还有后代	雪山村
	7	仪慎亲王永璇茔地	道光朝	永璇，可能还有贝勒奕絪	兴寿镇半壁店村
	8	定端亲王奕绍茔地	道光朝	奕绍	崔村镇宝山
	9	定敏亲王载铨茔地	咸丰朝	载铨	小汤山镇葫芦河
	10	成恭郡王载锐茔地	咸丰朝	载锐	南口镇西南约十里处花塔村
	11	钟端郡王奕詥茔地	同治朝	奕詥	小汤山镇
	12	恭亲王奕䜣家族茔地	光绪朝	奕䜣及后代	崔村镇麻峪村
	13	果敏贝勒载澂茔地	光绪朝	载澂	南庄村

备注：在茔地一栏，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茔地块数，如“郑亲王家族茔地（3）”表示郑亲王家族的第三块茔地。

按：大兴区境内，确切地说在今南三环成寿寺以南（属丰台区）就没有清代宗室王公茔地的分布了，其原因可能与京畿以南为汉人生活居住区有关。据《清代旗人社会》，顺治元年（1644）清朝入关后，将内城民人驱王外城（南城）[1]。今天的延庆县境内也没有宗室王公茔地的分布，可能是因为这里距离京城较为偏僻，交通不便，难于祭祀；山虽多，但山水不够和谐，无上佳风水之地。

二、清代宗室王公茔地在北京外围河北、天津两地的分布情况（表二、表三）

表二　河北地区清代宗室王公茔地的分布情况

	茔地	始建时间	入葬人员	具体位置
1	辅国将军玛锡礼茔地	顺治朝	玛锡礼	迁安市五重安乡宫上村
2	裕亲王家族茔地	康熙朝	追封裕悼亲王保绶及其子裕庄亲王广禄	清西陵外围易县南福地
3	淳度亲王允祐茔地	雍正朝	允祐	清西陵外围的易县神石庄村南
4	怡亲王允祥家族茔地	雍正朝	允祥及后代	怡亲王家族茔地共有三处，均在今河北省涞水县。一处为东营房村的怡贤亲王允祥园寝所在地；一处为福山营村的怡僖亲王弘晓及其子孙园寝或墓葬所在地；还有一处是在雁翎村的“南宫”，主人不明
5	愉恪郡王允禑家族茔地	雍正朝	允禑及后裔	马兰峪东约25千米的遵化市西三里乡北峪村之西
6	郡王品级、多罗诚贝勒允祁茔地	乾隆朝	允祁，可能还有后代	东陵和遵化市之间的兴旺寨乡
7	果毅亲王允礼茔地	乾隆朝	允礼	易县上岳各庄村
8	果恭郡王弘瞻茔地	乾隆朝	弘瞻及后嗣继承者	清西陵外围的易县岭东村
9	多罗简靖贝勒允祎茔地	乾隆朝	允祎	易县清西陵附近下岳各庄北官地
10	慎靖郡王允禧茔地	乾隆朝	允禧	清西陵外围的涞水县永阳镇西洛平村西北（档案为落萍村），俗称“西宫”
11	质庄亲王永瑢茔地	乾隆朝	永瑢	清西陵外围的涞水县永阳镇北洛平村东北。后代葬地也有在洛平一带
12	端亲王弘晖茔地	乾隆朝	弘晖、弘昀、弘盼、福宜	中崇陵西南1千米处的张各庄村。乾隆三年（1738），雍正皇帝入葬清西陵的泰陵完毕之后，从黄花山移至西陵陵区范围内
13	阿哥弘时茔地	乾隆朝	弘时	崇陵西南的张各庄村，东侧紧邻端亲王园寝。乾隆三年（1738）从黄花山移至此处
14	怀亲王福惠茔地	乾隆朝	福惠	清西陵境内易县昌西陵西北方向的太平峪村。乾隆三年（1738）从黄花山移至此处

表三　天津地区清代宗室王公茔地的分布情况

	茔地	始建时间	入葬人员	具体位置
1	裕亲王福全茔地	康熙	福全	蓟县黄花山
2	荣亲王茔地	顺治朝	荣亲王	蓟县黄花山
3	纯亲王隆禧茔地	康熙	隆禧	蓟县黄花山
4	直郡王允禔茔地	雍正朝	允禔	蓟县黄花山
5	废太子、追封理亲王允礽茔地	雍正朝	允礽	蓟县黄花山
6	恂勤郡王允禵茔地	乾隆朝	允禵，子弘明	蓟县黄花山
7	恒亲王家族茔地（1）	雍正朝	允祺	城关镇东营房村
8	恒亲王家族茔地（2）	乾隆朝	弘晊、弘昇等	蓟县穿芳峪乡果香峪村。后代也有葬于此地的
9	端慧皇太子永琏茔地	乾隆朝	永琏	蓟县孙各庄乡朱华山村
10	乾隆皇帝十二子永璂茔地	乾隆朝	永璂	蓟县孙各庄乡朱华山，端慧太子园寝西侧

三、关于清代宗室王公茔地分布情况的一些探讨

从表一、表二、表三可以看出，清廷入关后，清代宗室王公茔地主要分布在三个大的区域，一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二是今天津地区；三是今河北地区。

（一）天津地区

天津地区清代宗室王公茔地主要分布在蓟县黄花山和朱华山。黄花山在清东陵西侧，朱华山在清东陵西南，均处在清东陵陵区外围。这两处宗室墓葬的选址呈现出对东陵皇陵的拱卫形势，可谓是东陵的陪葬墓。在封建社会，能够陪葬在皇陵周围，这对死者来说是极大的殊荣，如汉唐时期帝陵的陪葬墓。当然，这些能够陪葬皇陵周围的也绝非一般人物，他们或身份特殊，或受皇帝重视，或为皇室做出过重大功勋。他们能埋在这里是经皇帝特许的，是皇帝对他们的格外恩典。我们来看埋在黄花山和朱华山的墓主人，黄花山埋葬有顺治帝的三个儿子和康熙帝的三个儿子。朱华山埋葬乾隆帝的两个儿子。他们均为皇子，身份特殊，卒后葬在他们父亲皇陵附近，陪护皇陵，在“身份资格”上是没问题的。另儿子陪葬父亲附近，也可体现亲亲之道。荣亲王茔地为顺治帝“卜兆”；裕亲王福全茔地为康熙帝命御史罗占在黄花山修建；端慧皇子永琏为乾隆帝委官相度，等。因此，可以认为黄花山和朱华山应是皇帝指定的宗室陪葬地。

此外，在天津地区还有恒亲王家族的两块茔地，一在城关镇东营房村，一在穿芳峪乡果香峪村。这两个地方距离陵区不远，东营房村距离陵区不足20千米，果香峪村更近，只有十几千米，且首葬者恒亲王允祺也是皇子，是康熙帝的第五子，故恒亲王家族墓葬也可以看成是东陵陵区的陪葬墓。

（二）河北地区

同样道理，河北地区易县和涞水县境内宗室王公茔地的选择也是出于作为对西陵陪葬的考虑。埋在易县和涞水县境内的宗室王公有追封裕悼亲王保绶及其子裕庄亲王广禄、允祐、允祥及后代、允礼及后嗣弘瞻等、允祎、允禧及永瑢、弘晖、弘时和福惠。其中，各块茔地的首葬者除保绶外，均为皇子。允祐、允祥、允礼、允祎、允禧为康熙帝的皇子，弘晖、弘时和福惠为雍正帝的皇子。除拥有皇子身份外，允祐、允祥、允礼、允禧、允详还深受皇帝喜爱，这是他们能够埋葬在陵区附近的情感因素。至于能够埋葬陵区附近的具体原因，从史料上看，目前我们仅能明确允详茔地选址缘由，此外还有雍正帝的几个皇子缘何葬于西陵陵区之内。允详不仅没有参与雍正帝即位前的争权斗争，而且在雍正帝即位后，一直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对雍正帝卑恭有加，深得雍正帝的重视，故雍正帝在自己的万年吉地选定后，还不忘给允详也指定一块。根据史料记载，雍正帝在自己“吉地”附近恩赐一块“中吉之地”给允详，但允详不敢接受，最后在附近自选了一块“平善之地”[2]；弘晖、弘时最初葬于天津黄花山，乾隆帝即位后，将他们移至西陵陵区范围内，陪护他们的父亲雍正，子绕于父膝下，父子共眠；允祎不受雍正帝喜爱，但卒前一直守护埋葬雍正帝的泰陵，因此可能卒后就葬在了陵区附近。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具体原因，这些皇子们能够埋在陵区附近，陪护皇陵，一定是经皇帝或恩赐或批准的。

再看西陵附近这些宗室首建茔地的时间，除葬有追封裕悼亲王保绶及其子裕庄亲王广禄的裕亲王家族茔地建于康熙年间外，其余均建于雍正和乾隆年间，均建设于雍正泰陵选定陵址，开始建设之后。这更加说明这些宗室墓地的陪葬性质。

葬有追封裕悼亲王保绶及其子裕庄亲王广禄的裕亲王家族茔地首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是清西陵陵区附近唯一一座比泰陵建设得还早的宗室王公茔地[3]。保绶为裕宪亲王福全第五子，一生也仅做到辅国公品级，身份一般，也无显著事迹，康熙四十五年（1706）去世。康熙四十五年（1706）时雍正尚未即位，陵址未选，故这块茔地当不是作为陪葬性质的墓地。

除了上述几处作为陪葬而选址河北的宗室茔地外，在迁安市五重安乡宫上村有一处辅国将军玛锡礼茔地，在马兰峪东约25千米的遵化市西三里乡北峪村之西有愉恪郡王允禑家族茔地，在东陵和遵化市之间的兴旺寨乡有郡王品级、多罗诚贝勒允祁茔地。这几处显然不是作为陪葬西陵而选择的茔地。辅国将军玛锡礼是努尔哈赤第三子阿拜第七子灏善的第五子，卒于顺治五年（1648），茔地选在迁安市五重安乡宫上村。玛锡礼可谓远支宗室，从史书上看，一生也无什么重大功绩；茔地距离东陵又较远，约80千米；更重要的是玛锡礼卒时东陵第一陵孝陵可能尚未选址，至少尚未修建，东陵修建时间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据王其亨考证，孝陵卜阅陵地的时间为顺治十三年（1656）[4]。由此看来玛锡礼茔地当不是作为东陵的陪葬墓而选址此处。其葬在此地的具体原因有待

考证。愉恪郡王允禑是康熙帝第十五子，生前守护景陵，勤勉恪守，卒后葬地由雍正指定，在马兰峪东约25千米的遵化市西三里乡北峪村之西。郡王品级、多罗诚贝勒允祁是康熙帝第二十三子，其守护东陵长达40年之久，茔地在东陵和遵化市之间的兴旺寨乡。愉恪郡王允禑和郡王品级、多罗诚贝勒允祁均为康熙帝的皇子，均曾守护过东陵，葬地距离东陵陵区都较近，此二人茔地的选址也可以认为是出于陪葬东陵的考虑。

此外，从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乾隆之后就没有陪葬陵区周围的宗室王公墓葬了。笔者推测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几方面有关：一是陵区范围附近不可能无限制的陪葬；二是清代后期宗室王公对风水越来越重视，多选择风景秀丽的风水上佳之地；最后可能还与清代后期社会动荡有关，宗室卒后就近葬在都城附近或郊区。

（三）北京地区

位于北京地区的宗室王公茔地最多，几乎清代各个帝王时期都有建设。这些茔地遍布现今北京市除大兴和延庆外的各个区县。

从上文表格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的宗室王公茔地大致可以乾隆时期为界，乾隆之前大多分布在京城近郊；乾隆之后埋葬分散，距离京城越来越远。

顺治时期和康熙时期建设的宗室王公茔地有：南甘池敬谨亲王家族茔地、西甘池顺承恭惠郡王楝德弘家族茔地、磁家务承泽亲王家族茔地、羊耳峪温良郡王猛峨茔地、木樨地克勤郡王家族茔地、东直门外睿亲王多尔衮茔地、白石桥郑亲王家族茔地、门头村礼亲王家族茔地、北下关多罗谦襄郡王瓦克达茔地、五路居郑-简亲王家族茔地、石景山饶余亲王家族茔地、“八王坟”阿济格家族茔地、“豫王坟”豫亲王多铎茔地、劲松肃亲王豪格家族茔地、慈云寺多尔博家族茔地、东大桥恭亲王常颖（宁）茔地、坡头村惠献贝子福喇塔茔地、陇驾庄显密亲王丹臻茔地、右安门外郑-简亲王家族茔地、成寿寺追封肃亲王辅国将军拜察礼茔地、黄土店弘晋家族茔等。

上述宗室茔地，除了位于今房山区的南甘池、西甘池、羊耳峪和位于今门头沟区的坡头村、陇驾庄距离京城比较遥远外，其余的如木樨地、白石桥、东直门外、五路居、北下关等均在京城近郊。

除恩赐或划拨茔地而影响茔地分布外①，影响清初宗室王公茔地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与圈地有关。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安置大批从关外迁入的王公、官兵等，在近京地区，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跑马圈地。这三次圈地时间分别在顺治元年（1644）、顺治四年（1647）和康熙八年（1669）。[5]这些被圈占的土地，一部分由皇帝和王公贵族占有，建立庄园；另一部分按照“记丁授田”原则，分给八旗人丁耕种。据《清会典・户部》记载：“凡宗室王贝勒贝子公将军，赐畿辅庄园各有差，通计八旗

① 按恩赐、划拨茔地如何影响茔地分布尚待考证。

万三千三百三十八顷有奇。凡勋戚世爵职官军士，赐畿辅庄田各有差，通计八旗十有四万百二十八顷七十一亩有奇。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承平以来，边界益拓，盛京东北及诸边口外，古称瓯脱不毛之土，多辟为腴壤。八旗户口滋繁，咸取给焉。凡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许越旗买卖及私售与民，违者以隐匿官田论。凡牧场近京之地，阡陌相连，尽给八旗官兵。以沙地不耕者为场，盛京及沿边之地，广漠无际，屯垦所不能尽。择水草肥美者为场，以牧上廐马及橐驼牛羊。次给宗室王公八旗官兵以广牧政。”[6]皇室赐予宗室王公的庄田称为王庄，这些王庄星罗棋布于京畿地区。王庄的用途之一就是作为埋葬和祭祀祖先的用地。可见，入关之初，也就是说在顺治和康熙时期，宗室王公茔地主要来源于圈地所得的私人王庄。故顺治、康熙时期的王公茔地多分布在京畿附近。从现在的行政区划上来看，都位于城八区，即朝阳、东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丰台。

至于顺治年间所建的位于今房山区南甘池的敬谨亲王尼堪家族茔地、西甘池顺承恭惠郡王棱德弘家族茔地、磁家务承泽亲王硕塞家族茔地和康熙年间所建的同样位于今房山区羊耳峪的温良郡王猛峨茔地为何远离京城，有待考察。

乾隆及以后各帝时期，宗室王公茔地选址越来越远，出现在了今密云、怀柔、通州等远郊区县。

上文已有分析，入关之初，宗室王公茔地主要来源于圈地所得的私人王庄，故多分布在京畿附近。后来，随着宗室人员的繁衍增多，圈地的面积毕竟是有限的，在京畿近郊圈占地被用完、皇室也无地可拨的情况下，宗室们便有人开始自己购地作为葬所。从清代中叶起，购置土地作为葬所成为重要途径[7]。当然也有一些宗室人员在近郊有地可葬的情况下，也选择埋葬在远郊，因为他们不单单要求葬地仅能容身，更对风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宗室购地的标准主要看风水是否上佳。而风水上佳之地多在京城远郊，故越到后期茔地越选越远，也越分散，不像入关之初一个茔地上埋葬好几代人员。

关于清代后期宗室购买茔地和对风水及葬地环境的重视，在史料记载和传说中可以窥见。下举数例以证。

卒于乾隆朝的克勤郡王雅朗阿。雅朗阿卒后葬怀柔峪口村北台，这里风光极美，周围山岭环绕，背有长岭，南有珠珠山，东有大神山、二神山、三神山、四神山等小山包，西临佟家坟，“从珠珠山向北望去，‘北台’东西两山如同两条巨龙，而珠珠山恰似‘二龙戏珠’的火珠。[8]”茔地周围环境很符合中国传统堪舆学的风水观念。峪口村南还有怀九河，亦为这里的风景增色不少。

乾隆朝在平谷建设的諴亲王家族茔地。关于諴亲王在马坊镇打铁庄村南的家族茔地，据民间传说，是因为马坊一带地貌隆起似龙形，而龙头位置正好在打铁庄村南一里许。

卒于嘉庆朝的睿恭亲王淳颖。据传淳颖生前看重了今石景山净德寺一带的风水，故葬此。

卒于嘉庆朝的荣恪郡王绵亿。据绵亿七世孙女金适说，绵亿生前曾命人采择坟地，地师看中了今北京市丰台区大灰厂村迤北三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原名樱桃园，是清江西羲宁州州同张彭龄的地方，共一顷十亩。于是，绵亿就用府中通县小东格地四顷五十四亩、房二十间与张彭龄换得。

卒于嘉庆朝的庆亲王永璘。永璘卒后选茔地于今北京市昌平区五峰山一代，传说是因为他看中了这里的风水。

卒于道光朝的奕绘。奕绘深爱房山大南峪的幽雅，乃以府中东城地两千亩易之。大南峪易成之后，奕绘始在此经营茔地。[9]

卒于咸丰朝的成恭郡王载锐。据民间传说，载锐生前游猎圣宝山时，看中了背靠此山的和平寺附近的风景，发愿卒后归葬于此。

卒于咸丰朝的定敏亲王载铨。道光十七年（1837）五月的时候，道光帝“赏借定郡王载铨俸银三万两，自置茔地”。[10]

卒于咸丰朝的固山贝子载钧。载钧的茔地用地是在咸丰元年（1851）时，以一千八百吊钱从农民手中买得的。[11]

卒于光绪朝的肃良亲王隆懃。隆懃卒后葬朝阳区十八里店，传说是看中了这里风水，可“登基坐店”。

卒于光绪朝的惇亲王奕誴。据民间传说是因为奕誴生前喜欢饮用通州葛渠村的烧酒，又看上了葛渠附近窑上村的风水，故葬此。

卒于光绪朝的醇贤亲王奕譞，他的茔地是通过购买得来的。据奕環《退潜别墅存稿》记载，戊辰年（即同治七年，1868）秋，奕譞在蔚秀园养病，某日到西山响堂庙闲游，见妙峰山泉壑幽美、层峦叠嶂，景色宜人，于是带风水先生李唐（字尧民）勘察。李唐认为该处“点穴最佳”，奕譞大喜，遂决定购买此地作为自己死后的茔地。

综上所述，北京地区宗室王公茔地的分布状况主要与茔地的来源有关。前期茔地多选在圈占地内，故多在京畿附近，这时期土地面积充盈，又不太注重风水，故一块茔地上往往埋葬多人；清代中后期，随着近郊圈占地被用完，买地成为茔地主要来源，再加上对风水的重视，茔地越选越远，越来越分散，甚至出现一代一换茔地的现象，如肃亲王家族茔地。

四、余　　论

入关后清代宗室王公茔地主要分布在今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地区。其中，位于天津和河北的宗室王公茔地多是作为陪葬皇陵而指定的。北京地区宗室王公茔地分布大致可以乾隆朝为界，之前的宗室茔地多分布在近郊，之后多分布在远郊，这主要与茔地的来源有关。前期茔地多来源于圈占地，故多在京畿附近；清代中后期，随着近郊圈占地被用完，买地逐渐成为茔地主要来源，再加上对风水的重视，茔地越选越远，越来越分散。

注　　释

［1］ 刘小萌.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清世宗实录. 卷九四［M］.
［3］ 陈宝蓉. 清西陵纵横［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4］ 王其亨. 顺治亲卜陵地的历史真相［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2）.
［5］ 四库本・清会典・卷一〇・户部［M］：“近畿五百里内，当明季兵燹之后，野多旷土，定鼎之初以锡，羣策羣力，垂为世业. 墟市不改，邱冢如故，有民田犬牙相错者，取别州县闲田易之，俾旗人各安其业，以正经界，其征输之籍尽除之.”
［6］ 四库本・清会典・卷一〇［M］.
［7］ 刘小萌.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8］ 冯其利. 清代王爷坟［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
［9］ 杨亦武. 大南峪奕绘贝勒园寝［J］. 北京文博，1997（3）.
［10］ 清宣宗实录・卷二九七［M］.
［11］ 金启孮. 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Graveyard of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Caln after Entering in Beijing

Zhang Lifang

Abstrct: After entering in Beijing, the graveyard of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caln is maily distributed in Beijing, Tianjing and Hebei. The graveyard in Tianjin and Hebie, is designated for accmopanying imperial mausoleum; The graveyard in Beijing can be divided in two stages by Qianlong peried. Before Qianlong peried, the graveyard of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caln is distributed in suburbs; After Qianlong peried, the graveyard of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caln is maily distributed in outskirts.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can be expained for the origination of the graveyard. Before Qianlong peried, the origination of the graveyard is enclusurn; so the graveyard is near. After Qianlong peried, to buy graveyard being the main source, added to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Fengshui, so the graveyard is more and more f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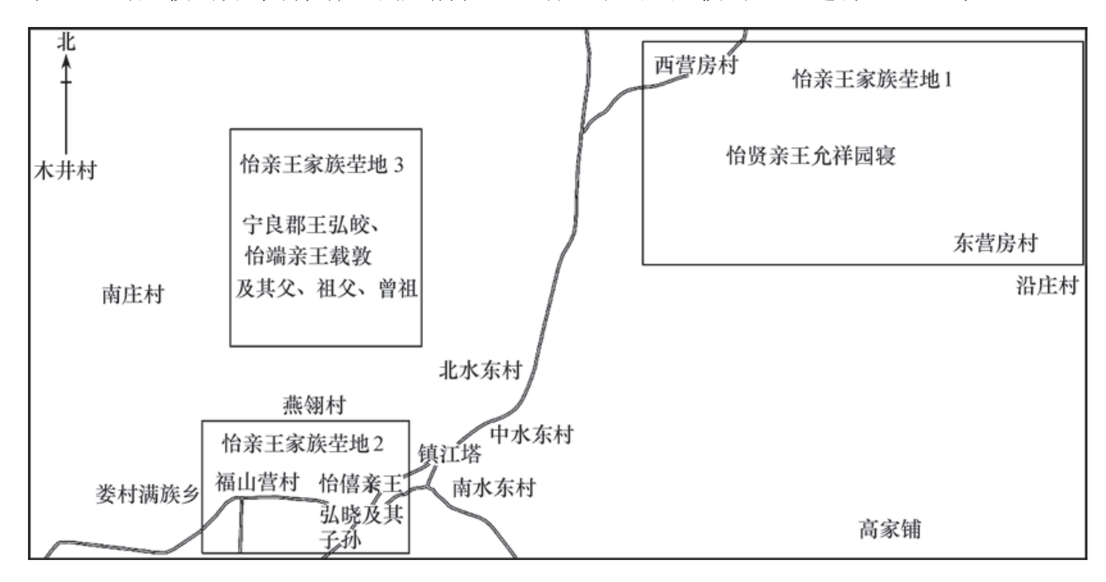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member of the royal caln; graveyard

清代怡亲王家族茔地调查及园寝主人考证

丁利娜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09）

和硕怡亲王是清代第一个恩封的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其始封祖胤祥为圣祖康熙皇帝第十三子，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十月一日，母敬敏皇贵妃[1]。据冯其利先生20世纪80年代调查，怡亲王家族茔地共有三处，均在今河北省涞水县（图一）。一处为东营房村的怡贤亲王胤祥园寝所在地；一处为福山营村的怡僖亲王弘晓及其子孙园寝或墓葬所在地；还有一处是在雁翎村的“南宫”，但冯先生未明确其主人。按：胤祥是怡亲王家族的始封祖，于怡亲王家族来说是一大宗，由于雍正朝对胤祥的特殊荣宠，其薨逝后葬在了东营房村的“平善之地”。胤祥第七子怡僖亲王弘晓及其子孙，作为胤祥的爵位承袭者，在怡亲王家族内均是大宗，他们薨逝后茔地选在了距东营房村西边不远的福山营村。所以说，怡亲王家族的三块茔地中，涞水县东营房和福山营村都是大宗茔地。那么涞水县雁翎村的这块怡亲王家族茔地主人究竟有哪些？怡贤亲王胤祥的其他几个儿子埋葬在何地？笔者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分析怡亲王家族的爵位承袭谱系及宗室王公园寝的分布特点，对雁翎村调查得知的五处园寝的主人进行了一一考证。



图一　怡亲王家族茔地分布示意图

一、清代怡亲王家族爵位承袭分析

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怡贤亲王胤祥有子九人、女四人。九子中有四个儿子早夭，分别是：第二子未有名，康熙四十七年（1708）生，康熙四十八年（1709）卒，年两岁。第五子弘昵，康熙五十五年（1716）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卒，年七岁。第八子绶恩，雍正三年（1725）生，雍正五年（1727）卒，年三岁。第九子阿穆瑚琅，雍正四年（1726）生，雍正五年（1727）卒，年二岁。这四个儿子夭折的时间都是在雍正八年（1730）河北省涞水县怡亲王家族兆域选定之前。按照康熙年间规定："凡皇子初殇皆备小式朱棺，祔葬于荣亲王园寝，惟开墓穴平葬，不封不树。"[2]早殇皇子尚且不建园寝，那么胤祥这几个早夭的儿子更是不可能建有园寝，雁翎村这处怡亲王家族茔地的主人自然不可能是胤祥的这几个早殇之子。

胤祥的其他五个儿子皆有封爵，即弘昌、弘暾、弘皎、弘昑和弘晓，生卒年（表一）。

表一　胤祥五子生卒

名字	谱系	生年	卒年	爵职	年龄
弘昌	胤祥第一子	康熙四十五年（1706）	乾隆三十六年（1771）	雍正十三年（1735）晋封贝勒，乾隆四年（1739）革爵	66岁
弘暾	胤祥第三子	康熙四十九年（1710）	雍正六年（1728）	贝勒品级殡葬	19岁
弘皎	胤祥第四子	康熙五十二年（1713）	乾隆二十九年（1764）	雍正八年（1730）封宁良郡王，乾隆四年（1739）理应革爵，从宽留王号	52岁
弘昑	胤祥第六子	康熙五十五年（1716）	雍正七年（1729）	贝勒品级殡葬	14岁
弘晓	胤祥第七子	康熙六十一年（1722）	乾隆四十三年（1778）	雍正八年（1730）袭怡亲王爵	4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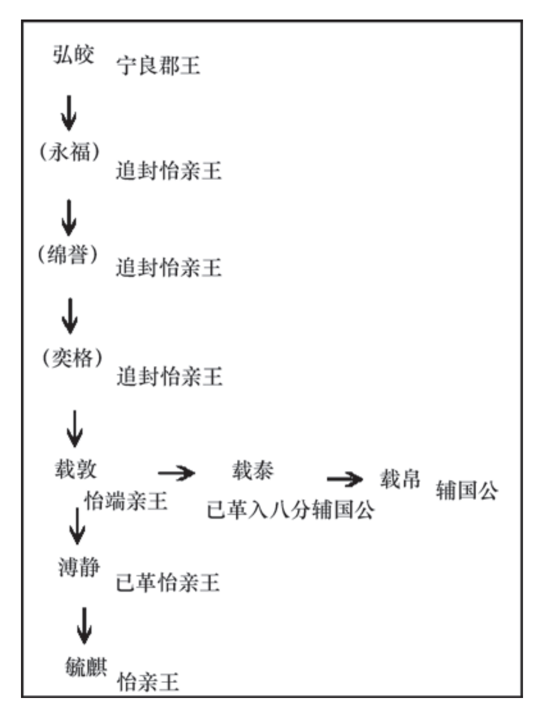
其中只有第七子弘晓承袭了胤祥的怡亲王爵，死后葬于涞水县福山营村的大宗茔地，园寝位置是明确的。其他四个儿子中，第一子弘昌秉性愚蠢，向来不知率教，雍正初年其父奏请将其圈禁在家。后因其父怡贤亲王胤祥薨逝，雍正皇帝降旨释放。乾隆皇帝即位后加封其为多罗贝勒，希望他能够改过自新。可是身为贝勒的弘昌于乾隆四年（1739）附逆于弘皙，结党营私，不守本分，"情罪甚属可恶"，乾隆皇帝震怒至极，照宗人府所议，革去其贝勒爵职[3]。乾隆三十六年（1771）四月二十一日卒。按：弘昌缘事夺爵，其身份自然也就由王公变成了普通的闲散宗室成员。按照清代的园寝制度，其逝后是不能进入怡亲王家族的昭穆排序中埋葬的。又因为其父怡贤亲王胤祥在雍正朝的特殊身份和园寝的"视常例有加"，弘昌逝后更不能够祔葬于其父胤祥园寝中。

所以，推测弘昌可能在怡亲王家族茔地的兆域之内单独埋葬，具体葬地不详。胤祥第三子弘暾未封早世，聘于富察氏。未婚守志，世宗悯之，命视贝勒例殡葬。胤祥第六子弘昑亦用其例[4]。按：弘暾卒于雍正六年（1728）七月，弘昑卒于雍正七年（1729）二月，两人均先于其父怡贤亲王胤祥而逝。怡贤亲王茔地选址在河北省涞水县“平善之地”的时间是在雍正八年（1730）。根据清朝对宗室王公丧葬时间的规定，“郡王、贝勒五月发引，七月而葬”[5]，即使是其中较晚薨逝的弘昑，在雍正八年（1730）之前也已经下葬完毕。也就是说，河北省涞水县怡亲王家族兆域在尚未选定之时，胤祥第三子、第六子均已薨逝埋葬。所以他们的葬地不可能选定在河北省涞水县，更不会在雁翎村。

而唯独胤祥第四子弘晈，是世宗雍正皇帝所恩封的多罗宁郡王，其余各代怡亲王大宗来说是一小宗，以宗法制度论，他不能够埋入怡亲王家族的大宗茔地，而应当作为一小宗之始封祖，在怡亲王家族的兆域之内另辟茔地埋葬。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弘晈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五日，母嫡福晋兆佳氏[6]。雍正三年（1725），世宗褒其父胤祥功，于亲王外复加封郡王，任王于诸子中指封，胤祥固辞不敢受[7]。及胤祥薨，雍正八年（1730）八月，世宗雍正皇帝乃封弘晈为多罗宁郡王，爵位世袭。时隔九年，乾隆四年（1739）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昇、弘昌、弘晈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并请奏将“弘晈革去王爵”。时理郡王弘皙与庄亲王允禄谋逆，弘晈附于弘皙。这场政治斗争让乾隆皇帝非常震怒，但终究还是念及怡亲王家族在先皇那里所受到的特殊荣宠，认为“弘晈乃毫无知识之人。其所行为，甚属鄙陋。伊之依附庄亲王诸人者，不过饮食宴乐，以图嬉戏而已”。谕曰：“弘晈本应革退王爵。但此王爵系皇考特旨，令其永远承袭者。著从宽仍留王号。伊之终身，永逸住俸，以观后效”[8]。《啸亭续录》言，弘晈此后无意政治，以养菊为乐，其养菊“分神品、逸品、幽品、雅品诸种名目”，达到数百种。还自制精扇，“名东园扇，一时士大夫争购之，以为赏鉴云。”大概正是因为弘晈这样韬光养晦的生活，让他避开了政坛是非，稍许平复了皇上的猜忌之心。两年后，乾隆皇帝下谕旨：“（庄亲王允禄、宁郡王弘晈）自知过愆，俱各黾勉”，“罚俸停俸之处，自明年春季为始，俱着加恩宽免。”[9]

乾隆二十七年（1762），谕曰：“宁郡王弘晈，既属患病，凡遇朝期，俱不能到。著赏给半俸，令其在家养病”。乾隆二十九年（1764）八月十四日，弘晈薨逝，年五十二岁，谥曰“良”。同年弘晈第二子永福仍循例袭贝勒。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薨，谥“恭恪”。同年永福第四子绵誉袭多罗贝勒。道光二十三年（1843）卒，未谥。绵誉第三子奕格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袭固山贝子，咸丰八年（1858）卒。同年六月，奕格二子载敦袭奉恩镇国公。同治三年（1864）九月，“改以宁郡王弘晈四世孙镇国公载敦绍封怡亲王”，“载敦所遗之爵，例应降袭入八分辅国公”[10]。

载敦承袭怡亲王的当年（1864），其父辈到祖父三代奕格、绵誉、永福均被追封为了和硕怡亲王。而载敦所遗之入八分辅国公爵位由允禄五世孙、奕增子载泰承袭。同治五年（1866）年载泰缘事革爵。同年，胤祥五世孙、奕协子载帛承袭奉恩辅国公爵。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载敦薨逝，年六十四岁，谥曰“端”。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载敦第一子溥静承袭怡亲王爵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薨逝。九月，因“纵庇拳匪，启衅友邦”[11]革去爵职，以先薨免罪。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溥静侄毓麒承袭怡亲王爵，民国后卒，卒年未详。怡亲王家族的亲王爵位承袭至此画上了句号（图二）。



图二　宁良郡王弘皎及后裔爵位承袭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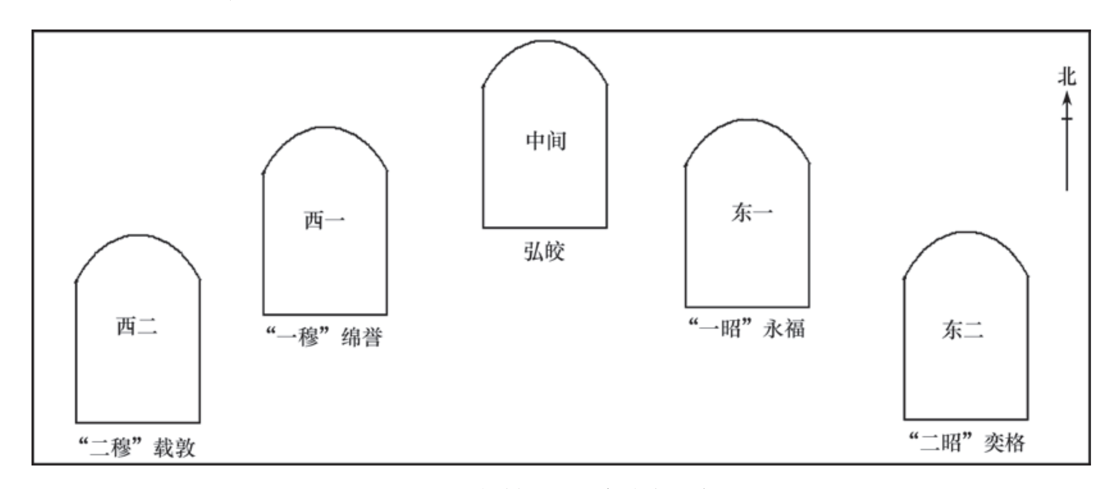
由以上宁良郡王弘皎后裔的承袭谱系我们看到，载敦承袭怡亲王后，从其父辈到曾祖三代奕格、绵誉、永福均被追封为了和硕怡亲王，此时载敦怡亲王爵则可以被视作从其曾祖、祖父、父辈那里承袭而来。所以，载敦薨逝后随其父、祖、曾祖埋葬在一块茔地，是合乎宗法规则的。而永福、绵誉、奕格三人在追封之前埋葬时，都是宁良郡王弘皎这一支的小宗成员，所以他们的葬地在昭穆序列上应该以宁良郡王为始封祖排列。综合以上分析，宁良郡王弘皎及其后裔永福、绵誉、奕格、载敦五人应该是在一块茔地上以昭穆次序排列埋葬的。之后的怡亲王溥静缘事夺爵，再之后的毓麒民国后薨逝，都不可能继续在同一块茔地上以昭穆顺序埋葬。其中，溥静薨逝后可能祔葬于其父载敦园寝之中，或者单独另辟葬地。末代怡亲王毓麒袭爵时年仅两岁，九年之后清朝灭亡，其

卒年不见于史料记载，葬处也无从考证。那么同一块茔地上以昭穆次序排列的弘晈、永福、绵誉、奕格、载敦五处园寝究竟位于什么地方呢?

二、茔地调查及园寝主人考证

据笔者2008年10月实地考察，涞水县雁翎村这处怡亲王家族茔地恰好有园寝五处，均坐北朝南，遵从“左昭右穆”的人字形分布（图三），推测正是弘晈及其后世子孙的葬处，这块怡亲王家族茔地的始封祖当是宁良郡王弘晈。

据调查，五座园寝最中间的一座位于涞水县雁翎村北，当地80岁老人刘振水的回忆说，这座园寝规模较小，宝顶内有双棺，未建碑楼，且园寝围墙为土墙，本次调查测得其地理坐标为北纬39° 30.222′，东经115° 39.83′。向东大约300米是北水东村，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东一”园寝，其地理坐标为北纬39° 30.127′，东经115° 39.896′，位于中间园寝的东南方向，据老乡刘振水介绍，该处园寝较大，宝顶内也为双棺，享殿等建筑覆绿琉璃瓦，建有碑楼，园寝围墙为砖墙，“文化大革命”后被毁。“东二”园寝也位于北水东村，地理坐标为北纬39° 30.122′，东经115° 40.063′，当地百姓俗称“小陵宫”，传说是七王爷的坟地。据村民回忆，当年曾见到园寝建有一孔拱桥、碑楼、享殿、宝顶等。“西一”园寝较中间园寝规模稍大，其地理坐标为北纬39° 30.176′，东经115° 39.476′。该园寝坐北朝南，背靠朝阳山，据村民曲振英介绍，当年园寝建有三孔拱桥、碑楼、享殿、宝顶等，其中碑楼见有土墙，抗日战争时期修炮楼时被拆毁。2008年笔者调查时，尚见有地宫和享殿残迹（图四、图五）。地宫的长方形墓圹清晰可见，内有较多渗水。享殿基址上散落有大量绿琉璃瓦残块，调查时废墟上堆满了玉米秆，村民认为该园寝主人是宁良郡王弘晈。“西二”园寝位于雁翎村向西不远的木井村，具体建制不详。



图三　雁翎村五座园寝分布示意图





图四　享殿遗迹



图五　地宫遗迹

《周礼》记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李光坡注曰："公，君也。……先王造茔者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疏曰：子孙据昭穆，夹处左右。"[12]据此，雁翎村这处呈人字形分布的五座园寝中，居中者应当是这支小宗的始封祖宁良郡王弘晈。然而据调查，这处园寝规模较小，而"东一"与"西一"园寝的规模则相对较大，所以当地百姓相传，"西一"这处较大的园寝的主人是弘晈。按：宁郡王弘晈是世宗雍正皇帝念及其父胤祥的特殊功劳，特旨恩封的郡王。然而，鲁莽的弘晈于乾隆四年（1739）附于弘晳，结党营私、往来诡秘，引得乾隆皇帝震怒，几乎遵从宗人府的奏折，革去其爵，然最终还是念及先皇雍正皇帝对怡亲王家族的特殊荣宠，从宽留其号，停其俸。弘晳案在当时是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弘晈卷入其内，可以说在他的政治生涯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宁郡王"从此便成了一个空头衔，并没有什么实职。此后弘晈便无意政治，以养菊为乐，终其一生。至其薨逝，虽然是按照郡王品级下葬，然由于生前的这场政治斗争，弘晈园寝"未建碑楼，用土围墙"，恐怕正是他自感愧疚，自损其园寝规制的表现。同时，弘晈也正好可以借此标榜一下无意政治的他"低调做人"的生活罢了。所以，我们认为中间这处规模较小的园寝主人正是宁良郡王弘晈。而当地百姓误传"西一"较大园寝主人为弘晈，是不明白园寝大小的背后原因所造成的。

"东一"园寝在这块茔地中位于"一昭"之位，按宗法排序来说，其主人当是袭弘晈爵的永福。永福是弘晈第二子，乾隆十八年（1753）八月十八日生，乾隆二十九年（1764）"循例袭贝勒"。三十八年（1763）赏乾清门行走。后历任正黄旗护军都统、正白旗护军都统、镶黄旗护军统领等职，并总管镶白旗觉罗学。乾隆四十六年（1781）授宗人府左宗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薨逝，年三十，赐谥号"恭恪"。同治三年（1864），由于其曾孙载敦承袭怡亲王，永福被追封为怡亲王。"东一"园寝之所以规模较大，且建有碑楼，享殿等建筑覆绿琉璃瓦，大概正是因为后来永福被追封为怡亲王所致。所以，如果这处园寝确实如我们推测为永福园寝，那么其规模肯定是在同治三年

（1864）永福追封怡亲王以后有过扩建而形成的。现遗址无存，地面隐约可见地宫和享殿痕迹。

“西一”园寝位于茔地的“一穆”之位，按照宗法制度的昭穆排序，这处园寝主人当是袭永福爵的绵誉。绵誉为恭恪贝勒永福第四子，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十六日，乾隆四十七年（1782）袭多罗贝勒爵。嘉庆十八年（1813）二月，守护西陵。三年后回京，并授宗人府右宗人。道光年间开始管理正黄旗觉罗学事务。道光二十三年（1843）绵誉薨，年六十四。同治三年（1864），由于其孙载敦承袭怡亲王，而被追封和硕怡亲王。这处园寝与“东一”园寝规模均较大，其原因大致是相同的。

“东二”园寝位于茔地“二昭”之位，按照昭穆排序，这处园寝应该是袭绵誉爵的奕格。然当地传说是“七王爷”的坟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怡亲王家族来说，“七王爷”无非是胤祥第七子怡僖亲王弘晓，而弘晓的葬地在涞水县福山营村。大概因为当时“七王爷”弘晓的美誉远扬，使得百姓对村中这些园寝的主人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按：奕格为贝勒绵誉第三子，生于嘉庆十年（1805）三月。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赏戴二品顶戴。道光二十四年（1844）袭固山贝子，十一月授散秩大臣，十二月著在乾清门行走。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御前行走。咸丰八年（1858）二月二十七日薨逝，年五十四岁。同治三年（1864），由于其子载敦承袭怡亲王，而被追封为和硕怡亲王。据村民介绍，当年园寝建有一孔拱桥、碑楼、享殿、宝顶等建筑遗迹。如果我们推测这处园寝的主人无误，那么园寝这样的规模可能也是在其追封为怡亲王之后扩建形成的。

“西二”园寝位于雁翎村向西大约500米的木井村，位于茔地“二穆”之位。按昭穆排序来说，这处园寝的主人应该是和硕怡端亲王载敦。载敦为固山贝子奕格第二子，生于道光七年（1827）三月二十四日。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赏戴花翎。咸丰八年（1858）其父薨，载敦袭奉恩镇国公，授散轶大臣。同治三年（1864）九月，袭和硕怡亲王。同治十三年（1874），派内大臣。光绪年间，出任旗务，并先后担任坛庙大臣、专操大臣、查城大臣、阅兵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薨，年六十四，赐谥号“端”。载敦园寝现已无存，具体建制不详。

综上，河北省涞水县雁翎村这处怡亲王家族茔地上五座园寝的主人依次为弘晈、永福、绵誉、奕格和载敦。茔地上埋葬的家族成员除了以上五人外，还有与他们合葬的福晋，以及祔葬于载敦园寝内的溥静。这块茔地在开辟之初只是怡亲王家族的一块小宗茔地，但是载敦承袭怡亲王爵，永福、绵誉、奕格均被追封为怡亲王后，这块茔地实则变成了家族大宗茔地。茔地上唯独始封祖弘晈未被追封亲王，大概正是因为乾隆年间那场令皇帝震怒的政治风波所致。正是由于这块茔地成为了怡亲王家族的大宗茔地，所以小宗成员载泰、载帛不可能葬于此。

注　释

［1］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M］.
［2］　四库本・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〇［M］.
［3］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三［M］.
［4］　清史稿・卷二二〇・列传七・诸王六［M］.
［5］　永宪录・卷三［M］.
［6］　爱新觉罗宗谱・甲册［M］.
［7］　清史稿・卷二二〇・列传七・诸王六［M］.
［8］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三［M］.
［9］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六［M］.
［10］　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五［M］.
［11］　清德宗实录・卷四七〇［M］.
［12］　（清）李光坡. 周礼述注・卷一三［M］.

The Research about the Prince of Yi in the Qing Dynasty Family Graves

Ding L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Feng Qili once investigated the Prince of Yi in the Qing Dynasty family graves. But he didn’ t clearly point 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graves at Yanling Country. Especially the masters of these tombs are not chear. This article basically makes clear the structure of these tombs through field survey. In the meantime, the author speculates the masters respectively is Hongjiao, and his descendants Yongfu, Mianyu, Yige and Zaidun, on the basis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is family and the patriarchal system.

Key words: the cemeteries of prince Yi; cemetery survey; research on the owner of the tomb

附　　录

附录一

《中国文物报》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考古文博系的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考古文博系

10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成立大会。常务副校长冯惠玲出席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高校考古文博专业、考古研究所及其他相关考古文博机构代表百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等在会上致辞表示祝贺。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引进魏坚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开始筹办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组建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2005年设立硕士、博士授予点，2007年启动博物馆建设，2010年设立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2011年获得教育部考古学一级授权，2013年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团体资质。考古文博系成立之后，将开始招收考古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

成立大会之后，还召开了学科建设研讨会，与会代表就考古学学科发展大势、文化遗产人才需求及教学、科研的建设等问题展开交流。与会代表认为，以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的生源、实干的师资团队、良好的教学与实习等条件，必将为我国急需的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23日1版　傅斌）

异军突起的背后

无需去陈述人大考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也无需去列举人大考古一年一个台阶的进步表现，我们只需知道这十年时间里，人大考古从设置专业起，如今已经具备了本科专业、专业硕士点、一级硕士点、一级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所、博物馆、考古实习基地、团体考古发掘资格等，凡是人家有的人大考古都有。仅具备了完善的硬件措施还不够，人大考古在师资、教学、科研等软件建设方面也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在师资力量上，可谓高强火力的配置。考古专业的所有老师均来自国内高校考古专业的前三强（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与西北大学）。在年龄配

置上，梯队搭配合理，既有在国内外考古界极具声誉的魏坚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又有吕学明教授、李梅田教授、马利清副教授等逐渐走向考古学一线的中坚力量，更有一批年轻力强、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使得人大考古充满活力和后劲。人大考古强势来袭的另一个表现是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单位。人大考古毕业研究生一直保持着高就业率，而且就业单位都是国内有影响力的考古文博单位和高校，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社科院地质所、北京市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首都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科学出版社等。历年还有研究生到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交流学习。

人大考古兴起与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首功之臣当属魏坚教授，他以充沛淋漓的精力、令人折服的个人魅力、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豁达宽广的胸怀、任劳任怨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就像一匹草原上的骏马拉着人大考古这辆华丽马车飞快地奔驰着。我有时戏称他为“空中飞人”，因为他每年有数个月要在空中飞来飞去，外出调查、开会等成了家常便饭，但他每一步又走得那么踏实。当然，人大考古的进步离不开其他每一位老师的辛勤劳动和无私付出。这是一个团结、和谐的团队，亲如一家的团队，正因为如此人大考古才会如此兴旺发达。

人大考古的发展也得益于机遇和学校领导的支持。然而能够将这些外部条件充分利用，体现了人大考古人的锐意进取精神和捕捉时机的高超能力，能够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推动本专业的前进和发展。

但是世间没有永恒的坦途大道，也没有永远的便利和随手可捉的机遇。人大考古的进步，往往是在困境甚至逆境中求得发展。这体现的是人大考古人不可为而为之的气魄和敢与天地斗的勇气，使得他们异军突起，成为新设考古专业中的翘楚。

人大考古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广交朋友。魏老师有一首诗写道：“老酒一壶群贤至，邀得高朋慰平生。”考古专业如果没有工地去发掘，所谓教学与科研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人大考古积极与各地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使其在软件建设方面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和依托。而考古发掘得来的资金又为本专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人大考古连续几年成功举办或合办了北京高校学生考古论坛、举办东北亚考古会议等学术研讨会，这些活动均有利于扩大知名度和促进本专业的发展。

最后，我想用“三开”来总结概括人大考古十来年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功，那就是“开拓”“开放”和“开诚布公”。缺乏开拓精神，便会原地不动；缺乏开放精神，便会默默无闻，缺少发展的外部支持条件；缺乏开诚布公，便会人心不齐，无法聚成合力，或者得不到外界的认可和接受。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治学和做事之道，我们的考古专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23日3版　毕德广）

附录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成立大会发言辑录

（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后滨教授：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成立暨学科建设研讨会现在开始。这个会议对历史学院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请来了这么多的嘉宾。学校领导也来出席今天的会议，表明这个会议对人民大学也非常重要。下面举行大会开幕式。我首先介绍今天到会的领导和来宾。

我首先介绍在主席台就座的各位，有：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吉林大学资深教授林沄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水涛教授，陕西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研究员。还有我们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几位当差的，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历史学院新成立的考古文博系系主任魏坚教授。我看到台下就座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领导郭洪林教授。

接着介绍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柴晓明研究员，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主任吴东风研究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教授，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曹兵武先生，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胡耀武教授和杨益民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戴成萍副教授和文博系主任肖小勇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张荣强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重点科研基地主任李延祥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系钱益汇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任韩建业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刘毅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陈洪海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系武吉庆教授，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君教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部向平副主任和孙危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世界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余西云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系主任李永宪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张爱

冰教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潘碧华讲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王新天助理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助理郑君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明东副教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永军研究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宋玉彬研究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华玉冰研究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吉平研究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教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梅鹏云研究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韩立森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研究员和苗轶飞助理馆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研究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研究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贾鸿键研究员。

大家都是考古界的同行，彼此都很熟悉。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这些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今天下午的会议分成两场。第一场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成立大会的开幕式，安排有七位先生发言。发言以后请各位嘉宾合影留念，这是历史性的照片，对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第二场是考古学科建设研讨会，等到三点半左右时间，我们移到人民大学国学馆109教室，在一个很气派的教学楼，去研讨考古学科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的成立大会，并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各兄弟院校、考古文博专业各兄弟单位的各位著名专家学者来出席这个会议。在此，我谨代表历史学院的全体师生对各位先生的光临和接下来的指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考古文博专业和这个团队都是非常年轻的，在考古文博的大家庭里，只能算是个小兄弟。大约9年前，记得是2004年，我们从内蒙古真正引进了第一位正式的、专业的考古研究人员，就是大家熟悉的魏坚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不断引进了一些专业教师。到今年为止，咱们历史学院考古文博专业的老师一共有10位，其中有3位教授，1位副教授，5位讲师，还有1位外籍教师。同时我们从北京的一些兄弟文博单位还请到了8位兼职教师，这样我们整个考古文博专业的教师就达到了18位，有一定的规模了。与此同时，我们的专业方向也逐渐确定，考古文博专业的教学体系也逐渐建立。大概在2005年，我们设立了考古专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2007年在今天与会的冯惠玲校长的领导下，考古团队参与了学校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从中也获得了很多动力，得到一些资源；2010年建立了博士后流动

站，并引进了几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对我们这个团队的建设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011年6月，在座的各位都很了解，教育部搞了学科调整，咱们大历史学学科由一个一级学科变为三个一级学科，我们非常有幸地获得了考古学一级学科的授权；2011年9月，我们又设立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点并开始招生；在今年，我们又获得教育部的批准，可以独立地招收考古学的本科生，目前已经首次招生并开始上课。这样我们大概经过九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考古文博专业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整个教学体系。

在魏坚教授等的领导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考古学博士已经毕业了7位，硕士已经毕业了30位，其中包括21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还有9位专业硕士。现在在读的有8位博士研究生，还有16位学术型硕士生，37位专业型硕士生。加之今年我们又获得本科招生的资格。对我们来说，一个从本科到博士的教学体系的建立，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我们的考古文博的团队还利用现有条件进行了一些科研，开展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这都是在兄弟单位的帮助下做的。我们合作承担了兄弟单位的一些科研课题，进行了相关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和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有内蒙古的几个地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宜昌博物馆和重庆巫山博物馆等地方和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在这些地方我们设立了考古实习基地。以前我们没有考古实习基地的时候，考古和博物馆团队在历史学院也承担了很多相关的工作。比如我们历史学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课程，叫做《田野考古与历史研究》，我们历史学院历史系的本科生，都要在考古实习基地进行一个月的田野考古的实习，通过实习认知考古，了解考古，增加考古学的知识。我们已经连续这样做了许多年了。通过多年的教学，从本科同学的反映来说，他们非常有收获。通过这样一个课程，他们了解和认识了考古学，我们也由此认识到考古学对历史学，对大历史学科的重要作用。有了独立的考古实习基地之后，我们考古学、文博专业的发展就更加顺利了。

值得一提的是， 2012年我们的考古学团队成为中国考古学会的团体成员；2013年年初，我们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团体发掘资格。有了这个资格以后，我们今年已经进行了一些主动申请的考古发掘。在辽宁锦州的金宝岭和河北卢龙蔡家坟遗址的发掘，就是我们历史学院考古学团队主动申请进行的，这也表明国家文物局对我校考古学科发展的认可和支持，它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考古学的教学、科研，考古实习和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可以说为今天我们历史学院成立考古文博系，奠定了专业基础。

今天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成立这样一个系，应当说是得到了我们人民大学的学校、校内各个职能部门，得到了我们兄弟单位大力支持和帮助的结果；也是魏坚教授为首的团队积极工作的结果，完全是水到渠成。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从2004年以来，咱们这个团队从引进魏坚教授开始，一直到现在，几乎每步工作都得到了学校的坚定支持，前任的和现任书记、校长，我们在座的常务副校长冯惠玲，主管我们的杨慧林副校长，还有我们学校的职能部门，特别是人事处，在座的郭洪林处长，从引进魏坚教授到最近一个教师的引进及家属的调动，各种各样的职称评定，可以说对我们非常的支持，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和照顾。此时此刻，我们历史学院能成立这个系，特别要感谢学校，感谢各个职能部门给予我们切实的帮助。另外也必须非常感谢兄弟院校和兄弟单位。我们历史学院建立一个考古文博学科，从无到有，谈何容易。我们的教学、科研，一开始没有自己的教师，当然只能依靠我们的兄弟单位，从他们那里借教师，他们帮助我们申请课题，邀请我们参加课题和考古发掘，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团队得以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和保证。对此，我想魏坚教授他们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我在这里说这个话，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心实意发自肺腑的。

在此，我还想特别借这个机会，说说我们的魏坚教授。他从2004年调到咱们历史学院，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一直是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工作，而且是埋头苦干，可以说是精心谋划，努力进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遇。有时候，我们劝他，咱们这次要不先放一放，下次再努力？他说不能放，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多做一点具体工作就行。所以很多紧急的时候，他都理直气壮往前冲。由此，我们每一步也都把考古专业往前推进，历史学院领导班子的成员对此印象深刻，我们非常佩服他这一点。今天我们有机会能成立这样一个系，我想要对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魏坚教授表示感谢！对魏坚教授领导的团队，这几位年轻的老师，还有外籍教师表示感谢！今天，我们考古文博专业没有错过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这是以魏坚教授为首的团队的光荣，我要借这个机会代表历史学院领导班子，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文博系的建立，寄托着历史学院几届领导集体发展考古专业的愿望。我们历史学院的这届领导班子是今年9月新组建的。在组建之前，魏坚教授就已经向院里打了建立考古系的报告。我们历史学院，以前叫人文学院，当时的院长是陈桦教授，他最早决定引进首名考古学带头人魏坚。当时的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所所长兼历史系系主任成崇德教授，具体地完成了引进魏坚老师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九年多，以后又陆续有发展。历史学院提出建立考古系的正式报告打到学校，也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新班子完全成立之后，而是在8月份。是我作为拟任的新院长和孙家洲院长商

量，并通过学院原有的学术委员会决议后，两人联名打的报告。我们不愿意等我们这个新班子成立以后再做这件事，也是想尽快抓紧时间。我们给陈雨露校长打上报告后，学校批复得非常快，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不应耽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历史学院成立考古文博系，确实得到了上述各方面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另外，历史学院决定及时成立考古文博系也有两个考虑，或者说是有两个契机。一个契机是2011年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国家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说是改变，对我们考古文博专业来说，应该是一个机遇，表明我们国家对考古学的重要性有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将来几年，考古学在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判断。我想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而应当趁此，为我们考古文博团队建立更大的平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去进行学科建设，这是我们的一个考量。另外一个相关的考虑就是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归根结底最了解这个学科发展的是他们本专业的学者，我们应当创造机会，使考古文博专业的老师能更加自主地决定这个学科的发展目标，这个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规划。我觉得只有他们最懂得这个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发展逻辑，由他们来主导，相对独立地去从事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会更有成效。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学院的领导班子也都同意这样的意见。一句话，应该要让他们有更多自主发展的机会。

另外我想，刚才我也提到了，考古文博系的成立和学科大发展对咱们历史学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历史学，历史学的学科发展不能没有考古学的学科支持和滋润。同时我自己粗浅地认为，我们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也不能或缺考古文博专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资源。就是这些原因，促使我们决定立即成立考古文博系。因此，考古文博系的成立乃是我们历史学院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学科发展的大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那么多重要的学者，在这个领域那么多著名单位的领导、同仁，都抽出时间来参加咱们这个会，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我们的发展特别需要请各位专家进行指导，提出意见。这对我们这个学科，对我们这个新兴的专业方向，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非常宝贵。借这个机会我郑重恳请各位学者一定不吝赐教，使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少走弯路，在以后的道路上能走得更加扎实。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光临！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冯惠玲教授：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召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的大会，虽然场面不是很

大，但我看气氛很热烈，我们荣幸地请到了来自考古文博界的众多知名专家和学者，包括高等教育领域的和实务部门的，我们算是一个正式挂牌，还不能算是一个新店开张，就有这么多嘉宾光临，我非常感动。对于考古文博界的专家，我是非常敬重的，我觉得这个领域的专家都很有学问，从事着对人类，对社会都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我自己的专业是档案学，和你们有一点相通，都和历史遗迹有关，我觉得考古文博界的专家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按照现在比较时髦的词，叫做穿越功能，能够把数百年数千年数万年，这么久远的历史还原，传递给我们，把那时候的场景，那时候的生活，那时候的文化传递给今天，使我们今人能够了解人类的足迹，了解人类的发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还有很多专家是专程从外地赶来，有的路途还不短。今天北京的天公也作美，用一个灿烂的蓝天欢迎各位，在这里我代表人民大学祝贺我们考古文博系的成立，也对各位专家来宾的到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刚才兴涛院长讲了，考古文博专业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的专业，这个系的成立和2011年国务院学位办学科目录的调整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轮调整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变化并不大，不像工科，滋生了很多一级学科，这次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历史学科门类，这里有了三个一级学科，特别是考古与文物，考古学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我想这是历史学界的同仁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国家和学界为了适应考古文博事业的发展在学术领域做出的有意义的调整。考古学和中国史、世界史并列，历史学科就变成一个系列，一个体系。我们今天能够成立考古文博系，对于一个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大学来讲，使我校历史学科，以及全校的学科体系更加丰满，更加完整，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学校的文化底蕴。学校此前就一直支持考古专业的发展，今后对于新成立的考古文博系还要给予大力支持，希望这个系能够办好，能够为国家输送合格的优质的考古文博人才，并且在科研领域做出有益的贡献。

在这里我也想代表学校对新挂牌成立的考古文博系提三点希望：

第一点希望，学术为本，凝聚方向。据我这样一个外行人理解，考古学科博大精深，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既要博古通今，同时还要兼容文理。刚才读的专家名单当中有一位搞材料的，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我和魏坚教授曾经碰到一件事情，有一位专家喋喋不休，兴致勃勃，把我们书记都忽悠来，说他有一个多么巨大的地动仪，价值连城，说的活灵活现，简直是个大宝贝，还说这个事情只是因为某种关系才告诉人民大学的，后来魏坚教授请到了一些专家去鉴定，最后是材料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说那个东西年头不对，所以我理解材料科学在这里的作用。我想它会涉及许多学科，我看到

我们系里有一位老师是搞计算机考古的，也和现代信息技术有关。在这样一个非常广博的知识构成的考古学科当中，我希望人民大学能够凝练自己的方向，设置好我们自己的专业方向，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设计好、选择好研究的主体方向，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能够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学科特色。

第二点希望，重视教学，完善队伍。考古文博系设在大学里，和在考古所不一样，它的第一重要职能是培育人才。所以我们要在人才培养上进行探索。在此前这些年的科研教学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有一些创新。但是，和在座的许多学院、学校相比，我们还是个年轻的专业，我们的队伍也不大，才有10名教师，他们却担负本硕博三个层次的教学。刚才也提到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既要广博又要深厚，教学既有课堂教学，又要有田野现场教学，所以如何培养最优秀的学生，为我们的事业培养最优质的人才，这也是我们新建立的考古文博系需要探索和努力的。为此我想我们还需要补充新的人才，建立一支最优质的教师队伍。

第三点希望，开放视野，加强合作。在座的各位专家都会认同，我们的文博事业和考古学科是实践性、交流性很强的学科，就拿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仪式来说，能有这么多专家从各地赶来，我自己感觉这也许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一个特点，大家很融洽，很合作，气氛很好，也许和我们魏坚老师人缘不错有点关系，都来捧场。我想也和这个学科有关，这个学科可能本来就需要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合作。所以我想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系的开始，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是要打开门，打开视野，更多地向我们前辈们，向学科专家学习、请教，更多的寻求合作的途径和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来优势互补，也衷心地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今后也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指点、支持和帮助人大的考古文博系，帮助我们健康发展，我们也努力融入这样一个队伍，和大家一起推动我们国家的考古文博事业。

再一次对新的考古文博系的挂牌建立表示祝贺！再一次对各位光临的专家表示感谢！祝今天的仪式圆满成功！祝我们的考古文博系、祝考古学科发展顺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诸位同事和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应当说，今天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发展的标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首先，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具有远见卓识，早早做了

这样的准备，当教育部调整一级学科的时候，我们正好不失时机的赶上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能在一级学科这一点上跟其他高校站齐了。另外，也是这些年来我们这个专业的老师们——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啊——努力拼搏，不断进取的结果。当然还有这些年来我们专业的同学们的努力。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之间，平时是师生，其实有时候就像父子，就像兄弟姊妹一样。所以我们才能团结奋斗，一起把这个专业搞起来。今天大家进门后看到外面的那几个花篮，都是不同年级毕业的同学送来的。而且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已经毕业的在京同学赶来了，有些京外的，如果有他们的领导来，也基本能够跟着赶来参加成立大会。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刚才校长讲的，凝聚力非常重要，向心力也同样重要，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来人大考古从一个非常弱小、不为人所知的状态，能够得到国家文物局，得到科研院所，得到各高校和学界同仁的大力相助，使我们逐步发展起来。我们没有什么教学经验，没有教材，没有教学方案，但是我们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我们没有考古实习基地，河北省考古所、北京市考古所、辽宁省考古所，以及很多考古所为我们敞开大门。就是在我们缺乏实习经费的情况下，也照样实施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实习。为什么？大概就是冯校长刚才说的，情分也很重要。从这一点讲，我对大家今天的到来，对大家百忙之中的光临，以及大家对人大考古文博的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今天能够成立这个系，让我想起了当年筹划这个事情的一些领导。刚才黄兴涛院长已经提到了，陈桦院长他们那一届班子，成崇德教授为此专门跑到遥远的阿拉善居延，我当时不知道在考察我，后来又跑到了绿草如茵的元上都，最后在呼和浩特找我专门谈了一次话，谈到学校有这样一个要求，希望建立考古系。但是我当时对人民大学一无所知，所以没有应允。但是后来他带我到人民大学来，我在人民大学跟相关的领导，包括和人事处今天在座的郭洪林处长见了面，听他们谈了他们对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慢慢坚定了我到人大教书的信念。因为当时在自治区工作，大家知道，好歹也算个诸侯王，混的也还可以。但是，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讲，似乎有这样一个更好的机会，有这样一个更好的平台，有这样一个更好的可以教书育人的地方，何乐而不为？所以我决定到人大来。这当然首先是人大这些老师们，学校领导们的感召和他们热情感动了我。随后，在两届学院领导班子的努力下，特别是孙家洲院长这届班子的极力推动下，很快就组建起一支教学队伍来，有了最基本的力量。我经常开玩笑说，欲想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我们很多情况下不懂这个基本的哲学道理，我们认为领导不懂你的专业而不跟领导反映你要解决的问题，那你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你要想领导重视你，就要不断地跟领导去谈，要重视领导的作用，这样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我说的

都是实话。我们人大的考古，就是人大几届的学院和系的班子，由他们不断地和学校的领导宣传，我们才在一级学科建设上能赶上末班车，才能在今天举行这个系的成立仪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反过头来要特别感谢我们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以及院系的领导对这个专业的支持。

刚才冯校长给我们提出来很多的要求，我觉得这几个要求都是实事求是的，我也不想说更多的话，就表个态吧，因为我们深感今后这顶帽子扣在头上责任重大，我想谈这么几点想法：

第一点，要继续重视人才引进，加强队伍建设。这十年我们进了十个教师，包括人才引进和毕业生安排。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要支撑一个系，我们有几个门类还不够齐全，还要按照学科的需要继续引进优秀的人才。目前，我们教师的年龄结构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可以说，我们已经过去的十年是打基础、上规模的十年。如果再有十年，等我退休以后，我们现在正在当打之年的四十多岁这几个教师到五十岁，现在刚刚毕业的处在发展阶段的三十多岁这几个教师到四十岁的时候，人大考古就不应该还只是今天这个样子。我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想，人才的引进，队伍的建设，是我们整个事业发展的一个保障。我想在这一点上刚才校长也已经讲了，我们人事处长也在座，这一定是将来我们学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第二点，要搞好教学，加强人才培养。毋庸讳言，我们是高校，我们是要教书育人的。我想，一个学校要有好的教授；一个学科要有好的学科带头人，并且有一个好的梯队。但是反过来说，有再好的教授，再好的学科和设备，教不出好的学生来，那也是白搭。所以，人才的培养，培养出像样的学生来，在社会上能够站得住脚，能够立起一面旗帜来，才是我们教学的根本。当然首先我们培养对社会有贡献的劳动者，但我们是高校，要培养更高端的人才，所以我想，抓好教学，抓好教材的建设，都是我们今后人才培养要做的事情。目前，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些布置，将来会逐步做起来。

第三点，要促进学科的发展，努力多出成果。这是我们今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从去年开了第三次东北亚会议后，我们就着手在编撰几本论文集，包括我们的纪念文集，大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调过来的同事的一些田野报告，都要抓紧出版。明年就将是人大考古步入十年的一个关口，我想到明年搞一个十年的小型学科建设研讨会，在那个会上我们希望能给大家拿出一批自己的成果来，发一套书给大家。成果是通过著作、论文体现出来的，这一点我们指日可待。

第四点，要加强合作，广交朋友，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还将继续和学界诸位朋友们，和国家及省一级的科研院所加强联系。刚才冯校长也讲了，

我们需要这个热乎劲，我们这个学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热乎，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但我们比他们有点文化；也像他们能喝酒，但是我们还能写科研论文，这是我们这个行当的特点。我想继续保持和发扬这样一个作风，我本人和我所在的团队，都会竭尽全力和学界朋友们保持良好的互动。我们要广交朋友，认真落实我们和国家文物局几次商谈要办的野外实习基地的工作，保证学生的实习能够有保障。这几年我们跟许多省所都有一些联系，我们还要加强和各省考古研究所的合作，多搞科研活动，比如帮助一些地方进行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都和科研项目结合起来。其实这些年我们现有的很多科研项目都来自地方，有的是和业务主管部门的科研合作，这样便于人才的培养，也便于经费的获取。

今天这个场合确实使我比较激动，说到这里，想起了刚才在网上看到一个同学写的一些考古的回忆，想起当年在居延考古的时候，沙漠戈壁之中很无聊，但有信号时，就拿手机发一点打油诗散心。我曾经发过的一些打油诗，好多同学都还记得，经常还会给我发回来。有首打油诗的后两句说的是："老酒一壶群贤至，邀得高朋慰平生。"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场合，当我们要办一个活动，要在一个发展的关口需要大家支持的时候，这么多朋友能过来就是群贤毕至！刚才冯校长讲得特别好，各个地方的负责人，各方面的领军人物，今天能够齐聚在人民大学，虽然人不多，但作用很大。所以将来人大考古这个学科的发展，要靠在座的朋友们，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领导，包括我们的同学，大家都是事业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所以我会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为人大考古学科的健康发展，我可以做到鞠躬尽瘁，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

下午好！

很高兴能够赶上参加人大考古文博系的成立大会。我在外地出差，本来预计今天中午十二点半到，因为现在飞机经常晚点，所以我改在昨天半夜登机，今天凌晨两点到京，来参加这个会议。作为一个考古人，我很高兴，我们的人才培养又多了一个重要的基地，就是人大的考古文博系。所以在此我要向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魏坚是我的好朋友和师弟，2004年到人大，说实话，他来的时候，我们考古圈一些人也是比较担心的。一个人到高校来办考古专业，究竟能够办成什么样，说实在大家心里是没有底的，但是我们都很支持。因为我们觉得，在人大这样一个人文社科的重镇，一个人文社科教育顶级的大学，建立考古文博专业是一个大好的时

机。因为从总体来说，考古学是一个朝阳学科，刚才哪位领导讲，我们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延绵不断，现在至少可以说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国土相对辽阔，考古资源丰富，人才需求巨大。所以，考古发掘研究，博物馆的发展，还有我们的公共考古，大众的考古知识培养，就人才来说，需求量是很大的；而且就大学来讲，感觉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跟我们考古事业的发展来说，在人才培养上，应该还是有缺口的。那么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不是管用的人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一点，在这里我要对人大的领导、历史学院历届的领导，如我比较熟悉的陈桦院长、孙家洲院长等前任的领导表示致敬！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眼光，引进魏坚等一批人才，我看了下纪录片，从考古专业到考古系的建立，九年间做了六到七件事，从成立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2005年招收硕士、博士，2007年建博物馆，然后2010年建立一级学科，2011年建专业硕士点，2013年又开始招收本科生。我觉得，一个学校在九年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事，迈了好几大步，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尤其是在从无到有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应该向人大的领导、历届的院领导以及人大相关的职能部门表示敬意！

第二点，我觉得考古文博系成立了，这是一个好事，应该是个新的起点，因为我们在这九年，看到人大发展，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魏坚讲的这个凝聚力。确实无论来这讲座也好，开课也好，可以看到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我觉得这是考古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凝聚力。第二个就是对考古的这个实践性的重视。我们可以看到，让历史专业的学生都参加考古实习，这个我觉得恐怕在全国的院校当中也是不多的。尤其是考古文博专业学生的实习，他们在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每年都要选择考古实习，而且都是认认真真地做，而不是应付。我也和魏坚打过好几次交道，一定要让我们推荐一个好的遗址，有助于学生的培养等等。所以，对考古学生的实践性和实际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第三个就是北方民族考古的专业方向，特色鲜明。我觉得这几个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点，就是在相对困难的情况下的勇于开拓，抓住任何机会，尤其是一级学科调整的机会。我是参加了国内历史学科评议的，在评议当中，究竟有哪些学校可以成为一级学科呢？人大是积极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考古文博系成立的条件下，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坚持这几点。还有最重要的，刚才魏坚主任也讲了，大学应该以教书育人，培育人才作为第一要务，所以考古文博系培养学生，我觉得首先应该让他热爱考古文博事业，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改行了，当然也算为我们国家培养了

人才，但就我们考古文博专业来说，就急需各类专门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朝阳的学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所以希望通过老师的身体力行，让学生热爱考古文博事业，虽然艰苦，但是很有意义，为我们这些考古研究机构多培养一些急需的、热爱考古，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不惧怕田野考古艰苦的人才。当然，在新形势下，比如说，知识的拓展，不仅仅是会挖，还有研究能力，以及对各种多学科的技术手段的熟悉和视野的开拓，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考古学家所必备的条件。所以我们也希望人大考古文博系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像重视考古实习那样，重视学生多学科的这种意识和技能，重视学生的研究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视野的开拓，我觉得如果有这几点，那人大考古文博系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祝人大考古文博系不断地兴盛、发展！我们作为考古的单位，也愿意为人大考古文博系的发展，作出我们一点贡献。谢谢大家！

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水涛教授：

尊敬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历史学院领导：

大家好！

昨天下午，魏坚教授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代表高校考古专业说两句话。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小范围的座谈会，结果没想到坐到主席台上来了，因此还是有很大压力的。因为高校的很多老前辈都在这里，按说不应该我来代表高校发言。现在我只能代表高校说一句话，对人大考古文博系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下面的发言只能代表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好在后面还有一个学科建设研讨会，我想在那个会上，各位高校的学科带头人会发表自己的高见，所以我就在这里代表我自己说两句。我觉得前面魏坚教授的发言很动感情，我也知道，近十年的时间，我们是看着人大的考古专业从无到有，逐步成长起来，今天挂牌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在这十年中间——刚才王所长也说了，做了非常多的实事，实实在在，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人民大学的领导有眼光，在十年以前就布了一个很大的局，这个过程中间，刚才魏老师也说了，没想到在一级学科调整的时候，刚好踩在这个点上了。实际上也不是说刚好，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布局是很难得的一个眼光，从学校发展来讲，从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来说，这是表示了学校领导的重视，有水平。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一个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一个新学科的创立，最关键的是学科带头人，在这点来讲，我想人民大学的领导也是非常有眼光的。刚才魏教授自己讲他的心路历程的时候说过，曾经在内蒙古草原这么多年，有王者的感觉。现在，我觉得他这个王者的感觉仍然在，因为我刚才看那个漫画书上，老魏戴的考古帽

子上还有一个学生给写的“王”字，这表明在学生眼里他还是王，只不过不光在草原上，在北京城里也能称王。在北京城里，从大的环境来讲，不太容易产生新的学科，也不太容易产生新的考古专业，这个是很难的，如果放在一个没有考古专业的省份里头，建一个新的考古专业，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恰恰就是在北京，这里高校林立，研究机构众多，能够在夹缝里头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十年中间就能把这件事做成了，的确是不容易。那么这里面，我想魏坚教授起到的作用，那不是一般人所能起到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对人民大学的领导表示敬佩，对魏坚教授也表示敬佩。当年我们也是觉得，把一个考古专业就这么做起来，可能还是不太容易，现在来看是真的做起来，而且毕竟是做成了。刚才，魏坚教授说了对未来的设想，我听了一下，他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我觉得我们反而有了压力，因为，人民大学的考古专业从无到有地成长起来了，已经开始筹划下一个十年规划了。下一个十年可能就不仅仅局限于北方了，是不是要向南方发展？门生弟子是不是要遍布全国？这对我们南京大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怎么说呢，不是威胁，是压力。所以，我想最后在这里讲一句话，祝愿人大的考古文博系越办越好，早日进军我们的江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研究员：

尊敬的冯校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人大文博系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很荣幸能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成立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借此机会我谨代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也十分荣幸地能够代表其他省市考古研究院的同仁们，向人大考古文博系的全体师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魏坚教授的带领下，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成果，其发展之快，潜力之优，学界同仁有目共睹。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人大考古从2004年设立考古专业起，就立志成为全国优秀的考古院校。十年磨一剑，现在这个目标正在向你们招手。正如前面黄院长刚才介绍的，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你们先后成立了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筹划建立了以北国春秋为主题的博物馆，积极主动与北京、内蒙古、河北、湖北等多个地方考古单位联合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交流合作，建立考古与文博实习基地，多次成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北京高校的研究生考古论坛，为国际间学术交流和青年考古才俊交流提供平台，为地方考古单位和高校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可谓硕果累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2013年顺利获得了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真正成为我们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也为日后人大考古进行田野工作提供了保障。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取得这样快速的发展，实属不易。所以，我在此向你们在教学实践中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也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天，人大考古文博系在此宣布成立了，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我相信有十年建设专业的积淀和执着的追求，人大这颗冉冉升起的考古新星必将后来居上，成为推动中国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也真诚的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也能够与我们陕西考古研究院建立更多的交流合作，能够使我们共同促进，共同发展。最后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够继往开来，再创佳绩！祝各位老师、来宾身体健康！祝同学们学习进步、学业有成！也祝我们的学科研讨会能够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吉林大学资深教授林沄先生：

今天是个庆典，一方面是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新成立了考古文博系，还有一方面，人大考古文博专业在十年当中，有很多事值得回忆，值得庆祝，所以这是个庆典。我来了人大以后很激动，这个激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前两天看了北京雾霾很厉害，到北京来有点担心，没想到来了以后天气特别好，秋高气爽，抬头一看，天非常的蓝，万里无云，正是举行庆典非常好的天气，天气也来参加这个庆典。另一个方面，刚才冯校长也说了，就是参加庆典坐着的这些人，本来以为人也不会很多，却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真是群贤毕至。特别是没想到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也来了。李零教授是我最佩服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在人文学科很多方面都有成就。他研究生毕业后虽然也在考古所起家，但是后来不干考古了，这样一位人也来了，就说明我们考古文博专业，是个很广泛的专业。另外科技考古方面，有朱泓教授，还有搞冶金考古或其他方面我不太认识的人，也都来了。还有像曹锦炎，虽然当过考古所所长，实际上他是搞古文字的，当然古文字也是跟考古搭边的，所以今天实在是群贤毕至，济济一堂，确实说明很多人都很关心人民大学考古文博专业的发展。所以我很激动，人民大学的考古文博系一定会发展得很好，前途无量。所以我就说几句话，谈谈自己的感想。

首先，我觉得人民大学的考古文博专业发展起来，跟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的培植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好多兄弟单位都帮忙，所以发展这么快。但是我觉得当中还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学科的领军人物魏坚。魏坚虽然是我学生，但我不是在这里说学生好话，因为我觉得这个学生，我很不如他。要说做学问，我做学问也算方面比较多，但是我跟人家老说，现在中国考古界的人物，能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做到明清，只有这么一

个，我学还学不过来。我指导他做博士论文，写的是元上都，其实不是我指导他，而是我在指导过程中学点元代考古，我们搞考古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哪个时代都搞，但他是个例外，从旧石器一直搞到明清，而且都参加过实践，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再说做人呢，我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他的人缘好，教课也教得相当好，我恐怕还学不会，我也已经到74岁了，想学也不一定学得像，我觉得有这样的领军人物，人大考古文博专业会发展得更好。

另外，我很佩服这个专业发展所做出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基础打得好。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发展考古文博专业的基础打好了，比如说很早就建立了博物馆，就有了文物的基础，还有就是获取考古团体资格，这个很重要，要搞考古专业，没有这个不行，现在有不少大学还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也要搞考古专业、博物馆专业，我看就不大实际。人大在还没有考古本科生的时候就带着历史系的本科生出去搞考古，这个非常重要，考古专业没有实习那是不行的。现在这个考古本科培养计划里面有半年的田野考古，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他们培养文博专业硕士，因为教师不够，就想了一个办法，除了安排本校教师指导，还再聘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校外老师来指导。我本来一直很希望文博专业硕士能尽快发展起来，因为文博事业需要很多原先大学培养不出来的人才，如果校内校外结合，那么就能快一点地培养出专业人才。现在我对人大抱很大的希望，希望在培养文博专业人才方面做出经验来。总之，将来要发展，先把基础打好了，我觉得很重要。

第二点就是眼光比较高远。比如，刚开始招研究生，就想到研究方向要有中亚考古和中西文化交流，这个眼光就放的比较远。现在要正式招本科生了，就想到要有宋元考古教研室，还要有科技考古教研室，这个都是考虑得比较长远。有好多搞考古专业的人，是有什么教师就教什么课。现在人民大学的做法是考古事业需要什么，我就设置什么，这就看得比较高远。对魏坚本人我有一个印象，当初他还在内蒙古考古所的时候，还在考古发掘时，他就想到将来要写报告，就提前培养手下技工有的会照相，有的会画图，要先有技术人才。所以魏坚能在做完田野工作后不久就及时出版了几个考古报告。他现在办考古文博专业，也是考虑到了将来要做什么，就先做好准备。因此我觉得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办起来以后，一定可以办得很好。据说今年刚开始招了六名本科生，不知今天开会学生来没来？大概来了吧。我问过魏坚，你们都是按照历史学门类入学的，学考古是你们自个选的，我非常赞成。我认为你们这六位学生，虽然人数不多，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会不后悔自己选了考古，而且我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像黄埔一期学生那样，将来成为从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考古骨干，一定要为这个事业而奋斗！

附录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学科建设研讨会发言辑录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

各位来宾、各位学界同仁，今天下午是“学科建设研讨会”，作为主持人，我先来说几句。我们人民大学的考古学科刚刚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今天考古文博系的成立，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学界同仁前来捧场，也让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今林沄老师特地讲了这个问题，我们能走到今天，没有大家的帮助，离开哪一步，都是无法做到的。今天刚刚有这么一点小的起色，就得到大家如此热烈的捧场，真是心生感佩啊！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想还要有很多专业上和技术上的问题，比方说学科方向的定位、教学上的安排、今后人才的培养等等方面，都希望听听大家的高见。特别作为考古这个专业，更多的是要实践，需要各省的考古研究所，特别像社科院考古所这样的大所的支持和培植，我们才能把今后的事情办好。所以这个事情有连带性，不是光靠几本书，一个课堂教学就能完成的。所以今天大家既然来了，就应该给我们支支招，出出主意，帮帮忙，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畅所欲言，共商大计。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

我就先说吧。魏坚来人大九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做了这么多事业。因为我是一直在学校工作的，所以我知道教育部在设置本科生专业时是非常慎重的。它不像研究生，因为研究生的这个专业在一级学科涵盖下还可以再设置，但是本科生的这个专业，好多年以来，教育部原则上是不增不减。就是说你这个学校要增加一个本科生专业，原则上就要减掉一个才可以再增加。除非你论证的特别好才能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所以我觉得呢，魏坚到人大来，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各部门的合力帮助下，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这和魏坚本人有很大的关系，这倒不是因为在人大，当着学生的面在这吹捧他。应该说九年零四个月以前，魏坚的人事档案是在吉林大学的，是我在吉大给你督着，然后转回内蒙古，又从内蒙古转到了人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本来是想把魏坚引进到吉林大学去，增强我们的师资队伍。因为大家也知道吉林大学主要是在边疆地区做工作。那么魏坚在内蒙古考古所干了这么多年，一直在边疆做工作，应该是我们的最佳人选。所以当时已经征

得内蒙古文化厅那边的同意，把档案已经给我们发去了。就在这个情况下，魏坚又准备到人大来，当然他的想法跟我都是充分沟通过的。后来我也是支持他到人大来的。我觉得，魏坚在九年前要是到吉大去，我们吉大的考古学科的建设也会更加进步，因为多了一员大将。但是我们做出了一些牺牲，成全了人民大学，给他们派了一个学科带头人，在九年多就出了一个学科一个专业了，也许也正好赶上了一级学科调整的机会，给人民大学增加了一个一级学科。在大学的学科建设里，要能增加一个一级学科，那简直是非常大的事业。所以说，魏坚本人的魅力和他自己的性格特点决定了这一点，他做事很认真，而且持之以恒，坚持到底，肯定要把这事办成。当然还有这边人大的年轻老师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也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人大的学生，这是吉林大学比不了的。因为在中国，高考考文科的学生，当然第一是进北大，那么除了北大以外，大概接下来就是进人大，接着是吉大。在文科里面确实是凝聚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这比我们吉林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占了优势。我们得费挺大劲把本科生培养好了，对专业非常热爱，基础知识也扎实了，到读研究生的时候，首先是免试推荐到社科院的考古所或是中科院，还有就是人民大学和其他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我们从来不保守，我们都是完全尊重学生的意愿，把他推荐到他更感兴趣的地方去。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学生和人大的学生比起来，肯定在高考之前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人大的这个考古文博系能够发展非常好，非常快，既有来自老师和学科带头人方面的原因，还有学生的因素。人大历史系的学生转过到考古以后，很快就进入角色，他这个基础就是很关键的。

如果让我提建议的话，我讲两个方面。给我们发的材料里头，分成四个教研室，刚才林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考虑的非常周全。因为你一定要至少有三个团队，你才能满足教育部的各种学科评估。可是仅仅三个团队的话，就显得是刚刚达到标准，你如果一起步就设置四个团队的话，那教育部不管评什么项目，你就都达到了。你要只设两个团队，你就不符合他的要求。因为要想评重点学科什么的，你至少是要有三个团队，四个是正合适的。因为吉大和北大我估计也是这样的，老师比较多，我们是设了五个团队，但是你们有四个团队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应该按照这个模式来建设。今天，人大的常务副校长在讲话里，直接提到了未来的人才培养，我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实在话，如果是按照四个团队建设的话，十个老师还是少。一个团队至少要三个人以上才可以。你要是想申请重点学科的话，一般需要有三个教授。所以我建议你们专业教师的编制，考虑到五年计划的时候呢，是10人到15人，如果十年计划就该是20到30人。按照中国的大学应该这样。北大现在

是没问题了，凡是做得好的一定得成规模。你要是跟西方的大学比较，那完全是两回事，他那个学校是完全没有人去评估他们的。十年以后你要能达到30人，要是五年以后，你能达到15到20人，这个规模就可以了。足够应付教育部的各种评估了。当然你不能一下进度太快，进度太快的话这个职称是会很麻烦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考虑好，这是一个方面。

再有一个，既然人民大学成立了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就要继续保持你们的优势和学科的亮点。就是说教研室的四个团队是按照类别和年代划分的，但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是可以从早到晚一直贯穿的，既有传统的考古，又有科技方面的配合，这样四个团队才能形成一个合力。所以我觉得你们还要坚持你们学科发展的这个重点，而重点的中心还是要围绕北方民族考古来做工作，不是说所有老师，所写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北方民族考古，而是要引导这些老师主要的研究兴趣方面，要向你们学科的重点方向靠拢，特别是年轻老师。这样的话，一旦教育部再推出一个什么工程什么计划的时候，你们就具备了申请的能力。如果各干各的，连一个符合的名字你都编不出来。要是这些老师绝大多数的文章和项目都和北方民族考古比较靠近，在写申报材料的时候打这个名字，否则的话就拿不出去。这就是在吉林大学为了发展考古专业，我16年整天琢磨的事。因此，我对教育部的政策都是非常认真学习的。我就说到这吧。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

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活动，有机会来祝贺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考古文博系这样一个新的机构的诞生，这是中国考古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简单说下我的一点建议。我觉得作为一个新的机构，在它的教学布局、专业设置、队伍建设方面，前期的基础构思一定要重视旧石器考古的研究。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确实被严重的压缩了，被淡化了，被忽视了，要知道人类百分之九十的历史都是在这个时段下的。但是，看看我们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体系，真正能用专业队伍研究教学的真的很少，在座的很多大学考古做得很好，风生水起，但旧石器基本没人教，没人学，没人搞。对于这个局面，我觉得人大作为一个新兴的机构是否可以改变？林先生也非常重视这段，跟我说过是可以出彩的，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思维，我们无论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都是共通的。而到后来的研究区段，区域性、国家性的特点非常强，别人可能搞不懂你的，或者不感兴趣。但是古人类、旧石器大家都会感兴趣，高度国际化，很容易和国际接轨。另外作为一个教学研究机构，没有这个时段人类历史的研究，你的机构肯定是不健全的，队伍肯

定是不完整的。还有像咱们国家的资金渠道、资源配给方面，在古人类研究方面能够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可以得到很多自然科学基金，很多项目可以拿到经费，能够解决很多资金问题。还有，这一领域应用了很多的科技手段，而且都是比较新的、国际化的，可能会带动其他领域的发展。包括在就业方面，现在很多大学的老师、同仁都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很多研究机构都缺人，就业市场是很好的。从多个方面来考虑，我建议人大一定不要忽视旧石器教学研究领域。从我们研究所的条件来说，我们也愿意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比如说，在教学师资力量方面，我们已经推荐了仪明洁作为师资博士后；我们还愿意来承担一些教学实习工作，比如我们一些旧石器考古的发掘工地，完全可以为人大和其他大学有这方面兴趣的同学的实习敞开大门。我想即使各个学校组织有专门的考古实习，但是不会有专门旧石器的实习，人员也不会多，那就完全可以纳入我们的研究队伍，利用我们的工作条件进行特殊需求的实习。另外还有教学的标本、模型和包括出版物，我们也愿意全力来支持，共同把这个工作做好。

吉林大学资深教授林沄先生：

这次人大成立考古文博系，开学科建设研讨会把双古所的专家也请来了，我觉得是很有眼光的。我们开考古的会，一般都不会请双古所参加，所以我觉得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作为刚起步的考古学系要发展的话，如果高星有这么大的热情给予支持，我认为魏坚该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吉林大学也是靠陈全家一个人，就把这个学科搞起来了。北京搞旧石器还是有地理条件的，有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我觉得魏坚应该考虑，是不是在这里能发展一个旧石器专业。

魏坚教授：

非常感谢林先生的提醒和高星教授的全力支持！我们是要做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逐渐健全这个学科门类。除此之外我们要有动物考古、植物考古。我们国家的旧石器考古确实比较薄弱，我们请来的名家都是国外的，我们的学生要想培养的好也得送到国外去。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是比较大的学术问题，请高星教授做讲座时就深有体会，接下来就我们就商量这件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杭侃教授：

首先对人大成立考古文博系表示祝贺！我与魏坚老兄认识比较早，1998年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内蒙古草原瑰宝展览，那个时候就觉得他很有人格魅力，干事情很爽快。2004年听说他来了人大，短短几年就把学科建设这件事做成了。2007年我到北大之后，感到教书育人对我来说是

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压力。他能做出这么大的成绩来，我是非常敬佩的。另外，我觉得在祝贺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压力，一定角度上说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事业发展来说这也是好事，有竞争才有活力。刚才几位专家、领导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大学里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的发展，一个大学不可能什么都是强项。包括北大我们也在想我们该做什么，比如我们的陶瓷。陶瓷考古作了二三十年，我们要保留这个特色。所以我们办了陶瓷通讯，刚刚我们又出了玉器考古通讯，明年我们准备出中亚考古通讯等等。我们自己也在考虑我们要保留哪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高校既是对手，又是互补的关系，我们应该互相支持，互相补充。

成立新的专业我们大家都祝贺，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在北大，去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去年古建只有一个人，我们面临怎么组织教学等等很多问题。我觉得一个学科在保留优势的同时还要跟踪学科的发展。我举例，比如耶鲁大学有一门课，翻译过来叫“考古学与素质材料”，据我所知在国内还没有大学开这门课，通常我们总是在抱怨考古的纪录片拍的不行，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也没有培养这样的人才嘛！假如我们培养了这样一批学生，又能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在西方，有不少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是能扛摄像机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不仅仅是这样，包括他的记录手段的变化，他的记录手段变了，他的出版手段也会变，他用数字化的手段看整个考古发掘，他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大家都说北大好，好在哪里？“一塔湖图”图就是图书馆，我把图书看成信息，学院的图书资料是我抓，我不把它看成借书还书的工具，我把它看成是信息平台。所以我们连续出考古通讯。我们的陶瓷考古通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只要哪一位研究人员他有需要，我们就免费提供拷贝。在新的时期，信息的表现形式在变，过去的纸本，未来还会如何发展？所以会间我就请吴东风先生去北大给我们介绍这个行业最高的信息化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在保留学科优势的同时要跟踪学术发展甚至引领学科的发展，这是大学应该做的。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陈洪海教授：

人大成立考古文博系，首先，我表示真心祝贺！现在很多高校在办这个专业，我认为办的越多对我们的学科、对我们的影响力的提升越有好处。就像在一个地方孤零零一两个饭馆没人去吃饭，有一片饭馆的话，所有的人一到吃饭的时候都往那儿跑，那一块就热闹起来了。从这一个角度来讲，高校里考古专业、文博专业这个大家庭里面，咱们人越多越热闹，肯定对咱们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

第二，我表示非常佩服魏坚老师。魏老师当时调到这边来的时候，当时也赶上潮流，很多考古所里的人都往大学调，调过来有一些真是来干事了，有一些是到大学里来想玩一玩的。当时就想魏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后来看他干的事，听着谁又调过去了，就觉得还真是玩真的了，人越来越多，又赶上机会好，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他们一级学科博士点什么的都下来了，给他玩真的创造了有利条件，到现在就已经开始招本科生了，从招几个研究生到可以招研究生一个专业，发展到招本科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很多高校可能进来几个人，但很多都走不到招本科生这个程度。因为我觉得从研究生培养到本科生培养，就好像几个人做媒体，可能三四个人合伙就办一个杂志，他一个月出一期，他就能把一份杂志办好，但是要是想办一份日报，每天都出版的话，那恐怕就得一大群人天天盯着。所以，从招研究生到招本科生，也好像从办月刊、双月刊到办日报的区别，需要投入和付出的精力就非常大了，要求各方面条件都得达到。也就是说，不光一个方向或几个人在那儿干，必须基础条件相互配套、人才培养和学生管理等一系列事情全来了。因为研究生好说，他读了研究生就想干这个专业了，一般学习态度好，即便基础差一些，但他态度好，带起来总好带。但是带本科生就不一样，吃喝拉撒睡，乱七八糟什么都要管，你就得整天盯着。所以一旦招本科生压力一下就变很大。那么人大从招研究生发展到招本科生的阶段，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可不是说笑话，而是玩真的了。所以我非常佩服魏坚老师，然后汇集了这么一个比较团结，比较有战斗力的团队，有十个人了，当然后边肯定还是得再进人。时间不是很长，把事张罗成现在这样一个规模，所以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第三要说的是，怎么样把本科专业发展起来。前边朱老师和杭老师都已经说了，尤其是朱老师，管这个考古专业，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培养，管了这么些年，我这经验没朱老师多。我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考古专业那时候在考古文博学院下面，我负责考古、文物保护这些专业，也是整天愁这些本科生专业，经历了好几次本科生培养方案的改革，一次一次的论证，整天琢磨着怎么样发展，跟朱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也就是有了这个规模。后面还是会遇到改革的困难，怎么样做出特色来，怎么样能拿到相应的平台，以后各方面的支持通过一些平台下达下来，没有这些平台的话，你就没有获取支持的渠道，那么后一步怎么样组成团队、形成特色，然后再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后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当然也相信，并预祝人大考古文博专业办得越来越成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

第一点，祝贺人大从今年开始正式成立考古文博系，我觉得考古系也好、文博系也好，名称不是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是开始招本科生了。所以水涛教授讲感觉到有压力了，但是我觉得在短期内我们还感觉不到压力，但从长远看这是肯定有压力的。我觉得最应该有压力的应该是北大，因为我们现在本科生招生，从生源看，我们这些外地学校不如北大，所以你们将来办好这个专业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全国都是万里挑一的学生都送这儿来了，就应该办好。而我们情况就差一点，心理压力就小一点，所以我觉得十几年、二十年间走在我们这些学校前面是必然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点，说一点恭维的话，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人把这个专业搞得有模有样确实很难，要是我就做不来，我们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而这是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我觉得这里艰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原来还想到人大来，但就觉得太费心了，做成这样真是不太简单的。

第三点，说点建议吧。我非常同意朱泓老师刚才说的观点，就现在考古学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方向，不用讲中国这么大，就是你放小了讲一个地点，也和三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你要做的事情确实太多了。任何一个科研单位——除了社科院考古所之外，包括北大，将来估计都不可能做到全面领先。想在很多领域都领先，社科院考古所也许可以，其他的我觉得都不行。所以我们要选择我们发展的圈子，选择范围和方向，包括我们的学校。大家经过几十年的过程，都有这样的一个考虑，有些是可以引导的，有些不一定引导成功，但是有和没有完全不一样。作为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学科领军人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做好规划，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我觉得这是个责任，也是最难的。不是说我给你找个工地、给你个项目、给你弄点钱就可以了，现在来讲这个要求比较低，钱多钱少不是什么大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有好的团队。平台建立起来了，人自然就多了。其实不光是考古学，所有学科都是这样的。最终的竞争都在于人才竞争。过去我们想出个书，还自己花钱，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吧？杂志办起来了，现在我们最缺的是文章，是最好文章，所以我觉得人才是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建议，有了本科专业，这和研究生培养差别很大，所以我觉得上本科生培养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在座的很多是考古所所长，大家都很清楚，中国考古学这十几年来，确实在慢慢地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20多年以前，俞伟超先生提出来了很多人都不理解、不接受，但是从现在情况看，考古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过去考古学研究的类型学、年代分期等等，八十年代百分之九十都是做这些，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考古学真正要做的是对当时社会的一个研究，社会研究需要的资料信息是多方面的，你获取信息的

手段就和过去我们讲陶片、拼陶片完全不一样。这样，你在学校里面教什么，你发掘的时候就要怎么来训练，我觉得这都是在本科生阶段应该研究的问题。此外，相应的就要考虑把实验室建设好。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在步北大和吉大的后尘，现在有七、八个实验室。将来学生就直接在实验室先得到体验，比如动物考古学等，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在实验室都做过、看过，这样才能提高水平，才能达到和世界考古学的接轨，我们还按过去的思路是不行的。在学校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房子，现在钱都不是最大的问题，买个设备、买个显微镜、买个扫描电镜，也不是什么困难事，最困难的还是房子。所以要给校长宣传，让领导重视起来。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什么实验室都建起来，先把三个五个建立起来，一个大学来说，这是最低限度。所以以后这方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做的时候可以避免我们的弯路，我们开始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哪点是成功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这是我找到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曹锦炎教授：

我觉得这次我是来向大家潜心学习的。我到浙江大学四年了，这四年我感觉难度在哪里呢？就在于本科生的问题。我们原来有一个文博系，文博系以博物馆学为主，所以它对考古反而是排斥的。所以陈淳的学生、王昌燧的学生，都是做科技考古的，到了浙大以后什么课都开，但是不往考古上做。所以我们现在两部分是分开的。我们这边当时就想把考古专业做起来，怎么做呢？一个就是千方百计引进人才。但是浙江大学没有像人民大学这样的人事政策的支持，第一，原来是省级考古所的，政策不承认，你要进来就要重新评职称，那人家都是那么多年的研究员，凭什么到你这里要重新评。第二，原来是高校的可以进来，但必须是985、211大学，除此之外免谈。这样的话，进人难度很大。当然这样也对，先引进领军人物，再让领军人物来引进人才。我去年也做过努力，引进过领军人物，但后来没成功。所以我这次来真的是想看看人民大学是怎么做的，这个是我的目的。

朱泓老师前面讲得很好，就是你的系建起来要有特色。人民大学现在抓住了北方民族考古，我觉得这个挺不错。我们在那边现在抓了两点，一个是科技考古，因为浙江大学理工科基础特别强，特别是计算机、数字化这方面，数字化处理一直是我们在做，这个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一个就是地球物探技术很好，我们买了300多万的设备就是专门用于勘探，但是这个勘探首先要明确是作为考古的调查，而不是代替了考古。这个明确了我们再做。所以我在想，就是你的特色要有。如果我们什么都管，那南京大学就在旁边，你去做什么？此外，如果我们把科技考古这块做好了，

其实浙大有很多，包括DNA技术，都会做，但是老师就不敢进去，^{13}C、^{14}C设备都有，都是空着放在那儿的，都没有用在考古上。所以我就在想怎么样用领军人物来做这些，所以我是向魏坚老师来学习的。

我有个想法，就是今后我们高校之间怎么加强合作。给大家报告一个信息，我们从艺术考古的角度，今后的想法是往中亚考古这方面发展。我们去年从美国买了三套这方面的图书，美国一个做中亚考古的权威教授退休了，他委托书店卖他的书。我们知道了以后，就花了几百万美金把这批中亚的图书买回来了。因为我们博物馆已经建起来了，考古本科生没有招生，硕士、博士已经在招生了，就是科技考古方面的。那么我想中亚考古这批图书，在今后中亚考古这个方向如果我们能合作的话，可以合作。当然今后如果大家在中亚考古有需要的地方，我们在图书方面可以为大家提供方便。如果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高校之间可以利用资料进行协作。我们学校这一点很好。也许我们将来专门建一个艺术史资料室，将来看怎么样能使大家都可以利用。

魏坚教授：

考古专业加上文博专业之后，艺术史这方面是绝对不能少的。我从外面走一圈回来，很多地方，包括台湾，很多学校只要跟这个专业沾点边一定有艺术史，中国的、西洋的都有。没有这一块，将来的博物馆这一套没法做，咱们在这方面确实还很薄弱，基础不行。

曹锦炎教授：

因为我们主要是跟普林斯顿大学的关系，所以这方面都是垂直的，就是在这方面考古的书，我希望如果将来我们几个学校合作，或者到我们这里来，大家可以互相当兼职教授，考古所的人也可以到我们这来教书，我们也可以给别人教。水涛为什么不可以在我们这里当兼职教授，每年工作三个月、半年，不好吗？

水涛教授：

大家都听到了，我明年就去写申请。

魏坚教授：

谢谢！很好的信息。中亚我们早就在做，新疆那年搞了一个联盟，新疆考古联盟有一个框架。今年本来要去做一些工作，结果因为其他事耽误了。因为这件事，我们已经从新疆连招五个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来读研究生，第一批马上就毕业了，而且都是能讲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的。也有外国学生是做伊斯兰建筑研究的。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胡耀武教授：

我谈两点感受。第一点是人大以魏坚老师为首的这个团队工作热情很大，花了不到九年的时间建立了考古文博系，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第二点就是魏老师团队的学术思想的活跃性还是很强的。从2004年进人大之后，魏老师开了很多的国际学术会议。关键是整个北京地区高校研究生的学术氛围，这几年他办了好几届北京高校研究生考古论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生学术思想的交流非常活跃，带动了北京各高校的学术交流，同时还邀请了校外的很多单位参加。去年我们有幸跟魏坚老师、跟社科院考古所各办了一个考古论坛，今年还是延续这种方式，进行下一届的举办工作。这本身对北京市的学生之间在考古学认识这方面的交流有所帮助，扩大了视野。

这是两点感受。第三点，从我自己学科的角度来谈，我们是科学院大学，讲究自然科学和人类。我们每年有很多大学的学生来我们系学习，我们非常荣幸。我们不断感觉到，学生的本科知识结构，怎么样在进入研究生期间和现在的结合起来。我们中国很早就实行了文理分科，进入科学院大学以后，很多学生也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不足。所以这也造成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科技考古发展从很早就开始了，到现在很多大学都开科技考古的课，也有实验室，但总体上科技考古和考古的这两个学科相互接触的融汇点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考古学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不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与考古学的结合、对考古学问题的认识也不够。归根结底，还是两个知识体系结构，在相互认识上的基础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魏老师建立了考古文博系，能否在培养考古学人才、具有什么样的知识体系结构、能够胜任今后的研究上下些功夫。我们可以以国外的研究生作为示范，国外很多都是公共专业，不同专业相互进行匹配、相互沟通。所以我觉得可以建议魏老师，在招本科生的过程中，招收一些理科的同学，这样在本科阶段就有一个文理相互交流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考古学本身的知识体系结构，能够更好地为今后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基础知识体系的培养奠定重要的基础。这是我的一些认识，谢谢！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李延祥教授：

我接着耀武说。首先我建议在你们的本科生的课程设置里面，应该设置数理化。高等数学必须得学，特别是统计学，将来要用的软件，不懂数学就没法儿用。要有物理化学，这个你要不学，将来那些个科技手段，你不知道怎么问人，也不知道怎么做，人家蒙你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三门课，过去讲数理化走遍天下，将来你们自己往深里发展，各种技术手段、科技

手段，要为考古服务，这才有后劲儿，这是国际化大趋势，还有天文学等恐怕都得涉及。就是说知识结构不能太陈旧，特别是单一的知识系统不可能让你有发展的后劲儿。可以上学校的通用课。学校一般有通用的数学一、数学二，可以直接选，然后你跟他们考试，不是说我们自己再找老师。

再一个，就是要加强科技的利用，这个是世界的趋势，我相信魏老师会有准备的。但我得提醒你们，一说科技利用，各大学就全买设备，你可千万别买设备，我敢说买了设备到博物馆也好，到考古所也好，基本最后都成了文物。因为我发现很多单位大批设备几百万买回来，一年用不了几回，那实验员水平也差，水平好的也不在你这干。所以人民大学要考虑，有多少好设备是自己能用的？人民大学没有的北京大学是不是有很多？所以，不要简单的买设备，是要加强对科技的理解，对科技原理的培训。其实对于有些事业单位来说，不买最好。考古的事业实际上是在田野上，有那些钱，你把田野工作做好。你把几百万砸到田野上，还能摸清一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你把几百万买个大铁疙瘩放在那儿，三年两年都不用，发挥不了作用。各大学各研究所都有这种情况，一搞基础建设就给你上硬件，买几个铁疙瘩放在那，不是刚才陈老师说了吗，他们实验室有多少好几年不开封的设备，是不是？我就说这么多。

陈洪海教授：

很多投资放在那儿转悠不动，就是让人参观、让人看看我们有啥。其实我们有啥体现不在项目上，体现不在成果上，这真是非常大的浪费。

李延祥教授：

如果让你们买设备，买几台好车，买点田野上一般的小设备就行。你不要尽买那些自己操作不了的实验室设备。咱们田野考古的买直升机都可以，所以你得考虑这个专业，所以咱不能一刀切，都得买设备。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余西云教授：

这些年跟魏教授互动比较多，对他的这个激情澎湃印象特别深刻，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也觉得自己还有点激情，但跟魏教授比，还差的比较远。能够白手起家把一个专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很不容易。特别是和我们这个成立比较早的专业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反而觉得很惭愧，没有像魏教授一样搞的风生水起，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作为一个比较老的专业，还是也有些自己的想法，这些年林先生对我们也是有个期望，在学科建设这方面，主要目标还是想建设外国考古这一块，包括人才的培养和将来的人才引进，想走到这个方向上去，目前还是很困难，我们好像也使不上劲，但是我们期望几年以后，能够有点效果吧。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助理郑君雷教授：

简单说两句。第一个就是非常佩服魏老师在人大的发展，这方面的情况我很清楚。第二个就是很高兴，因为考古学科越多，在我们学校里讲起话来，校领导也就会更重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刘毅教授：

简单地说，第一个就是时间过得非常快，非常不容易；第二个就是祝愿人大的考古文博系越办越好！第三想表达是，对于你们这个环境啊，很羡慕，嫉妒，没有恨。我们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刚才杭侃兄说的这个图书资料，我们历史学院原来就是有一个管图书资料的副院长，我有一次开玩笑就跟他们说，就是所有的钱花光了就是不买，钱浪费掉几百万。所以我就说我很羡慕你，希望你越办越好，以后有机会我们能有更多的合作，也希望各兄弟院校给我们南开多输送人才。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

我刚听好几位意见，大家都是非常希望这个新的考古系能够成为一个各个门类都比较齐全的体系，我想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很难做到。其实刚刚起步，还是应该抓住魏老师自己擅长的一些强项。现在好多高校都想成立考古系，比如说以前清华大学就说，他们不成立，因为北大有很强的考古专业，他们办艺术系，因此他们把工美合并了。所以我想，魏老师以前就是主要在内蒙做工作，内蒙古跟北京地区，特别是河北北部地区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我看咱们很多实习都在这一带，所以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所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拓广一些，因为这个北方地区是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中亚甚至是西亚整个丝绸之路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个长远一些的规划，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的力量和能力。我想这样做可能比较现实。其实我跟魏老师有缘分，他经常到北大考古系参加答辩，而且他也给我提供很多帮助。对人民大学来说，我就是这个院儿里的，我的一生的前二十年就是在这儿。所以我跟人大有缘，跟这个内蒙古也有缘，因为我就是在内蒙古插的队。现在，我希望以后还是能够跟魏老师多多地学习，今天来主要是恭喜人民大学考古系的成立，表示祝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李永宪教授：

今天很感慨，我和朱老师有点一样，我是1997年做了教研室主任，所以也是会经常琢磨学科建设方面的事。大概是2004年以后，七八年以前，我们有一个高校考古专业的一个什么会议之类的，碰到了魏坚老师，他很调侃地

说，高校的考古联合会议为什么不带我玩？这次是他带我们玩了。人大在这开会把大家都招来了，对于这个我很感慨，这算是共勉的话。

谈到建议呢，我们在大学考古专业转了几十年，所以有一些建议，也许用得上。第一个建议，刚才两位科技考古的老师已经提了，我认为很好。就是说甭管你以后是做商周考古、民族考古、内蒙古考古还是什么考古，一定要把握这个大趋势，就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都受到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手段的强烈竞争，所以这块不能扔掉。不能说我是做考古的我跟科技就没有关系了，对于是不是买设备还是干什么，那个还可以再考虑。我同意刚才李延祥老师讲的，就是要买设备，成立什么实验室，一定要跟着人走。你有什么样的能人，就能干什么样的事。不要人家有个植物考古我也来个植物考古，人家有个动物考古我也来个动物考古，全国到处都是动物和植物考古的实验室。动物考古实验室其实是没必要搞的，这是一个建议。现在看中国大学的研究所，我们知道北大的实验室是最厉害的，大概是1000万美元价值，是我们报的最高标准。但是这个标准跟排名前50的世界大学比，你都没办法比，那个价值都非常的低，所以这是一个欠缺。所以甭管是做什么方向，多大的规模，要做规规矩矩的考古工作室。第二个建议，我觉得就是怎么样重视领导、宣传领导，这是考古专业在中国发展能够得到好处的一个方面。另外我很在意刚才李零老师讲的，魏老师你们这个团队比较熟悉的北方民族考古是最吸引人的，并且是吸引团队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吸引境外的关注。中国大学考古与外国大学的差异之一，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触摸感觉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像咱们北大、吉大这类学校，特别包括人民大学，将来都有这个优越的条件，吸引国外的教师和学生。目前国外高校的考古学评估，一个是校委会评，一个是同行互评，一个是师生评价，一个是国际教师评价，一个就是国际学生评价。像考古学排名世界第三的伦敦大学学院有350名研究生，其中210名硕士生来自25个国家，你可以想象他们对全球文化触摸的程度，跟我们的差距有多大。所以说教师的国界，包括学生的国际化，我觉得人大在北京是会有一定优势的。假如说中国的大学也能够像国外的名校一样，我们的老师至少有10%～15%是外国老师，还有大量的外籍学生……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些，所以不能走在前列。你看台湾的台南艺术大学，他们的学生要去大陆留学，那多半是要去北京，川大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是，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尤其真的要搞文物考古，我想在整个亚洲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三个建议，大学考古专业的本科是很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讲，很多来考北大研究生的人都是为了改变出身，甭管我是烟台师院、曲阜师院还是哪个地方的本科生，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就能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其实现在用人单位就看你学考古本科哪

念的，北大，那没问题，甭管你哪的研究生。可是一听说你是烟台师范的，他就要想一想了，虽然是北大毕业的，但是你的本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人大现在的学科建设是要招本科阶段的学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这个教学体制还是看本科。

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张爱冰教授：

我们安徽大学考古专业2002年才开始建立，是一个很弱小的专业。看到魏老师搞得这么好，我们觉得很惭愧。我讲点体会吧。第一个，我上午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博物馆，刚刚进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学科简介，各种情况对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是人大的这个博物馆藏品从无到有，来源比较集中的是赤峰，还有一个是兖州，还有一个是二里头，还有教科书上的那几样器物。

魏坚教授：

二里头和郾城那些文物是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所长支援的。

张爱冰教授：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作为一个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这么一个博物馆的基本藏品的话，就有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他非常有眼光。当时他曾经也跟我讲过，征集这些东西吃了多少苦，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博物馆，博物馆还是有很多亮点，我觉得这一点做得非常扎实，非常好。

第二个，我看了他们的学科简介，近年有一个考古发掘的团体资格，在这几年注重田野发掘的基础上，马上就要建一个稳定的考古实习基地。我们安徽大学最近这一位新校长程桦，这一两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2013年给了我们300万，其中200万建了一个文物保护实验室。那么还有100万，他说这个也要买看得见的东西，买点设备，再买几个显微镜，只有5万能做实习基地的建设。所以，我觉得魏坚老师注重这个田野实习基地的建设，人大注重博物馆的建设是走对了路。安大一直想要建博物馆，但是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但是魏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较高的标准建起了博物馆，现在作为考古专业最基本的一个实习基地也在布局之中，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下一步，我要单独跟魏老师来联系，来学习下经验，怎么才能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因为这一次黄河七省、考古司也去了，我和我们主任还专门见了一下考古司来的负责人，跟他谈到这个事情，希望也能解决我们的实习基地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办好一个考古专业非常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最后想说的是，人大考古专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从无到有，我觉得是和学科带头人的这种精神和他这种踏实的作风分不开的，所以我表示表示钦佩，而且表示祝贺！而且预祝人大考古专业越办越好！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系武吉庆教授：

我是属于考古界的圈外人，在9月16号之前是河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院长，这些年跟魏先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是在2001年上的本科专业，这里面，王巍先生在我们学科建设当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对我们来讲，这个学科里面我觉得跟魏老兄您离的最近，您那个最具有借鉴价值。这两年因为河北省有一个泥河湾考古，上次11月份的时候，高星老师、魏老师，还有几位都去过那里，我们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契机，抓住这个机遇，这两年是有了很大发展。从经费上来讲呢，就说这两年一下就拿到了将近两千万的支持。之前有一千多万，接下来还有500万，那么如何建设，其实我们还是十分茫然。我在这不多说，我希望各位先生有机会到我们那里，指导我们的考古学科建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文博系主任肖小勇副教授：

首先热烈祝贺人大成立考古文博系！我是2008年开始在民大做文博工作，我们的考古现在还没有展开，所以这方面也谈不上经验。这次到魏老师这来参加这个庆祝会，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魏老师请教，正好也利用魏老师提供的这个平台来听取、吸收大家关于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指导。魏老师是2004年到人大，我是2005年到民大，我们俩的起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两个学校呢，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觉得人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包括引进人才这方面，我和魏老师就经常沟通，经常是我们引进的人才，最后都被引进到人大去了。今天，我查了一下魏老师手下有三个老师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人大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我也非常羡慕魏老师，有学校的支持、院里的支持，还有人才的支持，但是我们感到很欣慰的是我们也经常能够给人大提供一些人才，所以这也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这几年跟人大、跟魏老师的合作是非常多的，今后我们多向魏老师学习。尤其是魏老师今天那个话，就是要重视领导，这一点你们做得很不错，我今天真是深刻反省了几个小时，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培养。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任韩建业教授：

我要衷心祝贺人大在魏坚老师带领下成立考古文博系。因为我跟魏老师接触特别多，也特别佩服老师。第一个，佩服魏老师能够从一个人的力量发展为现在这个令人羡慕的规模，非常了不起。第二个，佩服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还有学校。像人大这么高层次的学校能够每年引进人才，把考古放到这个位置上，当然，我说还是魏老师本事大嘛！但是还是跟领导的战略布局是有关系的，这还是得承认，他引进你的时候是有一个想法的。人大强的

学科多了，为什么非要支持考古呢？他是看到了考古是个新的学科，是个可以发展的学科，这些年全国高校能做到这个的，我看人大是第一。还有这次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北大、清华那多牛啊，名列第一的一级学科最多。人大这几年没有搞合并，没有特别的什么变化，但是它的排名第一的一级学科比北大、清华也差不了太多，这个跟人大的主要领导有眼光特别有关系。这几年人大发展快，特别让人羡慕的也体现在考古方面。我要向你们学习的太多了，但是，因为学校和学校之间差别太大了，我们只能学习你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想尽一切办法做事的精神，具体的让我们也很难学到。提一点建议，我们一个系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这个专业怎么弄、本科怎么弄、博士怎么弄，但是我想作为人大这么高层次的学校，恐怕更多的应该首先确定一下我们学术发展方向。学术方面的创新点到底是什么、特色是什么，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布局，这是一切的基础。至于说这个招本科等等这些，当然也都很重要了，我们也得琢磨。但是作为人大这个定位，跟北大和吉大的学术方向的差别是什么，我这个地方几年之后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应该有个想法，不能说来个人做点什么，再来个人做点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些更高的追求。同时也祝贺人民大学给我们开创了一条新的路，我们也能跟着魏老师不断地学习，不断前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张荣强教授：

我发言觉得有点尴尬，就像后滨老师说的一样，我们都是圈外的。大概我最多的是关注一下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今天来主要是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和我本人，对人大考古文博系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今天我们看到人大考古有了10位老师，3位教授，我们的祝贺，实际上是我们给人大输送了一个人才，送了一份厚礼。刚才我也跟黄兴涛老师说我们现在支持人大，希望人大发展起来以后支持我们。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研究员：

关于学科建设的问题，刚才高校的先生们谈得都很好。今天在这里，我从一个用人单位的角度，对于不光是人大，包括各高校谈些想法。刚才川大的李教授讲的我非常赞同。你不管是本科教育也好，还是硕士研究生教育也好，都是个基础性的教育。我们各个省的考古所包括地县级的文博单位，我们和王所那种中央所没法比。中央所他们的工作都是带着课题任务做主动性的考古。省级考古所就是一个基层的考古单位，我们所面临的首先是训练动手能力，就是各高校都应该加强最基础的教育。如果说你的学历再高，不管你是博士还是硕士，现在各文博单位每年招聘人的时候，首先要看简历，

你都学过什么样的课程，参加过什么样的实习，你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我首先是看这个。然后我再看你，本科学的是什么？是哪个学校的？比方说我们今年招聘三个，我们没设很高的门槛，比如有些地方必须是博士、硕士，我们本科就可以。结果全国一报名，经过筛选，符合报名条件的有六七十个，大部分都是我们各个师大新办的专硕班的。因为他们本科没有经过专业性的教育，仅仅是经过两年的专硕培养，两年的时间他还要写毕业论文，他根本不可能掌握考古学的基础性知识，结果到我这一切都得从头学起。那我更需要的是具备动手能力，具备一般性考古学基础知识的，我就需要这一类型人才。不管你是博士、硕士，你学历再高，你只要具备动手能力，脚踏实地地做这项工作，那我非常欢迎。如果说我们光仅仅是一个高学历，来了就是冲着搞研究，那作为一个省级考古所来讲，我不会进几个高学历人才供着你，大家在做基础性工作，让你专门来搞研究。所以我有一点建议，就是一定要加强基础性教育。最起码从山东考古所来讲，我们是欢迎这一类学生去我们那工作。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宋玉彬研究员：

可能我说的和大家说的都不太一样。因为每次见到魏老师，魏老师都给我很多鼓励，今天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回报吧。通过今天一天的会，我感觉人大要以北方民族为特色。但是这里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校学科人才的培养，刚才郑所长也说了用人单位的需求。我觉得北方民族应该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需要国际性的视角。从培养人才的角度，不能老师会了教给学生就完了，如何建立一种互动？那就有可能从吸引学生的角度考虑，比如俄语、日语、韩语、蒙古族语，从招生这块就要界定上学的语种。要说的远一点，我学考古就跟林先生有关系。我84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的分数，吉林省的重点分数线是480，我正好是480，林先生说招个俄语的，我才能有幸学到俄语。所以从人大的角度，吸引考古专业本科生的时候，招生条件能不能在外语上做一下限定。前些时候我们在长春刚开了一个高句丽、渤海的学术会，提交了四五十篇论文，基本上是以国内的视角看问题。但是，高句丽和渤海绝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北亚的问题。但是从东北亚的角度来审视这个课题的人很少，也包括在座的很多先生。我们今年和俄罗斯合作出了一本滨海的女真图录和一本渤海的图录。我们出这两本书的目的就是，国内也很难能获得这些资料，即使获得了这些资料，也看不懂。我们就用非常便捷的手段出了两本图录，给学术界开启了一扇窗口，只能说了解相对的一个动态，如果说仅靠这个图录还是很难。我们所存有大量俄语的资料，但是懂俄语的人没

有，所以我向魏老师提一个建议，如果人大想把北方民族考古研究好，注意培养学生的外语素质也很重要。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梅鹏云研究员：

大家提了很多建议我都非常赞同。第一点，对于人大在魏坚老师的领导下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成绩我感到非常钦佩。第二点，从学科建设来讲，人大先招硕士、博士，现在开始招本科生了。照我的理解一般是先本科，再硕士，再博士。现在是倒着发展把这个学科建设到位了，这我确实扫了盲。第三点，我觉着这个会对于我们用人单位来说，就像刚才王所长说的，就像一个供需见面会，一个洽谈会似的。我们的学科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培养人才？实际上是我们的大学，特别是人大，将来从哪个视角去更多的考虑地方应用的问题。就像刚才郑所长讲的，就是动手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个人感觉，实际上我们不仅仅要培养人才的专业能力，更多的还是一个综合能力的培养。其实地方上用人，并不是看你是搞旧石器、搞新石器。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根据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它的实际需要来决定你做哪个岗位。可以说这几年，我感觉，就用人单位来说，“高分低能”的毕业生有的是，学历很高也不好用的也有，而有些是本科生的倒用得很好。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个研究生起草个报告，但基本的情况都写不清楚，驴唇不对马嘴。有的没有研究生学历的，如果写得很流畅、很通顺，有的可能没有学过考古的，但他写起来觉得很亲切，思维很到位。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能力。在地方上我们每年都要考评，考评叫“德能勤绩”，现在加上了“廉”。实际上，“德”就是我刚才讲的综合能力，我们的培养应该在这方面加强。除此而外，还要加强各方面的素质教育，其实文理兼收也是这个行业素质的基本需求。

一个高校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重要，现在中国高校总是在搞学科排名。你的这个学科，你培养的人，你毕业的学生，在各地发挥的作用怎么样？比方说，我从一个高校连续进几届学生，我都觉得不是太好用，或者他不具备能力的话，那么你这个高校，可能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就要打折扣，反之，人家都说非常好，非常优秀，那明年我还想要。

魏坚教授：

高校要了解用人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贾鸿键副所长：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首先表示祝贺！此外，我建议人大多培养人才，建议魏老师多推荐学生到青海去。现在魏老师的一个研究生已经到我们青海考

古所工作了。这几年我们所里已经是老年化了，现在每年都有退休的，前年进了两个学生，今年又进了两个，今年是四川大学李永宪老师的学生。明年我们又有六个退休的，指标是比较充足的。这几年连着每年都有的，希望多培养能到青海去工作的。因为青海是比较艰苦的，但是青海的大门现在是敞开的。青海72万平方千米的文物考古研究这一块研究项目很多，人才确实很缺，现在我们已经跟四川大学在玉树这边有合作。长江源头、三江源头的东西是很多的，都有学科研究的课题。我希望全国的各个学院，多培养出人才来到青海去。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华玉冰研究员：

我是带着一颗十分真诚的心来祝贺的。至于用人单位的想法，魏老师和学明都是从所里来的，都很清楚。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来就能搞发掘，所以说得加强田野教育，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更多地还是想谈谈感想。第一个是来了以后，感觉特别尊敬老师，更加羡慕老师。第二个是我们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作为地方考古所，帮着学校培养学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我对这个非常热情，可能下个月我就要跟学明院长，我们两个要到辽宁去选点儿啦，要在辽宁建立考古实习基地。第三个是我希望将来人大的学生毕业了能到我们辽宁所来，因为到现在看北大的这几年根本要不着了，陆续的各大名牌大学本科生，包括山大的都很难到我们这儿去。就说将来人大的学生能不能到我们所，这还真的是个问题。希望将来优先考虑到辽宁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吉平研究员：

我说两句吧。首先，魏坚先生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今天在这儿看到魏坚先生在人民大学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作为他的一个学生，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另外，我不知道其他省所有没有接到新的精神，我们现在接到一个文件，内蒙古考古所已经不让接收本科生了，这个是很麻烦的。这是内蒙古人事厅的文件，已经不让进了。如果是211大学的每年还可以有一个，其他的不允许的。此外我在这儿想表个态，希望我们内蒙古东部地区，至少通辽、兴安盟能够成为咱们人民大学教学实习的一个基地。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永军研究员：

很高兴再次来到人民大学，这次第一是来祝贺，第二是来学习。今年是第二次来人大，前两年人大举办北方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都会来参加，获益匪浅。要说在学科建设上，我们觉得在本科的教育阶段，应该加强基础学

科的培养。前面也有几位老师说过这个事儿。现在有很多高校都是文理都招的，像北京一些高校，像黑龙江大学也是新成立的考古专业，它也是文理科都招的。我想在考古学发展的多学科交叉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学生的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一些理科的知识也应该加强学习。比如说数学，数学现在在文科的很多教学里都有，围绕考古学的课程，也应该加强高等数学的继续学习，将来在考古工作中很多都要应用到。比如说计算机方面的、考古绘图测量方面的，都要用到数学方面的知识，这是我的一个小的建议。最后代表我们所里说点希望，因为人大的特色是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我也希望人大的学生将来能到我们黑龙江去，因为黑龙江跟青海一样，也属于边疆地区。可能一些学生不愿意到黑龙江，但是我们黑龙江这几年的条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希望魏老师能考虑一下，多做些学生的思想工作，到我们黑龙江去，考古的学生首先要热爱边疆。我们欢迎人大的学生到我们黑龙江。

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教授：

首先谢谢老魏的邀请，不过我也是你的兵啊，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兼职教授，所以我也是有责任、有义务把咱们这个学科搞好。特别是魏教授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光我来人大讲座就好几次了，每次都是魏教授亲自引导，给我捧场，所以我说我是有责任的。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人大成立考古文博系表示祝贺！刚才大家讲的，我也觉得现在各个高校都在揣摩怎么办这个考古专业，因为这几年考古比较有钱了，国家文物局每年这个钱就一百多亿，所以各个高校也都来办考古专业。有的师范院校办的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很小的师范院校也要办考古专业，大家都想找出路，都想找这个市场，把考古专业作为一个市场来看待。所以，这个专业建设本身，从根上就可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要把好这个关。我们人民大学的魏坚先生，他原本在内蒙古考古所工作就有很好的基础，特别是来到人大以后有这么好的人脉，动不动就给我们下个指示，我们都把它当圣旨来领会，所以我觉得有这样非常好的一个人脉资源，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有这么多人来捧场，抱的期望也大。刚才黄兴涛院长也说是没想到，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和后滨他们来往比较多，这次相应的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

第二个还是要抓科研成果。刚才几位考古所长都讲要来了就能干，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太难，年轻人要到工地上去慢慢磨，总能练出来。但是我觉得在科研成果上，还是应该严格要求。这几年我看咱们的科研成果比较多，所以相应的包括很多知名的学校，包括清华大学等等都拿了很多钱。做的课

题有：信息技术在大运河里的应用、信息技术在早期文明探源里面的应用等等，我看了以后实在不敢恭维，写得很差。有很多都是让学生拼凑，我把这些稿子都退回去几遍了。所以从学生开始就应该给他们严格要求，就是说不光是能挖，挖完还要能写，要能提高，要能总结，现在我们国家每年出书41万种，85亿册。但是我们真正能在国际上叫得响的书有几本？别说咱们考古了，就是其他专业也没拿出去。就是我们真正能拿出去叫世界上公认的东西，我们现在还不太多。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人大有这个北方民族考古我觉得非常好，能不能作为一个特点？因为魏坚先生他写的关于草原景教的文章都是我感兴趣的，我们俩原来也讨论过，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这都是真正的能引起国际上注意的。刚才几位先生也说了，国际上注目的有哪些？我们应该做的是哪些？当然现在文物出版社就是一个很好的这平台，因为美国四大亚洲研究中心都包我们的书。就我们这儿的书不用外文，只要有图片他们都要，每天的订单都是一个劲儿追着呢，而我们现在的关键是拿不出好东西。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倒希望是在魏坚老师的领导下，首先对本科生就开始严格要求，科研成果一定要做好，真正拿出在国外能叫得响的东西。我给王巍所长说过考古学年会的报告，年会出的一年一本，现在出着越来越厚，但是质量却越来越差。这个也有原因，很多好稿子要投给《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到了这种论文集，质量就比较差了。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从开始对咱们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要给予严格的要求，让我们人民大学的这个品牌能够拔高，能够经得起考验。若干年以后觉得我们这个专业是能挺得住的。这是我的期望，谢谢！

中国文物报社曹兵武总编辑：

来了就说几句。第一个是很高兴，因为咱们人民大学成立了考古文博系。刚才老师们讲了很多需求问题。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博物馆，我们国家搞考古的人，跟人家发达国家比还是差得很远。中国应该有中国的考古。另外，整个咱们文博行业里面的差距就更大了。咱们国家号称十万从业人员，里面的专业人员是很少的。而且这个社会发展水平十万也不多。实际上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需求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增加这么一个新的平台来培养人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第二个是很感慨，赞美魏坚老师的话说了不少，还是比较感慨这么几年有人打开这么一个局面。所以非常值得祝贺！很多先生也都谈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包括学校怎么搞，考古所要什么样的人？我也想谈谈，看看我们这个学科和人才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需求是什么，到底潮流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刚才也有老师提到当年俞先生提的一些新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现实。这些年考古的增长点就在这一块，我们原

来搞的这些东西不是说不要了，实际上还是一个基本功。文化史阶段的考古学，各地要搞谱系，最近二十年最大的增长点实际上就是在新的这一段实际上就是新考古学。我们的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包括很多技术手段，这几年是我们考古学最大的一个增长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史阶段的考古学、新考古学、人类学阶段的考古学，目前已经做的比较成熟了。下一个阶段的考古学是什么？我感觉文化遗产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考古学。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发展，需要什么人才？这个概念没有很好的提炼出来。我们这个系叫考古文博系，实际上这几个方面都想到了，用个什么词来概括确实很难。我们还需要有很多应用型的考古，我们除了基础学科、除了研究人才、包括考古所都说要来了就能挖的，这是不是一种应用也很难说。刚才杭侃老师提到说，考古学有什么数字传媒，这种应用是非常多的。进入文化遗产时代之后，我们对考古的需求与原来就完全不同。这种人才怎么来？还是要靠高校来培养。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大家都体会到，这个行业里面急需什么人才呢？北师大论坛谈到急需规划人才，规划人才可能不是说考古可以直接搞的，没学考古的也搞不了规划，但是实际上规划也是一个环节。比如说调查，现在经常动不动就调查，这些东西我觉得其他学科也教不了，也就考古能教的了。价值评估，可能我们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价值评估，但是一旦应用到社会上，学术研究这个价值只是一部分价值。文化遗产的价值放到社会上，它跟经济什么关系，跟地区发展有什么关系？文化的研究抽象价值是什么样？长远来看怎么容纳装到规划里面，都是我们传统考古学忽视，现在需要重新考虑的。包括大家都注意到的现场保护，发掘之后的保护，发掘过程中怎么处理，将来才有利于展示、有利于传播。我觉得这都可以定为我们应用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你们本科生不一定都掌握，但这个基础思想观念是要树立的。可能一个学生进到一个考古所挖的好不好，前两年可能比较难，但挖几年就会熟。但大学四年这个基本功打下来，他是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技能，这点对于人才培养是非常关键的。实际上文化遗产时代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考古资源怎么管理，怎么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大家都意识到这几年公众考古发展比较快，实际上公共考古只是普及很初步的，更重要的是这些遗产怎么管理？考古发掘和研究也是利用的方式之一，这种利用怎么平衡，社会各方面怎么协调？就人才需求很重要的方面打个比方：法律规定，我们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有“四有”，其中之一就是，要有机构、有人才。那么，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考古学和文化遗产方面的知识是最基础的。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学科建设能搞好，能提供一个好的思考，对于下一个大的发展阶段来说，应该是一个趋势和潮流。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主任吴东风研究员：

首先祝贺人大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的成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在学科建设上都有很多很好的建议，我都非常赞同。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谈谈。我们这个部门是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也可以算作应用型单位。我以前就是学考古的，七八级的，我和魏坚是同班同学，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班20个同学，从事的职业有很多种，有搞行政管理的，有真是还在田野挖的，也有当老师的，还有搞古建的等等。我建议，在咱们今后考古文博系的课程设置上，应该面宽一点，而不只是有类型学、地层学。现在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和国际上的对话能力，特别是在考古这一块，我觉得是应该增强的。那么这个基础就在大学的教育。光是知道仰韶文化远远不够，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从国内来看，过去我们考古专业的学生毕业以后，多半面临这两个选择，一个是考古所，一个是博物馆，现在这两个远远不够。近几年世界文化遗产热，刚才曹主任也讲了，文化遗产这个领域很广泛，有好多事情需要人去做。比如说现在的大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的建设，都需要人去做。谁去做呢？除了少数几个单位能做，都是其他系统在做。学考古的、学文物的、学文化遗产的人做不来，我们缺这样的急需人才。就拿我这个单位来讲，我这个单位叫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就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全国文博技术的信息化。就是信息系统、信息管理，这个数字技术，我们学考古大多是不懂的，你别看我在当主任，我根本不懂。而懂这个的人又不懂文物，不懂考古。说我们挖出大量东西，大家都知道，考古所好多同志，挖完了放到一块就完了，好的写个报告，不好的连报告也不写就扔了。这个是信息这一块。所以急需懂考古、懂博物馆、懂文化遗产的人。所以，如果能够克服困难，哪怕就是给他们讲讲概念就好。第二个方面，我们单位还是个咨询机构。那么目前能做的事情，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保护和技术方案都在我们这审核。随着国家听证审批权力的下放，从明年开始，我们单位就要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来承担这个事情。因此，我们特别急需这方面的人才，那从哪来呢？一般的学院和系，没人培养这样的人才，只有靠我们的专业，靠在座的这几个大学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从事这项工作。我们的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上一个新台阶。此外，现在遗址公园的建设、大遗址的保护都急需规划人才。你想做一个保护，首先要做一个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好多项目要实施保护，一般要用几千万，那么这么多钱，值不值得投？投在哪？都要进行评估。谁来做？如果我们只是会挖，只是会讲类、型、式，这方面的人才就会显得特别缺乏。

林沄先生：

这里我插一句。我觉得这个要在本科生阶段就去完成，完全不现实。所

以我刚才说，应该想办法在专业硕士中去培养，而且要有专业部门的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知道我们现在什么人在给他上什么课，他就可以适合做这个工作。那么学校里培养这种专业硕士，包括导师，就应该既有考古学方面的，还要有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两方面相结合进行培养，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应该委托学校来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人民大学就可以。

吴东风主任：

路上我跟王巍所长讲，现在我们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是都会挖。但是分配到各省，到底考古所能容纳多少人啊？事业单位都有编制限制，往往是需要人进不来，而我们的学生又没有地方可去。刚才我讲的这些类别，学校就没有学生，也没有设立这样的培养体系，干起来也很困难。如果说像林老师讲的那样，那当然好啦。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本科生也好，研究生，至少还得了解一下，或者请一些老师，不同行当的人过来给讲讲课，大家可能就会感兴趣。比如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他可能会想，今后我可能会对文保规划感兴趣，有的对大遗址保护，甚至古建筑感兴趣，现在好多学校的学考古都的去干古建去了。现在国家在文物保护这块投入经费是越来越多了，而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像我们单位，现在虽然80个人，但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各大学能够输送优秀人才。

魏坚教授：

谢谢！我看后边还有好几位没有发言，像郑大的郜向平、复旦的潘碧华这几位年轻老师还没说话呢。刚才没发言的都跟我坐一块，把没来得及说的话再说一说。今天下午我们研讨的是学科建设问题，特别是涉及人大考古文博系这个学科今后该怎么发展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后来谈到了我们整个考古文博学科如何发展的问题。现在看来，我们这里边都是远见卓识之士啊，都对我们国家文博事业用心良苦。特别今天后面这一段，几个省所所长的发言，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高校人才培养方面的注意。包括后来几位在京专业机构领导的发言，讲的这几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有哪个学校牵个头，把大家找来，而且一定要有用人单位参加，认真地讨论讨论，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当然我们也有我们学科的基本发展的套路。同时我想就现实应用来看，国家搞文博专业硕士本身就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跟世界接轨的一种举措。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本来也就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诸位谈的都非常好，可惜就是时间太短了，这个对不住大家。总之，我觉得这个会能请这么多神仙过来，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关心人大考古文博的发展，我觉得心里边特别热乎。我要跟大家说，人大的考古专业走到今天，学校和院系领导都很支持，我们院里这几任院长，几任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系里的领导都非常重视。像前任的院长陈桦教授，孙家洲教授，副院长成崇德教

授、李小树教授，他们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关怀，让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工作，干得有心劲，否则早就趴倒不干了。现在的院党委书记刘后滨教授，我刚来人大时他还是个年轻教师，我俩一块坐火车到石家庄联系，跑到保定去安排发掘点。看来人还要面子，我要干得不像个样子我连老师都对不起。要有决心，更重要的是慢慢地建起了一个团队。我想大家不要忽略这一点，做成一件事不是靠一个人，是靠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要有向心力。一方面大家知道这件事有关大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大家还得有个热乎劲，有点义气，有点肝胆相照，风险共担。所以我认为我们觉得比较欣慰的一个是院里边有很好的环境，另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好地团队。我们印了个简介小册子，看得出是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团队。我特别强调这个事，是想说做成一件事，没一伙人跟你合着干，就什么也干不成。而且我们能走到今天，就能预料到今后的明天可能会更好。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在座的各位掌门，继续支持人大考古和我本人，即便我明天退休了，还有学明、梅田他们，还有好多年轻的后起之秀，他们现在刚刚四十出头、三十出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想将来还要继续仰仗各位，为人大的考古学科的发展出谋划策！

征 稿 启 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十周年之际创办的学术刊物。本刊本着加强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普及考古文博知识的宗旨，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及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研究。

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拟每年出版一辑，目前拟设置的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考古与科技；⑥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同时欢迎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投稿。

稿件具体要求：①论文不超过15000字，考古发掘报告字数可适度增加；②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300字左右）、关键词（3～6个）及作者简介；③注释统一采用文后注，注释格式请参考《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的样式；④译文需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以免发生版权纠纷。

《北方民族考古》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后3个月内通知作者。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一经刊用，即奉样刊五本。

联系人：李梅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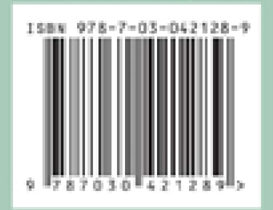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limeitian@hotmail.com（如邮件超过20M，请发至578134457@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邮编：100872

(K-2041.31)

www.sciencep.com



定 价: 108.00 元